

附刊

美國撥華的新努力.....歐陽長虹

英國經濟危機的剖視.....費正

養民·教民·治民.....蔡尙思

物價變動是政治狀態的晴雨計.....郭大力

論所謂官僚政治.....王亞南

「真理」在北平被扼殺了.....孟秋蟬

記北平市助學運動.....趙鎮乾

鄂爾多斯草原的警報.....陳微子

動盪中的廣東.....漠南

「歐琴妮·葛蘭德」及其作者.....林海

宋陽與語文改革.....焦煤

露出了狼的牙齒.....淳風

歷史劇的道路.....霍然

俞平伯的散文.....晦庵

「假鳳虛凰」觀後.....容方

評「藍色狂想曲」.....逸之

法國裝飾畫專校.....王益之

漫畫.....黛英·人之初·方成

讀者之聲.....嚴禁自殺
打倒學歷制度
自由主義者不應反蘇反共
「訪蘇三月記」擬出單行本
八月的調整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自白
「今日美國」續稿即到

1

第一卷
國立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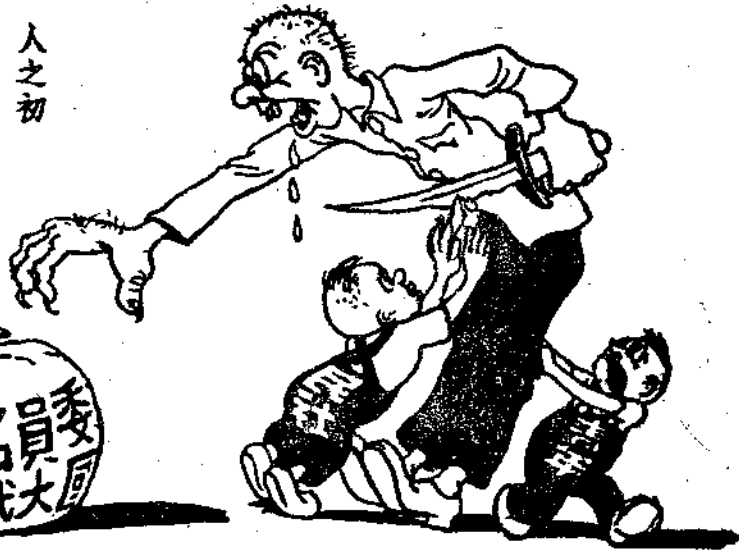
本期刊幅增加·每冊幣四千九



返魂有術

人之初

英黛 「……好講先，點慢」



準奴隸的新裝束

人之初

英黛

食爭民與



美國援華的新努力

——總結魏德邁在中國一個多月的活動

一 魏德邁在中國「調查」後將有何項建議

客：魏德邁來了又去了。在他離開中國之後不到一個星期，紐約先鋒論壇報有意無意地透露出他這次來華的真實使命，原來是要「考慮中國現政府勢將垮台及蔣主席將失去中國領導地位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同時研究萬一「南京現任政治領袖一旦被掃除後，中國將發生何種局勢」，以及「美國政府在此情形下又將採何對策」。

這個透露與你一個半月之前在本刊第十九期上所推測的，大體上若合符節。不過，在你的那篇文章中會有若干結論今天你看那些結論還適合麼？

主：先鋒論壇報那篇社論所透露的，實際上只說到了魏使團使命中「調查事實」Fact-Finding的方面。而看魏氏在華一個月零兩天期間的所作所為，他的真實使命却決不僅限於「事實調查」，同時也在代政府力謀挽救的妙計。

在我那篇拙文中，我曾預測「魏氏將以蔣主席的老幕僚長的身份，親自參加（縱使還不是主持）山東以及東北軍事的策劃和佈置，並從現地軍事發展中，判斷出究竟國軍對共戰事是看長呢還是看短？」我這預測果然沒有錯。不看嗎，當魏氏飛抵中國境內之時，正是南京舉行軍事會議之際，北方將星雲集都城，外間盛傳魏氏抵華的第二三天，即接見了李宗仁，傅作義等北方作戰首腦（這傳說後來被證實了，不過人數不若所傳之多罷了。其後，魏氏便僕僕風塵，飛濟南，飛平津，飛瀋陽，所到之處，每與當地的作戰指揮官「長談」，尤其在瀋陽時曾與參謀總長陳誠（當時似已內定為東北行轅主任了）作「竟夕長談」。凡此，豈不都是證明魏氏在親自參加剿共軍事的策劃和佈置嗎？

客：是呀。我看他這樣東飛西飛，多少還帶有替政府軍打氣的作用呢。過去七八個月當中，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援助確實很少，許多高級將領不

免有抱「美國要拋棄國民黨」的想法的。再加「政府近年來在宣傳上特別強調國共之戰是「國民黨替美國人打的」的一點；政府原來的用意也許是要逼美國多放點東西來，然而這種宣傳却產生了一種不幸的副結果——不少將領竟因此而埋怨美國不盡量援助，而不願賣力打仗，結果竟使士氣會更消沉不振。

這種情形似乎很使美國政府不安。此外國民黨高級人士每喜把戰敗責任推卸於美國過去的調停政策，認為如果不是馬歇爾的調停造成了一正式承認共黨的合法對立地位和「談談打打」的局面，共黨決不會如今日之猖獗——這種宣傳也使美國感到煩惱。

為了鼓勵政府軍的士氣起見，美國曾經撥過一億三千萬發子彈給政府，表示美國決不放棄政府。這次魏德邁之以特使身份在中國各前線重要地帶飛來飛去，當然也是鼓勵士氣的作法之一啊。

主：你這話很有道理。不幸，魏氏的來華却並沒能對當前戰局發生扭轉的作用。政府集中如許兵力在山東戰場，一大半的意義固然是從戰略的着眼點上，要「爭取沿海，打通津浦，貫穿東南與東北」；一小半的意義却也不無從戰略上着眼，在決定的戰場上打一兩場漂亮的決定性的仗給美國看看，表示政府在軍事上還多少有些把握，以堅定美國對政府失望動搖的心理的意思。可是，狡黠的共軍却偏偏不肯被動地在山東戰場決戰，反而把陳毅的部隊撥出三分之一交給劉伯承，與劉部陳賡等部隊，以號稱廿萬的大軍，乘虛渡黃河向南，突入江淮河汙之間的廣大區域，目的似在重建大別，桐柏、伏牛、幕阜、皖南等共區，形成對政府軍的腹心威脅，消極企圖在於迫使政府軍把集中於山東的龐大兵力分散，同時減低了山東主戰場的重要性，使得原可樂觀的整個戰局形勢又呈極度不穩之勢；積極企圖則在配合即將到來的東北六次大攻勢，展開所謂「大反攻」。這却是魏氏以及美國軍事顧問團所未曾料及的。

劉伯承部之能突破黃河天險，並在二十天之內急進一千多里，而且如



入無人之境，很少受到國軍有力的阻擊。這種情形更使魏氏感到沮喪和失望。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魏氏纔不能不公開坦白地承認，他「發現的軍事情形比較一兩年前更趨惡劣」，而且絕望地發出「單靠軍事力量決無消滅共產主義可能」的警告。

客：你上次那篇文章會說，假如魏氏對國民黨失望絕望的話，他可能「勸告國民黨縮短戰線，集中兵力，儘一切可能在美國大量支持下，確保一個南北朝的局面，把中國劃成兩部，由美國和國民黨統治其一部來與另一部相對立」。現在怎麼樣了呢？

主：在魏氏來華之前，聽說美軍顧問團中很有人這樣強調地主張，并確曾提出類似的建議。不過他們所說的「南北朝」，并不是像外面所謠傳的那樣劃黃河爲界，而是「政府軍在基本上採取守勢，必要時可放棄次要據點，但須確保已佔領的華北及東北各最重要據點，爭取時間，拖延戰局候至新軍訓練完成再行大舉進攻」的意思。爲了配合這個想法，中國政府還曾在魏氏來華之初，宣佈把中國劃分成軍事區、非軍事區、綏靖區三個區域，并暗示希望美國以全力援助政府建設非軍事區。

這建議在魏氏來華實地視察之後被根本打消了。第一、能攻者始能守，如果沒有攻擊力量，則確保大據點的計劃就沒有可能；這樣的計劃最後等於放棄東北及華北。然而。第二、魏氏既在過去曾以中國戰區司令資格將國軍運往東北及華北，於今豈能主動要求國軍撤出。第三、據說在華美國官商一致反對這個建議，他們認爲如果這樣做，「事實上等於承認中共國家，承認將廣大富饒之區域置於中共之手。」

客：這局面真尷尬麻煩得很；你看魏氏將如何行動來挽救呢？

主：局面的確是尷尬而麻煩，但美國某些有力人士總認爲，「縱使政府軍不能不喪師失地，不斷受着挫折」，但「到最後，只要國民黨能保持住若干主要港口及大城市，使美國軍火和援助能够運得進來的話，它總可以維持住這個政權，不致整個垮台」，而只要有這樣一個政府存在，「控制着中國最富饒的區域和最重要的港口，美國就可利用她，通過她來達成限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最低限度的目標」——（大西洋月刊）。

根據這一假想來推測魏氏的可能建議，我認爲大概會特別着重三點。

第一、如美國某權威戰略家所強調指陳，「中國東南部的海岸線是美國遠東的國防安全線」，因此美國必將盡一切可能來控制保持這個海岸線。照魏氏在華期間各中外通訊社所透露的消息，似乎美國是在力求建立一個有系統的海上基地網，由天津的新港起，經青島、台灣、黃埔而達海南島，而以台灣爲中心。爲什麼要選擇台灣呢？因爲「台省距離內戰戰場較遠，糧食供應亦較便利，尤其是台灣的戰略地位，足以控制甚多中國海岸，且事實上軍隊由台灣派出，比由中國其他區域調派更爲便捷」——（合衆社的電報）。

第二、如八月底東京美國太平洋空軍戰略會議所透露，美國仍要求保持「中國腹地」——成都之龐大美國戰時建築之機場，因爲「從成都，美國飛機能控制中央亞細亞之心臟」。既然是這樣重視成都，美國當然就希望戰火能夠穩定在華南和西南各省之外，否則成都的空軍基地恐怕就不是美國人所能自由運用的了。

第三、上面兩點都是基於美國的立場的。很顯然，要辦到上面兩點，勢非在軍事上支持國民政府不可；不僅因爲「蔣主席是在美國陣線之內」（霍華德語），而且因爲沒有更好的力量可以代替蔣主席的軍事力量。如何支持呢？只有幫助中國政府趕快練兵，儘可能拖延戰局，不使政府軍失敗得太快；拖到新兵練成，再圖大舉。據說，美國可能幫助中國政府在明年三月或六月以前練兵二十個師或六十個團。

客：怪不得外面拉壯丁拉得這樣緊，而且謠傳廣州及許多地方都要成爲訓練中心呢。不過，像這樣大的一個練兵計劃真是談何容易。兵員、武器、給養，一切都得從頭做起，誰能担保它能够如期完成呢？

一 魏氏臨別文告與所謂「嚴格監督下的援助」

主：我會同若干美國軍人閒談，他們不否認美國再裝備二十個中國機械師，確有相當重大的技術上的困難，但他們却認爲真正的基本的癥結却并不在此，而無寧是在於政府軍政機構的腐朽和無效率。從他們的談吐中，充份暴露出對中國那些特級上將或一級上將們的鄙夷和輕視。他們會強調指陳，如果國軍的整個指揮系統不澈底整肅，人事不根本協調，士兵的待遇（不僅在物質方面，而且在精神方面）不真正改善，單靠訓練新兵是無法解除軍事危機的。正如同政府把軍事上的失利諉

過於美國援助的不來，美國人却把責任推在政府的腐敗無能上；兩方面都在用着相當尖銳的語句來互相指摘。

客：啊！說到譴責政府腐敗無能，你對魏德邁聲明怎麼個看法呢？

主：我認爲魏德邁聲明與馬歇爾聲明有兩個最大的不同之點，是值得特別指出的。第一、馬歇爾聲明要求國共兩方的「自由份子」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團結起來，而魏氏聲明中却只要求國民政府革新政治，肅清貪污；這就是說，美國已經默許中實行了范登堡輩所主張的「支持排除中共在外之國民政府」政策，正式拋棄了羅斯福以來的「組織包括中共在內之聯合政府」的政策和馬歇爾的先調處後傍觀政策。在官式文書上這樣做，這還是第一次。所以今後美國如果再發表任何希望中國和平團結的宣言，我們就必須從這個新的角度去了解——和平團結是排斥中共在外的和平團結。

第二、不管他是外交辭令或否，馬歇爾聲明中對蔣主席總算是推崇備至，而魏氏則根本不會提及，反而還說「中國的復興有待於令人興奮的領袖」之類的話，好像蔣主席還不能算是一令人興奮的領袖似的。這一點似乎暗暗烘托出美國對國府主席的深刻失望和不滿。

客：如此說來，難道你認爲魏德邁可能建議不再支持蔣主席麼？

主：不，不。記得魏德邁聲明發表之後，中美輿論一致爲聲明中嚴厲語氣而感到驚異之時，合衆社忽然發表華盛頓某消息靈通方面的看法，我認爲這看法真是再確切恰當也沒有了。我把這張報翻出來給你看。

它說：「魏氏臨別文告之發表，無疑地係希望能使中國政府實施若干改革，使美國增加對中央政府之援助有所依據；至於措辭之嚴峻，絕非表示魏氏在九月中旬返華府後將建議反對援助中央政府。其發表之時間表示該文告之影響可迫令中國政府在杜魯門及馬歇爾根據魏氏報告準備提出建議之前，能有若干革新，否則此文告應於魏使返國後再行發表。」

「文告包括兩大要點：一針對中共，一針對國民政府。魏氏稱，如中共確係愛國，則宜停止戰爭，以和平方式協助國家。此間一般意見以爲，中共倘不如此，則彼等將不能擺脫魏氏所加諸彼等之責任。」

「另一方面魏氏指斥國民政府官員之無能與貪污……若干觀察家以爲魏氏已爲中國政府留一後步，使能自振以符合美援之資格，但魏氏對

中共之建議顯非中共所能接受。……蔣主席既得魏氏文告之支持，將更有力實現革新，且可以明告國人，如欲得美國協助，若干官員非予以淘汰不可。

「一般意見以爲魏德邁之文告應視作美國外交戰略之心理行動，而不應視作對華「修改」政策之最後表示」。

客：這分析不是如見肺肝的嗎？

主：那又不然。美國是著名的 Shock；山姆叔叔的錢豈是隨便化的。他每化一文錢，當然總是希望取得加倍的利息，至少也決不會做不賺錢的生意。如他在歐洲和希臘的行爲所證明，他借錢的代價就是取得干犯被援助者主權的權利。我覺得，魏德邁聲明之所以如此嚴峻而不客氣，其主要動機之一就是替所謂「嚴格監督」下的援助政策「開路。他似乎在說，「并不是我們要干涉你們的主權，實在是你們貴國的政府太腐敗無力了呀！爲了要保證我們的錢用得適當有效，我們不能不派遣大批的財政，經濟，政治，軍事專家來一顧問——你們的政府，監督借款的用途」。

客：這豈不等於叫美國人來直接參予我們的內政了，難道政府會接受如此苛刻的條件麼？假如接受了，政府將如何對人民解釋其行爲呢？

主：這有什麼解釋不解釋的。你沒看見報上所刊載的外國通訊社的雪片也似的消息嗎？不是說：「中國政府極願按照美國願望來完全控制撥華貸款及軍火之使用」；就是說：「當局會親自向魏使建議，由美國顧問在經濟政治及軍事各方面與中國官員合作，以打開「管制」下美國援助之門」。這些消息始終沒人敢於乾乾脆脆明明白白地加以否認過，可見政府是可能接受的了。

事實上，中國對美國可以說是體貼得無微不至。美國一批評家門資本，中國立刻就來了一個調查什麼揚子公司中公司的風波。美商一說中國政府對外商限制過嚴，政府就立刻由行政院張院長鄭而重之地發表聲明歡迎外國投資。魏德邁在中國調查，不僅沒人引以爲恥，反而還召集全體國務委員及高級官吏聽訓，以致引起「魏使參加國務會議」的笑話式的謠傳。麥克阿瑟一悍然決定要舉行對日和會，開放中日貿易，中國政府立即表示同意。這麼多的問題都已追隨了美國了，接受幾百千把個美國顧問又有什麼要緊。

客：既然政府最後一定接受美國的「嚴格監督之下的援助」，那現在政府若干高級官員在那裏憤慨萬狀，寫文章，發演講，直接對魏德邁作針鋒相對的指摘，又是爲了什麼？

主：這還不是面子問題！到底是挨了罵呀，回答幾句挽回一點面子，美國總應該原諒的吧；何況一面回答，一面還是非照美國的建議實行改革乃至改組政府不可呢。而且這回答也苦心委婉得很呢。我看政府人士對魏氏的強明的反響是採用三種方式表達出來的。一種是憤慨一番；特別是紐約先鋒論壇報所說的那批國民黨右派份子，所發言論簡直近乎反美。這種反美與其說是基於對國家民族的正義，無寧說是由於個人的恩怨，因爲他們幾次求見魏德邁「告洋狀」都沒見着，惱羞成怒，所以發洩發洩。一種是婉轉解釋，把腐敗無能的責任推卸在「內亂未戢」身上，希望美國能够諒解。還有一種，也是最普遍有力的一種，就是以反共反蘇的先鋒自居，藉以打動美國的心，希望美國就遠大的立場上可憐政府援助政府，而忽略一些小節。譬如國民黨元老之一的吳稚暉老先生就有這樣的妙文：「（中國現下的）這種戰爭不能總是中國的內戰。有些外國人尙以爲這是蔣介石與毛澤東二人開爲奪家當而爭，真是荒乎其唐的看法。蘇維埃制度之最不歡迎者無疑是美國人。現在是共產黨想在中國試行蘇維埃制度，厲行種種破壞而引起的戰爭，美國人無論在何種觀點上說，都難袖手傍觀，不能不動腦筋採取行動，至少也要好好利用中國這個貓腳爪，使其具有自火中取栗的能力。」

這三種反響又在美國引起了三種回答。右派反美的言論，被美國報紙痛斥，竟說「它之有利中共至少可抵莫斯科二十五個師團的力量」。解釋的文章也得到美國催促改革的反應，認爲無論改革政治怎樣複雜困難，還是希望用最快速，最準確而且最無情的努力去完成。藉反共來爭取美國憐憫的文章亦得美國的良好回聲，霍華德系報紙說：「中國政府固有許多缺點，然而在全世界分成美蘇對立兩陣綫之時，從美國之觀點而言，有一重要甚爲正確者——蔣主席乃在美國陣綫之內，軍事家俱認爲不支持友善之中國政府實爲愚蠢。故美國必須對中國有所作爲。」

是的，只要中國真正如美國政府所希望的，「與日韓兩國在反共陣綫中合作」，魏德邁的建議除要求「嚴格監督下之援助」外，是確實沒

有其他途徑可循的。

三 形勢比人強

客：這問題講得太多了，我也要告辭了。在我們分別之前，你更作一個簡單的展望好不好？

主：上面講了這許多，歸結起來也不過只有幾句話。在軍事上，美國的未來對華政策很可能是，希望造成一個長期混戰的局面，希望儘可能拖延戰局，以便美國獲得充分時間來支持若干親美的軍人，使形成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爲美國的盟友來防守中國東部的海岸，也就是美國西方的國防安全綫；在政治經濟上，美國的未來政策可能是，以國民政府多少改組一點來「一新」美國人民觀感爲前提，然後再實行「給予嚴格監督下的援助」。

美國這種做法的效果如何，將來自有事實爲證，此刻也不必推測。不過有兩個很可能的情形是應該指出的。

第一、既然美國的軍事計劃是在選擇他所最爲信賴的人，把他扶植成一個親美的軍事力量，那這力量就很有可能在將來形成對政府尾大不掉之勢。在這一點上，潛伏有相當複雜機微的因素，其發展值得注意。

第二、無論馬歇爾、魏德邁如何建議援助中國政府，幾十億也好，幾億也好，在時間上總嫌太慢了，有點緩不濟急。如所週知，馬歇爾原想把援歐計劃和援華計劃合併起來，擬成功一個完整的世界計劃，召開一次美國國會特別會議，提出來要求批准，以免零零碎碎地提出的麻煩；但范登堡輩却直斥馬歇爾是另有政治作用，而反對召開特別國會。看這情形，不到明年正月，國會恐怕就開不了。即使國會開了，以美國大選年政治鬥爭之尖銳緊張，馬歇爾援歐援華計劃能不能通過還是問題。即使無大修改通過了，則在美國外交先歐後亞的原則下，何時纔能實行，又是問題。這許許多多，都是值得注意的。

總之，形勢比人強。魏德邁輩人爲的力量，是否能拉得住中國形勢的發展，誰敢下一個斷然肯定的判語呢？

英國經濟危機的剖視

費正

英國經濟危機的表面化，不是令人驚異的事。但發生在這一時刻，却顯得極有意義。一方面，由於它與美國對英貸款及其一般的對英政策不可分割，因此，就無異是給予目前的一馬歇爾援歐計劃一個極大的現實性的諷刺；另一方面，由於英國已成為正在推進中的西歐集團運動的中軸，而今連它也不免陷於如此可悲的危機之中，就可見西歐經濟集團的前途，實在是非常灰黯無光的。

造成英國經濟危機的原因，據英財相道爾頓稱，主要是由於「數月來美元恐慌之迅速蔓延」；此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如「入口貨之價格上漲（指美貨價格上漲——作者註）；去冬洪水及煤荒之災害，損失二十萬英鎊，並使輸出銳減」。艾德禮駁覆邱吉爾的指責時，也不認為造成英國經濟危機的原因，是在於國內生產與出口的毫無成績，而是在於進口貨價上漲（據稱進口所付代價，與美談判時相較，已增加百分之四十，與英國動用借款時相較，已增加百分之二十），履行貸款協定義務，如英鎊承兌美元及禁止輸入歧視之條款，以及歐洲復興與運緩，英國在國外負擔重大等等的結果。

英國當局這樣強調外在因素的作用，實在說來，不能算是推卸責任。因為，這次英國經濟的危機，不是資本主義周期性的危機，而係根源於財政金融情況而來的危機。這個危機，雖然與英國在戰事結束後初期所呈現的，只有程度上的差別，但已經包含着對外貿易和對外政治經濟關係的種種複雜而嚴重的問題在內。這首先就是美元枯竭與履行對美貸款義務的兩大問題。如所周知，英國在這次戰爭中，業已損失了大部份的平衡國際收支的能力和資產（如生產的陳舊落後，資源的集中運用於軍需生產，特別是無形輸入如國外投資利益，商運銀行保險服務等收入的銳減），當戰事結束，美國停止租借物資後，便立即發生國際收支鉅額赤字無法彌補的問題。當時，幸好獲得了美國三十七億五千萬的貸款，方得渡過難關。但貸款運用一年以來，消耗極為迅速，預計今年十月即將用罄，而這用去的鉅

額貸款，又主要消耗於糧食，原料甚至是奢侈品的輸入方面，與其原來擬主要用以輸入機械，改造工業設備的計劃，背道而馳，以致貸款用光，財政赤字依然無法應付；同時，貸款協定對英課予的義務，却是那末嚴重的打擊着英國整個經濟基礎，使英國喘不過氣來。於是，戰後初期的國際收支差額的彌補問題，遂又重複出現於今日，並且變得更為尖銳。英國這次面臨的經濟危機，就是如此。

英國自美國吃到的苦頭，是多方面的。第一，如上所述，英國被迫需以寶貴的美元貸款，自美購入不斷漲價的貨物，這就無異是給貸款打着折扣。第二，美國只能對任何國家大量的輸出，而輸入的却為數極少。如據英國白皮書所說：「我們百分之四十二的進口，是從西半球來的」，「可是我們只能向西半球輸出百分之十四」。這結果，當然就要使英國不斷消耗其外匯資產，而永無平衡之日。第三，這是最致命的一點，即英美貸款協定中規定：英國借到貸款的一年後，必須履行兩個主要的義務：一、是取消帝國關稅特惠制，一、是開放英鎊流通限制。根據前一義務，英國必需在其帝國及英鎊區的立場上，與美國平等競爭，不得有任何的歧視；但在英國保持十九世紀的工業技術水準的現狀下，其無力與美競爭，是毋待證明的。根據後一義務，英鎊將不可能成為英鎊區內唯一的國際支付工具，凡所得英鎊或在倫敦存有英鎊（現已有一百餘億美元之多）的自治領、殖民地或其他國家，均可將之兌換美元使用，如此，英帝國的金融體系固然勢非解體不可，同時，英國根本也無此雄厚美元資產來承兌英鎊。現在，美國貸款即將用罄，却又要應付這承兌美元的支出，當然英國是吃不消的了。

因此，英國挽救危機，便迫切的要求美國修改貸款協定。美國政府似乎也頗慷慨，立即答應在華府舉行會談，並在會談中允許英國宣布停止英鎊承兌美元的辦法。但是，自後英美會談即突告中止，關於所謂關稅特惠制一點，美國却不大肯讓步了。由此可見，所謂「美國關切英國經濟局勢

「，是有限度的。此外，英美雙方均會聲明這次會談不討論繼續貸款事宜，但將討論「馬歇爾援歐計劃」，這又說明美國還對英國玩弄着一大串的吧戲呢。

不過，話說回頭，儘管美國如何正在趁着英國的危難，佈置對英的「經濟慕尼黑」（這是英國輿論對英美貸款協定所用的評語）。但如認為英國工黨政府可以不負責任，當然也是不合常理的。首先，世人皆知，貝文外交主義的政策，就應負絕大的責任。這個外交政策在經濟上產生的惡劣後果，有下面幾點：第一、追隨美國對抗蘇聯及所謂「鐵幕」下的東歐各民主國家的政策，使英國不能增進對蘇聯及東歐各國的有利的貿易及經濟關係（據估計，現行英國對蘇聯及東歐的少量貿易，均能保持極大的入超），而減少對美依賴和美元枯竭的威脅。第二、追隨美國分沾世界霸權權餘的政策，使英國必需維持龐大的海外駐軍，一方面增重了英國的財政赤字，一方面則加深了英國人力不足的恐慌，這對於英國平衡財政，增進生產的艱苦努力，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第三、加強殖民地統治的政策（雖然花樣多得了），不僅使英帝國進步力量呼籲自治領及殖民地間基於平等友誼之上的合作互助，以增強英帝國復興能力的努力，成爲不可能，反而加深了英帝國內部的離心傾向，予美國以可乘之機，去逐步實現其肢解英帝國的目的。第四、這樣的貝文外交政策，最後不可避免的一定會歸結到一個總的悲慘後果，即英國永遠的依賴美援，喪失經濟的獨立地位，成爲美元勢力的附庸。

其次，艾德禮政府整個經濟改革政策的妥協性和脆弱性，也不能辭其咎。國有化計劃的實施，就顯然無力貫徹下去，而且業已實行的也距離工黨對國民提供的諾言甚遠，不能與東歐各國的國有化運動一樣，使能改變國內分配、管理和一般制度的狀況。其他改良主義措施，當更可想見。但以英國經濟發展的目前情形，如不從這根本的改革上着手，是很難有助於英國經濟的復興的。譬如，英國一般的工業技術（資本的有機構成），都還保持着十九世紀的水準，既陳舊又落後，假使不將基本工業部門收歸國營，以國家的雄厚資力和國民的生產熱忱，從事全盤改造，當不可能消滅這個落後現象。其次，英國經濟機構的另一特點，是不事農業生產，將千百萬公頃土地廢棄不種而充當獵場和私家花園，使英國必需依賴從國外輸

入糧食和原料，以維經濟生活。而今要改變這一腐爛性的經濟機構，使農業在國民經濟中至少能佔據像在德國或美國那樣的比重，也非以國家力量，實行土地改革，調整經濟機構，不爲功。可是，兩年來工黨政府並沒有這樣做，而只在傳統的現行制度的基礎上，從事截長補短之計而已。因此，當然的，英國雖然獲得了美國鉅額貸款，也就不可能避免其長期性的經濟危機的威脅了。

現在，艾德禮向下院提出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似乎已開始作了一些轉變。如方案中規定實行裁軍，減少向硬幣國家購買糧食而增加從軟幣國家的輸入量，增加農業生產等等，這些辦法的實行，無疑地是比較能夠有益於英國經濟的復興的。同時，英國與東歐的貿易談判，也活躍起來，英向匈購糧協定業已成立，英南貿易談判業已開始，英蘇商務談判也有重開的消息。此外，英國國內的進步力量，也在此時展開有力的運動，工黨議員極力抨擊政府的政策，但保守黨所領導的反政府和修改政府方案的活動；却被壓倒。這都是英國在嚴重危機中所顯示的一些進步現象。不過，就整個而言，英國工黨政府的措施，却還是非常令人沮喪的。她提出的緊急方案，依然不脫妥協和脆弱的性格。如裁軍一項，僅照計劃縮減三十萬人，仍保持一百萬名以上的兵額；增加農產的四年計劃，僅能在今後四年內增加農產百分之二十，而又並未提及農地使用和分配的變更問題；減少輸入也只限於消極的很小的範圍，對東歐及蘇聯的態度，仍未有原則的確立。此外，緊急方案的規定實行管制勞工政策，延長工時，禁止要求增加工資，不外表示工黨政府對於犧牲平民利益與維護大資產者利益是同樣的重視的。尤其是艾德禮強迫工黨議員以八十一票對七十七票通過延擱鋼鐵工業國營計劃，更表示工黨政府已向保守勢力低頭了。

因此，一般說來，英國在這次經濟危機中，雖然在其對美關係或國內經濟政策方面，都作了一些轉變，但還遠不足以扭轉其對美依賴和對內向保守勢力低頭，替大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局勢。可是只要後一局勢扭轉不過來，衰老的大英帝國是永遠不可能擺脫其可悲的沒落命運的。英國的掙扎，充分顯露了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在今日的全部悲劇性的窮途末路了。

一九四七年八月廿五日在上海

養民教民治民

蔡尙思

——三民主義的一定次序

最標準的社會，最正常的政治，對於一切設施，都是要明辨本末，知所先後的。例如就經濟、教育、法律各部門來說：經濟是「本」，應該在「先」；法律是「末」，應該在「後」；而教育則應該在經濟法律二者的中間。再明白的說：就是一切政策，應該先養民，然後進而教民；先教民，然後進而治民。「養」後的「教」，才免「勞而無功」；「教」後的「治」，才能「心安理得」。反之：不養的教，教而無益；不教而治，治而無效；一切責任便應該全由政府負之了！

平時言論多傾向唯心，代表領主的儒家孔孟，也不得不主張：先富後教，（論語第十三）「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教死而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孟子梁惠王）這是明認養民應該先於教民的。他們又說：「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第二十）這是明認教民應該先於治民的。到了南宋，所謂功利派的葉適，便正式提出養民教民治民的三民主義來，以為：「古者君既養民，又教民，然後治民，而其力常有餘；後世不養不教，專治民，而其力猶不足」。他如明代的范濂，清代的鈕樹玉等，都有與此大體相同的主張。（詳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二六一頁）

現在試先就中國的封建社會，君權政治的歷史來約略分析比較一下：較上等的是多養民而少治民（這是一無中取有」的看法），如唐太宗一方面實行均田制（所謂「世業口分」，是不澈底的，下同）以養民，另一方面又不以重法禁盜為然而說：「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貞觀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較中等的養民治民並重，如隋文帝一方面行均田制、建輸籍法，以儉約為天下先，所以國計之富，史稱古今第一。而另一方面又嚴刑峻法以治民，尤其是晚年特制的刑法：盜邊疆一升以上；及盜一錢以上，不論盜者與聞見不告言者皆死；四人共盜一棊枹，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斬。最下等的是專治民而不養民，如秦始皇、漢武帝、下至宋、元、明、清許多專制君主，一方面土地不均，財富集中，賦稅苛重，徭役繁興，弄到民不聊生，盜賊蜂起；而另一方面又任酷吏，用重刑，以致「赭衣塞路，圜牆成市」（秦）；或且加強保甲（元清）、特務（明）等的工作，使人民一點自由也得不到。（此點詳見「理論與現實」第三卷第二期拙作「從民國去看歷史上的專制貪污」）

民國以來，在表面上雖然已是民主，而實際

却不但遠不如唐太宗隋文帝，甚至連秦始皇、漢武帝、和宋、元、明、清那些專制君主也比不上，秦始皇、漢武帝、和宋、元、明、清那些專制君主生在封建社會，未知掛起民主的招牌，這一點是還可以原諒的；假如他們生在現代而又自稱民主，那就說不過去了！

中國政府對於經濟，不但不注重分配，使民皆有恒產，而且大發展其一官僚資本——「買辦資本」，使財富集中於少數大官富人之手，而賦稅又特別的重，徭役又特別的繁，所以工農大眾除了挨餓、受刑、被打、出戰而死的以外，幸得苟活的，多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而錦衣玉食的政府要人，却絲毫不知人間有痛苦事，還是大發其文告，大談其訓詞，大談其道德、大頌其法令。在抗戰前政府努力提倡舊道德的時候，警察滿布在大都市的街頭，一看見大眾衣冠不整，就馬上跑去，責其不合「新生活」；等到伸手想去代大眾扣起鈕扣時，才知他們並不是有鈕扣而不扣，而是已經沒有鈕扣可扣了。有些大眾便因此而對警察說：「先生！這件沒有鈕扣的破衣服，我正要把它當作大禮服，如非到大都市來，真是捨不得一穿呢！先生們不但有得吃、有得穿，而且吃得好、穿得好，那會曉得我們老百姓的痛苦？警察雖凶，聽了這話，終也無辭以對！更有甚者，聽說西北一帶，往往一家男女老幼只有一條褲子可

以輪流穿着出門或見客，有的連一條公用的褲子也買不起，連成年的女子也只好一絲不掛，如果政府要提倡舊道德，那就應該派人滿載着鈕扣和褲子到處分送給大眾，但就使能够做到這一點，也未免有點「惠而不知為政」(詳見孟子離婁下)；何況這無濟於事的一點也根本沒有希望做到嗎？政府又大派警察到處大捉搶米糧的窮民，和偷食物的小盜，以為給他們坐了幾天牢，以後就會大怕起來，再也不敢去搶米糧，偷食物了。那知他們對於坐牢，正是求之不得，每逢期滿出獄，反而覺得戀戀不捨，茫茫無所之，因為坐了牢還得半飽，可以生存；不坐牢就只有全餓，馬上死亡。單這些例子已經可以看出：凡不養民的教民，民會愈被教愈想反抗的；凡不養民的治民，民會愈被治愈多罪惡的。

要之：在經濟民主、生活平等的合理社會裏，根本用不着嚴刑峻法；假使還有人民敢做盜賊，政府竟用重典去治他，也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換句話說：就是真能養民的政府，才有資格治民；凡不知養民的政府，就全是大盜，不應該以大盜而治小盜，而應該下令罪己，用法自治。如終不知出此，那麼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不易的公例：凡不養民的時代，便由小盜賊而大叛亂，由各別的反抗而聯合的革命，如秦、明的因陳、吳、張、李起事而滅亡，唐、清的因黃巢、洪、楊的起事而中衰，以及民國以來，各勢力的代謝，各政黨的消長，都是明證。中國古代，「兵刑」並稱，以刑法為小刑，以「甲兵」為「大刑」，用小刑對付小盜賊，用大刑對付大革命；到了最後，革命勝利，便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只知「治民」始者必為「民」所「治」終。

宋陽與語文改革

焦 煤

「五四」的文藝復興，以語文改革(如白話文運動)為主要課題之一，這似乎已無可諱言。白話文運動的提倡，我們自不能抹煞陳獨秀和「過河卒子」胡適等的功績。但當時他們的所謂白話文，實際上仍只是一種變相的文言文或新文言，致後來又幾乎讓位於林琴南、梅光迪等「復古運動」的抬頭。

宋陽先生，銳利地看出這「語文改革運動」的危機來。一九三二年，遂有「大眾文藝問題」一文，解釋革命的大眾文藝問題，必須發動新興階級領導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學革命的重要；並說明大眾文藝問題與語文改革運動的關聯性與不可分性。他亢聲喊出「大眾文藝用什麼話寫？」「堅認新式紳士與平民之間尚缺少一種「共通的言語」。當其把捉到這一癥結，便立下決心掃除橫臥大眾文藝前面的一切障礙，而主張來一次新的文學革命，強調大眾文藝應該用「現代中國普通話」來寫，「五四」的白話文，不過是替歐化的紳商換換口味的魚翅酒席。關於這，他曾經和止敬作過文字上的論戰。並且更其痛快的說：「雖然，這種普通話用漢字寫着仍舊是一種糊弄局兒，然而，這種真正白話——活人說得出來的話，很容易用羅馬字母拼音而廢除漢字。至於方言文學的文字，那就只有用羅馬字母拼音之後，才能得到徹底解決。」

一九三四年的「拉丁化」運動，便是他上面這一預言的兌現。而魯迅先生亦接着發表「漢字拉丁化」諸文，對宋陽先生的意見有了不少的補充和佐證。

這以後，文藝界一逕沈浮在這由宋陽先生所掀起的論戰的浪濤中。迄一九四四年，馮至、楊振聲、聞一多、許傑等還在高呼「再來一次白話文運動」，因為，文藝的遲遲不能大眾化，一面也在於語文改革的沒有澈底。新的語文是掃除文盲的重要武器，是智識大眾化的橋樑；只有對新的語文的執着，才能催促新的文藝的誕生。我們從這方面來推斷，則可想見馮、楊、聞、許等的主張也多少是承受了宋陽先生的影響。

再說，一九四六年到今天，在語文改革上，竟有了出於我們意料的更多的輝煌的戰果。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馬、西合著的「呂梁英雄傳」，袁水拍的「馬凡陀的山歌」……這些最貼近人民心臟的作品，以及今年才創刊的時代日報「新語文」，在在都說明了語文改革運動是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可是，我們能否認這些都不是受了「新興階級大眾語」的提倡所啟發嗎？

鐵的事實證明宋陽先生所從事的偉大的工作，正有人在那裏繼續完成；而宋陽先生所辛苦開闢出來的路，也正有人在朝着這條路上勇猛邁進。雖然十二年前即一九三五年，他已於福建殉難，但我們應該相信，倘地下有知，他在地下是不致感到寂寞與空虛。同時，他的由於社會文化鬥爭的實踐所留下的遺產，如「中國革命運動史」、「論中國文學革命」、「赤都心史」、「海上述林」、「亂彈」等巨著，那將永遠煊耀於我們眼簾，即使再有一場更慘烈的天災人禍，亦不能沖淡我們對這位巨人的哀思。

物價變動是政治狀態的晴雨計

郭大力

關於當前的物價問題，過於一般而廣泛的考察，是不能給我們何種啓發的。當然，說當前物價上漲乃至激烈上漲的趨勢，是由於通貨膨脹，那是誰也不願否認乃至不能否認的。同樣，在通貨膨脹之外，再把生產的因素加進來，也有充分的理由。如果生產已有充分的發展，現在這樣的通貨膨脹，也許根本就是致發生的。此外，生產萎縮所必致引起的供給不足及輸入超過，當然也有影響。

但無論是把當前的物價問題歸因於通貨膨脹，還是把它歸因於生產萎縮，或把它同時歸因於二者，我們都覺得，這種看法未免過於廣泛。它有抽象的正確性，但對於實際問題，沒有提出嚴密的說明。並且，這種看法，又是不完全的。當前的物價問題，有它的一般性質，然也有它的特殊性質。它的真正的理解，需要我們把它的特殊性質指出來。

如所週知，當前的物價問題原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並且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是經濟問題的總匯，而經濟問題是政治的基礎；這一點不但不是我所要否定的，並且恰好是我所要肯定的。但在這裏，我們卻須倒過來，指出當前的物價狀態，早已成爲一般政治狀態的晴雨計，因爲物價的變動，一般表示着政治狀態的變動。

又如所週知，我們的物價問題，是與抗日的戰爭一同來的，但沒有和這個戰爭一同結束。不但沒有結束；更嚴重的物價問題，其實是在這個戰爭結束以後，才開始的。

要說明物價問題會與抗爭一同來，那已經是一個常識的問題。支出的異常超過，使政府不得不人爲的創造出一種「購買力」來，即發行巨額的不兌換紙幣。但在戰爭初起時，人們對於這種情形，一般還是諱言通貨膨脹的。他們或認供給不足爲主要的原因，因爲在物價的賽跑中，領導的，總是舶來品。但更明瞭實際情形的人，也不喜歡說原因在通貨膨脹，而說罪在游資。游資這個名辭的發明，在當時，是不無理由的。因爲，爲了民族的利益，商業資本是應受一點打擊的。

但自太平洋戰爭結束，巨量美國商品由太平洋彼岸源源到中國來以後，事實就太明白了。認識的進步，對於游資作祟這一類名辭，也似乎已經給予了更明確的界限。從此以後，通貨膨脹，甚至在官方發表的文告中，也被認爲是合法而且合於事實的用語了。

同樣，我們又用不着問，爲什麼在對日戰爭結束之後，通貨會更膨脹，物價會更上漲。對日的戰爭雖然終結了，但另一個形態的戰爭，是在更悲慘的形態中進行。

所以，這裏要問的一點寧說是這樣：通貨膨脹雖是物價上漲的最直接的原因，但在當前的物價問題中，似乎還有一個特別的情形不能不加考慮。依據二年來的經驗，物價在一個時期的比較安定之後，總會繼以異常的跳躍。但反過來，在一次異常的跳躍之後，物價也總會繼以一個比較安定的期間。物價的變動趨勢，像有一種間歇性似的。但每一次間歇，總好像是一個暴風雨的必然的前奏。這是爲了什麼呢？

對於這一問，我以爲，至少有兩點是應當指出來的。首先一點就是投機的結果。

所謂投機，首先自然是商人的投機。爲保護自己已經取得的價值而掙扎，這是社會所給予的最重要的教訓之一。當人們有理由認貨幣價值似將趨於穩定時，物價會不顧通貨量而比較的趨於穩定，是自然的；反過來，在貨幣價值被預期會變得更低時，物價會超過通貨膨脹的程度而趨於激漲，也是自然的。但因在究局上不兌換紙幣的價值依存於其發行量，發行量依存於財政狀況，財政狀況依存於政治情況，所以，我們必須指出，幾年來，政治情況本來就在一弛一張的情況中。以上已經說過，物價早已成爲政治狀態的晴雨計了。

這個看法，很可能會被誤解爲過於看重主觀的因素。不過，事實上，如把主觀的因素完全抹殺，也是錯誤的。投機是有客觀的基礎的，但所謂投機自身，則無疑是一件主觀的行爲。

但更重要的，要算特殊階層的投機了。他們的第一種哲學，和普通商人的哲學是沒有兩樣的：那就是，在有錢可取的地方，儘量把錢取下來。他們的第二種哲學，也和普通商人的哲學沒有兩樣：如果看見了洪水一定要衝來，他們就會決心要尋到一個高地，然後看着洪水把一切沖光，再來驚賞自己的先見之明。他們是貪得的，但當情形被認為逆勢時，比之當情形被認為順勢時，他們會更貪得的。

這似乎說明了，他們的貪得心，要受一個事情的管制，但並不是要受這個事情的制裁。具體說來，這個事情，便是：洪水會來麼？萬一的遭遇會來麼？

這就說明了，爲什麼有二月間的黃金潮了。這又說明了，爲什麼在魏德邁來華一個月零二天的期間內，法幣的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都似乎比較穩定了。當政治情形一弛一張時，物價上漲的間歇性及其必然繼起的跳躍性，就都有了說明了。

物價心理反映了政治心理。

但同樣重要或更重要的一層，是通貨管制當局有意的俾一點也不合理的操縱。如果前一點是反映客觀的主觀，這一點便是由主觀造成的客觀。通貨政策當然要發生影響的。

在這裏，我們且不要說通貨膨脹的速率。我們是寧可從信用的關係來解釋的。如我們從抽象的廣泛的觀點，說在通例的場合，通貨膨脹的手段，就是信用膨脹，我就要指出，這樣的看法，對於我們當前的情形，不能是正確的。理由是很明白的。新鈔的發行，在我們當前的場合，顯然不是爲了信用的理由，而只是爲了財政的目的。只是爲了要彌補財政收入的不足。

事實上，如果通貨膨脹只是爲了財政的目的，它在實行上，是需要有信用緊縮的。如果把通貨膨脹當作一種暫時的救急策，則其影響，是應當設法使其減小的。因之，在這時候，幹練的理財家，必然會以信用緊縮的方法，來預防通貨膨脹過度的影響。

但當我們的通貨膨脹是爲應付戰爭的需要，其方式是直接創造「購買力」時，我們的理財家卻始終沒有能够把握確定的政策。是信用膨脹還是信用緊縮，根本就無確定的宗旨。那似乎純然是取決於一時的衝動。且無

論這種一時的衝動，是由於外來的因素，（例如美國協助改革幣制的傳說），還是由於內發的因素，（例如二月間緊急方案的頒佈），其不能持久，則是一致的。管制者不欲其持久，也是一致的。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把管制者的私人的利益關係加進來。在這樣說時，理財家的尊嚴和信任是被懷疑了，但我們必須做的，顯然不是攻擊任何個人。由一種這樣的自私者指導實際的通貨政策，雖然無可懷疑是國家的不幸，但這種不幸，在一定的社會情況，政治情況，和經濟情況下，卻寧說是不可避免的。

我在這裏必須指出的，只是這一點：在通貨膨脹過程中時而抽緊時而放鬆，似乎早已成爲理財當局的拿手好戲了。由是，獲得了一個暫時的結果：雖然通貨大大膨脹了，但在通貨膨脹過程中，我們卻有時看到物價暫時穩定乃至稍稍下落的情形。但由是，卻也獲得了一個永久的結果：商人對於政府的信用逐漸失墜。每一個人都知道並且預期着，通貨膨脹是長期的，其緊縮卻是短期間的，物價上漲是永久的，其下落是暫時的。這在結局上遂必引起商人和理財當局間的一種鬥爭。這種鬥爭，用一個商業界的通用語，便是行局與行莊間的對立，便是差進與差出的對立了。

我們這裏要指出的，是當前物價問題上這一個特殊的性質：通貨膨脹不必排斥物價暫時的下落。不過，這是必須說明的：這種暫時的下落，比永久的上漲，還更有害處。投機將成爲支配的；操縱，尤其是，熟悉內幕者的操縱，將使生產的全部命脈受窒息。信用緊縮的信號一經發出，生產業者就在通貨膨脹這一個重壓的下面，不得不再負起一個更大的重壓。明知物價就要狂跳，但還是不得不忍痛犧牲。這個政策，雖有利於榨取生產的各式各樣的特殊商人，但必然是妨礙生產的。

本刊連載之長文，不許轉載

凡本刊連載之長文，如會昭掄「今日美國」，華羅庚「訪蘇三月記」，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等，版權所有，一律不許轉載，特此聲明。

論所謂官僚政治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歷史的經濟的解釋）之一

楔子

在這裏，我只想簡略述到我作這種研究的動機和態度；至於研究的主要內容，也許是需要附帶列舉出一個梗概的。

先言研究動機。一九三三年，英國 Prof. Needham 因為某種文化使命，曾到那時尚在粵北坪石一帶的國立中山大學。我在坪石一個旅館中同他作過兩度長談。臨到分手的時候，他突然提出「中國官僚政治」這個話題，要我從歷史與社會方面，作一扼要解釋。他是一個自然科學者，但他對一般經濟史，特別是中國社會經濟史，饒有興趣。他提出這樣一個話題來，究是由他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對此發生疑難，抑是由於他當時旅遊中國各地臨時引起的感觸，我不會問個明白，我實在已被這個平素未大留意的問題窘住了。當時雖然以「沒有研究，容後研究有得，再行奉告」的話敷衍過去，但此後却隨時像有這麼一個難題，在逼着我解答。我從此即注意蒐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資料了。加之，近年以來，官僚資本問題，已被一般論壇所熱烈討論着。官僚資本與官僚政治的密切關係，是非常明白的。有關官僚資本的研究（一部分已在文匯報「新經濟」及時與文上發表），處處都要求我進一步對中國官僚政治作一科學的說明。此外，我在大學裏，有時擔任中國經濟史的課程。中國社會經濟之歷史演變過程，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認為有許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經濟發展規律固然很難，應用那種作為社會基礎的規律，去解說歷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會文化現象，更屬不易。中國官僚政治形態，是屬於那些社會文化現象之一，它將和中國社會突出的宗法組織，倫理傳統，儒家思想等等，同樣成為我們所理論到的中國社會經濟特殊發展規律是否正確的考驗。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為我關於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副產物。而我也希望藉此減輕我對於非所專習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僥倖。次言研究態度。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歷史上是已經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腐害的，而就中國說，且還在繼續發生反時代的破壞作用。而況國人皆曰可咒的官僚資本，正在猖獗的橫行着。我們在這種場合來研究官僚政治，就似乎

格外需要抑止住感情上的衝動。過分渲染一種急待除去東西的醜惡，和過分渲染一種急待實現的東西的美好，也許在宣傳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樣會妨礙科學上的認識。當作一種社會制度來看，官僚政治究是如何存在，究是如何取得存在，最後，它將如何始能喪失其存在，那才是我們研究的真正目標。一切存在的東西，在它其所以取得存在的一般社會條件，還在發生作用的限內，我們是無法憑着一己的好惡，使它從歷史上消失去的。而且，在我們今日看來，官僚政治一般已成了過了時的落後的東西，但在以往，它確曾在歷史上，伴隨着其他社會體制，扮演過進步的角色；而中國官僚體制的比較一般的提早出現，甚至無妨看為是中國社會早前比較進步的一個表現在政治方面的特徵。會是進步的東西，現在成為退步的象徵；會是比较出現較早的東西，現在居然當着其他各國典型官僚政治已分別交代其歷史命運的時候，還在中國社會極明顯的存在着，極有力的作用着，那決不是偶然的。那都需要比謹慎的科學研究，始能抉出它的實在關鍵來。

最後，我要附帶說及全部研究的程序和主要的內容：首先，是須得把一般很少論及的官僚政治本身的觀念弄清楚的，所以，我以「論所謂官僚政治」開始；官僚政治的基本諸概念，大體是從曾經存在於世界各國的官僚政治的實際狀態歸納來的，所以續論「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國」；把各國官僚政治的輪型指明出來了，我們才有根據說到「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現」；那何以在中國會顯得特殊呢？接着再論「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在那種社會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上，就不但政治形態有着特殊的發展，即其他社會文化的相應演變，亦會直接間接影響或加強那種官僚政治形態，所以，「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官僚貴族化與門閥」、「官僚與科舉制」，就成為一列待說明的關係；再其次，看被上述思想制度強化的官僚及其一團的生活，是怎樣使這種政治，更進一步受到充實和定型化，於是乃論「士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到這裏，我們才有理由或有憑據看到「中國官僚政治對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影響」；更其次，就是「官僚政治在現代中國的變形」；就是「官僚與各種新聞」；再就是「官僚政治與官僚經濟」；最後，將結束以「中國官僚政治的

「歷史交代問題」——上面所提的這些節目，是我打算分別作為獨立的論題，連續寫下去的。

由於學力和研究範圍的限制，我對於這個新鮮的題目，自不敢期待有什麼貢獻，但因為這是中國研究社會科學者應當踏入的新境界，至少，也希望能由我的錯誤而引出真理。

在有關政治理論或政治史的載籍中，我們經常容易見到關於貴族政治、專制政治、民主政治的論著。但把官僚政治(Bureaucracy)當作一個特定的形態或體制加以論述的，却比較稀罕。那往往只是在討論其他政治形態時附帶的說到。對於這種政治現象形勢少所論及的理由何在，以後還有談到的機會。這裏我只要表明：官僚政治確會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並作用於一切國家的某一歷史階段。也許就因此故，英國權威政治學者拉斯基教授(Prof. Laski)曾在塞利格曼教授(Prof. Seligman)主編的社會科學大辭書中，就官僚政治作過這樣的概括說明：

「官僚政治一語，通常是應用在政府權力，全把歸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種政治制度上。那種政治制度的性質，慣把行政當作例行故事處理，談不到機動；遇事拖延不決，不重實驗。在極端場合，官僚且會變成世襲階級，把一切政治措施，作為自己圖謀利益的幻覺」(見上述大辭書第三卷第七〇頁)。

這說明大體是妥當的，但我認為需要加以補充和分釋，否則不但對於拉斯基教授自己在那段話後面引述的例解，有些不易講得明白，而我們也似乎可以依據經驗，說官僚政治在任何歷史時代都能存在。比如說，講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公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動的刻板的應付、一味把責任向上或向下推諉……諸如此類，都是所謂官僚主義的作風，這作風，確實在任何設官而治的社會，差不多都可以見到；即在民主政治下，對於任用官吏，如採行所謂分贓制(Spoils system)——美國以前官吏進退，隨政黨為轉移，故稱此種官制為分贓制，則因交代頻繁，造成互不負責的脫節現象；如採行專家制，重視官吏專門經驗，則又因他們長期或世守其職，造成特殊積習，造成相伴而生的種種官場流弊。特所有這些作風和流弊

，通是屬於技術方面的，惟其是屬於技術方面的，故英美諸國，都先後實行一種政務與事務分開的文官制，從技術上予以改進，並設法使那些流弊，減縮到最低限度。然而，我們把官僚政治當作一種社會體制來討論，雖然也注意它的技術面，但同時却更注意它的社會面，從社會的意義上來理解官僚政治，就是說，在此種政治下，「政府權力，全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得把政府措施，看為為自己圖謀利益的幻覺。像這種社會性的官僚主義政治，是依存於諸般社會條件，而又為那些社會條件所範圍着的，它可能增大前述技術性的官僚作風，但却不可能單在技術上去講求根治。

由以上的釋明，我們就知道：

(一) 官僚政治得從技術的社會的兩方面去說明，而我們當作一種社會體制來研究的官僚政治，寧是重視它的社會的那一面，雖然我們同時沒有理由不注意到它的技術的那一面。

(二) 大約官僚政治在社會方面有了存在依據，它在技術上的官僚作風，是會更加厲害的，反之，如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權力，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由自己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擺佈，則屬於事務的技術的官場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漸設法糾正的。

(三) 技術性的官僚作風，不但可能在一切設官而治的社會存在，在政府機關存在，且可能如拉斯基教授所說，在一切大規模機構，如教會、如公司、乃至如學校中存在，可是，真正的官僚政治，當作一個社會體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許在任何社會的某一歷史階段存在，而就歐洲說，却只允許在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末乃至十九世紀初那一個歷史階段存在。

二

那是一個什麼歷史階段呢？

就政治上說，那是由封建貴族政治轉向資產者的民主政治的過渡階段。在那個過渡階段上，一般的政治支配形態，不是貴族的，亦不是民主的，却是在大小貴族與商工資產者彼此相互爭權奪利場面下成立的專制政體，而所謂官僚政治，就是當作這種專制政體的配合物或補充物而必然產

生的。爲了容易理解起見，我們且從以前不能產生官僚政治的社會或國家說起罷。

在歐洲，最初出現的國家，是希臘的奴隸國家。如在雅典，那是由十個部落所選出的五百議員所組成的協議會來統治，它服從那每一個公民都有出席權與投票權的民會的決議。担任官職的權利，擴充到無產勞動者以外的一切國民。羅馬由它開始建國到以後擴大領土的千餘年的長期歲月中，其政治生命史，幾乎一半是受共和國政府統治。羅馬共和國的官吏，任期只有一年，且向不連任（見 A.L. Lowell 著公共意見與平民政治范譯本第一八三頁）。後來臨到帝政時代，雖然如許多歷史家所說，因着東方專制政治的影響，使羅馬皇帝們扮演起東方專制君主的角色，頒佈法律，徵收賦稅和任命一切官吏，但也許不盡是西歐人人氣質上不適宜於這種統治（J.E. Swain 在他的世界文化史中，就不時強調此點，說專制主義是東方的產物，西方人氣質與此不合），而也許由於野蠻的日耳曼人已經侵擾進來了，致使那種統治形態，一時並不會形成與它配適的官僚政治。

中世紀的封建王國，是由僧侶貴族行使統治的。不管實行到了什麼程度，整個中世紀，似乎總存在着一個理想，想把文明世界統一於一個政府，一個基督教共和國，它同時是教會，又是國家。在形式上，封建的階級組織，由最高級的教皇，皇帝，國王或君主，到公爵、伯爵、主教、僧院長、子爵、男爵和小領主，以至最下級的騎士或侍從，儼然是一個頗有層序的金字塔。但因爲特許 (Immunity) 及其他的慣例，這每一個單位，差不多都成爲一個準獨立的政治體，它的屬地或地產，不受國王管轄。大小貴族或僧侶却分別担任着治理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下，一個特殊的官僚階層，自然是無法產生的。

可是到了中世紀末期，上述的封建基礎上，逐漸成長起了民族國家。每個民族國家，在開始都是採取專制主義的政治形態。那原因，把最基本的經濟上的理由暫且拋開不講，主要是由於那每個民族國家，起先都是由較有力的較大的封建貴族，努力統一其各別屬領內的政治權力；在這種企圖上，他必得同僧侶鬥爭，必得同其他貴族鬥爭，此外，他還會依據民族的或其他的理由，不絕努力擴大其領地，而與那些非其屬領內的僧侶貴族鬥爭。鬥爭勝利的國王，把以前分別把持在貴族僧侶手中的賦稅、戰爭

、公益、裁判等權，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了。可是對於這些方面的政務，他不能樣樣自己去做，特別在領土擴大的場合，他就更非委托或命令一批人去做了。於是，「君主專制政體就是在一方面國王只把有關行政事務的立法權集中在自己手中，同時由他發給官吏的命令，變爲行政法或分法的來源」（見 Engels 著近代國家觀念王譯本英譯者序第九頁），在這種情勢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對國家或人民負責，而只是對國王負責。國王的語言，變爲他們的法律，國王的好惡，決定了他們的命運（官運和生命），結局，他們只要把對國王的關係弄好了，或者就下級官吏而論，只要把他們對上級官吏的關係弄好了，他們就可以爲所欲爲的不顧國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圖所以自利了。所以，在專制政治出現的瞬間，就必然會把政治權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會相伴而齎來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專制政治的副產物和補充物。

三

然則在君主專制政體下的大批官僚，究竟是從何突然產生的呢？而他們這種表現在官僚政治下的官僚性格，到了民主政治支配之下，又是如何變質了的呢？

關於前一點，我有點不能同意拉斯基教授的法說，他認爲「官僚政治是貴族政治的副產物」。我則只承認官僚政治下的官僚，是貴族的轉形物，封建的貴族政治，是不能把官僚政治作爲它的副產物的。

我們已講到，專制主義政體，是一個過渡的政治形態。在它下面，被看作資產階級代表的所謂民主政治，還不會當作它的對立物而成長起來，同時，被看作僧侶貴族利益代表的封建政治，亦並不會隨着專制政體出現而根本受到否定。無論那個國家，它如其尙是專制的，要伸張王權，雖然不能不限制並打擊貴族，但爲了使統治穩定，仍得利用貴族，遷就貴族，如是所謂官僚，至少在開始的時候，大抵是由貴族轉化過來的。

比如就英國來說罷，英國在長期專制的過程中，固不必說，就是直到資產階級已經很得勢的十九世紀初，「資產階級還深深爲它自己的社會地位的卑賤之情感所支配，所以它以自己的及國家的經費，養一個怠惰的寄生階級」（見 Engels 著費爾巴哈論譯本附錄三第一七五頁）。一資

產階級在一八三二年得到了選舉改革運動的勝利，差不多還是讓貴族獨占了一切高級的政府機關，因為「當時英國的資產階級，普通都是一些沒有教養的暴發戶，不管是好是壞，也只好把一切較好的地位讓給貴族」（同上第一七六——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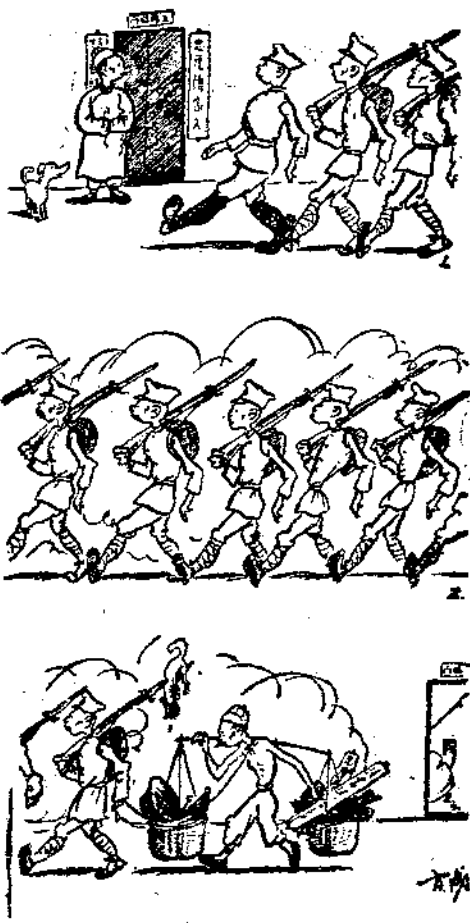
再看法國，法國的封建勢力，是經過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才予以澈底廓清的。大革命前的那個專制主義統治階段，「有人計算貴族和教士共有二十七萬人，依照一種可靠的統計，革命爆發前，貴族人數有十四萬，約分三萬家」（見 *Welhelm Blos* 著法國革命史李譯本第一卷第一一頁）。「當時貴族計分三類，即官庭貴族 (*Hofadel*)，職官貴族 (*Amtsadel*) 和鄉村貴族 (*Landadel*)」（同上第十二頁）。除最後三者鄉村貴族已貧困式微而農民化了以外，朝政大體是由官庭貴族治理，中下級官吏是由職官貴族充當。就在革命後，延至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八年路易·斐力普 (*Louis Philip*) 統治的時候，只有小部分的資產階級統治法國，其餘大部則為很高的標準奪去了選舉權。在第二共和國底下，資產階級才施行完全統治，但只有三年，它的政治上的無能，開拓了第二帝國的道路（同上費爾巴哈論，彭譯本附錄三第一七八頁）。

由上面的例證，就知道不僅在專制主義政體下，是主要由貴族充任官吏，就在市民階級所理想的民主政治形態下，許許多多的上級官吏，還是貴族出身。可是，同是貴族，他們的性質，是因所處的社會不同，因經濟發展的條件不同，而大異其趣的。在典型的封建政治下，大大小小的貴族，是自己在那裏為自已行使統治，在名分上，儘管小貴族對較大貴族維持着一定的依屬關係從關係，但實質上，他是所在屬地的絕對支配者；到了過渡的專制政體下，充當官吏的貴族，已不是以貴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國王的僕役的資格行使治理，再進一步到了典型的民主政治形態下，他們又不是國王或專制君主的僕役，而是通過憲法，通過選舉，通過國會，變為人民，至少是變為商工市民階級的公僕或政治的僱傭者了。這種政治權力的推移與變化，在它後面，存在着「一種社會經濟實質的轉變。在封建貴族政治末期逐漸成長起來的流通經濟或商業資本，原要求伸張王權，統一幣制稅權，打破前此各自為政，各自自給的分立局面。所以，對應着專制政治的經濟形態，就是商業資本，就是重商政策；而一般在專制統

一局面與重商政策下得到了成育和成長的商業經濟，到了一定限度，就感到專制主義對於它的束縛與妨礙的影響，而其逐漸伸展起來的實力，也慢慢表現了促使專制主義者向它就範向它尋求妥協途徑的足夠力量。到了這種場合，知趣點與它講求妥協的，就出現了像英國型的「光榮革命」，不知趣不肯與它講求妥協的，就出現了法國型的大革命。但不論革命的方式如何，其結果大體總不外伸張民權或市民權，而剝奪王權，使國會成為法律的主權者，使人民或選舉團體成為政治的主權者。這一來，官僚或一般行政人員，就要完全改變他們的政治性能，他們不復對國王負責，不復把國王的言語看作命令，他們要對國會，對人民負責了。「國會逐漸達到節制行政官吏的要求。法律不成為行政官吏權能的限制，而成為他們權能的基礎了」（見前述 *Krabb* 著王譯本英譯者序第十三頁）。

這種經濟的政治的變化一經形成，國家的政治權力，就不是全把握在官僚手裏，官僚也不可能任意侵奪普通公民的權利；在這場合，即使官吏在個別場合，還不難找到機會，作一些不負責任，不講效率，甚至假公濟私的勾當，但當作一個社會體制看的官僚政治，却是要隨着專制主義政治的沒落而喪失其存在的。

不過，以上大體是就典型官僚政治立論，至若像在晚近德意諸國獨裁統治下所出的所謂新官僚政治，那將在以次的論題（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國）中順便談到。



「真理」在北平被扼殺了（特約北平通訊） 孟秋蟬

真理晚報貼了封條

北平的新聞事業一直是在萎縮不振的狀態中，雖然大小型日報也有廿多家，但幾乎是一鼻孔出氣，晚報只有一兩家，又都是四開型的小報，內容低級趣味化。七月十五日市面上出現了一張真理晚報，編排尚稱新穎，內容雖不出奇，偶而也能報導一點接近事實的消息，發行整整一個月，到八月十六日被勒令停刊了，查封理由是「違反動員員職亂暨憲政實施綱要」。這是總動員令到古城後，新聞自由，首次受到摧殘。

當「真理」貼封條的前兩天，即八月十三日，這個不吉利的日子，黨政團聯合在萬牲園招待了一次新聞界的老闆，說明「違反總動員法令之言論與行動者，今後惟有依法執行，決不稍貸」。同時，繕列各報違反動員員職亂的罪狀如：「發難民財」，「消防隊為救匯文大火」，「勒索金條」，「胡適屈膝求教」，「皮爾遜無罪」，「抗議」，「小學校長代價四百萬」，「女一中解聘教員」，「四大聯考走漏試題」，「助學運動」，他如「共匪」沿用「共軍」，「真理晚報」襲取「真理報」的頭銜等等依法治罪，教而後殺。政府自有權衡，不過報導事實，也是記者天職，這些罪狀的原委如何，想必是讀者所樂聞的。

發難民財

(一)北平市難民代表團招待記者，報告集中北平之冀東難民已登記者，總計在兩千以上，日食兩餐稀飯，無菜，不足果腹，「七七」軍濟難捐款數目甚大，而難民未得分文，北京飯店舞會捐款及馬連良義務戲一億二千萬捐款，亦不悉下落，難民對此深表遺憾，社會人士亦有疑竇。以上疑難民代表的報告（根據中宣部北平社報導），真理晚報在八月九日四版以顯赫新聞標題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假借難民發大財，若干捐款無下落」，文中有一賊走關門，發難民財，捐款總數逾七億元。八月十一日主辦捐款的總辦事處委員馬慶瑞發表談話了：「目前真理晚報刊載消息，謾指本會內部弊端甚多，妄言捐款下落不明，含沙射影，顯係別有作用，破壞勞軍及救濟義舉，影響主辦人員之名譽，除函請主管機關查究外，誠恐外間不明真相，而為該報蒙蔽，特聲明如上」。

消防隊為救火

勒索金條

(二)匯文中學一把大火，燒光了多少年苦心血結晶的高林樓，延燒達六小時之久，迄未撲滅，事後消防隊向各地方法院控告行贖主辦之經世日報記者毀謗名譽，謂曾經見火不救勒索金條，而且揭發消防隊之積習，結果因為告在自已人的頭上，雙方言歸於好，原告自動撤

胡適屈膝求教 馬連良

回訴狀，但是關係方面認為報紙過份渲染，同樣有違動員法令。

(三)一代奸佞馬連良自冀高法院官判不起訴處分後，各報譁然一時，所以有「馬連良哭了，李萬春在一監間痛哭流涕」的諷語。馬連良善於運用社會關係，連日登台大唱義務戲，胡適曾為北平婦嬰保健所及靜生生物研究所籌募基金，在一敵國飯館邀宴馬連良唱義務戲，約市黨部主委作陪，北平益世報在這條新聞上標題曰：「馬連良聲價十倍，胡適之屈膝求教」。事後被認為「屈膝」有辱胡博士，也給「真理」記了一筆賬，原因是真理發行人與益世報的發行人有裙帶關係。

抗議皮爾遜無罪

(四)強姦沈崇之美女皮爾遜經美海軍部撤銷

小學校長代價 四百萬

(五)據此間中國社訊：「小學校長一席，代價四百萬元，任職後約牛載，即可收回成本，故逐鹿者大有人在」。於是惹怒了教育局大發雷霆，在各報登載頭條廣告，意謂：「上項消息，完全違反事實，尤足淆惑社會聽聞，……倘全無根據，僅係一時輕率之記載，則應由該社即日向各報刊登啟事，正式更正，否則為本身信譽計，為尊重教育事業清白計，祇有訴諸法律，並限於兩日內明白答覆」。結果因為中國社與某方有關，也就不了了之。

大批解聘教員

(六)暑假開始後，北平各大學相安無事，市立各中學競賽解聘教員，女一中校長彭華瑛乃黃宇人之妻，突解聘執教廿餘年之教員梁以儉等十二人，引起教育界與學生家長的公憤，列舉罪狀十大條：(一)校務紊亂(二)敗壞風紀(三)經濟獨裁(四)貪污有據(五)職權擅用(六)開創惡例(七)不負責任(八)違法濫職(九)濫用職權(十)捏詞誣陷。結果因為市長的支持，雖然被解聘的教員曾經絕食，但教育局限於「成命礙難收回」，僵持不下，惟有請朱部長親自解決，然而由於報界主持正義，也觸犯了總動員法令。

試題

四大聯考走漏

(七)一個怪電話傳出了北大，清華，南開，中央四大學本屆招考新生北平區試題以一百七十萬元賣出，由育英傳到匯文，消息傳出後，胡博士一語肯定：「我胡適之代表三校保證絕無此事，並謂此不負責任之傳聞不值吾人置信」。然而匯文中學，師院附中，且菊女中，女一中，中大附中，志昂

鄂爾多斯草原的警報 (特約包頭通訊) 漢南

妙齡女王和髻齡王子的被殺

塞外鄂爾多斯草原，綏遠境內烏蘭察布盟西公旗(舊稱烏拉特前旗)的女王奇俊峯與幼王奇法武在赴綏途中，被旗下東協理額爾齊和護路大隊長郝游龍率領任官羣衆在距離王府四十里的蘇保蓋廟包圍請願，當場擊斃，彈由女王左臂經右頸穿過，幼王彈中前鼻樑穿腦而過，屍首掩埋於王府所在地公廟子。女王奇俊峯年僅三十三歲，是西公旗已故石王的三妾，民二十一年和石王結婚，時女王年方十八，她是清末寧夏阿拉善旗王公之女，幼年隨太夫人族居北平，曾攻讀喇嘛女中，能通蒙漢文字，且可操一口流利的北平官話，極爲石王寵愛，結婚甫及兩載，紅顏薄命，石王竟於民廿三年患病疾歿於包頭園子巷該旗辦事處。

時女王有孕，生子名阿拉騰額爾濟爾，奇法武是他的官名，今年十三歲。抗戰爆發，敵偽挾東協理額爾齊參加德王羽翼下的蒙疆政府，女王遂率幼王及參謀主任李傳卿與護路大隊長郝游龍出走到達五原，舉起抗戰義旗，民二十九年曾由李傳卿陪同赴重慶謁見蔣主席，奇俊峯當被封爲護理扎薩克並防守司令，綏境蒙政會委員及綏蒙旗黨務特派員，幼王奇法武正式任命記名扎薩克，成年後，幼王繼承王位，在未成年時，女王垂簾問政。

，一直與參謀長黃楚山(現在陸大參謀班受訓)爲女王的左右臂，勝利後隨女王返旗接收大政，嗣因思想嫌疑，去年十月被省政府派員扣押解省，女王經半年來之奔走說情，終於今春將李保出，七月十六日李傳卿由包頭潛赴北平，行前留書女王，略謂：渠已赴平，促女王將貴重財物迅速轉移北平，圖轉寧夏，自首偕老，至平後可登報尋找李西言。不幸信到王府，女王已啓程赴包轉綏逃職，故信落於旗下任官手，遂以此爲藉口，釀成血案。平津京滬各報也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特別渲染這一桃色成份，有意或無意地想把這一政變有聲有色地歸咎到桃色事件上面去，實則，我們只要看一看女王之母奇月明聞到噩耗後，趕到包頭，八月十六日在包頭日報刊載的一段緊要啓事，就可知道内幕了。

緊要啓事(原文)
「近被西公旗殺女兒奇俊峯暨外孫奇法武死於非命之噩耗傳來，已延二十餘日，我年經七旬，從小到今只有其女，當其夫石王逝世，額爾齊早與偽敵已訂賣身契，其事可作，何所不爲……，本年七月十六日在該旗召開整軍會議，分列擁護總動員令之通電，十七日隨外孫法武赴包，轉道綏垣，報告編組部隊，路經郝游龍之住紮地烏蘭計，以奉命，速行編制，向該部講話，本想被其主唆額爾齊，賀守忠等同場劫殺，返回蘇保蓋廟，二百日謀殺，要知公職方面，在開會時應該如何調整，不能以毒殺死無對象之妙技，一意孤行，事前形懸如常，一旦召開整軍會議，拍發擁護中央總動員令之通電，由此動機被遺孤魅滅亡，斫斷根，斃死

「匪」與「真理」

(九)總動員令頒佈後，如用「共軍」而不用「匪」者，無異爲「匪」張目，但是平津的報紙，除了華北日報習慣上用「匪」外，其他各報還未曾推過這一個字意，而真理報出版以來以「軍」代「匪」，罪大惡極！

助學運動

(八)北平市學生助學委員會組織後，華北各院校熱烈響應，大中學分會接踵成立，並請行轅李宗仁主任作名譽顧問，何市長，陳雪屏爲贊助人，在民主廣場舉行遊藝晚會，發表告社會人士及同學書，「北大清華燕京助學演劇委員會」決定聯合排演「陞官圖」，定九月初在平市各校巡迴演出，朱部長到清華時，也熱烈贊助，慨捐義囊三百萬元，可見這是義舉，爲人所支持了，但是有人又在造謠中傷，說助學運動別有作用，將由當局統籌辦理，對於新聞界宣揚此一運動，希望願及總動員法令。(關於助學的詳細報導，請閱本刊本期另一篇通訊「記北平市助學運動」——編者)

桃色事件呢還是政變？

提到李傳卿，直到現在還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一部份人把這次的政變穿插到李傳卿的桃色事件上面，據當地報紙記載：「李傳卿是河北人，南開經濟系畢業，青年有爲

了。

了。

記北平市助學運動

——趙鎮乾——

近半月來，在秋老虎的炎威下，「助學」的聲浪震盪着整個北平城，參加的大中學達二十幾個之多，每家住戶都至少購得了一個助學章或一種義賣品，情緒的熱烈不亞於前此幾次大遊行，所不同者，這是一個很單純的不帶政治色彩的運動。

性質與工作

主持這運動的機構名叫「北平市學生助學委員會」，它於八月八日成立於北大北樓。簡明的組織綱要規定了它的性質與工作，其宗旨是：「基於同學互助互愛之精神，以集體力量協助清寒同學解決經濟困難之一種服務行為。」其方法是：「以直接勸售助學章、義賣、推銷及演戲、音樂、體育等表演方式向愛護學生之社會團體或個人捐募全部助學金。」助學的對象是：「凡參加助學工作之北平市公私立之大中學之清寒同學。」其分配原則是根據參加單位之人數或個別參加者之工作成績為標準，而且「凡助學成績優良之單位，除照章分配助學金外，尚酌提福利基金，以資鼓勵。」故其最大的特點是「自助助人」。

學生熱心 社會同情

九日至二十日為組織、宣傳時期。學生們都自告奮勇，數日之間，各校都成立了助學分會，組織了宣募隊，參加的總人數達三千之多。校與校間，隊與隊間的挑戰應戰，把工作視爲一種友誼的競賽，更提高了同學的情緒。社會人士的反應，也令人十分興奮，應聘爲名譽顧問、顧問、贊助人的幾包括教育、銀行及工商各界的領袖，英領事美領事的尤爲贊助人，劇團、音樂會、畫家的願爲助學而義賣，尤屬可貴。工作如此的順利，已

已無對證，學生豈容污我門庭，老嫗隻身婦孺，據此要點，希列位糾正事實，我雖眼目，亦無憾矣！

奇月朋啓

從此可以肯定血案的演成是一個政變，而不是一般桃色事件所能掩盡天下人耳目的。

旗內蒙民的向背

額寶齊與郝游龍是政變的主角，所以額寶齊與郝游龍就成爲草原上衆目睽睽的人物了，然而綏遠有關當局經其武主席與省臨委會正副議長張欽，關肅以及蒙旗有關人士經天祿、趙城璧等商討解決原則，在安定第一的前提下，決定（一）催促西公旗三代代表速返旗，暫時成立旗務委員會，維持旗內一切政務。（二）在旗務委員會未成立前，旗內政治、軍事仍由額寶齊、郝游龍分別主持。（三）西公旗將來旗政組織體制及扎薩克繼承問題，靜候中央處理。（四）推選在綏蒙藏委員會委員胡鳳山，

政變的兩個主角及其民族意識

經天祿，及綏遠黨部主任特派員趙城璧，同赴西公旗慰問民衆，安定人心。從這一決定可以看的非常明顯，血案的主角額寶齊、郝游龍事實上不但沒有治罪，相反地，還分別地主持旗內政治與軍事。由此足見這一行動是全旗蒙民所支持，至少可以從額寶齊和郝游龍還能繼續主持大政，而旗下蒙民竟無人反對，這是有原因的。

大喇嘛勾結額寶齊釀成政變，後經山西駐軍王靖國協同石王叔平，大喇嘛死於戰陣中，額寶齊倖免一死，逃至百靈廟德王府。此後石王式承繼王位，額寶齊遂流浪放逐異地，及至綏包淪陷後，額寶齊隨蒙疆政府的勢力伸展，擁阿木勒扎那爲扎薩克（意即王爺）重返西公旗主持東協理，勝利後，女王返旗接收，額寶齊仍爲東協理，此次刺殺女王者即其主使。

郝游龍是協理色令報之子，敵偽時期，此一精忠保王的領袖被額寶齊陷害，以通國軍之罪喚使日人將色令報扣押綏遠下獄，卒死於獄中。郝游龍今年廿五歲，他能出任護路大隊長，可以說是女王爲了報恩一手提拔起來的。但是這次政變，直接牽衆下手的就是他，在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上好像是認爲報德，說不過去，實則，據熟悉蒙旗情形者說，郝游龍可算是蒙旗中的少壯派，他對於省縣編保甲，要把西公旗的蒙民也編在

額寶齊今年已經六十八歲，當民十九年西公旗老王死後，王位繼承，曾經發生過一度很大的爭執，老王遺命由石王繼承，然而掌握旗神權的大喇嘛伊喜達格就不同意，因爲石王是一個喇嘛，照理是不能繼承王位的，大喇嘛想保佐族中另一正系幼王繼承，因而釀成擁石與反石兩派，擁石派是由西協理色令報領導；反石派由

一起，無異破壞旗自治的制度，而且他是去年國民大會召開前，蒙旗代表在南京呼籲「民族自決」的忠誠支持者，郝曾經說過：「如編保甲，逼上梁山」。據說，女王爲了保釋李傅卿時，曾與省縣政府有交換條件，可以編成保甲，隸屬安北縣，這件事的允諾，非但引起西公旗蒙民的不滿，而且招致了草原上蒙古包裏逐水草而居的人民普遍責備，兼以女王與李傅卿過從甚密，在那樣一個原始封建的社會裏，更難令人容忍。

總之，這次政變，並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在於額寶齊與郝游龍兩人，或則受了德王高度獨立自治的薰染，或則爲一民族自決的虔誠信仰者，加之女王的一切措施，遂致演成政變，那有其民族的和歷史的重大意義的。鄂爾多斯草原的號角響了，過去大漢族主義的民族政策如果還一味因循下去，將來的禍患不知伊於胡底！（八月廿日自綏遠包頭）

預卜了這一運動的成功。

打擊的開始

但是，打擊也一樣的有。助運初起時，官方並未表明態度，市教育局長王季高曾一度應聘為贊助人，何思源市長於辭聘時也說：「貴會聘本人為名譽顧問，不勝榮幸之至。」但不久，華北日報發表一則消息，說是助委會組織龐大，負責人多為主持「六二」運動的。於是傳說黨方某要人謂此次運動又有共產黨在中把持。十四日，行轅有秘書長出面發表談話，說是助委會未經政府批准立案，官方不予支持，並安慰貧苦學生，政府的救濟決二十倍於助委會。接着，行轅救濟學生的公函電報般的送達各大中學，其中特別關懷「匪」區學生。這時，新聞記者預測助運必受到一些難堪的打擊。

學做武訓 成績輝煌

二十一日，宣募隊出發街頭宣傳。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勸助學章。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發動義賣。一切都按預定的計劃進行，在「學做武訓」的口號下，三千多同學步調一致，大家都冒著秋老虎，出沒在大街、胡同，用盡方法向商店，行人勸募，真不知碰了多少釘子，看了多少顏色，一個個弄得汗流夾背，唇焦口敝，終於第一天造下了輝煌的成績——兩億元。到第二天，突破三億元關，預定的目標五億元已經在望，大家更加倍努力，因為「挑戰」時，每個單位都留下了「助學英雄屬於我」的豪語。

打擊的擴大

勸募的技巧當然不易盡善盡美。譬如在街頭勸募助學章，許多人因為在市上流動，東也碰着宣募隊西也碰着宣募隊，而同學們助學心切，有時苦苦勸募，難免令人不滿。這就成了市府某負責人的藉口，廿三日他對記者們又把政府如何關心學生的官話講述一遍，接着就說：「連日市民為宣募隊所苦擾，屢向政府請求制止，希

動盪中的廣東

「匪」患猖獗

治安問題的嚴重，一直在威脅着廣東的綏靖當局。早在本年三月間，保安司令部報告各區「匪情」雖然認為各報登載各地匪情「未免誇張」，但也承認「現有重大變化，即由沉寂時期變為活動時期」。又說：「目前最嚴重的要算瓊崖，復員時瓊崖土匪人數約一萬八千多，經四十六軍及保安部隊剿辦後，現尚有五千多人（？）」……

其次是南路，現在約有二千三百多人」云云。接着又說東、西、北江方面，也有「殘匪」存在，又指出為什麼不能將土匪肅清的原因，說是「第一，因瓊崖方面牽制大部兵力，瓊匪有二十年歷史，四十六軍以三萬餘人力量，經數月剿辦，亦苦沒有辦法，後來保安隊以戰鬥兵八千人，担三萬餘人責任，更困難，但已有顯著進步（！），惟土匪基層組織健全，宣傳政策亦甚成功

陳微子

天下真個太平了麼？一般人的估計，瓊崖「匪軍」活動地區幾達全島。除了點外，線面的優勢非官方所能及。在地理環境上，瓊崖大部地區山嶺環抱，便於他們游擊；加之組織嚴密，民心所趨，官方和他們一較，漏洞就多了。在南路，廉江化縣的「奸匪」不時出擊，地方官便顛慄不已。除了「粉飾太平」「瞞報匪蹤」外，更有什麼善策呢。

民政廳長下台了

省政府改組，省主席換人，數月以來，羊城遍傳着。但是羅主席督京回來，不是省主席換人，而是民政廳長走了。這中間聽說是很有點緣故，人家說主席與廳長合不來，所以傳聞李廳長在京控告羅主席貪污，控不過來，祇有讓位給詹朝陽了。爲什麼廳長與主席之間要發生這麼大的摩擦呢，我們且回溯一年多以前，

望各同學迅速停止，遵重法令。」接着，又有兩中學校長退回贊助人的聘書，原因是：「奉教育局電令：中學不得為大學主辦之助學運動贊助人。」保甲長出面攔阻募捐的情事亦有所風聞。單純的運動，也用政治手段來處理，學生們的憤慨固無庸說，身為名譽顧問的胡校長也從側面表示：「這次助學運動甚為合理，不但可以教育學生，而且可以教育社會。」不幸這些話怎樣也不能克服官方的成見，實在可悲！

這是教育 須要繼續

到二十五日止，街頭義賣已告結束，剩下的工作除主辦義賣商場、戲劇公演等外，還有洗衣、擦皮鞋、照相帶生產性的工作，五億元的募集可不致成問題。但最大的收穫尚不在此。這次運動表現了幾個特點：第一，對於工作，事前有計劃，事後能檢討、改進，並採取了競賽的方式。第二，上級機構盡量接受下級的建議，下級遵從上級合理的指揮，表現了民主和守法的精神。第三，工作的範圍涉及及到洗衣、擦皮鞋、剃頭等項，打破了智識份子的階級意識。胡適校長認此為一種好的教育，可作為這次運動的評價。許多教授都希望這是一個開始，今後更能發揮光大。

(八月廿日寄自北平)

本刊徵聘各地通訊記者

本刊擬在國內外各大城市置特約通訊記者一人至二人，凡有採訪及寫作能力而願意為本刊服務者，請先試稿兩次并附簡歷履歷一紙，逕寄本刊編輯部，合則函聘，稿酬從優。

官僚教育與市會教育

某報曾經登載了一篇「賣屋當官」的雜文。內容是說賣了「家當」去當「大老爺」，將來能夠置回產業，纔耐人尋味呢。省府當時把報社警告了一番，編者慌忙道歉，自承不察。這以後，是類文章少見了，「賣屋當官」的人，却與縣座更換俱增。廳長油水吃不到口，便怨主席獨裁了。這也難怪，沒有點利潤，當廳長又何苦來。

穗市的正式大學有四所：一是國立中山大學，其他三所是私立的嶺南、國民、廣州。最近成立招生，沒正式立案的珠海大學不計在內。

廣東雖說是革命的策源地，但學府裏的學術風氣並不怎樣濃厚。就以在廣東最吃香的中山大學來說吧，學術上的研究也不見得起勁。如果說由於學者專家們都集中北方，南方學府缺乏著名之士指導，形成研究興味的低落吧，或者這具小半的理由，但却不是全部的原因。著名的經濟學者王亞南不是在中大任過教職，後來畢

五月學潮的發生

中大法學院教授梅龔彬、劉渠的被綁；章導、彭芳草的坐牢，大家都醞釀着去意。彭芳草老早便離開了廣州，章導被校方解聘了，多位教授的出走，學府不能不為之失色！而由於總動員令的頒布，學生還有說話的餘地麼，王星拱對付學生的辦法，是中大史無先例，整批整批的開除。

在老頭子吳鼎新主持下的國民大學呢，不但了無生氣，且正以復古來麻醉青年。佈告上說呈准了教育部，由一年級入學起至四年級畢業止，國文(按

「副元首」到廣州

近來廣州的達官貴人正忙於迎送。魏德邁先生忽然而去了，接着八月二十五日是孫科大駕蒞臨。幾天，聽說副主席要由中山故鄉轉澳門乘永興軍艦到廣州來，於是乎趕搭牌樓，籌備歡迎，忙得不可開交。時間似乎太急促了，一點，各繁盛馬路雄糾糾的牌樓還沒有架搭好，副主席可就先到了。因此，當孫科坐着汽車經過寬敞的太平南路，而且正從牌樓底下通過時，架搭牌樓的工人可還在炙熱的太陽

威力下

威力下，汗流夾背地工作着。正如報上所說，這些牌樓不知是不是留待歡迎用的。在這人民災難重重的日子裏，架搭千萬元以上一座的牌樓，不是一「副元首」可真不值得呵！

在廣州，歡迎場面的盛大、隆重、緊張，勝利以來這算是第一遭。孫科在一年多前也會到過廣州來，歡迎也相當熱烈，可不十分顯現在軍政當局方面。那時，孫科還是以政協主席，立法院院長的身分，說着滿口漂亮的民主字眼，現在呢，已升格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長了。他以「副元首」的資格，曾大聲呼籲美國援助，斥責蘇聯侵略，已經贏得舉國一致的「鳴彩」，無怪廣州招待的熱烈了。

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各界假中山紀念堂舉行歡迎大會。「副元首」果然不同凡響，先說廣東人有的是革命精神，但近來退步了，以後要迎頭趕上，事「為天下先」，接着：「廣東今後應為建國的重要基石，但現有一件事，為京中人員和同鄉很覺担心的，那就是本省的治安問題。據聞瓊崖方面的匪禍已蔓延到南路去，東江也有發現，這是省市黨局特別注意的事。治安如果不能維持，建設即

露出狼的牙齒

——風 淳——

聯合社華盛頓八月十二日電「據海軍當局於昨日（星期一）之聲明稱：據證明，中國女子沈崇九歲，曾與皮爾遜於北平東單機場作伴約三小時，事後，伊不願提出控告，直至第二日伊才提出，同時據中美雙方醫生之檢驗，並未發現伊肉體上之損傷，而皮爾遜曾被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及給與不榮譽之撤職，直至今年六月間，海長福萊斯特表同意法官之意見，此即釋放皮爾遜並允許皮爾遜恢復美軍伍長職位。」

沈崇案畢竟翻案了，皮爾遜無罪。

我讀完聯合社的電訊時，不禁記起拿破崙一句憤怒的話：「虛偽如同官樣文章」。

倍倍爾說：從一個國家對待婦女的态度就可看出這個國家文明的進步與落伍，在沈崇案中，美國就露出了美式民主的牙齒。紅帽女孩的童話說得好，狼纏着祖母的頭巾而對紅帽女孩說着甜言蜜語，可是，他一張開口，就露出了狼的牙齒。

我們實為美國可惜，記得在沈崇案發生的時候，有許多名流都認為這是偶然的事件，有許多學者，如胡適先生，都認為這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忍辱負重真是中國人的美德，睦鄰也真是中國的傳統精神。我們的名流學者們在當時，一方面，深恐沈案會影響中美邦交，另一方面，他們對美國的法律，還存着景仰之心。可是，如今，事實證明了這畢竟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即是法律問題，美國的法律也是為政治所左右，他有階級的區分，也有種色的岐視。

沈崇案的翻案，這固然引起和沈崇案在同一年代同一國度的年青人的憤怒，這也傷害了同一年代同一國度的沈崇案前輩們的心。連胡適先生也不得不嘆口氣，認為這是極不幸的事件了。福萊斯特海長真給中國人上了最好的一課，如今，不僅中國的年青人認出了美國的牙齒，中國的受過美式教育的學者們，也認出了美國的牙齒。

我們實為美國可惜。嫌疑與憎恨的種子播下去了，一粒麥子，是會結出許多粒來的。誠然，在中國政府如此迫切需要美元的時刻，這也許不致影響中美邦交。但當每一個中國人在街頭瞥見一個美國兵時，他立刻會驚覺到這是一個人和他的姊妹「作伴」的皮爾遜，當每一個中國人晨起披閱報紙，眼光觸及美國兩個字時，他立刻會聯想到這是一個人發明原子彈的國家，却也是一個發明「作伴」新義的國家。邦交原不是締結在大使館之上的，而是締結在人民的心上的。

美國，你如今是站在那一邊呢？讓我這個異國人來重覆訴一述林肯總統的軼事吧，曾經有一個神父對林肯說：他希望上帝總站在我們的一邊。林肯不同意他的見解，却說：「我可不這樣想，因為我們知道上帝總是站在真理的一邊，不過我們是永遠懇求我自己和我的國家應該永遠站在上帝的一邊。」林肯真是美國歷史上傑出的總統，他不強脅真理站在他這一邊，他却服從真理而站在真理的一邊。美國，你如今站在那一邊？請想想。

你們如今不在服從真理，而在強迫真理服從你，你們如今不是站在真理的一邊，而是強迫真理站在你們的一邊。凡是強迫真理站在他這一邊的，必站在虛偽的一邊。

但，虛偽的聲音正像破裂的蘆管所發出的聲音，不僅使每一個人掩耳不聽，而且使每一個人發生厭惡。讀了聯合社十二日華盛頓的電訊，我們為自己憤怒，也實為你們可惜。

你們不但拋棄了羅斯福，也拋棄了林肯，傑斐遜了。難道真如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你們的最偉大的女宗教家瑪麗·索斯所說：「這已不再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個華爾街所有，華爾街所治，華爾街所享的政府了。」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如果把他的改成「皮爾遜所有，皮爾遜所治，皮爾遜所享的政府」，是不是更切合一點？

在真理面前，皮爾遜若無罪，美國却有罪了。美國，我們為你惋惜。

談不到，本省為三民主義的策源地和試驗場，我們絕不能讓它變為共產主義的試驗地。」（見八月二十七日新報日以下引同）

既然總動員令頒佈了，廣東是一個大後方，「為建國的重要基石」，「土匪」力量微小，又不像東北那樣大規模，假若治安也不能維持，就愧為「策源地和試驗場」了。但追源溯本，「副元首」不失為一個聰明人，說下去很有道理，萬事都是你們做官的弄壞了：

「政府原為人民做事，有貪污的行為，就是剝削人民，最失民心」，因此，「我國的政治不能修明，則共產主義便不能以武力清除」。這句話太夠警惕性了，所以「我們的國民政府以革命起家，不能引起人民的反感，而予共黨以藉口」這些當然是身為「副元首」，且為廣東人民說話的口吻。可是左也貪污，右也貪污，一連串的貪污字眼，而且要保證「廣東方面在不久的將來絕無貪污」，「人民不贊成貪污，政府就不應貪污」，「這個革命搖籃的省份，今落後到這樣田地」，你××當主席呵。這樣一來，弄得省主席先生很不好過。

可是據半官方面的人

士說，雖然不是你孫科的人當省主席，也不應以「副元首」的威勢罵人呵，反正人家知道你關懷家鄉便是了。

「副元首」的演說得到不少的鼓掌。在這多黨參政，政權開放的時候，很有些「同志」認識不清，意志動搖，「副元首」也注意到了：「國民黨是現在的執政黨，選舉以後當然仍望繼續執政」。何況「美國人士今日對我們的希望，仍寄於蔣主席，如魏德邁特使不願到共區去調查，即係承認國民政府的表示」。

而且，「無清政府的腐敗，我們不會有革命，同樣，如無日本的侵略，我們也不能表現民族抵抗侵略的精神和力量。這一次的戰亂，也是如此，如無共黨的叛變，我們也無從現我們改革政政的決心和勇氣」。意思是說，如果共黨被消滅了，或者根本就沒有共黨存在，「我們也就沒有「改革政政的決心和勇氣」了。

最後「副元首」還說：「共產主義雖未能以武力消滅，但中共之叛亂行為，則非訴諸武力將之消滅不可」，看情形，「內戰到底」是注定的了，這是一副元首「帶給三羊父老的唯一好消息」（八月一日寄自廣州）

「歐琴妮·葛蘭德」及其作者

林海

世界文學史上有兩位同樣寫小說，同樣生在十九世紀前半，而性質又頗相似的作家，這便是巴爾扎克和迭更斯。這兩位無論在優點或缺點方面，都有許多共通的地方。他們的優點是精力瀟灑；善創造，富想像，作品來得容易，人物的範圍和數量更大得可驚。他們的缺點是亂頭粗服：文字欠斟酌，感覺不夠微妙，寫實中屢入浪漫作風，不會描寫上層階級。自然，同之中還有一些分別。大體說來，迭更斯的筆墨要比巴爾扎克的精巧一點，巴爾扎克的規模也遠比迭更斯的闊大。但是，仔細研究起來，這兩位還有個絕大不同之點。他們雖都以揭發社會的黑暗為職志，而彼此的人生觀却背道而馳。迭更斯儘管做出種種嬉笑怒罵、痛哭流涕的樣子，心裏却老實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為善無不報，這世界到底會自動止於至善的。巴爾扎克沒有那麼樂觀，他的「人間喜劇」實際只是一齣毫無意義（因此不配稱做悲劇）的殘酷的惡作劇。這一「喜劇」的收場，跟迭更斯作品的收場恰相反，不是惡人失敗，善人得到最後勝利，而是惡人勝利，善人吃虧到底，

或者善惡同歸於盡。他們的人生觀何以如此懸殊呢？筆者在評論迭更斯一文裏曾指出一個事實：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現的人生觀每為其生平遭遇所左右。迭更斯二十五歲以後。名利雙至，到老不衰，所以作品中不期而然地流露出樂觀的態度來。這種看法用在巴爾扎克的作品上也一樣可通，巴氏的「悲觀」跟他的身世是大有關係的。不信，且來看看他的傳略。

一七九九年五月十六日，巴氏生於法國西部的都爾城。他父親由辯護士轉而為軍糧官，於一七九七年娶巴氏之母，美而有才，生二子二女。巴氏行一，誕生後即寄養人家，到四歲纔領回。七歲時他又被送到峯多謨 (Yendome) 市一家學堂去做寄宿生，一直住校，到十四歲纔回家。翌年父親帶他到巴黎去讀書，到了十七歲，他的普通教育便結束了。在求學期間，他的成績並不優異，但似乎看過很多的書，因為除了這時期外，他一生中沒有多少看書的時間。接着父親命他到巴黎大學去學法律，並在一位證官和一位律師的事務所裏實習了三年。二十一歲那年他領到了執照，父

親便叫他作開業律師，他却反抗起來，說自己要依賴寫作過活。這時他一家人遷離巴黎，父親只給他一點點的生活費，叫他住在頂樓，要以艱苦的生活逼他屈服。他却自持體力頑健，意志堅強，不斷奮鬥下去。他先動手寫悲劇，出產了一部不受重視的「克倫威爾」；後來開始寫小說，短短的四五年間出版了一大堆無人過問的東西。一八二五年到二八年之間，他轉移精力去經營出版、印刷、和鑄字的業務，結果負了十萬佛朗的債。這債務直接使他忙了十年，間接却叫他苦了一世。在避債的期間內，他又下手寫小說。一八二九年出版的一部摹仿司各脫的半歷史性的小說叫他出了頭，於是他真正的文學事業便開始了。以後的二十一年裏面，他的事跡可分作三類來敘述。第一，在事務方面，他永遠擺脫不了債務，往往舊債未了，新債又來。他想錢想得發昏，常作盲目的投機。例如，一八三八年他到撒地尼亞去，想從羅馬人遺留下的礦渣中淘出白銀來，結果自然白耗資本。他又愛旅行，搜集骨董，和在已排好的稿件上重新起草，這些都使他增加虧累。

他有時也想做官，曾參加過兩次的議員競選，結果沒成功。第二，在寫作方面，他真是勤快極了，除司各脫外，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他的習慣是每天午後六時吃了一點東西便上牀睡去，夜半起來，靠着大量濃烈咖啡的支持，一頁又一頁的寫着，直到次日中午甚至午後。連續工作十六小時，在他是常事。他的作品往往寫了又寫，最後定稿有時可比初稿多出三倍，這些都是在校樣上添進去的。第三，在友誼和愛情方面，他比較還順利。他是個和藹不過的人，當代法國文豪，自雨果以下，都跟他要好。同胞中他最愛大妹妹羅兒 (Laroc)，常跟她通信。他死後，這位妹妹給他作傳。他有好幾位女友，關係最密的是一個波蘭籍的伯爵夫人，名喚韓斯加 (Hanska)。他倆於一八三二年開始通信，過了十八年纔結婚。其間這兩位有情人常在歐洲各地會見，最後於一八五〇年三月十四日在烏克蘭成了眷屬。但是同年八月十八日，巴氏却因積勞成疾逝世於他的巴黎寓所了。

正如一位批評家所說，「巴爾扎克的一生說明了他的作品」。因

爲他坎坷了一世，他的作品無形中便染上悲觀的色采。跟迭更斯相反，他不肯相信我們的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之最佳的。這兒並沒有迭更斯小說中常見的十全十美的人物，熙來攘往、摩肩接踵的只是些守財虜、浪子、兇手、寄生蟲、惡棍、被壓迫的婦女、窮困潦倒的工匠、和被子女們遺棄的老頭兒。這兒也並沒有什麼可歌可泣的事，銅臭和罪惡籠罩了一切！所謂「人間喜劇」便是由這些集合而成的。一八四二年巴氏初次想起用這個名目來稱呼自己的全部已成和未成的作品。他把這些作品分作三大類：生活的場景（包括私人的、外省的、巴黎的、政治的、軍隊的、鄉村的諸部門），哲學的研究、分析的研究（附註：「人間喜劇」有意摹仿「神曲」，這兒的三大類恰等於「神曲」中「地獄」、「淨界」和「天堂」三大部門）。依巴氏的原定計劃，全部「人間喜劇」應包括一百三十三冊各自獨立的小說，對象爲整個法國上中下三層社會。最後由於年命的限制，未克如願以償，只完成了五十餘冊，但即此已足驚人了。

這五十餘冊作品並非全體都是傑作；在時間上看來，這也不可能。假使用詩人來作比，巴爾扎克該是「七步成詩」的曹子建，而決不會是「二句三年得」的賈浪仙。他

不特不喜歡，實際也沒工夫「苦吟」。斯脫采 (G.L. Strachey) 在「法國文學紀要」(Landmarks in French Literature) 一書中有一段很

精彩的描寫：「在不可克制的才力激動之下，他（指巴爾扎克）狂熱地、拼命地寫着。他的意象一羣一羣、生動密集地蜂擁到他身上來——最荒誕的幻象跟最有生氣的實感亂糟糟地混在一起。他並不想去別擇；他惟一開心的只是想個法子把它們全部傾倒出來：好的，壞的，或無所謂的，這算什麼？這許多東西擠在腦海裏，必須把它表達出來，如是而已。」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藝術工夫自然不會達到完美的階段，於是嚴格的批評家便紛紛給他們舉「罪狀」。綜合他們的意見，大約不外下列三點：第一，巴爾扎克是個粗才，只會描寫醜惡的、不愉快的東西，嬌嫩的、精妙的他根本捉摸不到，因此他不會了解迦茵·奧斯丁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第二，他始終擺脫不了浪漫的氣味，他的作品，無論在人物或情節方面，每每夾入低級的傳奇性作風；第三，他的文字太不講究，一句接一句，跟堆石頭似的，笨重得很。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又同聲稱讚他具有極敏銳的現實感，而且大氣磅礴，爲生民以來所罕見。平心而論，這些評語都不錯。本來像巴爾扎克那樣性格的人，在文學寫作上，似乎

也只宜粗而不宜精，宜寫實而不宜浪漫。天才到底還有人類，在能力方面，原不必求全責備的。

巴氏作品中最得好評而且最爲我國人士所熟悉的，要算「高老頭」和「歐琴妮·葛蘭德」這兩部。就中「高老頭」一書仍帶着若干傳奇的因素，「歐琴妮·葛蘭德」則幾乎白璧無瑕，大可塞住批評家的口。這書是關於一個守財虜的，故事如下：

主人翁葛蘭德出身木桶匠，由於努力和機警，中年以後手頭漸漸鬆動起來。法國大革命時代，他湊集了一些現款，從共和黨人手裏買到了蘇穆爾地區內最肥沃的葡萄園和其他產業。後來，時勢造英雄，他居然做了一任蘇穆爾城的市長。拿破崙登台後，他的官職是被削了，但他的葡萄園產已很可觀，何況又同時繼承了三份遺產。得失相衡，命運之神還是向他微笑着的。他家中只有一妻、一女、一女傭。故事開始時是在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個晚間，那天是歐琴妮小姐二十三歲的誕辰。這時她父親年已七十，家產達五六百萬佛郎。葛蘭德先生不好交游，家雖富有，門庭却冷落得很；但時常跟他來往的也有兩家。一家叫古盧曹，包括叔叔三人；姪兒是本城的地方法院院長，一個叔叔當證官，還有一個是神父。另外一家叫格拉辛，包括一對

夫婦和他們的兒子；格拉辛先生是本城最有錢的銀行家，他的兒子阿多爾夫則剛從巴黎學畢法律回來。這兩家的人懷着同一的企圖，三十三歲的古盧曹院長和二十三歲的阿多爾夫都想向歐琴妮小姐進攻。這天晚上他們各帶着禮物到葛府來祝壽，正在打着牌，門外忽然傳進了一陣響亮的敲門聲。進來的是新從巴黎到此的主人翁的姪兒查理·葛蘭德。這位衣冠楚楚的美少年的出現，叫全場的外省人損了顏色；同時也使歐琴妮小姐一見傾心。然而，隨着這花花公子降臨的却不是什麼好消息。從交他帶來的一封信裏，葛蘭德先生知道他的在巴黎幹葡萄酒生意的令弟此時已因破產而自殺了！這是封遺書，把兒子付託給哥哥。當天晚上葛蘭德先生一聲不響，不讓客人和家人猜出他心中的秘密。第二日他纔把噩耗傳給他的妻女和查理。歐琴妮早已愛上他的堂弟，在悲哀中他們的情感日益加深起來。幾日後，查理爲了重造家業，動身到東印度羣島去。行前，歐琴妮悄悄地每年元旦和她生日父親給她的金幣，全數贈給查理做盤纏；查理也把母親給他的一個金質化妝匣，連同他父母的兩張畫像，留給她做紀念。堂弟去後，歐琴妮的生活又回到單調寂寞中去，但她的秘密終於被父親發覺了。爲了金幣的喪失，葛蘭德先生把他的女兒

禁閉起來，只許她用麵包和開水做食糧。他的太太驚恐成疾，不能起牀，半年後她的女兒雖得解放，她自己再過幾個月却悠然長逝了。接着她的丈夫也歸了天，讓歐琴妮承受了一千七百萬佛郎的遺產。歐琴妮一直在等着查理的消息，七年後的某一天查理的信來了，婉轉地告訴她：舊情不可復，他已發了財，並且決定跟一位貴族小姐結婚。歐琴妮的回答是，央請古慮曹院長到巴黎去，替查理清償他父親欠下的一百五十萬佛郎的債務，然後在一個很特別的條件——只許作名義上的夫婦——下，跟這位院長結了婚。不到幾年，名義上的丈夫又溘先朝露了。歐琴妮的財產雖越來越多，心上的愁雲却也愈來愈黑。她的生活還是跟做女兒時一樣的清苦，惟一的伴侶是父親手中用過四十年的女傭娜倫。

這書情節簡單，意義尤為單純。主要的人物只是一父一女，父親代表金錢，女兒代表愛情。書中有一處說得明白：「那天夜裏父女們都計算過自己的財產；父親要去售賣他的黃金，女兒要把黃金扔在情海之中。」結果呢？父親的元寶日日進門，壽終時積聚了一千七百萬佛郎。雖然，哲學的地說起來，還是空着手來，空着手去；但生前「求仁得仁」，總可算得稱心如意了。女兒爲了愛情，吃了半年閉禁的

苦，犧牲了一位慈母，又眼巴巴地等了七年，到頭來却撲了一個大空！這世界原是金錢主宰一切的，作者說得明白：「我們的時代，主要的是金錢在社會和政治方面，充任立法者的時代。」所以，一個不懂世故的花花公子，經了一番磨折之後，也會爲着財勢去跟一個生得相當醜陋的女人結婚（他全然不知他叔父有多少財產）。這書徹頭徹尾脫不了一錢。葛蘭德辛苦一世是爲了一錢，他的令弟自殺了也是爲了一錢，古慮曹、格拉辛兩家的人不斷到葛府來鉤心鬥角是爲了一錢，最後古慮曹院長甘願作名義上的丈夫也還是爲着一錢。惟一不愛錢的是歐琴妮，然而她失敗了！這是作者的經驗使然！這是現實的環境使然！

以結構來說，這書是一人間喜劇中最完美的一部。這兒設有插曲，設有閒文，一切神秘的事件，熱鬧的場面，以及不必要的人物全都剔除。全書清清楚楚地分作三部：歐琴妮二十三歲生日以前是第一部分，從查理出現到遠行是第二部分，以後是第三部分。論分量，前後兩部佔全書三分之一，中間一部佔三分之二。論時間，前部泛述幾十年間的往事，後部歷時十年，中間一部僅敘十日左右的事情。因此，全書的重心無疑地是落在中間一部。這兒作者借著父女倆的想頭、行徑來

烘托出書中的意義；父親是千方百計在弄錢，女兒則一心一意爲着堂弟；現實和理想的鬥爭沒有比這裏演得更淋漓盡致的了。

這書人物不多，寫得最成功的自然要算那位守財虜。作者雖以他女兒的芳名來作書名，並且加意描寫她，似乎要打破自己不能描寫少女的紀錄；但比起她的父親來，歐琴妮的性格却仍顯得單薄、虛幻、沒有多大光采。才力的限制原是無可如何的。作者從各方面刻畫葛蘭德，他的吝嗇、冷酷、沈着、和老謀深算，無不寫得刻入周到。他毫不誇張，只是依情據理，把一樁樁具體的事件累積起來，結果一個可恨而又可畏的守財虜便從紙上活生生的跳出來。寫守財虜而能使其可畏已不容易，這兒的葛蘭德先生似乎又有幾分可敬，因爲他有着鋼鐵般的意志。世間的所謂領袖，其能事原也不過如此，所爭只在一念之間，上帝與魔鬼的分別也就在這一念。一個能描摹出上帝或魔鬼般人物的作家，其本身自然也是偉大的。

但是，巴爾札克的技巧最值得注意的却是背景的描述，這書的第一部便是全體致力於此。作者先詳細地描寫蘇穆爾城內一條街道像攝影般記載下來，然後依次介紹葛蘭德（他的過去的歷史、現在的狀況、性格、習慣、外表、和家庭）以及古慮曹、格拉辛兩家的人，接着把葛公館內外部同樣精細地描寫一番，最後介紹這家的女用人娜倫，

於是故事便開始了。這種寫法有兩層道理：第一是借背景來反映人生——這一些讀者自會看出，無須細說；第二是有了背景，後面便可省去許多解釋和困難。舉例來證明，古慮曹院長和阿多爾夫追了歐琴妮好些時候，並沒聽說有什麼反響，查理、葛蘭德一來，她便大動芳心，這除了用背景來解釋外，還有什麼更圓滿的說法？這書的事實本就不多，第三部中，查理的信未來以前，除葛蘭德夫婦的逝世外，根本沒發生過什麼事情，然而時間却有七年。這該怎麼辦呢？作者只輕輕地交代了一句「五年過去了」！這在別人的作品裏絕對通不過，讀者會馬上覺得它的草率的。但這兒却很自然，因爲作者早在背景的部分裏，叫我們意味到葛蘭德公館裏的生活是如何的刻板單調，別說五年，便是五十年，也可一筆帶過。背景的描述有此功效，這就不能不使你佩服作者的靈心妙手了！

雨果曾以「精於觀察和想像」一語來讚頌巴爾札克。巴氏的不可企及處似乎尤在於他那空前的觀察力，這種力量使他對於現實世界具有一種超人的感覺。他和雨果的不同處便是一個只宜作詩人，慣會在三十三天上飛行；一個却是天生的小說家，越近地面越有精神。這就說明了爲什麼同樣以現實作題材，雨果的「悲慘世界」祇是一個縹緲虛幻的影子，而「人間喜劇」中許多作品却是有生氣，能活動的肉身。

藝文誌



歷史劇的道路

霍然

從「狼羣」想開去

歷史劇的材料，不消說，是採自歷史。然而歷史的材料是無邊無際的，歷史劇的形式却是有限的。用有限的形式去網羅無際的材料，這等於手裏握着一把沙，一定是流漏的多，留存的多。所以它只能採取其中最典型最能標示歷史發展動向的幾個片段，作橫斷面的描寫。而從這橫斷面具體的描寫中，從某一角度歷史人物具體的言行中，總結歷史的得失，批判歷史的得失。

這十年來之間，我們為了配合反抗被異族奴役的鬥爭，於是從過去的歷史裏，汲取了同樣的被異族奴役的題材，而製作成一個個龐大的文庫了。然而其中大部份，似乎都被題材的網羅住了，老是以着題材的後面跑。稍有一些關連的，都盡量收容在劇本裏，不肯來一下決絕的取捨。譬如寫起明末的史劇來，就一直從李自成「造反」，寫到崇禎吊死煤山，寫到吳三桂的一箭一石一怒為紅顏，寫到史可法的慷慨就義，寫到功的孤軍抗戰……幾乎當

命的具体情况，也能從這裏直覺着那時動亂緊張的氣息。

例如「狼羣」底整個故事，雖然只告訴我們一個驕傲自恃，謹守繩墨，而又喜歡嘲諷的軍官，怎樣在同僚的嫉妒下，蒙上了通敵的罪名；軍事長官怎樣明知他的罪狀完全出於敵人的誣陷，爲了維護所謂國家的權威，軍隊的紀律，以及兵民對於長官的信仰，依舊不惜維持原判，把他送上斷頭臺。然而在他背後，我們却看到了一般人的正義和公道，是怎樣選就着空洞的紀律和虛偽的權力。說是使爲了後者而犧牲正義和公道。可是這正義和公道却正是流血革命的動機——「你以爲我們目的——在這裏拚死命的是爲甚麼緣故？是爲了幾位權貴貴族人的野心麼？爲的是公道道，假使人民有一天違犯公道，那它祇不過成爲一些暴君污吏的巢穴，而我們便是在裏面掌刀的了。」（原書推利耶語。）

一方面要完成爭取自由正義的大革命，一方面又鄙棄這些自由和正義，這就注定了法國大革命底悲劇性，使革命的果實落到野心家的私囊裏了。

平津小事

大榮

△胡適近來大爲「開明」，據說與青年接近也是一個原因。胡近來忽有新發現，向別人講笑話云：一個國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則容易民主；反之則否。德國文學中極少怕老婆的文字，故不易民主，中國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將來必能民主。

據另一位留德教授說：其中也略有小道理。近些年來的德國文學，一提及男女問題，必鼓吹女子爲男子犧牲。

△吳培正寫「朱元璋傳」，擬寫十數萬字，分六十七章，第一章「小流氓」，第二章「小軍閥」，第三章「大丞相」，第四章「大皇帝」等等。用通俗文體，每章後附大量註釋，則完全引經據典。

△丁易幾遭師大解聘，終於在各校教授的「輿論」壓力之下，師大（現在是「師院」）當局未敢解聘。

△朱光潛到武漢主持招考差已返平。據云：武漢投考武漢大學學生，反不及考北大清華南開者多。

法國裝飾畫專校

王益之

法國國立高級裝飾畫專門學校，雖然校舍是新型的，但歷史却甚悠久了。它的前身是路易十五所創立的皇家公費繪圖學院。創立這個學院的原意也頗爲有趣，原來當時（十八世紀）法國畫壇已有標奇立異的傾向，有些畫家已不愛忠實地反映實物，所出作品往往失去了「真實」及「理性」，這事實頗招致當時某些人的不滿。路易十五所愛好的畫家巴里利埃力謀抵抗此風，就設立這學院，規定學生免費入學，目的在培養一批「藝術的工匠」。巴里利埃生於一七二四年，死於一八〇五年，爲花卉畫家、歷史畫家、曾被選入學士院。學校成立於一七六五年，主要課程爲繪圖、建築、雕刻，以數學及幾何的原理來訓練學生。

它同「法國國立藝術學校」和「法國音樂戲劇學校」一樣是一所藝術方面的高級專門學校。正如現任的校長葛西諾所說：「學校當然在培養藝術家，但是我們的藝術家是向美化每個人生活的各部份去發展的。」

學校是國立的，學生畢業時由國家發給文憑。同時入校也不很容易，要經過好幾次嚴格的考試。肄業學年爲四年，前三年課程都爲必修科：上午自由作畫，下午爲裝飾畫科，什麼椅子坐墊圖案、書籍裝飾藝術、兒童服裝圖案、雕刻等……下午五時後則爲藝術史、文學史、幾何、透視學等學科。到第四年上，學生才專選一科，以求深造。

這學校真是人才輩出……大畫家如華洛基埃、馬蒂斯、馬爾蓋、格羅梅爾……大雕刻家如卡爾波、達路、羅丹（羅丹考國立藝術學校被拒而入該校）都曾就讀該校。朋朋、台斯比歐亦曾在該校地下室工作過，現在則在學校教育下一輩的青年了。

投考該校的學生每年爲數不少，外國學生亦有，今年已有六十個外國學生擬入該校，對於外國學生投考該校要有法國駐在各該國的使節或文化專員的介紹才能，經過該校教授會通過，且可免試。

該校另辦有一個補習班，晚上及星期六上課，是專門爲已經從事裝飾藝術工作的青年進修辦的。

書話

俞平伯散文

俞平伯「燕郊集」，除收其友文學叢書，用沖皮而裝訂外，另有一種特印本，紙而平裝，由平伯自署書名，飾以黑色直條。平伯字本秀雅，年來更趨平實，用作書而，醇樸可喜。此本內容與叢書本無異，惟叢書本印刷不佳，間有闕字，此本則完全補足，且所用道林紙質純色白，遠較叢書本之米色道林為佳，友人黃裳亟稱之。其實此書裝頓，乃做「雜拌兒」而來，「雜拌兒」一名梅什兒，出版於一九二八年，為平伯早年散文結集，開明書店印行，封面題字，出玄同手筆，周作人曾為作跋，平伯自己有「自序」，有「自題記」，其「自序」云：

頗擬試充文丐，於是山叔老人諄諄以刊行「文存」相詔，急諾之。俄而驚。夫「文存」大名也，吾何敢居？必得他名以名吾書而後可焉。謀之歸，詢之友，叩山叔老人之門，均茫茫不吾應。思之，渺渺不得。「恰好丁卯大年夜，姑蘇寒給我一堆「雜拌兒」，在我枕頭邊」。無以名之，強而名之。讀者其顧名思義乎？十七年一月廿四日夜半，於禁用白話之地。

此序用文言寫，且甚怪，末曰「於禁用白話之地」，所以文中夾用白話，即加引號，却是一種極有趣極機智的抗議，這種地方由平伯寫來，最見功力。後五年，「雜拌兒」二出版，裝頓相似，題簽亦仍由疑古先生動手，不過周作人却已經由「跋」而「序」，高升一級了。但他自己劈頭就說：「這是我的一種進步，覺得寫序與跋是一樣」，他的理由是「序固不易而跋亦復難，假如想要寫得像個樣子」。其實要寫

得像樣什麼文體都難，却不是字和跋的問題，以此來掩飾他的升了一級，我看有點多餘。「雜拌兒之二」還是散文集，但和第一本一樣，却是很「雜」而已。「之二」裏還附錄「嚶語」十九至三十五，共計十七首新詩，有小序云：

這是我在西邊以後所作新詩的總名，一共做到現在，只有三十五首。其第一至十八已附西邊之後。這兒是從十九至三十五。這實在是在分行寫的文罷了，所以附在這裏，反正也未必再想出什麼詩集了。

平伯有詩集曰「冬夜」，曰「憶」，曰「西邊」，此後真的不曾再出詩集。「憶」在前面已經讀過，「西邊」一集，至今未得，蕭蕭寒寒，固是書海一夕而已。

「冬夜」

「冬夜」為平伯最早詩集，三十二開橫本，民國十一年三月亞東圖書館版，分四輯，收詩五十八首，有自序及來自清序，又有付印題記，云：

花影底綽約，
却是銀灰色的。
影兒雖礙花啊，
花終不願拋撇她依依的影。

其時雖五四運動才三四年，「冬夜」的成績的確值得稱道，所以出版後頗受注意，批評的文字也特別多，再版時刪自序，以「致汪原放書」代序，算作對批評者的一點答復，平伯儒者，腹內雖有牢騷，說來溫文爾雅，總不見有一點兒火氣也。



去年，魯迅全集出版社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曾再版「魯迅全集」，立即售完，因遲了一步而買不到的人很多。今年魯迅先生逝世十一週年，該社特將「魯迅三十年集」重印，全書共二十厚冊，包括魯迅先生全部創作，定下月出版。生活光明各大書店，均代預約。

文協近接英國「世界作家傳記」編者來信，請中國作家自撰小傳。又：「中國作家」創刊號，業已付排，即將出版。

「黃永玉的木刻畫」，收有作者自選木刻畫四十幅，佳紙精裝，即將出版。其中「老鼠嫁女」一幅，最為外人喜愛，不久之前在詩年會展覽，傳出原拓頗多。



施蛰存存抗戰時期，執教廈大，曾譯有「北山譯乘」十冊，聞其中四本：「老古董俱樂部」（短篇），「丈夫與情人」（對話），「戰勝者巴爾代克」（中篇），「陣亡十兵拒葬記」（劇本），即將在上海重印，其餘諸書，亦將陸續出版。

蕭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其英譯俄譯均受國際文壇重視，戰後初版由作家書屋發行，早經銷售一空，現聞再版業經印出。又：張天翼之「談人物描寫」，對創作過程作深入淺出之解剖，文筆清麗，是一本最切實的文學論，同時也可作一本最成功的創作看；又焦菊隱近譯契訶夫名劇「櫻桃園」，完全以最熱練的口語譯出，末附研究契訶夫及「櫻桃園」長文，對讀者幫助尤大。聞此兩書亦由作家書屋出版。

「假鳳虛凰」觀後

容方

我諒解，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苦衷，說「假鳳虛凰」的主題是在發揚「勞工神聖」的精神，因為不這樣誇大的加以註解，它將被攻擊為污蔑勞工，這可以說是一場沒有是非的吵鬧，兩方面的理由，都與實際情形相距很遠。所以，如果有人，因為那誇大的註解，竟敢希望以假當真，說「假鳳虛凰」的本意正是如此，那就實實在在的有意誑騙了。我想，一個批評者，最重要的就是誠實。

自然，你可以用盡一切方法來牽強附會；因為一段無關緊要的描寫，就把它拉扯成故事的中心。舉例來說吧：當那一位理髮師無錢舉行婚禮的時候，各位理髮師曾經拿出自己的所有來幫助他，於是我們的批評者就大做文章，說這是表現勞工們真切的友情的。但是仔細一想，那位理髮師所做的勾當，原來只是一種欺騙，那歷各人的幫助，又何嘗不能解釋為騙子的幫忙呢？這自然不是原作的本意，然而由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任何不合實際的諒解，都是無益的。「假鳳虛凰」本來是怎樣，就還它一個本來的面目。

我的看法，「假鳳虛凰」既不在此揚「勞工神聖」的精神，也不在注意的攻訐理髮師的職業，它興趣的中心，不過是那以假當真的情節，玩弄那你騙我的我騙你的笑料。此處理髮師換了別的職業，故事並不會有根本的改變。但是，因為每一項職業必定有習慣的動作，所以經過表現，就容易誤解成是一種污蔑；而事實上却不是如此，我想理髮師是不必看得那麼嚴重的。

當然啦，笑料的產生，既然大半放在職業的習慣動作上，那麼，所謂笑劇也希望貶責人生世態的目的，就很難達到了。「假鳳虛凰」是一部純粹笑樂的作品，我們的看法，不必加什麼過份的渲染。

這樣一部片子，如果有所取的話，應該說導演的貢獻最大，看「假鳳虛凰」，實在如見導演佐隆先生其人。你得慢慢的等待，耐着性子；但冷不防，却水花四濺，笑料突然躍出，驚喜大樂之下，不容你多加思索，只覺得這是一次發明；而不是別人所能慣有。如皮鞋的當眾出醜，這種例子很多，不必一一舉出，這特別是佐隆先生的氣質，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我們都可隨手拈到這種神奇的出品。但是，這也當是一種無法彌補的缺陷，因為思想既然專注在這方面的發掘，於是就容易忽略了別方面的完整；尤其看了「假鳳虛凰」，導演對全片的控制，特別覺得鬆懈，結果起伏平板，調子緩慢，就成了它顯見的缺點。也因

為不能隨時隨地控制全片於笑劇的氣氛裏面；而在鬆懈處，就特別見出手法的不調和不統一。如果，這種缺陷，得到了彌補，我想導演的處理笑劇，真可說是出神入化了。

演員以石揮的表演為較佳，一貫的作風，是來得自然貼切，在四個演員裏面，以他最能適應導演的手法，和片子的性質，他重無牽強生硬之處，遺只和路珊一比較，就可以見出是非，因為路珊，特別在這裏故作，似乎一做作，就變成了演笑劇一樣，這想法和表現，實在未免幼稚。而其餘的兩位演員，和石揮一比較，則好像根本沒有自覺是在演什麼戲，這一方面使石揮的表演凸出；也一方面，使石揮感到沒有呼應之苦吧！

這歡樂的聲音，呼應着莫扎特痛苦的生活，兩股激流在一顆心裏迴蕩。從那聲音裏，我們更可以感覺到痛苦之深沉；從那痛苦裏，我們也更能感覺到歡樂的力量，聲音和生活是一個人格的兩面；惟有從這兩方面來表現，才可真實的體驗到那人格的豐富和瑰麗。因此我們描寫音樂家的生活，重要的絕不是叫我們來欣賞他的作品；用他的作品，只是為着更好的表現那個人格。把音樂採和着他的生活，使我們能深一層揭示他靈魂的奧秘，也深一層揭示那時代的奧秘。

但是「藍色狂想曲」，雖然是一張音樂家葛許溫的傳記片，却沒有注意到生活與作品之間的關係。我們欣賞着一章一章的樂曲，却不能從這樂曲的遞變之中，感覺到這音樂家的人格之成長，似乎音樂家葛許溫，在這裏完全處於次要的地位，不過虛擬他的生活，作為一種線索，來以次演奏他的作品罷了！所以「藍色狂想曲」，雖名為音樂家葛許溫的傳記片，實際上只是一張音樂片罷了！這情形，通常出現於好萊塢，並不覺得奇怪，但它們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

事實上，我們不必舉太多的例子，像「巴黎一美人」曲子的完成，它究竟經過了怎樣一種精神上的激動與變化，我們即無法從片子中感覺到，只是銀幕上出現了一個個特寫；而它們却與曲子沒有任何感應和關係，這種潦草與浮面的描寫，正可以說明這種片子的貧乏。一個人物的傳記，在他們不是「刻苦成功」，就是「愛情糾纏」，除此就變得什麼都沒有了，因此希望把音樂和音樂家的生活與感情，那樣密切關聯的表現出來，是完全成爲一種幻想了。

這裏只能給你欣賞片段的音樂，却不能給你體驗音樂家完整的人格。「藍色狂想曲」與宣傳之間的距離，是相去太遠了。



評「藍色狂想曲」逸之

莫扎特用他歡樂的聲音，來表現自己在痛苦與折磨之中不肯低頭的感情；在那時代說，這感情，正表示着「一種新的生活態度在降生：人們再不肯屈服於冷酷和絕望的封建桎梏之中。願望歡樂啊！人們願望好好的生活，歡樂是生活和時代的理想。」

讀者之聲

本欄投稿簡約

- 一、來稿署名顯便，但務請於稿末書明真實姓名及地址，否則不便刊登。
- 二、來稿請勿超過六百字，愈短愈好。
- 三、來稿例不致酬，僅以登載該稿之本刊寄奉一冊。
- 四、來稿除附有貼就郵票、寫好地址之信封者外，概不退還。

嚴禁自殺！

曹永輝

八月十八日大公報地方通訊中有一條小新聞「嚴禁自殺」云：「本報昆明通訊，社會部通令嚴禁自殺，該部以邇來各地自殺案件層出不窮，認爲此種現象係由於生活不安所致，近分令各省社會處設法防範，嚴予禁止，并應經常派員巡視，如發現有可疑徵兆，即設法勸止，如有不聽勸導者，依行政執行法第七條第八款「意圖自殺，非管束不能援救其生命」之規定，予以管束。」

看後頗使我發生一點感慨。當然自殺的動機是很繁複的，但在此時的中國中，大部分自殺者都因爲生活的關係，是可斷言的（社會部也承認這點）。惟其因爲是迫於生活，所以要禁止便不是件容易的事了。不從根本上改良民衆生活入手，而只是消極地嚴禁，這正如「湯止沸」同樣可笑。至於不聽勸告而即須予以管束，也許便是嚴禁自殺中的具體辦法，但這辦法却正是那些不能生活下去而企圖自殺的人，求之不得的事。反過來說，假如政府能夠使他們繼續生活，則又何必一定要自殺呢？譬如坐監牢自然不是件好事，然而爲了維持生命而故意構成一種罪名，企圖入獄吃囚飯的，已是數見不鮮的事。我就心政府切實執行起這拘管的辦法時，拘管所恐難免有一「客滿」之患呢！

同時，自殺而需要通令各省社會部嚴禁，則中國的人民生活在怎樣的境

界中，也不難想見了。「人民豈不太愚笨了嗎。蟻蟻尚且貪生」，中國的（八月十八日 上海）

八月的「調整」

高沃

八月的調整呀！
僅僅十萬元。
——十萬，十萬，
我怎能不從頭到腳的失望。
夠買雙鞋嗎？
夠買一袋麵嗎？
還是夠打發點零星債主？
我們半餓着，從家里踏進辦公室，
工作，效率——都狗屁……
待遇成了人家的隨意小費，隨意恩惠；
生活的圈子縮緊成針眼般小。
反淘汰的日子，被「淘汰」的人，
千千萬萬，萬萬千千……
你且看着我們
怎樣挨餓受窘，
怎樣憤怒，怎樣行動，
怎樣打碎這針眼！
（附作者致編者函）我是小公務員，心頭對此次待遇調整極端憤怒，簡直是笑話，開窮人的玩笑。寫此詩，却願！只希望能發表，或代介紹發表，是所至感。

打倒學歷制度

吳家濱

在中國社會里，許多機關和團體，都要視你的學歷證件，然後才給你考試，定你的地位。甚至神聖的學校，也是同樣的要視你的學歷證件，然後才給你入學考試的資格。我真不明白，考試爲了什麼？既然要學歷證件，那就不應當考試。既然有考試，那就不應當要學歷證件的資格而已！反之英國大文豪蕭伯納，他僅僅小學畢業。我們是否能以他的學歷而不認承他爲一個大文豪嗎？俄國大文豪高爾基，祇讀了三年書，我們是否以他的學歷，而認他的著作是假的，是抄襲的呢？要明白學校並非是一個訓練學生智力學力的標準場所。發明之王愛迪生，他在學校是一個被認爲不可教育的低能兒，但他出了學校，却成了一個大科學家。

何況學校並不是人人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自白

林朋

楊光時先生等「自由主義」者，在觀察週刊發表一篇「民主國際」之後，尹其文先生、歐陽長虹先生、伯奇先生和施復亮先生，都先後在時與文發表了幾篇關於「民主國際」的論文，於是楊光時先生的「民主國際」的內容和「自由主義」者的本質，都一起被揭露出來了。而尤其是經過楊先生自己更正函發表以後，所謂「自由主義」者的「民主國際」，就此得到一個更明確的結論。

楊光時先生在更正函裏說：「老實說，我們投這篇稿子，當然有我們的用意的，不過這個用意却

資格而已！反之英國大文豪蕭伯納，他僅僅小學畢業。我們是否能以他的學歷而不認承他爲一個大文豪嗎？俄國大文豪高爾基，祇讀了三年書，我們是否以他的學歷，而認他的著作是假的，是抄襲的呢？要明白學校並非是一個訓練學生智力學力的標準場所。發明之王愛迪生，他在學校是一個被認爲不可教育的低能兒，但他出了學校，却成了一個大科學家。

何況學校並不是人人

（三十六年八月蘇州）

未被人家識破，我認爲我們這篇東西的着力處，在於「祇要得到美國的保證，一個超越馬克斯主義的思潮便可產生」。根據楊先生這種說法，則所謂「一個超越馬克斯主義的思潮」的「着力」核心，就在於「祇要得到美國的保證」。因此，楊先生的「一個超越馬克斯主義的思潮」的「產生」，是完全以「得到美國的保證」爲前提的。相反的，如果沒有「美國的保證」，那末這批「自由主義」者的「一個超越馬克斯主義的思潮」就不可能產生了。所以楊先生的「自由主義」者的和「美國保證」，

原來是如此不可分離地互相結合着的。一個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的思想體系的產生，不是基於中國人民的要求，而是「祇要得到美國的保證」，這種厚顏無恥的論調，正是反動派勾結國際帝國主義者的反映。

抗戰初期，日本法西斯發表「廣田三原則」和「近衛聲明」，馬上就有汪精衛的「電報」來響應。同樣，美國在高唱組織國際反蘇反共集團時，也馬上就有楊先生的「民主國際」相應和；日本法西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抗日政府以外的「和平政府」，馬上就有汪精衛的和平反共「政府」成立。同樣，美國在中國招尋國共以外的「自由主義」者，也馬上就有楊先生的既反對反動派也反對共產黨的「一個超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的產生；所以美國要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招僱其合理理想的「自由主義」者來充當代理人，是毫不困難的。「正告美國」，楊光時先生等一批「自由主義」者，正在插着草標待價而沽了。

然而楊光時先生爲了實現他的反動企圖，既然不得不通過依賴美國的關係——「祇要得到美國的

保證」，但在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穿上中間派的

「自由主義」的外衣，企圖掩飾其反動的內容，來欺騙中國人民。因此，就不得不陷於形式邏輯的泥坑中，大叫「看見光臂膀，就想到裸體一樣」的引人走進迷魂陣中去。這種穿上民主外衣爲反動派說教的伎倆，正是毫無例

自由主義者不應「反蘇」「反共」

編者先生：貴刊廿三期登載施復亮先生所作的「錯誤的看法與反動的對策」一文，對於設立民主國際和美蘇關係的論述很中肯，態度也很嚴正，使我非常欽佩，不過有一點我要通過編者向施先生請教，希望把答案在貴刊發表。施先生認爲「既然全世界自由主義份子皆在窮困中，爲了反抗貪污腐敗的政權，不消走上了左傾的道路。既在貧困中且已走上了左傾的道路的全世界自由主義份子，爲什麼還會在對蘇關係上有許多不同主張與不同看法。」這好像說，那些被逼上梁山自由主義者走的左傾道路，必須是主張相同，看法相同，傾向蘇聯而左傾的道路也只有走向蘇聯。我個人的意見，認爲所謂左傾

外的反動派論客們的特點

楊先生爲了「殊難緘默」，所以來函「更正」，可是「更正」却沒有絲毫「更正」，反把「未被人家識破」的反動秘密全部白白出來，這雖然是楊光時先生的悲哀，但同時也是中國人民的幸運。（八月二十七日·永康）

不僅僅是走向蘇聯那一條路，而英國工黨政府所實行的溫和的社會主義也未嘗不包括在左傾的道路以內，因此全世界自由主義者可以主張模仿蘇聯的社會主義，當然也有些人主張採取英國溫和的社會主義方式，以不流血的手段達到改良政治的目的，所以我以爲「全世界的自由主義者在對蘇關係上應該有不同的主張和看法」，上面所陳述的意見，是否有謬誤，我極懇切的希望施先生答覆。即請撰安！

夏誠希謹啓
八月十六日
（答）我很感謝夏先生對我的指正，我也承認「全世界的自由主義者在對蘇關係上」可以「有不同的主張和看法」。但我還有幾點說明：第一，我那段

文字是引用楊光時先生等人的，其著重點在於指出它的矛盾和以此爲造成「全世界擾攘緊張的局面」的主因。第二，我認爲今天的自由主義者決不應也不會以「反蘇」或「反共」做自己的基本主張，因爲事實上「蘇聯」或「共產主義」並不是自由主義的致命威脅。全世界自由主義者，「在對蘇關係上」儘管有「許多不同主張

「今日美國」續稿即到

編輯先生：曾昭倫氏「今日美國」一稿，文字內容俱臻上乘，鄙人極愛閱讀，自貴刊十五期登出「死谷之遊」一段後，即未續載，不知何故？敬請便中示知，以免懸念。又此類國外遊記或其他國際通訊，貴刊如能儘多登載，實所歡迎。

金文杰拜上
八月十一日 西安

「訪蘇三月記」擬出單行本

編者先生：我是貴刊的忠實讀者

與不同看法」，但在基本看法和態度上是不會有多大不同的。第三，「窮困的」，「左傾的」自由主義者，不但不會「反蘇」，而且必然是同情蘇聯的。第四，我們說基本上「不反蘇」，並不是說對於蘇聯的任何政策和行動都不許批評或反對。鄙見如此，不知夏先生以爲如何？

施復亮 九·一〇
（答）「今日美國」好久沒有續載，我們非常抱歉。據作者曾昭倫先生來信，說續稿在兩個月以前就還未收到，真是奇怪。曾先生最近已由美國赴美考察，答應在短期內把續稿寫完，並且把已經遺失的也補起來，「今日美國」想必不久即可和讀者再見。編者。

代郵

（一）楊同一、熊峻、周正、張作元、顧百琦、王偉銘、賈廷、徐一平、譚見夫諸位先生：你們關於「藝文誌」的意見，當盡可能採納，「讀者之聲」欄因爲篇幅關係，來函未便一一刊出，請原諒。（二）楊娜、歐陽理、王文、劉廣益、丁力、一讀者、T S 諸位先生：你們對於「民主國際」的指斥，都很中肯，但因爲同一題旨的來函太多，故除選載林朋先生「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自由」外，其餘都不擬刊登了。

時文
刊週
發行人 程博
編輯者 洪
經理部 上海文週刊編輯部
上海枯嶺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本刊改訂訂閱辦法

- 一、本刊自二卷一期起改為定期訂閱。
- 二、訂閱期間，零售價格調整，訂戶不受影響。郵費加價，另函通知。
- 三、舊有訂戶自二卷一期起，按原優待辦法折算，起迄期數標明封籤，不另通知。
- 四、郵票（千元以上）代洋，十足通用。
- 五、本刊定價如左：

外國	國內				期數
	航空	航空	掛號	平寄	
平寄	四萬七千元	三萬八千元	四萬元	三萬元	十二個月
美金二元	九萬四千元	七萬六千元	八萬元	六萬元	廿四期
美金四元	十八萬八千元	十五萬二千元	十六萬元	十二萬元	四十八期

代郵：

襄陽陸健民先生：尊處所訂本刊，郵寄遭退回，請示知詳細地址。

致作者

編者

- 我們有幾件事要告訴各位寫稿的朋友：
- 一、來稿希望有一般性和現實性，如果學術性太重或者與時代隔離太遠，雖然有內容有份量，我們也不歡迎。
 - 二、本刊置重點於政治、經濟及社會一類問題（包括各地通訊），希望作者在這方面多多惠稿。
 - 三、小說，詩歌，劇本，繙譯以及序跋一類的文稿，暫時不收。
 - 四、來稿請不要過長，最好在四千字以內，以便一次刊完；長稿即使內容好，也很難登出。短稿却可以儘先發表，而且稿酬較豐。
 - 五、來稿務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以便計算字數，且免排字錯誤。
 - 六、一稿兩投，務請各位避免。
 - 七、來稿收到後，一經決定採用，不等待發表，立刻致送酬金；如果文稿發表後還沒有收到稿費的，希望趕快來函查詢。又各位收到稿費後，務請將稿費收據早日投郵寄下，以清手續，且便查對。
 - 八、不合用的稿件，我們很願意儘速退還，但是務請各位在稿末註明通訊處，並且事先聲明，附足退件郵票，方能照辦；否則事後查詢，恕不負責。

本刊合訂本第一冊已出版

本刊合訂本第一冊（一至十二期）已出版，附有詳細分類目錄，內容豐富，裝訂精美，每冊定價貳萬元。數量無多，欲購從速。又第二冊已裝訂中，不日出版，訂價四萬，預約八折，九月底截止。

對峙

魏德邁的來去和

中國問題的概結

論戰局

殖民地制度的總危機

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國

通訊 張東蓀論華盛頓與南京間的距離
今日雲南

2

第二卷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國饑餓，上海跳舞」

蕭邦的手蹟與巴黎版畫市場

尊重理論

評「天橋」

漫譚「電影劇本選」

音樂、番茄、葡萄糖

漫畫

胡適的「方向」

日本法西斯又復興了

聲之者類 本刊專論請署真姓名

馬敘倫

蕭遙

吳清友

王亞南

高名琪

石燕

平凡

關懷

容方

夏奈蒂

于欣

黛英·人之初·華山·老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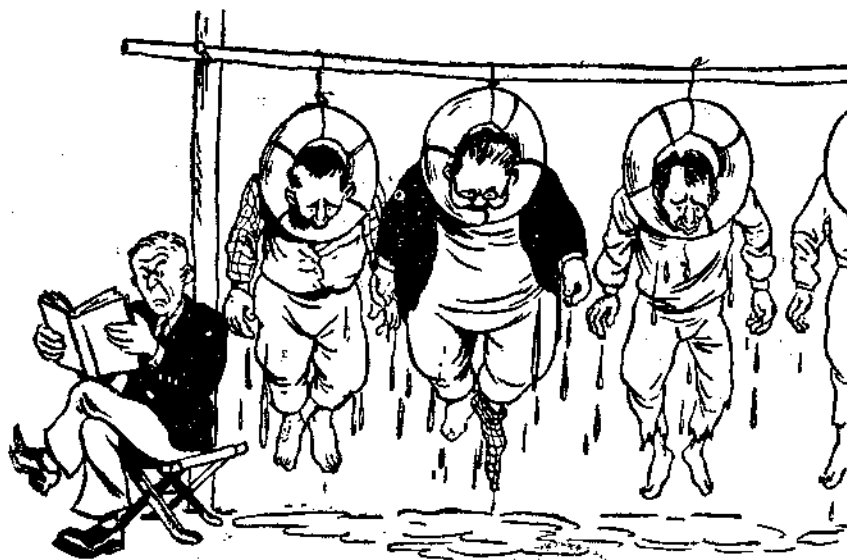




飛 盤 山 華



1



2

馬 歇 爾 援 歐

• 黛 英 •



「老朋友！闊別二年了」

人之初

魏德邁的來去和中國問題的癥結

馬敘倫

魏德邁離去中國已多日了，我才來寫這篇明日黃花的文字，曉得是不能引起讀者興趣的，但是我注重的是中國問題的癥結在那裏？需要從這裏說起。

劈空而來，和來做什麼？

從一個地位次於國民政府主席的立法院院長孫科發出了急迫慘厲的哀聲，坦明地向美國要求援助，經不起全面戰場上幾分鐘消耗的一億三千萬發彈藥跟着來了；雖則聲明只此一遭，總像一個孩子鬧得急了，媽媽給他一粒糖果，便是告訴他，你安心吧，媽媽總捨不得你的。

不久，飛將軍劈空而來，魏德邁使華消息突然公布，自然使得盼望救星的中國政府，驚喜欲狂，籌備歡迎，有馬歇爾的先例可以「查明辦理」，可是魏德邁却謝絕了，又使得中國政府惆悵起來。

魏德邁來做什麼？紐約先鋒論壇報七月二十三日社評：「魏德邁將軍在赴華前，或者已自官方與非官方得到報告，他的代表團當然不是在查核美國派在中國許多可靠的觀察家所獲得材料，而是去贊襄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改革，使美國能在遠東採取一個較滿意的政策。美國官員顯然有配合對華與歐政策的需要；有各種蹟象顯示國務卿馬歇爾寧願強烈支持國民政府，因為這種步驟，可與馬歇爾援歐計畫，尤其是對希土政策相配合。他所面臨的困難，是如何能使國府得到人民的支持他。」我們曉得紐約先鋒論壇報是公然為資本、財富、和權力服務而在政治方面和共和黨有關係，反映該黨比較進步的一派人的觀點的，他的看法該是根據他的消息的。再據合衆社檀香山十九日（七月）電：「魏德邁中將十八日夜途徑此間，發表談話稱：「余所率領之六人委員會，將從事研究馬歇爾之援助外國計畫，是否有擴展至中韓共黨控制區之可能。」又合衆社檀香山二十日（七月）電：「魏德邁中將二十日宣稱：「渠所率領之研究援華問題代表團，不受任何種類之約束所牽制。」魏德邁之情報顧問華生稱：「魏德邁將軍不能發表渠之希望或意圖，因全部之研究將為客觀性質。」」等魏德邁到了

南京，發表書面談話：「……惟余此次留華時間甚短，將儘量利用所有時間，完成對中美兩國均至關重要之工作。……余此刻僅能發表一概要，余奉美國總統之命，對中國與朝鮮兩國之全面情形，作一調查；換言之，即此兩國目前之現實情況，以及其最近將來對復興工作之能力。故余之主要任務，為尋求事實，因此，遂有專家若干人隨余同來，擔任有關經濟、財政、工程以及政治等方面之工作。……吾人必須承認：（一）用以達成吾人之任務之時間非常短促；（二）全體團員必須將其整個時間用於各種情報之蒐集與估計，各種工作，非但對中韓兩國非常重要，即對全世界亦至關重要；（三）余決使吾人之工作，切於現實，而合乎時要，因此，於進行此項工作時，不能作任何事先之判斷，在極密謹慎之下，則工作可能獲得良好之結果。而此種計畫所依據者，不僅為吾人所希望之真實，且經客觀徹底之調查後，吾人知其必為真實。……目前（甚至最近之將來）余……所可說明者，即余將盡力完成杜魯門總統所授予以之任務，蒐集一切有關政治、經濟、軍事有利或不利之事實，探討其間相互關係，再由此種關係而予以評價。」我們對魏德邁這種聲明，並無懷疑的必要；因為他在字裏行間已表示得很明白，他是為美國對華政策執行的過程上有此一番研究的需要而來工作的。不過我覺得最近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財政的情形，可能使美國會像俗話說的「白費心思一場空」，那就不能不使華盛頓方面焦急了，究竟這個貓腳爪中用不中用？（八月廿四日大公報無錫通訊：「吳稚暉談話：「蘇維埃制度之最不歡迎者，無疑是美國人，現在是共產黨想在中國試行蘇維埃制度，（現在？寫者）厲行種種破壞而引起的戰爭，美國人無論在何種觀點上說，都難袖手旁觀，不能不動腦筋，採取行動，至少也要好好利用中國這個貓腳爪，使其具有自火中取栗的能力。」）那就有全面調查一下的必要。但是，我以為單是爲了調查，何必定要這位將軍出馬，這次他所得的材料，除了中國人民的一部份以外，不必他勞駕也一樣可以得到的，獨有對美國所用的貓腳爪（其實這個貓腳爪只是美

國所謂合法的政府。有不滿意的地方，要加申斥和警告，卻又不是堂堂的命或客氣點的照會可行的；那末，魏德邁有一個很好的資格，就是「老友」，用特使的名義，「老友」的資格，便可不容氣地申斥和警告了，我們除了在正式文告上看見的以外，還曉得八月廿二日魏德邁被邀在國府委員會茶會上發表的談話，要比文告上還嚴厲得多，這是僅僅一位盟國特使不能這樣脫略國際儀節的。

自然決不至於僅僅申斥一番，像紐約先鋒論壇報說的「而是去贊襄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改革」當然是他重要的任務；可能還有不能馬上宣布的，像莫斯科廣播海軍機關報「紅艦隊」載稱：「美國準備武裝並訓練二十師中國軍隊，以二十億美元貸予蔣主席，企圖對華政策獲得一無限制之控制；」美國將在中國境內獲得八個戰爭基地。「我們從魏德邁本身是美國一員著名的將軍，而他帶來的工程顧問是一員海軍中將，和他調查所到，有在內戰軍事區域的青島非軍事區域的台灣，正是一向傳說美國所要的戰爭基地，就不能不叫我們相信「紅艦隊」的消息，是「事出有因」；何況早先在美國的報導也有類似的消息了。

要民主人士晤談

這次魏德邁特殊的作風，是和民主人士見面，而且出於他自動的；據我們曉得，他所要見的都是民主運動前綫的人士，這不管他是不是由於華盛頓「面授機宜」，或是他認為政治調查範圍內「題中應有的文章」，但從行政院長張羣的談話，和上海市參議會議長潘公展等十六七個團體負責人聯名致美國政府當局的電文，顯示出官方和官方的附屬統御機構卻都沒有和他「會議」或「面陳意見」的機會；那末，他這個行動應該是有特別意義的。我們曉得，他在北平，和他晤談的民主人士，向他直率地說明中國人民的意見，要美國離開中國內戰的關係，和中國要的是和平、民主、自由、厭惡的是內戰、獨裁、特務、無能和貪污；正像上海民主人士和他晤談說明的一樣，而上海民主人士更指明了美國在抗戰勝利後的援華政策，是變相的干涉中國內政和幫助了內戰的一面，他雖然小心地辯正，美國的援助世界，沒有干涉任何國家內政的意思和任何領土野心，但他終於承認，由美國政府的命令，和由他個人指揮執行，為解除日軍的武裝和遣送日軍返國的軍隊的調動，確會間接幫助了國共兩黨的爭鬥，為顯然的事

實。

有人這樣地看法，這是魏德邁給予民主人士的威脅，因為他會向某一部分民主人士要求他們表示對於中共如果掌握政權，仍是一黨專政，中國便要成了蘇聯的外圍的意見；但是，據我們所曉得，民主人士的答復，一致以為中國人民不願做任何國家的外圍，中國人民需要的是和平、民主、自由、統一的聯合政府；那末，民主人士倒給他一個抗議性的答復，而每個民主人士卻都給他一個中國人民不歡迎美國片面援華的印象。

也有人這樣地看法，這是美國需要中國成立一個為美國可以向世界交代得過的民主政府；所以想替國民黨來「拉皮條」，這是他的試探；民主人士被他利用了。我們對於試探這點，是看得很正確的，因為馬歇爾來華的工作，對於這點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國民黨死不要中共來合作；魏德邁的來華等於漢德森去希臘，漢德森也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資格到希臘，已「贊襄」保王黨拉攏自由黨成立了新政府，完成他的任務；不過中國可不比希臘那樣容易服從美國的指揮，一則國民黨往往是「前倨而後恭」的，有時他還先恭而後倨；（黨或個人切身利益關係）另一方面，除青年、民社兩黨早已做了姨太太外，別的民主人士和政府站在不同的陣綫，政府無法拉攏的，所以魏德邁來做一番工作，還是要替馬歇爾「彌補缺憾」；但是，保不定有本來立脚不穩的貌似民主人士去上鉤子，願意做第三房四房的姨太太；至於在這一和魏德邁晤談的民主人士，並不是拿見一見美國特使來「以為宗族交游光寵」，正是當面向他提出抗議；那末，魏德邁雖然進行他的試探，但不能說民主人士就被利用了。

「滿載而歸」和離華的聲明

魏德邁這次調查所得的文件，銷毀了一噸，帶走了五百磅，可以說得「滿載而歸」。文件的內容，我們無從曉得，也不必曉得；但合衆社南京十九日（八月）電：「魏德邁將報告杜魯門總統稱：因目前中國情形，比中國對日戰爭結束時尤劣……渠所發現之事實，有下述數項：（一）中國為內戰所分裂，中共佔百分之八十之東北富饒地區，以及華北廣大重要地區。（二）通貨膨脹日趨惡劣。（三）對外貿易由於政府一再實施新管條例，仍在不良狀況下。（四）人民開始感覺局勢無望，進步尚不及日本。（五）黃河新舊道間之水災，使數百萬人無家可歸，本年冬天有遭逢飢饉

之費。(六)交通運輸在可怕情況下使政府對遼遠之邊疆，難於保持接觸與控制；並使主要物資移運困難。(七)政府預算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作軍費用；此使甚多重要復興計畫及若干非軍事性質之計畫不得不延緩。(八)有大規模之逃避納稅之事項存在。(九)美國在華商人感覺中國對於渠等之限制太多；雖則政府正式宣布歡迎外資，此間大部分美國商人勸告採取小心之觀望等待態度；美國商人宣稱中國要人有多達五億美元之鉅款，貯在美國銀行，由於通貨膨脹威脅，不願提歸國內投資於復興計畫之用。(十)實際上自蔣主席以下之每一中國人，承認在國民政府內需要多方改革；但迄今為止，並無多大成就可言；甚至若干接近蔣主席之人，亦不能滿足。蔣主席宣稱：內戰阻止此急欲求得之進步，但堅稱若干目標業已達成。(十一)前屬於日本之台灣，聞在戰後歸中國後，其行政效率不高。(十二)中國有廣大未受教育之羣衆，缺乏領導才能及代表資格。我們便可略略見得他的內容的重要部分。再從他的離華聲明上看來，這就是聲明的藍本。聲明是他工作報告的「事由」，我且把他評注一下；

(上略)「我們在華的最後一週；大致是集中於分析所蒐集的大量資料，而且把政治、經濟以及其他各項資料配合起來，以便獲得真確的判斷和結論。許多人的觀點雖然是殊異的；但是在某一點上，中國所有的心是聯合一致的。在戰爭毀壞的中國，存在着對於和平的熱烈願望，一個及早實現而且永恆的和平；我希望爭取和平的方式也可以這麼容易的辨認出來。」

我們常常和美國朝野的朋友們說：美國不該不從爭取中國全國人民的「心」上確立對華政策的基礎，中國人民除極少數被國民黨麻醉了的國民黨員(也是少數)以外，一致「熱烈願望一個及早實現而且永恆的和平」；所以中國人民反對內戰、獨裁而要團結、統一、獨立、民主、自由。聲明承認「中國所有的心是聯合一致的，在戰爭毀壞的中國，存在着對於和平的熱烈願望，一個及早實現而且永恆的和平。」那末，我們等着看魏德邁回國正式報告後，美國對華的態度，善意和惡意就可考驗出來了。至於我們「爭取和平的方式」，過去的政治協商會議已是一種，現在情勢雖然不同，根本的原則依然存在，只要美國放棄了片面援華政策，任何方式都可以隨時寬取的，但是，魏德邁不該辨認不出來，只是他還不完全承認美國對於中國內戰是有極大的責任的。

「在日本投降之後，中國名正言順的希望享受他們艱苦博來的勝利之果，在努力驅逐殘暴的侵略者出境時，他們曾經忍受了困苦和危難，還有說不出來的窮乏。今日在中國，我在許多地方發現了冷漠和昏迷，不去尋求辦法來解決現有的問題，反而用了相當的時間和精力來譴責外來的影響，或尋求外來的援助。令人失望的，是見到許多中國人的沮喪的失敗主義

，他們本是很能幹而且愛國的，相反的他們應該抱有希望和決心纔對。」如果在過去中美一百年友好的歷史上說，我們可以承認他這些話是道義的責備；可是抗戰勝利以來，美國杜魯門總統的援華政策，建築在利用中國一黨專政的政府為發展美國的雙重利益的：(一)美國是反蘇的基地，(二)是美貨傾銷的市場。這樣，魏德邁雖然指出日本是侵略者，給了我們過去的「困苦和危難，還有說不出來的窮乏」；但是，勝利後美國給中國的是什麼？美國的援華政策，含有侵略的意味？只看美國若干輿論和有正義感的人士的表示，便不需要中國人民的說明了。

誠然，有許多中國人民在「冷漠」和「昏迷」的狀態裏，但「昏迷」的只屬於被國民黨麻醉了的國民黨黨員，(也是少數)和一聲依附官僚資本的蛆虫，他們當然是「尋求外來的援助」的。「冷漠」的雖然像屬於大多數的人民；但是他們決不是「冷漠」，他們熱烈的內心在消極極端地表現着，從各地的不安靖和瓜棚豆欄茶餘飯後的軼歌兒唱裏可以盡量的取得證明；他們在勝利後得到的教訓，已經普遍的覺悟了美國援華的真相，他們的確在「譴責外來的影響」。至於民主人士，是大眾人民的領導者，他們決不會有「昏迷」的，他們「冷漠」不「冷漠」？魏德邁見過若干民主人士，該很清楚的；就是魏德邁從某種觀點上看來，是「冷漠」的，也該明白這是真的「冷漠」？民主人士自然要「譴責外來的影響」，却決不「尋求外來的援助」；因為他們是主張國家該獨立的。說到「沮喪的失敗主義」，怕是「尋求外來的援助」的人們才是這樣的，魏德邁所見的人們裏的，我們從邏輯上看，是對中國人民說的。

「雖經長期戰爭和革命的削弱和分裂，中國仍有他本身復員善後所需要的大部物質資源；元氣的恢復，有待於令人奮興的領袖和道義與精神的蘇醒，這只能在中國內部產生的。」

當然，一個國家決不能依賴外來的力量生存的。今日中國人民正在團結自己的力量，實現和平、統一、獨立、民主、自由的國家。這種精神已從對日抗戰以來滲透到人民的各階層。所以並不需要再等「令人奮興的領袖」。

有人這樣地解釋，聲明的這一段，有「弦外之音」，他意思在叫國共以外的第三方面，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有人又以爲魏德邁看中了現在中國政府的領袖，已失了人民的信仰，他希望另有一個領袖(不包括共產黨)來領導中國的復興，我們對於這點，實在沒有加以研究的必要，中國的事情中國人能够自了也不勞他的顧慮；因為事實上中國人民已覺得了自己該走的路綫。人民大眾都是領袖，也不需要另一個領袖。

「當我完全明白這個國度中某些個人和團體的利益與問題時，我是深

切的關懷中國全體人民的福利。我確信如果中共是真正的愛國，而且對於國家前途感覺興趣的話，他們會自動的放棄以武力來執行主義的努力。假如他們是誠懇的想幫助中國的話，他們可以用和平的方式來代替造成過去的悲劇的若干目的暴力和破壞。

我們到要謝謝他「深切關懷中國全體人民的福利」；但是「中國全體人民的福利」是和平、團結、統一、獨立、民主、自由、而目前妨害「中國全體人民的福利」的是內戰，內戰是由美國幫助了一面而繼續，擴大的，那末，魏德邁以特使的地位發表這個聲明，他這樣地說，就該請他「自省」；「解鈴還是繫鈴人」，如果他是真正「深切關懷中國全體人民的福利」，我們等着他回國後是否建議美國退出中國？看吧！

我們從他的下文看來，怕他「深切關懷中國全體人民的福利」的，是在中共發展得很快，（誰使他發展得這樣快的？）如果中共掌握了政權，中國便要「赤化」；所以他跟到說：「我確信如果中共是真正的愛國，而且對於國家前途感覺興趣的話，他們會自動的放棄以武力來執行主義的努力，假如他們是誠懇的想幫助中國的話，他們可以用和平的方式來代替造成過去的悲劇的若干目的暴力和破壞」。他肯定的把「造成過去的悲劇的若干目的暴動和破壞」的責任安放在中共身上，用反面的語調譴責中共不愛國來挑撥中國人民的情感，在一個像魏德邁這樣的美國人的觀感上原不足怪，但在一個特使的地位，發表這樣的聲明，大概他忘記了馬歇爾初到中國，經手「整編」，中共願意共一國五對比的故事，而自己證明了美國偏袒中國內戰的一方；他聲明裏「力求客觀和公正」的話，真是「欺人之談」。

我們並不要替中共作辯護人，而且他也不需要我們替他作辯護人；我們正為深摯的愛國，我們要從理論和現實上闡明中國問題的癥結在那裏？且待後文再說。

「同樣的重要，中央政府可以獲得與保持中國人民的一致和熱烈的支持，只要撤換目前在政府居負責地位而不能勝任和貪污的官吏，不僅在中央機關，而也在各省市機構。」

魏德邁這次的聲明，和上年馬歇爾的離華聲明，文章的機杼是一樣的，就是對國共雙方都加譴責而分了輕重，這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的。他對國民黨政府只指出官吏的「無能」和「貪污」，雖然他在下文說到「中央政府必須立有實行激烈而無所不及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但把中國國家根本所需要的，和中國人民所要求的，隱忽不說，在他固然可以推諉到「立言有體」，而我們卻不能不說他「顯有偏袒」。假使政府改組一番，無能和貪污的官吏換去若干，政治和經濟上改革一陣，而根本還是一黨專政的政府，並且是不民主的政治，這樣，魏德邁以為就可以「獲得與保持

中國人民的一致和熱烈的支持」？「打開窗子說亮話」，官吏的無能和貪污，基本的因素，就是獨裁不民主，這是在中國歷史上有舉不勝舉的例子，（獨裁者不一定是君主，權臣蒙蔽了君主，專斷一切，也是獨裁。）國民黨的獨裁政治，又由於一黨專政造成的；所以正本清源不從這裏下手，官吏的「無能」和「貪污」是必然的，在「無能」和「貪污」的官吏布滿了中央和地方的機構裏，就有最好的政治、經濟政策，辦起來滿不是這回事，這是顯明的事實告訴了我們的，魏德邁調查的資料中不會得缺少這一宗。

「爲了重新獲得和保持人民的信心，中央政府必須立即實行激烈而無所不及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僅僅諾含是不够的，實行是絕對的需要。應該承認僅靠武力是不能消滅共產黨的」。以上都依八月廿五日上海大公報原文，下略。

這簡單的幾句說話，很深刻地說明了國民黨專政的政治已失卻了人民的信心，可反證了中共是從政治上得了人心。他又承認了諾言是不兌現的支票，和「武力是不能消滅共產黨的」；那末，美國已如實了知中國的情形，他如果，真正「深切關懷中國全體人民的福利」，無論在中美歷史的友誼上，真正的世界的和平上，美國的利益上，對於片面援華政策該有深長的考慮吧，我們也要考驗考驗他。

聲明的一般觀察和我的批評

聲明的一般觀察，我且舉一個代表的例子；合衆社華盛頓二十五日電：「消息靈通某方面二十五日稱：魏德邁將軍臨別文告之發表，無疑地係希望能迫使中國政府實施若干改革，使美國增加對中央政府之援助有所依據，至於文告口氣之嚴峻，絕非表示魏氏在九月中旬返華府後將建議反援助中央政府。該方面稱：魏氏文告發表之時間，表示該文告之影響，可迫令中國政府在杜魯門及馬歇爾根據魏氏之報告，準備提出建議前，能有若干革新，否則此文告應於魏氏返國後再行發表。該方面又指出，文告包涵兩大要點，一針對中共，一針對國民政府。魏氏稱如中共「確係愛國」，則宜停止戰爭，以和平方式協助國家。此間一致意見，以爲中共倘不如此，則彼等將不能擺脫魏氏所加諸彼等之責任。」這的確是政治方面的消息，重要的就在後面幾句話；我們從聲明和魏德邁在中國和民主人士的周旋，可以看出美國意圖再拉攏國共一次，爲挽救國民黨政府的失敗，但是國民黨既然死不願和中共合作，中共又是領教過的，怕正像要他先放下武器的不可能一樣。美國在另一方面，爲迫使國民黨政府改組一個使美國可以向世界交代得過的民主政府，意圖誘使中國民主同盟參加；這怕有了青年，民社兩黨的先例，民盟也不會上這圈套，國民黨也未肯充許民盟參加；那末，美國可能爲他自己而懼怕中共的發展到不可控制，不顧一切而以技巧

的手段積極援助國民黨政府。紐約八月二十六日廣播，先鋒論壇報二十六日社評：「倘使中國政府失敗了，他的最可能的結果，必將令人沮喪，其中之一就是中共將執掌政權。他們因為缺乏行政人才，或許要向莫斯科求助；這樣一來，遠東的局勢，就將要比較希臘的具有更大的威脅性。或則黃河以南將要為若干軍閥所割據，而各個為共黨所吞併。倘使中國政府仍要走上自殺的途徑，那麼美國必需作應付非常之準備。」這也不能不說是美國應有的一種心理，尤其在它的政府方面。

我對於魏德邁的來華，根本認為是辱國事件，因為斷無一個獨立國家，可以讓盟國這樣堂堂皇皇地派人把軍事、政治、財政、經濟自由調查，而特使的氣派儼然和前清「欽差」一樣；臨去把中國從政府到人民用嚴峻的口氣批評一番，（不客氣，就是訓話。）雖然他替我們證明了我們政府已不為人民所信仰，和指出了「中國所有的心是聯合一致的在對於和平的熱烈願望」，但我們在國體上說，並不感謝他的。至於有人對他的來而表示歡迎或感謝的，那是魏德邁所譏嘲的「昏迷者」。至於他調查回國以後，美國的對華政策有沒有改變，我就不去考慮這一點，因為不存這個幻想，也不該存這個幻想。

中國問題的癥結在那裏？

我們的國家民族的確到了嚴重的考驗時期，若不從根本上檢討一番，泛泛地說些蘇美問題，國共問題，或其他，都是叫一般人聽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個才叫做沒有「國是」。

我以為現在任何方面，都拿為着國家民族或人民的利益做幌子，究竟什麼叫做國家？什麼是國家民族或人民的利益？一般的人最多只有一個空泛的概念，所以聽到甲方說為着國家民族的利益，不能不相信他，聽到乙方說為着國家民族的利益，也不能不相信他。這樣，或者甲方出賣了國家民族利益，或者乙方出賣了國家民族利益，總不能給他們判別一個肯定的是非；這是我認為非常危險的事體。

我們該明白的，國家和民族，不是同時的產物；沒有國家，先有民族，民族的生存，不是完全需要國家的；國家是某一時期民族生存所依賴的一種方式，而它的本身既不和民族俱來，也不必和民族同了；證於我們中國的歷史，國家的形成至早在夏商時代，而民族卻早用別的方式生存着；證於現在國內邊界上的落後民族，他們名義上戴着中華民國的帽子，實際上他們和中華民國早脫了節，因為國家對他們有剝削的權利，並沒有對他們的生存盡過什麼義務；甚至西南有些民族還被外國利用，剝削，中華民國何會對他們有什麼保護，然而他們還是生存着，我會經從中國文字上，證明國家是私有財產制度產生後的產物，國家在世界史上誠然佔有特別長久的時期，到目前還未脫離這個時期，就因為私有財產制度的還未廢

止。但二十世紀已跨上了社會主義臺階的第一步，往後民族的生存，是否尚需完全依賴着這種方式？我以為國家是社會進化需要的一個過程；科學發達後的社會，有超前的進步，生存所依賴的，自然也有更進步的方式，國家在以後人類的觀念上將逐漸地被輕視而至於廢除這個名詞，這已不是理想，也不是任何力量可能挽救他的。

中國人民還是有不少讀線裝書的，禮記禮運裏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一章還被國民黨的創造者孫中山先生取做他的理想世界的範型；的確，他是闡揚了古代社會主義的精神，描寫了古代社會主義的效果；孫先生晚年的思想是歸宿在社會主義的，所以他常寫「天下為公」，表示他的「祈禱」，和下文「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一章同看「看」，就曉得「天下為公」的時候，是沒有「城郊溝池以為固」（大道既隱章文）的事情的；那末，「大道之行，」就不該有國家了。禮運這兩章裏的說話，都是相傳孔子說的，那末，孔子是贊成「天下為公」的。孫先生是常常稱揚孔子的，國民黨是遵奉孫先生遺教的，但他卻已忘記或拋棄了孫先生的遺教。

我還要說一說，中國人民的意識上，早經造成了世界觀的，這是儒家的大同派和莊、墨兩家乃至中國的佛學，宋明初期的理學，都是鑄成這個意識的洪爐；五十年前「西洋人」說中國人沒有愛國心，其實是一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國人自己說中國人酷好和平，也是一知其一不知其二，實際沒有愛國心的現象和酷好和平的習性，都和這點有深切的關係；但是他們對於拿不平等來待遇我們和擾亂我們的和平的反抗，卻也會到極度，這原是不抵觸的；這種都可以向歷史上取得證明。

可是，我並不主張我們中國現在就不要了國家這個方式，在長期的「清談誤國」，是因為半開化的民族用強力來侵略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文化高的民族「知經而不知權」「高談玄理」，削弱了抵抗的力量，以致不能抵抗，被迫南移。目前我們中國，還未脫離半殖民地的命運，武力和經濟侵略的危機，不但嚴重而且日漸加深；我們雖然要向社會主義邁進，而尚未到達社會主義的階上，當然還是需要國家來做保障；但我們要明白，國家是全體人民的國家，決不能被不顧全體人民利益而為着他一個剝削人民大眾自私自利的極少數的集團所利用；所以我們需要國家，是真正為着民族的利益，不是拿他做幌子來保護極少數的剝削人民大眾的集團的利益，這應該極端注意！否則便是我們自己出賣了利益，而供極少數的剝削人民大眾的集團的享受，我們自己還不明白而甘心為他所利用。

什麼是民族或人民的利益？就是怎樣維持他的生存，怎樣發展他們的生存的權利；我們中國民族目前在半殖民地的環境下爭扎，我們人民在半封建的社會裏受剝削和壓迫的生活；那末，如果真正為着民族或人民的利益，首先對外要使民族脫離半殖民地的縛束，對內要使人民從半封建的

社會裏解放出來，得着自由、平等、安穩生活的權利，不至於再受剝削、壓迫、匱乏、失業等等的包圍。如果只是口頭筆下的民族或人民的利益，這是拿民族或人民的利益做幌子，是賣野人頭的勾當，爲的是他個人或是他們自私自利的集團的利益。

在一個有悠久歷史的私有財產制度的國家里，顯然地有貧富兩個階級，至多分個大富小富大貧小貧；大富小富必屬少數；中國的貧富不均，是半封建社會的收果，那末，爲着人民的利益，無疑地必需改造社會，先達到均富的階段，二千年前的孔子，已經說過「不患富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國民黨的創造者孫先生看到中國的情形是「不均」「不安」，所以他主張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中國現在的情形，並未改善，而加深了「不均」和「不安」。(不能把這個「責任單置於好戰之中國共產黨門前」見八月二十六日華盛頓星報社評)如果真正爲着人民的利益，無疑地先要使「貧而又「不安」的大多數人民生活改善。

這樣說來，中國問題的癥結，很簡單的只是需要改造社會和改造政治；這兩件卻又分不開的，假使政治民主化，經濟也民主化，便解決了這個問題的初步。

從現實來說，的確是國共問題阻礙了中國的改造，但是他的本身就是改造的過程。

我們爲着誠摯的愛國家愛民族或人民，我要請問國民黨現在還時時說着革命，但我是參加過國民革命的，我瞭解的革命的意義，是把善良政治去替代惡劣政治，而把人民從惡劣政治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國民黨從國民革命成功以後專政二十年，他不會行過根據三民主義的政治，反而走上「自私自利」的路，鬧成和官僚、買辦、地主、資本家(自然不獨備美國的資本家)沉瀝一氣，造成一個混合集團；那末，現在還說着革命革命，這革命的意義「可得而聞歟？」

我過去在國民黨，瞭解的國民黨革命政治是全民性的，所以反對階級鬥爭；但是中國全體人民，農工佔了百分之八九十，尤其是農民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全民政治是否該在極大多數大衆的農民身上着手，使他們的生活得大進步，或者比較在軍閥的惡劣政治的壓迫下得到改善；我想叫世界公正人士從實際的批評一下，結論大概是個否字；那末，國民黨二十年專政的成績，只是代表了官僚、買辦、地主、資本家的利益；大多數的農民乃至手工業者一般的知識分子是不會佔到三民主義的光的。那末，現在國民黨說的革命，是什麼意義？合該再使全國人民瞭解得更清楚一下。

據我淺狹的瞭解，現在國民黨說的革命，不是孫先生提倡的革命，也不是國民革命時代被人民認識的革命，也不是反對階級鬥爭的意義，只是編造、嫉妬和自私自利的排除異己，所以演成現在的內戰。我大膽地這樣說着，因爲現在中外的人士都瞭解到現在中共行的不是

共產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主要的內容，可以說就是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內容。我們只從階級上向中共統治區鳥瞰一下，他有什么了不起機器工業？那還說得上無產階級的鬥爭？事實上他是極端的在大多數的農民生活上着手眼，而且從外國尤其是美國人方面看到的，他的政治的成績，實際就是改進了農民的生活，解決了國民黨所要解決的平均地權問題。所以「魏德邁二十二日(八月)會告各府委及部長：「中國共產黨問題不純在軍事方面，亦是改進人民生活問題之一。」「(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大公報合衆社南京電)所以他在離華聲明里說：「爲了重新獲得和保持人民的信心，中央政府必須立即實行激烈而無所不及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僅僅諸言是不夠的，實行是絕對的需要。應該承認僅靠武力是不能消滅共產主義的」。那末現在的內戰從大多數農民乃至全體人民和國家的立場上看，更有什麼爲我們不能瞭解的意義？有的，只是代表「自私自利」的極少數人的集團，和官僚、買辦、地主、資本家混合的集團的利益鬥爭；而這種集團合起來佔不到全體人民百分之幾，可是正在大量地犧牲農民在戰場上爲他們爭利益。

如果說，英美等國都在那里反共，我們中國也該反共；或者說，中共現在雖然行的是新民主主義，將來他是要走上共產主義的路去的，所以我們要「先知先覺」更要反共。那末，我們先要問英美等國爲什麼要反共？如果明白英美等國和我們中國有絕對不同的基因，那末，他自然要反共，我們够不上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是否該跟在他們後跑。至於將來的問題，我們且不提孫中山先生所企求的目的是什麼，他的遺教講些什麼，只最近魏德邁會和中國民主人士談到這點，他們的答覆，將來的事在三十五年以後你們美國怎樣，你能曉得？魏德邁不能說一句肯定的答覆。像我們中國這樣的國家，先要使得大多數的人民有飯吃，有衣着，有屋住，有路走，辦得到這樣，任他英美等國發生經濟的革命，中國是沒問題的，否則中國將由半殖民地而做了人家的殖民地，(當然中華民國四個字可以保存的)，而日日講反共，口口是革命，假使政治不能徹底改善，還是要毀滅了自己。我們清楚了這樣的理論和現實，我們應該明白在我們人民的立場，該有正確的主張，自己起來解決國家民族的問題。我們對內應該不讓同胞再遭無意義的犧牲，對外也該鮮明地表示我們要自己造成一個新時代的獨立，自由、民主的國家，拒絕不經過我們全體人民允許的任何方面任何援助。末了，我還忠告國民黨。國民黨也曉得已到了「最後關頭成敗之所繫」，但「武力是不能消滅共產主義的」，也不能消滅現在的中共，乃至阻止他的發展了。今日「富豪者之子，軍官之子，政府大員之子」都不上戰場，而貧民被拉強徵驅上死路，從人道說是不仁，從理勢上說是不智，如此失了立場的鬥爭，必走向失敗，拿「一氣用事」，也沒有前途的。

三六、九、一〇、在上海

論戰局

蕭遙

一、北線與南線

從七月初起，戰場上的形勢，已經發生了與前不同的質的變化。兩個半月的發展，已經必需（同時也有可能）讓我們給它作一總結了。

如果說：今年四、五、六三個月的戰事重心，乃是在山西到東北的「北線」。那麼，從七月份起，戰事重心移到從山東到陝北的「南線」來了。一般說來，三個月的暴風雨過去以後，北線是處於比較寧靜的「戰役休息」之中，無論是東北，是河北，是山西，雙方的接觸是很少的。僅僅在平津保地區，國軍會兩度出發「清剿」，但在孫連仲長官所說的「顯示威容」以後，國軍仍然回防了。所以北線是沉寂的，是比較平靜的。但是，這時候在南線，戰事則是像海濤的奔流翻滾，像颶風捲起了飛砂一般地劇烈進行着；僅僅因為新聞封鎖的緣故，使人們難以捉摸真象罷了。

本來，南線就一直是內戰的重心所在。這從國軍的兵力配置可以得到極好說明：從去年七月內戰爆發時起，國軍即在蘇皖地區配置了卅一個旅，中原地區廿五個旅，山東卅七個旅，晉冀魯豫廿八個旅，陝北十三個旅，總計一百卅個旅，約佔當時國軍對共軍作戰總兵力一百九十三個旅的三分之二。在戰鬥折損以後，國軍統帥部，依然於今年一月到四月時，在南線增兵配備為一百五十個旅，約佔全國用於作戰的總兵力百分之七十。曾經在某一時期，國軍以八十多個旅配置於山東前線，以卅多個旅配置於陝北前線，這兩個戰場，成了國軍在全國範圍內兵力最集中的兩大戰場。

國軍統帥部所以要這麼做法，是有其理由的。因為戰事日久以後，經驗證明非集中兵力不能致勝共軍。自從四月份起，共軍在山西到東北連續展開攻勢以後，國軍更期待能迅速平定南線，使集中於南線的大軍，能夠抽出來機動使用。否則，要對付北線是不可想像的。有張國軍的機關報說得好：「山東與陝北是決定生死的所在，共產黨據有了這兩個黃河南岸的橋頭堡，它就可以牽制我們的兵力，隨時擊截我們的後路；我們若是能肅清了它，我們就可以渡過黃河，以我們的雷霆萬鈞之力，壓倒其他地帶頑抗的共匪。」

於是，在北線共軍攻勢告一段落之時，在東北等地新攻勢又將重新爆發之前，南線遂成了戰事的焦點：如果國軍在南線致勝，它就可以大軍渡過黃河，集中應付北線。如果共軍在南線致勝，它就可以使北線已有成就鞏固，南北呼應，從事新的行動，轉入新的形勢。

二、國軍的重點

國軍在山東戰場上集攏了四十萬以至八十萬大兵，在陝北戰場上保持了廿萬大兵；最高統帥也特地飛到這兩個地區親視機宜。國軍的具體計劃是怎樣的呢？九月六日的「觀察」專稿，在這一點上透露了國軍的真正希望：「能將共軍包圍殲滅，當然是國軍最期望的。如果這一步做不到，就希望將其主力完全擊潰。再做不到，就希望他主力離開山東（或陝北）」

這兩個半月的發展，顯示國軍的這個「希望」，是與現實有着相當距離的。上面所引的這篇同情國軍的「觀察」專稿就認為：「國軍在山東的作戰（陝北也是一樣——遙註），究竟到了一種如何的程度，是難以知道的，但顯然最理想的戰果還不會收到。共軍每撤退一個地方，是輻射分散，難以得到聚攏的機會。其次，主力完全擊潰了沒有呢？看中央社的報導，這一點似乎做到了。然而，事實上他還有主力在這裏與國軍週旋。最後，是共軍主力離開了嗎？但野戰軍並沒有聽說開到什麼地方去。」此外，九月一日出版的與陸軍有關的「新聞天地」雜誌，也採取同樣的看法，它認為：「共匪既沒有潰敗，我們不能認為已經取勝。」

這樣的看法，在若干點上並不完全與事實吻合；但是，在大體上是指出了國軍的「希望」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的。應當公平地說一句：國軍集中了「大重點」從事進攻，由於種種限制，以及戰略形勢的變化，所以依然未能脫出過去的窠臼。——這就是說，在地域上，特別是佔領城市上，「大重點」的確取得了若干不算太小的成就，可是在殲滅對方有生力量上，則成就依然跟過去一樣。

在山東方面：國軍採取「大重點」攻勢以後，先是在沂蒙山區活動，

爲了避免被擊損失，所以採取「緊緊靠攏，齊頭並進」的戰法，以董顯光部長所說的「大鐵桶」戰術，在廣袤的沂蒙大山裏滾滾去，佔領了東里店、南麻等共軍中心地帶。這個攻勢繼續了近一個月，突然發生了共軍地方兵團圍攻臨朐的戰鬥。國軍爲了解救臨朐友軍之圍，「大重點」遂從沂蒙山區北移膠濟路，利用雄厚的兵力，進駐了膠濟沿線。同時，它又分兵北上，逼近黃河；在佔領羊角溝以後，爲了避免「大重點」過於分散，重新退到膠濟沿線集積。從九月份起，它的攻勢東移，向膠東地區前進。膠濟路南佔領了日照諸城等地，膠濟路北佔領了平度掖縣等地。國軍是不是還要前進呢？我們不敢肯定回答，但是必須指出的，就是在上述國軍的「大重點」進軍中，並沒有遇到太大的戰鬥，更沒有發生殲滅性的戰鬥，頂多不過截擊戰牽制戰而已；但從九月開始，這種形勢似已接近尾聲：諸城已兩進兩出，平度也互易其手。是不是國軍的「大重點」，已經因佔地過多而稀薄起來了呢？是不是共軍的抵抗轉趨增強了呢？讓以後的事實來回答吧！

在陝北方面：國軍的進展，也有着相仿的情形。自從六月以前共軍在三邊及隴東對三馬作戰以後，中央軍在陝北已經不再依賴雜牌軍的配合，而是靠自己獨立支撐了。從七月中旬起，胡宗南將軍的部隊又向北實行它「齊頭並進，鑿隙而過」的特種戰術了。它先後佔領了綏德、米脂、葭縣等城，一度傳說並已佔領三邊，據董顯光部長發表：「陝北全境各城均已收復。」在這一進軍中，似乎也未聽到對共軍殲滅戰的消息，胡將軍所發佈的最驚人消息，乃是「共匪主力已渡河入晉」，但後來證明「王震部重又南竄」（十二日大公報），所以國軍在陝北的成就，大概仍然是在城市方面。

二、共軍的活動

共軍的活動，又是怎樣呢？

從右翼到左翼的軍事評論界中，在國軍發動南線的「大重點」攻勢之時，曾經流行過一種意見：認爲山東既然是「關鍵」，是「決定生死」之所在，共軍也就應當集中主力與國軍在此週旋，「否則就麻煩了」。它們對陝北的估價雖然不如山東，但是也認爲必須同樣做法，或者至少相似地做法，才能挽救共軍的「危局」。這些意見，強調山東陝北是黃河右岸共軍僅存的兩大橋頭堡，強調魏德邁來華時「肅清黃河南岸」戰略的重要性，因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但是，正如李宗仁將軍所說：共軍是「狡黠」的，是「狡如鷹兔」的。兩個月來的發展，證明了共軍的行動，大大出乎這些評論家的估計之外。一方面：共軍不肯完全集中主力在這兩地區相週旋，使它的對方所企求的山東陝北兩地的「陣地戰」，變成了游擊戰。另一方面：共軍不但肯放棄這兩個「橋頭堡」，還企圖發展新的「橋頭堡」。所以，中央社說共軍是「狡滑萬分用心險惡」了。

共軍的行動，是分四路發展的：

首先，在山東：針對着國軍的「大重點」，陳毅、粟裕、陳士渠、唐亮、葉飛的「華東人民野戰軍」及其地方部隊，採取了一面牽制，一面跳越重點的戰略。當國軍浩浩蕩蕩的「大鐵桶」向沂蒙山區滾進時，共軍只留下一部份地方部隊在魯中，盡其牽制戰的任務；在縱橫三百里的沂蒙山區，主要是游擊隊及地方兵團活動，它一方面繼續實行所謂「土地改革」，據說現已轉入土地複查階段；另一方面則堅守大崗、板崗、南北位崗等山頭，向西插入徂徠山一帶，盡其牽制戰的作用。特別是南麻、臨朐兩戰，吸引了「大重點」北移，分散了「大重點」。現在共軍揚言，已大部重新佔有沂蒙山，大致就是牽制戰的效果罷。至於「野戰軍」的主力，按粟裕九月十三日的談話，似乎在「大重點」進攻時，就「越重點」轉移了。它在七月初從南邊過費縣，戰卅八旅，越津浦路，與劉伯承、鄧小平的南下共軍會師以後，似乎就留在魯西南地區；八月份幾度激戰以後，中央社說它已「逃竄黃河北岸」。到了八月下旬，中央社又說它「一度整補以後重新南下」，先在城武附近作戰；及至九月八日，更在鄆城以南荷澤以東的沙里集（譯音），對國軍五十七師作了一場極大的戰鬥，路透社說「此役該師師長失踪，萬餘人情況不明。」……這個形勢，配合了兩個半月來山東「大重點」的轉趨稀薄，使粟裕敢於九月十三日的談話中大誇耀了一番。揚言這是對全國及山東「最有價值的貢獻」，說是對方的重點攻勢已經失效，而主動與被動也已全部易手了。

其次，是南下：正當山東共軍越出重點之時，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李先念的共軍主力大舉南下了。它先在六月卅日日夜渡越黃河天塹，連續於鄧城、金鄉、羊山集等處，作戰一個多月，揚言在七月份進行了九個半旅的大殲滅戰。接着，於八月七日宣佈南移，十日越過隴海路，配合原先活動於淮陽地區的魏鳳樓、張太生所部，積極向南發展。當時，國內大部評論，均認爲它是「因國軍佔領魯西南渡口，只好向南逃竄，大致將越過平漢線回竄豫西」。可是，後來事實證明，它在涪川及信陽附近對平

漢線的截擊，只是一種牽制戰，它的主力，始終是在經線一一四度至一一六度之間向南移動着。於進入黃泛區後，又連續越過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等四條大水障，終於八月廿七日進入大別山地區，從隴海路側河南省的寧陵起，迄大別山安徽省的立煌止，連奪十一城。到達大別山以後，向南發展的則續奪湖北的羅田、英山、以迄長江北岸的潘水。向東南發展的矛頭，則取道六安，佔桐城舒城，在巢湖南佔廬江、潛山、無為，進抵長江北岸。

再次，是陝北：八月下旬，共軍突破三邊三馬兩戰以後的暫時沉寂，不顧胡宗南將軍佔領全陝北的計劃，彭德懷、賀龍、習仲勳、王世泰的部隊，向榆林移動了。攻擊榆林，是一場激烈的戰鬥，大公報的榆林通訊報導：「國軍演出了不少壯烈的場面。」可是，共軍的主要企圖，還不止此，它是想以此吸引胡宗南的三大主力之一（卅六師）北來。八月廿日，卅六師一二三旅全部及一六五旅大部由鍾松師長率領北援榆林；廿一日，正當進入米脂北七十華里的沙家店時中伏。這一場戰鬥以後，共軍自恃「從此胡宗南嫡系只餘十四個旅，減去守備兵力，其機動兵力不會超過七個旅」。因此，它就揚言西北戰場上已「開始反攻」了。自此以後，一方面國軍佔領了陝北所有縣城，另一方面陝北共軍則「次一行動已經開始」（大公報），八月廿五日起，開始向南移動，奪佔關中分區的首府馬欄市，奪佔新正、新寧兩新設縣境，進入三延（延安、延川、延長）的農村。

最後，在豫西：陳賡、韓鈞、孔從周的共軍，在山西戰役後休整了多時，終於也在八月廿三日呼應出動了。它先在灑池附近分三路渡過黃河；在第一週中，與河防國軍在洛陽外圍打了幾仗，但終於打開了新安到陝縣間百公里左右的缺口，沿洛河奪宜陽、洛寧以至豫西北的盧氏。這一行動，正如此間刊物所載：「八年抗戰，黃河河防鞏固，裝備優於我們的敵人，並不會突破過這一段河防，而今共軍居然從平陸茅津渡到會興，這也真是一個不可想像的奇蹟。」

此外，還應當一提的：這兩個半月，除了山西、平津保以及上述各地的戰事外，各地共軍的游擊戰也有了新的發展。在豫皖蘇，劉伯承南下後，游擊隊被更鼓舞了。在蘇北，八月十二日發生了被大美晚報稱為「國軍後方前所不敢想像的大事」——鹽城被佔。蘇北共軍並向南移動着，自稱在蘇中地區近來已打下七十處據點，控制泰州、泰興、如皋間三千方里土地；這一仗以後，聯合社消息已說它們一部份渡過長江，進入澄錫處三角地帶。與此同時，蘇浙皖邊的游擊隊也有了新活動，安徽放蕩回鄉會已

上書要求「迅速平定此股共匪」；江蘇省主席王懋功也已通令加強蘇浙防務。看起來，正當劉伯承部佔領皖中長江北岸時，皖南、蘇南、浙西、贛東北的共軍游擊隊，也在作呼應活動了。這個情形，使我們不禁想起劉伯承南下隴海線以前，張太生、魏鳳樓部隊活動於黃泛區的情形。

從以上的情形看來，這兩個半月來共軍的動向，不僅是想保持其有生力量及「左岸橋頭堡」，而且也還想越過重點、折損對方及創造新的作戰地區。必須指出的：國軍會宣佈這兩個月折損共軍的數字，在臨朐、榆林、羊山集諸戰中，共計達十餘萬人之多，並說「劉匪已損失殆盡，只餘萬人」。這數字與現實發展對照，已足夠使我們吃驚。但是，共軍所發表的上述各次戰役的戰績統計，更會使我們吃驚。據本埠時代日報透露，共軍公佈七八兩月份折損國軍營以上正規軍五個師部及十六個旅又兩個營，非正規軍十個團一個營，共達十三萬七千人，內正規軍將級軍官十四名，非正規軍十一名。據說：這數字加上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的戰果，已達一百四十個旅（欠一個團）又十四個師部，約一百廿六萬人。……這樣鉅大的數字，不是很令人吃驚嗎？

四、新形勢新特點

兩個半月的這些大變化，產生了一些什麼特點呢？

從前面的敘述裏，我們會清楚發現：南線的形勢已經整個改觀了。而最令人值得注意的，則是山東（這個所謂決定戰局的關鍵）的作用，已經大大與前不同。過去，山東乃是共軍在黃河南岸的唯一橋頭堡；陝北與山東，乃是共軍在黃河左岸僅有的兩個橋頭堡。現在，無疑的，共軍在黃河南岸增加了好幾個橋頭堡。論其面積，要比這次國軍在「大重點」攻勢中所得的山東地區為大。論其地域，則比山東要更向南移。山東（特別是膠東），是被遠遠的拋在後面了；陝北（特別是陝北的北部），也是被遠遠地拋在後面了。現在，戰爭的前線，已經從黃河流域擴展到淮河流域與揚子江流域，從長城擴展到隴海西段。這個變化，就使南線以至整個的戰局產生一個前所未見的特點：從此以後，國軍應付戰局，不僅有北線與南線，而且除山東與陝北以外，更需要解決比這兩個地區更接近國軍心臟的「新南線」。

其次：過去一年多，共軍所處的境地，在戰略上，大都是內線作戰（雖然在戰術及戰役上，它們力求外線）；國軍所處的戰略地位，大都是外線作戰（雖然它們會在作戰上遇到內線）。今天正在發展中的形勢，特別

是前面所述劉伯承、陳賡的兩路新發展，已經產生了內線與外線的轉換的因素。這個特點，將使內線與外線作戰，在今後更加呈顯犬牙交錯的新形勢，這個形勢，對於今後戰事的發展，以及殲滅戰的增多，會有很大關係。

再次：由於戰場的擴展，（今天所作戰的地區，在陝北、豫西、皖西等處已比去年七月前為廣；在其他地區，如蘇北，亦接近了去年七月以前的情況），這將使雙方的兵力部署發生鉅大影響，從而更加影響到今後戰事的進程。不論從國軍或共軍方面說，從事新形勢發生以後的戰事，兵力及供應都應當比今年上半年增加，否則就不足以應付新的情況。就共軍來說：它也許會恃農村土地改革的效力，不顧慮後方的治安，不惜把原來集積後方的兵力全部拋進遠征運動戰之用。它也許會更加放手在新佔領的農村發動土地改革，以便達到毛澤東「求兵、求食」的進軍方針。它也許會用「大反攻」的宣傳，更加激動人心，使它的部隊增加，應付新的需要。……另一方面，就國軍來說：不管共軍戰績的宣傳是否事實，蔣主席已一再告誡他的部下，務使指揮官及兵員不再損失，足見過去有生力量的折損，會是國軍一個沉重的負擔。這兩個半月以來，這個負擔恐怕依然是存在的，羊山集六十六師之役，就是一個例子。因此，以八月份來說，國軍全部二四八個旅，已經將二二七個旅拋到前線去，後方只就必要的川康新疆等處，留下了廿一個旅。湖南、廣西等省，早已不派一個正規軍。這正是極大的極限了。現在，新的形勢又發生了，國軍當然不能再讓劉伯承等部隊這樣直闖，必須乘共軍還未在新佔領區生根以前，立即對付它，才能免除今後更大的麻煩。在這種情形下，國軍當然不能完全把後方的廿一個正規旅抽出來，只能依靠在山東等地抽兵出來。但是，這樣的辦法，又是對各戰場需要援兵及集中兵力的要求矛盾的；這個形勢，加上因共軍新佔領許多地區而影響到糧食及兵源，對於今後戰局的發展，是有重大影響的。

最後：從戰略態勢來看，南線的新變化，也產生了新的因素。一方面，南線與北線的關係是更加密切了。國軍要對付北線，必須先對付南線，否則心臟地帶是會感到現實威脅的。共軍則也許會恃靠南線的發展，更大阻應付北線，以便造成更新新的局面。另一方面，僅就南線而論：陳賡的渡河，配合了陝北共軍的南下，西北戰場的胡宗南部隊，已變成兩面作戰。劉伯承的南下，則有聯系蘇浙皖、蘇皖、豫皖蘇、皖浙贛四組游擊戰的作用；這個作用，將使東南大城市及軍糧兵源的輸送線受到南北的新威脅。這些新的戰略態勢，對於戰局的今後新發展，當然有其極大的作用。

從這些新特點來看，我們應當承認，這兩個半月的發展，已經使南線

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這個變化，加上了東北到華北已有的變化，可以說：戰事已經發生全面的變化，新局面已經代替舊局面而演出了。

五、可能的發展

我們不想預測今後戰事的具體發展；但是，我們不能不根據上面的這些特點，來指出戰爭新局面演出以後，會具有怎樣的發展規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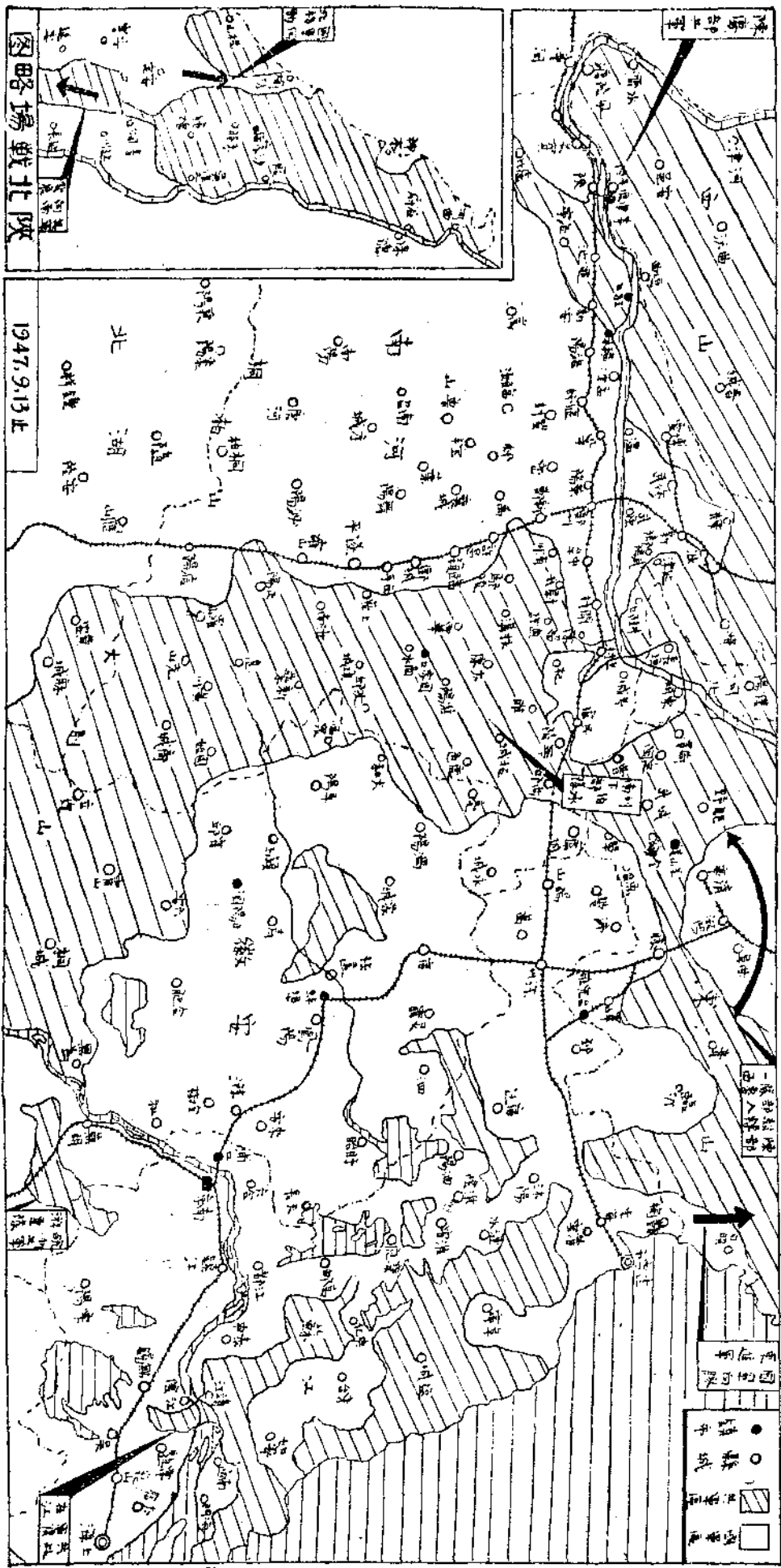
從國軍方面說：南京正在舉行軍事會議，他們正在最高統帥的直接領導之下，規劃一個應付新局面的對策。有人主張：國軍索性先應付東北，再逐步應付華北而華中，這個主張顯然忽視了東北局勢之一時澄清不了，而接近京畿的南線更非加緊對付不可。因此，國軍的方策，大概仍然是加緊「總動員」，以至放鬆其他戰場，集中來應付由北向南發展的新形勢。

從共軍方面說：這次四路活動的情形，很可以使我們瞭解共軍的戰略戰術。今天的局勢雖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共軍却仍然堅持它「有生力量第一」、「集中優勢兵力從事殲滅戰」的主張。因此，硬敲城市的陣地戰，大約不會成為共軍作戰的主要形式。共軍大約還是會以運動戰為主，並且採用「協同戰術」的兵力配備，例如劉伯承、陳賡可能是一組，陳賡、彭德懷又可能是一組。例如說：劉伯承部隊主要是向前挺進，發動廣泛的游擊戰及運動戰，而陳賡的部隊則跟蹤從事大運動戰及強攻戰。例如說：陳賡部隊主要是側擊潼關西安，造成西安以南新威脅，而彭德懷則南移對付胡宗南的調動。自然，這只是就作戰方策說，說明今後戰事並不是強攻陣地戰為主，實際的具體發展情形並不一定如所說的這樣。

這樣的戰事，是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的新型戰爭。它既不是蘇德戰爭那樣，也不是中日戰爭那樣，更不是美國對日本的戰爭式樣。國軍也許憑藉它的優厚有利條件，還會向一些城市前進，甚至佔領一些共軍前進中的據點。但國軍的統帥部不應當以此為滿足，因為共軍所從事的，乃是一種新式的農民戰爭，應當瞭解共軍的「處心狠毒」；它正針對國軍的政治弱點，利用國軍兵力的不足，向東南農村迅速滲透發展着。如果劉伯承到達長江邊上的部隊，竟與蘇浙皖贛的游擊隊聯系起來，豈不是會造成一條從杭州灣到皖中的半弧形「農民防禦帶」，把東南大城市、國軍心臟與廣大農村及兵源產地隔離起來？豈不是會因此使長江運輸大動脈切斷？豈不是會使即將爆發的東北戰事告一段落後，共軍敢於逼近京畿？……因此，國軍的戰略對策，是不能光從戰爭理論中去尋找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還得歸根於政治。

九，一四，清晨。

南綫戰場形勢略圖



殖民地制度的總危機

吳清友

一

幾世紀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政策，雖然經歷了許多的變化，但殖民地制度的總危機，從來沒有達到目前這樣深刻和廣泛。這種危機的本質，是包含在下面這一事實中，即是：殖民地帝國不能照舊地統治下去，而殖民地人民則不願照舊地被統治下去。這裏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帝國主義國家所採用的殖民地政策，不管形式上有怎樣的變化，但仍以民族壓迫和經濟榨取為其基本方針，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於壓迫和榨取程度的加深，殖民地人民反擊的力量也提高了，由於屢受花言巧語之欺騙，殖民地人民要乖得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座巨大的洪爐，它把殖民地人民鍛鍊得更加結實，團結了。他們爲了爭取平等、自由和反對法西斯主義，曾經奮勇殺敵，那末在勝利之後，無論在政治地位或經濟生活都沒有絲毫的改善，他們是不甘心的。殖民地帝國爲着鎮壓殖民地人民的戰鬥行動及緩和他們的憤激情緒，的確「煞費苦心」。在保持殖民地制度的動機下，「恩威並濟」，「軟硬兼施」仍然是被慣用的手段，這裏略舉一二作爲實例吧！

二

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在進行的時候，殖民地制度的重大弱點，就已暴露出來。一九四四年十月，美國「幸福」雜誌強調指出：

「在一次戰爭期間，殖民地帝國的破產，已表示出這些帝國不能保衛殖民地，而殖民地的人民也不能保衛他們自己不受外來的侵略。」

這裏包含的意義，是：殖民地制度的不合理，殖民地帝國已逐漸衰弱下去，以及殖民地人民在帝國主義束縛之下，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於是在不牽涉廢除、放棄、清算殖民地制度的前提下，念頭就轉到「改良」的道路上。既然說到「改良」，就需要原則和步驟。最明顯地論述到這

些問題並常被應用的是一「大西洋憲章」和一「聯合國憲章」的某些條文。

「大西洋憲章」規定：英、美「兩國不自行擴張勢力或領域或其他。

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兩國不願其實現。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願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待納粹之專判宣告最終之毀滅後，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之保證」。以後荷、葡、丹、比等殖民地帝國也參加了這個宣言。

「聯合國憲章」對這些問題又進一步作更顯著的規定。它劈頭就說：「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一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

這裏更具體地提出一種所謂「國際託管制度」，力稱：「增進託管領土居民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之進展；並以適合各領土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及關係人民自由表示之願望爲原則，且按照各託管協定之條款，增進其趨向自治或獨立之逐漸發展」。一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提倡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並激發世界人民互相維繫之意識」。

上引這些辭句所蘊蓄的精神，多少可以使人對殖民地制度及被壓迫民族之前途與命運，產生一種比較樂觀的展望，然而無可否認，這些美麗的辭句，是頗爲淆混而欠清晰，於是從這裏發生了不同的解析和意見，各個殖民地帝國都企圖「無背」於這個憲章的原則，來達到保持殖民地制度之真正目的，並從這個觀點制定五花八門的計劃、草案等等。

先從英國說起。迄今爲止，不列顛帝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帝國。根據最新的統計資料，一九四三年底，英國所有的殖民地包括自治領，

委任統治地及附屬國在內，面積計達三千七百二十萬方公里，人口計達五萬一千三百萬人。如果把英國皇冠上這幾顆真珠摘下來，它將立即黯然無光。因此，對於保持殖民地制度，英國首感生存攸關的利益，無論是保守黨或工黨，都是如此。邱吉爾早已聲明過：「我不願成爲清算不列顛帝國的首相」。而英人卡羅爾氏甚至引用羅馬教皇在一九三八年秋季發出的指令，認爲：「真正的殖民地政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開化劣等才能的種族」。比較開明的，如英國名作家赫胥黎 (Julian S. Huxley)，他認爲「對於一個國家」佔有「另一國家作爲殖民地的現象，人類的良知已感覺歉疚，正如一世紀之前對於人佔有他人作爲奴隸一樣」。但他對於殖民地制度還是主張保持的。這我們在他所提出所謂「殖民憲章」(Colonial Charter)中可以看出來。雖然這個憲章說到殖民地不能視爲財產，不過是在保管或保護之下而已。而且保護關係的基本目的，是在協助殖民地民族以最大速度達到自治。其他重要目的，則爲殖民地的開發，自始至終都爲了原有居民的利益，不過也替世界其餘部分着想。保護權將由憲章的所有簽字國共同行使，但行政責任將付託與有管理殖民地經驗的國家。殖民地地位不包含附屬的或永久的不平等；一切民族和一切種族的地位平等和機會平等，是應當使之儘速實現的目標。殖民地政府中一切位置，直至最高的爲止，將對本地居民公開，唯一的選擇標準是效率，而訓練土着人民担任此種工作，將是殖民地教育系統的基本功能之一。憲章的所有簽字國，對於殖民地的經濟機會或其他一切形式的機會，都有平等權利，唯一的條件，是維持行政效率的需要，和土着的優先權利。無庸置疑，殖民憲章的著者多少是抱善意和同情的態度，但也沒有談到殖民地制度澈底的廢除和被壓迫民族真正的獨立，其餘的更不足道了。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使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發生的激劇的變化。爲着適應戰爭的需要，殖民地的經濟有了相當的發展，從而也加強了殖民的資本與勞動兩個基本階級的地位。同時也提高了它們的民族自覺，積累了戰鬥的經驗，並增加了戰鬥的武器。另一方面，德、義、日等殖民地帝國已經瓦解了，英國的勢力也削弱了，它甚至於成爲殖民地（特別是印度

和埃及）的債務國。而美國則以最強大的殖民帝國出現於世界的舞台。美國現時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擴張，首先是觸及不列顛帝國的利益。遠在大戰還在進行的時候，美國的「外交政策報告」中就公開提出這樣的意見：

「毫無疑問地，我們的國家非常關心一件事，就是要廢除在外國的獨佔貿易和獨佔投資制度，其中也包含殖民地的亞洲」。我們有一切的根據，認爲印度在目前也正像在戰前一樣，是全世界所有殖民地中最有價值的殖民地。山姆叔叔對約翰牛身上所打的主意，在這幾句話中，昭然若揭了。更有興趣的，是美國對英國的殖民地制度曾經施以無情的批判。美國是反對殖民地重歸原主的。例如美國有一位記者名叫哈里斯在「新共和」雜誌上發表過一篇題爲「論英國及其殖民地」的文章，其中寫道：

「由於日本人代替而確立的一種更壞的帝國主義形式的這一事實，但不能使土着人民重新回到他們白種的統治者那兒去，相反地，却刺激了它們的民族主義之增長」。尤其是一九四六年初英國與托爾西奧丹尼亞協訂二十五年同盟條約，英國賦予托國「獨立」的時候，美國予以嚴詞的抨擊，英國則色厲內荏地反唇相稽，它舉事實上是美國殖民地的里比利亞爲例。「這個共和國是『自由的』，但在實際上，這種自由造成了這樣的情形，就是大部分的黑人，是被解放了的奴隸中的少數無能與墮落的人所統治着，而站在他們背後的，就是白種人的企業」。但由於租借法案以及一九四六年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大借款，英國陷入美國的財政金融依存關係的泥淖裏去了。它對美國不能不作相當的讓步。「孟徹斯特導報」曾經這樣說過：「我們必須清除英、美之間的心理壁壘」。「除掉讓美國人和殖民地政策的困難有所接觸，並鼓勵他們參加和他們所負的責任和關聯的工作之外，是沒有其他的更好辦法的」。英國對它自己最重要的殖民地也「自動地」作了頗大的讓步，印度的分邦自治，就是顯明的實例。這種「自治」無寧稱爲「分而治之」更恰當些。而美國賦予菲律賓的「獨立」，對英國尤有「示範」的作用。但殖民帝國的這種佈局，距離被壓迫民族真正的解放與獨立還有遼遠的途程。也就是說，被壓迫民族的鬥爭還將繼續下去。

四

美國因為戰時增強了的生產力，正在努力尋求排洩的尾閘，英國為着平衡國際的收支，正在爭取銷售的市場，而業已褐色的法、荷、葡、比諸國也為要保持其殖民帝國的餘威，而很費勁地維護其既得的權益，我們在事實上看到的，不是民族壓迫的鬆弛，而是民族壓迫的加緊，不是經濟榨取的減輕，而是經濟壓迫的加重。作為投資勢力圈，商品推銷場，原料來源及戰略前哨的殖民地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作用和意義，比戰前有過而無不及，特別是隨着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經濟恐慌之將臨，此種過程將日見普遍化和深刻化；雖然我們知道，由於戰後帝國主義列強實力的重新編配，殖民地對老牌殖民帝國英、法、荷、葡、比的依存關係有了重大的削弱，但另一方面，由於美國的原子外交和金元壓力，使若干殖民地，甚至獨立國陷入了新的束縛關係中，這應當認為是戰後殖民世界的新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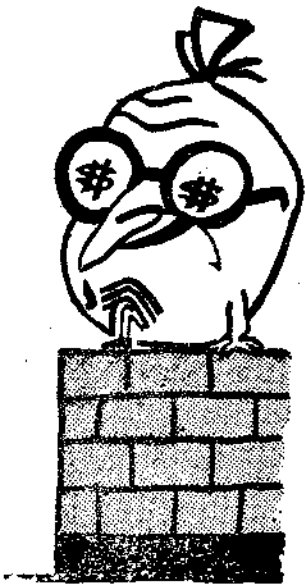
目前殖民強國的鬥爭，主要是環繞於所謂「託管制度」的周圍。國際託管地的領土，包括舊國際的委任統治地；從敵方所取得之地區；根據協議置於國際託管制下的地區。英國克蘭波爾爵士曾經強調指稱：「英國政府反對改變現有英國殖民地和委任統治地的任何片面國際託管制度」。英國的殖民地大臣所坦利氏更露骨地說：「英國不能和其他國家共享行政的責任，它只能單獨地負起自己殖民地的行政責任」。美國則持相反的見解。它認為「甚至在許多殖民地要返還它們原有領主的條件下，美國希望在解

決管理這些地區的問題上，能更多地傾聽美國的意見」（「華盛頓郵報」觀察家林德萊語）。法國和荷蘭也抱着同樣的目標，主張把殖民地和宗主國「統一」在一種「聯邦」和「聯盟」的新形式中。這些「自治」，「獨立」，「統一」，「聯邦」等好聽的名詞，固竭其欺騙，掩飾之能事，但依然不變的是本質，即掠奪和壓迫弱小民族。同時在鎮壓民族解放這一件事實上，殖民帝國的意見和行動是一致的，當敘利亞和黎巴嫩，荷印和越南反帝鬥爭如火如荼的時候，英國固竭力幫忙，而美國也不是中立的旁觀者。殖民地民族如果能够統一起來，堅強其組織，統一其行動，不難擊潰這種血腥的干涉陰謀。

誠如美國名政論家M.威爾納氏所說：「一條緊張，不寧靜，半戰爭的帶子，現在正從中國經過東南亞，印度洋，中東和地中海，伸展到北非的大西洋海岸。這個地帶現在正成為大戰後殖民地戰爭的舞台，並有它們自己的戰略。這種不寧靜的地帶，被各種形式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和到處的民族對立所聯結着。在殖民地戰爭中，技術上的優越和現代武器，較諸在正規戰爭中，是不重要的和少決定性的。在反抗者方面，擁有空間，數量上的比重，和增長着的民族的堅定的政治立場。在一個殖民地戰爭中，士氣是由政治的熱誠構成的。現代的戰爭已經證明，要在殖民地陣營中獲致勝利是相當困難的」。目前荷印和越南的英勇的，正義的，解放的鬥爭，正證明威爾納氏的看法，是與事變的客觀進程相符合的。

候時的金黃到得

——馬老——



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國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歷史的經濟的解釋）之二

被看作一種社會體制的官僚政治，既如我們在前篇證明了的，是爲任何社會特定歷史階段——由封建制到資本制的歷史過渡階段——的必然產物，那末，一切現代化的國家，顯然都會經歷過這種政治形態；一切尙逗留在現代化過程中，或尙未現代化的國家，顯然還不免在爲這種政治支配形態所苦惱；而那些立在資本主義轉形階段和社會主義形成階段的國家，是不是也會有官僚政治出現呢？關於這幾點，是我們緊接着前面的論點，而必須分別予以解明的。但爲了說明體系上的便利，本篇只打算就現代各先進國家曾經歷過來的官僚政治的史實，扼要加以敘述；對於最近法西斯蒂諸國統治形態下新官僚主義，只想順便提及，因爲我們的目的，僅在藉此顯示官僚政治在中國過去和現在，該分別具有那些不同於一般的特質。

二

先就英法兩國來說。

英國從一五〇〇年起，就已確實變爲一個民族的君主國家。它的舊時封建體制，已經在開始崩潰。君權在開始擴張，過渡性的專制政體在開始形成。一英國政府的發展，比歐洲大陸早一個世紀，但兩者通是遵循着同一的發展道路。亨利八世（Henry VIII）與依利薩伯（Elizabeth）的事業，實際上是和路易十四（Louis XIV）威廉一世（Frederich William I）的事業相似的。它是一種聯合和統一國家的事業。倘使各省不會聯合而成爲各王國，各地方團體不會結合而爲各民族，和一切封建的權利，特權豁免和權力衝突的混合物，不會變爲一個統一的政治制度，後來的民主立憲政治的發展，將不遵循它所採的途徑。這是專制君主政體的事業」（見Krabbe著「現代國家觀念」王譯本英譯者序第七頁）。在完成這種事業當中，國王「在國內就力圖達到能够替他的全體臣民立法，和由他自己的官吏直接對臣民施行法律的地位」（同上第八頁）。這就是說，立法權是國王的，行

政權却全落到官僚手中了，官僚政治就這樣配合起了專制政體的要求。

自是直延至十八世紀末年，官吏的任用，完全操在當權者私人手中；驚官賣爵的事，也是層出不窮。政府的職位，甚至可以預約。例如格蘭味（Grenvilles）把玉璽保管處（Privy Seal office）的書記，預約給他四歲的親戚；英國第一個內閣總理滑浦爾（Walpole）叫他的公子霍萊士（Horace）在政府中掛個名，拿公家的錢到巴黎去享受沙龍的生活。這都是歷史上很著名的事實」（陳樂橋著「英美文官制度」第五頁）特別在依利薩伯時代，英國官吏賄賂公行，爲人所共知。法官對於釋放罪犯有固定的價格。即在十七世紀，聯合王國的行政，仍是極端腐敗；關於英國艦隊狀況，諾列斯（Norreys）會寫信給科克（Sir John Coke）說，「全體都十分腐敗……上級人員須下級人員供奉，並強迫他們爲着自己和他們的司令而實行盜取」（Sombarth著「現代資本主義」李譯本一卷二分冊第五三一—二頁）。

可是，與我們待述及的其他歐洲各國比較，英國的專制政體，從而英國的官僚政治，畢竟是表現得最爲平淡無奇的。英國的國會在十六世紀以至十七世紀中，大體上雖然是純粹形式上的，供國王諮詢或玩弄的東西，但在昌言「國王出自上帝，法律出自國王」的詹姆士一世（James I）時代（一六〇三—一六二五年），議會對於這位放肆無度的君主的財政上的需要（如依關稅收入，專賣權讓渡，貴族爵位出賣以及強迫借債來維持其浪費生活），就已提出雖然是無效的抗議。等到詹姆士的兒子查理一世（Charles I 一六二五—一六四九年）繼位，議會更利用查理所遭遇的財政困境，一方面給予他以支援，同時却由他取得以次幾種允許；即不得議會同意，不課捐稅，不在私人住宅中駐紮軍隊，不在和平時期宣佈戒嚴令，不得任意下令拘捕人民。這幾種基本的立法權取得了，英國議會政治就把它的專制政體和官僚政治沖淡了。

從表面上看，彷彿英國比較修明的政治，是由於它自十三世紀以來的傳統的議會制度使然，其實還有更基本的因素在作用着。「……從亨利七世（Henry VII）以來，英國的「貴族」，不但沒有妨害工業生產的發展，

反想從中得到利益。同樣的因為經濟的或政治的動機，大地主的一部分都時常準備來與財政的及產業的資產階級之領袖合作。這樣，一六八九年的妥協因而容易的成功了。政治掠奪品——地位、官職、大的薪俸——都還在鄉村貴族的手裏，只要他們願慮到財政的產業的及商業的中等階級的經濟利益。而這個經濟的利益，在當時已經充分的強大，它終於決定了國家的一般政治（Engels 著「費爾巴哈論」彭譯本附錄三第一六四—一五頁）。

這樣，「新的土地貴族和新的財閥，新階化的高等財政家以及由當時保護稅支持着的大製造家，就是自然的盟友」，他們自於一六八九年成就了「光榮革命」這一政治買賣以後，就在國家的任何一個經濟部門，確立起他們的支配權，對於國有地，對於對外貿易公司，對於信用機關，通能「協作的」從事掠奪和僭有。「英國資產階級對於自己利益的行動，絲毫沒有弄錯」（Marx 著「資本論」郭王譯本第一卷第六七一頁）。英國的專制政體與其配合物的官僚政治，是由它的國民經濟順利成長，和它的資產階級的指導原則被明快發現出來之後，就逐漸收場的。英國的自由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是它的順適社會經濟狀況下的產物，但却反過來給予了那種社會經濟以有利的指導；賴有此，英國的專制君主乃知道他的利益不在保持傳統王權，英國大大小小的貴族和官吏，乃知道他們的利益，不在個別的控製或把持政府。

如其說英國資產階級對於階級利益的打算，絲毫沒有弄錯，法國在這方面的表演，就似乎弄得太不成樣了。

法國的專制政體和官僚政治，與英國比較，是會給人以更強烈得多的印象的。在整個十七世紀中，一系列專制君主，都分別配上了一系列專擅的總理大臣。亨利四世（Henry IV）時代的緒利（Sully），路易十三（Louis XIII）時代的立殊理（Cardinal Richelieu），路易十四（Louis XIV）前期的馬薩林（Mazarin），後期的柯貝爾（Colbert），都像虔誠的維護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的王權，但他們在維護王權之餘，却一致的在這樣期許自己：「余即國王」。他們分別把持朝政，爲了集中權力，如像立殊理，會把全國分劃爲若干監察使區，委派監察使監督各區內國家賦稅的徵收，地方警察或憲兵的組織，命令的實行，以及裁判所的处理等。這些監察使只要對立殊理負責，他們因爲具有賦稅、警察、以及裁判的無限權力，所以後來法國有名的所謂「三十個暴君」，一大部分就是由他們變成的。立殊理爲了監視他們，又利用偵探與詭術，把他的官僚政治特務化。他的後繼者

馬薩林大體繼承了他的作法。而著名的柯貝爾，則是由馬薩林一手栽培的。我們看到法國這種大權獨攬的官僚系統，再回顧一下英國查理一世的權臣巴金汗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屢被國會攻擊的史實，就恰好是一個對照。

法國官僚系統爲了剪除舊來貴族給予他們的政治阻礙，在路易十四時代，就設計出了一個讓貴族自行糜爛，自行腐化的奢侈豪華的凡爾賽宮，可是，貴族階級的政治阻力雖由此減弱了，法國整個國民經濟却由此種浪費，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而貴族資產階級化的可能性，也相應被堵截了，資產階級對於王權，對於官僚政治的鬥爭，自然就頗不夠勁。「一直到革命以前，貴族、地主在自己手中，仍保有法庭及一切與之相關聯的警察職能。法官的職權，是領主賦予的。法官自己是依靠捐稅，賄賂和罰款來維持生活」（見蘇聯科學院歷史學部編「近代新歷史」杜譯本第六三頁）。而且「十二世紀至十八世紀間，在法國與世襲貴族並存的，還有一種法官貴族即官僚貴族，他們之所以獲得這種稱呼是用金錢買來的。當時會被稱爲「議會」的法庭最終審判，是這種貴族的壟斷權。議會議員的稱呼是當作遺產來讓渡的。由於革命前的法國法律只有在巴黎議會備案以後才能發生效力，所以法官貴族熱心地擁護統治階級的特權，並且總是公開反對任何改革」（同上第六六頁）。

英國議會除了極少的場合，自始至終都採取限制王權的步驟。法國貴族可以用金錢購買，議員也可以用金錢購買。他們把貴族，議員的頭銜一購買到手，就想以擁護統治特權，反對任何改革，來一本萬利的收回其所支付的代價。極有啓迪覺性的偉大啓蒙運動，不足以喚醒這般貴族官僚的昏頑。到頭只有讓大革命去作着無情的清算了。

三

在歐洲，專制政體——官僚政治出現較早的國家是英法，而出現較遲的國家則是德俄。

直至法國發生劃時期大革命的一七八九年，日耳曼的兩個民族國家，始在國際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當時屬於哈布斯堡王朝的，除奧大利而外，還有匈牙利和斯拉夫國家；而屬於霍亨佐倫王朝的，在普魯士王國中都有包括柏林在內的勃蘭登堡侯國，在西部有薩克森的一部分和威士特發利亞的一部分，在東部有西里西亞，東普魯士及「西普魯士」，在北部有帕麥

拉尼亞的一部分。就把屬於哈布斯堡王朝的奧國拋開不講，德國內部統一聯合事業的遲滯，是不難想見的。

可是領土範圍的狹小，並不會限制德國君主們採行專制政體的雄心。在同世紀的上半期，被譽稱為現代德國最初建立者斐特烈大帝 (Friedrich der Große) 父子，就已經在從多方面進行那種統一聯合的事業。如其說斐特烈大帝的業績，偏重在武功方面，而對於文治、對於官制，就是由他的父親斐特烈威廉一世 (Friedrich Wilhelm I) 開始創建的。行政的集中管理，由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機構的建立，官吏服務條件 (如為避免因緣舞弊，不許在本市本省作官等等) 的確立，特別是公私財政的明確劃分，差不多成為此後將近一個世紀中德國行政上的規範 (以上參見 Handerson 著「德國簡史」第三—四章)。

德國的專制君主，雖不像英國國王那樣，說「國王出自上帝」，也不像法國國王那樣說，「朕即國家」，而只是較謙抑的說：「皇帝不是專制的主人，但只是國家的第一個臣僕」 (斐特烈大帝語)，然而，語言的表現，並不能改變事物的本質。落後而被四週強鄰所宰割制約的德國，為了對付外侮，終不能不在國內各邦領間，在社會階級間，採行較妥協的姿態；而資產階級力量之不易培植，更促使那種妥協受着一種絕對主義的領導。因此，直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德國還是被支配「在專制主義的官僚主義的封建主義的混合行政之下」 (「資本論」郭王譯本第一卷第六二五頁)。

至若在這種政體下，照一個自詡非常愛國的德國學者桑巴特 (Sombart) 所說：「官吏不正當的行為，表現為一種普遍的現象。這現象在它的普遍之中，只須由幾個特例，特別是普魯士的就可以證實。無論如何，這是早前一切時代的常規……斐特烈三世 (Friedrich III) 治下的政府人員，為一種無賴漢，殊令人討厭。他們像一羣飢餓的獵犬，總是利用每種機會作蠅營狗苟的勾當」 (同前「現代資本主義」李譯本一卷二分冊第五三〇—一頁)。就是在德國人誇稱為聖潔嚴格訓練的普魯士軍隊中，軍需亦公認為是發財致富的肥缺 (同上第五三三頁)。

本來，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前後，德國在俾斯馬克 (Bismarck) 主政當中，已因幾次對外戰爭的意外收穫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突躍成長，採行了一些立憲的步驟。但歷史學家把德國那種政府，看作為一稍加掩飾的專制政體。儘管憲法把德國境內二十五個邦，合成一個聯邦，有點像北美合眾國一樣，各邦都有相當權力。但是帝國政府控制工業團體、鐵路、法典、

社會福利和外交事務。皇帝可以統制普魯士在聯邦會議 (Bundesrat) 裏的票數。他利用這個方法可以統制憲法的修正，可以召集和解散國會，可以任命罷免內閣總理。下議院 (Reichstag) 的立法權是有限的，法律的通過，可以不經過它的同意 (參見 Swain 著世界文化史沈譯本第二卷第一六九頁)。惟其如此，前述專制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的混合行政體制，只是在草瑪憲法所由實現的社會民主黨政權之下，才被暫時剷除過，但為時不久，第三帝國的英雄們，又在各種矯造與增飾之下，變相的復活了德國的政治傳統，那是我們要在下面補說到的。

俄國直到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1682—1725) 同卡薩林 (Catherine the Great 1762—1796) 才把專制統治奠立起來。全國帶有原始性的自治政府，都分別予以剷除，而任用與皇帝有親近關係的人，管理全國的行政。俄皇在名義上雖掌握全國立法行政的大權，但他的全部工作，除遊戲狩獵以外，無非是簽名與接見賓客。一切對內的重要問題，皆由貴族院解決。貴族院經過各部官署，指揮全國行政；其中，內政官署同時又是貴族院的辦公處，而各官署的秘書，則是各種重要事務的報告人與執行者。其在地方，有兩個執行系統，一為行政，一為財政。地方督軍指揮各地駐軍，監督地方政權及法庭警察。地方行政的秘書官則專理賦稅收入。督軍直隸於貴族院，秘書官則由各官署委派。為了監察各地方官吏，更為欽差大臣一類監察官的設置。

這看是層次分明的官制，實行起來，照俄國自己描述的，却是下面這樣：

「無論如何小的官吏，甚至一個管理沙皇的鞋子的官吏，可以為了自己利益任意破壞政府的命令」。

「官僚主義在本質上就是忽視現實，專講形式。在政府下級機關可以解決的問題，而又不需要詳細規定的事，却要提交上級機關以延長時日。很小的一個問題，故意咬文嚼字終久得不到最後解決。機關雖多，辦事遲緩……視人民如牛馬，因而發生強奪、利誘、賄賂、藐視國法、狡猾、欺詐的現象」。

一監察機關用各種方法掩飾行政官的污點，他們有時也更換行政人員，但那是為了在人民心目中，造成一種印象，以為政府也是反對官僚主義的，其實，那是政府懼怕人民騷動，故以監督官的名義來監督人民……不論監察機關的形式如何……在中央政府有「秘密官署」，在各地地方也必有

很多秘密組織（以上參見庫斯聶著「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高譯本第二冊第五〇〇—五二二頁）。

帝俄官僚政治的上述弊病，顯然是直延到十月大革命才根本剷除了的。俄國式的專制政體——官僚政治，對於英法兩國固不必說，就是對於德國，亦表示了莫大的差異性。德國在幾次對外戰爭勝利後，封建的軍國主義雖受到鼓舞，資產階級勢力亦因以昂揚，所以德國的專制政體，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就必須以不澈底的立憲來予以遮掩。俄國每經對外戰爭失敗以後，就藉改革內政，特別是解放農奴來平抑全國人民對於它那種腐敗暴虐統治的責難與怨憤。但農村傳統生產關係沒有根本改變，國民經濟或民族資產階級勢力無法拾起頭來，它所施行的立憲步驟，就比之德國還要不澈底得多。等到外國資本進來了，新型的金融寡頭支配因素，使參組在尚待蛹脫的傳統社會生產關係或政治支配形態中。也許就因此故，我們一見到前述帝俄後期的官僚政治及其弊害，就彷彿格外感到是「吾家故事」。所以，儘管不少的歷史家，從俄國是一個西方國家兼東方國家，來解釋它的專制政體——官僚政治的特異性，而我却寧願就社會史的立場來說明它。

四

由上面的例解，我們不僅明瞭：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會轉向資本社會之過渡歷史階段的產物，同時還知道：某一個國家的傳統封建關係愈強固，它的自由經濟發展愈困難，它在此過渡階段的官僚主義政治，就愈加要混合着專制主義封建主義，而表現得更持續，更露骨。反之，一切當然是另一個形相。我們最好在這種推論下，簡論到美國的官僚政治。

在美國尚未出現以前的美洲，一北方和南方一樣，盜取為一切時期的官吏的本來職務。十七八世紀半官的大營業社為營利欺詐的園地；恰和殖民地區域的行政一樣，遼遠省份的行政，不常委諸最切實和最忠誠的人，總督大都對自己的僚屬樹起先例來，藉欺詐和壓制聚斂財富」（見前述Sombart著李譯本一卷第二分冊第五三二頁）。

有人根據此點，說美國後來的官制，其所以採取所謂大家都有機會參政的短期輪換的分職制，就是鑒於殖民地時代的英國官吏，過於腐敗，過於專擅，想藉此來限制官吏的不法活動（見陳樂橋著「英美文官制度」第一五頁）。我不反對這種說法，但美國官吏不法活動的受到限制，或者，當作一種社會體制看的官僚政治在美國的不易出現，却有他根本的原因，那就

是市民的民主政治，在美國比較能實行得澈底。即「資產階級長期的統治，現在只有像在美國這種國家才有可能，因為美國本來就沒有封建制度存在，而社會開始就是建立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之上」（見Engels著「費爾巴哈論」彭譯本附錄三第一七六頁）。

不錯，我們已承認就是在市民的民主政權之下，官吏不負責任，講形式，講應付，乃至假公濟私的事，還有發生可能，並且在美國確也發生過，但如英國拉斯基教授所說，像在欧洲的那種官僚政治，是難得見之於美國的（見Seligman主編「社會科學大辭書」第三卷第七二頁），如我前面的推論，那只是屬於技術性質方面的。

然則美國是否永不發生官僚把持政府權力的那種官僚政治呢？近來美國國內有識人士已經抱有一種隱憂，表示着不會在資本初期發生這種政治形態，却可能在資本末期發生這種政治形態。如Louis M. Hacker在最近出版的「美國資本的勝利」中就說：「在極權國家裏面，國家已將全（社會經濟）領域控制在手，無論企業經營或私人行動，都變成官僚政治的關切對象。至於美國方面，雖則官僚政治在羽毛未豐時代，尚能響應民主主義的過程，然而國家資本主義的勢力，亦在日趨雄厚」（見陳譯本第十八頁）。這就是說，美國如其一步一步走上國家資本主義或獨占資本壟斷之路，它的政治將不可避免的要極權化，官僚主義化。這逼得我們要把德義型的獨裁的官僚政治作一交代。

人們對於同一名稱所代表的不同性質的東西，往往總容易把它們搞在一起。前述那位美國資本主義之勝利的作者會這樣告訴我們：「英法兩國的新宮廷貴族，不啻是專制官僚政治的柱石，他們操縱教會，左右司法，統率海陸軍，享受最有利的獨營權，並（就法國而論）以稅收承辦人的地位，向人民橫施敲榨。這種現象，跟現代的法西斯主義極相類似，蓋十六十七世紀的英法專制政治和現代德義的法西斯政治，都想扶植私人親信所組織的集團，由這些集團去作實際的政治控制者」（同前陳譯本第三一頁）。

其實，這兩個不同時代分別發生的專制政體與獨裁統治，就是在形式上的相似點，也是極其有限的。從而，假使把配合後者的官僚政治稱之為新官僚政治，那也只是名詞上的相同罷了。在資本主義末期或帝國主義階

段出現的獨裁統治，乃因前此的議會政治，選舉方式，以及其他有關民主自由的社會秩序，已不適於或不於金融寡頭獨占局面，於是各國就照應其各別的歷史條件，採取新的行政形式和方法，那在意大利稱為法西斯政權，而在德國則稱為納粹政權。因為這種統治或軍制的對象，是幾世紀來在自由民主號召乃至實際活動中，覺醒起來了的，已經部分的取得了政治權力的生產勞動大眾和有識的中等階級，還有是資產階級內部除了金融寡頭或獨占集團以外的其他有產份子，於是這種統治就特別需要製造一套等級主義全體主義的哲學，一個無所不在，無所不為，無孔不入的祕密警察組織，把全國人民特別是全國勞動大眾，任意編組在他們所設計出來便於宰制驅使的社會政治框架中；於是，這種統治的執行者，法西斯黨徒，國社黨徒，就比之專制時代的官僚集團，還要採取更橫暴更無顧忌的姿態。貪污、欺騙、敲榨，結黨營私舞弊，那是太尋常了，公開的劫掠，對於人身自由的任意蹂躪，集中營，集體屠殺，已成爲這種統治的必要手段了。

當然，今日美國的政治，距離這種法西斯統治還遠，但它的獨占集團在戰後通過其所包庇養的政黨，所施行的一些反民主反自由的措置，已使世界有識人士，就小美國正在向着法西斯統治前進中。

臨到末了，我還得關於蘇聯講幾句話。前述那位美國資本主義之勝利的著者，不但把最近獨裁統治與初期專制混做一團，且把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也一視同仁的處理。他說：「在德義等極權國家裏面，它並且有消滅私產權，將國家社會主義代替國家資本主義的傾向。俄國方面，這個步驟甚至已經完成。不論個別的環境如何，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顯著徵象，總跟軍商主義時代一樣，建立強有力的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中的人員，即是新制度的主要推動者」（同前書第十七—八頁）。爲了證示蘇聯也有官僚主義，國內外論壇上，已經有人把蘇聯近年自我檢討分別指出集體農場和工廠中一部分人營私舞弊的情形，作爲宣傳資料。蘇聯社會經濟還不會達到理想的境地。屬於技術性的官僚作風，是可能不會祛除淨盡的。但我相信，一個私有財產制不存在的社會，一般生產大眾皆有政治發言權的社會，任何一種當作社會體制看的官僚政治形態，是決計無法生根的。

「中國飢餓，上海跳舞」

石燕

大部份人窮困和飢餓，少數人荒淫和無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中國幾千年來原來就是這樣生活過來的，到了目前，也不過對比更加鮮明，程度更加深刻：窮困和飢餓的大部份人數目更加增多，荒淫和無恥的少數人數目從比例上說更加減少；窮困和飢餓的更加窮困和飢餓，荒淫和無恥的更加荒淫和無恥罷了。既然從古如斯，即使於今爲烈，也並不值得提起，只有少見多怪的外國人纔會說出這樣聰明的笨話來：

「中國飢餓，上海跳舞！」

當然外國人是即使強姦中國女大學生也可以宣告無罪的，說一二句風涼話還會犯什麼大罪嗎？

既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那麼應付的第一種辦法當然是：外國已經說了，就當他沒有說過一樣。「不礙不聲，做不得當家翁。」裝做啞，原是精神勝利的妙法。可是中國人因此也說起同樣的話來，那怎麼辦呢？

第二種辦法是：外國人已經說了，中國人可不准說。雖則「防民

之口，甚至防川，」自以爲築隄方法非常巧妙的人們，在河隄還未真個潰決的時候，是決不肯相信河隄居然有一天會真個潰決的。可是不識相的外國人們，連馬歇爾和魏德邁在內，偏要將這種情形一說再說，向全世界說，向外國乾爹說，那又怎麼辦呢？越是不「面皮」的人，越是要「面子」，失了「面子」可不是玩的呀！

第三種辦法是把責任向別人身上推：我本來早已實行了極好的辦法了，却是別人撓阻我的緣故囉；我替老百姓想辦法，老百姓偏不接受囉；時間不夠囉；年歲不好囉；剛巧出了一件什麼意外的事囉；等等。可是光是推則自騙地保持了若干「面子」，却並沒有實際好處；因爲騙得了自己的未必騙得了別人；何況這不光是「面子」問題，而且還是「銀子」問題呢？

於是第四種辦法是：不准跳舞！

辦法的確不少，但是却從來沒有考慮到：「怎樣能够使得中國不飢餓」！

張東蓀論華盛頓與南京之間的距離

文琪

張氏九月八日在清華大學講演辭，原題「南行見聞雜感」

魏德邁給人的印象

魏德邁要來中國的時
候，當時我曾經推測過，
不會是單單爲調查而來。
因爲要調查的話，美國在
中國有的是大使館，顧問
團，軍事機關等，足夠來
調查，無須再派一個人來
。而且事實上，魏德邁到
中國之後飛來飛去，這裏
停三天，那裏停五日，這
個樣見半小時，那個晤談
一小時，這樣的調查也實
在不能調查到事實。本來
我已準備到上海去，因爲
在上海各方面都可以得到
比較多的消息，而魏德邁
的來中國更使我提前了起
程的日期。在我到上海沒
有幾天，魏德邁就到了南
京，後來我就和幾個朋友
到南京去，到南京去的時
候剛好他又到了上海，等
他回來的時候才約我們去
談談。他給我的印象和他

政府感覺失望 有人被罵得

哭了

魏德邁到南京之前，
政府爲了迎接貴賓整飾房

說只調查事實的時候，政
府已經感到相當失望了。
他到南京之後與司徒大使
住在一起，且聲明不受招
待，政府用以招待貴賓的
準備撲了個空。當天晚上
魏德邁就在美使館裏開會
，並沒有去拜訪我們的元
首，第二天上午也沒有去
，直到中午的時候才去，
政府是更加感到失望了。

魏德邁在上海第一個
接見的是上海的美商，美
國商人對我們政府是非常
不滿的，他們認爲中國這
個無底洞是永遠無法填滿
，像這樣的論調在美商大
美晚報上常常都有。在魏
德邁面前也是如此說，并
責備中國政府對外商不公
平等。這一來政府有點
着了急，於是就有外匯的
改變，大概是希望獲得
美商的好感，少在魏德邁
面前說些不利政府的話。
後來，魏德邁在各地
飛來飛去之後，回到了上
海。我知道他當時確是得
到了不少材料，對於中國

馬歇爾聲明和魏德邁文告的比較

有人說，魏德邁回去
之後，美國政府便會立即
發出對華政策之類的聲明
，我看是不會這樣做的。
魏德邁臨走時的那個聲明
，我相信是經過杜魯門和
馬歇爾同意的，也就是說
，美國政府指使魏德邁發
的這樣一個聲明。假如我
們這樣認定的話，我們就
可以說，這就是華盛頓決
策的第一步；就是把你看
污無能舉出來，看你有什
麼反應，如果中國政府自
己承認是錯了，那我才肯
幫忙；如果中國政府是照
原日原狀硬幹到底的話
，那我就來看看你怎樣辦
。魏德邁的聲明主要是看

會，在會中魏德邁會演說
達一個半小時，這次演說
比那個聲明還厲害得多，
許多國民黨要人簡直氣得
不得了，甚至出來之後哭
了。這個消息報紙都沒有
刊載，只有申報上面透露
了一點點。

中國政府反響怎樣，其次
是看共產黨及人民的反響
怎樣，在這些反響沒有完
全的時候，美國是不會貿
然的來一個對華政策之類
的聲明的。

拿馬歇爾和魏德邁的
兩個聲明來比較，顯然至
少有兩點不同。本來，我
們對這些聲明都可以作爲
醫生開給病人的藥方來看
，藥方由醫生開出來之後
，病人是否吃是由他自己
決定。馬歇爾的藥方是說
中國政府應該加入一些自
由份子，我們政府是照這
個藥方來吃藥了，可是藥

的份量太不夠，而且這些
藥不是真藥，因此吃藥之
後，病狀仍然一樣，毫無
起色。關於這兩個聲明的
不同點。第一，馬歇爾說
，應該以主席爲首領來擴
大政府的基礎，刷新政治
。而魏德邁却說中國缺乏
良好的領導，所以有些外
國報紙說，魏德邁的指責
是包括 Generalissimo 在
內的。第二，馬歇爾說，
政府裏面應該增加一些「
自由份子」。這並不難，
像民社黨、青年黨、及社
會賢達等等不是已經參加
政府了嗎？魏德邁却說，
政府應該去掉一批貪污無
能的份子。這就太難了，
到底怎樣去掉法呢？去掉
這些人的話，政府裏就沒
有人了。所以說，這兩個
聲明分量上是大大的不同
的，魏德邁以總統特使的
資格作這樣的聲明是歷史
上所沒有的。以上是我的
看法如此，也許是太過份
的樂觀。

美國不瞭解中國

今日雲南

高名

由此看來，美國已經進了一步，雖然這一步也並不够徹底。然而多少和我們想像中的美國有點不同，美國也不是永遠不變的。假若美國能再進一步的話，中國就可能有了。至於說美國已經進了一步，到底是甚麼力量促成的呢？這是事實迫使他這樣，並不是任何方面以道義說服了美國，據我看來，鐵的事實將來還會迫使美國更進一步。

另外要講到，今天美國爲甚麼不再進一步的道理。這是因爲美國不了解

中國人的帝皇思想

在座的吳曉先生研究歷史是知道的，中國的政思想幾千年來就是被帝王思想所控制。所謂帝王就是土匪頭，皇帝用人唯一的條件就是只要忠於我就行，不管這個人壞到一百二十分也好，二百四十分也好，因爲不忠的話，就怕自己的位置保不住了。今天政府是建築在貧污之上的，政治不是二十世紀的政治，社會也不是二十世紀的社會。以家天下來統治國家，心裏想的就

美國等待各方反響

我們的歷史，以爲我們中國是一個二十世紀的現代國家。當然，在天空飛的飛機，在地上走的汽車，我們中國也有這些二十世紀的東西。可惜我們官吏的腦子不是二十世紀的，我們的政治是古董，古得比北平的古物都還要古。作風和清朝皇帝沒有甚麼兩樣，簡直一式一樣。目前是有辦法絕滅貪污的；政治就是貪污，沒有貪污就沒有政治，美國人說，你們要根除貪污，怎麼除法？除掉貪污就是除掉這個政府。可能嗎？

名稱改換罷了，皇帝仍然一樣存在。舉例來說，閻錫山從前在山西是都督，後來改爲將軍，又變爲督軍，現在是主席，變來變去結果仍然是不變的土匪頭。不久選舉之後不用主席改用總統了，這不過又是名稱上多一變，其實本質上一點也沒有變，君主政治是以君爲主，君主高與怎樣辦就怎樣辦。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就是這樣，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要根本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就得首先拔去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美國人並沒有明白到這一點。

近於無聲的昆明

昆明自從「動員戡亂」以來，幾乎變得無聲了，報紙不消說是清一色，雜誌完全低級趣味化，比較可看的一張日報「觀察報」，也由於大局的逆轉而屢次被迫改聘社論委員，態度已經轉變了許多；這裏唯一受人歡迎的僅有每星期日貼在街頭的「民主」壁報，學生們不論在任何情形下總抓住這個武器，把壓在心裏的要求散播出去，爲老百姓呼喊。

朱紹良來昆視察

八月中旬，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將軍出巡到雲南來了，各報也和各機關首長一樣作風，來時寫社論歡迎，去時再寫社論歡送，這情形真夠使人肉麻了。據朱氏宣稱，此來目的：一是宣慰，二是視察「動員」情形。報紙上登載他的出身盡是一大長串

「剿匪」的頭銜

「剿匪」的頭銜，所以有人說他是來作種種佈署的（包括特務在內），更有謠傳說他即將來滇主持省政，而盧漢則可能調東北。他一來到，即在省黨部召集黨團人員訓話，也大聲疾呼着：「今年是國民黨最危險的關頭」，並且大罵「國民黨之失敗完全在於宣傳」，末了則訓誡「每個黨員必須自我革命，共赴國難」。聽說他還秘密的去視察了滇西一轉，外間卻宣稱他到溫泉「小住」去了。值得注意的倒是：這次各報的歡迎文章裏都在請他「重視地方土匪」，「派兵圍剿」，因爲這是平常很諱言的事，這裏我們就該看一看民變的情形了。

民變之火

十年以來，三迤老百姓過夠了苦日子，他們那一天不在水深火熱之中，貪污勒索、征兵征糧以及中央化後所受外來欺壓，難道還不夠逼他們造反嗎？先前報紙上也時常登載

一些「小股土匪」的消息

，卻始終沒有「圍剿」的捷報，人人知道，民變是蔓延了，記者曾多方採訪，證實迤南民變最爲普遍，進東次之，迤西地廣人稀，民變較少。這裏略舉一二給讀者：

陸良縣馬街居民受不住

貪污縣長楊玉生的暴政，與官兵衝突二次，結果官兵死傷甚重，居民武裝上山，且以紳士楊體元爲首，聽說現有七千餘武裝，楊玉生呈到省府，還誣告爲「受共匪煽動」哩！

邱北縣屬居民以抗拒「剿匪」與官兵發生衝突，那裏人民的武器充足，而且很有組織，政府特由簡派派兵一旅去圍剿，現在還沒有消息。

彌勒縣民變沸騰，圍得鄰近地方都不安寧了，那裏民變首領是趙永貴，部下武裝五百餘，曾經打過「民主聯軍」的旗幟，喊着「劫富濟貧」的口號，曾於上月擊散官兵一營，目下正在擴充中。

迤東如巧家等縣接近

川邊地方，時有大股「土匪」出沒

，規模很大，治安當局苦於無兵可調，束手無策。

志願兵一名，值錢五萬元

昆明的失業人口究竟有多少，誰也無從知道，但是窮人與化子之多那是隨處可見的，前月官方招募「志願兵」，即有三百多名「踴躍參加」的，這被官報做了許久的宣傳材料，由此，我們不難想見有多少人掙扎在飢餓死亡線上，而三百多不過是既不會做「賊」或「匪」又不甘心做化子的少數壯年人吧！痛心的是：每人發得「安家費」五萬元。在昆明，一匹大狼犬起碼都要三十萬元的呀！六百個「人」才抵得一隻狗，誰說我們的生命還值錢呢？

民青兩黨在雲南

隨着「競選」熱潮的光臨，許多達官貴人都挂

魏德邁聲明發表之後，美國政府就在等待，看各方面的反響如何，首先，國民黨方面就出現了自力更生的論調，拿不到錢的時候就不要，自己照目前的情況來「更生」來「改良」。甚至有人說官方要發動反美運動來威脅一下，這也並不是不可能的，許多人會懷疑，政府沒有錢的話，怎樣改良呢？其實政府聰明得很，幹一天算一天，等到實在幹不下去的時候，再去磕頭請求，那怕美國人會不答。還有一些傢伙更主張武力接收旅大，直接和蘇聯衝突起來看你美國怎樣，像會琦之流就是，恐怕你們清華大學的教授都沒有他那樣聰明。有人以為今日政府已經無路可走，其實路多得得很，不過這些路都是要老百姓的命的。

一個國家民族好像人生一樣，很容易錯過機會

中央大學不許我講演

末了，順便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到南京的時候，中央大學想約我去演講，結果臨時不許借禮堂，故沒有講成，在京滬一帶，幾個學校在一起的大規模聚會是幾乎不可能的。今天，比較起來，北平的教育界在這一點上面比南方

，最好的機會莫過於政治的時候了。當時我就知道這是很難得的機會，然而也很容易錯過，生怕它會錯過，結果還是錯過了。

美國的態度是決定中國政治一個重要的因素，假如這個因素能夠解決，那麼對中國政治問題的解決起很大的作用。目前美國是不會怎樣的大規模來援助國民黨的，錢少的話拿來給中國政府也沒有用，錢多的話，美國自己家裏就有問題。開明的人士如華萊士等就認為中國政府根本就是一個法西斯的政府。反動的又把中國看成並不重要。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是不容易得到美國大規模的援助的。假如美國能更進一步，那時候才能談到美蘇合作，中國問題才有辦法解決，我相信美國是在改變中的。

要強得多，至少還有這一點自由和力量。這裏，我要向你們清華同學警惕一下，在惡劣的環境下要善於保存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已有的成果和作風，因為環境可能會愈來愈黑暗。(廿六年九月十二日寄自北平)

冠辭職，同原籍「活動」去了。正當此時，民青兩黨的支部也在昆明成立起來，開始紛紛登場了！除了招待記者，發表宣言之外，民社黨還在各報刊登大幅廣告招收「社會賢達」，「各界名流」為黨員哩！許多投機份子、流氓、市儈、地痞、土劣……都一大批一大批相繼加入，從而可以參加「競選」了！這其中還鬧出了許多笑話來，譬如我的家鄉一個小土豪，前幾天公然以青年黨「縣選舉事務所主任委員」的姿態出現了；另外一個才從東北逃回來的小軍官也在活動民社黨的「委員」，這幾天在茶肆、酒館裏大拉其黨員。他們還在記者會上誇口擁有若干若干黨員，真比國民黨的「集體入黨入團」還來得快哩！大抵青年黨的多，土劣，民社黨的多地痞，失業軍人。這就是所謂「賢達」「名流」了吧！我們不明白的只是他們那裏來這麼一筆龐大的黨費？

「去你的，USA，滾你的，USA！」誰也想不到，在抗暴大遊行的時候昆明沒有一個美國兵，而今天反而來了許多了。早在兩月前就有一批來到，香港報紙，曾經揭露國內好戰派企圖以川滇、滇越兩鐵道作抵押品，以便取得借款；現在美人是越更增多，證實了這個陰謀的真實性。中國人民深深感到：必須再來一次「滾你的，USA」運動！

暑期學潮

雲大附中的護校運動，堅持了兩個月之久，終於八月廿五日因大學部校長接受雲大自治會的調解方案而告終了。答應「校務維持委員會」取消，大學部校長兼附中校長，續聘所有在校老師，公費照大的勝利，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使昆明學生又一次的興奮了，又一次的加強了與黑暗勢力奮鬥的決心。為了慶祝這個勝利，廿七日晚他們特在雲大至公堂演出李健吾的「山河怨」及「屠戶」等名劇，招待昆明同學，這是暑期繼「李聞慘案週年紀念會」的第二次盛大晚會。

同時中山、高工也開除了大批同學，其中大都上學期為反對校長貪污而罷課時的工作人員。中山校長鄧重魁是個大黨棍子，盡人皆知。但在同學一致憤怒之下，還是勝利的挽回了。

考大學二三事

八月是畢業學生找出路最苦悶的時期，這裏有兩千高中畢業生在向著大學的鐵門奮鬥，不幸今年各校的錄取名額都很少，大學當局在以「難倒學生為能事」之後，依然神氣十足的說「考生成績太差」，嗚呼！一年不如一年，猶令人髮指的是雲大又泄了試題了。去年雲大發生買賣試題的事是千真萬確的，今年泄題的經過更令人驚奇：數學題泄漏達三次，一、二次雖被發覺，但是第三次仍然在考前十分鐘賣了出去。還事情被一家晚報登了出去，接著各報都直接間接的寫了社論，鬧得滿城風雨。雲大當局當然又是絕口「否認」了，而且還要「依法控訴」哩！否認儘管否認，但事實總是事實

，在幾年頭誰都知道，某方面有計劃的滲透，早已針對學府了，不是連北平三大的試題都灌輸了嗎？

文化工作者大聯合

近幾天山城又是連綿刺骨的陰雨了，各校已紛紛開學。昆明文藝界在陰森的氣氛下開始大聯合了，早在六七月就組成了「昆明文化界聯合會」，內分歌詠、戲劇、文藝三大部門，分別由刀叢社、哈合唱團等社團擔任主委，積極展開工作，本月六日晚還在至公堂開了一次規模宏大的「文化工作者聯誼會」，會中有音樂、詩朗誦、大合唱及精彩活報劇「活下去」等，是暑期第三個極大晚會。

這裏唯一的新音樂叢刊「教學唱」已出至第五輯，內容較前更為充實，是領導昆明新音運的旗幟。師院「五月劇社」定即日起演出夏衍名劇三幕劇「芳草天涯」，由藍河導演。(九月六日寄自昆明)

代郵：
高名先生：請示通訊處，以便寄奉稿稿。

藝文雜誌

蕭邦的手蹟與巴黎版畫市場



平凡

〔巴黎通訊〕版畫公賣在巴黎，近來已達到驚人的價格。德布古的一幅版畫，居然以二十六萬一千佛郎賣了出去。古代版畫，年來銷路極旺，去年十一月間英人瓦爾的兩幅版畫，總共售價二十三萬佛郎。當時一般人的印像，是法國十八世紀版畫的公賣市場，絕不可能與英國版畫同日而語。然而事實的證明，適得其反。例如德布古的「公眾散步」就賣到上面所述的價格：二十六萬一千佛郎；查尼耐氏的「好奇」，賣到十七萬二千佛郎。其他多有以十餘萬到二十萬佛郎的最高價格而脫手的。

蕭邦的書翰，也在公賣市場出現，是一八四三年到一八四九年間所寫的，收信人是他的青年女學生羅齊埃小姐，總共有二十封。那時蕭邦正與法國名女小說家喬治桑過着愛侶的生活，所以其中兩封信的末尾，還有喬治桑親筆的極長的附語。蕭邦對他的女學生，很詳

細的敘述了關於他個人生活，充滿着智慧的話語，都是分別標價出售的。其一是一八四八年發自倫敦，當時蕭邦正在英國旅行。這封信賣到八萬佛郎，（折合同幣約為二千五百萬元），總共售到四十三萬三千佛郎。在巴黎當官公，以一天一千佛郎計算，已經足夠一人維持一年到兩年的生活。

說到古籍的標賣，亦可謂價值連城，打破了歷來的紀錄。例如一七六二年間的版本：「韻文短篇小說選」，上下兩冊，中附有艾森所作插圖，即賣到二十萬零五千佛郎。關於比較近代一點的書籍，價值也很大。法國詩人馬拉美的詩集原稿，經影印四十冊，上編以號碼，一冊即賣到十七萬七千佛郎。

隨版本，書翰，典籍同時出現於公賣者尚有名畫多幅，有售到四十萬佛郎一幅的。



尊重理論

關懷

關於「密雲期風習小紀」

在文學的各部门中，文藝理論底收穫在量的方面，是遠比其他各部门來得少；而且在這少量之中，也還有大半只是舶來理論底批發，不曾經過「中國化」這個熔爐鍛煉過的東西。

然而論到「質」，却由於少數理論家底努力，無疑是有特殊成就的。並不能因為量的少，而蔑視它的存在。

先前的有些討厭理論的人，時常把理論家喜歡引「馬克斯云」，「普列哈諾夫曰」和「詩云子曰」相提並論。然而「馬克斯云」，「普列哈諾夫曰」本身是沒有罪孽的，問題是在於有沒有把這些先哲的思想滲透在具體的實踐裏；還是只當作一件華貴的裝飾品，專門向人炫耀的。

我們的新文學本身就是在外來文學灌溉之下長大的，作為研究它的理論，自然也不免要多多借助於它們的潤澤。——我們

上了，但因為它們都是放在最廣闊的視野裏去觀察的，時間的流逝，只有越顯得它的正確，它的久而彌新。

在這一本書裏，我特別喜歡第五部份幾篇對於個別作品的批評和介紹，例如「田間的詩」，「生人的氣息」，「生死場後記」之類。胡風先生一面緊緊地站定在一貫的理論基石上，一面盡量使他的理論底原則融化開來，注入到每個個別的場合去，試驗着它是不是真的經得起具體的考驗。

這考驗是毫無取巧的地方的。假使理論真是雜湊拼搭起來的話，一碰到那些具體的作品，便會立刻跌倒下來，不成片段。所以有些聰明的理論家，總是乖巧地避過這種具體的分析，專門在名詞上玩花樣。

然而胡風先生却勇往直前的衝進作品推裏去了，這正因為他有豐富的修養，銳利的觀察，堅實的理論根據的緣故。

評「天橋」

容方

女伶在我們這罪惡的社會裏，其遭遇之慘，實在不是我們所可以想像的。看着她們，一個個好像站在社會的峯頂，為衆目所注視，為大家所羨慕。但是，有誰對她們是以誠相待；以心相愛的呢？她們一個個不過是被人玩弄的對象罷了！有一日，熱鬧的生活過去，被人拋棄；她們不但看來是悄悄的離開了社會；而且大半是陷在非人的生活裏；在人間最陰暗的角落裏泣泣吞聲，而終於苦痛的死去吧。如果我們不是帶着「玩賞」與「欺弄」的心情來看待她們的生活，而真能感受她們生命碎裂的苦惱，那麼大家所看出來的，將是令人不敢正視的血淋淋的現實吧！

是的，你在「天橋」裏，將看見一位女伶的浮沉；尤其看見這罪惡的社會的剝削者，對她的欺凌與摧殘。他們污辱她的生命；用她的生命來做賺錢的工具，把她像市場上的貨物，拋來拋去，你搶我奪。結果，又像屍體一樣的把她拋在一邊，讓她受風吹雨打。我們看着這一段段故事；在銀幕上，雖然是模糊的表現着，但已使我們忍不住，為這生命掉淚了。在這一點上，我看出了「天橋」還有它的可取之處，態度並不輕佻。

但是，事情是極明白的，並不是因為戰爭才有這種現象，他們非人的生活，開始得已經久遠；所以「天橋」的把那早就跋扈的官老爺和漢奸拉在一起，那

是完全正確的，這之間本來就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但是，在結尾，把勝利，看成是一種新的生活的開始；是一種充滿着新的希望的開始，却有一點令人難以置信了。因為，今日整個中國，是沉在更大的苦痛裏去了，誰能抹着真心閉着眼睛，說勝利帶來了幸福的生活？人們是眞真的翻了身？因此，這結尾，可以說，使全片的感動之處，皆得到了相反的結果。

其實，這本來就是一種很笨的做法，為什麼描寫任何生活，都要硬去拉扯抗戰來倍觀呢？「抗戰」既不是一種什麼裝飾品，有了幾筆這種描寫，也並不能顯出片子的偉大，何況一般人對於這不是勝利的勝利，已經痛心疾首，說不出的憤恨，你還要在他們面前說謊，這不是太笨太可笑了嗎？

而且，說實在的，我們為什麼要抗戰；一方面我們要擊退敵人的侵略；但是，也要拋棄我們本身的腐敗，也就是說人民要翻身。絕不是說，我們過去過的苦痛的生活，敵人走了，不過少去了一層壓迫，苦痛却應該繼續保留下來，說戰爭以前的苦痛是合法的。所以，「天橋」的那一羣流浪者和勞動者，他們也要新的出路，而不是回到了老路上去。我們絕不能忍受，說那一個個賣藝者在風箱裏掙扎的情景，是合理合適的。把那種場面，把那種鏡頭，浮誇的表現出來，那結果，是不是一種忍受痛苦與奴性的說教呢？「天橋」在敵人的踐踏下，固然血流成渠，在戰爭之前，也同樣的不可羨慕，所以我們絕不要走老路，老路只是一條死路罷了！在這一點上；我們感覺到了作者的思想與感情不深厚，他沒有體驗到眞實「天橋」生活的辛酸與悲慘，因此，他也沒有強烈的願望，要來推翻和改造這種生活了。

同時，我想到這種生活狀態，固然要改造，要推

翻；而屬於他們本身，引發下來的錯誤的思想與制度，也一樣的要改造，要推翻；這裏的科班制度，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我們的這位女伶，固然是因意志不堅定，所以到了那腐爛的社會裏，受到了別人的欺騙與傷害。但是，如果，她一直在這班子裏唱下去，也實在並沒有什麼幸福可講，她同樣的生活在壓迫與苦痛裏面，這裏有的，是專橫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實足的宗法社會的酷和無情，別看那表面的義氣和骨氣，就認為科班制度，本身是合理和正確的。因此，把科班的生活來和腐爛的社會生活對照，把師父的堅持來和女伶的軟弱相對照。我相信，如果科班制度本身不是這樣的陰冷，女伶也不會絕望的投進那罪惡的漩渦裏去自找末路。現在片子裏，憑着未着重那女伶的矛盾的內心生活，那理由，不過把錯誤全推在她自己身上；而把師父和他所代表的科班制度的錯誤，抹得一乾二淨罷了！

堅持的是什麼呢？是骨氣，是不肯屈服於敵人，這是對的。但是，如果堅持的是過去的生活；是那本來就在奴隸狀態的生活，堅持的是那制度，是那本來就在發揚奴隸精神的制度，那堅持又有什麼好處呢？因此，看完了「天橋」，雖然，它使我們深惡那一羣如狼如虎的官僚與流氓，但是，我們却也不能去跟着讚美那宗法制度的科班生活，更不能回到那奴隸生活的狀態中去。「天橋」在這裏，有着最大的錯誤。



漫譚「電影劇本選」

夏奈蒂

關於美國出版的「電影劇本選」其初曾見諸張駿祥先生的介紹，其後又在「文藝春秋副刊」的域外書市欄讀到過一段「一九四五年最佳電影劇本選」(Best Film Plays of 1945) 的消息，編選者都為迦斯納 (John Cassner) 和尼珂爾斯 (Dudley Nichols)，但顯而易見那兩本書的內容完全不同，前者僅僅祇是一種嘗試，出版於一九四三年；成功了以後於是就誕生另外一本，雖然祇有十個戲，不過編選人根據自身的經驗使苦心經營的編選更其完整，譬如每個劇本都附有劇照便是個例子。

然而我現在要談的依然還是屬於前者：「二十個最佳電影劇本選」(Twenty Best Film Plays) 自從我無意中得悉世上有這本書存在，又無意中在馮亦代先生的書架上獲得到手，我打定主意必須細讀四遍或者至少兩遍才物歸原主。因為你或許比我更明白，坊間雖然多的是鮮艷奪目各種美國電影雜誌，而可以置於案頭作研究用的實在寥寥若晨星，如若不直接向美國定購或者壓根一本也沒有。物以稀為貴，我以為是視為至寶。

首先是冠於全書之前編選人那兩篇洋洋數千字的導言：「電影劇本之作爲文學作品」和「作家與銀幕」，勝似在大學裏上兩個鐘點。那是一個 Course，一種值得學習的課題。配以理論，以下我們有二十個劇本。每個劇本在銀幕上都是個世界，搖撼人的心靈，使人爲之感動爲之深思。在文字上我們往往得到一種神祕的歡愉，尤其是那電影劇本而言，譬方「左拉傳」(The Life of Emile Zola)「黃金窟」(All That Money Can Buy)「錦繡山河」(Juna rez)「怒火之花」(The Grapes of Wrath)「太虛道人」(Here Comes Mr Jordan)或者「吾土吾民」(This Land is Mine)，當初我們在戲院

子裏看過，哭過，笑過，激動過，臨了戲散了，人走了，幕拉下來了，戲中的世界也隨之飄忽忽淡忘了。其間你也許記住一句話，一個姿勢，你苦於沒有一種確切的具體的形象足供回憶，沒有憑依，現在我們在用文學構成的電影劇本上得到我們許多失去的。它不止是使你溫故而知新，並且使你真正有所得。

有所得的自然應該是那些電影劇本製作者。有這樣一本豐富的書——一千餘頁，每頁都帶着成功的標記，每個場面乃至每句對白都有着劇作者藝術的印證，對於「老手」是難得的借鏡，對於「生手」實在勝似讀十本「如何編電影劇本。」 八月十五日



音樂·番茄·葡萄糖

予欣

(賀綠汀在鄉村里)

那是一個怎樣瘦弱的人啊！長長的，一根枯萎的高梁桿！

但那眼瞳里有嚴肅的光，有火樣的光！

那是一種和藹的光芒，他給你親切而善良的撫愛。

正跟他的聲音一樣，他的聲音像一泓向着你潛潛流過的同情的溪泉，那樣的柔和，那樣的細微，雖然他是寡言的。

這是陪都，——大後方唯一的一所自由氣象的新型學校，深墜在嘉陵江邊的一個小村里。

學校在鳳凰山頂上，他住在山溝下面靠近費式庚林的一個老百姓的莊園內。他的門外有小塊土地

神和學問都是屬於祖國，屬於人民的，他要歌頌人民英勇的戰爭，歌頌祖國復興的光明！

但是他只能活在自由進步的希望裏，不願別人自由進步的人是會阻礙他，錯制他壓榨他的！

他的志願不但要自己自由，還要廣大的人民能夠自由，不但他一個人的生活進步，還要廣大的人民生活進步，所以那些只許他自己在很可憐的一點時間裏，得着很可憐的一點自由，而不讓他希望廣大人自由進步的人，無論設下怎樣美麗的圈套也套不着他了！

他寧可犧牲音樂院的職業，他寧可不教音樂院，他寧可不當樂官，把自已枯瘦如柴的身軀，和老婆兒女搬到鄉下去受窮，生着病受窮！

然而，這是一多麼自由的鄉下啊！這里他居然有一小塊土地可以種番茄，而且居然種出那麼紅，那麼肥美人的番茄！

更使他感覺着生命的遠大將來，感覺着無限光明的誘惑，無限希望的愉快，而使他突地跳躍起來了似的，是他看見了有二三十多個受了貧窮和災難打擊的流亡兒童，能夠很聰明地聽在他身邊學習音樂啊！將來，將來！那時健康的將來啊！他要弓起背脊來做一道橋，把年輕孩子們從苦難的世紀，從沒有音樂的世紀引渡到一個繁華強盛的，充滿了進步的幸福的音樂的新世紀！

他像種補番茄一樣培植着那些孩子，他們有鼻涕的時候，他像媽媽一樣給他們拭掉，太矮了高不及鋼琴的孩子，他把他笑嘻嘻的抱上去。

在這期間他特別爲孩子們寫了「我們是抗戰的孩子」，「愛阿愛」……那正是過兒童節的時候。孩子們一早晨張開眼，就很有秩序的唱他的歌，他聽着聽着就去爲他們指揮，也教他們指揮。

有時候，蚊蟲已經受不住午後的陰暗，都悄悄從屋角里偷出來了，他還在壓着鋼琴，望着孩子們教他們唱；孩子們就像媽媽學着說話似的；那樣帶着夢，帶着欣悅。工作是勞苦的，有了孩子們的歡笑就不覺得勞苦了。

爲了健康，快些撞走病，有更强的筋力工作，天天有醫生來替他打葡萄糖；他巴想不得有一天他能參加孩子們所有的遊戲，參加他們晚飯後在山坡上的遊戲。

那該是多麼快樂，多麼有意思，多麼能發揮感情與智慧的啊！

讀者之聲

胡適的「方向」

老迂

十多年來「美國的」博士胡適，丟了他的哲學史大綱的續集不寫，爲了和羅斯福同學的關係，做了一個時期的大使，而且也做了火柴匣收藏家，真是了不起了！

博士返國而後，口裏說不想做官，（實在的說，做過了大使，又做唯一無二的富有政治性的北大校長也夠過癮了）但對於政治的興趣却似乎十分濃烈。在最近一年當中，博士組織的空氣時濃時淡，無論如何，想不是空穴之風。他對於「六二」前的高論，也實在「中和」之至，兩面俱好。而且，在他美國式的民主立場上，又出足了風頭，難怪大公報的記者說他年青了（不是幼稚）。

上面的閒話，并不能顯示胡博士的「方向」。惟有他在八月一日一次廣播（八月二十日寄自江南）

日本法西斯又復興了

蘇爾福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四一八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侵略者的日本，自向盟國投降後，距今已兩年了；在這不算短的兩年中，假使有良心，有血氣或親受其侵略的人們，總是不會忘記日本法西斯強盜的暴行：到處姦淫、搶擊、燒殺；多少人過着無家可歸顛沛流離的生活，多少中華優秀的兒女爲了驅逐日本法西斯強盜，爲了獨立、民主、自由，慷慨地付出了自己寶貴青春的鮮血；如今我們所得到的

是什麼？是自家人的互相殘殺，是眼見日本的復興。當然囉？我們不僅不應該嫉忌日本的復興，而且要予以同情和援助。然而，今天日本的復興，不是日本民主的復活，而是美國「杜魯門主義」下麥克阿瑟一手提拔的日本法西斯強盜的再抬頭。這是無益於世界，且是世界和平安全的威脅。

兩年來麥克阿瑟在日本做些什麼？無非是在扶植日本作爲反蘇反共的基地；兩年來，事實的證明：「波茨坦宣言」和「莫斯科決議」並沒有實現，

「遠東委員會」和「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也置諸高閣，形同虛設，戰敗的日本，在其一人包辦之下作爲反蘇反共的堡壘，且麥克阿瑟總部決定：「天皇是日本元首，不是戰犯」。大家都知道，日本天皇是最大的財閥和地主，

（日政府一九四五年十月卅日通知參帥總部，說天皇所有財產包括土地。不動產，動產等，計值一，五九〇，六一五，〇〇〇日圓），是欺騙日本人民使其妄欲爭取世界權威及勢力的最高代表。而且，日本新憲法規定：「天皇是象徵着日本國民至高的總意」。因此，兩年來處置日本戰犯的工作，變成一幕滑稽戲。使日本再度以遠東反蘇反共的先鋒自命而有種種狂妄的表示，公然提出領土要求，公然宣稱擬領導中國，要求託治琉球，要求千島和庫頁

島的捕魚權，要求在台灣享有移民權。更令人痛心的是麥克阿瑟和美國當局對於這樣的日本反而表示十分滿意，盡力從各方面加以援助，公然地主張和日訂立和約，「愈快愈好」。尤令人驚奇的是我國府孫副主席也宣稱：「努力協助日本……便成爲反蘇反共的極權主義的堡壘……中國應該放棄會受日人禍害而存報復思想」。同胞們！我們一輩子能忘記八年來日人所給與的苦痛嗎？士兵們的創痛猶新，戰場上碧血未乾，有良

心的人們誰會說出這無恥的話呢？尤使人痛心的，我賢明的政府當局，又主張開放對日貿易了，從此以後我們又可以「享受」「價廉」「物美」的日貨了。

美帝國主義扶植了法西斯的日本，中國的反動者出賣了中國，欲使中國成爲日本的尾巴，美國的附庸，可是：這是在牛角尖內的想法，須知現在中國的人民覺悟了，從今後他們決不再受騙了，他們要站起來說話和行動了！（八、廿五、永吉）

本刊專論請署真姓名

編輯先生：
貴刊爲一有地位之大刊物，專論作者最好不要用簡名，即將姓名全部刊出，俾以堂堂之教，正正之旗出現。先生以爲如何

何佩雲謹啓
九月五日，金華。
（答）何先生的意見，我們很贊同。希望以後各方朋友撰寄專論時，能署真姓名或常用筆名。

時文

刊週

發行人
編輯者
經理部

程博
時文週刊編輯部
上海枯樹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世界文庫

兩條路

樊弘

朝鮮問題

郭森麒

關於「民主國際」的討論

吳世昌

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

王亞南

通訊

「爭取學術獨立十年計劃」的論戰趙鎮乾

廣東南路的動亂

子薯

山城秋色

黃瘦

農村在劇變中

與稷

3

卷二第

立國稷

館書圖東

藝文誌

新型舞蹈的新精神
托爾斯泰的固執和堅強
關於英國片「孤星血淚」
戰士怎樣在地上生根的
「浮提」
「他們不要瞎子去當兵」
弗特列馬區為休姆林辯護

衛如
林如
佐文
懷霜
夏奈
穎金
童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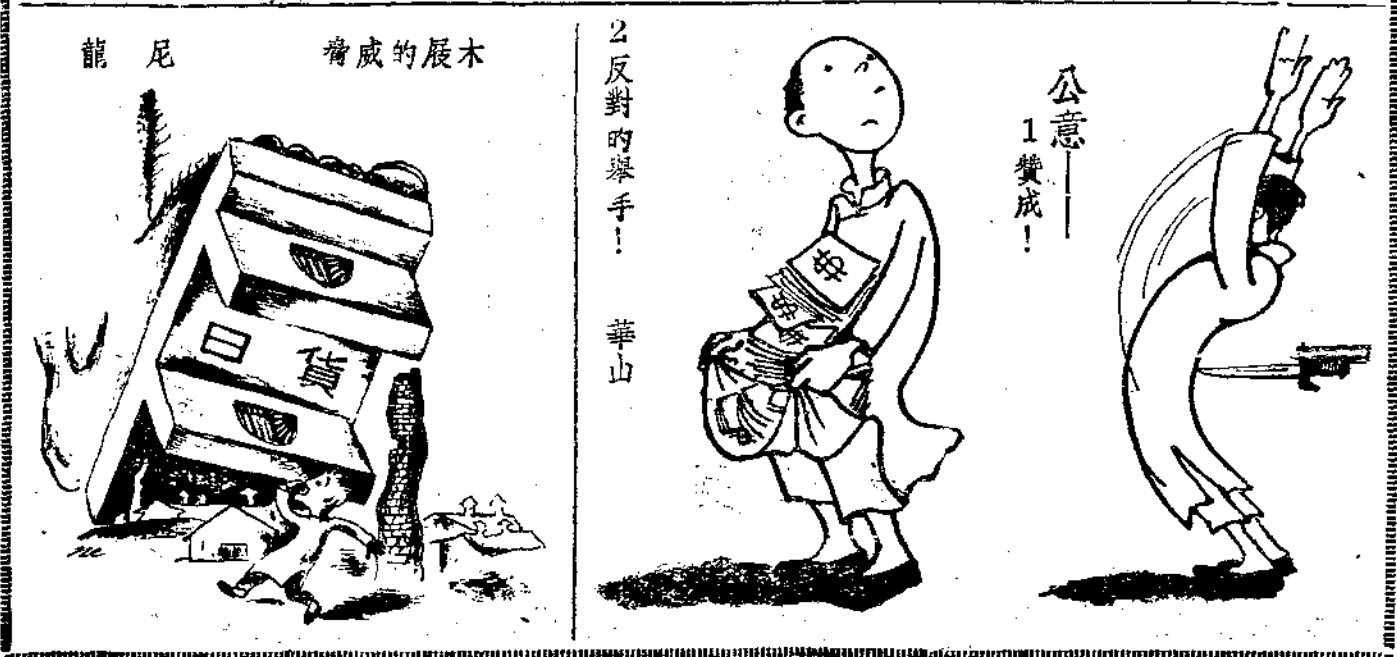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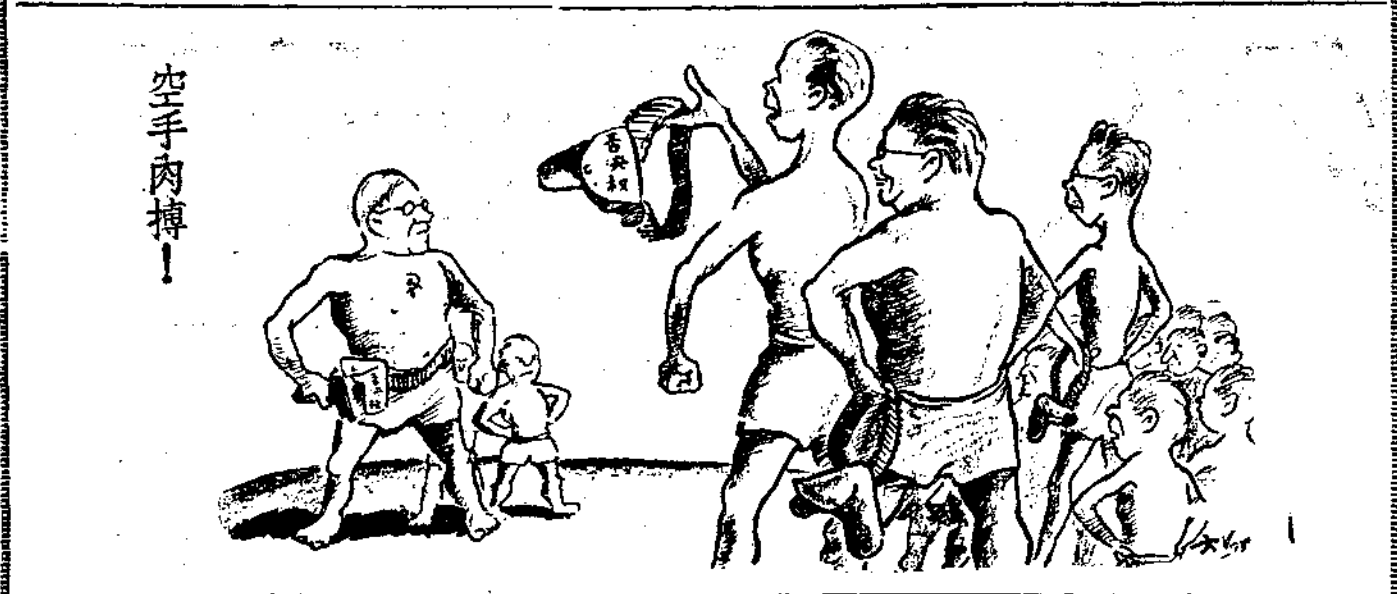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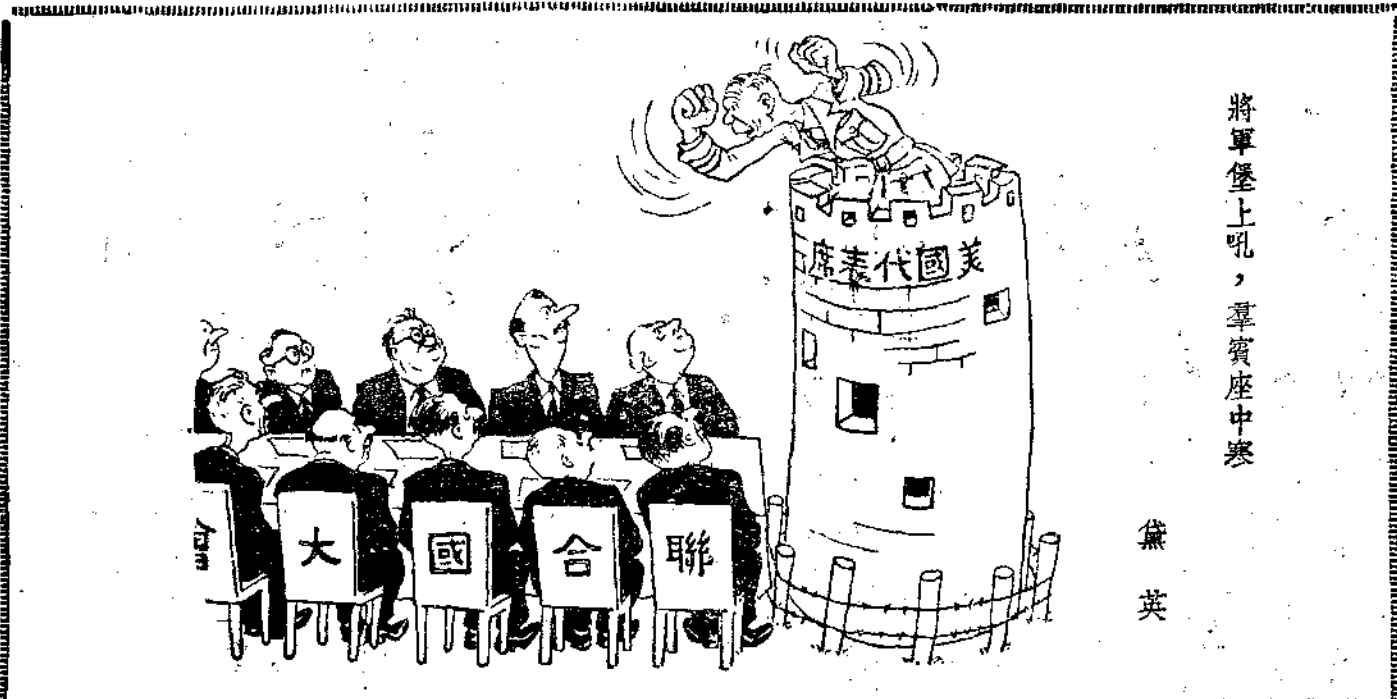
漫畫

黛英·方成·華山·尼龍

讀者之聲

張東蓀氏責楊光時君引錯了話
「重視」英文
孫副主席的外交談話





兩條路

樊弘

一、當前中國的分配制度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割富人之產以益貧民，一種是竊貧人之產以益富人。在這兩種制度之中，我們必須加以抉擇，那一個分配制度是更好的。

假令在這些富人之中，大部分都是新興的工業家，好像十九世紀時代的工業資本家一樣，他們賦有偉大的組織能力，能把自然科學上的發明利用於工業，增加人類勞動的平均生產力，或提高人類的平均物質幸福，縱令今日的所得的分配，偏向着富人的利益，對於社會，尚能忍受，因這雖於社會的正義有所損失，但於社會的生產却有增加。我們倘有理由來擁護他，因為我們寧願忍受分配不均，而不願生產不豐。

可是在今日中國富人之中，一部份是坐食地租的大地主，一部份是流氓資本家，一部份是豪門資本家，一部份是窮兇極惡的貪官污吏。他們毫無生產的能力，有的酷似一羣吃得腦滿腸肥的豬仔，有的酷似土匪，有的酷似狐狸精。現在且以膨脹通貨的方法，來竊據貧人之產，以益富人。無論從社會正義立場，或從社會生產立場，均絕無絲毫存在的理由。

但是今日的少數知識份子，還在以秘密的或公開的言與行，來幫助這種偏向富人的分配制度的維持與擴大，實在沒有意義。假如割富人之產以益貧人是不人道的，那末，今日而竊貧人之產以益富人，必是更不人道的了。我以為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不但不應替這種偏向富人的分配制度說話，而且應當與以糾正。

二、中國的工業建設有兩條路：一條是以全體勞動者——精神的和肉體的——的覺醒為基礎的工業建設。一條是以少數的官吏或資本家的覺醒為基礎的工業建設。在這兩種工業建設的途徑之中，我們必須加以選擇看那一個更有效率。

在社會主義尚未浸透中國勞動下層以前，勞動者根本不知剝削為何物，我以為後一種途徑較易實現。在社會主義已經深入中國勞動下層的今日，剝削觀念決於人心，我以為前一途徑較易實施。採後一個途徑；資勞之

爭，永遠糾纏不清。採前一個途徑，資勞雙方合為一體。故俄國在對德宣戰時延長工作時間無問題，但在美國則問題極大。由此可見，今日中國的工業建設，走後一條路較難，走前一條路較易。

在中國共產黨未成立前，前一條路，既已較難了。在中國共產黨蓬勃向上的今日，前一條路，難上加難了。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未成立前，後一條路既已難上加難了。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已成立後，後一條路必是難上加難又加難，並幾至於不可能了。

可是中國的少數知識份子，還以為中國的工業建設，遵循這個以少數官吏和少數資本家的覺醒為基礎的建設途徑有可能。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是開倒車的。他們實在尚未充分理解循着這個途徑前進，所將碰着的暗礁，是有何等等的毀滅性啊！

我所謂的以全體勞動的覺醒為基礎的工業建設，並不是指共產主義制度，亦不是指社會主義制度。我所指的只是一個在今日中國的狀態下，能夠得到全體勞動者很興奮的支持的一種工業建設的途徑。我的意義只是說，循着這個途徑前進，中國的工業建設可以走上社會主義的制度，無須再經重大的流血的革命。

三、世界的民主政治有兩種典型。一種是以扶助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民治制度，並且在實質上偏向資本家階級利益的維持的民主制度。一種是以扶助社會主義的發達的民治制度，並且在實質上偏向全體勞動者的福利的維持的民主制度。聖保羅說，「不勞動者不應得食」。假令這話不錯，那末，第二種民主制度是比較進步的民主制度了。為達成前一種民主制度的任務計，須有一個代表資本家階級利益作基石的政黨，來對外反對封建勢力，對內實行民主。為達成第二種民主制度的任務計，須有一個代表勞動者階級利益作基石的政黨，來對外箝制資本主義，對內領導民主。以最近的英國來說，英國是一個接近偏向勞動者階級利益的維持的國家，因此今日英國的民主制度實是今日中國的知識分子所最崇拜的一種制度了。但

英國之能有這種民主政治全係因爲有一個代表勞動階級的大政黨的存在的原因。在這兩種民主制度之中，我們必須決擇，看那一個民主制度是比較前進的。

我沒有意思說，蘇俄的民主制度就是世上絕後空前的民主制度而無須加以改進了。我的意思只是說，蘇俄在本質上，是一個以代表全俄勞動者階級的利益爲職志的民主制度。按諸不勞動者不應得食的原則，這種民主制度值得我們效法。可是在枝節上，這種民主制度當然尚有革新進步的餘地。我們絕不應該以爲蘇聯在本質上，他的民主是進步的，便以爲附屬於蘇聯民主制之上的一切東西都是好的。我們亦不應該以爲附屬於蘇聯的民主制度之上，有些東西在中國可以不要，便以爲蘇聯是個獨裁的政體了，甚至還沒有美國的民主政治好，這就未免不合事實了。我們今日中國所企圖實現的民主制度，無論是中山的三民主義也好，或是共黨的新民主主義也好，都在力取蘇聯之長而避其短。例如蘇聯是一黨政治，中國便沒有人主張一黨政治的。只要爲勞動者階級前途謀發展，一黨固好，兩黨更好。蘇聯在創造這種民主制度的時候，採了恐怖主義，在中國便沒有恐怖主義。假如我們說，蘇俄有秘密警察制度，我們嫌他不民主，那麼我們不要他就是了。我不知道，我們自己不要他，還有什麼人更要他。可是，假如我們因爲蘇聯的民主在枝節上有些缺點，我們便以爲蘇聯不是民主，甚至中國亦不要更進步的民主，而寧選擇只以擁護少數的資產階級的利益爲民主制度，這就未免過於感情用事了。這就好比，在五卅運動的當年，一般的老學究，因爲看見婚姻自由制度，在枝節上，有些弊害，便根本反對這種婚姻自由制度，而寧擁護不自由的婚姻制度是相同的。中山先生曾說，我們學外國須要迎頭趕上去學，不要只抓別人的尾巴，但可惜我們這些在象牙之塔裏面過慣書生生活的人，往往養成一種媚事特權階級的心裏，即凡是在朝的人物，他的行爲都是對的，在野的都是錯的。只要他在朝了，他便是對的。吳佩孚在野時不對，但在民國十一年把安福系推倒而後，他便對了，因爲他在朝了。孫中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期便是對的，可是在野便不對了。所以在民國十一年時候，吳佩孚一朝，便連孫中山先生的老朋友，吳稚暉和蔡元培也勸他退位了。段祺瑞在野時被痛罵爲北洋軍閥，可是在執政府時代便被一部份教授們，視爲「更始」的或革命的領袖了。這種傳統的，感情的，和媚上的心裏的存在，是使少數的知識份子謾罵進步的民主制度的原因。可是少數畢竟是少數，傳統畢竟是傳統，感情

畢竟是感情。過了一些時候，多數的、科學的、和理性的考察，必然還是要來奪取這個最後勝利的王冠的。但我却不願看我們的師友們不幸而變爲時代所遺棄的落伍者。

四、三民主義的實現者有兩種人；（一）就第一種人來說，他們取得收益的方法是勞力，或大半是勞力。從民生主義來說，他們不是民生主義的障礙物，如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從民族主義來說，他們不是民族主義的大敵，如軍閥、官僚、土豪。從民族主義來說，他們不是民族主義的敵人，如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或廣義的買辦。而且在他們之中，大半都是親身遭受大地主、大資本家、軍閥、官僚和土豪，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或買辦的剝削的，並且爲了打破鎖在中國人民頸上的枷鎖鏗鏘起見，不惜犧牲他們自己的性命的。（二）就第二種人來說，他們取得收益的方法是資本和土地，但不是勞力或小部份是勞力。從民生主義來說，他們直接構成民生主義革命運動的大障礙——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從民族主義來說，他們又是普通老百姓的敵人——軍閥、官僚、土豪。從民族主義來說，他們又是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廣義的買辦。而且，在他們之中，大部也都是刑事上的犯罪人，或大半均是以吮吸小民的骨髓、血液和脂膏以爲生，而且他們自己便是鎖在人民頸上的枷鎖鏗鏘，因此他們日夜所馨香禱祝的就是怎樣能夠撲滅或躲避三民主義的刀鋒。在這兩種人之中，我們必須加以決擇，看究竟誰是眞能實行三民主義的人物。

宣傳貞操主義的婦人有兩種，一種是買淫爲生的娼妓，一種是良家的婦女。在這兩類婦女之中，我們必須加以決擇，看誰是眞能實行貞操主義的。

五、在國際上的強鄰有兩個，一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他對我們有一個好處，可以供給我們的機器，可是他也有過壞處，即是他的工業品的輸入，便是我們幼稚工業的毀滅。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他有一個壞處，就是他沒有機器來供應我們的需要。但他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可告訴我們怎樣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發展我們的工業。在這兩個強鄰之中，我們必須決擇，我們對誰的友誼應是第一位。

我們的朋友有兩個：一個是大富翁，他可借給我們錢，但要我們給他作准奴隸。一個是小硬漢，他的腰包沒有錢而且脾氣很古怪，但他却把我們當做小弟弟。在這兩個朋友之中，誰個的友誼應當放在第一，這也須得我們去決擇。

三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於北平

朝鮮問題

郭森麒

一、背景——日本四十年來的統治

朝鮮北接我國的東北，東濱日本海，與日本本土相對，東北與蘇聯交界，極西即鴨綠江口的西端，又與我國毗鄰，因此她在戰略上具有極大的價值。過去，她會成爲中國，帝俄，和日本競爭角逐的中心地帶。在一八九四——五年中日戰爭和一九〇四——五年日俄戰爭中，日本還僞裝着爲朝鮮爭取獨立，至一九〇五年假面具揭開了，她在美英的默許下收朝鮮爲保護國。之後，朝鮮國內時常暴動，至一九一〇年日本索性正式把朝鮮劃入自己的版圖。

日本對朝鮮是用鐵的手腕來統治的，一切經濟設施無不爲自己打算。交通網的構成爲的是滿足日本自己戰略上的需要，礦產資源的開發爲的是孕育日本的戰時工業，農業上的改進也是爲了補助日本糧食的不足。

大凡帝國主義者統治弱小民族，總是要扶植一部分上層階級的勢力，而讓最廣大的民衆生活在飢餓綫上。日本對朝鮮的統治，也恰恰是這樣的。朝鮮土地分配的情形和中國極相似，土地幾乎都集中在少數地主的手裏，大多數農民天天在高利貸和高地租的壓迫下過生活。據估計：朝鮮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集中在百分之二的人口手裏，沒有田地的佃農至少佔人口的百分之五十。日本對於這種土地集中的現象不但不加阻止，反而予以鼓勵，因爲這樣才可以使朝鮮成爲日本糧食的供給地。在盟國勝利以前，朝鮮的米每年對日輸出數量總在四百萬担之譜，如果日本不把糧食控制在少數富有階級的手裏，那些直接生產者一定會把他們自己生產的糧食消費掉，那末日本所需要的糧食便無從供給了。朝鮮的大地主大半是日本人，朝鮮人也並不少，後者和日本人勾結，以便搜刮和控制廣大的農民。他們當然極端反對土地改革，不惜用種種手段來阻止土地改革的實施，這對於社會進步的確是一種阻礙，但對於兩年來美國的統治却增加了許多助力。

日本在朝鮮有一個半官營的企業機構，名叫「東方拓植會社」，擁有土地一三〇、〇〇〇町步（每町步約合二、四五英畝），幾個大紡織會社，幾個飛機裝置工廠，幾個糧食加工工廠，一個煤礦和漁場等，幾乎朝鮮一切經濟命脈都操在這個會社手裏。

在政治方面，日本用種種恐怖的手段來鎮壓民族獨立的思想與行動。自一九一〇年以後，朝鮮所有的政治團體都被解散，凡被認爲有危險思想者不是被暗殺，便是被監禁或放逐。在朝鮮總督之下，不但政府高級行政

官吏是日人，即重工業，金融機關，運輸交通部門，和國際貿易機構無一不控制在日人的手裏。

再看日本在教育文化上怎樣壓迫朝鮮人民：學制是由日人訂定的，她強迫講授某些課程，並規定如何教法。各級學校都要加強日文課程，倫理方面着重勤快，忍耐，服從，忠義的訓練。朝鮮人受過小學教育之後，只有極少數再進入中學和大學。以一九三七年爲例：朝鮮中學生僅有七萬人，其中日人便佔了半數，但日本居民僅佔朝鮮人口百分之三。朝鮮人民受教育的機會都被剝奪了，更談不上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雖然，朝鮮人民受了日本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種種的壓迫，但他們還是迫切期望着解放的一天！

二、雅爾達會議和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決定

勝利的來臨使朝鮮舉國歡騰，他們以爲從此可以享受獨立，自由和民主的果實了。可是，事實却使他們大失所望，自勝利到現在已經有兩個年頭，朝鮮大部分人民還在困苦和悲慘的環境中討生活。

本來，在開羅會議中，英美已經同意在相當時期予朝鮮獨立，不過開羅會議所決定的只是籠統的原則，對於朝鮮獨立的步驟並沒有加以詳細的規定，至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達會議時，蘇聯同意於對德戰爭結束後參加對日作戰，當經指定以朝鮮北部爲蘇聯作戰區，朝鮮南部爲美國作戰區，五個月之後，美蘇又在波茨坦會議中同意以北緯三十八度爲界，來劃分兩國的作戰區。隨後日本投降，又規定在這條界綫以北的日軍應向蘇聯投降，綫以南的日軍應向美國投降。這是純軍事性質的規定，本來不會成爲問題的，可是日後美蘇矛盾日深，這條界綫便成爲劃分南北朝鮮的一道鴻溝。在界綫以北，蘇聯保有豐富的礦產和水電（工業），在界綫以南，美國佔有肥沃的耕地（農業），但南北互不往來，使朝鮮經濟陷於癱瘓狀態。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外長會議決定朝鮮應由英美中蘇四國實行託管，託管期間約爲五年，在此期間應逐步把整個政府責任移交朝鮮人民。爲實行這種協定，當時在莫斯科有兩個決定：第一，美蘇同意在漢城召開軍事會議，討論有關兩佔領區的行政和經濟組織問題；第二，決定成立美蘇聯合委員會並與朝鮮各民主黨派及社會團體商榷，建議成立臨時民主朝鮮政府。而由美蘇予以協助使朝鮮成爲獨立國家。

如果這個計劃能按照真正民主的原則來執行，朝鮮不難翻身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可是，自羅斯福總統去世之後，美帝國主義者推行反蘇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政策，在遠東方面，扶植中國、日本和朝鮮，作為戰略的基地。

誠然，莫斯科會議之後，朝鮮南部各黨派對於英美中蘇四國實行託管制度都不贊成，但不久，比較進步的黨派便覺得：與其讓美蘇長期軍事佔領，把朝鮮割成兩半，倒不如接受託管的建議。但右翼份子如李承晚和他的黨羽們，對於有蘇聯參加的託管計劃加以嚴厲的抨擊，他們根本反對有左翼各黨各派的份子參加的聯合政府，右翼份子這種頑固的態度，使美蘇之間的裂痕日益加深，也使朝鮮距離獨立的日子日益遙遠了。

三、兩年來的政治

在美蘇還未佔領朝鮮之前，在重慶的朝鮮臨時政府會宣佈一個復興朝鮮的計劃，其要點如下：

(1) 日人在朝鮮所有財產一律沒收，撥歸政府所有。

(2) 朝鮮人民權益予以充分保障。

(3) 訂立一個計劃，把土地重新分配給耕種者。

朝鮮臨時政府的領袖離開祖國達二十年之久，對於朝鮮國內實際情況未免隔膜，故所擬計劃大多數朝鮮人都認為不足以應付朝鮮被日本長期壓迫後所面對的問題。因此朝鮮人民在停戰之後盟軍佔領之前，便在全國各地成立了人民委員會，由日人手中取得控制權，並以公平標準分配食糧，這些委員會的代表在漢城成立朝鮮人民共和國，並推舉被日本監禁一年的新聞記者劉文洪(Lyuh Woon Hyung)博士為領袖。這些委員會裏的人物大半都是人民所愛戴的，這個組織也是人民所一致擁護的，可是美軍佔領朝鮮南部之後，人民委員會的權力便被剝奪了，但人民對於它還是仰念的！去年美國佔領軍司令霍奇(John R. Hodge)為了攷驗人民的政治情緒，曾允許在南部某些城鎮舉行投票，每次投票的結果總是人民委員會的候選人獲得絕對優勢的勝利，以後美國軍政府便不敢再舉行投票了。

美軍政府取消了人民委員會的政權之後，霍奇司令便宣佈日本官吏暫時留用，他這道命令下了之後，遭到朝鮮人民的極力反對，結果軍政府反而授命日本警察，槍殺反抗命令的朝鮮人民。

日人遣送回國之後，美軍政府之下便成立一個顧問會議(Advisory Council)，內有議員十一人，這個美人一手包辦的會議，主席是金燕蘇(Kim Seung Soo)，他是朝鮮南部的大地主，在戰爭期中曾充當朝鮮中央會議(日本所設)的要角，又是朝鮮民主黨的黨魁，民主黨是由大地主和富商所組織的，後來他們重要黨員都當上了顧問會議的議員。此外，還有重

慶朝鮮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和久住華盛頓的政治陰謀家李承晚也參加在內。至一九四六年二月顧問會議改組為朝鮮民主代表會議(Korean Democratic Republic Council)，李承晚任正主席，金九為副主席。這個會議只有軍閥、政客、大地主，和富商們所組織的政黨，如朝鮮民主黨，朝鮮國民黨，和新朝鮮民族黨予以支持，其他所有自由份子都一致拒絕參加。這個會議既然是這樣不孚衆望，只好又加改組，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成立一個臨時立法會議，委員有九十人，其中半數由美軍政府指派，其餘半數由於選舉。這個立法會議是遵照美軍政府的訓示來起草憲法並籌組政府，並且軍政府有權隨時加以解散。換句話說，這個會議只是一個美國的傀儡政府。

在朝鮮南部的黨派中，除巧立名目，黨員稀少的右翼黨派外，所有進步的自由份子都聯合起來組織一個「民族的民主陣綫」，參加和同情民主陣綫的份子約佔朝鮮南部人口的四分之三，包括有人民黨，新朝鮮黨，共產黨，職工會，農民協會，青年，婦女，文化，和科學等團體。因為民族的民主陣綫已經在人民心目中建立了信仰，遂遭軍政府和右翼份子的妬忌和猜疑。他們的領袖們時常受到憲警的侮辱、逮捕和監禁。

美國佔領軍司令霍奇原是在琉球戰區作戰的軍官，後來才調到朝鮮來的，他既不懂政治，對於朝鮮問題更一無所知。他的左右手大都腐敗無能，他所親近的朝鮮人不是過去親日的地主官僚和政客，便是對於祖國非常隔膜的陰謀家，他的頑固獨裁的作風並不亞於當年的日本總督。凡是到過朝鮮南部的記者和政界人物(如Roger N. Baldwin, Ralph Izard, George M. McCune等)無不對於霍奇的作風加以嚴峻的批評，甚至軍政府中人對於他的處理都不能認為滿意(如在朝鮮美軍政府任職的Bert Han D. Savafan回國後便著文指責霍奇)，霍奇對於攻擊共產黨的人不管贖到什麼地步，都還是讓他們繼續擔任重要的職務，凡是批評軍政府的刊物不問情由，一律予以查封，人民如有遊行、結社、罷工等情事，軍政府也一概用高壓的手段予以解散、逮捕或槍殺。美帝國主義者這種殘暴的行爲比起日本的統治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難怪朝鮮最大的日報曾於去年八月卅一日撰寫社評，以「致霍奇將軍」為題，作了如下沉痛的控訴：

霍奇將軍，讓我們來看目前的情形。朝鮮人民今日所受的痛苦是在日本人統治下所從來沒有過的，我們不相信這種苦難完全由於政治的混亂和朝鮮人民的缺乏愛國心。

我們相信朝鮮軍政府的努力沒有成功，這失敗是由於貴國對於朝鮮缺乏理解，由於朝鮮人民行政組織缺乏力量，由於沒有任何準備而實施自由經濟，以及貴國政策的舉棋不定。

這種反對軍政府的控訴，都是事實而非誹謗，我們希望貴國將超過從前那樣而聽取朝鮮人民的輿論，和貴國在韓所採政策中將很快的和積極的反映這種

輿論。

這篇社論是代表朝鮮南部一千九百萬人民憤怒的呼聲，美國的佔領民衆是朝鮮人民所不堪忍受的，美國扶植了少數富有階級來對付廣大的人政，與日本的統治又有什麼兩樣？

在北韓方面，朝鮮人民所組織的人民委員會却被蘇聯所承認，並且蘇聯根本就沒有成立軍政府，政權是交給人民委員會的，蘇軍僅站在監督的地位。我們不管蘇軍究竟是否真正把政權交給朝鮮人民，但在人民委員會治理之下，人民普遍擁護政府，親日份子全部肅清，去年十一月三日會舉行普選，成立了代表性的立法機關，却是事實。

四、兩年來的經濟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朝鮮的礦產蘊藏多半都在北部，所以北部工業特別發達。南部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有肥沃的土地，豐富的農產品。可是，南部的土地都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尤以日本官方所組成的東方拓植會社所有的土地爲最多，美軍政府沒收該會社之後，便改組爲「新朝鮮公司」(New Korea Company)。該公司和東方拓植會社一樣的作爲搜刮人民生產物的工具。日本私人在朝鮮的土地計有四二四、〇〇〇町步，其中只有七一、〇〇〇町步在北部，三五三、〇〇〇町步都在南部，美軍沒收這些私人土地之後，並不是分配給農民，而是讓人民出錢來購買的。毫無疑問的，買得起土地的只有大地主，富商，和發戰爭幸運財的人，農民是不會有份兒的，因此土地更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了。

在朝鮮北部方面，蘇聯所沒收的土地一律分配給貧農，並不取代價，分配的數量是每人五町步，凡是沒有直接耕種土地的人一律不得享受分配的權利，不過凡是從事抗日的人員和家屬不但可以得到配給，並且有優先權。

近兩年朝鮮南部米的生產量很豐富，但米荒的嚴重却是二三十年來所僅見。造成米荒的原因是：大地主和富商的囤積居奇投機取巧，軍政府對於糧食的價格和分配始終是應用「自由貿易」的原則，毫沒有加以管制。在朝鮮北部，糧食根本就少，但並沒有鬧嚴重的米荒，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委員會分配得公平合理。

美國接收東方拓植會社的工廠貨棧商店和漁業公司，也是交給新朝鮮公司來經營，主持這些接收工廠的人起初都是親日份子，因此引起職工的反對，釀成罷工。南部的工業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煤荒，因爲南

部的煤大部分原由北部供給，而北部現則在另一單位內。

朝鮮北部工業生產的情形，據漢城大學教授李新猷氏去年致察的報告：大工廠已經全部開工，如薩方(Suphong)水電站，重蘇(Chungsoo)氮素化學工廠，平清(Puching)輕金屬工廠等的生產量已完全恢復。去年杜魯門總統也會派代表鮑萊前往正式調查，鮑萊發現在他調查的時候，鎮南浦的煤鐵鋼中心正大量從事和平工業的生產，平壤的十個工廠，咸興的九個工廠，和元山津七個工廠都恢復了全部的生產。前美國國務院朝鮮司長 George N. McCune 曾在今年三月號 Pacific Affairs 發表一文，也說明蘇聯在朝鮮北部並沒有像她在東北那樣的大規模搬走機器設備，蘇聯似乎正在竭力幫助朝鮮恢復工業。

至於朝鮮金融的情形，更可以反映一般經濟的狀況。朝鮮物資缺乏，物價上漲是無法避免的，還有一個使物價暴漲的原因：即是日本投降前一星期濫發鈔票，在這短短一星期中，朝鮮的鈔票由十五萬萬元增至八十五萬萬元。當時通貨膨脹的原因有三：(1)存戶向銀行大量提取現款，(2)因爲戰事情形惡劣，日人需要大批匯款，(3)大多數公司解散，分發股東紅利與職工獎金。不過，比較說來，南方的情形比北方嚴重得多，因爲：第一，北方有錢的人恐怕蘇聯沒收現款，乃將資金移往南部，第二，蘇聯在佔領區內發行軍事流通券，以代替流通的朝鮮銀行鈔票，這樣自然可以控制一部分軍事流通券的發行量。第三，南方還有一些趁火打劫的大地主和富商，他們趁物價陡漲的時候，好做囤積投機的勾當，這樣使一般老百姓所生活的壓迫更加嚴重，去年十月內所發生的社會政治大騷動，物價暴漲便是一個間接的原因。

五、漢城談判和朝鮮前途

按照莫斯科科外長會議的決定，組織美蘇聯合委員會，與朝鮮各民主黨派商權託管及成立臨時政府問題，這個聯合委員會在去年三月至五月間會舉行過會議，但因美蘇雙方意見分歧，結果不歡而散。

今年四月間馬歇爾會致函莫洛托夫表示希望重開停止一年的美蘇聯合委員會，五月間莫洛托夫覆文表示同意，會議於五月廿一日在漢城正式舉行，美國代表勃朗少將(Albert E. Brown)和蘇聯代表希鐵柯夫(T. F. Shchou)分別發表演說，都強調應根據莫斯科科外長會議，成立朝鮮臨時政府爲該委員會的初步工作，會議兩天之後便成立三個小組：一、研究與朝鮮政黨及社會團體諮詢的有關事項。二、處理與臨時政府機構及籌備憲法

政綱有關事項。三、辦理臨時政府人員獲得辦法及臨時政府接替朝鮮南北兩部現政府職責的計劃。

但是，美蘇雙方爭論的焦點都集中在第一小組所研討的與朝鮮政黨及社會團體商議的問題上。蘇方代表的主張大約有下列三點：

(1) 有一萬人以上之政黨或團體才有諮詢的資格。

(2) 朝鮮政黨黨員必須造具名冊。

(3) 凡反對莫斯科外長會議宣言及反託治的政黨或團體都沒有資格受諮詢。

蘇方代表這種主張被美方代表堅決反對。後者認為參加聯合委員會的政黨應包括所有僅千餘人的小政黨，且美方首席代表勃朗少將於上月九日發表聲明稱：「莫斯科決議係將朝鮮交四國託治，然韓人憂慮此種託治是否即為當初日本對朝鮮曾經實行之託治，此亦為人情之常。」（新亞社漢城八月九日電），上月十六日勃朗氏又對報界聲稱：「目前聯合委員會之陷入僵局，實由於蘇方堅持其主張，必須在第一小組委員會中製作政黨及社會團體名簿，此點頗似實行否決權。」（新亞社漢城八月十六日電）

美國為什麼要千餘人的小政黨參加諮詢？又要為反託治政黨辯護？蘇方代表建議製作政黨及社會團體名簿，美方為什麼要加以「實行否決權」的罪名？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朝鮮南部的政黨特多，北部的政黨很少。據統計：朝鮮南部政黨和社會團體有四二三個單位（南韓政黨會議出席代表人數），北部僅有三十八個單位。並且，在南部政黨中，進步民主的政黨數目不多，但直接參加和同情的份子約佔朝鮮南部人口的四分之三，而右翼反動份子所組織的政黨多半是黨員很少，巧立名目的。這些政黨大半是代表大地主，富商和政客們的利益的。反對託治最劇烈的也是他們，上月廿三日這些右翼份子曾在金九領導之下舉行反託治大遊行。他們根本就不希望有任何左翼份子參加政府，更不希望有蘇聯參加的託治。右翼領袖之一李承晚曾經說過：「若有共黨黨員數人參加，則此種雜碎政府將永不能成功」，又說：「余等僅能希望聯合委員會能獲致協議，但在協議中，即使百分之九十為美國要求，百分之十為蘇聯要求時，余等仍不能希望此種政府使朝鮮南部最後避免共產之控制」（見李氏六月十六日對漢城報界談話），李氏此種恐懼蘇聯的心理，也就是不願意有蘇聯參加的託治的主要原因。美國為了要支持朝鮮右翼份子的立場，便不惜採取違反莫斯科外長會議決議的態度。

同時，在漢城談判期中，美國又做了兩件值得我們重視的事情：(1)

魏德邁特使於上月廿七日在中國任務完畢之後，飛抵漢城，進行「事實調查」。在魏氏離美來華之初，即有合眾社記者推測，其目的在分析美蘇談判組織朝鮮臨時政府之僵局情形，以決定美國是否將在朝鮮南部單獨行動，如馬歇爾國務卿前在莫斯科外長會議時所已提出者（合眾社七月十一日華盛頓電）(2) 國會擬以二億元貸與朝鮮南部政府，以反抗共產主義的侵入，並壓迫蘇聯解決統一問題，並傳美國準備以五億元貸款在朝鮮實行一個三年計劃。

美國以上的措置當然使談判更陷僵局，我們看看美國自己究竟怎樣打開這個僵局：上月廿七日美國向蘇聯提出一個照會，建議中美英蘇四太平洋國家於九月八日在華府召開會議，共同解決美蘇間已成僵局的朝鮮問題，這個建議提出之後，華盛頓人士已認為：「美國放棄和蘇聯在朝鮮統一問題上謀取協議，而另主張四強會議討論該問題，實在只是趨向聯合國的另一步驟，因為美蘇兩國既不能獲致協議，則四強更不能獲致協議了」（華盛頓八月三十一日合眾電）。果然莫洛托夫於九月四日照會美國，認為美國這種建議殊屬不合時宜，也果如華盛頓人士所預料，美國在四強會議無望之餘，趨於聯合國的一途了。

聯合國只是美國的御用機構。如果美國就朝鮮問題有所建議，很可能提交大會討論，以造成對蘇的不利空氣。但如真欲解決朝鮮問題，必須以不違背下列原則為條件，否則徒使美蘇衝突更加尖銳，朝鮮統一愈見渺茫。

一、組織朝鮮政府必須根據民主的原則，不得讓大地主，富商和政客的集團來操縱朝鮮的政治。

二、不得利用經濟援助等手段，迫使朝鮮充當反對假想敵國的前哨。美蘇在朝鮮對峙的局面已經維持了兩年，在這兩年中美蘇雙方互相攻擊，演成目前劍拔弩張的形勢，朝鮮人民受了四十年日本壓迫的痛苦，勝利後又要在美蘇夾縫中過着悲慘的生活，為美蘇自己的安全計，固然須要打開僵局，站在朝鮮人民的立場說，更不容這種局面繼續維持。美國過去在佔領區內，一面扶植右翼反動集團，一面對於進步民主份子橫加迫害，已使朝鮮潛伏着嚴重的內戰危機，如目前僵局無法打開，不但要使美國「特製」的內戰烽火燃遍朝鮮的原野，也許還要充當遠東國際戰爭的戰場！

一九四七、九、十九。

關於「民主國際」的討論

吳世昌

觀察二卷二十一期刊載楊光時先生等十人投稿「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與對策」之後，八月一日，八日，十五日出版的時與文週刊接連發表四篇批評的文章，一卷九期的北平現代知識也載了一篇王和先生等十二人的批評。我在觀察二卷廿二期（七月二十六日）曾有一篇討論這一問題之文，題名為「論「民主國際」」，因此後出諸文亦以「民主國際」為主題。時與文各期之文，並多涉及拙文與觀察編者儲安平先生之處。在此局勢混亂，人心苦悶之際，有人提出意見，有人熱烈討論批評，不論是贊成或反對，我以為總是可喜之事，比較喊出來的聲音散入無何有之鄉，回答的是一片死寂總要好些。

我首先得說明我對於像楊先生這類文章的態度，我覺得現在不論國內國外的局勢，都是在一個混亂的時期。國人對於這個局勢的各種看法，在中國這個正在爭取言論自由的時期，都不妨提出來，供人批評，供人討論，該修正的修正，該補充的補充，該反對的自然也可反對。我是素來反對定思想於一尊的。前幾年有此現象，我會為此寫了一篇「思想復員論」，刊在三十四年十一月廿四日重慶出版的「客觀」第三期，後來聽說上海「週報」曾予轉載，想京滬一帶關心此類問題的朋友或已看到。我認爲此時言路不比彼時更寬，我當時的觀念並未大改變。如果此時就要把思想定於一尊，我想也許太早一點。觀察的傳

統既規定所發表的文字不一定爲編者所同意者，據我所知楊先生等投此文時，均用真實姓名，及住址，並非不負責任之作。編者在編輯後記中說到楊先生等十人的文章，祇說其若干觀點在國內外從沒有人提到過，希望引起廣泛注意，並未說同意楊先生等之觀點。若因此指此文爲代表觀察態度，並且涉及其基本撰稿人，那是莫須有的。若因一篇文章在主張言論自由的刊物上發表，而該文的觀點爲若干讀者所不滿，因此遷過編者，則編者受攻擊事小，而此後的言路必將更窄。

關於時與文各期批評楊先生等一文的意見，我不想多說，但有涉及拙文之處，則不可不辯。

事實上，最先批評楊文的是我那篇「論「民主國際」」。楊氏文中最招人攻擊的是主張由美國以經濟力量來援助其所希望成立的「民主國際」。尹其文先生所指斥的三點，其「第一媚外」「第三自利」兩點即指此事。我在「論「民主國際」」一文中對楊文主要的批評，即反對此事。我不僅反對美國以經濟力量援助所謂「民主國際」，我並且反對任何國家以經濟力量援助任何此類勢力。在要求中國人民的自力更生這一點上，和許多關於此一問題的論者並無差異，拙文也不應該引起關於此點的誤會。楊氏之文主要意思是希望國共以外的自由分子能起來阻止這可怕的內戰，如果他們不提出由美國經濟援助云云，則他所謂的自由主義者決不至被人指爲反動或假自由

主義者，並且有許多人會同意這樣的主張。

但是尹先生文中剩下的一點，即「第二恐共」，會引到拙文「現代國家的統治方式和力量，都轉變到經濟方面去了，主要目標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不論資本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的國家，或溫和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莫不如此。」但是尹先生却因爲「吳先生并未言明，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究竟要採取三種經濟制度中的那一種」，因此他說：「想必在他（指我）的心目中，最好莫過如美式自由經濟制度了」。美式自由經濟制度好不好是另一問題，但如果因我在「論「民主國際」」一文中「并未言明」採取三種中那一種制度，而「想必」我心目中如此想法，則是武斷的推論。事實正和這「想必」相反，我在七月五日出版的觀察二卷十九期「從北塔山事件說起」一文中，明明這樣的寫着：「中國今後經濟制度，仍不免走溫和的社會主義之路，此路亦即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之路，而不是資本主義之路」。批評一個人的思想，若只是拿一篇短文來斷章取義，是不但不公平，而且很危險的。因爲這樣，不但不能令受批評者心服，而且旁觀的讀者也不會認爲這是 Fair Play。

但我承認尹先生和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時與文中施復亮先生一文，是把這事當一個問題來討論，而不是像另一作者一樣，以誣蔑與謾罵來掩蓋其無理與發洩感情的。施先生行文尤其審慎。他

認為如果楊先生此文動機純潔，則「觀察發表這篇文章並沒有什麼不可以，也不會損及「儲先生個人和觀察週刊的地位和榮譽」（歐陽先生文中語）。「施先生又說：『我也認為儲與二先生附和楊先生等人的意見有欠斟酌。以一年來儲與二先生

生在「觀察」上所發表的主張和態度看來，至少不應該無條件地附和楊先生等人的主張。不過無論如何，直到今天為止，我們還不可把儲與兩先生的主張和態度，跟楊先生等人的主張和態度等量齊觀。』儲先生對於楊文的態度以下再說，我在「論「民主國際」」一文中既已反對楊先生等主張由美國以經濟力量援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似不能再被認為「無條件地附和楊先生等人的主張。』如果施先生認為我反對「美國以經濟力量援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僅是「作了若干「次要」」（引號是我加的——作者）的補充和修正，那是各人看法的不同。

希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能起來，以阻止這漫無止境的戰爭，這是國內大多數人士的主張。自由主義者之沒有力量是由於無組織，也是大家承認的事實。國際間美蘇兩大集團的對立，為國際間愛好和平的人士所憂慮，也是衆所周知的事實。聯合國組織之為權力政治家所御用，弄得生氣奄奄，似乎也不可否認。如果說這是一個人民的世紀，則人民的隊伍中決無權力政治家。希望權力政治家來奠定世界永久和平，雖非不可能，究不如由各國人民自己來擔當這個責任較為有保障。有這麼一個觀念，應該採取何種方式，一個自由主義者以爲不妨提出來共同討論。用什麼名稱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在不要希望甲國幫助乙國

人民，以致自入圈套，結果依然為權力政治家所利用，反而增加其勢力，爲求自由而失去更多的自由。我論「民主國際」而反對由美援支持，其意義如此。

在八月八日時與文上有一位不署姓的，自謙爲「不敏」的「作者」，則運用其春秋之筆，指斥楊光時等爲「假自由主義者」，想「賣國獨佔」，其文爲「鄉愿作品」（這個引號是原有的）。並且深入楊光時等之動機，由楊等文中不言「特務」與「集中營」而判斷其屬於「那一系反動派的幫凶」，說楊等「不打自招」，而予以「誅心」。並且開宗明義就「坦白承認」：「如果我在下文將對楊光時等人的主張與態度表示鄙棄與厭惡，也就等於對儲安平與吳世昌的主張與態度表示鄙棄與厭惡。」楊等短短二千字的文章，竟有「賣國獨佔」的效力，則楊等決不是反動派，簡直被那位作者捧成張天師了。因此，在我受到具有這樣的「主張與態度」的作者之連帶的「鄙棄與厭惡」，我也覺得不以爲奇了。時與文的編者能發表這樣的文章，我只有欽佩他的雅量，別無話說。

老實說，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背負着四千年「精神文明」的十字架，面對着漫無止境的戰亂，外有權力政治，內受經濟壓迫，共患難的是國內大多數貧苦無告的文盲，在此時而欲對當前局勢有所主張，他們所能走的道路是窄狹的，艱苦的。他們的心情是孤臣孽子的心情，「自由主義者」在今日並不是一個美名，連他們能看向前途的光明都成問題，今後甚至可能將被各方面「圍剿」，可能成爲天下之大不韙，自由主義

者本身已不可貴，這年頭真自由主義者都未必有人願意做，還有人願意做「僞自由主義者」麼？而真正反動派的幫凶，是連真自由主義者都不屑做，也不必做的，還會盜竊這樣一個不美之名，以充僞自由主義者而招人攻擊麼？

至於觀察的編者儲安平先生，他發表並介紹了楊光時先生等人的文章，但也並不即是同意或附和。他曾和我討論過這問題，第一、他認爲楊文中所謂「普遍內戰」一語有語病，因爲我們不能想像像英、美、蘇一類國家也會有內戰。他不同意楊文中說「普遍內戰」是由蘇聯造成的。（我在拙文中也說：「我們並不以爲一切國家的內戰均爲蘇聯所策動或支持」。所以某君提出「印尼」「越南」等戰爭例子來駁我（其實這些戰爭並不是內戰），成爲無的放矢。我也說：「雖然如有這種蔓延（指內戰），美國的政策也要平分一半責任」。其次，儲先生認爲個人信仰或反對共產主義是個人的自由，但爲全世界謀和平着想，則國際間應從合作出發，不應從敵視出發。至於要在美國的「經濟支持」下來從事中國的爭取民主運動，他也和我一樣，絕不同意。

他個人的意見如此，但他之所以仍願發表楊先生等此文，因爲創辦觀察的目的本來是希望供給各方面（不是一方面）發表意見，不論作者與編者是否相識，意見是否相同，只要文章有重量，代表一種看法，用真姓名，他就願意發表。他認爲楊先生等這文是一篇重要文章（重要與是非是兩件事）。楊先生等論第三次大戰的特點——內戰蔓延成一片，確爲國內外無人說過。足見他們嚴肅地在用思想，這種精神是應該予以鼓勵的。

上述儲先生關於此一問題的意見，是他最近來信和我講起的。

末了，我要說明我與楊光時先生至今並未認識。我於七月八日抵滬，九日備安平先生出示該文，十六日儲先生赴平，觀察廿二期起，由我代編。楊文發表後，我會接獲讀者投書贊成楊文的二封，反對的一封，我發表了台北萬家保君的一封措辭尖刻的反對的信（廿三期三十四頁），楊先生會至觀察社訪我，我不住在那裏，他沒有找到，又來一個電話，我又沒接，來信要我約定時間，我不知他的電話號數，又把他的通訊處忘了，沒有能覆他。他最後來信對我表示不滿，我覺對他十分抱歉，但我已經要回南京了。據觀察社的一位職員說，楊先生看來像一個中學生，可知他是一個青年。對於一些青年在大局苦悶的時候，負責表示一點意見，如果有錯誤，加以批評是可以的。但竟有操觚的論客，忍心說這些青年「無恥」「賣國」，那篇文章可值美金多少元云云，我想這不是言論界的好現象。上海灘上的黃色小報可以捕風捉影造些謠言來兜生意，對於一個認真地討論問題的刊物如時與文，我希望在審定稿子時還要鄭重一些。

（編者附言）「時與文」希望真能「供給各方面發表意見」，前此曾登載好幾篇討論「民主國際」的文章，現在吳先生來稿為己為人而申辯，我們也願意它有公諸讀者的機會。吳先生文中指責「時與文」編者的「雅量」，並「希望在審定稿子時還要鄭重一些」，盛意可感。不過，既然如吳先生所知、所言、和所主張的：作者的論見「并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而編者又不應「統制言論」（見吳著「言論自由的自律」，載「觀察」二卷二十一期），某文的「觀點為若干讀者所不滿，因此通過編者，則編者受攻擊事小，而此後的言路必將更窄」。如果作編者的「雅量」小一點，更「鄭重一些」，則楊光時先生等的大文根本就登不出來，而「操觚的論客」便無所施其技了。

白露給山城帶來了薄霧，秋老虎仍逞着雄威，生活在內戰重壓，經濟蕭條和社會腐敗下的山民，心裏也蒙上了一層秋霧。先說教育。在重慶各中小學的招生戰中，騙局是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如中正高級會計職業學校早已自行停辦，近忽有人頂着招牌亦在街上貼起招生廣告來，結果被騙的學生達數十人。八月廿七日日本中央日報載有這樣一則消息：教師節（亦即孔子誕辰）教育局致函社會局請轉飭各影院放映教師節的宣傳標語，但社會局對該局所函寄之標語內容多有「不解」，故未轉飭放映，內有尤為「不解」者一條，乃「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山城秋色

一瘦黃

。這真是古香古色。本市的各中小學，大部份都已開學上課，但在國民經濟貧弱的現況下，未入校的學生平均竟至百分之卅強，南岸有一兩所中學，至今學生入校者只數十人到百餘人，請假信，休學函，使校長們很傷腦筋，收費不多，學校又如何維持，校長們都在這樣的嘆息着。

再說商場。由於購買力的普遍低落，商店門可羅雀，去歲獨步山城的合眾公司，在今年異軍突起的西大公司競爭之下，已於八月底悄悄地關門大吉了（當然還有別的原因）。日本貨物的來華，也叫商人感到不安，拿着現鈔的不敢收貨，存着貨物的又無法拋售。日貨的來華雖對我國的民族工業是不小的打擊，但有一部份投機家却認為是賺錢的好機會。邇來此地便有日本貨物出現，它們改換了中國製美國製的牌子在市場銷售（據云布疋已有日本牌號玻璃紗等，概是走私運此）。最明目張胆的，要算打銅街某商號高懸掛的「日本臭蟲藥」來渝的招牌了。再次說到差運。為着配合「總動員戡亂法令」，各輪船公司的船隻被政府徵調者頗多，如民生公司之民貴，民憲，民聯，民風，民萬等九艘，強華公司之華源等輪，其中一部份調駛江津一帶載運新兵至漢口，原先所賣

出之客票與所裝運之貨物均被追臨時退還或卸下。據民生公司稱：九隻船應差之全部損失，約四十二億餘元。九月二日華××號登陸艇載運大批軍火東下，青年軍二〇三師近亦有東下之說，內有不願東下「剿匪」之青年學生，多有乘機脫逃者，但被該師稽查隊抓回者亦復不少。幾日來，從綦江開來的胸前佩有「新豐」的軍隊，像螞蟻一般擁擠在南岸，使人們覺察到：內戰又緊張了。最後談談煙毒。八月廿九日，正當行轅舉行轄區禁煙會議之時，本市出現了一張一羣內幕人散發的快郵代電，它是秘密的寄發至各機關團體，街頭上是看不見的。該電說：渝市一百廿多萬人口中，煙民約佔廿萬，大小煙館，唆唆攤攤，無水站，嗎啡所，不下三四千家（平均每保煙館約十五家），今平均以每人日吸三四兩計（十兩鴉片製嗎啡或唆唆一兩，假如吸唆唆二分，則等於吸鴉片二錢，凡上癮者，必日吸二錢）則全市每日銷耗煙土為四萬兩，若以目前每兩廿萬之價格計之，則每日所消耗之款為八十億元，其數目至為可驚。又市內最著名之毒區，厥為朝天門，通遠門，菜園壩，江北，南岸，彈子石，化龍橋，磁器口，海棠溪，龍門浩等地（已佈

遍了全市——筆者）渝市為全國著名之煙毒出納總口，蓋雲，貴，川，康之煙毒，咸以此為集散之樞紐，而各幫之最著名者，有敘（宜賓）（瀘州）幫，昆明幫，重慶幫，貴陽幫，湖北幫，上海幫等，其中最兇惡者，厥為昆明幫，其毒物之轉運，皆以強大武力為之保護，如有欲謀之者，必與之決死戰，本市之全權包庇者為××，而執行此項任務者，為××××處偵緝隊員，其包庇之法有五：一，驚雷法（即捕小體大之法）。二，善肥法（即待該煙販生意興隆變成巨富後，捕而拘之，以待包庇）。三，相機法（利用煙民本身之衝突相機而捕之）。四，神鬼不驚法（又名密告法）。五，先審法等。這些奇怪嚇人的辦法同數目，我們能不咋舌，結果，風是吹了，浪却沒有，只×局長在市參會議上，報告了一遍數目字，與實施禁政的工作情形，而行轅的禁煙會議也在八月卅日分組討論並擬訂禁政實施具體辦法後閉幕了。（卅六、九、十寄自重慶）

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歷史的經濟的解釋）之三

一

對官僚政治概念，有了一般的說明；對世界各國的官僚政治，分別作了一個輪廓的介紹，現在再來討論中國官僚政治本身，那無疑是有許多方便的。但方便的地方，是就一般範疇立論，即就中國官僚體制，與一般典型官僚體制的共同點立論，然而把中國官僚政治當作一個對象來研究，我們所當特別重視的，毋寧是在它的特殊方面，即它對一般表示差別的面。

中國官僚政治，也正如同世界其他各國的官僚政治一樣，是一個歷史的現象。由它的發生形態，到形成爲一個完整的體制，以至在現代的變形，其間經過了種種變化，我們要指出它的特點，至少應就過去官僚政治與現代官僚政治兩方面來說。但如我們要在後面指明的，中國現代官僚政治，雖然大體照應着中國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形質上的改變，從國外，到近更從德美諸國新官僚體制中，吸入了一些新的成分，把原來的傳統形態複雜化了，但原來的傳統形態並不會因此被否定或代置，反之，我們甚且可以說，那是原來官僚政治形態在現代的變本加厲或強化。因此，在研究的程序上，我們須得從中國古典官僚政治形態的諸特殊表象講起。那些特殊表象，分別體現在它的以次三種性格中：

（一）延續性——那是指着中國官僚政治延續期間的悠久。它幾乎悠久到同中國文化史相始終。

（二）包容性——那是指着中國官僚政治所包攝範圍的廣闊，即官僚政治的活動，同中國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如倫理、宗教、法律、財產、藝術……等方面，發生了異常密切而協調的關係。

（三）貫徹性——那是指着中國官僚政治的支配的深入的影響；中國人的思想活動乃至他們的整個人生觀，都拘囚錮蔽在官僚政治所設定的樊

籠中。

這是我們要分別在下面予以詳細說明的。

二

關於中國古典官僚政治的延續性問題，最先需要論究到它發生或形成過程的起點。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到，官僚政治是當作專制政體的一種配合物或補充物而產生的，專制政體不存在，當作一種社會體制看的官僚政治也無法存在。在這點上，中國官僚政治並非例外。因此，我們要探究中國官僚政治形成的起點，似乎就只要問到中國專制政體是何時才開始的就行。新舊歷史學家社會史學家已公認秦代是中國專制政體發軔的朝代。而由秦以後，直到現代化開始的清代，其間經歷二千餘年的長期歲月，除了極少的場合外，中國的政治形態，並沒有了不起的變更，換言之，即一直是受着專制政體——官僚政治的支配。譚復生所謂「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之政，如何皆是「大盜」，這裏且不忙分釋，「二千年之政」，皆治襲秦代專制政治而來，却是一個事實。而較近在蘇聯以「中國通」見稱的社會經濟史學者 Wittfogel，論到中國中古歷史階段時，特別強調「二千年官吏與農民的國家」這句話（參見氏著「中國經濟史研究」橫川次郎編譯本第五四頁），那也不外表示，那個歷史階段，是由官吏支配農民，是施行官僚政治。而在這以前，雖然設官而治的事實，早經存在着，但那時的政治支配者主要是貴族，即在春秋之世，國君「爲天子之同姓者十之六，天子之勳戚者十之三，前代之遺留者十之一。國中之卿大夫皆公族也，皆世官也」（見夏佑會著「中國古代史」第一八三頁），他們享有世祿，由是爲他們所支配的生產人民，就不得爲形式上的自由農民，而只是農奴。不過到了戰國之世，一切改觀了；在諸侯相互長期戰爭過程中，

封建貴族的政治支配權，逐漸轉移到封建官僚手中了。中國歷史載籍是用「政逮於大夫」，「陪官執國命」，「布衣爲卿相」一類籠統文句來描述此種轉變，而「傍觀者清」的外國社會史學者却是這樣說的：「戰國封建的混戰，把寄居在封建制度巢穴中的封建官僚養大了，並且開始把他們抬舉到社會塔的上層來。封建官僚起初不過是封建貴族技術上的助手。它幫助封建貴族剝削農奴式的農民，組織封建榨取農民血汗的機關，並使這機關鞏固和成爲合法的形式。但封建的混戰，却直接動搖了整個社會制度，削弱了和抹殺了舊有的階段劃分，並且在新的調子上來重新劃分階段。封建上層階級社會地位之一的不穩固，是愈來愈加厲害，而且常使封建諸侯依靠官僚。封建諸侯爲着爭霸權爭統治而成的不絕戰爭自身，更造出一種對「專門人才」之急切需要，如軍事專門人才，外交專門人才，封建榨取機關的專門人才——如收斂賦稅和剝削土地的和森林的財富等等……封建的混戰，培養了封建官僚……」(Saharov 著「中國社會發展史」李譯本第六四——五頁)，而這培養起來的封建官僚，不但成了專制政體實行的準備條件，且還在某種程度，成了專制政體實現的推動力，如史載「繆公求士……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民以殷盛，國以富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史記」李斯傳)。

秦得「策士」「處士」或封建官僚之助，而成就一統大業，而實現專制的官僚的政治局面以後，其他繼起各朝代的開基創業，雖同樣要取得它前一朝代末期的士大夫或失意的政客和策士們的匡助，但其間有一根本不同之點，即秦代的官僚政客是在封建貴族政治崩潰過程中養成的，而秦後各朝代的官僚政客，則都是在官僚政治局面下養成的。二千年的歷史，一方面表現爲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時又表現爲各王朝專制君主，通過他們各別文武官吏，對農民施行剝削榨取的支配權力的轉移。王朝的不絕再生產，再配合以官僚統治的不絕再生產；同式政治形態的重覆，在有的歷史學家看來是「循環」(如日本秋澤修二之流的中國歷史循環說)，而在其他更深刻的歷史學家看來則是「沒有時間」，「沒有歷史」(如 Hegel 稱中國爲「空間的國家」)。但中國官僚政治延續了二千年却是一個事實。它的這種延續性，或者它其所以能延續得這麼長久的道理，我們

將在後面講出它的更基本的原由來，而下面緊接着要說到的它的其他兩種特性——包容性和貫激性，也許可以看爲是一部分的說明，雖然它們那種特性的形成，同時也可說是由於它延續得比較長久的原故。

三

中國官僚政治的包容性，那當然也是把它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類同政治形態相比較而表現出來的。每一個社會，同時存在有各種各色的社會文化現象和制度。而在任何階級社會裏面，政治現象或其體制，往往總容易而且必然會變得突出，這是舊歷史學家們慣把政治史來代表人類文化史的一大原因，但政治現象或政治體制雖然比較突出而顯得重要，它並不能無視其他社會現象和制度的作用；大約一種政治制度如其對於環繞着它的其他社會體制不能適應，不能協調，它就會立即顯出孤立無助的窄狹性來，反之，如其它能適應，能運用同時並存的其他社會文化現象，並且在各方面造出與它相配合的社會體制來，它的作用和影響，就將視其包容性而相應增大。與外國官僚政治相較量，中國官僚政治之所以能顯出包容的特性，就因中國官僚政治在較長期的發展過程上，漸逐發現了並在某種限度創出了配合它的其他社會現象和體制。我們沒有充分篇幅，把這點在這裏詳細解述，姑從以次幾方面予以較論：

首先，中國以父家長爲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組織，雖然是在專制的——官僚的政體實現以後更加強化了，但在這以前，却顯然存在着這樣一個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傳統。國與家是相通的，君權與父權是相互爲用的。而在歐洲，特別是在早前的羅馬社會，個人在家族中的地位，是早經相當確定了的。歐美歷史學者認定東方的專制統治，不適用於西方人的氣質，也許這是一部分理由，這就至少要使官僚政治在這一方面的作用和影響，受到限制。

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關聯着的。人民對於法的認識，法的習慣，有了素養；對於權利義務的相對關係，有了一些明確概念，那對於任意蹂躪人權，任意剝削榨取人民的專制官僚政體，就將成爲一個阻礙。「西方社會的特點，是常常有爲種種目的而存在的許多團體，有時經國家明白承認，有時則否，但是它們全體構成個人間的許多社會關係。就大小說

，這種種關係常比現代國家的公民權所含有的關係，在個人生活內，佔有大得多的地位」(Krische著「現代國家觀念」王譯本英譯者序第二九頁)。因此，就在專制時代，國王對於被看為地方習慣法的私法，「實際上只不過行使極少的立法權」(同上第九頁)。而在中國，一般的社會秩序，不是靠法來維持，而是靠宗法，靠綱常，靠下層對上層的絕對服從；於是「人治」與「禮治」，便被宣揚來代替「法治」。這顯然是專制——官僚政治實行的結果，但同時却又成爲官僚政治得擴大其作用，加強其活動範圍的原因。

又其次，我們得講到比較狹義上的諸文化事象，如學術，思想，教育等等。歐洲在專制官僚政治的歷史階段，曾經發生過兩大運動，其一是啓蒙運動，又其一是加爾文主義運動；這兩種運動，就它們反封建的立場說，雖然有某些場合是站在專制官僚統治方面，但它們在大體上，却是主張自由，強調人權，反對專制主義，反對官僚政治的。換言之，即歐洲專制時代的學術、思想與教育，並不像它們以前在所謂政教統治(Hierarchy)時代那樣與政治結合在一起。反之，在中國整個長期專制時代却不同，中國文化中的這每一個因素，好像是專門爲了專制官僚統治「特製」的一樣，在幾千年中，彷彿都與專制官僚政治達到了水乳交融的調和程度。所謂「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學，荀學也」(譚復生語)，無非謂學術與政治的統一。「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龔定盦語)。學術、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變爲政治的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滲透力，就會達到政治本身活動所不能達到的一切領域了。

要之，中國的家族制度，社會風習，與教育思想活動等等，在某種限度內，雖爲官僚政治施行的結果。但却又成爲官僚政治的推動力，它們不但從外部給予官僚政治以有利的影響，甚且變爲官僚制度內部的一種機能，一種配合物。

四

惟其中國專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動員了或利用了各種社會文化的因素，以擴大其影響，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貫徹的作用，就逐漸把它自己造成爲一種思想生活上的天羅地網，使全體生息在這種政治局面下的官吏

與人民，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覺的把這種政治形態看爲最自然最合理的。在一般無知無識的人民固不必說，就是自認爲窮則「寓治於教」，達則「寓教於治」的士大夫階層，歷來就很少有人想到這種政治形態以外去。他們像從來沒有什麼政治理想，如其說有，那也不是屬於本來的，而是屬於過去的。「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以至「協和萬邦」的空洞詞句，被翻譯增飾爲「修」「齊」「治」「平」的大道理；唐虞三代的「無中生有」的「盛世」，變爲「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大口實。而由「明君、賢臣、順民」結合成的政治理想圖案，始終在被宣揚着，漠然的憧憬着，但又似乎從未好好實現過。所以，我們現代很自負的歷史學家如錢穆一流人物，就說：「因爲中國在先秦時候，孔子他們這一般聖賢，都已經將那些人生理想講得很高深，以後實在很難超越。問題並不在再講這些問題，而如何在去做這些問題。漢唐人能够依着先秦這個理想逐漸作去，實在是了不得。中國的理想本來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過他，這不能因此反罵中國人不長進……在這裏，我可以大膽說一句，今後中國的政治社會，恐怕還依然會逃不掉漢唐的大規模，政治的一統，社會的平等，此下仍不能超過。這就是說，我們固有的崇高的理想，到現在還未十分達到，將來還要這樣做去」(見錢穆「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一文)。我不想在這裏批評這種高論，但我得指出：(一)這是典型的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政治思想的結晶；(二)這是中國官僚政治支配下的必然產物；(三)這說明中國士大夫輩對於專制的官僚的統治(注意：錢穆根本就不承認中國秦漢以後的政治是專制政治，以後還有講到的機會)中毒之深，所以「陷溺」於其中而不能自拔。

顯然的，這樣好的政治理想或政治形態，應當只有站在統治地位或站在幫忙統治階級的人，才特別欣賞，而處在被統治地位的一般人民，該是如何想法呢？我們固有的文化理想，政治理想，由聖賢講得那樣「高深」，下民如何體會得到；那樣「崇高」，下民且無體會必要。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立教，又成爲那種政治理想實現的補充物。俄皇卡薩林(Catherine the Great)是中國武則天一流的人物，她頗懂得孔子的那種教義，一次對莫斯科的總督說：「當我們的農民要教育的日子到來時，你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參見Spang「世界文化史」沈譯本下

卷第四六——七頁)。中國士大夫階層過去也許有不少的人能理解到這個道理，但他們却總不大肯把這秘密揭露出來。一般人民特別是一般農民沒有受教育，或者又受到統治者爲他們編製配合好的一套有利於統治的教育，他們的政治期待，就是沿着「賢人政治」或西人所謂「聖賢統治」(Herrschaft der Besten)——德國崇拜中國政治理想的學者 Leibniz 會這樣稱謂)的線索，希望出現「真明天子」，「太平宰相」，「清天太爺」；如其現實往往總是給他們那種期待以無情的反撥，那除了嚴刑峻法會教他們恭順外，還有網常教化以及其他與「治道」攸關的各種社會制度習慣，乃至命運哲學，都可以緩和他們的反抗情緒。結局，「明君賢臣」的政治場面，固然要「順民」維持，而「暴君污吏」的政治場面，尤須「順民」忍耐。中國政治自來就不許讓人民具有何等基本權利觀念，所以，任何基本權利被剝奪被蹂躪，他們很少在法的範圍內去致慮是非，至多只在倫理的範圍去分別善惡；事實上，即使是在倫理認識內，他們也並不能把善惡辨得明白，因爲讀書有權利做官，做官有權利發財，做官發財都由命定這一類想法，是不許他們有澈底的道德評判的。

不僅如此，社會心理的科學告訴我們，同一社會事象的反覆，會使我們的反應，牢固的變成我們的第二天性。在專制官僚政治下，統治階級的優越感和一般貧苦大眾的低賤感，是分別由一些社會條件在把它們支持着，強化着。有時「布衣可以爲卿相」，卿相亦可以變爲布衣的事例，並不會把官吏與農民間的社會鴻溝移去。而長期的「從古如斯」的政治場面，使統治者被統治者不期然而然的把既成社會事象(不論它是如何不平，如何不合理，如何爲稍有現代政治意識與人類同情心的人所不忍聞，不忍見)視爲當然，並看得非常自然。

懂得了這些道理，才會明白歐洲人的氣質，爲什麼不適宜於專制主義政治，而我們中國人的氣質，又爲什麼像是特別適宜於專制主義政治。

然而，對專制主義官僚主義中毒最深的，畢竟還是一般立在封建專制統治地位或爲那種統治幫忙幫閑的官僚士大夫階層。因爲成見與利害關係結合起來，才能變得最頑固，最不易改變。當中國農民大眾不止一次的表示他們不能再忍受橫暴壓迫，而奮起自救，並引起全國騷動的時候，士大

夫階層往往總是利用機會，幫助野心家向民衆提出許多諾言，收拾殘局，重整山河；儘管新的專制王朝出現，新的官僚系統登場，而舊的政治形態却又復活了。

政治上的實利主義與歷史惰性，錮蔽了他們，使他們不能相信在固有的社會政治形態以外，還有什麼理想。

五

可是，中國官僚政治所表現的上述諸般特殊性格，並不能從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得到說明。長期的專制官僚統治，無疑大有造於那種政治的支配者，使他們有時間有機會把社會一切可資利用的力量，動員或收編起來；把一切「有礙治化」的因素，逐漸設法排除出去。「道一風同」的局面一經造成，治化上顯出的貫徹作用，也就既深且大了。反過來講，這些又是官僚統治得以長久維持的原因。

一切因果循環論，是會失之表象的。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究到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本刊啓事

- 一、本刊即將於第二卷第五期(十月十日)起，調整價格。零售每冊五千元，訂閱三月：平寄五萬元，掛號六萬元，航空五萬八千元，航掛六萬七千元，半年、全年類推。
- 二、爲優待訂戶凡在十月十日前訂閱本刊，概照原訂價：(三個月平寄三萬元，掛號四萬元，航空三萬八千元，航掛四萬七千元，半年、全年類推)計算。外埠訂閱郵費爲憑。
- 三、訂閱期間，零售價格調整，訂戶不受影響，郵費加價，另函通知。
- 四、讀者訂閱務請隨足訂費，(大額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指定寄法，空郵恕不答覆。
- 五、匯寄訂費，收款人務請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周折。

「爭取學術獨立十年計劃」的論戰（特約北平通訊）

趙鎮乾

胡適之放「砲」

北大校長胡適博士於九月七日發表了他對蔣主席張羣院長談論過的教育十年計劃，他認為這是一條爭取學術獨立之路，其原文如次：

「今年政府官費派送留學生達二百餘人，自費一千二百人，另有考官費未取之留學生，而成績尚屬優異，特許自費留學者五六百人之間，總計留學生二千餘人。每人需外匯二千美金，計四百萬元。這些錢如果分配予幾所好學校，豈不可以做許多事，比如今年北大以五千人之美金，僅分配一萬五千美金，根據上述情形，即等於不承認自己學術獨立，許多錢用在送許多學生錢金之用。」

「學術獨立不是件難事，從前美國哈佛耶魯等大學，得到博士學位還認為學得不夠，到歐洲留學，就學牛津、劍橋、巴黎、柏林等大學，作專門研究，但後來美國終在四十年中，作到第一步獨立的地位，第二步現在已為學術領導地位。」

「中國現在專科以上的院校一百四十餘所，形成『大家喝粥飯』的辦法，如此下去，一千年也走不上學術獨立的路。以日本為例，明治維新以後，僅全力舉辦兩所國家大學，其成績已斐然於世界，最近十餘年才添了九州、漢城、台灣幾個國立大學。此足為我國取法。」

「我國以十年為期，政府應不吝氣規定：第一個五年，特別以全力幫助五個大學，即北大、清華、浙大、武大、中大，限期成為國內最好的大學，成為世界有地位的大學。第二個五年，再加上五所大學，十年中獨立的學術常可造成，至少世界上應承認五所或十所大學的學位，比別國二等三等四等甚至五等大學的學位有價值。當然十年中不是完全不顧及其他院校，政府却須偏重十年計劃中的大學。」

上面這一段話，牽連到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取消留學生的派遣，一是政府在五年內特別培植五所大學。胡氏自認為他放了「一砲」，但許多辦大學教育的人覺得以胡氏的地位而又與蔣主席張羣院長兩次談及，這計劃很有實現的可能。就原則上說，既為爭取學術獨立，當無可辯護之處；惟爭取的路線就見仁見智，意見紛歧。

大公報曾加轉載——編者，他也反對「政府近年來的大量創辦專門以上的學校，而不注意到質的問題」。不過認為胡氏所指定的五所大學沒有根據，只憑「一點偏私」，將會引起不公平的結果。這一點，有人說陳先生巧妙地替南開說話。但陳氏最大的貢獻還是在留學政策的必須保留；（一）、「四百萬美金的留學費，比政府每年無益的浪費，真是微乎其微」。 （二）、「在抗戰以前，我們的學術水準已是很低，而大學設備也是很差。經過八年的抗戰，再經過兩年來的紛亂，其水準之低，與設備之差，更不待言。國家專門人才的需要，大學師資來源的枯竭，若說不靠留學而只有金錢即可以很短的時期就能解決，那又未免把這事看得太容易了。」於是他嚴厲地下一批評：

「我們贊成胡先生提議充實我們大學的圖書儀器，但我們反對他提議以留學的經費去作這件事，因為這是兩件功用不同的事情。在一個相當的時期裏，充實國內大學的設備固是很重要，而出洋留學尤宜注意。我們不要忘記世界學術尤其是自然科學日新月異。若說我們只靠買大量圖書與最新儀器，就可以趕上人家，那是一個最大的錯誤。這是八十年前曾國藩的思想，還跟不上五十年前張之洞的留西洋不如留東洋的淺見。」

「我們贊成胡先生提議充實我們大學的圖書儀器，但我們反對他提議以留學的經費去作這件事，因為這是兩件功用不同的事情。在一個相當的時期裏，充實國內大學的設備固是很重要，而出洋留學尤宜注意。我們不要忘記世界學術尤其是自然科學日新月異。若說我們只靠買大量圖書與最新儀器，就可以趕上人家，那是一個最大的錯誤。這是八十年前曾國藩的思想，還跟不上五十年前張之洞的留西洋不如留東洋的淺見。」

「我們贊成胡先生提議充實我們大學的圖書儀器，但我們反對他提議以留學的經費去作這件事，因為這是兩件功用不同的事情。在一個相當的時期裏，充實國內大學的設備固是很重要，而出洋留學尤宜注意。我們不要忘記世界學術尤其是自然科學日新月異。若說我們只靠買大量圖書與最新儀器，就可以趕上人家，那是一個最大的錯誤。這是八十年前曾國藩的思想，還跟不上五十年前張之洞的留西洋不如留東洋的淺見。」

「我們贊成胡先生提議充實我們大學的圖書儀器，但我們反對他提議以留學的經費去作這件事，因為這是兩件功用不同的事情。在一個相當的時期裏，充實國內大學的設備固是很重要，而出洋留學尤宜注意。我們不要忘記世界學術尤其是自然科學日新月異。若說我們只靠買大量圖書與最新儀器，就可以趕上人家，那是一個最大的錯誤。這是八十年前曾國藩的思想，還跟不上五十年前張之洞的留西洋不如留東洋的淺見。」

陳序經嚴厲批評

最先發出反響的是南開大學的陳序經，陳氏於九月十一日在天津大公報發表了「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九月廿一日上海

北洋大學的李書田與陳序經是一條陣綫上的，只是李書田的攻勢更兇一點。他強調「老牛車的十年計劃，永遠趕不上噴氣推動引擎之飛機。」「實際此原子時代，一切日新

月異，要想學術獨立，亦不允許十年計劃之從容實施。」關於以留學費來充實國內大學一點，他首先糾正胡氏的統計錯誤，因為只有官費留學生二百人的四十萬美金才由政府開支，其次是說明此四十萬美金還不夠美國第一流大學一星期的開支。胡氏答陳氏的談話中，曾言許多留學生都在美國讀二三流大學，李先生又證明這不是事實。總之，他是反對取消留學政策的。對胡氏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他更傾全力以攻擊，「誠然如胡先生所云，中國的一百四十個單位以上的專科以上學校，大家都在吃稀飯。但是如果一樣稀，大家必可相安無事。倘若大多數都吃稀飯，胡先生所推薦的五個大學，整日山珍海錯，你們嚥的下去嗎？公意允許嗎？馬上要行憲的政府能如此偏私嗎？」於此，他提出一個重要的

於此，他提出一個重要的

選購：「一代先知先覺的大師，與其在此危如卵之際，可憐的推薦五個大學，何如先以三寸不爛之舌，與一枝秃筆，奮力化砍殺為玉帛。只要武裝割據的政黨，把軍隊交給國家，交通立刻恢復，經濟馬上復蘇，因戰事消耗的一部份國力民力，用在大學教育上，不出數年的努力，全國三十所國立大學都不難躋於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芝加哥、巴黎、牛津、劍橋等大學之林。」胡氏推薦的五個大學，他也認為沒根據，他主張依地理的分佈，東北大、西北大學、中山大學、交通大學、北洋大學也應列入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內；私立大學之辦理有成績者如南開也應列入，「以獎勵躬身辦教育的張伯苓先生」，但李先生最忘不了的是本身的北洋，似乎寫這篇「論胡適之先生所談的『爭取學術獨立十年計劃』」，骨子裏大半是爲了這個。他不是說嗎？北洋比北大歷史久；「要想爭取世界學術地位，必須在學術上實事求是

（這是北洋的一貫校訓）埋頭苦幹。」「爭取世界學術地位這句話，我是極端贊成的，並且二十年來不斷努力於斯。戰前北洋工科研究所出版的研究叢刊，是經常與歐美第一流研究機關相互交換，且深得國外同道之讚許，認爲不比他們出版的刊物水準低。」

鄒魯最爽直

拆穿來說，寫這些文章的背景，都是希望自己的學校多得點幫助，不使自己的努力白費，但是各人的作風不同，論調與態度也各不一致：陳序經比李書田含蓄，而以鄒魯最爽直。鄒先生不在胡適之理論上找疵議，第一封信只問明五大有沒有中山大學的份兒。及胡先生答覆：「鄒先生所詢之中大，當係南京中央大學。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所提到國內第一流之五所大學，爲本人私人意見，政府如何規定，另作別論。關於計劃中之大學分區問題，無此必要，如按區域指定大

學，西北西南之廣大地區內，豈非也須指定？爲交通便利，則區域方面並無問題。」鄒先生也就動了「火」，其答詞中肯定胡適有成見，偏廢南方。因爲鄒魯最爽直，也就最現實，他專談中山大學，於是好多人視之爲集中到這兒。除了北大教務長鄒華熾「願以廣東人立場，負責指責中山大學確實未辦好，所以縱然南方無一所大學，也是事實」外，擊援他的大有人在，李書田是一個，胡先驥是一個，近來立委陳安仁也舉出四項理由函請胡適將中山大學列入第一個五年計劃內。

平津各報的意見

平津各報都非常重視這一問題，除大公報保持緘默，天津益世報吳元任有專論論及，主張三點：（一）、以五倍於留學生的經費先恢復各大學戰前的標準；（二）、派遣留學生，理論方面與實用方面的名額有合理的分配；（三）、延聘各國第一流

學者，長期在中國講學。北平的平明日報，認爲「學術獨立不是件容易事」：第一要爭取學術自由，第二要打破「抱殘守缺、經典自蔽」的習慣，第三要全國的學術界共同努力。他如民國日報、經世日報、華北日報，與這些論調大同小異。

爭取教育總經費

這許多的批評、反駁，胡適之先生都一一耳聞目見，他說近來太忙，有空時再作一次總答覆。我們希望胡先生的答覆能夠盡量容納各方的意見，并想出更完善的辦法。但，我們不能不提醒一句，胡先生的十年教育計劃並未談到如何爭取教育經費百分數，這是項值得惋惜的一回事，也是一個不小的錯誤，事實上，留學政策的取消不那麼容易，留學生的經費也只有幾十萬美金（自費生外匯不能列入），如果在現有的教育經費下，特別幫助五所大學，那是絕不可能的事。爭取和平，爭取教育經費的百分數，實是最根本的問題！（九月十八日北平）

廣東南路的動亂

——子 著——

「粵南」這個名詞，在上海不大多見；但是若說「廣東南路」，尤其是說「欽廉」的時候，恐怕每個人都會知道，也許每個人都知道它現在是混亂一團糟的局面了。我現在將此處動亂的發生和經過，粗略地記敘一下，讓全國關心廣東的人們，得到一個清晰的瞭解！

動亂的萌芽

在抗戰的初期，合浦縣張世充由懷市中山大學回到家鄉，對隣里知識份子及農民宣講民主主義的好處，協助農民抗繳苛捐雜稅，以致當地貪污土劣，恨之入骨，誣以造反，施用高壓，逮捕槍斃之不足，還燒了他們的房子，殺光他們的親屬，實施了帝王時代的誅九族的一套，可是時代畢竟不同了，這些辦法，不但不能夠使他們畏懼，反而使他們更堅決地走上反抗的道路。他們結合了一些無家可歸的青年，避入隣近的大山（即勿漏山脈）里去，積極地組織活動起來。因此，就種下了動亂的根源。

張世充與張炎

當抗戰的末期，亦即敵人攻入了欽桂後的時候，醞釀了七年的「解放」洪流，立即乘機爆發了。張世充揭起了南路人民解放軍的旗幟，自任總司令之職。同時，吳川縣的張炎也揭竿響應。張炎曾任第七區行政專員，他的勢力當然不小，如吳川縣立中學全體七百多個男女學生都參加了工作，在張世充方面，也有不少知識學

農村在劇變中（特約會稽通訊）

與 稷

浙贛路上

浙東的大動脈——浙贛路，和京滬、滬杭是很不同的：班次少，車廂小，開得慢，而且顛簸得厲害。京滬、滬杭雖也說擁擠，你若多化點錢，買對號車票，座位却決無問題。浙贛路上可就難說了。現在杭州上饒間的特別快車，規定是對號的，但如果你果中途上車，就很難找到座位。在堆滿了行李和擠滿了人的過道中軋進去，好不容易尋到你的號頭了。一看，也許你的位置已被一個紳士佔領，他說他也有票，不過是車上補的；又也許一個什麼軍人正昂起頭抽煙，你和他理論，他理也不理。找車上的「服務員」吧，他却反轉來教訓你一頓：「給你趁上車，已經算好了。要舒服，就睡在家裏眠牀上，門也不用出一步。」

但這些總是動員時節應有的現象，不足為怪。最使筆者注意的，却是乘車者的成分。和京滬、滬杭大不相同，在這裏，你很難見到西裝革履和擦了一口紅的小嘴。我巡視了一下我所坐的那個車廂，發現沒了髮和穿花旗袍的女人，只有二人。而多的却是軍人，姨姨和半農半商的小商人。軍人是不必買票的。而姨姨和小商人，因為浙贛路車票比京滬、滬杭要便宜一半，也着實化得起特別快車的車資。

這三種人（軍人，姨姨與小商人），可說是連接鄉村與都市的橋樑。在鄉下人看來，杭州、上海就是這三種人可以去的地方。對於女的說，那裏有闊人和他的太太，小姐，你可以去幫們做飯，拖地板，喂奶，抱小孩。每月賺幾萬倒不希罕，重要的是最後或者可捲一筆回去，或者結識上一個顯赫，迷之天天。如果這女的走了後一條路，失了足，鄉下人自然睡罵。但如走了前一條路，偷了許多衣服首飾回家，那就衆口交譽。偷都市闊人的東西，鄉下人並不認為不道德，這也可見道德觀念的階級性了。

而對於男的說呢，杭州、上海有大商店，有大批兵營，有警察和憲兵的訓練所。從杭州或上海販買布疋，毛巾，肥皂，香烟之類到鄉下，無論你開小舖，擺地攤，或者挑担子沿門叫賣，賺頭都相當大。所以耕作之暇，做做「單幫」，也是生財之道。這就是半農半商的商人。至於出去「吃糧」——當差使」的，原因與動機却頗不一。有的是抽上了籤，逃不脫；有的是想拿兩百萬，頂替別人；又有的是因前修示範，想步那些司令，軍長，師長，……的後塵，（浙東各縣都有幾個顯赫的軍人，）也來個「白日升天」（白日即目不識丁之意）。……

我不住地擦着汗，想着這些同車者身上所包含的問題，——都市與鄉村間的不正常的關係。對面的女人們咬着冰棒，在贊嘆上海的電風扇。隔座有幾個人正在咳嗽：「五金魁！」「七巧！」「……車子裏的空氣又悶熱又擁擠，真需要一個強壯的體魄才能支持。

但蝸牛一般的火車，雖然誤了點，到底也把我拖到了我的目的地——一個小站。從這小站再坐幾十里黃包車，就到了我的故鄉。

農村在劇變中

我的故鄉是一個山村，位於會稽山脈的邊緣。在一個溪谷的兩邊斜坡上，零零落落的分佈着數十家人家。

經過八年抗戰與兩年勝利的光陰，農村的變化實在太大了。窮困，悲慘

生參加，當時兩張連結成了一連四百多里的陣線，東起吳川，西抵欽縣的小董，西以張世充的家鄉白石水為大本營，東以吳川為大本營，中間的遂溪、化縣、廉江等均為他們控制着，大有席捲南路的氣概。

就中以張世充的活動區域來說，它包含着合浦、靈山、欽縣、防城，當時的靈山縣城，曾被圍攻，合浦縣城廉州（亦八區專署所在地）亦一日數驚，中央以剿共為重，不顧日寇威脅，調遣大軍馳援，始得解圍。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要問，難道廣東南路對於共產主義這樣成熟了嗎？我的回答是：農民並不知道什麼叫做共產主義，他們最關心的只是本身的生活問題。那時候因為安南米不能輸入，正鬧着米荒，農民都被迫吃着「黃狗頭」（野草的根）或山茹，甚至「芭蕉根」或細嫩可口的木葉等；而政府不但不能設法救濟，反而強迫他們繳納田賦、自衛費、抗戰費等等，倘使不能如期繳納，捉殺隨之；并且要抽壯丁去當兵。本來當兵是人民的義務，但是只見窮人有義務，稍有些錢或同官吏們有親戚關係的，就暗中辦妥了，縱算抽中第一籤，亦用不着去，反而要捉那些窮民抽中第二三百籤者頂替去。所以窮人怎樣都是死命一條，與其受饑而死，毋寧走險而死；走險而死還有不死之望，何況有着知識份子去領導他們為解放而奮鬥，為他們搶掠倉庫的穀米，救濟他們的饑饉呢！

發「剿匪」財 殘殺青年

當國軍勁旅趕到，配合着地方的保安隊自衛隊，組織了一個「剿奸匪清鄉團」，持其精銳武器，一時把「解放軍」的重要基地，逐一擊破了。「解放軍」遂「化整為零」，主要的幹部，進入延綿的勾漏大山中去，從事救濟貧民的種種活動；有一部，

當然是的。曾經窮困與悲慘得無以復加。在民國卅年，日本人開始由浙贛路向南推進的時候，年成不好（那年只有兩成的收穫），而老百姓却要向新（敵偽）舊（我方）縣府同時納糧。軍隊過境又多，據說番號就有十幾種，打仗，火併是小事，最麻煩的拉夫，搶劫與燒房子。實在生活不下去了，連糠和糜粉都吃不安穩，年青人就挺而走險，搶大戶，搶市鎮。於是新舊縣府又一齊派兵來剿匪，把紅帽子加給老百姓頭上。

「那時候，那裏還想到會有後頭日子呢？」一個同族的老伯對我說。

但是苦難却鍛鍊了人民！首先，政治認識是提高了。新縣府混蛋，舊縣府也混蛋，共產黨却真的產生，而且迅速地擴大，（雖然後來是撤退了。）

現在的鄉下人已和十年前大不同，看見我這個讀書人回鄉，都愛跑來打聽打聽：「內戰打得怎樣了？」

「共產黨要得天下吧？」

其次，更重要的，是

經濟方面也有了顯著的變化。因為戰爭期間負擔重，生活艱難，一般窮人就只好一方面拚命省吃省用，一方面又努力開墾荒地或為人勞作。這樣，勤和儉二字，真是徹底做到了。現在鄉村裏很少游手好閒和偷吃懶做的人。而鈔票失去信仰之後，鄉村的工資早已用米計算。（按工作輕重，每日在十斤至二十斤米上下。而且鄉下工作，總是供給飯菜的。）

因此雇工與手藝匠的收入是相當穩定的，倒不像都市的公教人員那樣，每次物價波動，薪津就相對地銳減了。

和窮人相反，一般士財主和富農的經濟生活却走上了下坡路。鄰村有個小地主，在十年前，他如果放出十塊錢去，借戶就得給他做十二個工算作利息。他有幾百塊錢放出，所有的田地就有人代他耕種，他只要坐享其成好了。但後來法幣跌價，借戶紛紛把債還清了。而工資日貴（其實也至多維持戰前的水準，不過相對地說

是貴了），又要應付徵實，徵借，他又沒有什麼遠官要人可以勾結的，到現在，他的生活也就弄得和一個「吃挑肩飯」的差不多。

有達官貴人撐腰的士財主或士紳士們（只是極少數），却又不同。這些人正處於得意忘形之際。他們可以利用統治工具來壓榨人民，自己却不受統治工具的束縛。如某司令的親屬，在縣城裏開設了幾家大茶舖，茶舖裏附設戲院，戲院裏又附設妓院，賭場，鴉片館。而開的商行與茶葉行呢，那又是全縣的托辣斯。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從一個小縣分，甚至一個小鄉村，我們也可看出整個中國在怎樣地蛻變。舊式封建地主是沒落了，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但同時，窮苦的人民却在苦難中鍛鍊出力量，而且這力量正在日漸壯大起來。

「小三北」

抗戰期間在浙東發展

起來的共軍，最先是新四軍的三五支隊，出現於杭州灣南岸，餘姚，上虞，慈谿三縣之北。所以這一支部隊也稱為三北部隊。稍後浙贛路上也有共軍活躍起來了，自稱為「金蕭線（浙贛路金華至蕭山段）人民抗敵自衛軍」。但老百姓卻喜歡叫他們作「小三北」，以表示和三北部隊同系而又有分別。

小三北也會在浙贛路沿線建立過若干小塊的根據地，當抗戰勝利時，聲勢是頗浩大的。但用老百姓的話語說：「毛澤東到重慶簽了字，江南撤兵。於是這支部隊便撤走了。」

不過在老百姓的記憶裏，它却是永遠新鮮的。聊天的時候老提到它。這不但因為在小三北的根據地或解放區裏，曾分過土地，而且它有兩種特點，最可使人佩服：

第一，有紀律。對老百姓秋毫無犯，而且非常和顏悅色。睡覺從不進屋，只在廊沿上打地舖。惜你的碗筷，總照數奉還。

份則躲入東京灣的諸小島上，索性過着「海盜」的生活。

在道剿「匪」的當中，給那些「剿匪」大爺們有着一個發財的好機會！當白石水被國軍攻入後，它周圍四五十里內的青年，均被殺戮殆盡；就是「解放軍」所經過的地方，也都殺之無赦。但是私自有錢給那班「剿匪」大爺的，可以例外，等到剿伐告一段落後，國軍調回，輪到縣長自己來「清鄉」也可以說是「清錢」的階段，合飲兩縣長都發了財，欽縣的縣太爺，曾買到三千餘畝的水田，并建築一座洋樓大廈；合浦縣長夏某，也不後人。後來，夏某被人控告，不知有無下文。

「匪患」猖獗

上面我已說過，「解放軍」的基幹實力，是「化整為零」的散進到各個大山去了，並沒有消滅在「剿」匪部隊的炮灰下，所以當清鄉部隊一結束，他們的實力自然隨之復活。去年四月底，「匪患」復熾，目下欽、廉、羅、防一帶，動亂不甯，已和前年無異。「匪軍」分為二部，一為劉鎮夏，司令部在防城縣境的那良（屬十萬大山），一為張世充，司令部在合靈一帶。二人都用「南路解放軍名義」，以奪取縣倉庫，誅戮貪官污吏，規掠富家及槍枝為目的。各邊壤和鄉村，都是他們的勢力範圍，只有幾個縣城及數個較大的城市尚未被他們控制，但日夜如臨大敵，戒嚴重重。現各縣縣府勒令各城市組織自衛團隊，大事徵兵，徵糧，徵槍，加之田賦，征借等等，負擔重過戰時三倍有多。在此混亂局面之下，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否則動輒以奸匪論罪。而貪污土劣更可趁此其機，儘量中飽私囊，人民只有俯首下心，任為魚肉而已，因此，南路的「匪」愈剿愈多，那并不是偶然的。（廿六、八、廿九）

如有損壞，一定賠償。

第二，有計謀。小三北從不打敗仗，敵人強大，它就逃走，敵人只幾十幾百個，就一下子包圍，繳了槍。行動總在晚上，神不知鬼不覺的來了，又神不知鬼不覺的去了。它的來路去脈，敵人永遠摸不清。而當它駐紮在一個村莊裏時，步哨線總佈置得非常嚴密。小三北通常用民兵作哨兵，穿着老百姓的便衣坐在涼亭裏或石橋上，別人再也看不出來。你進村，他從不阻擋。你要出村，他就叫你「大哥」或「大嫂」，勸你回去。真動不動，當然也免不了從懷裏掏出手槍來威脅你一下。

有這兩個特點，小三北就顯得和別的軍隊大不相同。老百姓稱贊它，就說它「完全是諸葛亮的一套法子」。當然，抱懷疑態度的也有，罵它奸詐的也有。因為這一套說不定是假仁假義，那就不是諸葛亮，而是曹操了。

綏靖與反綏靖

小三北三五支隊撤走時，有很多共軍回家又做老百姓，也有少數仍留在四明山區活動。近一年來，四明山的共軍不斷擴大，而且據說北方又派了些人來在三北地區登陸。現在，連會稽山區也有小三北捲土重來了。四明山和會稽山其實是相連的，不過四明山屬於舊寧波府，會稽山屬於舊紹興府。

於是政府說要「綏靖」了，在七月間同時成立了「四明山區綏靖指揮部」和「會稽山區綏靖指揮部」。前者我不大清楚，只聽說綏靖指揮部和靈屬七個縣長開會之後，決定要砍盡四明山的樹木和把山區的村莊全部遷出。這工程顯然如愚公移山，勇氣確實可嘉。

會稽山區的綏靖指揮部，駐紮在紹興和諸暨間某大鎮。指揮官姓吳，據說他來的時候，共帶了人槍四十、四十個兵，怎能綏靖紹興七八個縣呢？於是也召集縣長縣議長們開綏靖會議，商量了幾種辦法：

第一，發通行證與公

民證：經過綏靖指揮部所在地，老百姓必須有鄉公所發給的通行證。如果沒有，那就拘押，甚至吊起來鞭打。要保釋，也可以，只要你化五十萬，一百萬。這樣發生了幾件事之後，大家對那某大鎮自然望而卻步，鎮上的生意清淡了不少。而公民證呢，老百姓直捷了當地把它叫作「良民證」，其實却比良民證更多麻煩。敵偽時代發到鄉下的良民證是不貼照片的，現在的公民證却非貼不可。試問鄉下人有幾個有過照相的經驗呢？總不及百分之一吧。甚至還有人相信一照之後，靈魂要被勾去的哩。而且各縣各鄉各村的男女老少一律要照，一時要找這麼多照相材料也實在不易。鄉公所是為此傷透腦筋了。費用大，那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倒會負扭的。

第二，戒嚴與報警：綏靖指揮部所在地要戒嚴，倒容易，天還沒黑，大家都關上店門睡覺，行人自然絕迹。鄉下怎麼戒嚴呢？指揮官規定辦法：每保

出兩個壯丁，夜夜在村口放哨，不許行人通過。放哨時，有銅鑼的就帶銅鑼，沒有銅鑼的就帶洋瓷盆。如果發現小三北，就趕緊敲鑼的敲。這一村敲了，別村哨兵聽見，也趕緊敲。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大家敲起銅鑼和面盆來，小三北自然嚇跑了。有次近指揮部的某村忘了放哨，沒敲銅鑼，保長就在第二天被捉去了受刑罰，死了幾百萬才贖出來。

第三，開會與訓話：自吳指揮官到後，已不知開了多少會。今天召集鄉長開會，明天又召集保長開會。有一次忽然一道緊急命令，叫每甲派兩個壯丁，星夜趕到鎮上去聽「訓話」。命令上還說：有土鎗的背了土鎗去，沒有土鎗的就帶鋤頭鐵錫。於是，在一晚間，六七百壯丁被他動員去了，集在一起聽訓。指揮官是山東人，「山東人吃麥凍，一凍（僅）勿凍（僅）。」壯丁們吵吵要翻譯，又吵吵要翻譯，不打官腔。指揮官訓了一通之後，那贊土鎗的好處

，說洋鎗一顆子彈只能打一個人，土鎗一下子飛出許多沙子去，可以打十來個。又問大家會不會放土鎗，表演給他看看。壯丁們就一齊喊：「當然會！」幾百人一齊舉起土鎗來，乒乒彭彭亂放了一陣。直嚇得那指揮官面如土色，虧得鄉長保長們出來，才把壯丁們止住了。

第四，修汽車路與電話線：紹興，嵊縣，諸暨各縣間的汽車路與各鄉鎮間的電話線，正在發動民夫，加緊修築與佈置，以便利剿匪工作。這自然又是勞民傷財。電線桿需要樹木，修汽車路得拆房子和填平夏田，而且出勢力的又是老百姓。

這些是剛開始做的綏靖工作。此外，如禁止寺廟集會與演戲，怕小三北趁機活動，也極引起人民反感。而如築碉堡，練民兵之類，計畫據說也都提出來了，暫時却無法進行。小三北方面呢，却也同時展開了反綏靖的工作。他們特地挺進到綏靖指揮部所在地附近，今天傳說甲村有四個人上山去參

加了，明天乙村確實實的有七個人當了「共產」。抗戰期間曾經參加過的，反正現在存身不得，越發以重新上山為安全。汽車路與電話線，還沒建設好，就遭破壞。沿路電線桿被貼滿標語。

在這些中間，一般老百姓，特別是鄉保甲長們，自然非常為難。綏靖指揮部要派款，小三北也好言好語來找鄉長，代籌點糧食。吳指揮官已經有了在揚言組織會稽山區的人民自衛隊了。到底聽那邊的話好呢？不敲銅鑼的保長是被指揮部處分了（其實他並不幫小三北），而聽從指揮部的命令，忠實地執行綏靖政策的保長們，却在一天之內，同時被小三北捉去了三個。

但人民有人民自己的愛憎，經過苦難鍛鍊的老百姓，是有決定一切的力量。真正能做綏靖或反綏靖工作的，真正能使農行安定與繁榮的，不是任何黨派，任何軍隊，而是老百姓。只有跟着老百姓走的黨派與軍隊，才會成功，或者照鄉下人的話說：才會得天下。

藝文雜誌

新型舞蹈底新精神

衛 勃

這在抗戰期間，中國已經有了建立新型舞蹈的運動。根據了西洋芭蕾舞與中國舊歌劇的舞技與武功作為基礎；再加以對中國邊疆，山地，高原各民族底土風舞的採掘，融合，凝望方纔建立起新型舞蹈的雛型。

這個努力的嘗試不知耗費了多少藝術家底心血與文化界，尤其要提起的是吳曉邦與戴愛蓮二位舞蹈家獻身於這個運動的熱情。由於他們直接的領導及許多青年人狂熱的努力，中國舞蹈才有了這點新的萌芽，而陶行知先生領導底育才學校也正是培植這個民族新型式舞蹈的暖牀。

這次在關心演出的「育才舞蹈音樂會」所表現的成績雖然在舞蹈藝術上是相當的脆弱；然而它揭起了所有觀眾底潛在的熱情，儘管觀眾是小市民，而在劇場裏與舞台上所呼應的情感的共鳴，表現了

或是象徵，總之，它永遠不會離開那固定的主題的精神。這種嶄新的精神完全根立在「為了人民」，這個精神也正是故去了的陶先生一生所遺留的精神。

「育才」的這筆參加演出的天才學生們，在正確的教育方式中，發掘出了他們與生俱有的天份，現實的生活的苦難幫助了他們認識了這個社會的黑暗面，因而更容易地把握

住劇中每個角色的性格、形象與那種受難者內心的感情，他們雖然都還年青，但他們的表現却很老練。他們肩負着這個運動底

使命，把這新的精神底種子撒到了城市，更深植在每個觀眾的心中。根據表演時觀眾底共鳴，和散場時觀眾興奮的談話裏，我們會覺出這羣青年底工作已有了偉大的收穫。我相信這羣青年在工作

的成績中所表現的堅韌而活躍的力量，正是承襲了陶先生們。這羣先進者們所固有的那種精神底力量，也正是散播到每個中國人民心底的精神。使每個人都有一種新生的力量

這種新的精神不僅在最近的將來使新型的舞蹈發揚光大，普遍到任何角落；並將影響了社會上每個工作部門，而幫助整個民族走上新生的路途

使生命，把這新的精神底種子撒到了城市，更深植在每個觀眾的心中。根據表演時觀眾底共鳴，和散場時觀眾興奮的談話裏，我們會覺出這羣青年底工作已有了偉大的收穫。我相信這羣青年在工作

的成績中所表現的堅韌而活躍的力量，正是承襲了陶先生們。這羣先進者們所固有的那種精神底力量，也正是散播到每個中國人民心底的精神。使每個人都有一種新生的力量

這種新的精神不僅在最近的將來使新型的舞蹈發揚光大，普遍到任何角落；並將影響了社會上每個工作部門，而幫助整個民族走上新生的路途



「浮提」(域外書市)

夏奈蒂

這裏有一本大歌劇家浮提 (Verdi) 的傳記，書評家稱之為「歌劇的小說」，共四百三十八頁，作者是韋法爾 (Fritz Weier) 自從刊行了這本書以後贏得國際的名譽。原文是用德文寫的，後來才譯成了英文出版。

作者開頭幾頁就用戲劇手法引人入勝——他描畫浮提在威尼斯的貢朵拉上。(貢朵拉是威尼斯拉名的小船。) 那位意大利大師發覺另外一艘貢朵拉靠近了，在那裏坐着兩個高貴的人，剛看完歌劇演出回來。那兩個人就是瓦格涅跟他太太。其時為一八八三年，接近瓦格涅生命的年頭。他已經七十歲，浮提也一樣年輪，然而，他覺得那個德國歌劇家站起來比他高。那一次匆匆一瞥可是使他重新又獲得一種力量。以後七十五歲他創造了「奧賽羅」，八十歲時創造其他兩個重要作品。

浮提和瓦格涅完全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作者就着重道顯著的不同上。全書極其有趣，充滿各種可愛的細節。

國會附設之「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曾要求該會將其組織經過等種種詳情見告，但竟遭該會之拒絕。因此之故，該會之十六個負責人(包括休姆林在內)俱遭傳訊判罪。其他十五人中，包括「讀者圍地」什詩(Reader's Scope)「發行人」S. 葛里生，作家霍華特·法斯脫，紐約著名外科醫生E. R.

白斯基以及戲劇家愛德華·却道洛夫之前妻瑪莉林·却道洛夫等人。著名電影演員弗特列馬區曾為此案，偕同其妻佛洛倫絲愛兒屈立琪前往華盛頓為休姆林作證。據弗特列馬區之辯言稱：「休姆林是一個守法的居民，其為人非常正實誠懇」云云。



「守望萊茵河」演出人遭判罪 弗特列馬區為休姆林辯護

童 秀

據華盛頓通訊，百老匯名劇「守望萊茵河」之演出人漢門·休姆林(Herman Shumlin)按即華納影片「萊茵河的守衛」之導演，最近以藐視國會之罪名被判徒刑一年及罰金一千元。此事起因，據該通訊稱，由於休姆林為「反Fascist Refugee Committee」之支持人之一。

托爾斯泰的堅強和執固



讀托爾斯泰傳記，知道晚年因自己理想與實際生活的衝突，尤其是家庭妻子兒女間種種糾紛，逼得這八十二歲高年的「戰爭與和平」的作者，不能不憤然出走，以至冒風寒而死在火車經過的一個小市鎮上，真可算是一個不尋常的悲劇。

林如櫻

自然，比起他同時的一般文人來，托爾斯泰一生要算是幸福得多了。至少，他沒有遭受顯赫的政治壓迫，不曾嚐過流放或貧窮的滋味。但是，他的帶有宗教色彩的萬民平等的人道主義，也正與建築在專制和奴役制度上的沙皇統制，與支配當時社會的反動階級的權益，是不能並立或妥協的。所以，那反動階級的潛在力量，終於是通過了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以並非有意而却是悲慘的姿態，一步一步的要去逼死這一篇短文的（大致是一九二五年，我運作者的名字也早忘記了，）內面轉述了某一俄國作家述說的一件小故事。有一次托爾斯泰同幾位朋友在談天，不知幾時話題轉到婦女問題上來了。托爾斯泰一自這問題目提出時，神情忽然變得嚴重，而且只是默然在側留意聽着別人談論，他自己不再開口了。起初大家並未注意這位老人的異常神態，後來有人覺得情況不妙，便想問問他的意見來緩和這不愉快的局

「文學新聞週刊」上看到

戰士怎樣在地上生根的

根 根

關於「荷花淀」，孫犁著，海洋版。

縱使是一朵野花，一顆小草吧，它也有長短相等於呈現在地上部份的堅韌的根，執拗地穿進泥土裏去。要不然只消輕輕地吹過一陣風，就會把它們從天南帶到地北的。

現在還有許多人在懷疑：那些「烏合之眾」，怎樣會依舊牢牢地站住腳跟。這一本「荷花淀」是提供最有力的回答了。

遠離開那邊有上千萬里的人們，誰也不會想到，在那裏縱然沒有可以作為保障的高山，也沒有結實的人工築成的城堡，有的只是「白茫茫一片」的「荷花淀」，只要用一根細細的竹刺，就能把構成「荷花淀」的荷葉，戳它幾百個透明的大窟窿的，然而人民的戰士，却如同他們在山上，在高梁桿下一

面。

「我嗎，我對於婦女

樣，在那裏的土地上，也深深的把他們的根伸展進去

了。那時還遠在日本投降之前，這「荷花淀」的周邊，正是侵略者在東北之外，奴役殺戮得最慘酷的地方，也就是最難於展開反抗的地方。然而人民的戰士却冷靜而又周密地考察了這一地區的特殊條件，想出了許多適合這一特殊條件的特殊的戰術方法。他們並不鄙棄被竹刺就能刺破的荷葉，相反他們就利用這荷葉，躲在荷葉的下面，讓「下半截身子長在水裏」，待到敵人一臨近，他們便使這不能行動的荷葉變成能夠瞄準着敵人打槍的活人了。

而在另一方面，爲了防止戰鬪以後，引起敵人更慘酷的屠殺，他們就發動廣大的人力，開始了許多彎彎曲曲的互相呼應的地道，把手無寸鐵的老弱們都安置在裏面。當敵人利用優勢兵力，深入到村裏的時候，他們就憑着一枝槍，幾顆手榴彈，英雄地守住了這地道的「翻口」。敵人雖然能夠用鐵錘之類，突破幾個「翻口」，但因為這地道不是筆直地開掘的，走三步便要轉一個彎；正洞以外，又有偏洞；直洞盡頭，又是橫洞——層層的構造都互相不相同，不用適合這洞內條件的特殊姿勢，怎麼翻也翻不進去的，而且裏面又非常黑暗，所以即使能夠跑進去，也終於逃不了「像胖老鼠進了細腰蛇的洞一樣，只有跑到蛇肚子裏去的」命運。

「荷花淀」底作者曾經這樣說：「這是戰爭的基地」，「平原上有過三次驚天動地的工程，一次是拆城，二次是破路，三次是地道。局外人以爲這只是本能的求生存的活動，那是錯誤的。這裏面有政治的精心積慮的設計，動員和創造。」這是一點都沒有誇張的地方的。

馬凡陀詞 嘉工曲

載新音樂月刊第六卷第四期

「他們不要瞎子去當兵」是優秀的獨唱曲。

這優秀指的不僅是詞本身的富於現實性與表現手法的通俗，更重要的是曲作者精細深刻的體味了詞作者的意圖，而在節奏、旋律等方面賦予典型的刻劃和生動的描寫。

「他們不要瞎子去當兵」

(歌曲評介)

金 穎

異常而可怖，呼吸迫促，筋肉抖顫，神經失了常態，「鋼針尖尖拿兩根」，於是，悲劇來臨：「刺進了我兒的眼睛……」。鋼針一來，在N音停留，完了——身心全垮——癱軟、朦朧！然而，兒子慘叫一聲，旋律倒載八度，鮮血四濺，「項」在第二度降半音上面。隨即，她神志稍為清醒，慘痛，恐怖，主音八度跳躍：G-G¹（「孩子啊！」）她悽厲迫出這一聲，接着揭開悲劇的主題：「他們不要瞎子去當兵！」是慘然的，慰安呢？或者是混和血淚的肝腸寸斷的懸緊了喉嚨的乾號？而她，畢竟着力喊出那絕望中的一絲希望了！

曲子風格獨特，氣氛渾然，節奏、旋律（可惜沒有見到伴奏）慎重的推敲與精密的安排，刻劃出「道可唯咒的時代」的一幅生動圖畫，簡練，精細，乾淨，有力。……

卅六年九月十七日晨一時

關於英國片：「孤星血淚」

佐文

在英國文學的領域裏，却爾斯狄克斯是最通俗名的一個，他的小說，充滿了曲折奇情的內容，老練而又細膩的描寫，幾部傑作，差不多全上了銀幕，如「賊史」(Oliver Twist) 先後於一九一六(派拉蒙)和一九二二年二度攝成無聲片米高梅於一九三五年完成「塊肉餘生」，列為十大名片之一，被稱為影壇奇蹟，冗長的自敘，竟能極流利的於二小時餘表現在銀幕上，確不是易事。次年再完成「雙城記」(考爾門主演)，同樣得到成功。一九三九年又攝了一部「聖誕述異」，近五年來每屆聖誕節，米高梅總添印若干新拷貝再發行。

現在這部「孤星血淚」(Great Expectations) 則是英國電影，是 Cine Guild 公司出品，這家公司係由英國電影界名人安東尼赫佛洛克，阿倫，名導演勞納尼和大衛里昂等籌資組成，專拍攝高級電影，最近有個偉大計劃，就是要把所有狄克斯的鉅著，在十年之內搬上英國銀幕。「孤星血淚」是第一個作品，得到了意料之中的成功，目前正在開拍「賊史」。

「孤星血淚」，一九三五年在好萊塢的環球影片公司曾拍攝過有聲電影，結果是失敗了，十一年後今日，由英國自己來製作，謹慎而細心，在勞納尼總監製下，畢竟得到美滿成績，在一百八十八分鐘裏，凡狄克斯在原著中所含著的氣氛，情緒，幽默，戲劇性的人物角色，莫不理想地搬上銀幕。當本片於今年五月運美公映時，一向只演好萊塢A級銀片的紐約音樂廳破例開映了這部英國片，而報紙影評對於「孤星血淚」的批評，都加以崇高的讚揚。參加比利時國際影展時，本片代表英國作品，也載譽而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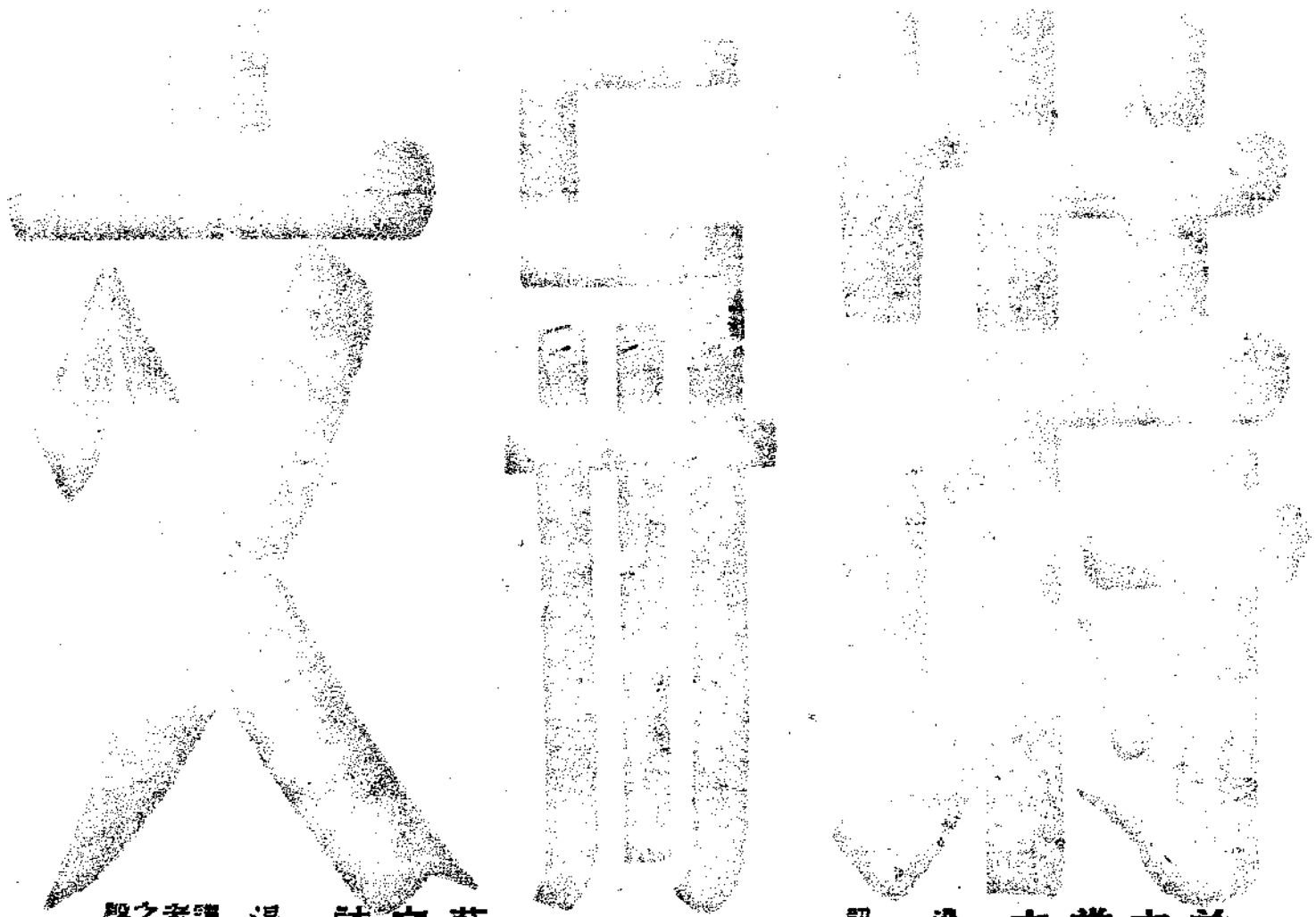
本片的導演是不列顛的一個天才大衛里昂(David Lean)，他年紀不到三十歲，但作品如「亨利第

五」，「海神」，「天倫之樂」，「相見恨晚」，「浮生夢」等已蜚聲於國際影壇，對於電影藝術，有著獨特的成就，他已決心為不列顛影業服務，曾立誓不赴好萊塢拍片。

至於演員方面，包括「海神」裏的水手約翰米爾斯，范麗拉維勃潔，「璇宮艷后」裏的佛朗西斯沙立文，裴納米爾士和有演戲天才的年輕女星琪恩芭萊絲(以演本片而成名，已在主演「哈孟雷特」一片)等小說原著也許讀者早已看過，它像狄克斯筆下其他作品一樣，帶有一點傳奇性詭秘的含著，主角庇發也是一個窮苦的孤兒，在鐵匠加基店中當小學徒，他天性仁厚，七歲那年曾在荒地上救助一個從獄中逃出的死囚麥格威許，以後，他每禮拜到鄰家海維潔小姐那裏去一次，這位老小姐生性古怪，為了追念失去的一個戀人，她盡守遺所巨廈四十年之久，膝下無兒，只有一個領養的小姪女伊絲梯兒，庇發年紀雖小，對於伊絲梯兒已生愛慕之心，但她則把庇發當作野孩子，雖時常遊蕩，也時常吵鬧，海維潔小姐對庇發愛護甚深。

庇發十六歲成人之後有個叫約瑟的律師跑來對他說，有筆鉅大遺產要他繼承，是某某人留給他的。庇發想，愛護我的，除了海維潔小姐之外，還有誰呢？他相信這筆遺產是那位老婦人遺留給他的，他就到了倫敦。在這大都市裏，他又再見到傾心已久的伊絲梯兒，但當他發覺伊絲梯兒決定另嫁他人時，他更發現，他這筆遺產原是幼年避過他的死囚送給他的，而伊絲梯兒正是死囚的女兒，她心頭有極大的悲痛鬱結着……狄克斯小說以曲折離奇見長，高潮疊出，影片本身的最後結局，男女主角在老屋中撥開灰塵滿的高幃，陽光投射進來，光明充滿一室時，觀眾才會呼一口氣，鬆一下心頭的重壓。

本片說明了英國電影年來的飛躍的進步，它不再跟好萊塢學步，在自己的領域，發見了更豐富豐富的題材和天才。



讀者之聲
教部次長充當「打手」
福建活埋「土匪」
解聘教授的奇妙藉口
暨大同學向社會控訴

漫畫

黛英·方成·華山

藝文誌

迎濤予愛蓮……………馮亦代
法國雕刻的厄運……………平凡
「春殘夢斷」前後……………容方
「五月丁香」……………趙強
音樂界的「第三種人」……………金穎

4

卷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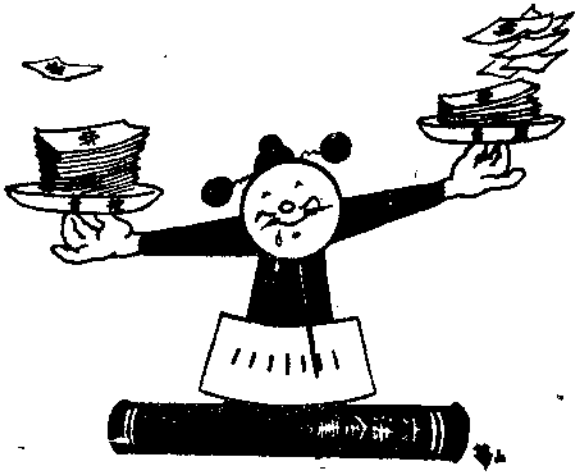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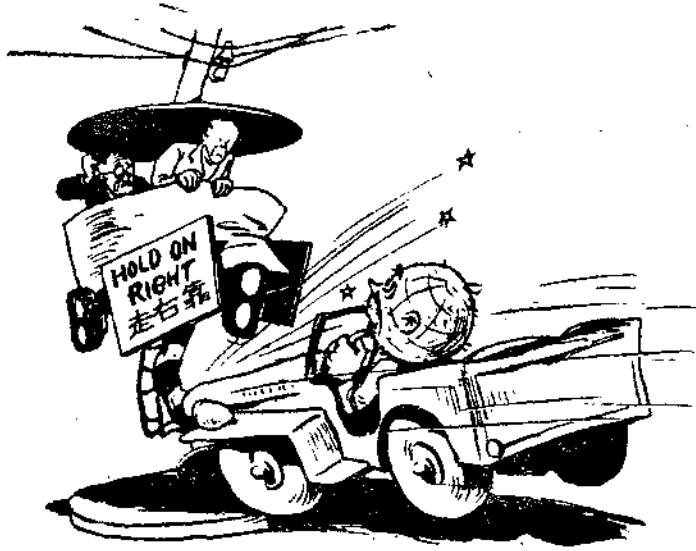
美蘇的外交戰……………宦鄉
中國還需要革命……………陳旭麓
當前的若干經濟問題……………周伯棟
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王亞南
過
從「外科醫生」談到「市民治」……………周華
大別山下……………杜漸
訊
北平學生進步了……………文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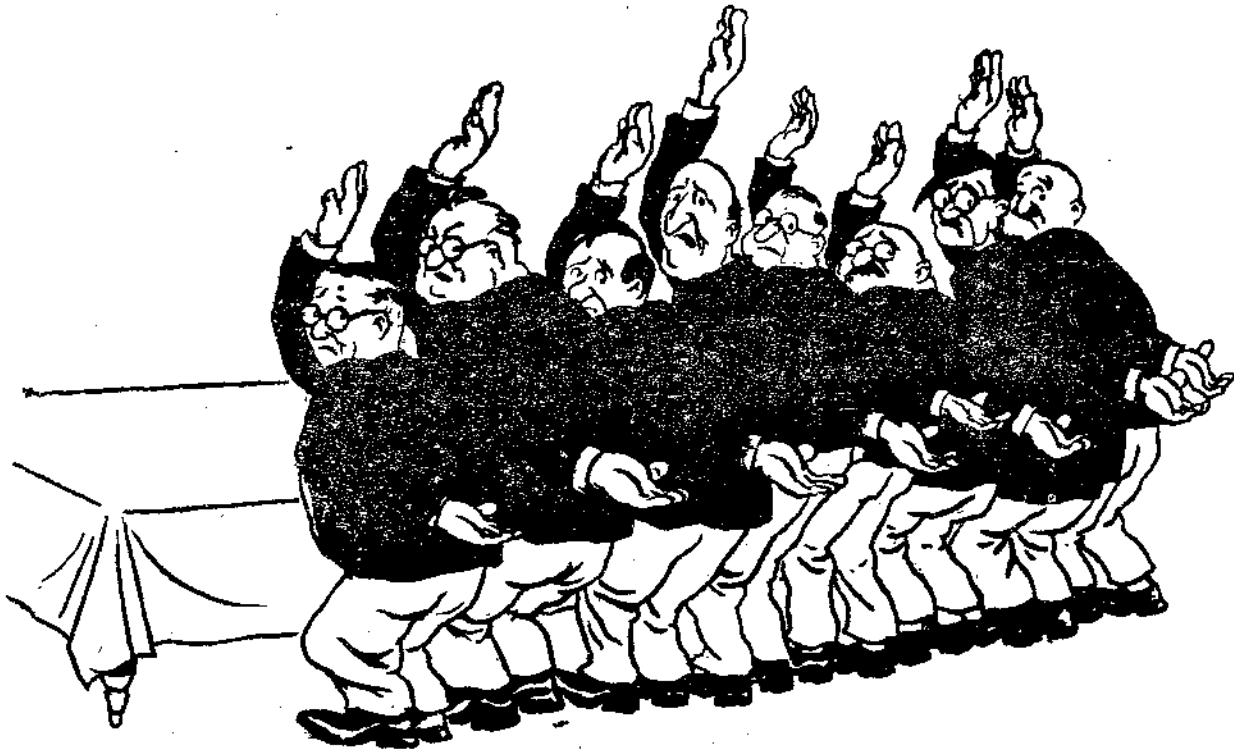


閒情美景

• 英黨 • 的走「左」靠是生先界世



• 英黨 • 錢要你向手只一，你成贊手只一



美蘇的外交戰

宦鄉

一、美國要改變聯合國的本質

聯合國大會第二屆常會於九月十六日在紐約的富勒與地開幕。迄廿三日止，以演說辯論為中心的第一階段告一結束，大會開始進入了討論階段。

綜觀一週來演說辯論的情形，尖銳嚴厲，緊張刺激。美英與蘇聯雙方各以最率直坦白的語句相互抨擊，完全不顧所謂外交禮貌，絲毫不為對方留餘地。美國代表麥克尼爾在他的演說中，甚至用一種失敗主義的口氣明白宣稱：「如果在現狀之下還有誰希望列強團結合作，那假使不是昏聩的狂想，就一定是危險的欺騙。」這樣悲觀絕望的語調，出諸於一個主要強國的代表之口，這就怪不得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大担心事，「深感困惑」了。

是的，從這次大會的美蘇代表演說中可以看出空氣的嚴重與危險。大會所面臨的問題大概可以類別為三大系列：一個系列是有關聯合國本身的，如否決權修正，五十五國和平安臨時委員會的設置等是；另一個系列是主要地以美蘇對立為主體的，如希臘事件，朝鮮獨立，原子能管制等是；還有一個系列是以安定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為中心的，如巴勒斯坦問題，修改義大利和約問題等是。在這三大系列的問題中，最足以反映出局勢的沉重性的，是第一系列的問題，也就是美國企圖改變聯合國的本質，把聯合國從一個「列強合作共維國際和平安全」的機構，改變成一個由美國操縱，成為美國反蘇并實行對外擴張政策的工具的問題。

在這次大會中，美國的馬歇爾國務卿曾提出一個修改憲章的建議和一個根本扶煞安理事會的方案。他認為「五強一致同意的權力被濫用」了，於是就提出「寬放安理事會投票程序」的建議，申明「關於在憲章第六章之下所引起的各種問題以及申請入會等問題，美國願意接受以不論何種適當的方法，澈消一致通過的需要」，這樣對憲章中否決權的規定作部份的——但決不是不重要的——修改。馬氏這一建議顯然是不合理的，企圖操縱聯合國的。何以是不合理呢？聯合國秘書長賴伊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說：「關於否決權的衝突及意見上的差異，并非由於否決權本身的緣故，因為否決權問題僅係病症，而非病原。如果不把成為病原的強權的全面鬥爭加

以根本解決，而單要修改聯合國的憲章，那是改變不了基本局勢的。」此其一。其次，憲章第六章是關於「國際爭端之和平解決」的，這一章因為所牽涉的不僅僅是程序問題，而且也牽涉到「採取行動或建議其所認為適當之解決條件」（第卅三、卅四、卅六、卅七等條），所以當然應該讓各大國保持否決權。至於申請人會的否決權如果不保留，則某些不「愛好和平的國家」或甚至是法西斯的國家（如西班牙），也可能在多數國家袒護之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那就糟糕之至了。何以說是企圖操縱聯合國呢？因為就現實情勢看，如實行多數表決制，則美國控制的泛美集團便佔了五十五票當中的二十多票，英國加上自治領至少可以有八九票，兩國合計總在過半數以上，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其他強國（中、蘇、法）不保留否決權，那豈不是聯合國的任何事情都要受到美英聯合的操縱嗎？

馬氏大概知道這個修改憲章的建議絕對辦不到，因為按照憲章第十八章第一〇八條的規定，任何修改憲章的案件，必須一經大會會員三分之二之表決，并由聯合國會員國三分之二，包括安理事會全體常任理事國，各依其憲法程序批准後，對於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發生效力。」所以他企圖用偷天換日的手段，把聯合國的權力從安理事會轉移到另外一個新機構上去。按照聯合國憲章，一切實權都握在安理事會的手裏，大會只能提出建議案，沒有拘束的力量；但安理事會有否決權，而大會則只須三分之二通過便行。這樣，馬歇爾所使用的手法便是：第一步先把各種相持不決的問題，如巴勒斯坦、希臘、朝鮮等問題，由安理事會議程上撤消，提上聯合國大會議程，以免蘇聯採用第十二條一項的規定；第二步就提出設置五十五國和平安臨時委員會的建議，并規定其職權為「可以討論由於會員國家向其提出，或安理事會根據憲章第十一及第十四條而向大會或安理事會提出的損害友誼關係的情勢和糾紛；可以建議會員國於必要時要求召開大會；也可以在下屆大會中提出將該會建立於永久基礎之上」。這些權限正是安理事會所具有的，所以假如馬歇爾這一建議竟被通過，那安理事會就等於無形中被繞越廢棄（bypassed）了，而否決權的修改與否也就無關宏旨。按，聯合國在現行制度之下，主要地是以兩個東西為支柱——其一是

所謂「大國一致」的原則，其二是安全理事會奉各會員國的授權，代表各會員國履行迅速有效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責任。前者的任務在於保證國際合作，尤其主要強國合作；後者的任務在於依循主要強國合作的原則確保和平。現在馬歇爾的提議等於從根本上否定了「大國一致」的原則，同時取消了安全理事會的機構。這樣一來，聯合國這機構勢非變質不可，它可能變成一個完全受少數國家（主要是美國）利用與支配來反對另一些強國的工具，重蹈第一次戰後的國際聯盟的覆轍；它將不再是國際合作的象徵，而是分裂世界促進戰爭的動力。美國的建議把聯合國推上一條危險的歧途了！

二、美國目的在排斥蘇聯，便利擴張

爲什麼美國要企圖改變聯合國的本質呢？唯一的目的是在排斥蘇聯，驅之於聯合國機構之外。

美國明知道，無論在理論或現實的立場上，蘇聯都非維護否決權並支持安全理事會的存在不可，所以就偏偏在這兩個基本問題上作「掘牆根」的工作，使蘇聯不能忍受而自動退出聯合國。這一「自動」兩個字很重要，因爲美國絕大多數人士都是主張美蘇合作共同支持聯合國的，倘若美國的外交家不能用極高明技巧的方式，迫使蘇聯不得不退出而又在表面上不着一點被迫的痕跡，那美國政府就將爲美國人民所反對、唾棄。所謂否決權之爭，不過是這種高明技巧的方式之一，替美國人士作一番心理上的準備而已。

早在一兩個月之前，美國參眾兩院議員中已經有少數人士在高唱「從聯合國中逐出蘇聯」的運動了。現在馬歇爾氏的「偉大提案」實際上是替這個「逐出蘇聯運動」蓋上一層彩色煙幕。他給蘇聯兩條路去選擇：一條是如果要留在聯合國中，就得與英法及其他小國一樣，接受美國的命令；一條是如果不願意留在一個受美國操縱的聯合國中，那就請你自便。假如蘇聯真走後一條路的話，他就可以告訴美國人民說：「看哪，這大熊是自願走出去的，分裂世界的責任，應該由他負擔，可與我們沒有關係」。或許這就是馬歇爾所謂「爭取主動」的含義吧。

何以一定要排斥蘇聯呢？難道世界很顯明地一分爲二對於美國有什麼好處麼？

觀念上的對蘇憎惡自然是最主要的諸因素之一。自這次戰爭結束之日起，美國就以資本主義的最高代表人和維護者自命。所謂「美國世紀」一

語充份反證出美國資本主義自命不凡的驕傲神氣。他們認爲美國的一切，從觀念到制度，都是世界上最優越的。因此，當他們看到另一種觀念和制度——蘇聯的政治經濟體系，不一定比他們的壞，反而比他們要好，以致爲全世界人民所注視關切，乃至心焉嚮往的時候，他們的優越感就受到嚴重損害了。他們認爲蘇聯的存在，對於「美國世紀」的實現，是一個重大阻礙，所以他們處處要排斥蘇聯。

這種恐蘇惡共病，這兩年來竟發展到了一種歇斯底里性的程度。美國的獨佔勢力不僅害怕并討厭蘇聯，直至連東歐的新民主主義、英國的工業國營計劃、法國和義大利的共黨勢力膨脹，在美國獨佔勢力的眼中，都成了不能須臾忍耐的東西。最近半年當中，美國報章雜誌硬把歐洲的經濟危機全部歸罪於歐洲國家的經濟制度，批評威脅的論調不時可見。而美國的政客和外交家們則着手展開「爭取歐洲各國孤立蘇聯」的策略。這爭取實際就是把美國勢力向歐洲擴張。

美國爭取歐洲各國的策略可以分成三種；第一是從現實的利害着眼，通過經濟「援助」的手段，在美元控制之下把歐洲組織成一個單位，作爲美國體系的附庸。這也就是所謂「馬歇爾計劃」的真正用意。只有把歐洲的關稅壁壘取消了，把歐洲的貨幣統一了，並成爲美元的附屬了，然後美國的商品和資本纔好自由通行。但美國這個目的的達成，首先必須克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阻力。一則蘇聯和東歐不參加，歐洲的經濟統一便不可期，同時美國的負擔也將太重；再則蘇聯和東歐不肯犧牲自己主權來換取美援的榜樣，將在精神上號召西歐各國的人民，使反對其本國政府的犧牲主權換取美援的作法。這就是說，蘇聯如果不願作美國的附庸，便須被排斥打倒，以免影響到別的願作美國附庸的國家的意見。假如蘇聯被排斥於聯合國機構之外，聯合國成爲美國及其南美以及西歐東亞附庸的聯盟的話，美國估計馬歇爾計劃的實行可以得到許多便利。

美國的第二個策略是挑撥戰爭的宣傳，其作用在故意強調美蘇攤牌的不可避免，世界大戰的必然到來，迫令美國及歐洲人民趕快選擇美國這一邊（to take sides with U.S.）。目前美國的戰爭宣傳雖然十分熱鬧，但大多數的世界人士總以爲單只觀念的衝突不够引起戰爭，從而認定美蘇戰爭只是一種幻想的Illusory東西。這樣的認識使得西歐人士對take sides一點猶豫不決，老想在美蘇之間走一條所謂「中間的路」。假如這次美國能够很順利地把蘇聯及東歐國家排斥在聯合國之外了，地球就會明白白地分成兩個世界，美蘇妥協似已完全絕望而戰爭則似更成了非打不可的樣子。這

將迫使各個猶疑徘徊的國家趕快作一個最後抉擇。譬如，這次馬歇爾和維辛斯基的演說分別發表之後，法國的皮杜爾外長在他的演說中就呈露出一種左右為難，無所適從的悲哀。這種悲哀在法國是很自然的，但却是馬歇爾輩所最樂於看到的，而且也是在他們意料之中的。

美國的第三個策略是用武裝直接干涉來鎮壓歐洲的人民革命運動。如所周知，希臘的局勢目前正在極危險嚴重的狀態中，逼得美國非直接用軍事力量干涉不可，否則希臘的現存反動政權就有崩潰的可能。但要用美國的名義這樣做，恐怕會引起美國人民的反對，所以非要找一個東西來掩護一下不可。因此美國的將軍和謀士們便發明了一希臘人民解放軍是受國外支持一的證據，要求聯合國出面制裁，同時則表示美國願意舉其兵力和資源來供聯合國的指揮。這樣一來，干涉希臘內戰的不是美國而是聯合國，聯合國居干涉之名，而美國則得干涉之實；這不僅可以敷衍美國的輿論，而且更可以動員美國的輿論來支持聯合國干涉希臘的戰爭。但在這裏也有一個難題，就是安理會中有蘇聯的存在，而蘇聯是握有否決權的。蘇聯的否決權迫使美國不能盜竊聯合國的名義去參加希臘的內戰，同時也使美國在希臘的一切作為都有牽手礙脚的困苦。所以非把蘇聯排擠在聯合國之外，美國對歐洲國家的武裝干涉根本不可能。

以上只是就美國獨佔勢力為了向歐洲擴張，需要把蘇聯排斥於聯合國之外來說的。此外，還有更基本的一方面，那就是，在美國獨佔勢力的算盤上，排斥蘇聯能保證美國戰時繁榮的繼續存在，繼可以延續美國經濟恐慌的到來。如所周知，美國的極度經濟蕭條事實上已經開始，美國現在急於要向歐洲擴大資本與商品的輸出，來阻止這個蕭條的繼續惡化下去。在這一點上，美國遇到兩重阻力：其一是美國國內的若干有力階級反對對歐貸款計劃；其二是那些急於要救濟的西歐國家摸準了美國的弱點，不肯痛痛快快地迅速接受美國的條件，把主權出賣給美國。假定這次馬歇爾在富勒與坤地的外交攻勢能把蘇聯逼得退出聯合國，從而造成一種極危急嚴重的世界分裂的形勢，那就可以對內克服美國內部的矛盾，對外迫令西歐國家早點向美國屈服妥協。這兩點一辦到，則美國與西歐之間的軍事與經濟合作便可暢暢快快地揭開來迅速進行，而無須像現在英美軍備統一標準那樣遮遮掩掩了。這樣的軍事與經濟合作，必以恢復美國的一民主兵工廠一的地位為第一要務，而美國的戰時繁榮又有重新復活的希望，二次大戰期間的戰時繁榮曾把美國獨佔資本家的荷包裝得滿滿的，直到今天這般獨佔資本家們還在希望好景再來呢。

上面這些，就是潛藏在馬歇爾這次外交攻勢下的真正動機。這樣剝開表皮來看過之後，也許有人會說，一美國的獨佔資本勢力又不是瘋子集

團，總不會這樣醜惡險毒吧？一這種想法太好了，因為在垂死掙扎中的獨佔勢力是什麼醜惡險毒的事都做得出來的啊！

三、美國攻勢將遇到重大阻力

但美國獨佔勢力要實現其一相情願的企圖，也不是沒有困難的。

第一個阻力就是蘇聯的反攻。第一屆聯合國大會中，蘇聯提出驚人的裁軍案，把貝爾納斯斯的攻勢給瓦解粉碎了。這一屆大會中，針對着馬歇爾的外交攻勢，蘇聯提出制止戰爭宣傳的議案，揭破美英某些戰爭販子的陰謀，保證蘇聯的和平意願，強調世界局勢的緊張完全由這些戰爭販子一手造成，從而號召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人士起來反對美英獨佔勢力的挑撥戰爭的企圖。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蘇聯是決不會上馬歇爾的當，自動退出聯合國，把分裂世界的責任自己担負起來的。

第二個阻力就是聯合國憲章的本身。無論是否決權的修改也好，是聯合國機構的變更也好，都是屬於修改憲章的範圍。而一談到修改憲章，那就有一定的手續必須經過。沒有蘇聯的合作，這都是不可能成為事實的。蘇聯必然堅決反對美國修改否決權和設立五十五國和平與安全臨時委員會的建議，只要這反對存在，美國的建議就無法在法律上成立，除非美國敢於自願担負分裂世界的責任，開除蘇聯的聯合國會員籍。

第三個阻力是來自全世界的進步力量。美國的華萊士氏已經開始嚴厲斥責美國軍人和資本家操縱下的外交；一切前進的報紙和輿論都反對美國的挑撥戰爭的宣傳。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則向美蘇呼籲合作，要求解消歧見以免一威脅到聯合國的生存一。這種全世界愛護聯合國，深怕聯合國不幸夭折的心理，將使馬歇爾的攻勢難於完成任務。

第四個阻力是來自西歐國家。以英國來說，麥克尼爾雖然會用最尖刻鋒利的言語來譴責蘇聯，但他却一對馬歇爾所提議之五十五國和平與安全臨時委員會之建議表示異常冷淡。英國自由黨的孟哲斯德導報說：「若考慮另一辦法，使聯合國機構迅速變成美國之反蘇聯盟，則大為可惜」。甚至保守的倫敦太晤士報也說：「變更解決爭端之機構雖可改善及加速調解方法，但只有解決爭端之志願方能使調解工具發生效力」。至於其他歐洲各國首都，則除極右派的方面外，大半都認識美國的真正用意而給予以冷淡的反應。歐洲人民的這種意志表現，將使各該國的政府不能過份對美屈服。

綜觀這種種情勢，我們不相信美國已經真正取得了主動，美國排斥蘇聯、破壞聯合國、分裂世界的企圖是否能夠如願以償，還在未可知之數呢

卅六、九、廿六日。

中國還需要革命

陳旭麓

(一) 未完成的革命

中山先生留下一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言，奮志以歿，一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是歷史的惡作劇，中國不可彌補的損失。當他彌留之際，自然希望繼起革命的志士，完成其未完成的遺志，使全部三民主義的理想能够完整地實現，以達到富強康樂的民主政治。但是他四十年艱苦奮鬥，民族革命表現了很大的成效，推翻了滿清；民權方面，也消極地做了些破壞專制政體的工作；惟有民生主義或社會革命，則尚未開始。國民黨自肩負起這部未成功的革命史，二十餘年來，還是在民族革命的過程中兜圈子，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才算告一個段落。民權主義雖然暫由消極的破壞進到積極的建設，召開國大，頒佈憲法，可是觸着了難拔的暗礁和作繭自縛的矛盾。民生主義則仍是一張未填寫的白紙，遲至今日，又已危機四伏，誰知中華民族的革命道路，是如此艱險而遙遠！

何以法國經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以後，自由平等博愛即已抬頭；俄國經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以後，以最短的時間，激頭激尾的即完成了社會革命，提高了社會生活水準，鞏固了國家基礎。我們呢？從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起，經過洋務運動、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及國民革命軍北伐，以至於現在，過去了一個多世紀，時間不可謂不長，還是一革命尚未成功，這句話，好像已變成了玄學上的名詞，永久得不着具體的結論，因此我們不能不追問下去，到底爲了什麼？

法俄的革命，是比較單純的政治革命。工業革命先已給予法國社會經濟一個大的改革機會，俄國沙皇所領導的大地主政權，也已到了登峯造極，因此政治和社會的改革運動，獲得了順水推舟的助力。而我們這百數十年來寶貴的血肉，却始終爲民族革命而捐輸。洪秀全領導太平天國，浩浩蕩蕩地進行着推翻滿清的工作，偏偏遇着會國藩李鴻章一班人又要把牠扶

起；辛亥革命，算是完成了驅逐韃虜的工作，誰知帝國主義者一齊闖入，如決江河，莫之能禦；驅走了一個韃虜，却來了無數的韃虜，幾召瓜分之禍，直至抗戰勝利，才掙脫帝國主義的枷鎖，可是新的枷鎖又在擺佈了。自十八世紀後，工業革命風靡了歐美及東方的日本，物質建設，日新月異，而中國的社會經濟始終停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昏迷狀態中，所以二十年前「五四」時代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今日還沒有失去它的時間性。其次，法國有盧騷伏爾泰等的自由思想做了革命的先驅；俄國有革命的先知列寧全部接受了馬克斯主義，確定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我們的革命經典三民主義呢？却作了讚美詩護身符陞官圖，原來革命鬥爭的意義，被沖淡得看不見形迹了，因此舊的一套歸於破壞，新的一套又不能建立，結果變成一個殘破不全的社會！

我們如果追溯上去，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可以說就沒有革過一次命，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湯武革命」，所謂漢高祖明太祖的「平民革命」，也只是朝代的遞嬗，張三打倒李四李四打倒張三的戲法而已。從社會經濟的意義上看，湯武的新朝代和桀紂的舊朝代有什麼兩樣，漢之於秦明之於元有什麼截然的不同；就是震古鑠今的辛亥革命，也只是打倒了一姓的皇帝，分作數十家小朝廷。當時各省的軍閥，割據一方，擁兵稱雄，不是「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嗎？誰能否認他們不是獨立的皇帝？就是今天，在某些地方尚殘存着這一種形態。惟其如此，五千年來的歷史重擔，壓在這一代黃炎子孫的身上。如果我們把這一副血腥的重担有了交代，便算是我們的功績，替下一代子孫造了幸福；如果仍是一個血腥的重担留給下一代的子孫，則積垢愈多愈難洗滌，血腥愈重愈難負擔，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罪惡。看我們如何洗滌這罪惡！

(二) 封建勢力在中國社會生了根

中國人民雖然流過了無量的鮮血，經過百數十年變法圖強的鬥爭，終

沒有完成革命的使命，這是中華民族吃虧的地方。譚嗣同謂：「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所以戊戌政變時，他可以逃避而不逃避，卒及於難，那種義憤填胸的氣概，與聞一多先生的「前脚踏出大門就不想回來」，先後輝映，直欲以自己的鮮血，激起社會的改良運動，換取無數人的幸福，這種先知先覺成義成仁的態度，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啓明星。

革命志士的犧牲，固然可以激起革命的浪潮，喚醒多數人的覺悟，但亦可減少革命的力量。在每一次革命的過程中，革命鬥士在暴力下不斷的犧牲，反革命者却未受到應得的懲罰，袁世凱並不送上斷頭臺，溥儀逃到東三省依然大模大樣的做起皇帝來，北伐時代許多罪大惡極的軍閥，變來變去，花樣翻新，有的竟是高擡要津的「革命元勳」。所以每一次革命鬥爭的結果，反革命者的氣焰高漲一次，不但不能使社會起沉澱的作用，相反的，渣滓浮在上面，壓制了革命的力量。

滿清末年到北伐時代，國民黨代表革命新興的力量，始終與專制毒藥的愛新覺羅氏封建割據的軍閥相週旋，經過無數驚風駭浪，才建立起中華民國的基礎，會幾何時，自己又是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變作了受箭的鵝的，依然中了歷史的遺毒，——泗上亭長的劉邦、皇覺寺小沙彌的朱元璋，一旦做了皇帝，作威作福比別的皇帝還要厲害，龍袍披上，再也不能代表那來自民間的身分了。這也無怪他們，我們的教主孔子就有這樣的教條：「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做小和尚的時候，敲着木魚化緣，是你的分內事，如果做了高高在上的萬歲爺，必須「君權神授」——朕即上帝」的擺佈起來，才不失貴為天子的身分，要是不快意的話，割下幾個腦袋來解解悶，彷彿只是踏死幾個螞蟻一樣，這也是分內事。從夏商周時代的傳遞下來，政治構造和社會階層已變成了這樣一副偉大的機器，人類不過是機器裏的原料，經過機器的那一階段，即變為那一階段的塑型；歷史是這樣的作弄人類，使原料變成作品，作品變成渣滓，人類就永久走着這樣的連環路。因此封建勢力在中國社會已生了根，成為社會牢不可破的基石，政府只是基石上的堡壘，新的老了，又被新興的推翻，是這樣的一代代新陳代謝着，基石始終沒有動搖過。如果我們要走出歷史的連環悲劇，我們必須以全力去摧毀這頑強的基石和基石上的堡壘。辛

亥革命之後，在「五四」時代，固然也做過些摧毀基石的工作，可是沒有長出新的土壤，動搖過的基石依然如故。「不遇盤根錯節，安別利器。」我們現在就處在這樣一個執銳攻堅的時代。

(三) 革命的必要

我們既然面臨着這樣一個積重難返而又萬分需要革命的時代，但是在這五千年歷史四萬萬六千萬人口的泱泱大國裏，究竟存在一些什麼事實，這些事實又怎樣使革命的力量不能盡情地發揮？

第一、豪門資本官僚資本的集中。這些特殊人，可說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即獲得了特殊的羽翼，一天的膨脹昇華，利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掌握國家財政，壟斷金融事業，投機國際貿易，巧取豪奪，無所不用其極，戰時發國難財，勝利發接收財，吞噬了國家的一切資源。據最近報載：自三十五年三月至本年二月，中央銀行共售出外匯五億一千餘萬美元，孚中湯子兩公司購去二億二千餘萬美元，這兩個公司的主人，大家都很清楚，他們不但田連阡陌，洋房遍都市，亦且存款充於國外，聞各家在美存款共有四十一億美元，較之昔年和坤的家庭有過之無不及，因為他們在封建關係剝削之外，還以買辦的姿態去現。財富愈集中，窮而無告的人愈多，社會的病態即由此產生，美國各托辣斯的財產儘管大得不可以數計，然而一般人的生活尚能維持，所以不至馬上影響整個社會的健康。人類的通性，只要活得下去，誰又好為己甚？就是吃苦，只要是大家共同的，社會仍可獲得紓解的力量。如果少數人窮奢極慾，大多數人却被困在飢餓的死亡線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就是社會的危境。

第二、戰爭和飢荒，是造成革命的要素。無論那一個朝代，革命勢力的興起總離不了天災人禍的驅使。近年來各地的水災旱災，無日不在嚙噬着人民的生命，亦無日不在呼籲救濟，可是所謂救濟，也只是大人先生們的口惠，飢民真能獲得恩施的，恐微乎其微。曾來華覲見乾隆帝的英國首任大使馬加特尼，在他留華的日記裏，記述着這樣一件事：那年廣東有一縣飢荒，上震天聽，乾隆帝在打獵費內撥了五萬兩去賑濟災民，歛發至禮部，扣下了二萬兩，還要經過好幾層官爺們的手，等發到飢民的身上，已經不到二萬兩了。所以每經一次飢荒，人民對官爺們即多一層認識，也增加一次仇恨，況且今日無處不是貪污的事實。八年的抗戰，大家儘管艱苦備嘗，却知道這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非戰無以圖存，誰不懷着打敗

日寇我們翻身的希望？而兩年來的內戰，却又爲了何事？「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使人民流離失所，誰甘受此橫逆！誰忍觀此殘暴！非戰區的人們，徵兵徵實，也已被壓得死活不得。剿滅政策，固視之爲天經地義，可是事實告訴我們，這是抱薪救火，火那裏會熄滅呢！此種長期的內戰，形成一個最不平的現象，政府對官僚資本、豪門資本不能抽得一絲一毫；提用美國存款，鬧了幾年，你休想拔一根毛。所有軍糧稅收，都是從純良的商人、中產以下的地主和一般農民頭上括下來的，這許多小資產階級也早已喘息在無產階級的邊沿了，一旦革命從他們的口裏喊出，是最可怕的；且許多難民和逃役的壯丁，流離轉徙，逼上梁山做了中共的外圍的，大有人在，戰事一日不停，這種人勢必不斷地增加，政府應視爲隱憂。

第三、土地問題，愈趨嚴重。「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只是政綱中美妙的條文，縱然有決心去改良，如果不拿出斷然的手段，終是積重難返。共產黨過去的燒殺政策，沒有人不反對，而於處理土地的革命手段，除了被清算的地主們，似乎很少對之有微詞。中國以農立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依靠着自然生產來養活，自然生產的惟一對象——土地，不能有合理的分配，而讓土地需要者與土地所有者完全對立，這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從上年各地搶米的風潮，也可看出囤積者與需要者關係的尖銳化，因此土地問題構成了有歷史性的革命要素；早在宋代，四川的王小波，浙江的方臘，湖南的楊么，即已提出了「均產」的口號；接着太平天國提出了土地改革的問題，民生主義內且已確定了土地政策，共產黨更以改革土地爲其施政的核心。中國社會近世紀來不斷地轉變，可是土地分配依然停滯在小農經濟和手工農生產關係的階段裏，工業革命始終翻不出牠的掌心，所以中國要談社會革命，必須從土地革命做起。

第四、「官逼民反」，久已成了歷史的定律。早些日子，湖南沅江縣政府，因統制大糞，惹起人民的反感，數百農婦圍擊縣長。舉此一端，以概其餘，其實類此的事情，幾無日無處不有。「只許官家放火，不許民家點燈！」今古如出一轍。但是過去官場還有一副森嚴的假面具威脅老百姓，現在這副假面具早已撕下了，官場的猙獰貪婪面目，暴露無遺，何況今日中國，已集古今中外貪污政治的大成，人民的仇視報復心理，與日俱增，揭竿而起的事實，已經層出不窮了。

上面的這些事實，都是極其明顯的，誰能否認當前政治的腐敗和社會

的黑暗，又有誰不希望對腐敗和黑暗有所改良；但是一點一滴的改良，對這半身不遂的麻木社會，不會發生絲毫的刺激作用。我們不也常看到處貪污者以極刑麼？可是主刑者本身即在貪污；而公教人員的不能養廉，又無異鼓勵貪污，貪污何從斂迹？我們不也常見到政府引用社會賢材，可是他們一任要職之後，於實際究有何補救？漢高祖明太祖不也是民間去的嗎！所以今日不談改良則已，欲談改良，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使這僵化的社會有新的轉機。如最近政府提倡節約，表面上看，何嘗不是良法美意，但是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他們早就束緊褲帶過日子，要他們節約，除非節約僅夠維持生命的米麥；而日食百萬的豪富階級，他們決不會因節約而降低他們的生活，這即露骨地存在着社會革命的問題。

(四) 誰能擔當革命的重任

來中國數十年的司徒大使，對中國國情確有相當的了解，曾幾度發言，主張革命運動。誰來領導革命？司徒大使沒有接着說下去，也許有難言之苦。擺在我們目前的，能擔當革命重任的，不外下列三方面：

第一、由於政府自發的，來完成革命的使命，實現中山先生的遺志。政府中確有不少此種期望和抱負的人。美國名教授裴斐，去年應我國教育部之請，來華講學，回國後，在哈布斯雜誌發表「退出中國此其時矣」一文，該文主張：「由中國改革政治，成立爲人民所擁戴之政府，並實行社會改革，庶不至引起極端份子的革命。」裴斐教授的高見，不出所謂政協路線，希望政府派自動地澈底改組政府，實行中山先生改良派的民生主義，以緩和激進份子的流血革命，完成不流血的光榮革命。當去年政協開會的時候，也許有這種迹象。可是畢竟這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兩年來的事實，已經告訴了我們。政協開會後，不是有許多忠心耿耿的人物，吞聲飲泣嗎？一向被認爲金字塔的上層結構，既由自己所佔有，又要由自己拱手讓人，我們除了做唐虞拼讓政治的夢，現實的道德和智慧是不容易有的，因爲既得利益集團，爲了要保持既得利益，正好像革命者要完成革命的使命，是不擇手段的。

第二、抗戰期中以至於勝利以後，智識階級的社會意識，有一個大大的轉變，好些象牙之塔的學者，因環境給予的刺激，走上了時代的道路；如聞一多先生本是一個連報都不願意看的學者，竟積極參加民主政治活動，即其一例。美國教會世界服務社理事長穆斯博士遊歷遠東返國後談：「

中國除共產黨外，尚有不少自由分子，彼等不能參加蔣主席所領導之政府，故有單獨發動變亂的可能。（見香港八月一日星島日報）穆斯博士的觀察，有部分的真理，在中國知識階級的領域中，無疑的有大量的自由分子，他們不願走入共產黨的集團，更不滿意政府的一切，他們擁有輿論和民氣的反抗力量。大概穆斯博士所見到的，便是國共以外的許多自由分子以及五月間學生運動的表現。這許多自由分子，固然懷着滿腔熱血，但是如欲單獨舉起革命的旗幟，是不容易的：一則缺乏堅強的組織，再則沒有革命手段的武力；並且願意挺身出來干涉政治的自由分子，佔全國人口的百分比究竟太少，這是中國的中庸主義在作祟。但是雖然他們沒有革命的力，却有左右社會的影響，如果國民黨能夠領導政府突破當前的難關，實現中山先生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以達到民主的道路，則這些自由分子正是民主的新血輪，如果政府繼續腐化惡化下去，他們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將有走入左方革命集團的可能。不可否認的，此種現象，已日趨顯著。

第三、握有武力領導革命的中共，已有了二十餘年實際的鬥爭經驗，現時擁有的地盤和人力，誰也不能否認其為國內第二大政黨的地位，這次魏德邁將軍之來華調查，據說「中共是否威脅國民政府的存在」為其調查主要課題之一，此處不是一政府是否可以消滅中共，美國人的觀察，已大可玩味。本來近十年中共的發展，為許多人始料之所不及，其為社會矛盾之時勢所造成，毫無疑義；尤其在西北的艱苦環境裏，竟能夠擴大成長，樹立相當的政治基礎，與江西時期，實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而國內外人士也隨着環境的轉移，給予不同的看法。其現行的土地清算政策，固為地主們所不滿，然土地的新劃分，中國社會經濟早有此種必要。「無產階級起來！」原是共產黨固有的口號，近年來中共的態度，固然仍是爭取農工階級，但開明的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也已變成了他們拉攏的目標，這與他們的新民主主義同樣是適合中國目前的環境。然而就當前多數人的觀察，中共雖然擁有相當大的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但其不能立即傾覆政府却與政府之不能剿滅中共無異。此時此地說起來，這點正是事實，就是說中共領導的革命力量還沒有水到渠成之勢，似尚有待於國際局勢的徹底轉變。

中國現階段的階級意識，大資產階級不論，商人和地主式的小資產階級，為了他們有足夠溫飽的享受，他們本反對流血革命，然而這階級裏的人，在官僚政治的剝削和內戰的壓力下，已有轉變的趨勢。為淵驅魚，誰

應負這個責任！大多數的青年知識階級及開明紳士，希望改良派的社會主義者或革新派抬頭，如果國民政府能夠達到改良的目的，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他們正是政府的諍友；可是政府的一切設施，正與相反，益增加他們的離心力。改組後的政府，所謂混合內閣，徒增加幾個花瓶而已，其實質不變，一如往昔；物價依然高漲，官吏依然貪污，金融依然無法調整，亂糟糟的情形依然無絲毫的好轉現象。現在「剿匪」政策雷厲風行，大規模的戰事究竟何日戢止，誰也不能有肯定的答覆。魏德邁將軍所獲得的調查材料，固是滿箱滿匣，把這些材料分門別類的整理出來，也許可以得到一個切實的結論——一切的癥結在內戰，要解決這癥結，魏德邁將軍的錦囊和馬歇爾特使有何不同，除了積極協助「剿匪」政策，以武力恢復「和平」外，恐亦無斷然的辦法。

在這裏，我們可獲得了本文的結論，中國需要革命，無論政府來完成未完成的革命也好，共產黨來革命也好。換句話說，國民政府如不能拿革命的手段刷新社會，則「革命」必假手於人。可是你要革命，你要和平，人家都不點頭，結果革命也不能，和平也不成，就演為現在你打我，我打你的局勢，這局勢要維持多少日子，刀柄又拿在別人手裏，可以痛哭流涕者在此。

(五) 國際因素

有人把中國的歷史與蘇聯作對比，俄國的二月革命推翻沙皇，與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相近；二月革命後，孟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做了俄國的領導者，沙皇的政權又轉移到了資產階級的手中，列寧和史大林繼續領導布爾塞維克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這才完成了十月革命。國民政府面臨中共的民主運動，很可能比擬自己的地位處於十月革命的危境。不過與俄國不同的，我們的國家有國際的兩大勢力在激盪，自發的革命受了壓制。

因此中國的問題，一方面固然在於中國人民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隨着國際的寒暑表為轉移。美蘇間的癥結有了合理的解決，中國問題才能澈底的解決。美國新聞週刊編輯大衛勞倫斯在該刊發表的社論說：「美國也許不能征服蘇聯的軍事首腦，如說那時歐洲完全成了屠宰場，美國也可能被炸為屠宰場，那時人力大失，債務劇增，捐稅奇重，另一次戰爭的結果必定造成美國的社會主義，目前的制度不能存在。」如果大衛勞倫斯的話是正確的，中國的難題也就在那個時候隨着獲得了解決。

當前的若干經濟問題

周伯棣

一、農村經濟的衰落

地價的漲跌，常可反映該一地區的經濟的繁榮與衰落。這在都市如此，在農村亦是一樣。照理，目前百物騰貴，農地的價格，亦應上漲，却為什麼反而下跌呢？

這主要的原因，因為土地價格常有租稅折入資本 (Amortization of the Rent) 的法則，在發生作用之故。申言之，土地之租稅愈重，即地主之負擔愈重，地主之負擔愈重，等於地主之收益愈少，收益愈少，還元為土地的資本價格便愈跌，於是表現為地價的跌下了。

現在對於地主的最大的壓力，是為徵實與徵借。這些實物租稅，本是自然經濟時代的笨法，同時亦為抗戰時期的不得已的辦法；到了抗戰結束，本擬宣告中止，但後因內戰延續，物價飛漲，政府為籌軍公糧食，遂亦續辦徵集糧食的工作。

自本年八月起至明年的七月底止，這一年間徵集糧食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據糧政當局的宣稱（聯合社七月三十日南京電），以稻谷計算約為八千萬担。這八千萬担，是依何種方式徵集呢？據七月底行政院召開全國糧食會議的決議，分為三種方式：

(1) 徵實——三十六年度田賦繼續徵實三千五百萬担，以稻穀與小麥兩種為限。但亦得折徵法幣。

(2) 徵借——依徵一借一原則，向糧戶徵借，但得斟酌各地收成情形，分別減免（故徵借總數尚有伸縮）。

(3) 收購——不足之數由政府市場上按價收購。

通過上列三個方式，政府可集糧八千萬担，亦即糧戶約繳納實物六至七千萬担。在這個情形下，地主的收益減削了。他們在可能範圍內，自得將負擔轉嫁於佃農，但轉嫁亦有一個限度，於是做地主的情願將土地出賣，而收買者亦只能以收益的還元價格接受（收買）土地，故地價（田價）顯然降低了。「昔日田為「富」字脚，今日田為「累」字頭」，田多，甚至成為地主自殺的原因了。

徵實徵借還算是合法的稅捐，此外還有非法的攤派、勒索，據四川省幹團民國三十一年對川北十縣的調查，當時地方攤派的名目，共有六百六十種之多；徵實徵借僅及地主或自耕農，攤派與勒索當更及於佃農。凡此影響於農村經濟之衰落自是意中之事。

農村經濟衰落，田價低跌，地主拋售土地，而農戶却買不起土地。國家金融政策，如能注意於農業金融中之長期信用，發放長期貸款，幫助佃農購得土地，倒也不失為一個辦法。無奈我國目前的土地金融還停滯在短期信用與中期信用的階段。所以田價雖跌，於「耕者有其田」的實現，並無多大的幫助。

二、農業稅與工商稅

徵實徵借是農業稅。徵一借一，等於一年兩徵；徵借規定自民國四十年起無息分五年平均抵還，這又無異於「預征」、加倍徵收與預期徵收，在工商稅是少見的。公債有類於預征，但只要公債不是強制公債，便沒有預征的普遍與苛重。

在工商稅方面，目前有營業稅，有特種營業稅，有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有特種過分利得稅，此外還有印花稅、營業牌照稅與特種交易稅；至於關稅、鹽稅與貨物稅等消費稅，經過轉嫁，能歸着於工商，也可歸着於農業。

工商稅是多歧的，但課了特種營業稅不必課營業稅，課了貨物稅也不必課營業稅；又課了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只要它的利潤，沒有超過正常利潤 (Normal Profit) 百分之六十，也不必課特種過份利得稅。工商稅中，原則上只有營業稅（或特種營業稅）與所得稅相重複 (Double Taxation)，但營業稅為比例稅，稅率較輕（按營業總收入額征百分之五，製造業減半），只有所得稅是累進稅，稅率較重，所以這樣的重複課稅，還勉強可說是形式的重複課稅。（印花稅稅率普通不過從價千分之三，五，姑置不論）

但農業稅的一年兩徵，那才是實質的重複課稅。

一切工商稅，照稅法的規定，均不許有任何的附加稅的；但農業稅（田賦）的附加，却為數千年來傳統之事實。在實行徵實之前，不是把正稅附徵，併成一起，折徵實物的嗎？

最後，工商稅，均用貨幣納稅，故其負擔為貨幣負擔（Money Burden）；而農業稅用實物納稅（徵實徵借），故其負擔為真實負擔（Real Burden）。在幣值日跌的情形下，尤其在滯納的情形下，貨幣負擔較低於真實負擔。

我們不是說工商業的負擔不夠重（實際上工商業的負擔力，除出豪門資本外，亦已達到了飽和點），我們只是說農業的負擔實在是過重了。

這苛重的負擔，落在農業上，又不用累進的稅率，而率依田賦的舊章，故其負擔又多落於中小糧戶，這更是一種不公平的事呵！

三、財政的困難

國家一方面徵貨幣稅，他方面徵實物稅，但徵得的稅，還不夠充浩繁的開支。貨幣稅近年以來常只占歲出總額的百分之二〇——三〇。其入不敷出的數目，截至三十五年度為止，是靠官產、國營事業盈餘、敵偽物資、救濟物資、剩餘物資的標售。自八三十六年度，預算數字原為歲入七萬億，歲出九萬三千億，不足二萬三千五百億元。但截至四月底止，據財長俞鴻鈞在參政會的報告，可析列如下表：

一至四月現實數字	五月底估計數字	全年估計數字
收入 二〇〇〇〇億（強）	一五〇〇〇億	一七〇〇〇億
支出 五〇〇〇〇億（強）	一三〇〇〇億（*）	二〇〇〇〇億

*此外須再增列預備費二萬億，故成一五〇〇〇億元。全年支出遂成爲二〇萬億。

由上表一至四月收支相抵不足三萬億餘元，此雖為淡收時期，但財政的困難仍不難概見。此項數字估至年底，全年支出共爲二〇萬億，全年收入共爲十七萬億，收支相抵不足三萬億。

但按之實際，物價作高速度的增漲，稅收等等只能作低速度的增收，而支出却不能不隨物價作高速度的增加，則到了年底，收支不敷之數，恐尙不止三萬億元。

這不足的數字（即使是三萬億元）將如何彌補呢？據俞財長的報告，擬採的方法有數端：

甲、開源方面：

1. 在租稅方面爲更大的努力。
2. 樹立債信，推行公債政策。
3. 出售公產：包括（一）敵偽產業，（二）剩餘物資，（三）不必由政府經營之生產事業。

乙、節流方面——停止支付不急要的支出及非有利於生產建設事業之支出。

在上列幾種方法中，節流方面，因為是內戰方殷，百分之七八十的支出是軍費，軍費無從節省，其他的費用即使節省，亦爲數有限。在開源方面，公債政策已以美金公債開始了，但消化亦大不易（上海一地，自四月一日至八月九日止，共只售出三千二百萬美元。）；敵偽產業已剩餘無多，剩餘物資多爲軍隊日用品，未必盡合國民需要；不必由政府經營之生產事業，如賺錢的，政府不肯放，不賺錢的，人民未必要，即使肯要，而如中紡一家即值二萬億元，中煙即值三百億元，全國商業行莊的總存款，不過六千乃至七千億元，在此情形下，民間那有餘力承購？最重要的自然是租稅，但這又是怎樣呢？

據俞財長的報告，第一擬在租稅方面爲更大之努力。其努力的方向，有下列兩端：

一、直接稅方面——推行分類綜合所得稅，舉辦特種過分利得稅，開徵證券交易稅，籌辦特種營業稅，籌辦一次財產稅。

二、間接稅方面——整理關稅、鹽稅、貨物稅。

對於這些租稅方面的努力效果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照已往數年的情形租稅收入只占歲出總額的百分之二、三十，照今年的預算租稅收入雖占歲出總額的百分之三八·五，這個數字到了年末決算，自將大打折扣，因為上文說過，租稅縱隨物價而略有增加，而支出却增加得更快，則租稅的比重自將降得更低了。對於租稅方面的更大的努力，對於整個的支出，自不能有極大的幫助了。

財政上的支絀，造成惡性的通貨膨脹，目前，據章乃器先生的估計（見經濟週報五卷八期第十一頁），每天的開支爲四萬億至六萬億元，每天鈔票發行量爲一千億至一千五百億元。一個星期的發行量，就等於全國行莊的存款數量。目前財政的困難於此可見。

四、物價與薪給

通貨膨脹的狂瀾，引起幣值的低跌，這在對內價值，表現為物價的狂漲，在對外價值，表現為外匯的狂漲。

物價狂漲的結果，影響到財富分配與生產的各方面，而最引起社會的不安的，是為物價與所得的失衡。一般言之，所得是趕不上物價的，但還也得看所得的性質而不同。所得分為兩大類：（一）是可變所得（Variable Income），例如利潤所得，自由職業者所得屬之；（二）為固定所得（Fixed Income），例如工資薪給所得，利息所得屬之。一般言之，可變所得可隨物價而升降，固定所得則不能隨物價以升降。故前者受物價的壓力少，後者受物價的壓力重。

但同為固定收入，產業工人的工資，因有團體契約的關係，其工資尚容易隨生活費指數而調整，偶有一度凍結，即引起物議，政府為求社會的安寧，便也實行解凍；唯有公教人員的薪給，因為是個別契約的關係，其工資才不容易隨生活費指數而調整，雖說是三個月調整一次，實際相去遠甚。於是公教人員才落到貧窮線之下。

但同為公務人員，達官貴人，又豈可與中小級公務人員相提並論，達官貴人的名義工資雖少，實質工資則多，例如住則有官邸，行則有汽車，食則有宴會，活動可有特別費，再或兼上幾個公司銀行的董事與理事，與馬報酬，祿在其中；他們的薪給，只成為全部所得的一小部分。中小公務人員才真以極少的薪給為其全部的收入！

教育人員的收入更為可憐，平津的教授是不兼差的，名師宿儒的一月的收入，尚不及國家銀行的一個小職員；上海的教授，兼差的，固然生活裕如，不兼差的，簡直是食不果腹。在上海的社會，兼差愈多，將愈為學生所重視，為校長所青睞，為同事所贊美，不兼差的，除物質的困苦外，似更須受精神上的輕視了！

起初是公、教人員「二人三足」，公務員與教育人員得同受甘苦；現在公教人員與武職人員「二人三足」，公教人員的調整待遇，更見困難了。

同是教育人員，中小學尚可徵收學術進修費，以改善教師的待遇，上海市教師的標準待遇，市小教師是一百四十萬元，初中教師一百七十萬元（見九月十七日時代日報）。目前國立大學的普通教授待遇，則釘住於一百六十萬元（全部所得）。中小學教師的標準待遇，原是甚低，但以後國立大學教授的待遇，將更低於初中教員的待遇了。

五、物價與外匯

物價狂漲，幣值跌下，表現在外匯方面，是為外匯的高漲。

我國自從抗戰以後，於三十五年三月一日開放外匯市場，初定匯價為二〇二〇元，嗣因國貨出口未能暢銷，復於是年八月調整外匯為三三五〇元，其後因進口太多，入超甚鉅，又於十一月調整匯率為一二〇〇〇元，至今年八月，因貿易梗阻，外匯損耗，又改定基準市價，目前該項市價約為四二〇〇〇元，按日由外匯平衡委員會核定公布（近日外匯市價提昇已近五萬元——編者）。

外匯匯率年餘以來已有四次的調整，而經常的黑市總是高於法價，待至黑市與法價相去過遠，百弊叢生時，這才調整一次，現在的基準市價雖則是接近黑市，然而仍不能消滅黑市，而其準市價的背後仍有以為特種商品進口結匯之用。

外匯匯價不能穩定，逐步趨高，根本原因在乎我國幣值之日益跌下。其次，我國的貿易久為入超，例如去年對外貿易進口為一、五〇一、一六五、二四六、〇〇〇元，出口為四一二、一一一、八一一、〇〇〇元，進口與出口之比為一〇〇比二七。故出口外匯之供給甚少，而進出口外匯之需要甚多，國際收支不能平衡，外匯匯率自成逆勢。這更使法價或基準市價的不克維持，而造成黑市的滋長。至於外匯平衡基金，原只有治標的作用，即僅有平抑臨時波動的作用；要牠挽回匯價的狂瀾，那本是不可能的。何況我國目前的平衡基金，原無固定充實的基金，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機構，自更無維持匯價的能力。

幣價跌，外匯匯價必漲，匯價漲，外來的原料品以及日用品隨之漲價，國貨亦相輔漲價，故匯價的漲又刺激物價的漲，即更助長了幣值的跌。目前物價與匯價是相互為用，相互助長聲勢，以造成幣值的低跌。

六、結語

我國目前經濟上，險象環生，弊病百出，而其最大的病源則在乎內戰。在內戰的條件下，因赤字太大，通貨膨脹，徵實橫行；因通貨膨脹，分配失均，社會粟六；因徵實橫行，農村破產，耕無其田。此外又因兵役而引起農業人口的減少，更為促進農業經濟不景氣之因素。總之，一切社會病象之癥結，均出發於可咒詛之內戰。誠使內戰停止，一切經濟問題也容易得到解決了。

九月十九日完稿

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歷史的經濟的解釋）之四

前篇所論述的中國官僚政治的諸般特性，在我們一般舊歷史學家的

眼中，都是中國固有文化的精華，而在他們的筆下，且都被塗抹上了中看的玫瑰顏色。一切與此「精華」，與此「玫瑰顏色」不大調和的稱謂，就被斷然拒絕。「官僚政治」是從外國輸入的名稱，固不必說，就是一向公認為「吾家寶物」的「專制政體」，亦不被接受了。比如，歷史家錢穆會這樣告訴我們：「秦漢隋唐幾個朝代，政治武功，社會經濟，都有很好的設施。秦朝統一天下，造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局面，這便近於現世所謂民族國家的理論。秦以後，兩漢隋唐最有成就的事業是政治與社會。一統的政治和平等的社會」（見前述「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一文）。惟其社會是「平等」的，所以政治上的一統，並不是專制。然則社會何以見得是平等的呢？他舉出漢朝官制如何平等之後，接着說：「人民任官，都有一律規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他。清朝的考試，法律上規定的時間，三百幾十年來都未曾改過。至於考試的方法，皇帝亦不理會，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國的政治，實在不能算是君主專制政治」。究竟那是什麼政治？他沒有明白說出是「君主的民主政治」，也未拿出一「君主立憲」這個名稱，只含糊說是「一統的政治」。

一個歷史家這樣歪曲歷史，實在令人納罕。專制政體被他所提出的「平等」事實解消了，官僚政治自然要因此失去存在的依據。也許錢先生立論的主旨，不在用以「變」古，而在求所以「飾」今，因為在他發表那篇大作的抗戰後期，「漢唐盛世」正被一般論壇上宣揚得天花亂墜哩！設把誅心之論手開不講，我們只有一點可以原諒如此這般的高論，即，一般舊史家原本就不大肯留意任何政治形態的社會經濟基礎問題，那個問題不弄清楚，他們理論上的支離矛盾，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但困難的問題是，中

國專制官僚政治之社會經濟基礎的探究，又不能刻板的硬套一般社會史的發展公式，這就不但叫舊歷史家摸不着頭腦，且使中外新歷史學家社會史學家莫衷一是的聚訟紛紜了。

這裏需要提出來講個明白的，有以次有關的幾點：

（一）專制的官僚的政治，作為一個社會體制來看，一般是產生在由封建社會移向資本社會的過渡歷史階段，我們如其不能把秦漢及其以後的中國社會，理解為那種性質的過渡社會，則中國專制的官僚的政治，究是如何產生的呢？

（二）如其秦漢及其以後的社會，仍是封建的，那種封建社會基礎上，為什麼也能產生專制的官僚的政治？它與一般封建制的基本不同點何在？

（三）由中國封建制的特殊社會經濟條件所限制的中國專制官僚政體，直到秦代始當作一個社會體制實現出來，其實現的歷程如何？在秦及其以後諸王朝的封建制，是否完全是地主經濟的？如其不然，將作何解釋？

我將在下面分別解答這些問題。

二

說官僚政治是專制政體的配合物，說專制的官僚的政治，是產生於近代初期，由封建社會移向資本社會的過渡歷史階段，那是近代國家觀和近代政治史所提供我們的一種認識。但正如一個有了自然科學知識的人，對於自然現象的理解，就不免受到許多拘束一樣，有了政治科學知識的人，他對於這裏有關的問題的想法，就不能太過「自由」了。

認定中國秦漢以來直至現代以前的政治支配形態，是專制的，是官僚的，如其同時又不承認這個歷史階段是過渡性的，於是，比照一般的講法，就得對中國專制政體官僚制度的產生，提出一些異乎一般的說明來。那些說明，值得在這裏提論到的，約有以次三點：

第一，以水來說明：把治水或講求水利，與中國專制官僚政治關聯起來，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在卡爾的「資本論」中，已可發現一些片斷的提示。但最近注意中國社會問題的蘇聯學者，如 Vargo, Madjar, Wittvogel 等，差不多都特別強調此種說法，以為灌溉對東方對中國經濟，有決定的重要意義，因為要講求水利，要有集中的組織，要有特殊技術人材，於是才產生專制國家，產生有學問的治水工程師——官僚。把原有的事實，強調得太過火，即使不完全是錯誤，也接近錯誤了。這些「水的理論家」其所以犯了這種錯誤，大約有兩件事實「鼓勵」他們；其一是西方人一向比較多知道一點的世界，如埃及，如巴比倫，如印度，都有關於治水方面的記載，特別是埃及，尼羅河早被視為它的生命線，它的政治經濟組織，與集體人工灌溉有極密切的關係；而其二，中國誇大宣揚的大禹治水業績，早成為國外接近中國歷史的人，最感興趣的故事，所以，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Wittvogel 也就不自覺的發生這樣的聯想了：「黃河與揚子江……自古即促成河道工程官僚政治……支配中國的自然力，是大河巨川，所以，隨着農業的發達，河道工程官吏的勢力不能不增加起來。名聲噴噴的禹，其最大功績，即在於調制河流，整頓山川……」（轉引自錢亦石著「中國政治史講話」第九八頁）。然而中國「政治的一統」，是在大禹以後很久很久的秦代才開始實現，秦代專制官僚政治，據歷史所載，與水的「淵源」並不很大，水的理論的系統說明者馬桑爾 (Madjar)，又相並提到另一個「外敵」的因素了。

第二，以「外敵」來說明：「拉狄克 (Radeck) 否認水的作用和意義……否認韋伯 (M. Weber) 關於中國國家之起源，是由於治水的必要的解說。代替這個理論，拉狄克提出自己的理論，說中國是在和遊牧人的爭鬥中產生。可是，聰明免不了錯誤，中國的官僚制度，不僅是在和遊牧人的爭鬥上產生，而且也在和水鬥爭。並且也不僅是在和水（洪水）爭鬥，如拉狄克之了解韋伯，也是為着水的取得」(Madjar 著「中國農民經濟研究」陳彭合譯本第六九頁)。「這個官僚制度，是因為實行密度灌溉經濟的必要，指導這經濟的必要，和一方面組織抵抗遊牧人的侵入，一方面化遊牧人為農夫的必要而產生的」（同上第七〇頁）。秦代在統一過程中，曾有過「用注填闕之水，灌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的鄭國渠；而在滅亡六

國以後，又「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築長城」以及其他對外戰爭，彷彿用治水再加上對外敵鬥爭，來說明專制官僚政治的產生，算是「言之有據」了；而且，秦以後的任一朝代，皆有水患，也皆有外患，自然也都需要專制官僚型的統治。然而，有一件史實，被作這種主張的學者看漏了，即中國歷代專制王朝及其相配合的官僚系統的建立，治水要求與對外戰爭要求，都不會變為怎樣重要的敦促因素，而往往只是到了那種政治支配形態已經成立起來以後，才有餘力講求水利，講求「四征弗庭」；而且，在另一方面，專制官僚的統治，到了每一王朝後期，差不多都成了招致水患與招致外患的直接誘因。那將如何解釋呢？

第三，以士的創造力量來說明：我在前面已引述過沙哈諾夫關於春秋戰國時的「封建混戰，培養出了封建官僚」的說法，現在却要論及吳景超先生所特別推獎的吳保安君的意見，那是說，「君主集權的工作，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必定需要一些人來幫助他，這些人便是士」，這是不錯的；「這種新的人物，或為淪落的貴族，或為不得志於本國的貴族，或為自耕農的子弟，總名為士」，這也是不錯的，但往後他就想得有些飄飄然了，以為士想做官，又看不慣貴族的驕橫，於是就「想抑制貴族，故主尊君，由尊君而聯想到一統，由一統而想到政權不應該由某階級獨占，應依照機會平等的原則，交給有才有知的人去掌理。他們這種理想，正合當時集權君主的需要，所以士在政治社會上逐漸取得領導的地位」，接着舉了「戰國時的七雄，沒有不用士的」許多例子，彷彿集權政治是依照士的理想，而又為士所實現出來的。吳先生在這樣介紹了吳保安君那篇「士與古代封建制度之解體」以後，就提出他附和的大見解：「士對於創造君主集權國家及打破封建社會的貢獻，由作者所舉的例證看來，是無可懷疑的。因為打破中國封建社會的人物，與歐美打破封建社會的人物不同，所以中外歷史的演變也異其趣向。作者說：在西歐國家統一運動歷史裏，我們但見許多城市商人派代表，開國會，加重君主之權，以裁抑貴族的封建勢力。可是在中國統一運動歷史裏，却出現這許多稱為士的人來，既不作買賣，也不甘於作地主，終日地開囑着要改革社會，要從貴族手裏取得政權，為未來歷史創一新新的局面」（以上參見「新經濟」半月刊第九期）。然則由士創造的嶄新局面，究竟是稱為什麼局面呢？兩位吳先生都沒有說得

明白，只含糊的表示：「在西洋史上，封建社會以後，是工商階級所開闢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史上的封建社會以後，則未嘗有此」（同上）。

總之，水利也好，外敵也好，士的創造力也好，也許分別在某種程度，對促成中國專制的官僚的政治，有所幫助，但中國初期封建的解體，或官僚政治的實現，不但不能由這任一動因解釋，且也不能由它們三方面連同得到解釋。它們極其限，不過是在更基本的動因上演着副次作用罷了。

二二

我同意上述兩位吳先生所說的，「中國歷史演變，也異其趣向」的說法，但其趣向之異，不在西歐封建社會以後，出現了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封建社會以後，「則未嘗有此」，而在中國古代或初期封建社會以後，又出現了中古的或集權的官僚的封建社會。

這裏存在着對於封建制本身的認識問題。

單純從形式上，從政治觀點上考察，說中國封建社會在周末解體了，那是不無理由的，即作者在中國社會史論戰開始時，亦是如此主張（見「讀書雜誌」論戰第一輯拙作「中國封建制度論」），但後來對封建制作更進一步的論究，始覺得錯了。

說封建制度是把自然經濟作為它的基礎，那比之過去的純粹政治觀，無疑是進步了，但「自然經濟」云云，畢竟是太有相對性的名稱，就是「一小農經營」來範圍它，亦還不會把握住問題的核心。對封建制作有全面決定作用的因素，乃是由農業勞動力與土地這種自然力相結合的生產方式，當土地這種自然力，這種在當時的基本生產手段，以任何方式被把握在另一部分人手中的時候，需要利用土地來從事勞動的農奴或農民，就得依照其對土地要求的程度，與土地所有者——領主或地主——結成一種隸屬的關係，把他們全部的剩餘勞動，乃至一部分必要勞動，或其勞動生產物，用貢納，用租，用賦稅或用其他名義，提供於土地佔有者；並且，為了保障這種財產關係的安穩與榨取的順利推行，在這種社會經濟基礎允許或要求的範圍內，相率成立了各種與其相應的政治法律道德的關係。因此，封建制度並不像我們過去乃至最近尚為許多歷史社會學家者所想像的那樣狹義的東西。蘇聯學者杜博洛甫斯基說：「在自然經濟形式上的封

建制度，以政權的非集中化為特徵。但是具體的後來的真實性，可以帶許多重要的變化加入這種標誌中去，直至把此特徵消滅掉為止。例如，歐洲在封建時代的個別期中形成了集中化的國家……但在基本上，絕對沒有變更農民與站在農民之上的私有者或土地使用者間的生產關係，就是沒有變更存在於封建制裏的生產關係」（「亞細亞生產方式封建制度農奴制度及商業資本之本質問題」第八五——六頁，轉引自錢亦石著「中國政治史講話」第一八六頁）。

從這裏，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或初期的封建形態，即完全建立在自然經濟形式上的那種非集中化的封建政治關係，雖然經過春秋戰國時代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活動，軍事的交通，帶有拓殖性的戰爭，逐漸把那種非集中化的特點消除了，以致出現了秦代的一統，但那種變化，至多不過是在政治上說，把非集中的貴族統治的封建形態，轉變為集中的專制官僚統治的封建形態；在經濟上說，把分田制祿的領主經濟（Landlord Economy）封建形態，轉變為「履畝而稅」佃田而租的地主經濟（Landowner Economy）封建形態。封建的形態是改變了，其本質還存在着。這就是說，中國周代封建天子，把他治下的領土與領民，除自己直接支配者外，其餘都分歸其子弟或功臣，其子弟或功臣，又按照其階位，把它由封建得來的領土與領民，除了自己直接支配者外，再分封其屬下。就是自天子以至於卿大夫，即所有屬於支配階層的人，都依着土地的佔有形式，而寄生於農奴的勞動生產剩餘上面。秦代的土地制度不同，從而它對於領土領民的支配方式也不一樣；秦始皇及其以後的許多專制王朝，不把領土領民交於其諸子功臣治理（漢代在初期亦會分封諸子功臣，但不但所行範圍甚狹，且在景武之世，逐漸削除了），而大權獨攬，對諸子功臣僅「以公賦稅重賞賜之」，此似與周代大有區別。但問題不在領土領民以何種方式支配，而在支配領土領民的所謂支配階級究竟是寄生於那種形態的生產上面。周代對其領內可以榨取的農奴勞動剩餘，直接讓諸子功臣分別自己處理，而秦代及其以後王朝的帝王，則把那些形式上較自由的農奴或農民的勞動剩餘，全部以賦稅形式收歸已有。然後再由俸給的形式，「以公賦稅重賞賜之」。可見秦及其以後的官僚主義的專制機構，與周代的封建機構，同是寄生於農奴生產形態上面（以上參見拙編「中國社會經濟史綱」第一〇七——

八頁)。

可是，同爲封建制，爲什麼一由領主型轉向地主型，離心的非集中的局面，就要移轉到向心的集中的局面，而成爲專制的官僚的統治形態呢？這是不難說明的。在「封土而治」「分地而食」的條件下，每個封建貴族，都能把他支配下的領民領土，看爲自給自足單位，這雖與初期較不發達的自然經濟形態相關聯，但每個自給體，都不免帶有離心的獨立的傾向。一旦這類大小自給體，由逐漸發達起來的交換與交通所分解，以及由與此相伴發生的爭地戰爭所破壞，它們要就是被消滅，否則就是擴大，就是化前此的大小獨立自給體，爲一包容的通的有於無的整體。前述「士的創造力」云云，不過是在這種客觀變動情形下，「因利乘便」的盡了一點促進作用；等到統一局面完成，大規模的官僚政治機構以及與其相應的擴大消費，需要增大稅收，需要講求水利，而統一專制局面，也使在某種限制內需要破除割據政治境界的治水事業，便於推行。治水事業的推行，確能在某些場合，加強專制的官僚的統治，但決不是專制官僚統治由治水要求而產生，而是它的反面。大規模的講求水力，只有在專制統一局面下，才特別有可能與必要。

要之，中國的專制官僚政體，是隨中國的封建的地主經濟的產生而出現的，它主要是建立在那種經濟基礎上的，而我們也是容易由秦代專制官僚政治實現的過程，來明確予以證實的。

四

史載「秦則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一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寡」(「通典」)。彷彿舊來的社會經濟體制，即基本的對貴族領田制，對農奴分等配田，因而，田地不許買賣(所謂「田里不粥」——「禮記」)，農奴不許轉業(所謂「農之子恒爲農」——「管子」)，不許遷移(所謂「農不移」——「左昭」)的世卿，世祿，世業的固定化的領主經濟制度，是由秦孝公用商鞅來破壞的。其實，像上述的這種用土地束縛農奴，而實際也連帶束縛貴族的所謂「帝王之制」，就在周代極盛時，它究在其領內推行了多大的範圍，並且實施到了什麼程度，迄今還成爲尙待研究的問題；而一臨到比較有信史可徵的春秋戰國之世，特別

是在戰國，因爲鐵器的普遍應用，社會生產力一般的增加，包括商業活動與高利貸活動的交換經濟的發達，以致舊來在某些地域某種程度確實施行了的領主經濟封建制，一般都無法繼續維持。

在連續「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的戰亂過程中，一切有固定性的制度，都將相率解體。而成爲領主封建制之基石的「世祿」，在戰國時代孟軻的口中，已表示由「暴君汚吏漫其經界」，而在小國寡民的滕國，亦不復能保持。世祿是世官世卿的存在基礎，同時又是農民世守其業的依據。故秦代商鞅變法與此有關的幾點是：

(一)「宗室非有功論，不得爲屬籍」，即無功不及爵秩。

(二)「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秦爵二十等，起於孝公之時，商鞅立此法以賞戰功」(「文獻通考」)。

(三)「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又「秦孝公用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通典」)。

(四)「墾粟而稅，上一而民平」。

所有這幾項改革措施，都在破壞世祿世官世業秩序：凡有功者可以獲得爵位與土地；凡耕作努力者，可以獲得私有土地或更多土地；土地收入以賦稅方式歸於上，均在爲私有土地的地主經濟，奠立根基。可是，所有這諸般作爲，並非由秦國君臣所獨創，那在當時已經成爲一般的變動趨勢，秦孝公同商鞅不過確認此趨勢，用政策，用法令來因勢利導，貫徹推行罷了。比如，就賦稅一項而論，史載「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其實，那無非是魯宣公「初稅畝」，「履畝而稅」，乃至「鄭子產作丘賦」(「左昭」)的繼續。

然而，包括全面的變革，畢竟是由秦代完成的。秦與六國並立，而獨能成就此種創舉，亦並非偶然。秦僻在西陲，與西戎犬戎並處，直至領主封建制開始崩潰的周平王之世，始建國家，其所受古代封建束縛，當較其他國家爲淺；加之，秦當周室衰微之際，以「僻處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盟會」；阻山帶河，比較少受列國相互爭地之戰禍。因之，一旦發憤圖強，就可能暢所欲言，而不必遇事拘執成規，遇事顧慮環境。秦之列王，強半皆用客卿爲相，用人惟能惟賢，已經是對於貴族政治的打擊，而又開官僚政治的先聲了；用人作風改變，行政措施自無須遷就傳統既成勢力。所以，商鞅的徹底變革方案，並不會遇到何等阻礙。

孝公商鞅變法的結果，是「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是人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總之，是「國用富強」，是為後來吞併六國立下了堅實的社會經濟基礎。

秦國的版圖每有度擴展，它顯然會把這致富圖強的方法，以地主經濟代替舊領主經濟，以官僚政治代替貴族政治的新社會秩序，一度予以推廣。秦始皇吞滅六國，統一天下，統治時期雖極短促，於一古人之遺法，無不革除；後世之治術，悉已創導。甚至專制政體之流弊，秦亦於此忽忽之十五年間，盡演出之。歷史家夏會佑氏在如此指述之後，更提出秦人革古創今十大端：（一）並天下，（二）號皇帝，（三）自稱曰朕，（四）命爲制，命爲詔，（五）尊父爲太上皇，（六）天下皆爲郡縣，子弟無尺土之封，（七）夷三族之刑，（八）相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郡守、郡尉、縣令皆秦官，（九）朝儀，（十）律（見「中國古代史」第二三二頁）。這十項「創作」，殆無一莫非專制官僚政體的支柱。然其中最基本的措施，則是「天下皆爲郡縣，子弟無尺土之封」。因爲有了這一項根本決定，任何貴族，就沒有「食土子民」的權能。經濟政治大權集中於一身，他就有無上的富，無上的貴，無上的尊嚴，「朕即國家」，他的命令就成爲制爲詔了，而分受其治權的大小官僚，就得仰承鼻息，用命受上賞，不用命受顯戮了。——一切都說明專制的官僚的政體，必須建立在地主經濟封建制基礎之上。

然而，秦到始皇統一之後，雖把孝公制定的爵秩（秦爵二十等爲徹侯……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漢書」百官志）廢除了，「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漢初諸子功臣裂土受封，其後亦逐漸剝削其政治權和經濟權，而變爲「就食長安而不至國」的遙領領主，變爲名義上的侯國。但東漢及其以後的其他歷代王朝，例皆多少賜予其諸子功臣以爵賞和土地。特這種點綴在地主經濟封建制下的領主經濟成分，因其比重過小，其性質亦不同（中國貴族領地不輸不納，迄未經法律明文規定），其所及於政治的作用，自然是極其有限的。

要之，中國二千餘年的專制官僚政治局面其所以是由秦國開其端緒，乃因中國二千餘年的地主經濟制度，是由秦國立下基礎。這種政治經濟形態的配合，不但改變了中國封建性質，改變了中國官僚政治形態，且也改變了中國專制君主與官僚間，乃至官僚相互間的社會階級利害關係。

大別山下

杜漸

共軍劉伯承部大舉南下。自上月十日越過隴海路，配合黃汎區的魏鳳樓張大生部，橫跨黃淮大平原，經過十七天的急行軍，連奪數十城鎮，終於八月二十七日進入了大別山。這一個曾經過慘烈內戰的山區，在過去是紅軍根據地之一，當地的人民一向被視爲「不穩的」，這一次重入共軍之手，在「土八路」協助之下，使國軍的追擊部隊，增添了不少麻煩。共軍進入大別山後，並在鄂東方面進佔羅田，英山，黃梅，直達長江北岸的滠水；并在皖西方面，從立煌向東南發展，竄奪六安，霍山，舒城，桐城，以及巢湖南岸的廬江，潛山，無爲以迄長江北岸，現安徽省會合肥及著名的米市蕪湖，都感受威脅。

自九月二日共軍奪取六安後，皖西皖中大爲震動。因爲沒有部隊堵截，一切都像失了憑藉，同日下午夏威由蚌埠馳抵合肥督師，合肥兵力單薄，城內人心浮動，紛紛向外逃難，但因到蕪湖和蚌埠去的舟車全部已被徵供軍用，客班停止了，老百姓即使能湊足旅費，而沒有特殊辦法的，依然走不出去。

九月十二日以後，皖中皖西的國軍馳援部隊，陸續趕到，沿大潛山區及舒合路上，都有了激烈的戰鬥，皖省的戰事重心顯然是由皖西移向皖中了，截至

九月十五日爲止，共軍因係採取主動，頗佔便宜，後經國軍猛力反攻，始退出六安、舒城、霍山等城池，現在豫南又告急了，據官方報紙的報導，共軍三面圍攻商城未逞，但實際上，立煌商城間，商城固始間，商城潢川間，仍在混戰狀態，目前共軍的企圖，大約不外：一，打通黃汎區到大別山的走廊。二，積極向西發展，以期與繼續南下的共軍相呼應。迄今共軍的主動似仍未易手。

大別山區的國軍，在戰略上，是利用山岳地帶的自然形勢，增強防禦的兵力，企圖組成一個大口袋，包圍夾擊共軍，以期聚殲。不過，這個區域太遼闊，除非有山東戰場相等的兵力不辦，即使口袋形成了，能否繫緊口袋，使共軍從容就戮，還很成問題，李先念即是一個舊例。

在內戰的火海裏，人民真的忍受不了。徵兵徵糧服役後，已經使他們喘不過氣了。戰火燃到之處，就只有死路一條。國共兩軍交相來去，人民必須以雙重人格來應付他們。尤其國軍紀律不算太好，如在霍邱的李北園攻，在橫川的私立淮南中學，都留下了極壞的印象。希望軍事當局要嚴令禁止軍隊擾害人民才好。（九月廿五日寄自蚌埠）

從「外科醫生」談到「市民治」

周華

「外科醫生」

——陳誠

張羣院長的北來是頗為重要的新聞，他一向是躲避記者的能手，如今又担了「責任內閣」的担子，所以是不會洩漏出什麼新聞來的。而從他匆匆沒有在天津停留，先赴東北，我們也可以知道他這次北來和東北的人事更動大有關係。

東北人事更動，是陳誠總長兩次蒞東北後，返京約過了半個月才實現的。不用說是爲了以前的情形有未盡善之處，我們只要看前此東北共方發動攻勢時大員們來平的踴躍，也可以略知一二。當時每家攜帶着十幾件乃至幾十件行李，火車站行李房的脚夫一看見取行李的人就湊上來：「是潘陽來的吧？」這些官員，住在各旅館或是其他處所，還要不時舉行跳舞會，一派昇平氣象，不像是來避難的。若是與他們接近一點，則更可以聽見每一個人的

一些逸聞趣事和接收外史等。

現在總算換了人了，陳誠總長兼任東北行政主任之後，到了瀋陽，地方士紳們一再對陳敘述他們的希望，盼望陳能像「外科醫生」，能夠「快刀斬亂麻」，痛快地改變一下作風。陳自己還很慎重，不預備有什麼刺激性的動作，有一兩個「小老虎」少將被遣送出境，實際上算不了什麼懲罰。陳誠兼主任的意思也似乎只望能慢慢地來，我們從他的舉動裏可以看到兩點：（一）既往不究，（二）顧全各方面關係，不用重典。爲了上在後更動了政學系的人，又爲了財政經濟方面要同行政院下面各部份有一個連絡，所以張羣才有東北之行。

想像的那樣多，所傳種種，多少帶有宣傳攻勢的性質。記者曾訪問一個老年的自由主義教授，曾經談到這些事，他認爲東北新行的「三不主義」（不送禮、不賭錢、不跳舞）以及早上八點鐘點名等等的辦法，和從前胡展堂清早五點鐘見客的規定，並沒有二樣，都是「末」而不是「本」。

目前根本的問題恐怕還在怎樣使人民能安居樂業，使人民能感到國軍控制區域的軍隊和政治的確好一些。華北方面似乎也有人提及這一點，所以最近有整頓地方武力的事。中共區域的農民，戰前是吃雜糧的，如今他們能一天一頓雜糧一頓白麵了；戰前他們是一個月吃不了一次葷的，如今每星期吃幾次葷了。怎麼能使他們覺到這面更好？在目前中國，必須要給農民一點力量，至少要用相當劇烈的方式，去實施民生主義。改良成份太濃的辦法，在貧富對立如此尖銳時，是不中用的。

「市民治」與

胡適

從東北回過頭來，講到天津。說起時局，不免要想到魏德邁。魏在天津見到張伯苓校長，張曾向魏提及天津吏治的情形還好，據魏傳當時說：他的確知道有很廉潔的，但只有一個人，接着就說出那個官員的名字。如果魏當時的話屬實，我們不免在這裏要抽一口冷氣了。但也還有不爲魏將軍那樣悲觀的，滿懷着「慈悲心腸」的，如胡適校長便是其中之一。

原來前些年時北方成立了一個市民治促進會。聽說有人去拉周炳琳先生參加，碰了一個大釘子，但不久還是拉到一些人如胡適校長梅貽琦校長張伯苓校長等加入，並且儘管有一位政治學者說「市民治」這詞還是頭一次聽到，而不管他是「市」民治還是「市民」治，總之是成立了，北方輿論盛譽之爲「自由主義者的大聯合」。胡適爲了市民治促進會開理監事會，在九月二十一日由平去津，當天下午在公能學會演講，演講中就提到他當天上午參觀北平市參議員選舉的情形。其中一段說：

「我們看到一位瞎子來投票，這太感動人了，外國記者忙着替他照相，但是他也不知道是誰。有人建議他用手在候選人名單上任指一個，但他是盲人，連指的能力都沒有，結果由他的小孩子在名單上隨便指一個。」

我們照抄胡先生這一段談話，並不是像他那樣來證明選舉辦法「有缺點，有值得批評的地方」，而是要說明知識份子與人民的隔閡。看見瞎子的時候，大概認爲連盲目者也來促進「市民治」，所以「這太感動人了」，而事實怎樣呢？我且以自己來作個例子。選舉的前一日，戶口警察忽然駕臨敝寓，把大小數目的身份證先討來查看一番，再囑咐第二天務必去選舉，最後方建議我們如無目標，可以選某某女士云云。所謂某某女士，年紀很輕，我們在電車廣告及影院幻燈中均已見過。戶口警察方法，甲長又來，又建議我們選舉另一个人；不久弟弟從校中回來，說校長叫我選一家選另一個某某人，這已經是三個人了，我們因爲無所適從，第二天就沒有去實行「市民治」，不料中午甲長忽又來，告知非去選舉不可，無奈只得去「市民治」了。我很疑心這位瞎子先生是我們的同志，他當然更想不到外國記者曾給他照像的，否則恐怕便不想去了。

政府革新期間，有的報登了專電，說將有北方自由主義教授加入政府，並有人說是周炳琳或錢端升。甚至有人提及胡適的。明瞭這幾位最近情形，都會知道這種事是沒有可能的。最近傳來陳雲屏就任青年部長的傳聞，這大概就是政府所能網羅的人才了。

總之，無論「外科醫生」也好，或「市民治」也好，都是在革新或改良之間兜圈子，能挽救目前的危局嗎？我懷疑！（九月二十二日寄自北平）

北平學生進步了

文琪

學運與北平

正如前些日子華北學聯致魏德邁備忘錄中所云：「中國迄今未有健全的公民輿論，而唯一可代表真正民意的即為中國的青年學生運動，故實國拉織摩爾先生說：學生運動是現代中國發展的潮汐表。」的確，歷來中國的學生運動都負有隆重的歷史任務。從「五四」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開始，接着是「一二·九」的「團結一致，全民抗戰」抗戰勝利後「一二·一」的「停止內戰，成立聯合政府」直到最近的「反內戰，反飢餓」可以看出學生所提出的口號都是歷史必然的趨勢，而且有它一貫的傳統任務——「爭取民族解放」。在這偉大的目標下青年學生付出了最大的代價，他們在付出了熱心與熱情之後更付出了他們的熱淚和熱血。統治者

對付學生的手段從石子、水龍頭進步到手榴彈、馬隊，甚至於國際戰爭中禁用的達姆彈。然而在殘酷的現實教育之下青年學生也進步得多了，他們懂得怎樣在惡劣的環境下去完成他們的任務，在不是「人」的土地上建立起人間樂土，抱着殉道者的精神，鮮血和生命又何足愛惜呢！

北平——這「五四」和「一二·九」的聖地，曾經是兩次偉大的學運的發祥地，如今青年學生又在這塊土地上再度站立起來了。經過敵偽多年統治變成無聲的北平，如今又成爲了整個學運中最堅強的一環。

抗戰期間北平一直在沉默着，然而從這裏南遷的學生却先後揭起了「討孔運動」和「一二·一」，在沉悶的整個大後方中贏得了「民主堡壘」的稱號。復員後學生漸漸的問

來了，「民主堡壘」也就在這裏建立起堅固的據點。因此人們相信這長時期可怕的沉默就要打破；一點也沒有錯，事實也證明了今天北平學運的重要。但是一向緘默慣了的古城，却能夠演變成今天的狀況，這其間的過程也并不簡單。青年學生在沉重的功課下，啃着高頭之餘，也確實費了不少心思來想來做，怎樣在政治環境特別惡劣之下使北平變爲「有聲的北平」這裏還得重複一句話：「青年學生在殘酷現實教育之下也進步得多了。」

從復員到抗暴

在勝利後的初期，尤其是聯大沒有復員北返的時候，北平是相當寂靜的。因爲那時還有一絲和平的氣息，剛剛天亮了，大家都像喘了一口氣，一心只望天下太平好好地過日子。

從四川，從雲南，學生羣慢慢移向北方。就在這個時候，李公樸和聞一多兩先生先後被刺了。學生們經過一個長距離的旅程，得到的是令人悲憤的噩耗和沿途目睹的破爛貧窮的記憶，當學生陸續到達不久，便發出了抗議槍擊曹桂事件的文告，響應美軍退出中國週的文告，這微弱的聲音在古城開始有了反應。然而整個情況還是惡劣的，一向住在北平的學生，多年來的教育使他們不大敢說話，更不敢有所行動。對復員回來的學生大都有新奇之感，互相間也有相當隔膜，學生們自己也知道這樣隔膜會削弱自己的力量，但是年青人的智慧與熱情終於消除一切隔膜，大家溶成了一片，很少有「真」「偽」的問題在這裏發生過。北平的政治環境的確是比較他處惡劣得多。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開始從事

健全本身，能夠代表全體同學意見的學生自治會在各個學校漸漸組織起來。不能忽視，學生自治會的組織在學運中是有其特殊的重要性的。清華燕京的自治會成立得最早，因此復員後的初期學運中也表現得最積極。北大在這時期內情況是相當混亂的，因爲校舍分散，學生間的份子複雜，加以在XX的主持下，據說連一部份校役都是真有「特殊任務」的。因此自治會遲遲未能組織起來，其他的專科以上學校在這個時間內，有的也正在力求健全自己，有的在潮流的影響下開始逐漸的演變，不再不問不聞的埋頭在書本裏。但有的學校仍然特殊勢力橫行。至於中學，整個可以說是與學運脫離無關的，這固然是因爲過去的環境及學校當局防制的結果，中學生自己本身對現實認識不夠深刻尤其是

主要的因素。總而言之，這個時期內學生隊伍的力量是不夠強大的。

東單事件發生，激怒了全中國有良心的人民，北平學生開始第一次行動了。由於上述情況的存在便發生了許多困難，北大在這時期兩次開會都被特殊人物搗亂，後一次甚至演出了全武行。誰也想不到在全武行演出後的第二日，一萬人的抗暴遊行會出現在北平的街道上。這一次突擊實在出乎人們意料之外，在遊行的前一晚沒有一個人甚至學生會斷定明天會遊行，更不會想到有一萬人的遊行。由於環境的惡劣以及本身的不夠堅強，北大只做到了儘量發動本校及城區同學參加，而遊行的決定則是在清華燕京兩校自治會的聯席會議上，這個會議從十二月廿九日的晚上開始，一直到卅日的清晨四時才決定了遊行，遊行的

準備工作是前一日就已經弄好了的，「一二，卅」就這樣爆發了，震動全國各地的抗暴運動也跟着掀起了。

在險惡的環境中，學生們表現了高度的勇敢，機動，智慧。

「一二，卅」和「六二」

在「一二，卅」中沒有中學生參加，而他們都目擊了歷史的一幕。到了「愛國護權運動」，中小學生被迫着去參加而大學生都冷淡下來了；北大只有一個，派去接濟華學生入城遊行的汽車只有兩個人坐上去，學生圍住了汽車往裏面丟鈔票，大叫：「不要錢不要面！」我給你錢，不要替清華丟面。「車身上貼了「棍子專車」，在「歡迎棍子坐車遊行」聲中汽車駛出了清華園，「護權運動」像傀儡戲般結束了。許多學生，尤其是中學生，漸漸對現實有了較深刻的認識，成羣結隊的常常出沒在北大，清華園，燕園。在民主牆邊，在一二，一圖書館裏，在

大哥哥大姊姊指導下小姊妹們正在向現實學習。在北大清華燕京的許多集會上，中學生都不遠千里而來參加，回去之後，他們開始閱讀一些民主、進步的刊物。在這個時期，許多學生在蛻變中，許多人都懊悔為什麼沒有參加抗暴遊行，也有許多人懊悔為什麼那麼糊裡塗塗去參加「護權運動」。站到學生隊伍的人是一天天的多了，不僅是大學生，而且還有大量的中學生。「五四」，今年是特別的被學生熱烈的紀念着，其在北平。在學生自己的刊物上如清華週刊、燕京新聞，都極力指出「新五四」的必需和它的必然到來。張奚若，張東蓀，吳晗，吳之椿等許多人更替學生指出了「新五四」的內容。在五週中，各個學校的歷史晚會，科學晚會，文藝晚會，詩歌晚會，營火會，戲劇晚會，座談會都吸引着大批的人羣。隨着對現實更深刻的認識，學生了解自己的責任之後，「新五四」在慢慢的醞釀，終於在「反內戰，反飢餓」運動中表現了學生力量空前的強大。

當京滬一帶還在進行「吃光運動」「挽救教育危機」的時候，北平的學生明瞭時機已經成熟。首先清華在五月十五日的系科代表會上議決為「反內戰，反飢餓」而罷課，並組成了「反內戰反飢餓罷課委員會」進行工作，這就是澎湃全國反內戰反飢餓運動的首先發難。北平各校立即響應，「五，一八」血案促成了華北學生聯合會的成立，更堅定各校罷課和「五，二〇」遊行的決心，在「反內戰，反飢餓」的旗幟下面，全國學生的聲音變成了為一個目的而呼喊，這也就是大人先生們所謂的「學潮變質」。

在這次運動中首先應該提出的除了華北學聯的成立外，就是北大院系聯合會的組成，使北大團結起來成為學運的主要份子。其次，不僅是全市大學差不多都動員了，而且還有大量的中學生。在「五，二〇」遊行的隊伍裏面就有匯文中學，貝滿女中，市立女一中，市立女中和其他中學的學生。在這個時期，學生的隊伍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堅強而壯大，在華北學聯的領導下是不怕任何迫害的。

「五，二〇」遊行歸來，近二萬的大中學生坐在民主廣場內一致鼓掌擁護華北學聯代表報告：「定六月二日為反內戰日」這就是「六二」的由來。從「五，二〇」到「六二」學生間曾經有過相當激烈的爭論，以學生的情緒來說，「六二」的罷課遊行似乎是勢在必行，然而當局準備鎮壓到底也像是難以避免，因此學生間有了「過激派」與「客觀環境派」的爭論，後者以為當局不惜一切手段必然會大量削弱學生隊伍的力量，為了保存實力作更大的用處，應該有理智的決定，正如作戰的戰術也不是光靠拚命的衝鋒可以得到勝利。前者以為不管客觀環境如何，為了真理應不惜一切的犧牲，假如北平學生自己提出的「六二」別的地方有了行動，而北平在「保存實力，能收能放」藉口下退縮不前的話，對北平的學生是一種恥辱。結果，在華北學聯的會議席上，胡適和梅貽琦致詞之後，學聯通過了不遊行的議決案。連胡適也說：「學聯代表有政治家風度。」這明智的決定獲得了學生對學聯的信心，也攻破了許多無恥的謠言。

「六二」之後

在極端的恐怖中北平安然的度過了「六二」，以後的幾日中也連續發生一些事件，學生間傳說陰謀者要有計畫的破壞整個北平學生的團結，除了打擊力量比較弱的幾個學校外，更集中力量對付幾個起領導作用的學校。雖然這時候環境非常不好，尤其是最近的總動員令頒佈後更不能不謹慎，但是已經壯大起來的學生隊伍的力量是不容易被削弱的。「六二」以後，學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和以前的時期都有顯著的不同。在表面上學生似乎沒有那樣活躍了，其實學生間的團結與力量是在一天增長中。在另一種形式下他們仍然活躍着，這期間曾經有過民主廣場命名典禮的舉行，曾經有過遙祭武大三烈士的追悼會與罷課，曾經有過聞一多先生的週年祭。

暑假後，大批的學生離校返家了，誰能說這不是比在街頭宣傳更為有效的宣傳隊，內戰不停，反內戰運動是無法消滅的。自從「寫鈔運動」展開後，市面上的鈔票常常都寫有「反內戰，要和平」，還有許多多形式式的口號。留在學校裏的學生紛紛組織識字班，民衆學校，工役夜校，不僅在學校內展開，而且深入到農村裏去，在「到農村去」的口號下去灌輸真正的智識給善良的人民。

此外，如華北學聯號召下的助學運動，如北平學生對四大聯改走漏試題的抗議，都值得注意，因為外間已經報導很多，這裏不再贅述了。

今天北平的學生像一個久經風霜的巨人，他總得起任何艱苦的考驗，在沉鬱的環境下充實自己的力量，一切陰謀，暴力，都不會損他絲毫。在這黎明前的子夜，還有一段黑暗的時期，暴風雨隨時有到來的可能，但壯健的巨人不會害怕，只要「是時候了」的時機一到，北平學生便會英勇的站起來攜手前進！（八月卅日寄自北平）

藝文誌

迎淺予愛蓮

馮亦代

收到淺予愛蓮來的電報，定於十月三號搭「麥令阿達」號輪從美國西岸舊金山啓程回國，預計十月下旬初，他們當可以重親祖國的土地。是的，整整地一年了，當他回來放開畫人的懸眼，一看見這更爲殘破與荒蕪的土地時他能一掃淚跡海外，苦憶故園的陰霾心情嗎？

每次讀到他從紐約寄回來的信，對於那個大城市的生疏孤寂之感充盈紙上，有時他甚之頗有悔作此行之意，覺得即使他是貧困地生活在祖國，他却更可以親嘗到祖國的苦難；他依舊畫生活，但這支筆是生活在人民中間的。不過美國人對於他的尊敬，可以說也就在這一點上。賽珍珠評淺予在美所開畫展時便說：「葉先生的作品有興味叢生的作風，象徵了戰爭以來中國藝術的復興。一部份由於戰爭的需要，一部份由於新生的民族主義，中國的青年畫家已經開始以銳利的近代現實主義描繪他們的祖國與人民，雖然用的是自古相傳的工具。葉先生的作品是以至高的漫畫家的敏銳來表現的，但他的作品卻不僅祇是漫畫

而已。這些畫已爲他的人情感與憤激所豐富了的。這一種難辟入裏是由於他的自學而成就了他一己的繪畫方法。用傳統的技巧來解釋新的人民的中國。他在中國年輕一代的畫家中應名列前茅，我鄭重地把他的作品，推薦給美國的觀衆。」

我對於賽珍珠說淺予「用傳統的技巧」一點，不能十分同意。因爲淺予的繪畫方法固然汲取於中國舊傳統的極多，但他得益於現代歐美畫家的也不少，他的畫可以說是接受了中外的傳統，而另闢新徑的。但說他的畫爲「人情感與憤激所豐富」，則以爲是確論。中國儘有許多名畫家在美國名利兩得，一隻鳥，一枝竹，一條魚，大套寬術，變來變去變不出風花雪月與詩畫自娛的破落頭巾之外。至於生活，中國人民的生活，他們既不願明瞭，也不願描繪，唯恐一帶泥土，便不成爲高雅之士，外國人的錢包也不會爲他們而開了。淺予却不然，他把中國人民生活作爲他畫中的主要題材；憑着他的切膚之感，把這些生活生

五月丁香

趙涵

駱賓基著

建文書店出版

「五月丁香」表現的，是一個東北地主家庭的沒落，這裏主要的人物，是女地主——大德的母親，全劇在樸實的筆調中，却把這性格烘烘得極爲生動而完整。這是一個頑強的性格，不但因爲東北地方，自然界的賦性特別強悍，需要他們日夜的爲生活搏鬥，因此鍛鍊成這副粗獷的容貌；尤其因爲大德的母親是一個女地主，地主使她需要和許多人對立，要她從許多人的手上搜括血汗，使她必需精明而狠毒。同時，因爲她是女性，是一家之主，這就更得集中她的聰明與精力來對付環境，自然而然的就鑄成了她火烈強梁的性格。這

是可悲的。她是一個地主，她的一切打算都是爲着一個自私的目的，因此當她在這四處都是她的敵人的環境中掙扎時，就不免顯出她的無望和狼狽。從這樣一個性格裏，我們一方面看到了地主階級的貪婪殘酷的面目，也看到了它必然沒落的可憐的慘狀來了。事實上，當最後，爲着屈服於侵略者的淫威

「五月丁香」給我們創造了一個生動的典型，尤其強烈的，筆觸是那裏真實和樸素，語言用得是那

麼單純和自然。但是說到樸素，說到單純，在柴霍夫說來，是完全來自他生命的真純；他的風格，固然值得我們學習，然而絕不是可以強求的，因爲事實上，因爲每個人的感受不同，尤其時代不同，每個人的風格，也自然的會受其影響。我覺得在「五月丁香」裏，作者爲了過份要做到樸素和單純，不免近於「修飾」的地步了。我確實有這樣一種感覺，似乎作者爲着要保持那種平凡的生活的印象，反而怕去觸

動那存在於生活中的激動的鬥爭的感情。因此，有許多性格被他模糊了，有許多事件被他隱蔽了，是一種存在於生活中的堅強躍進的力量被其沖淡，而不能突出，不能感召我們了。這種潔癖，如果誇大起來，是會和自然主義的傾向接近起來的。

這是一個四幕劇，但看得出第三幕是以後插入的，因爲沒有一個第三幕，這劇中代表不潔的一個人的來去，就更爲模糊，因此，爲着加強她，也是加強一種希望，就出現了一個第三幕。但是也正因爲是插入的緣故，這第三幕就使我們覺得特別的不諧和。就其餘三幕說，作者甚盡力量做到把情節「化開」，使它平凡和樸素，而這一幕，却特別把情節突出，而在描寫上，就顯得只見骨架而不見血肉的毛病，那種語言上的單純和自然就反而消失了。從這種不諧和與不自然的錯誤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矛盾，這矛盾是由於作者還不能真切的強烈的突進生活的緣故，所以，在有的地方，爲要單純平凡而流於模糊不明，在有的地方，却爲着要添加一種希望而流於不真純了。

動地繪畫了出來。有一位外國友人寫信給我說：「在重慶看淺子的畫，印象並不十分強烈，但在紐約再看時，則感到他的畫的確是生活在中國人的脈膊裏的。中國人民的苦難再次顯在我的眼前，我感到慚愧，因為我沒有什麼可以幫助你們。」

淺子在美國也許沒有像畫花鳥的畫匠那樣地有大批美金收入，可是他的成就是無可諱言的。他把現代中國人民的生活與思想介紹給美國人；同時他會到許多美國的人民畫家，如克羅茲，葛洛伯，把中國現代畫家的作品展覽給美國畫家，使他們對於近代中國的繪畫，有一新認識。譬如丁聰的畫，便受到克羅茲無窮的欣賞。淺子在美國第一次畫展是由紐約美國插圖作家協會主持的，他們特別舉行了一個「中國夜」，看他的畫，聽他的講話。最末一次是在波士頓「司徒藝術館」舉行的，該館爲了對於作者的尊敬，把售畫收入的半數，捐給美國援華會。這一次展覽共有十一日，自六月十日至廿一日，成績很好。畫展所有的收入足夠淺子愛蓮到西印度羣島的風林達去走一次，這是愛蓮出生地。

去年的八月杪，正是愛蓮在逸園表演的時候，我曾經幫助她時演出，可是在好多次幫助愛蓮演出中，那一次却給予我最苦痛的回憶。我們沒有錢，僅有一點活動金是由佐臨，曹石坡，蕭家點幾位先生湊起來的；辦事人手不夠，什麼事情都須愛蓮自己動手，一面要排

演，一面要上街置備服裝等等；舞台地板上的縫可以伸進半個腳趾進去，而且隨處有鐵釘，沒有錢做佈景。沒有後台，後台設在聯華公司借來的大卡車裏。因爲要及早化裝，愛蓮和幾位同舞的演員夜飯都無法吃，每晚拿羅宋麵包用汽水送下咽喉去。但是觀衆的盛情是可感的，有一位裝甲兵團裏的兵士，從吳淞附近走到虹口公園，再搭電車來買票看演出；而閉幕後，所有車輛都沒有了時，他必得步行回去趕在第二天早晨銷假。連演了二場之後，票房收入很好，愛蓮希望能有點錢可以把她留在重慶的學生接出來，不幸有一位管理票房的人出了毛病，起初是帳目不符，等帳對清了，應該給的錢還欠了一大部。到今天，欠佐臨先生的及印刷費，廣告費，都沒有付清楚。

而有一天，我看到報上批評，說愛蓮的足尖不能在台上站穩，可真把我氣昏了。如果這位先生知道愛蓮在來滬前每天在重慶吃的什麼東西，我想他也要和我一樣氣昏的。因爲從大年初一到除夕，她在育才教課時吃的是黃豆芽，黃豆湯，鹽菜煮豆腐，豆板燒青菜等等，每天一粥一飯，連陶行知先生也是這樣吃的。自然逢年過節可打牙祭，進城也可以吃大魚大肉，但每次都使她害着腸胃病回去。這就是這位藝術家所過的生活，所得的營養，而居然還有人在提倡舞蹈的美名下，吞吃她份裏的收入！



音樂界的「第三種人」

金穎

音樂藝術陣營中也有「第三種人」。他們既非「舊」，也非「新」；既批評學院藝術的珍貴木乃伊，也鄙薄新音樂的與人民大眾相結合。非甲非乙，儼然自認爲「第三種人」。

或者：理論上贊同新音樂，編起刊物却大登奴民愚民歌曲；或者，文字上攻擊學院藝術，開起樂會却滿紙洋歌，同時用昂貴的票價拒真正愛好音樂的窮小子於門外。結果呢，像甲也像乙——正確點說：兩者之外的「第三種人」。

此輩「第三種人」的根源是「市儈主義」與「機會主義」的結合，而以獻媚、邀寵、扯淡、幫閑作爲敲門進身的手段，因之，「大使音樂家」（註）輩出，「頌」歌叢生，音樂會也時時舉行了。

音樂陣營中的「第三種人」，其實是統治階層豢養的臣僕，其發展的邏輯是：

幫閑——幫兇——沒落。

（註）某教授兼X長，痛斥其禮聘的「屬僚」（也是教授）違抗命令，不在一個高貴的會場上演奏，憤然大呼：「主人大便時叫我拉提琴，我也只好照辦」。對人譽其一片忠心，呼以「大使音樂家」。

代生活享受的人，甘心吃這不明不白之苦，是不能想像的；不過愛蓮苦過了這麼多年了。不是她對於生活享受沒有要求，而是她對於藝術的虔誠克服了她的一切困苦與不如意。

愛蓮在美國的演出，據我所知道的，以本年三月中的兩次最爲盛大。因爲在美國預定畫展場所須在半年前，而預定戲院則至少須在一年前，要舞台的困難比在上海與蘭心大戲院訂合同還困難百倍。她的兩次演出，一次在紐約五十八條街的音樂廳，一次在勃洛克林的音樂學院。前者是美國東西協會及華美協會主辦，後者則由勃洛克林藝術科學研究院主辦。第一次演出還有華僑組織劉其模領導的中國音樂戲劇協會的伴唱，

同舞者爲朱曼玲小姐，喬治·菲爾柯克斯和却爾斯·勃蘭二先生。朱小姐是華僑，在美習舞，非爾柯克斯和勃蘭都是愛蓮的同學，屬於美國的拉麥里舞團的。七月間，愛蓮在風林達也有演出，那裏的僑胞除了廣東戲之外，沒有看到過祖國的表演，所以這次演出風靡了西印度羣島的華僑們。

愛蓮要回來了，他的朋友們給她唯一的禮物便是中國樂舞學院，這學院現在由她的弟子彭松，陸徵秋，葉百令在上課，將來便由愛蓮主持。希望這是現代中國舞蹈的一個新開始；正如索柯爾斯基把西洋古典舞介紹給中國觀衆，愛蓮和她的學生們將爲中國的舞蹈奠下了基礎。

法國雕刻的厄運



(巴黎通訊)
彩色在造型藝術中起着極大的作用。

造型藝術史，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色調在這一藝術領域中一天天擴大其勢力。一般藝術愛好者極大的願望，也是在於如何去收藏顏色美觀悅目的作品，而似乎認為色彩就是構成造型藝術不可缺少的成因，說來實在不無令人感到驚異之處，今日所謂造型藝術的鑑賞，似乎離不開顏色，一如音樂的鑑賞，離不開音韻悠揚的樂器。

凡乎

看重色彩，非但一般鑑賞家如此，即連藝術品作者亦復如此。他們寧愛油畫，彩色畫，水彩畫，或顏色鉛筆畫，而將墨色畫，連同木刻與雕刻都打入冷宮去了。

這原因說來極多，試從印象主義算起，接連便有「朋達汝派」(Pont-Aven)，「納畢派」(Nabis)，「野獸派」，立體派，未來派，達達派，表現派，抽象派等等應運而興，這些派別的倡導者，大都為畫家而非雕刻家。例如莫奈，高更，波納，馬蒂斯，畢迦索，色夫里尼，阿布，東丁斯其諸人，就都是畫家，其中如高更，馬蒂斯，畢迦索與阿布諸人，雖然都是雕刻家

每銀台每
幕希

「春殘夢斷」觀後 容方

為什麼「貴族之家」會這樣動人，使人的情感引起那樣的波瀾？最重要的理由，是因為我們看見了兩顆單純無辜的靈魂，被傷害了。但是，我們在「春殘夢斷」中看到了什麼呢？這裏的麗莎既不高貴，思想與情感更是貧乏，這裏有的，不過只是一點「才子佳人」式的思戀。另外的一位主角莊元，在性格上既空洞，在思想與情感上，更難捉摸到他怎樣一個人物。如果一定要得出一個結論，那麼只有在最後見

刻不比繪畫能憑藉其本身種種優點，具有炫赫的魔力，街頭的雕刻品，勿論好壞，均不為行人所注目，展覽會的藝術品，舉凡繪畫，其前面站滿觀衆，反之雕刻，即令是傑作，亦幾無人顧問，就是一個極顯明的例子。更有進者，年來經濟困難情形，到處皆然，一個雕刻家，到處皆然，一個雕刻家，比一個繪畫家須具有更多的財力，去購置工具，佈置工作室，不比繪畫僅紙筆油布顏色數事，即可以開始工作。規模較大的影

麗莎的一段故事裏而來尋找了。這時候的麗莎是已經結婚了，她和他的忠實的丈夫，過着平凡單純的生活，當莊元知道了這情形，不覺心裏是怎樣的悲痛，但是他的深愛麗莎，他就不該去揭開麗莎心裏的傷痛；而應該悄悄的離開，也唯有這樣一顆能夠體貼別人的苦難的靈魂，才能得到別人的同情。莊元既自私的去面對麗莎，打擊她受了傷害的靈魂，發洩自己心中的憤恨，這樣的人物還有什麼可以同情的呢？「春殘夢斷」的兩位主角，不是庸俗，就是空洞，那麼當他們在生活上遭遇了一點波折，實在是引不起別人的敬仰與感動的。我想「春殘夢斷」之無法掀起崇高的悲劇的情緒，這是一個理由。

事實上，當莊元知道了麗莎已經嫁人，如果他感情離開，而麗莎之進修道院却是因為傳聞，或且在一個際遇裏，看見了莊元寫給她的信，那麼，這悲劇的情緒要真切合適得多，尤其能有一種人性的光芒展露，使這情尾，自然而動人。但是，我們的作者沒有這樣做，因為他是一貫的，用着這種不真切的方法，來製造這個悲劇的，我們舉一個最顯明的例子：麗莎既已陷入苦痛的深淵，一個做母親的，絕不會把過去莊元的信，拿出來給她看，再去傷害她，似乎必令她死而後快，這樣的母親是太多了，何況把信拿出來也並不能對這一家的生活有什麼幫助，像過去把麗莎嫁給她表哥那樣的原因。因此，這裏的一切，都是違背着自然的人情人性，和我們實生活沒有關係的，然而一齣好的悲劇，却必需建立在這人情和性情的基礎上，「春殘夢斷」的作者却和實生活中在製造麗莎們的悲劇的人們一樣，他自己就違背着人性，在這種情形之中，我覺得作者自己，倒真是一個悲劇。

讀者之聲

教部次長充當「打手」 楊奚水

據此間「東南日報」九月十九日南京專電稱：「十七日下午六時半，教育部田次長培林，打電話予現任中央圖書館之陳警屏氏，當時該館業已下班，工友正在閉門用膳，電話機旁，適有該館主任任鎮濤與黃編輯視黃二人閒談，即由黃氏接話，以語言不通，乃問：「你說什麼？我聽不出。」孰知田氏在電話中，破口大罵：「混蛋，你是什麼東西。」黃氏常即覆告：「我不是工役，請好好講話。」田次長即將電話掛斷，執料不二分錢，田氏乘汽

車趕至該館，不通姓名，不問情由，不容分辯，竟襲黃氏耳光，以致黃氏眼鏡落地幾破，牙齒出血。黃氏思痛之餘，……十八日東律師依法解決。」

該報重報此一消息，容有成見，不過田培林編人耳光，却是鐵的事實。夫教育部次長者，全國教育最高當局之一也，竟如此虛莽野蠻，驕橫失態，宜乎上行下效，全國各學術教育機關，都成為打手用武之地了。如此次長，如此警育，能不浩嘆哉！（九月廿五日，杭州）

福建活埋「土匪」 爽之

九月九日省參議會開第十三次駐會委員會，各參議員提出問題頗多，尤其重要的是：「請警保處對匪警風紀應加整飭，俾得民心，以利剿匪」。當時并有參議員薛貽丹提出鄭重建議：「古田縣剿匪愈多？（九月九日，福州）」

解聘教授的奇妙藉口 江流

國立女師學院院長張邦珍被控無理解聘大批教授，原告的法律律師李麗

張新院長解聘杜鵬年教授所謂的與女生接近妨礙風紀論，全校教授都是妨礙風化了。」如此，說得張邦珍的辯護律師也不願為她作辯護。聽說張院長這今還是一位老小姐，藉「妨害風化」而解聘教授，

暨大同學向社會控訴 敢為

八月二十六日早上，晴天一聲霹靂，暨大校門的牆壁上貼出一道佈告：「查學生許春雷、王世傑、陶玉麟三名，迭次違犯校規，屢戒不悛。經第五次訓育會議議決，應予開除學籍，此佈。」同日下午，訓導室裏的辦公桌上，也疊起了一堆給同學的通告書，大約有著百封左右。因此，各人驚心動魄，不知禍來誰顧！全校譁然。

且是大批解聘，這種措施，從最好的一方面着想，我們可以諒她的「變態心理」和「神經過敏」，但即使如此，也已經是整個教育尤其女師本身的損失了。何況解聘教授的內情還非局外人所得而知呢？（九月廿四日，重慶）

「護教委員會」應運產生了，到訓導處提出了數點質詢：一、許春雷等三人，根據第幾條校規開除的。左衛生訓導員答（後簡稱答）：「我不知道。」二、在你的訓導室裏辦理，都不知道嗎？答：「這是在開訓育會時，由李校長個人提出的，沒有什麼根據。不過，校長自己負責，我祇承意辦理。」三、節令退學「同學

過，也飽受威脅了：「你們今後不好動。動，就要你的命。」

現在學校就要開學了，但暨大的同學還生活在恐怖中，他們要求保障安全，要向社會控訴。（卅六、九、廿一、暨大）

近因紙張印刷價格高漲，本刊為平衡收支起見，不得不將售價酌予調整，惟為顧及讀者負擔，決自本月第五期（十月十日）開始，期前訂閱，概照原價優待，敬希注意。

為你們清除學匪，「害羣之馬，必須剷除」，「我們請李校長盡力清除學匪」……

暨大同學向社會控訴 敢為

且是大批解聘，這種措施，從最好的一方面着想，我們可以諒她的「變態心理」和「神經過敏」，但即使如此，也已經是整個教育尤其女師本身的損失了。何況解聘教授的內情還非局外人所得而知呢？（九月廿四日，重慶）

暨大同學向社會控訴 敢為

且是大批解聘，這種措施，從最好的一方面着想，我們可以諒她的「變態心理」和「神經過敏」，但即使如此，也已經是整個教育尤其女師本身的損失了。何況解聘教授的內情還非局外人所得而知呢？（九月廿四日，重慶）

本刊下期調整價目，訂閱從速

十月十日以後訂閱價目					
外國	平一	內		掛號	平寄
		航空	掛號		
寄律	二美	航空	掛號	五萬	十二期
		六萬九千元	六萬元	五萬元	全年
元金		全年			

近因紙張印刷價格高漲，本刊為平衡收支起見，不得不將售價酌予調整，惟為顧及讀者負擔，決自本月第五期（十月十日）開始，期前訂閱，概照原價優待，敬希注意。

時文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發行人 程博
編輯者 時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崑崙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四一八號

附刊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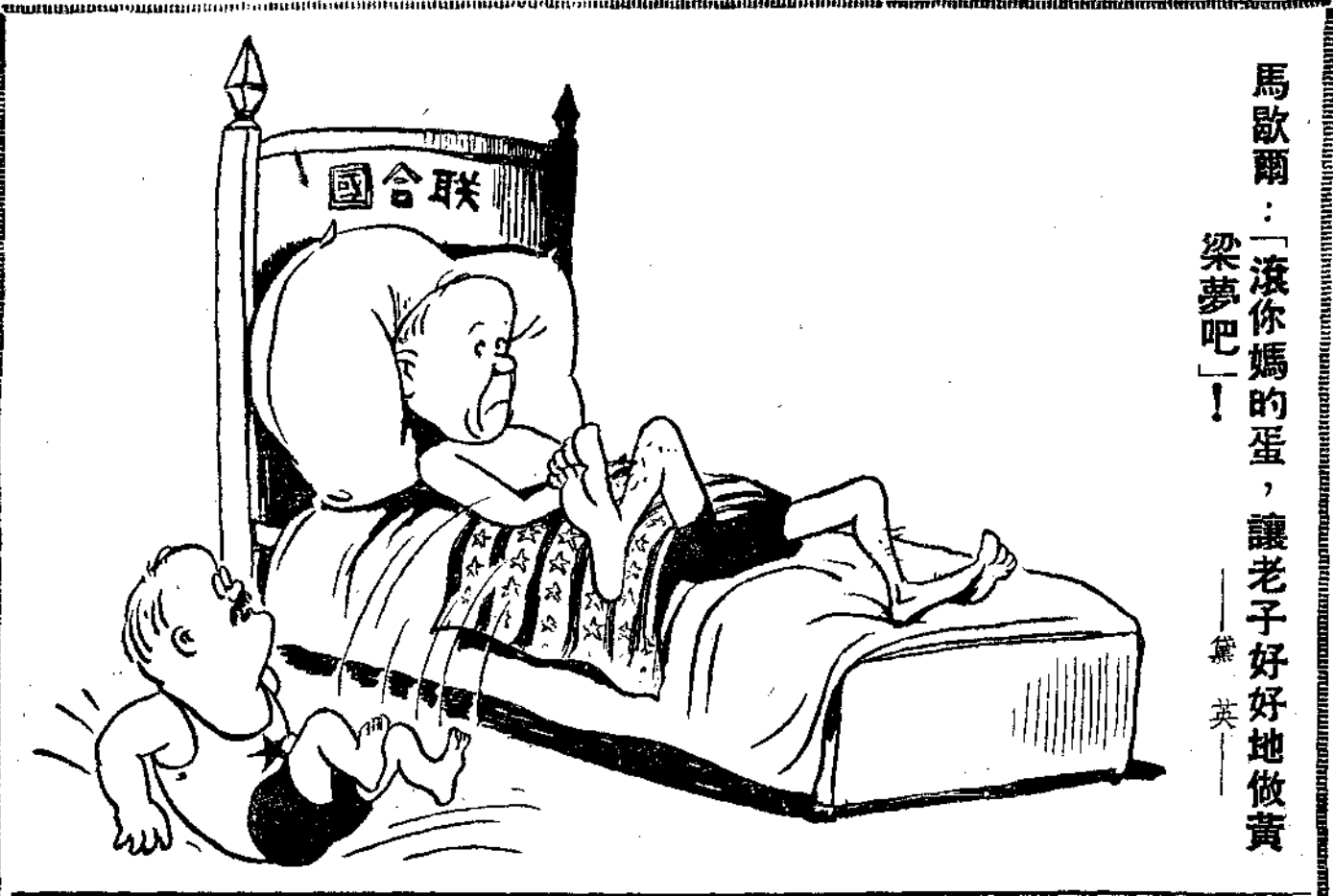
卷二第

立國圖書館

資本主義經濟的前途……………吳清友
 開放日本貿易的政治意義……………費正
 印度：從殖民地到自治領……………張庸
 官僚·官僚階層內部利害關係
 及一般官制的精神……………王亞南
 藝文誌
 讀「中國作家」……………趙涵
 談姚牧的創作……………冬
 花之舞曲……………逸之

通訊
 東北的戰鼓(附東北最近戰局略圖)……………于未
 平津的兩種逮捕·兩種肅清……………凌華
 北平一場武劇……………辛莘
 黨團未合併·先火併……………范仲
 浙江的「匪患」……………史靖
 關於「聞一多的道路」……………史靖
 漫畫
 學校儼如商店·學場有似官場
 教育部取締運動歌謠
 木刻
 李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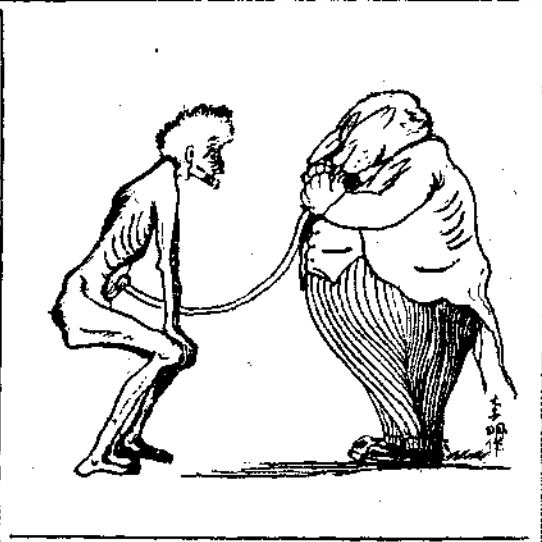


馬歇爾：「滾你媽的蛋，讓老子好好地做黃梁夢吧！」
——黛英——



新鬼煩冤舊鬼哭

——穆企——



資本主義經濟的前途

吳清友

筆者近譯瓦爾加氏新著「戰後資本主義經濟之變化」一書，共二十五萬言，茲就全書精華所在，憑譯過程所得總概念，壓縮寫成四千字的短文，以餉讀者。——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其規模來說，是空前的。在戰爭的歲月裏，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起了激劇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現象，是：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之加強，戰時經濟雖曾採取許多調節的措施，但無計劃性，依然存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律，貫穿着戰時經濟的整個行程。生產和資本有進一步的集中與集合。除了美國之外，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都呈現了強烈的貧窮化的傾向。在戰爭的進程中，生產、技術以及勞動力之分配，均顯示出與戰前不同的若干特點，而消費的減縮，尤為普遍的情形。國際分工的減少，更具嚴重的後果。通貨膨脹的浪潮，氾濫資本主義的世界。人口的減少，對今後世界經濟之影響，尤其不可忽視。

首先應當着重指出，戰後世界經濟中的新因素，是東歐各國經濟的民主化。這些國家將大部分主要的生產手段歸為國有，而國家又是根據「民治、民有、民享」的方針而施政。所以這些國家的經濟在整個世界經濟中所佔的比重雖然不大，同時那裏的生產工具國有化，也沒有越出資本主義的範疇，然而它絕不是在舊意義上說的資本主義，而乃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目前這些國家的新經濟體制，還遠不足以左右今後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可是它的趨向，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起了極大的變化，但依然不變的，是它的基本矛盾——社會生產與個人佔有。此種矛盾不僅沒有祛除，而且在戰後反而加深起來。我們知道，美國在戰時會由國家建設了許多製造廠，英國在戰後將若干重要經濟部門收歸國有，但這些都沒有排除私有財產制度，更沒有排除資產階級對剩餘價值之佔有。因為戰時美國由國家所建設的製造廠，大多數是移交給個別資本家去經營，使他們獲得了暴利，而在英國雖由工黨執政，然而並沒有改變那裏政權的階級性質；因此，生產工具國有化在英國和東歐各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各國內部由於失業造成的勞動大眾赤貧化的傾向

，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由於戰爭造成的赤貧化之傾向，都導向資本主義國內市場及國際市場購買力之降低，這也與資本的無限擴張的意圖相矛盾的。此種意圖，由於生產與資本進一步的集中和集合而更加積極了。這裏還要指出一點，由於戰時技術的進步，資本的有機構成也起了變化，即是：不變資本的增加，和可變資本的減少。換一句話說，就是剩餘價值量的減少。如果資本家固執地要獲得同量的剩餘價值，就必須生產更多的商品並保證暢旺的銷路。談到銷路，在正常條件下，是直接依賴於社會的購買力。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購買力不僅不能作無限的擴充，而且有強烈的必然萎縮之趨勢，於是資本主義本身始終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之中。也從這裏使得個別資本家之間以及國際規模的競爭不可避免地尖銳化起來，即是以最大獨佔——托拉斯、新提嘉、卡德爾——為首的奪取原料來源地、商品推銷場以及投資勢力圈的鬥爭，將空前激烈，而結果則導向武裝的衝突。人類歷史上出現過兩次世界規模的大戰，都是以此為主因。但大家都知道，戰爭不僅是非生產的，而且對生產力有極大的破壞，這轉而促進了資本主義腐化性的加強。

不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許多國家都弄到民窮財盡。由於「民窮」，所以到處對商品需要甚殷，但由於「財盡」，到處都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甚至於戰時由於人民消費受了限制，把貨幣用存款方式放在銀行裏的所謂「延期」的購買力，也很快地為戰後像狂潮一樣的通貨膨脹沖刷殆盡了。而未受戰爭直接影響的國家，如加拿大、澳洲、特別是美國，却暴富了。資本、工廠、機器、車床都有多餘。戰後那裏對生產工具的需求，比較在戰時業已發展起來的生產力，也要少些。這些東西運到國外，只有採用信用的方式，才有可能，而這等於資本的輸出；在隄防不安的局勢下，海外投資，並不安全，除非抱有政治的野心。

技術的進步，生產的集中，以及生產組織的嚴密，歸結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導向平均利潤率之降低。個別的資本家在這裏採取對抗後者的方法，往往是與減低成本的措施如進一步的合理化、裝備最新的機器、提高個人資本的有機構成、減少工資等相關聯，而

達到「薄利多賣」之目的。或者透過獨佔、壟斷，以人爲的方法，把生產壓制在低下的水準，以此來達到提高價格，多賺利潤之目的。然而生產的減縮，並不能緩和，而相反地，是強化平均利潤率降低的傾向，歸根結蒂更加萎縮了市場的容量。至於說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意味着同一工時單位可以產生更多的商品，或者同一單位的商品包含較少的社會勞動，而歸結到價格的降低，但爲要使全部勞動力都有負荷，出售的商品價格，照理是要提高起來，於是又闖進不可克服的難關——購買力問題，結果還是一裁員減薪，把工人一批又一批地拋到街頭。所以戰後週期的失業，比戰前更厲害得多，這已成爲無庸爭辯的事實。什麼「減少求職人數」，「增加工作機會」……都是白費心思。失業問題的嚴重性，戰後人口的變動，生產不足的恐慌與生產「過剩」的恐慌之匯合，工業恐慌與農業恐慌之交錯，……都是影響戰後資本主義經濟前途的有力因素。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之加深和擴大，蘇聯威力之成長與茁壯，東歐新民主之創立與發展……這些事實，在估量戰後資本主義發展行程的時候，都是佔着顯要的地位。

這裏我們想強調指出對戰後資本主義前途極有關係的一個重要問題，即是人口的變動問題。戰時各國人口都有或多或少或少的降低，這是不言而喻的。但人口自然減少的傾向，還未被加以應有的注意。

根據美國諾斯坦 (E. W. Nostein) 教授等所著「歐洲及蘇聯人口之將來」一書的估計，單就有工作能力的男子來說，一九四〇年在歐洲（蘇聯不在內）爲一萬二千七百二十萬人，一九五五年將達到一萬四千四百八十萬人，一九七〇年將達到一萬四千七百六十萬人。換一句話說，戰後蘇聯除外的整個歐洲，有工作能力的男子人數，與戰前相比，幾乎處於停頓的狀態。但大家都知道，在任何社會，人是決定的因素，即所謂「人定勝天」。從生產的觀點來看，人，特別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生產過程中扮演着重大的角色；沒有人，機器不過是一堆廢鐵罷了。有工作能力的人數處於停滯的狀態，在某種意義上說，即是生產難於達到預期的發展，此種演變的後果，是不可忽視的。根據同一作者的估計，一九四〇年蘇聯有工作能力的男子在一九四〇年爲四千九百萬人，到一九五〇年將增至六千六百八十萬人，到一九七〇年將增至八千四百一十萬人。從這裏可以看到，一九七〇年蘇聯有工作能力的男子，比西歐和北歐各國合在一起還要多些。如果從十五歲至三十四歲的青年男子來說，蘇聯所佔的比重還要大些！

至於說到美國，根據「Problems of a Changing Population」一書的材料，最樂觀的估計，一九八〇年美國將達到它的人口發展的最高點，那個時候，它將有一萬五千八百萬人口，包括每年有十萬的入國移民。較悲觀的估計，美國到一九五五年就將達到它自己人口發展的最高點，那個時候，它將有一萬三千八百萬人。過了這一時期之後的二十五年內，美國人口將減少一千萬人。在兩種社會，經濟體制對比下，僅就人口這一點來說，戰後資本主義的前途，就已蒙上一層黝黑的暗影。

此外我們要說到的是戰後初次的工業週期之動向。首先要指出的，這次戰爭造成了各國之間發展進一步的不平衡。無論歐洲或亞洲，直接參戰的國家都有強烈的貧窮化的傾向。加拿大、澳洲、南非聯邦、南美諸國以及歐洲若干中立國，特別是美國，或則受害輕微，或則帶着擴充了的生產力和改進了的生產品構跳出戰爭。由於這些差異，戰後呈現在世界眼簾的是兩幅不同的畫面：在貧窮了的國家中，有「生產不足的恐慌」，在富裕了的國家中，有「生產過剩的恐慌」。至於業已實行新民主的東歐各國，那裏雖然也有「生產不足的恐慌」，但由於經濟上與蘇聯有着密切的聯繫並從蘇聯得到必要的援助，恐慌在這些國家裏，將見緩和得多。唯有英國是獨特的，它將是介於這兩種類型的經濟恐慌之間的國家。英國比戰前至少須把輸出增加百分之五十，才能達到國際收支的平衡。而美國則擁有五百億美元的「延期」的需求，這將造成爲短暫的景氣，首先對非最必需的消費資料，例如冰箱、汽車之類造成較佳的銷路，然而單靠國內市場，特別是在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工資減低，罷工頻仍等條件下，並不能消納它在戰時所增長起來的生產能力。美國用金元壓力，原子外交的手段來開拓國外市場，也困難重重。眼前大家不是已經看到美國已有經濟恐慌的種種徵候麼？作爲資本主義世界決定因素看待的美國，如發生經濟恐慌，其影響所及，是不難想像的。恐慌，這個與資本主義制度始終糾纏不清的病魔，它雖不能使資本主義制度立刻「壽終正寢」，但它總使資本主義制度「長登壽域」，這是可以斷言的。

最後應當說到的，就是戰時殖民地工業有相當的發展，也即是說民族資本和勞動階層的力量，有頗大的增長，反帝的浪潮，昂揚起來了，這對資本主義制度應當是個重大的打擊。這與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相配合，將動搖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之基礎，我們且注視着客觀事變發展的行程吧！

開放日本貿易的政治意義

費正

關於開放日本貿易問題，國內經濟專家學者就問題的本身，指陳利弊得失，既極詳盡痛切，不必多事贅述。現在，作者只擬對其政治意義一點，略作補充。

在目前的階段，有一極為明顯的事實是：美帝國主義的世界擴張與制霸政策，是以強烈而廣泛的經濟攻勢為其表現的特徵的。反過來，也就是說：美國的每一對外經濟決策和措施，都包含着世界擴張與制霸的企圖在內的。

這方面的例子層見層出，多得勝枚舉，開放日本貿易，亦其例子之一。

如果當作管制日本的合理政策的一部份而言，開放日本貿易原不足驚異，也不會蘊藏什麼危機。但這所謂合理政策的一部份，與目前麥帥總部決定開放日本貿易所依據的，絕無相同之處。假使開放日本貿易是依據下列原則決定和實行的：第一、日本戰爭潛力（軍事工業、集中組織和壟斷財閥）已被徹底摧毀，開放日本貿易只爲了增進日本和平民主的經濟生活；第二、日本對盟國的賠償及其他應盡的（如協助遠東各國復興）義務，業已由各盟國共同協商確定，並在履行之中，開放日本貿易只是爲了使日本更能盡此義務；第三、各盟國對戰敗的日本，在政治經濟方面，完全平等合作，而無任何片面的專攬獨斷，開放日本貿易亦係基於各盟國的共同利益，而非某一國的自私打算，那末，這樣的開放日本貿易，自不會遭人物議和反對，反之，是值得贊同和支持的。然而，目前的事實，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日本——美國的戰略據點之一

首先，我們要着重指出：開放日本貿易，只是美帝國主義爲了使日本成爲其反蘇和制霸遠東的一大戰略據點，而決定和實施的。

美國十分清楚：對外貿易是日本過去的霸業與侵略的主要基石，現在

開放日本貿易就能最有效地恢復日本的強大，使日本在美國的支配之下充當美國反蘇和制霸遠東的前哨。

當美國國務院及陸軍部聯合宣佈「對日私人貿易將於八月十五日恢復，藉以加速日本的經濟復興」之後，麥帥總部接着就表示，爲了「保證人民的合理生活，要使日本工業恢復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同時，美國貸款予日本的計畫，也公開透露出來。這是美國恢復日本的三部曲，也是開放日本貿易的陰謀的寫照。既要開放日本貿易，復興日本經濟，就得把日本工業水準確定在相當的高度之上，美國的大規模貸款也就不可或缺，否則，決難達到目的，甚至變爲毫無意義。反之，如果不開放日本貿易，提高工業水準亦無法實現和維持，美國獨佔資本也很難大量的最合法的侵入和控制日本經濟。當然，這也就是證明說，開放日本貿易是美國扶植日本強大的一個關鍵性的步驟。

誰都想得到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日本工業水準，是怎樣高度的水準。誠然，現在日本的工業生產，是很低落的（一半是由於日本獨佔集團爲了逃避賠償和拆毀，取並得美國的支持，以人爲的怠工和停滯所造成的），對外貿易也很不足道，但今後按照這個標準，據日本人估計，至一九五〇年工業生產就可達到一九三〇年日幣價值的一百一十億元；對外貿易數字也可與一九三八年相等，比一九三〇年還膨脹百分之六十，即多十一億日元。

不僅如此，按照這個標準，日本工業的構成中，機器工業可佔第一位，爲百分比的二十一，其次爲化學工業佔一九，再次爲紡織工業佔一八，此外食品工業佔一〇，金屬工業佔八，密業佔五，電氣佔五，印刷佔四，木材佔二，其他八（「每日新聞」記者的估計）。這個工業構成的火藥氣味，要比「一九一八」前更濃厚，可使美國得到戰力來源的極大補充，和節省空間距離的極大便利。例如，上列工業構成中，機器工業包括造船，可維持戰前水準，戰敗日本可以擁有五百萬噸的大商船隊，而「七七事變

一時也不過五百五十萬噸。這個大商船隊在戰時就可以插身一變為美國的補助或運輸艦隊。第二位的化學工業，現在是說擴大肥料工業，其產量必超過戰前（實際所允許保留的已超過一九三八年一倍以上），將來則是美國在日本擴大了炸藥的製造。第三位的紡織工業，到十月初止，日本已有二百六十五萬紡錘開工，還準備新設一百零五萬紡錘，紡織工業三年計畫最後一年預計到達棉紡四百四十四萬五千錘，這，現在可使中國的主要工業和英國的曼徹斯特，匍匐於日本的脚下，將來則可作美國生產軍服或飛機零件的附屬工廠。第五位的金屬工業可保存鋼鐵年產量三百五十萬噸，平時用於造船，戰時用於製造槍炮。這樣，美國在將來只消供給日本飛機坦克和原子彈，全副武裝的日本就可再度威風凜凜的出現在遠東戰場上了。

我們切不可為上面的估計是誇大的。美國保持日本戰爭潛力的努力，還有甚於此者。看吧！蘇聯政論家儒科夫一月間在消息報上指出，麥帥總部已將其業已發表拆除廢充賠償的工廠一千零九十個，刪減為九百三十四個，所刪去的一百五十六個工廠，都是飛機、軍火工廠和實驗室，其中刪去的一百一十三個飛機工廠中，有二十四個是地下工廠！

還有，假使我們聯想到美國目前對德國西部，特別是魯爾，也作着同樣性質的活動時，就更能瞭然於美國在日本的這番作為，絕不是偶然的。

奴役遠東人民的金字塔

其次，我們要指出的，開放日本貿易是容許日本恢復和重建其對遠東人民的奴役關係的第一步，不過，這將是在美國最高支配之下的新的金字塔式的奴役關係。

美國在遠東，也如在歐洲一樣，它的外交上戰略上最迫切的要求，是在戰後的廢墟上和一般的混亂中，急速支撐和鞏固資本主義統治體系，以對抗新興的人民力量及蘇聯對這力量影響；同時，並在這一努力中，把資本主義世界置於美元的支配之下。因此，憑藉其軍事管制的便利，奪取和重建戰敗國工業與資源的強大基礎，俾以此為有力的桿槓之一，助成其統治世界的目的，便被美帝國主義者視為一大重要課題。至於隨之而來的歐洲或遠東各國舊的反動政權與隸屬關係的恢復，那也是被視為當然的趨勢。

現在，在歐洲，美帝國主義正對德國西部作着這樣的佈署，在遠東也以開放日本貿易開始了這個佈署。只是在歐洲，它已不能使德國獨佔資本再度奴役東歐各國，同時也還需尊重英法的利益；而只有在遠東，可以不必顧及遠東各國的民族利益與復興要求，斷然放手給日本，為美國利益也為日本利益去重建它過去在遠東各國的市場了。

例如，美國聲明中所列舉開放日本貿易的原則中，有所謂「使外國商務代表可毫無限制與日本製造商接觸」，「希望能引起外人投資於日本企業之興趣」，這就一躍可知，是只有美國才能充分享受這些原則的好處的。美國在過去管制日本貿易中，壟斷了日本貿易的百分之六七十至九十，今後名為開放，實際上僅是便利美國商人擴大對日貿易，並從日本對遠東各國貿易的擴展中取得更大利益。投資云云，除掉美國獨佔資本可藉此大量侵入日本，推行支配和扶植日本經濟的一貫政策外，又再有那一國力能為之？

在戰前，日本一直是美國的主要市場之一，重要工業原料的輸入依賴美國尤甚，同時，美日獨佔資本間的結合，也至密切。三井、三菱、住友等康采恩的個別公司的大部份股票都落到了美國大公司的手裏，日本的康采恩且常常扮演著美國公司的商務代理人的角色。現在憑藉軍事管制的條件，美國獨佔資本更幾乎完全掌握了對日獨佔資本的支配權力。正因如此，美國才不願澈底摧毀日本獨佔資本集團，才要開放日本貿易，讓日本獨佔資本重新取得海外市場。

但在遠東各國，其處境則是完全不同的。在戰前，遠東各國（主要為中國及南洋各國）是日本的原料供應地與商品傾銷市場，後來還被組成所謂「日圓集團」的獨佔「布洛克」。其間的關係，可以「工業日本，農業中國」一語，作充分的說明。戰後一年多經由麥帥總部管制下進行的日本對遠東各國的易貨貿易情形，亦仍不脫這一舊的範疇。如以中日易貨為例，日本輸華的貨物是枕木、礦木、人造絲、火車頭、銅錘、白報紙、機器、交通設備等工業品，而我國輸日的則為食鹽、麥麸、磷酸鹽、生鐵等重要原料品。在此情形之下，開放日本貿易對遠東各國還不是把這一種易貨方式所顯現的貿易關係更加擴大起來？依照日本最近擬訂的所謂開放貿易後今年年底以前實施的對我國貿易計畫，日本將對華輸出以紡織品為主的

商品總值約美金九千九百二十八萬元，而由華輸入包括糖、糖、大豆、煤等原料品約值美金四千七百六十八萬元，這難道是日本人的幻夢嗎？

遠東各國的屈服

依上所述，在開放日本貿易上所陳現的，是一種極端反動與違反遠東各國利益的計畫，而對於這一計畫，稍有民族自尊心與對遠東和平具有責任感的遠東國家，都應該加以斷然的反對和拒絕的。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是，被貝文尼巴主義拖着走的一羣國家，和正在不擇手段，依賴美國，從事內戰的中國，都不願各該國人民一片沸騰的反對聲浪，接受了這個計畫了。

遠東各國的屈服，顯然主要是由於美國的高壓政策所迫成的結果，此外，則要歸究於遠東各國政府的昏庸、無能與反動。美國一手以美元與「巨棒」控制着大部份的遠東各落後國家，一手則選擇戰敗日本做它制霸遠東的工具，而今遠東各國的接受開放對日貿易，只是表明它們已完全無力反抗被美國主義所擺佈的這個悲慘局面，甘願在美國的巨掌之下，在日本的奴役之下，討點足以維持搖搖欲墜的特權統治的殘羹剩飯而已。

我國國務會議對開放日本貿易所決定的原則中，列有「對日貿易輸出入種類數量，以不妨礙中國國民經濟為標準」及「我國對日所需物資，應儘可能先在賠償物資中取得之」兩項；行政院發言人並加以解釋說：「我國參加對日貿易，並非自此案決定後開始，去年中央信託局即曾以物物交換方式對日通商，國務會議決定組織赴日商務代表團，不過將中央信託局所從事對日貿易工作稍為擴大而已。此項代表團，其名額和人選既由行政院與經濟界協商組織，則可說仍為一種有管制之貿易，並非完全私人自由貿易。」這誠然說得漂亮，但顯然把事實的全部真相及其嚴重性質，以輕描淡寫的自說自話掩蔽起來了。事實上，問題決不在於開放對日貿易在目前能否加以限制，使不致導致日貨的泛濫傾銷，更不在於目前開放對日貿易後我國能否使對日輸出入限制到不妨礙國民經濟的標準之上，或能否儘先取得賠償，以縮小輸入日貨；而是在於我國是否接受了開放對日貿易，同時默許提高日本工業水準？是否要求過開放日本貿易的目的，應該是為了使日本能履行對盟國賠償及協助被侵害國家復興等義務？是否建議過開

放對日貿易應在日本和平民主的經濟基礎上而不是在日本獨佔資本的統治基礎上進行？又是否堅持過開放對日貿易，應由各盟國共同協商，在取得平等地位和利益的前提下進行？如果我們不敢面對這些問題，及求得這些問題的解決，則所謂不妨礙國民經濟的標準，無疑地將是一句空話，管個對日貿易云云也將無從下手，到頭來不過是一幅「工業日本，農業中國」悲慘圖畫的再版罷了。

教 授 生 涯

李 華



印度：從殖民地到自治領

張庸

一、沒有奇蹟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古老的亞洲發生了兩次「不流血的革命」：一次是美國把政權移交給菲律賓；另一次是英國把政權移交給印度，而使「世界最古老之一國，成爲世界最年青之兩邦」（聯合社）。許多淺見之流，看到印度獲得了「獨立」，都驚嘆不止，以爲帝國主義者「理智」而且「仁慈」，慷慨地滿足了殖民地人民多年的願望。我國駐印大使羅家倫唱道：「好一個奇蹟，獨立而用不着戰爭」（爲印度自由而高歌）。

他又說：「大英帝國對印度一百五十年的統治，和平的結束，獨立的印度，同時和平的產生，是一件史無前例的事」（對於印度獨立的觀感）。毫無疑問，這一次印度的分裂爲兩個自治領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印度，作爲一現代帝國主義的樞紐（杜德）來看，她的爭取獨立自由的運動是與全世界被奴役被踐踏的千千萬萬人們的解放分不開的，甚至可以說，印度人民反抗的勝利就是殖民地奴隸掙脫他們鎖鍊的信號，也就宣佈了帝國主義的死亡。

不幸的是，大英帝國的統治者是聰明的，然而並不仁慈。在統治了一百七十餘年以後，她移交給印度上層統治者的已經不是一個和平，統一，繁榮的印度，而是兩個仇視，混亂，貧困的印度。用一位印度記者的話來說：「片面的獨工業

已贏得，整個國家却裂成碎片。在古國衰敗的昔日榮華中，國大和回盟的最高領袖們彈冠相慶了」（H. 夏：「被分割的古國印度」）。今天，新德里和喀喇蚩的政府都對着一大堆困難的問題，而最煞風景的是：「獨立」的歌詞剛剛唱罷，大規模的內戰已經開始。

如果以爲「社會主義者」的艾德禮真是誠心誠意把帝國王冠上最明亮的寶石奉送給國大和回盟，那不僅天真得可笑，而且是不可思議的「奇蹟」。我們還是看那位印度記者的報導吧：「英國人的目的原是製造出兩個政府，兩枝軍隊，叫他們相打，自己從中取利……其實英國那里肯把自治權給印度，只是使印度徹底崩離析」。換句話說，英國一貫的「分而治之」的統治秘訣，在「獨立」的外衣下，已發展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所以，面對着這痛苦的現實，七十八歲的老甘地只能默默地祈禱，甚至絕食，縱然他的偉大的苦行已經挽救不了整個形勢。

印度四萬萬人的命運又一次被欺騙，被出賣了。這是一幕悲劇，却不是奇蹟。

二、現實的考驗

造成這一幕悲劇是有許多原因的，但扮演着主要角色的國民大會黨和回教同盟却不能不負着主要的責任。嚴格說來，國大和回盟都不能稱爲政黨，却

毋寧是兩個政團，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構成的份子非常複雜，幾乎包括了各種階級和各種傾向（雖然工農階級佔極少數），只有在爭取民族獨立（對於回盟則是「脫離印度教的壓迫」）的口號下才能團結一致。因此，當英國人對印度上層份子暗送秋波時，國大黨內部就意見分歧，甚至不惜犧牲它所標榜的政見，以至清除內部的「異己」，而投入總督府的懷抱。對於回教同盟來說，這更是一個不易的真理。這就說明了爲什麼在印度，反對黨總是生長的，而一進政府就衰落。政治氣節是一個無情的考驗，這對於中國人一點也不陌生，因爲如所週知，我們也不缺少這樣熱中於「還政於民」的政黨啊！

此外，國大和回盟在血緣上本來是英國人的產兒，所以無論他們會企圖獨立自主，畢竟還不能忘情於這一份親恩。英國人休謨（A. O. Hume）在一八八五年獻計創立國民大會的時候，原是想用它來對付「增漲的不安」，所以初期的國大不過是一個歌功頌德或者發發牢騷的團體，它的政治要求也僅限於賞賜一個自治領的地位。在甘地的領導下，國大從沒有作過發動羣衆來展開暴力反抗的「非份之想」。回教同盟更是英國人一手扶植的政團，它的目的是對抗國大的「越軌要求」，在先天上它是一個分裂主義的組織。

今天，國大黨的領袖們已經號稱獨立，可是他們却沒有成功，因爲他們不但放棄了信誓旦旦

的「完全的獨立」(Svaraj)，在這口號下，他們會拒絕了自治領的地位，不但容忍了國土的割裂，不但和封建王公們妥協，而且他們已經處在衆叛親離的危殆的形勢下。原已深入七十萬村落

的組織，現在開始動搖了。過去的團結開始解體，因爲上層和中層的幹部都在爭逐着官職。

真納的回教同盟在表面上勝利了。他那「巴基斯坦」的要求，七年前還只是一個夢，今天已經成爲現實，他自己更坐上了總督的寶座。然而他也有他的苦悶。第一，他的「伊斯蘭危機」之類的煽動性的口號已不再存在，像過去那樣十字軍式的狂熱已不復可能，它內部的分裂和派別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同盟若不能有一個積極的經濟計劃，就沒有理由作爲一個羣衆組織而存在。第二，巴基斯坦是一片農業地帶，完全缺乏工業基礎，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是不可想像的。更不幸的是，富庶的旁遮普省已經被分割而且正遭逢着內戰的破壞。第三，這新建的回教國不但分成東西兩部，而且在它內部的少數民族，包括好戰的錫克族在內，也一旦會提出自成一國的要求的可能。這些少數民族人數達一千八百萬之多，他們的要求如果被漠視，勢將演成持久的內戰。

此外，值得重視的，這兩個新生的自治領還必須應付今天微妙的國際局勢。正如希臘一樣，英國在那裏撤退，白官方面就趕緊來填補那一塊「真空」。有可靠的材料可以證明，美國對印度的濃厚興趣，不僅是爲了印度需要經濟建設的助力，更爲了毗連巴基斯坦的是蘇聯的亞洲共和國。

內外的局勢交織成一張網。陷在網里的正是國大和回教那些彈冠相慶的新貴，立在網外袖手旁觀的却是一「理智」而且「仁慈」的大英帝國。印度人民期待着自由富強的民主共和國的產生，但他們的領袖們却必須通過當前現實的考驗。

三、艱巨的任務

如上所述，可以看出印度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只是在自治領的形式下把它更尖銳化地提出來了。早在七年以前，杜德已經寫過：「印度人民向帝國主義的挑戰，以最簡單的意義來說，就是六分之一的人類從外國的統治下要求自由而已。但這種自由的要求不可免的要比那要求形式上的政治獨立更進一步：；在基本上，它是向一個根深蒂固的剝削制度挑戰，這個制度的中心是在倫敦，可是它却與印度內部附屬的特權與剝削制度緊密地聯繫着」。他更指出：「印度人民的鬥爭，是千百萬被壓迫和被剝削的，過着人類生存最低水準的人民要求獲得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要求民族的、政治的，和社會的自由底一個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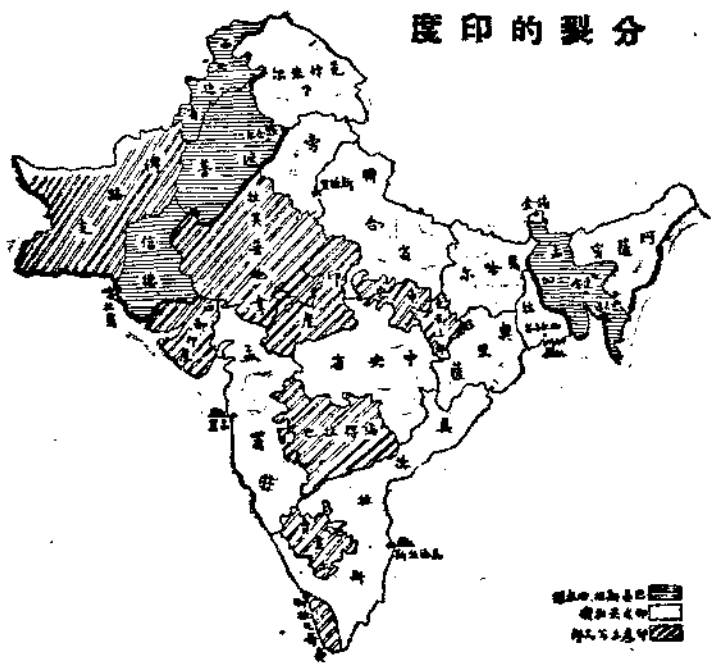
由此可知，企圖把印度分爲兩個自治領，描寫成「不流血的革命」或獨立的勝利，是如何歪曲了問題的本質，因而幫助了對印度人民壓迫和剝削的延長，和模糊了印度人民革命的目標。無疑的，印度人民在四十年的奮鬥中鍛鍊了自己，認識了敵友的分別。如同其他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一樣，他們必須向內外敵人作持久而艱苦的抗爭。

必須記得，印度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的古國，人類社會中每一個階段的文明和文化，從最原始的到最進步的，都在印度存在着。因此，最廣泛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

化的問題都能在印度的現狀中找到最尖銳的表現，印度人民，在他們的解放運動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一些特殊的問題，例如不同種族和不同宗教的關係和共存的問題，與舊的迷信和腐化的社會方式及傳統的鬥爭，教育的普及，婦女的解放，關於農業的整理和工業的發展問題，城市與鄉村的關係問題等。這些尖銳而迫切的課題是只能由印度人民自己來解決的。

印度人民負着兩重艱巨的任務，一方面，他們要求真正的獨立民主，從外國的統治下解放；另一方面，他們要解除因襲的傳統的束縛，獲得社會的解放。這二者不可缺一，而是互相聯繫着的。一個從大英帝國手里「和平產生」的自治領不可能解決任何一個問題，因而不可能解決印度問題。

度印的裂分



官僚·官僚階層內部利害關係及一般官制的精神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歷史的經濟的解釋）之五

一般的講，歐洲的專制官僚政治，是產生於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或封建貴族與資產階級鬥爭的過程中。這種鬥爭在開始時，專制君主及其官僚們，在極力扶植並利用商工市民新興的勢力，以削弱剪除封建貴族，到後來，資產階級勢力愈來愈膨大到威脅其生存了，他們有的人又企圖動員一切傳統的封建力量，以維持其前此因利乘便取得的各種政治權力。由是，站在社會立場上講，那些君主及其官僚們，究竟是封建的呢？抑是資產者的呢？就有些使人在辨別上感到眩惑。其實，他們這種二重的性格，不但我們今日辨認起來困難，當時的封建貴族或資產者市民，都會在他們相互鬥爭過程中，吃了君主及其官僚們的騎牆態度，和玩弄並出賣他們的苦頭。

我們誠然有理由用過渡社會階段來解釋他們的二重社會性格，但有一點是非常明白的：其一是：在貴族與資產者鬥爭白熱化的階段，他們自會分別權衡個人利害關係，或者是更保守的站在貴族方面，否則就是更積極的站在資產者方面；其二是：他們即不站在任何方面，那亦不會妨礙他們對於被支配者的社會統治地位。

反觀到中國的專制官僚統治形態，我們那些專制君主與官僚們的社會性格或其階級關係，愈研究，彷彿就愈像不可捉摸。

貴族政治是建立在領主經濟基礎上，中國領主經濟在周末乃至秦代解體了，貴族階級失掉了社會的存在基礎。

資產階級政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上，這種經濟形態的重心在商工業，但要以農奴解放，地主經濟成立為前提條件；中國地主經濟雖然在形式上成立了，那種地主經濟所允許並要求的商業與高利貸業，雖然在相當範圍內活動着，但農業的生產不必說，就是工業亦始終沒有脫却手工業的範疇，於是，資產階級又不能在中國取得社會的存在基礎。

結局，成立在商業、高利貸與非現代性地主經濟（此點以後還有從長述及的機會）基礎上的中國專制官僚政體的社會屬性，便發生問題，相應着，中國專制君主及官僚們的社會階級屬性，也成為問題了。

「除了帝王的尊嚴之外，中國臣民可說沒有身分，沒有貴族。唯有皇室諸子和公卿兒孫享有一種非由於門閥而寧是由於地位關係的特權。其餘則人人一律平等，而惟有才能勝任者得為行政官吏。……」（Theobald「歷史哲學」王譯譯本第二〇一—二頁）。

「中國國家政體，因為是由於調節水道，防止水患及灌溉田畝需要等而發生，完全帶有和平性質，於是，在中國組織了一種特殊形式的傳統階級。這種特殊形式的階級在歐洲是沒有見過的，叫做士大夫階級。」（Vahl's 的高見，轉引自 Raabe 著「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

「在中國本有超階級的社會羣，這便是過去的士大夫階級」；「士大夫是超階級的，超出生產組織各階級之外，自有其特殊利益。」（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七頁）

這種高見的發生，根本是如我們在前面第四篇所說，把封建制的本質看漏，拘泥於政治的表象，以為中國古代領主貴族政治解體了，封建制度即隨着消滅；而不知道封建制度的存廢，最基本的要看社會的統治階層，是否還是寄生在對於農奴或形式上自由農民的剩餘勞動或剩餘勞動生產物的剝削上。這基本的剝削事實沒有改變，單把剝削的方式改變了，即把分封諸子功臣，直接食於其封國封邑的方式，改作「以公賦稅重賞賜之」，「以俸祿給養之」的方式，那並不會消除封建的本質。雖然從社會史的意義上說，後一種封建形態，是比較進步的，是比較給予了農奴更多一點自由，並且還比較能容許乃至要求相當範圍與程度的商業高利貸業的發展。然而，這一切的一好處，不但沒有使封建本質改變，且如我們將在後面說明的，還使中國中古以來的典型封建體制，具有更殘酷剝削的可能。

因此，正如同資本社會可以容許共和政治體制，也同樣可以容許君主立憲政體一樣，封建社會可以由貴族支配，亦可以由官僚支配。在官僚支配的政治場面下，貴族及貴族的身分，誠然變為不重要了，但代替貴族行使支配的官僚，並不會因此就「特殊到」成爲「超階級」的東西；把他們來同歐洲專制時代的官僚比較，也誠然像 Vaino 所說，爲「一種特殊形式的統治階級」，但借 Wittfogel 批判 Hegel 的話來說：「中國官僚階級對於所謂『自由』農民，對於農民重要生產手段的土地，乃至對於土地的收益，不是握有明白的權力麼？被拔擢進官僚階級的機緣，在客觀上，不是單由那些立在官僚候補地位的學者，富裕地主商人的子弟們，當作特權而豫定了的麼？」（橫川次郎編譯「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一五七頁）

一句話，中國的官僚階級，或者換一個表現方式，中國的士大夫階級，不是爲了或代表貴族階級利益，也不可能是爲了或代表資產者階級的利益，而用陶希聖講「對了」的那一句話：「自有特殊利益」。因爲他們自己就是支配者階級，自己就是一直同所謂「自由」農民處在對立者的地位。

二

特依據我們前面的說明，一切官僚政治，都是當作專制政體的配合物而產生的。中國官僚階級頭上頂戴着至高無上的帝王，一方面使他們在某些場合表現爲被支配者，而所謂在帝王的神聖權威之前，臣庶一律平等，那又不但表示他們對帝王間存在有極大的距離，並還顯得他們與一般人民變成了無差別權力的一體，上述的黑暗格的錯誤認識，就是從這裏發生的。

其實，中國的專制政體，其所以是官僚的，同時又是封建的，其關鍵就在此。設把政治修辭上的插話，和實際政治運用上的圈套，扔在一傍，而去透視中國政治的實質，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帝王的政治經濟權力，一方面使他扮演爲地主的大頭目，另一方面又扮演爲官僚的大頭目，而他以下的各種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則又無異是一些分別利用政治權勢，侵漁人民的小皇帝。官僚士大夫們假託聖人之言，創立朝儀，制作律令，幫同把大皇帝的絕對支配權力建樹起來，他們就好像圍繞在鯊魚周圍的小魚，靠着鯊魚的分泌物而生活一樣，這絕對支配權力愈神聖，愈牢固，他們託庇它，依傍它而保持的小皇帝的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動搖了。當作一

個社會的支配階級來看，中國官僚士大夫階級是在充分運用或分有皇帝的絕對支配權，這情形，固然最基本的要從他們對整個被剝削階級的關係來解釋，但同時也可由他們大小皇帝或大小官僚地主間分配既得權利的利害衝突關係來說明。

中國專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絕對支配權，歸根結底，是建立在全社會基本生產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種基本生產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農業剩餘勞動或其勞動生產物的佔有上。他以那種控制和佔有，表現其經濟權力；他如何去成就那種控制和佔有的實現，表現其政治權力。但無論是經濟權力或政治權力，離開了他的官僚機構和官僚系統，都將變成空無所有的抽象。於是，整個政治權力，結局也即是整個經濟權力，如何分配於全體官僚之間，始得保持全官僚階級內部的穩定，就成爲官僚頭目或最大地主們所苦心焦慮的問題了。每一個歷史王朝的開始，差不多都特別把這問題提出來認真予以商酌考慮；「治安策」一類建議，是應時的產物，而「深慮論」一類文章，則曝露出了官僚階級內部鉤心鬥角的矛盾。略舉數例，以見一斑：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即考慮到政治經濟權力的分配問題，他接納了李斯「置諸侯不便」的建議，除客觀條件外，至少也因爲李斯的措辭，特別迎合他的心事：「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漢高祖懲秦以孤立而亡，封諸子爲王，對於異姓功臣，另眼相視，昌言：「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然對同姓子弟，亦不放心；其侄吳王濞受封之日，「召漢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耶？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史記」吳王濞列傳）

東漢光武中興，一方面鑑於西漢分封諸子引起之禍亂，「未嘗有盡王子弟以鎮服天下之意。蓋是時封建之實已亡，尺土一民，皆自上制之」（「文獻通考」封建）；然而諸子靠不住，公卿亦不見得忠實，所以「光武愷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稱令，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尚書），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後漢書」仲長統傳）秦漢以後，歷代開國君主殆莫不深慮到分配權利如何才好的問題，但

講得最露骨，最情見乎辭的，要算宋太祖與其功臣在「杯酒釋兵權」的悲喜劇中所留下的一段對話了。太祖鑑於唐代藩鎮之禍，對當時握有兵馬大權的親友兼功臣石守信，頗具戒心。他一天與守信等痛飲之餘，覺得有對「故人」——「吐肺腑」之必要，他說：「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守信等聽了伴為咋異：「今天下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出此言耶？」太祖當反詰他們：「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就請太祖開導他們，太祖表示：「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就拜謝他指點的盛意說：「陛下念及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這一席話講過的第二天，史載守信等皆稱病，乞解兵柄，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資甚厚。」（「宋史」石守信傳）

為人君的對於他的臣下這樣放心不下，睡不着覺，表面上好像只是顯示君臣間的利害矛盾，其實，如像宋太祖表演出的上述一齣戲，完全是由趙普一千文職官僚在幕後導演出來的。武官的權勢太大，文官總不免有些眼紅。諸子與功臣間的猜忌，宗室與外戚間猜忌，宮中與府中間的猜忌，京官與各地州牧郡守間的猜忌，六朝特別是南宋以後異族當朝，統治民族與漢人官吏間的磨擦與暗算，以及這每一對對勢力各別陣營中的內訌，真是說不盡的宦海風波，或官僚階層內部的利害衝突。

所以，一個帝王，如其他不是阿斗一流的昏庸人物，一切聽任宵小擺佈，他要把底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僚，甚至正待加入官僚陣營的士子，都統治安排得對他服服貼貼，而相互之間又能保持相當的「和諧」，那也就夠他頭痛了。所謂寢食不安，所謂宵旰圖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後，主要還不是為了對付下民，而是為了對付臣屬哩！

我們由此已不難多少領悟到一般官僚政治賴以推行的官制的精神了。

二二

中國的專制官僚政治，雖開始於秦國，由秦首創了許多官制，但秦僅傳及二世而亡，其致亡的原因當然很多，至少有一部分理由，要歸之於創制不夠周密，或缺乏彈性，以致實行起來，格外顯得「苛」「暴」。

原來任何一種制度，就其積極作用一方面言，都有待於時間經驗之積累，而為「嘗試錯誤」的結果。縱觀中國官僚制度，由秦代以至於清之中葉，每經一個朝代，表面上看，好像是多一次重複，多一次「再生產」，但仔細觀察起來，其內容是代有變更，或者說，每個王朝殆都會徽前慈後，加過一番因時制宜工夫。在貴族政治的封建階段，世卿世官，一決於血統；而當時立在最高地位的帝王，對於人事，像是一切準據自然，而他自已，亦大體是依自然血統條件，行使統治。這看來是很不合理的，但却是再簡單不過了。到了官僚政治的封建階段，就是對於被宣揚矯飾得神聖不可侵犯的帝王，因為他自身，或者他的乃祖乃父取得統治地位，並不是憑什麼叫人一見了無異議的客觀標準，於是一個極微賤的野心者，也可對他發生「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彼可取而代之」的念頭；至若他以下的公卿大夫，由宰相以至於小小吏丞，權之所在，利之所在，自然要分別成為大家營謀攘奪的目標。所以，一個有心計或者有遠見的帝王，乃至幫同帝王主持朝政或實際把握政權的官僚頭目們，對於政務的推行，總不能不以次幾種考慮。

第一，試如何使一般臣民，對專制君主乃至其他攬權人物，養成敬畏自卑的心習；對於其言行，無論合理與否，都得心悅誠服。

第二，該如何使各方面各部門的官僚勢力，都在對專制君主向心的重點上，彼此保持一定的平衡；任一方面任一部門勢力的突出，就將視為是賈誼「治安策」中所謂「大抵強者先反……最強最先反」的禍害。

第三，該如何使全體人民，能「安分守己」，「聽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統治，並如何使人民中之優異或豪強分子，有機會有志望參加那種統治。

這些問題被苦心孤詣的考慮着，揣摩着，權謀術數的玩弄，就成為專制君主及其大臣們統治上的日常課題了。一切官制的創立，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玩弄權謀術數的結果。於是，看似複雜的官制體系，就在無形中貫注有上述三大要求。

大體而論，官制包括三個門類：其一是官職、官品、官祿的確定；其二是官吏權責的分劃；其三是官吏任用的程序。從表面上看，第一點似甚簡單，分類按級規定就行了，其實設官分職，依等定酬，除須斟酌實際情

形，權衡損益外，創制者例皆把他或他們當前的主觀企圖放在裏面了。如秦設許多新官職，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郡守、郡尉、監御史等，我們在前面已知道那都是爲了大權獨攬，「置諸侯不便」的代替物，而俸祿的差別，在秦無詳細記錄可徵，若漢及其以後許多朝代，除了依據等第外，重高官而薄於小吏，厚京官而薄於外放，殆皆成爲一般通則；用意所在，是昭然若揭的。

可是，把它與第二點關聯起來考慮，就更形複雜了。比如，同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秦雖代皇帝分掌政治、軍事、監察大權，漢代到了先把異姓功臣分別剷除，後又把同姓諸侯分別削弱之後，覺得三公權力太大，怕太阿倒持，或靠不住，於是把信心縮小到朝夕共處的內臣；武帝時奏請機事，已以官者主之，延及光武之世，因宰相例爲德高望重之人，督責指揮，諸多不便，於是崇以虛名，將政事悉委之於尚書；所謂「事歸臺閣，三公論道而已」，其後同屬臺閣，尚書又不若中書親近；到了唐代，索性以中書、門下、及尚書三者爲相職。這就是說，國家行政大權，愈來愈集中到帝王更親近的人手中了。所以，官吏權責的分劃，仔細考察起來，無非是專制君主及攬權者們弄權鬥法的結果。

最後關於官吏的任用，那在官制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且會直接影響到官吏的職掌和權責。世卿世官之制既廢，官吏的產生，一定要用一些舉官的方法。據薩孟武先生的研究，秦代相沿有三個舉官方法：一是薦舉，如魏冉舉白起爲太尉，范雎任鄭安平爲將；一是辟除，依秦制，內而公卿

，外而守令掾屬，皆自辟除，如呂不韋辟李斯爲郎；一是徵召，士有負盛名的，皇帝可徵召拔用，如叔孫通以文學被徵（見「秦的官僚政治及其文官制度」，「新政治」第七卷第一期）。但無論薦舉也好，辟除也好，徵召也好，都得有個標準。不錯，財產、德行、學問、能力，會在當時分別當作證衡標準。但其中除較有客觀性的財產一項，極易引起不平等弊外，其餘如德行，如學問，甚至如與德行學問有關的能力，似都需要一個最後的公認的準繩，以資鑑別，而且鑑別的方式，亦大費斟酌。秦代創制伊始，對於這方面的歷練，自嫌不够，換言之，用什麼目的去訓練士大夫，用什麼方法去籠絡或收買士大夫，它是沒有經驗的。幾經漢代君臣的揣摩與「深思遠慮」，作爲人才鑑別準繩的儒家學說被崇尚了，其後中經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開其端緒的科舉制，鑑別的有效方法亦被發現了；在這種製造並選用官吏方式的演變過程中，中國官僚制度才逐漸達到完密境地，而發揮其包容貫徹的性能，亦是藉此製造並任用官吏的演變過程而逐漸形成的。

所以，我們要展開那種作爲中國官僚政治所由遂行的一般官制的研究，最先就得披覽到一部「孔子御用史」的篇章。

（編者按）據作者來函稱：本篇爲原定目錄中所無，惟在研究過程中認定非增加它不可。



東北的戰鼓

于夫

一 戰鼓又響了

現在已是一高粱肥，大豆香的時候了，然而這句秋色的形容詞，在今天心中只是一個痛苦的記憶吧了。物價飛騰，這個月初東北人民的主要食糧高粱米五千四百元法幣一斤，大豆一斤則是三千六百元法幣。至於大米呢，瀋陽的價錢是每石九十多萬法幣，而看報上登的上海行情，頂好的白粳不過五十餘萬元。而過去呢？敵偽時代不提也吧，才光復的時候，大米每石是法幣一萬多元。

事實上，對這暴騰的物價，人民是並不驚奇的，驚奇的是等了十四年的艱苦歲月，為什麼勝利後竟在這過去沒有和日本打仗的地方，在日本人走了後，同胞間竟如此斷殺起來？這問題就在人民心中存在快二年了，到今天並沒有人在這地方敢說出答案來，只好等着砲火，讓砲火決定一切吧！

夏天的四平之戰才過去二個月不到，九月底便又起了烽火，二年來的經驗告訴人們，一次比一次的

激烈，而這一次無疑是空前的。從前，瀋陽的人民在長春外圍戰事結束之後，還會捐款救濟過，這次人們想到，是自己的命運在受戰神擺佈了。這幾天，謠言很多，說什麼林彪廣播打瀋陽呀！……另一面，陳誠坐鎮瀋陽，一般人對陳氏的估計份量頗重，說他比杜聿明有內戰經驗，比熊式輝在軍事上更高明，至少大家覺得也許增援部隊的調動能够快些。

這一點，共軍也像承認似的，所以九月底當中央線還相當安靜的時候，北甯綫上便先起了戰事。到今天，北甯路是斷了。起戰事的地方主要是在錦州山海關之間，而且一年多來雙方經常爭奪的錦西、綏中、興城，這一次仍是老命運。這幾個地方一出事，鐵路上便運兵不成了，秦皇島、葫蘆島二個吞納港也失了効。對外連絡本只有營口了，但是現在大石橋又被共軍佔去，更進一步，國軍在海城也撤守了，營口的作用也告失効。

國軍的增援部隊已由關內沿北甯綫推進了，可是到今天，仍沒到

綏中，即使路打通了，路軌經破壞後，修復通車又是一回事，在這假定的假定中，大家反正離不開瀋陽，飛機又早被人訂到了十一月，只好睜着眼睛看保衛大瀋陽之戰了。

看這幾天的共軍行動，很顯然的，牠是向瀋陽進攻。長春和吉林處於次要的地位。直到今天，共軍並未大舉進攻長吉，一般認為如共軍攻瀋陽得手，長吉兩地是用不到大打的；反之，如不得手，則再北擄長吉。在國軍，也是先守住瀋陽，主力撞一下，打垮了共軍的主力，長吉早晚沒問題。

這主力的大決鬥，一進十月，便迅速的展開，沒幾天，瀋陽外圍便緊張起來。瀋陽外圍的重要據點，北為鐵嶺，東為撫順與本溪，南為遼陽，西是新民。這幾天昌圖開原的國軍撤退了，戰事已到了鐵嶺外圍；南邊的海城也丟了，遼過鞍山便是遼陽；西邊新民也有戰爭。前天在瀋陽新民間的巨流河，竟發現了少數共軍。現在，出乎一般人預料的，只有撫順本溪兩地比較平靜，可是在用兵方面，誰曉得以後

的事呢？

為什麼戰事發展的這樣快？這便不能不談到今夏的四平之戰。談四平之戰，又不能不談到一年多的東北戰爭的演變經過。

二 戰爭的演變

三十四年，日本一投降，國軍便想來接收主權，十月九日政府代表到了長春與蘇方會談，空運不成，大連登陸又不成。最後協議，國軍於十一月初在營口登陸，到時又有了變化。十一月中旬，長春的政府人員來了個撤退。十一月十六日，國軍從陸地上打出了山海關。

十二月政府人員又回到了長春去，中蘇談判又開了幕，在長春、瀋陽、哈爾濱，政府接了事。那時，馬歇爾還在重慶轉旋着和平，政治協商會議正醞釀中。

三十五年一月十日，劉翰東由蘇方連絡官陪同到了四平街，省主席視了事。一月十一日政協開幕，全國停戰令下，可是為了恢復主權，却將東北除外。一月十六日，國軍由蘇軍導入瀋陽。

二月，蘇軍到期沒撤兵。所謂軍事調處、政協會議都令人期待。馬歇爾回了國。

三月全國舉行着反蘇遊行，軍

事調處有了爭吵。三月中旬蘇軍前脚離開了四平，共軍跟着進來。劉翰東當了俘虜，後來又放了出來。於是一度溫暖了人心的調處工作開始動盪。東北主權問題也在辯論。四平，成了一切焦點。

四月，執行小組來到了東北，蘇軍繼續撤兵。四月十八日共軍又佔了長春。國軍由瀋陽北攻。那時候，還受內地各戰場雙方將領相當歡迎並且還起相當作用的小組，到東北却撞了硬釘子。連他們外出觀察也成了問題，因而引起爭論。關鍵仍在四平，四平不解決，和談說不上。政府表示：打下了四平再講。

戰爭進行到五月。五月十九日國軍又收回了四平，然而戰事却到了長春、永吉。二十三日國軍克服了長春，二十八日國軍佔了永吉。和談成了再講之後再再講。

六月，軍事上成了強弩之末。六月七日東北停戰令下，於是執行小組和內地一樣，派出了八組，熱鬧了好久，結果，也和內地一樣，由執行變了象徵。打打談談，到了十月召開國大前夕，第三方面爲和平爭最後一口氣時，二十五日國軍又進駐了安東。和談從那時候起，便一直走着下坡路。在東北，國軍發展到了頂峯，因爲冬天沒有戰事。這時候的國軍在軍事態勢上處于最有利的地位：在遼南半島方面

到了旅順軍區邊緣的普蘭店；安瀋路通車，切斷了共軍的南北交通；安東省境內佔了通化一帶，那是長白山餘脈的邱陵高地，屏障着中長路；西邊到了遼源，作成向北滿插足的姿態。這個黃金時代，沒幾個月便失去了。

今年一開始，一切和談的象徵也作了結束。東北自春暖花開到綠柳成蔭，戰事一直沒停。春天共軍自哈爾濱開始渡江南下，一個春天來回了三四次，結果在德惠吃了敗仗，但在最後一次，雖然仍沒拿到根據地，可是也沒有退回江北去。這形成了今夏四平之戰的發展。

四平之戰自五月打到七月，結果共軍除了最末期的攻擊四平據點未能得手外，其餘的則頗有進展。遼南半島的共軍攻至大石橋南邊，安東則又入共軍掌握，由此，共軍的南北走廊再度打通。國軍則掌握住四平市，可是中長路長藩段一直沒有通車，這次陳誠到了瀋陽，會集中一切交通力量修補橋樑，第一次試車才通過，準備在雙十節大加慶祝的通車典禮還沒舉行，這次戰爭又摧毀了一切。

四平之戰與春季攻勢不同的，是共軍在中長路兩側屯集了主力；西側以梅河口爲中心，以西安爲前哨；東側則以遼源爲中心，以康平懷德爲前哨。另外便是熱河，經過

夏天的戰爭，國軍手中的只剩下承德外圍的幾個據點了。

四平之戰的形勢，決定了這次戰事的嚴重性，使初期的戰事展開迅速，末期的爭奪異常慘烈。

二、大瀋陽之戰

在瀋陽的政府高級軍事人員都不否認這是爭奪瀋陽的開始，有的說：「讓他們來吧，一鼓殲滅他們，整個的東北形勢便可改觀。」共方的消息說，林彪本人在今夏四平之戰時會說：「這僅是試探性的反攻」，而前天共軍竟說要「肅清東北」了。

由這次戰事的最初發動形勢來看，也足證這次瀋陽之戰不但影響着東北，也影響着華北，進一步是影響着全國內戰的總形勢。

這次戰爭，一般人認爲是共軍的第六次攻勢，可是在我個人，我想把今年的東北戰事看作共軍的春、夏、秋三次攻勢，因爲春季發生的四回攻勢，實際上僅是一次戰役的斷續進行。在這三次攻勢中，春季是以長春外圍爲對象；夏季攻勢中是以四平外圍爲對象；春季中共軍過來了一部，夏季中他們在中長路兩側站住了脚。而這一次呢？共軍竟南下到了瀋陽了。

戰事的初期是在九月底，在熱河的共軍約三萬人到了北寧路上，錦州至山海關間的每一個站，有的

被包圍，有的失陷，月初戰事竟發展到山海關附近。三萬多人的進襲，在這一小段北寧路上，並不能說是擾亂性質。國軍目前不會再從瀋陽抽出兵來往回打，只有關內增援去的可和這枝共軍作戰了。這戰事到今天並未結束，這也是增援部隊的第一關。

共軍另一股是由遼源這一帶出動的，經康平、懷德、彰武，而到了新民附近，新民東西的兩站巨流河與白旗堡，在一日左右都發現了共軍，惟未對新民攻擊。

遼南的共軍進佔海城後，並未全力北攻，而是繞過盤山，攻擊錦州新民間的溝幫子。這路的發展很可注意，但常常爲一般人所忽略；這一路的共軍以遼南半島爲兵員補充地，甚至安東的共軍也要仰仗遼南的接應。

所以在北寧線上，除了錦州至山海關間，國軍必須打通外，可能的演變，是錦州新民間與新民瀋陽間都要發生「鐵路戰爭」。這對國軍的增援是不利的。

至於瀋陽外圍的爭奪，北段是最要緊的，也是這次主力戰的所在地。目前共軍自遼源出動的一支，已佔了四平西北的犄角八面城，而至公主嶺。梅河口的已越過開原與昌圖，到了鐵嶺外圍。這一帶，據此間報上的登載，已發現共軍六個

縱隊的番號，番號仍是一至六，也就是春夏兩季中的戰鬥部隊。

一直沒退走的是吉林、長春、四平間三角地區的共軍，這次，這一股前後佔領了長春公主嶺之間的劉房子、陶家屯、范家屯，更進一步到了長春南部的大屯。

在這裏，還有二隻待下的棋子是：撫順外圍之戰，與安東遼寧邊緣的本溪之戰。

形勢到現在仍在發展中，雖然趨勢是明白了，可是在這比粗略的過程中，仍有新花樣的。在國軍方面，可能收縮吉林長春的兵力，夾擊共軍，或北上打運動戰。在共軍，可能在瀋陽外圍的重點中，先包圍，再越點穿隙而到瀋陽市郊，至少小部的擾亂可能於最近發生。

戰爭的條件決定在天、地、人。講天氣，現在瀋陽將是落葉的深秋景色了，不過一個月，綠葉便會落光，便是有雪的日子了。今後是可怕的冷天，這對士兵的戰鬥力大有影響，所以服裝的配備及士兵的耐寒性都成了勝利的條件。一般講來，服裝不齊的時候，耐寒性便更顯得重要了。當然，就對天氣的適合程度而論，第一是東北人，第二是華北人，第三是南方人。

論地勢，國軍的長處是以逸待勞，據點工事老早有準備。共軍的優勢是無後顧之憂，佔領着外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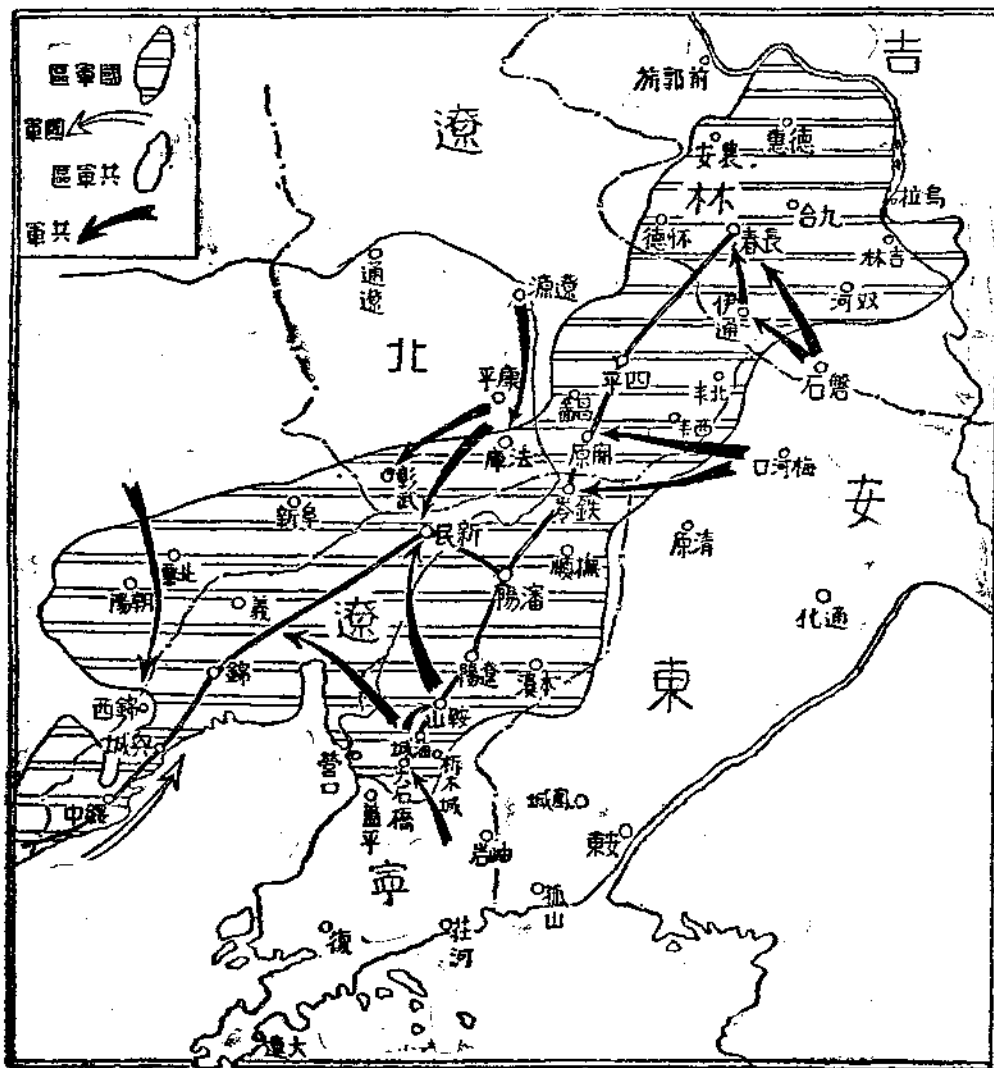
地，進可攻，退可守，即使攻瀋陽失敗，外圍已得的據點仍有保留得住的可能。

論人，便是援軍了。昨天鄭洞國對記者說，共軍此次動員的兵力約三十至五十萬，如果這是把正面、遼南、和熱河的共軍一併計算的，這數目的估計大致

可靠，論國軍，單論正規軍，似乎沒有這數目，所以便靠援軍了，而援軍現在還沒有到錦州。不過，國軍一個絕對的優勢便是空軍。這力量是無法精確估計的。

這次戰爭的結果，目前還不能明確的判定。一個軍事家不是說嗎？「戰爭便是賭博」。從事賭博的人都是想贏的。在這裏，直到今天止，我能寄給遼遠的內地讀者的，只是：這個戰事影響極大，也是最慘烈的。同時我想起今年夏天

圖略局戰近最北東



四平解圍後，守四平的國軍將領陳明仁所說的一句話：「我當了二十年丘八，從沒打過這樣硬仗」。我這個東北人，從九一八眼着日本平安的進入瀋陽後，逃到了內地，十四年多，我也流浪過各戰場，與陳明仁一樣，我也從沒看到過四平

那樣的硬仗，不曉得這算不算時代進步了？

不管我怎樣想，時代是要向前走的，只要中不了流彈，我想我會看見時代的進步。

(十月六日寄自瀋陽)。

平津的兩種逮捕·兩種「肅清」(特約北平通訊)

凌華

貪污和「異端」

自從決心「自力更生」以來，在平津所見到的大事，厥惟兩端：其一是肅清貪污，如最近成立了一個「平津冀軍紀吏治督察團」；其二是肅清「異端」，如頒發「後方共黨處理辦法」以及最近製造恐怖，廣事逮捕學生等事。我們承認，如果「肅清」進行得順利，則一方面去腐化分子，一方面去掉「後顧之憂」，於所謂建國大業或有裨益。但如不幸而發生流弊，如肅清貪污依然含混從事，肅清「異端」變成胡亂抓人，那末只會增加人民對政府的惡感的。記得以前在內地時，聽說特種人物認為一切帶去圖書館的學生皆屬異黨份子，假如這公式也被應用到今天肅清「異端」的措置中來，則我們將更為政府的糊塗與無能而慨嘆了。

我們試從兩方面來看

這種「自力更生」的成效。

蒼蠅——高級

參謀搶屋

關於肅清貪污，並非此番突然心血來潮，過去如「清查」呀「監察」呀，已舉過多次，成效如何，有目共睹。北平的老爺們，一架機關，幾位衛兵，就可霸佔房屋，甚至發生和別的老爺們因搶屋而互相火併的事。等到搶得房子，便可免費居住，或以低價「洽購」。「洽購」，不但估價放低，而且可以緩交款項(至少分期交款)，一轉手之間，獲利極豐。(據說天津「洽購」房屋的價格，從無超過項費者)。

免費居住房屋，早成爲權要們份內享受的一種特權。小民們不必說了，就是頗惠慶在北平的房屋，至今也仍由某武人闖爲私寓，忽忽兩年，收回無期。

我們特地提到這種「官場風氣」，其用意不過是藉此來談起督察團一件自認爲非常偉大的工作。

我們並不是說，貪污止於搶屋一端。如果官爺們竟肯自滿於搶屋，那麼中國雖不算「大治」，至少如今也勉強可以清平了。自平津冀軍紀吏治督察團開始工作以來，當然有老百姓去密告，乃至有因分贓不均或派系傾軋而去告發的。督察團收了密告信，就表示「注意」「調查」。注意復注意，調查再調查，總算在數千封密告函裏辦了一樁，這就是「苑崇毅案」。

苑是「九一八」以前東北的一個小軍閥，戰後因大勢已去，退隱在北平。勝利原是官俸發財的天賜良機，苑崇毅雖無復當年氣派，但餘威仍在，做了保定綏靖公署一個掛名的少將高級參謀(這類高參爲數甚多，孫連仲說他和他們根本就不見面的)。

他拿到了鄭作華和萬福麟的兩封證明信，冒領過三座房屋。其中一座已經領了售出，得價十七萬元。有些房屋原主就住在北平，看着房屋被人冒領，便向處理局抗議。這個處理局，用孫樹棠教授的法子，叫做分贓局，根本一向是接到大官及名流們的證明之後，就「等因奉此」，胡亂「處理」一頓的，對於「刁民」們的抗議呈請，當然不放在眼中，所以苑高參也能平穩渡過險關，總算發了一點洋財。

哪知道這次督察團要來「澄清吏治」了。據該團團員對平明日報記者發表的談話，要先辦「容易」的案件。大概經過調查之後，認爲苑高參一案是「容易」辦的吧，於是高參大人鄧錕入獄了；還牽連了處理局一個組長，這個組長，起初的罪名是「濫職」，後來又說是「糊塗」，「將應受行政處分」云云。

老虎——前任

市長盜糧

這時，一個天津老年士紳李廷玉挺身而出，控告前天津市長張廷諤貪污，說勝利之初，這位市長接收了一個倉庫，封好前門，打開後門，用大量的運輸工具搬走糧食，連一日夜之久，價值數百萬元云云。張廷諤見了這消息，即在天津大公報和新星報登出大幅啓事，加以否認，自稱已函請督察團澈查。於是李廷玉就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這位可愛的老先生願意做一個「不怕死」的控告者。他說他之揭發張廷諤的貪污，過去已有過好幾次，並曾一度告到蔣主席處，但不知爲什麼始終未辦，所以這次又向督察團控告。

但這大概是一件不「容易」辦的案件了。督察團始終含混其辭，有的說要先辦別的密告案，有的

說過去既已查同過這樁事件，所以要從緩一下，有的說如今督察團太忙，：這時候，又辦了一件事：開六億的敲詐案。督察團的威風就在這裏：忙於幾億元的案子，却把幾百億的不「容易」辦的案子擱下了。

「清黨」：官員遭捕

當這個「肅清」貪污的運動正在推而復推而復推的時候，另一種肅清運動却開始了。據一位高級官員向記者說，這是一個「新的清黨運動」。

這一種作風又與上一種不同：大捉一次，亂捉一番，「管可錯捉九十九，不可錯放一個。」

在九月廿五日或廿六日，忽然傳說破獲了一個中共的電台。有沒有這一回事，誰也不知道，於是逮捕隨之而起。保定綏靖公署建設委員會的副主任

北平一劇場：黨團未合併先火併

黨團正式合併的消息傳出後，政府中有很多人說：這同我們的力量可以加強了。其實合併在南京不過是舉行儀式，在地方上却變成了火併。

監製者·導演·演員

察隨着南京二全(團方)、四中(黨方)兩個會議的舉行，北平黨團鬥爭達到了最高潮，從平時互相的冷戰熱戰，進為短兵相接的武戲。這齣全武行好戲的演員，是經常被市黨委團幹事委為在北平唯一能繼承黨團精神的中國學院的學生，上演地點也在中國學院，導演便是北平特別市黨部和北平支團部。演出一連延續了將近一個月，演員精神始終不衰。

辛 中國學院，自從去年秋季由團的學生作為主力，把做了十年院長的何其章(西北軍系統中的人物)驅逐出校後，它在北平學府中便成為官方勢力的大本營。團在「驅何」這件事上，雖然功居首位，但是一年來無論在中國學院的校務上或學生活動上，它並沒有取得領導權，反而一切操諸黨手，團的學生只不過淪為打手或保鏢的地位而已。這次武劇的演出，可以說是團的翻身運動。

辛 辛

準備工作是在暗中早就進行着的，到了八月廿三日纔表面化。攻擊從側面入手，對象是秘書長吳慶昌和總務長韓道之。廿三日的早晨，中國學院(以下簡稱中院)的校園裏貼滿「打倒吳慶昌韓道之」的標語，具名的是「護校聯合會」。「護校」兩個字意味着：學校是我

們搶得的，而便宜反被你們拾去，現在我們要收回權利了。「護校會」不但貼出標語，列舉吳韓兩人的罪狀，同時還策劃了更厲害的行動。

吳慶昌這位秘書長是去年中國學院「驅何事件」發生時，由北平行轅派來駐在中院的將級參議。這位參議因為看中中院校園裏的一所小院，便索性把家眷遷來同住。二十三日清晨，吳還在夢中，便被一片喊聲吵醒。他披著衣服出來一看，滿牆都是「打倒吳慶昌」的標語，他發起火來，立刻叫喊工役洗掉，誰知工役這時也不像平日那樣聽他的話了。這位秘書長正待發作，早有一羣學生擁到他面前，手指口罵，限令兩天以內搬出學院，否則便要將他的行李拋到馬路上去。吳慶昌仔細一看，這些學生正是平日團方拋頭露面的份子，他彷彿明白了什麼，畢竟是在官場中混慣的人，看着情形不好，不吃眼前虧，便滿口答應下來。另外一位吳慶昌請來做女生宿舍管理員的，被學生鎖在房裏。她哭啼央求了好久，纔被放出，所有傢俱行李都被拋到房外。

韓道之住在校外，當時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失，不過從此他再也不能進入中院校門了。團方的學生把他們平日蒐集對關於韓的惡行，逐條公布出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貪污，說他把學校的經費存在清末大閘李蓮英的後人所開的銀號裏，每月十七分利，而向學校報告則只有十三分。說來可憐，韓道之這一個市黨部導演的下小丑，縱有天下大膽子，恐也不敢把每月四分利錢一個人獨吞下去的。於是他便在報紙上發表談話，發誓說絕未貪污舞弊。反正否認儘管否認，即使是查無實據，總也事出有因。隔了一天，韓看着事無轉機，便到黨部求計，立刻便由黨方學生組織起「正義護校會」，擁護韓道之，吳慶昌繼續主校。「正義」的意思彷彿是怕別人指說是被動的，所以先自標明，表示確有主見。

閃電式的佔領

委員于清中將被捕了。同時，他下面尚有兩人被捕，一人逃走。逃走的是王治秋，他的妻子代他進了監獄。後三者都是少將參議，却不是掛名的。于清是馮玉祥的舊人，頗為孫連仲所信任，也許比較開明一點，但是恐怕連張君勱的程度都夠不上。他曾經代孫連仲辦理過幾次國庫問題討論會，請了被目為左派以及呼籲民主的若干教授吃了兩次飯，並曾贈送了幾袋麵粉給他們，——其中有兩袋還是發臭的。這就引起了無端的揣測，傳說這就是他的罪名。如果這樣一個連自由主義者都說不上的人物還要橫遭忌視，也未免太可惡了。各機關高級職員聽說也間有被捕的，以致傳說紛起，人心大慌，但報紙上不許發表。

學生含冤

燕大罷課 兩個聯大校友，最近才結婚的袁永熙和陳礎被捕了。袁在金城銀行做事，陳在貝滿女中教書，他

們的家據說也被視為嫌疑地帶。陳礎去年的學生，今年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的陳理康，到陳礎家中去送還一本小說，也被捕了。官方居然說是「去領取款項」的，真是活見鬼。陳在學生中本有相當好感，借書更是極平常的事，但一遇嗅覺奇特者，就把許多帽子罩上來了。有一位教授說：「真的對方的工作人員捉不到，而結果是摧殘了社會上許多有用青年，使整個社會更走向黑暗與恐怖」。燕大得知喪失的消息，就在十月一、二日兩天罷課。同時北大清華也發現學生失蹤，北大是吳讓、邢福津、力易周，清華是陳彰遠和一個姓張的。北大清華正醞釀自二日起開始罷課，而一日下午七時，陳、吳、邢、力五位同學都同時被釋了。

這些消息還是天津益世報登出來的。天津大公報大概因為已經自居官報了罷，諱莫如深，竟無一字涉及，連燕大罷課的事情都不提。這表示北方一

「護校會」和「正義護校會」之間並沒有大規模的衝突，雙方最多不過貼標語，一方喊打倒，一方喊擁護，稍稍口角而已。三天後，團方就按着計劃了的步驟，把中院正牌的院長王正廷又抬出來。王正廷在去年何其聲離開中院後，曾經來過北平一次，想乘機收回中院，但當時遭受黨團聯合拒絕，如今團方看着王是唯利用的人物了，就又把牠請出。好在對於這些老官僚們，從來就是在用得着的時候便恭敬一番，不用的時候，就一頓打罵，請他滾蛋。王正廷本人雖然不在北平，但是他的代表呂劍秋在七月間便來了。呂劍秋便是曾在立法院中爲了職業代表名額問題指責過社會部長谷正綱的七十歲老立委呂復。

八月廿六日的傍晚，呂復帶了大批人馬，由團方學生做護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接收中院，當時宣佈王正廷的意旨（其實這個意旨早得到團方的同意），說是以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名義替王接收。這場接收因爲是閃電戰，當時並未引起糾紛。過了兩日，代表黨方的世界日報纔出現了醒目的宏論，把呂復罵得狗血噴頭，大概是報復當日呂在立法院中指責谷正綱的舊仇。兩三天後，中院又出現了一個「愛校護校會」，自稱保持中立，一方面不反對呂復，一方面堅決反對呂復。這會也在世界日報大登啓事，把呂復痛罵一頓，同時又提出了教授治校的办法。中院的教授會呢，是由市黨部的一位科長負責主持的，如此「愛校護校會」無疑地也就是黨方的組織了。在「會」的數量上說，二比一，黨方佔了先。

高潮：黨方大打出手

會可以儘量組織，報紙上也可以盡情臭罵，但是真正的交手戰總還沒有出現。到了九月八日，黨方可真不能忍耐了，便發動了第一次攻擊。九月八日是中院第二次招考新生的前夕，這天晚上，黨方選了三四十個強壯的學生舉行偷襲，把呂復準備好的新生試卷全部撕毀，

試場的窗子也都打破，大概認爲這一着成功後呂和團方雖不全而崩潰，也得大丟其臉。果然團方不曾防備，試卷盡被撕毀。然而團方仗着人多錢多，一夜之間，就把新試卷重新辦齊了，第二天依然舉行考試。

黨方看着一計未成，接着便實行第二次攻擊。九日早晨，新生正在考試時，黨方又派來三四十個學生，在各試場門外大喊「打倒王正廷呂復」，「考試不合法」。團方因爲前一天吃了啞巴虧，所以早有準備，立刻出來應戰。結果一場混打，把考生都嚇跑了，雙方都有三四個人受傷。這時警察也來了，進行真正排解工作，給兩面大作其揖。當晚團方便以中院校務委員會的名義發表聲明，毫無隱蔽的說：市黨部派來大批打手，搗散試場。

十日，新生考試照舊舉行，這天團方防備得更爲嚴密了。試場移到中院最深僻處的理化館，考生中因爲有不少是黨團兩方推荐來的，所以應試者仍不乏人。團方的學生每人都帶起青天白日紅邊的臂章，手裏拿着木棍，從校門排站到理化館。果然黨方雄心不死，因爲知道團方必有準備，所以並不出動己方學生，而特地請來北平國術館的師傅們臨時到場幫忙，據說每人每日略致薄酬國幣五十萬元。國術師傅們穿起白衫藍褲，手捧白石灰，從市黨部整隊開到中國學院，見了帶臂章的人，不容分說，迎頭便是一包白灰粉，然後奪下木棍，一頓亂打。這次團方吃了大虧，一個爲首的學生王瑞被幾個壯漢按倒在地毒打，其餘的都躲到理化館旁邊的一個小院裏，隔着短牆用石塊與國術師傅胡亂對打。相峙了一小時，警察纔到場調解，但是國術師傅却翻牆回去了，只捉到其中一個，從他身上搜出短刀，但是後來證明確實是市黨部派來的，又只好開釋了。被毒打的王瑞坐在地上的撒賴，他邊哭邊罵罵罵的無恥，又說同志們貪生怕死不來救他，最後要求考生和他同到行轅請願，結果哭了好久却無人理會，只好帶了自己的唾壺到行轅撒嬌去了。

個大報沒落的定局，可以向南方人報告的。

兩種逮捕，兩種「肅清」同在進行，結果如何呢？如果當局能看得清楚一些，把重心放在肅清貪污上，把勇氣放在肅清貪污上，也許還可以稍微減輕人民的怨憤，但目前的作風則頗使一般人士增加疑慮。我們試看北大壁報聯合會訪問教授的紀錄，

一連三場惡戰，問題演變得愈難解決了，沒辦法，只好由北平市長何思源、市黨部主委吳鶴人、支團部主任李燕、警備司令部司令陳繼承四人會銜出了一張任何人都不准再到中院胡鬧的佈告，貼在中院校門口，並派了武裝警察保護學校，這場風波纔算平息。

尾聲：臭罵洩憤

但是黨方猶不死心，仍然隔幾天便在世界日報上登個啓事罵罵一番。團呢，只輕信信地發表一個通告，說：蓋有秘書長吳慶昌印鑑的證書，餘部不承認，所以算作無效，以此作爲報復。

據說這件事已經驚動了南京，導演之一的市黨部主委曾被他的主子申斥，說把事情鬧得太大了。但是申斥儘管申斥，等到十八日王正廷從南京趕到北平後，十九日世界日報上便出現了一個中國大學「愛護校權會」、「驅王正義護校會」、「師生護校聯合會」和一個叫做「驅王必勝會」的四會聯合刊登的廣告，把王正廷過去的醜史，諸如在紅十字會移交時不交出汽車，在駐美大使時吞沒公款而被最高當局電令申斥回國等事，一股腦兒地和盤托出。這也許是四中全會時只顧高談「合併」，而忘掉指責其他劣行的一個補償吧。（九月廿三日寄自北平）

關於「聞一多的道路」

史靖

差不多一年多了，在充滿了憤怒和恐怖的國度里，一切又都像恢復到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那時候的情況，除了某些地區而外，中國快被窒息得沒有聲音了。年輕人耐不住寂寞，爲了重新提醒許多善良的然而被生活重壓着的人們的記憶，搶着九月十五日這一個中國民主運動史上劃時代的節日，我懷着對於一位崇高聖潔的靈魂的景仰和敬意，遂不揣淺陋冒昧地寫出了「聞一多的道路」。

時間既極其倉促，許多必要的準備皆不及順利安排，不可否認的，作爲一部傳記來看，「聞一多的道路」不僅是不够謹嚴的，而且無論在文字上或事實上都是存在着够多的缺點的。作者並不諱言這些。正因爲有許多明顯的缺點，這本書雖然由於作者對於文學與藝術太欠缺修養，而採用了一種舊式的直述的傳記體裁，却並不敢也不希望讀者諸君把它純然當成一個人物的傳記看待；那需要對於這個人物的生平道德文章人格諸方面充分的了解，特別是先決地需要這方面的充

足的資料。非常抱歉，我沒有這樣做，而實在也是缺乏這種能力去做。

誠如書名所提示的，作者唯一的私衷，乃在說明聞一多先生的四十八年生命所經過的歷程，在這個動盪變亂充滿了血腥烽火和人民的痛苦呻吟的時代里，一個知識份子如何成長，如何面對現實，最後如何結束了他的生命，選擇了他最終所要追求的目標。這樣，聞一多先生就用他的生活與鮮血寫成了一首壯麗的史詩，爲知識份子指引了一個應該適向的目標，並且用他的一生爲知識份子開拓了一條適向目標的道路。自然無需誤會，沿着這條道路行進，並非說接受了相同的目標，也必需有相同的結束，那是必需的，而且是近乎怯弱的。沿着這條道路行進，並不在重複光榮的但也是不幸的結束，而在接受他殉道的決心和勇氣，主要地還在學習他的轉變以及轉變後的工作。因爲我們雖然歌頌偉大的犧牲，却並不鼓勵隨便地犧牲，更重要的乃在爭取勝利。

自然，也無需誤會，特別強調

聞先生的轉變及其轉變後的工作，並非即是忽視聞先生轉變以前的生活與成就，誰都明白，歷史不容割裂，沒有前面四十五年的摸索探尋，便很難有後三年的那樣毅然的选择。聞一多的道路是曲折的，但畢竟是聯貫的。爲了要尋出這一條貫穿的綫索，因此即使是在資料最缺乏搜集極不易的情況之下，我依然不顧貧乏與空虛地分別敘述了一些聞先生早年和中年的事略，希望從這些極簡略的敘述中能看出一絲他的生命和思想發展的軌跡。慚愧的是由於疏忽，更由於笨拙，我雖然一再再拙著中指出先後的關聯，却表現得不够清楚，以致可能在某些讀者的心中造成一種含混的甚至是厭憎的印象。倘如因此而有所損聞一多先生的光輝，我自然是無法辭其咎的。不過作者敢於自信的就是這些敘述儘管非常簡略或有遺漏，却是正確的可靠的，作者對於聞一多先生的了解或不够，但尙不至於誤解。

作爲民主戰士終於以身殉民主的聞一多先生，由於晚年的光輝過於燦爛，在好些人的心目中易於造成一種錯覺，從而無視了他以前在

文學上和學術上的造詣，無疑地這種錯覺必須加以糾正，聞一多先生的轉變之所以特別值得誇耀，正是因爲他是建立在崇高的造詣及學術地位之上的。他之所以特別獲得青年的熱愛和崇敬，固然是由於他的人格與熱誠，也是由於他的學問與文章。因此紀念這一位青年的導師，應該對他有一個完整的認識，所以一個文藝的外行，對於國故一無所知的聞一多的學生，爲了紀念先生殉義的周年忌，不顧因噎而廢食，匆忙間雖自知遺漏難免，終於仍然採集了許多先進文豪們對於聞先生在新詩方面的貢獻的推崇而寫了一章「死水」，並且根據先生生前故舊的經常評述與個人的耳聞目及寫了一章「懷舊與研古」，以介紹聞先生治學的精神和在國故方面已獲得的若干成果，無可否認，這些文字對於一位詩人學者的表彰是不够的。不成問題的，在這兩方面還需要有更深入的分析 and 研討，需要有人來從事更深刻的和謹嚴的工作。

這本小書的初版和再版都承史枚先生予作者以幫忙和斧正，謹致虔誠之謝意。尤願藉此機會感謝許多先進和許多熱誠的及不熱誠的青

浙江的「匪患」

范仲

年朋友給了我以極寶貴的指示與批評；爲了表示衷心的接受，我已坦白地指出拙作的疏忽缺點和造成缺點的原因。不過限於時間，特別是限於能力，彌補糾正的工作遂無法進行，因此一本完善的聞一多先生的傳記實有待於先生的故舊、家屬以及許多敬仰聞先生的青年朋友，特別是那些對文藝有深刻修養對國故有深刻了解人士去加以完成了。

「聞一多的道路」，僅僅是爲一位民主戰士而兼詩人學者的光榮的充滿了活力的一生，倉促地塗繪了一個約略的輪廓。但願這是拋磚引玉，從而引致一尊莊嚴的但是生動的造像。

值得慶幸的是由朱自清先生郭沫若先生以及吳晗先生潘光旦先生等所編纂的聞一多全集不久即可陸續付梓問世，這對於幫助了解聞先生的道德文章實在是最好的根據。此外，聞先生的兄長們依然健在故鄉，他的三十多年的好友潘光旦先生羅隆基先生等對於了解聞先生的生平都可以提供許多珍貴的軼事。作者愧惶之餘，深望有時間有興趣的人士們能迅速來從事並完成這個神聖的工作。

謹爲聞一多先生在天之靈祝福！
爲民主的勝利祝福！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

勝利二年以來，由于內戰的影響，農村社會正在急速地走向破產，「捐」、「徵」、「借」，使農民們嚐夠了勝利的苦味，看看各地的報紙，聽聽街談巷議，何處不是「匪」？那天不在「剿」？在這丘陵地帶，雖然治安當局配合國軍正在大事掃蕩，但相反的，「匪」却日益「猖獗」。記得有人說過：「貧窮和飢餓永遠是共產主義的溫床」，千真萬確，浙江，這人文會萃之邦如今已淪于貧窮與飢餓的淵藪。記者茲就浙江全區之匪情作一綜合報導。

在浙裏武裝人民活動之區域可分：
(一) 四明山區，(二) 浙閩贛邊區，(三) 浙蘇皖邊區，(四) 金蘭盆地區，(五) 會稽山區等五區，分述于后：
(一) 四明山區：此區包括上虞、暨縣、餘姚、新昌、豐波、慈溪等縣，共有「匪」衆約千餘人，爲李之光所率領，四明山設有司令部。省府暨綏靖當局在此設有四明山綏靖指揮部，派駐浙保第一總隊擔任清剿工作。除此，尚有最近本區之鎮海、定海等縣之徐小玉部。自七月上旬駐定海沈家門之保警第一中隊警長楊先林擊斃，中隊附魏朝祿率部衆十六人投入徐部後，該部併共軍勢力更形擴張，經常流竄鎮海、定海、奉

化、象山，跨縣邊境。又鎮北「共匪」並設有「浙東行政公署」，掌理行政事務。

(二) 浙閩贛邊區：此區包括江山、常山、泰順、慶元、平陽等縣，境內崇山峻嶺，「匪部」因地理環境之優異，綏靖當局束手無策；在泰順、平陽邊境有中共浙閩邊區特委鄭丹甫率領之一支數百人，總部駐在九峯灣。先前衢州綏靖公署設有浙閩邊區綏靖指揮所，現已撤銷，所遺任務由各縣地方團隊接替。

(三) 浙蘇皖邊區：此區包括德清、安吉、孝豐、昌化、桐鄉、長興、吳興、於潛、遂安等縣，駐孝豐附近之有許道珍率領之寧廣孝游擊獨立中隊一支百餘人，駐昌化上胡家地方亦有不明番號「共匪」百餘人，其他地方零星派支甚多未能統計。在各縣邊境，治安當局設有聯防處多所，如安吉長興邊境之龍山聯防處，吳興、長興、安吉邊境之妙和岷聯防處等。

(四) 金蘭盆地區：此區包括金華、蘭溪、浦江、義烏、建德等縣，境內「匪部」不下千人，其中出沒金華、義烏、浦江邊境者爲中共浙江副主席吳山民之舊部，駐於蘭溪、建德、浦江交界

處者有丁谷之部隊。近曾一度謁臨皖南共軍企圖包圍衢州，但證諸月來事實，此傳恐係子虛。

(五) 會稽山區：本區包括紹興、蕭山、諸暨等縣，駐有周芝山所率會稽山人民抗暴游擊隊，經常出沒蕭紹諸邊境，治安當局在此設有會稽山綏靖指揮所擔任剿務。

除上述所述，其他如三門、象山、鎮海洋面之「海盜」，括蒼山區、雁蕩山區之「共匪」不勝枚舉。總之，整個浙江除城市及其附廓外幾乎全部掌握於「共匪」手中。「共匪」非但到處繳獲各縣縣公署所存槍枝，擴充武力，另一方面對政治工作亦不遺餘力，積極展開，如宣傳隊之普遍設立，在餘姚一帶組織鹽民成立鹽民自衛隊，同時規定農曆二月十三日爲鹽民翻身節等。治安當局成天會商，成天會剿，成天發表戰亂宣言，已弄得焦頭爛額，精疲力竭。從人民武裝的事實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一幅「地獄圖」；的確，整個浙江已陷于癡瘓中，「貧」、「徵」、「剿」三塊大毒毒已在化膿，腐爛，它需要新的血液，新的細胞！(九月十二日寄自衢州)

藝文雜誌

讀「中國作家」

趙涵

翻開「中國作家」，我第一篇讀了綠原的詩：「你是誰」。他說：

我發誓要
把生命蘸着血
摔給中毒的世界

這是一首矗立着戰鬥意志的詩。流貫在這首詩裏的，是火山的熔岩，它從你的心裏激引起你的願望，你的仇恨，你的或者迷茫了的生命。這裏不僅是熱情，它比熱情深沉，它比熱情開曠。它像慈母的手，有那樣的溫暖；但它又像戰士的刀，它在召喚。你聽啊！

親愛的同胞們——
每天從辦公室頭昏
眼花拖出來的公
務員呵，
不要認為你底妻子
兒女是
你底吸血蟲，不要
恨他們
（他們無辜！）
（他們應該活！）
你要洗個冷水臉，
再想一想：
是什麼把你弄得這
樣無助？
再看怎麼辦！
再聽啊——
主婦呵，當你輕輕
地
用鍋鏟敲着
空了三天的米罐子
的時候，

不要埋怨你底可憐
的丈夫吧，
要幫他搶回
從窗戶飛走的希望
，
要使他決心活下去
呀！
爲了你們底孩子，
爲了你自己，
爲了他是一個「人
」。
不要讓他在街頭巷
尾
被金錢牌的卡
輪碾死，
不能逼他尋短見！
活下去呀！親愛的
姊妹！
那怕就是淪爲乞丐
，
也要活下去呀！

組織乞丐底隊伍
活下去！活得下去
的！
是怎樣深激的情操，
母親和戰士的血交流在一
處，詩人是煎着這樣的血
，在爲我們寫生命的詩篇
。別看它是這樣浩蕩的氣
脈，當你默聲讀它的時候
，它又是怎樣的密緻而親
切。你不自覺，眼淚已經
延着臉頰滴落在地面了。
因此熱情不是雲霧，而是
大海。惟有這樣的詩，也
才能夠叫做詩。空泛的，
叫囂的，冷笑的，挑逗的
，那些灰白的「詩」，滾
出去吧！
暴戾的苦海
用飢餓的指爪

撕裂着中國的堤岸
，
中國呀，我底祖國
在苦海底底底底底底
射裏，
我們永久記住
你底用牙齒咬着頭
髮的影子。
是的，我們要永久記
住；而且我們的詩人啊，
當我讀到你用仇恨的激情
，用包容大地的深愛來凝
結成「你底用牙齒咬着頭
髮的影子」的句子時，整
個的我都被你撼動了，如
像我正在進行一次兇猛的
搏擊，我的生命的刀尖上
擊出了火花。

是的，你底詩要使每
個人生命的刀尖上擊出火
花。這才是戰鬥的詩。

我第二篇翻開了朱自
清的「論廢糖」。這是一
個腳步謹慎結實的作家，
他在一步步走着自已研究
學問的路。在這篇文章裏
，他並不需要創新立異，
只是在文章的結尾之中，
他把人民性和藝術性相對
立，這是值得討論的一種
說法。因爲「人民性」
，首先是反對教條主義的，
因此它和公式主義沒有相
通的地方；第二，「人民
性」的理想正是文藝爲人
民所有，所以它一開始就
要朝這個方向努力。因此
「人民性」與「藝術性」

讀姚牧先生爲介紹他自己的作品演奏會而寫的「
我是個拾荒者」，我被一個年輕音樂工作者的熱情的
由衷的呼喊所感動。七日那天，我懷着極大的期望參
加了姚牧的作品演奏會，正如姚牧自己所說：「音樂
應爲廣大的工作需要而工作」，我渴望從他的樂曲中
，聽到人民在生活重壓下痛苦的呻吟和在戰鬥中翻身
的怒吼。



談姚牧的創作

——聽姚牧作品演奏會

冬耕

然而，我是感到失望的。姚牧並沒有打開智識
份子窄狹的樊籠，將音樂獻給廣大的羣衆，他的樂曲
幾乎全部是蒼白色的；過分濃重的智識份子絢爛的抒
情情調，使樂曲顯得貧弱，沉悶，無力，沒有「求生
的慾望」，也沒有「熱烈的愛憎」。在音樂已經能有
豐富的思想內容的今天，這樣貧弱纖細的樂曲將來未
免要被時代巨大浪潮所淹沒。

幾個大合唱曲，表現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民生活
，吟咏的不是活生生的人民語言，而祇是像「懷本枝
頭露」、「春眠不覺曉」、「春訊」和「桃園裏」
……一類極端纏綿感傷的舊詩詞，顯然缺少迴響鏗鏘
的音響，而集體大合唱的雄渾有力的特性並沒有被發
揮。

「感時」和「風」由古怪味極重的新詩譜成，節
奏曲調都處理得太平直，情緒也把握得不够緊湊。「
雲霞曲」很像一首抒情詩，小巧，玲瓏而細膩，就作
曲技巧上講，是較成功的一個，但祇是作「四首望
江南」的遙想而已！

鋼琴組曲「中國小品」採用了「江南謠」與「哭
長城」的民謠旋律，是作曲家向民謠採來的「五聲音
階習作」，在創作企圖與路向上是較好的作品，但由
於作曲技巧的不够成熟，曲體是不完整的。「村樂鐘
鼓」中鑼鼓的敲擊不够熱烈，全曲僅像樂曲中的引

實際上是不能分離，而是二而一的東西，正因為在文藝現象上，有了這種分離，所以才造成許多錯誤的。

第三篇，我讀了胡風的「先從衝破氣和惰性的開始」。這是一篇精闢有力的好文章，首先他自己已經從衝破這種氣與惰性的開始，因此這裏充滿着析，而且有熱情。本來，一篇好的理論文章，本身就是對一種錯誤的擲擊。這篇文章，不僅富有啓示性，而且指出了一個明白的路向，因為今日，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再用什麼現實困難來為自己辯護，「任何求真的創造事業都是在阻礙和迫害中間開闢出自己的道路」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求從自己開始，從衝破自己的錯誤的關門開始，而且也有開始和這種惰性的作戰，然後才能加強和這種氣與惰性的作戰。「歷史在前進，人民在前進，繼承着革命傳統的我們底文藝，爲了更大的奮發」，必須迎接這不能待的一次披荊斬棘的戰鬥。一切在這種氣與惰性的戰鬥，請用這把刀，對準你的瘡口刺下去，讓毒汁流去。

接着我讀了兩篇散文，巴金的「靜夜的悲劇」和唐弢的「生命冊上」。巴金的文章，一開始你就讀到「夜似乎很靜……」，你就會感覺到他的眼睛開始點燃了痛苦的火焰。在這篇文章裏，他不僅爲死去的馬拉痛苦和悲奮，也許在今日這沉重的氣氛裏，他那鬱積的心裏更期望着「一把刀插進去，使生命暢快的衝激出來，不要永久的像那壞了的水龍頭讓水一滴一滴的滴下去吧」是的，在今日，我們也常有這樣的心情啊！

巴金的「靜夜的悲劇」是一個站在浪潮的峯頂的英雄，而唐弢的「寫在生命冊上」則是一朵潛藏在浪潮裏的水花，生命的價值是一樣的。而這倒下去的影子，却更引起我們一種震顛吧！文章裏的寧靜，到結尾就變成了莊嚴的氣象了。

這樣我一篇篇的讀了下去。我讀了靳以的「母女」，這是一篇極爲有力的單純的好小說，他把兩個人物，描寫得多真切和自然，而這一類的文章却通常不免於牽強和做作。並且這裏的思想是堅實的，內容也很新鮮，本來，今日的對立已不是年輕的與年老的對立，而是真理與非真理對立，你看到母

女倆站在這裏的時候，你會感覺到歷史已經走了好遠，人們是活得更多的有信念，有價值。踏過去吧！你本不必自私的爲自己的女兒担更多的心，你担心的只是爲了更多的兒女們的幸福吧了。跟着你的是有許多多，現在我就是添加進去的一個。

自然，我們不能忘記新人馮輝的「姐姐」，這是曾經被許多人推崇過的美過的文章，尤其一開始，對姐姐同情的熱情，像像滾動着一顆顆晶瑩的淚珠。而且描寫性格，也知道旁敲側擊，寫姐姐落落落落的情景，把姐姐的主持家格，全顯在紙上了。只是文章轉入整個農村動盪的場面時，作者失却了控制的力量，更重疊的，過去動人的淚光在此隱滅了，因此有着一種白描的傾向，例如姐姐站在堡壘上看望的場景，也不像以前描寫的動人，我想這理由很簡單，因爲對姐姐的回憶，他有着貼切的愛，不由自主的，筆尖都是灑了淚水，但是，對人民和他們之間，有着相當的距離，所以從這裏，我們的作者如果要克服這種傾向，必須把人民當成他心裏的姐姐，這是最基本的創作態度，也不僅是在思想上可以強求的，我希望馮輝給我們新作品。「中國作家」，在目前說起來，實在是一次可以歡喜的收穫。

「花之舞曲」，一部新鮮優美的蘇聯音樂片，裏面包括着許多各種不同的樂曲，有哈依卡夫斯基的「胡桃夾」，悲多汶的「蘇格蘭之歌」，以及「天鵝湖」、「塔拉斯布爾巴」、「麗娃栗坦」……等節目，每一段曲子，都用了不同的形式來表現，它希望借這種畫面上形體的顫動，或比較具體的故事與人物的描寫，使我們能夠因此和音樂的深邃的世界相接近，把捉住存

舞台銀幕

「花之舞曲」

逸之

「花之舞曲」，一部新鮮優美的蘇聯音樂片，裏面包括着許多各種不同的樂曲，有哈依卡夫斯基的「胡桃夾」，悲多汶的「蘇格蘭之歌」，以及「天鵝湖」、「塔拉斯布爾巴」、「麗娃栗坦」……等節目，每一段曲子，都用了不同的形式來表現，它希望借這種畫面上形體的顫動，或比較具體的故事與人物的描寫，使我們能夠因此和音樂的深邃的世界相接近，把捉住存

在在那流動的旋律中的精神與主題。這是一種嘗試，它可以說是一部蘇聯的「幻想曲」。只是有一點，「花之舞曲」却不是卡通。同時，華脫狄斯耐把自己的幻想放在第一位，結果他是借了音樂，來幫助完成了他的希望和理想；人們不是爲音樂所吸引，而是爲畫面上的形體的變化和故事吸引了。「花之舞曲」則一般的是以音樂爲主，畫面上的東西，只是從旁來烘托和暗示吧了，

這一種情形以哈依卡夫斯基的「胡桃夾」爲最成功，一個個白色的影子，一個個活的音符，她們使旋律更美了，而且使曲子的情緒，也變得單純了。輕盈的快樂的腳步和迴旋啊！她們使音樂的夢境更遠更深了。所以這種從旁的暗示和烘托，不但未限制了原作的情緒的流溢；而且還爲他打開了一座想像更豐富的門扉。在這一點上，「幻想曲」因爲立腳點不同，因此所得結果也就不一樣了。

這裏包含的曲子很多，也不能一一介紹。只是看了「花之舞曲」，覺得這嘗試是有意義的，因此把它推薦給我們的讀者。

讀者之聲

教部取締煽動歌謠

黃非

九月二十七日的上海中央日報載有這末一條新聞：

〔南京航訊〕教育部以近有陰謀份子蓄意煽動變亂，編製各種破壞社會與國家之童謠歌曲，如「你這個壞東西」、「坐牢算什麼」、「逼上梁山」、「到延安去」等，亟應嚴加取締，以杜流傳，而遏亂萌云。

這裏面所舉出的四個歌曲，後面三個我都没聽過，但第一個「你這個壞東西」卻是我常常聽見，而且自己非常喜歡的。如果沒記錯，歌詞好像是這樣的：

「你，你，你，你這壞東西，市面上日常用品不夠用，你一大批，一大批，囤集在家裏。只管你發財肥自己，別人的痛苦你是全不理。油鹽柴米天天貴，這都是你，都是你，囤集的好主意。只管你發財肥自己，政府的法

令你是全不理。你這個壞東西！你這個壞東西！壞東西，壞東西，囤集居奇，抬高物價，攪亂金融，破壞抗戰，都是你！你的罪名和漢奸一樣的。別人在抗戰裏，出錢又出力，只有你整天的在錢上面打主意。問一問你自己，死要錢做什麼，到頭來一個錢也帶不進棺材裏。你這壞東西，真是該槍斃！

這支歌，原是在抗戰期中作成的，所以詞中有「破壞抗戰」等字樣。如今，雖然抗戰已經勝利，無如社會狀況並未有所改善，囤集居奇的好商、貪污預領的官吏、豪門獵犬、買辦洋奴，在現在都暴露出了更猖獗更醜惡的面孔。老百姓沒飯吃，沒衣裳，流離失所，時時受到死亡的威脅，處處沒有一點自由。於是，他們便用宏大的聲音，在抗戰勝利

後的今日，重新唱起了這咒你這個壞東西的歌曲，只略為改動幾個字，如將「抗戰」改成「建國」，便仍然切中時弊，唱起來，叫人聽着痛快，但也叫一部份人聽着痛恨。

既然使一部份人聽着不舒服，那麼當然要「嚴加取締，以杜流傳」了。可是，他們偏又不肯明說，卻另外加上一個罪名，曰「破壞社會與國家」。

嗚呼！衰頹諸公，何不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摸摸良心，問問自己，看那些破壞社會與國家的究竟是這支歌曲，還是那些該槍斃的壞東西？

良心早摸不得的，一摸問題可就多了，亂子可就大了，倒不如乾脆來一個「嚴加取締」，直截了當，省事得多。然而這也取締，那也取締，剩下來的是什麼呢？

窗外正由一架亟待修理的收音機在廣播着「五月的風。」
3. 5 3 5 3...
嗚呼，妹呀，心肝呀！這是被誰許願揚在中國領空的全部的聲音了。老百姓的聲音，真的

只剩這些了麼？不！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的人們，將要唱起反壓迫反對剝削之歌，將要高歌吼起咒你這些壞東西，將要起來槍斃你們這些壞東西！

學校儼如商店

學校儼如商店

金克仁

上海私立學校的「學店」作風原不自今日始，淪陷時期即已有之，不料勝利後相沿成習，轉而有變本加厲之勢。本學期私校收費，雖經政府限制，但多數不遵規定，擅自加收。現在一個私立學院的學生須繳一百六十萬元的學費，四十萬元的雜費，還有圖書費五萬，體育費二萬，保證金四萬，講義費二萬，一共就要二百六十萬元。如果學生選課多讀幾個學分，又得另繳所謂學分費，每個學分便是幾萬；學科不及格而補考者，又納補考費幾千元。似這樣巧立名目，一味聚斂，辦教育以榨取錢財為能

事，學校豈不成了商店了麼？清寒學生因環境所逼，間有請求豁免半費或三分之一的，那班校長和職員們大都一副關王面孔，相應不睬。更叫人氣憤的

，按「上海市獎學金統一審查委員會」所規定的手續，申請書表式應先由各校當局領取，然後分發清寒學生填寫，然而各校當局竟認事不關己，辦理很不認真，或迄未領來，或領來而不肯爽快發給學生，其甚者，連負責辦理的人員都未指定。學生問院長，他向訓導主任或秘書推；再問訓導主任，又說須先請示院長。從這方面看，學場又儼若官場了。（九月廿日，上海。）

本刊調整價格

近因紙張印刷價格高漲，本刊為平衡收支起見，自本期起訂閱價格調整如左：

外國	內 國		
	平 寄	掛 號	三 個月
平 寄	航 空	掛 號	五 萬 元
寄 律	掛 號	六 萬 元	十 二 期
	六 萬 九 千 元	六 萬 元	全 年
	半 年 美 金 二 元 半	全 年 美 金 四 元	全 年

加 照 年 全 年 半

時 文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發行人 編輯者 經理部
上海文週刊編輯部
上海牯嶺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新華日報

內戰全貌

石磊

論美國外交政策

林煥平

論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李定中

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

王亞南

宋子文接替羅卓英

林鬱

星洲華僑慶祝雙十節

的一場風波

鄭明禮

6

第二卷

「魯迅傳」序

臧宋

魯迅的避難生活

許壽裳

弔俞頌華先生

德明

關於雜文
左拉與社會主義
法國兒童電影
攻訐

關懷
林如獲
屏藩
寒山

願美國莫再逼成「共產國際」的擴大
麥克阿瑟來中國作皇帝麼？
對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友誼可言
物價全面上漲
刊物胡亂造謠



內戰全貌

石 磊

(一) 兩種戰略——「深入」與「空心」

在一個多月以前，人們對於共軍的四路南下，大多還認為是「流竄」的性質，認為這是因為「抵擋不住強大國軍壓迫」的緣故。不久以後，情勢逐漸明白起來，似乎共軍的活動，不僅是消極的，而且還有其積極的意圖。本來，戰爭就是這麼一回事：消極上要抵銷敵方的策劃，積極上要佈署自己的策劃。當今年仲夏季節，國軍的策劃已經非常明顯，借用前線日報社論的話，就是要「肅清山東，深入匪區，使共匪在人力物力上損毀殆盡，迫使其至少非退守東北不可」。若是國軍這個策劃實現，則戰事繼續由南向北發展，跨過黃河長城以後，雖說共軍還能在華北華中留下游擊戰種子，但是鑒於十多年前國軍在江西圍剿共軍的經驗，當共軍區的人力物力使用至飽和點時，它是不能不保存主力而「長征」的了。若果今天國軍也有如此的成功，則雖不能說底定關內，至少也總可以得到一個偏安的局面。

鄧文儀局長最近為共軍的活動撰了一個特殊名詞，說是共軍所採取的，乃是一種「空心戰術」。意思就是：共軍只在其老佔領區心臟中留下少數兵力，把幾乎全部的主力拋到外綫來作戰了。這個判斷，就這些時情形看來，大致是不錯的。既然如此，則我們也可以猜想到，共軍對於國軍的上述策劃，是有過判斷的。今年夏季以來，駐中國的外國通訊社，就不止一次報導過共軍首腦舉行軍事會議，大致就是在研究國軍的這一策劃而佈署它自己的策劃罷。共軍首腦部究竟怎樣詳細地佈署，我們自然無法知道，但就今天的發展情形來看，以及鄧文儀局長所指出的「空心戰術」等等觀察，似乎共軍不願再蹈十多年前在江西蘇區的覆轍（硬要在心臟地區作戰，致使人力物力均蒙極大損失，主力不能不作「長征」）；現在共軍所採取的策劃，似乎是按照毛澤東所謂「求戰、求食、求兵」的軍事原則，也就是說：它們估計經過一年作戰以後，兵力的消長、戰區的擴大等等，已使對方兵力相當分散，若能在外綫作更強的牽擊，則也許對方難以「深

入匪區」。所以，它們避免了把主力留在心臟地區打硬仗，打陣地戰，（其結果會使其兵力受重大損失，而人力物力均受重大破壞，這正是國軍企望的，對共軍不利的）；而寧把主力大部拋向外面去，實行所謂「空心戰術」，這樣一來，它可以避免在其心臟地區作硬戰，而選擇到它所擅長的運動戰的條件，這就是所謂「求戰」，以求在這種戰鬥中「滾雪球」式地擴大它的力量。這樣一來，它又可以避免在其心臟地區中，發生軍民爭食的現象，而獲得新的糧源，這就是所謂「求食」。這樣一來，它又可以避免在其心臟地區中，發生因「參軍」過多使生產力不足的現象，而獲得新的兵源，這就是所謂「求兵」。

(二) 大別山下

劉伯承的活動，乃是這一戰略思想最標本的例子。在他的部隊進入大別山之時，據說沿途很發了一筆「洋財」。按合衆社九月十五日的電報，已經估計：「在他巧妙的軍事攻勢政治攻勢互相配合之下，其某一枝部隊已由過隴海路時的二萬人增至八萬人。」在六安等戰役中，所得的裝備似乎也不在少。而在「求食」的問題上，由於它得到了「華中巴川」（李品仙語）的大別山，也許劉伯承會躊躇滿志的罷。但是，如果僅僅只有這些成就，還是不足為訓的，歷史上的民變武裝，何嘗不均是如此呢？如果在軍事進展的條件下，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那還是無根的浮萍，隨時會被一陣風來吹走的。劉伯承是一個被路透社稱為「最懂得政治的軍人」，他當然不會不了解這點。從這個角度上來觀察，當九月中旬劉部在鄂豫皖三省相當膨脹以後，當國軍紛紛從其他戰場上回撤皖中鄂中的時候，劉部忽然停止繼續膨脹，反而把它的觸鬚向大別山中集攏，就不是難以瞭解的了。顯然，它是不肯放棄這個富庶的「有糧有兵，有利作戰」的鄂豫皖邊區的，因此它不會如某些皮相的軍事記者所說，「準備逃回北竄」。它顯然是在企求於長行軍以後，得到一個較穩定的環境來休息整訓它的部隊，藉以恢復疲勞及總結經驗。這時候，除了用它的少數先遣部隊，從皖

中、鄂東分別渡江，以作將來活動的種子以外，其主要力量大概是放在建設中原根據地的工作上，它一方面在「立煌大山中設立修械所」，以爲下一次作戰的重要軍事補給，一方面「召集了一次邊區幹部會議，決議了從速建立根據地、爭取羣衆、廣收知識份子、優待俘虜」等議案（均見「觀察」二卷七期通訊）。自然，這其中一定會以土地改革、建立新政權作爲核心的，所以連這位惋惜國民黨的記者，也認爲「共軍真能將這些決議案實施，那安徽就要變成第二個山東了。」

最近，從十月五日起，劉部在一個比較不太活動的休整以後，又開始活動了。按雙十節上海大公報的報導：「該部在鄂東者，已由浠水移動，由黃安出發者亦配合向長江北岸發展，似窺大冶（按在江南）。在皖西者回竄霍山，佔六安附近之麻埠、蘇埠、獨山、張家山等據點，皖中又緊。」據十三日大陸報消息，則上次劉部「最膨脹時的邊緣」——合肥附近的桃溪鎮，亦重起激戰。尤其是霍山附近的一戰，意義更爲重大，據說八十八師六十二旅頗有折損。根據這些消息，我們還很難判斷劉部是否又將作一次新的進軍；但是，我們彷彿可以看到它在一度休整以後，已經用「分田廢債」的口號，在立煌、固始、經扶、商城、浠水等爲核心的鄂豫皖邊區，深下了足跟。而且，已經準備在休整後打幾場大仗了。大軍事學家魯登道夫說得好：「土地是人換來的」，不能在戰鬥中折損皖鄂國軍的力量，大別山還不可能是共軍的根據地。

（三）陝豫之間

劉部承的舊部下——陳賡、謝富治的共軍，自從渡河進至豫西以後，雖然沒有像劉部承一樣作巨大的長行軍，但是其活動的目標，顯然跟劉的目標是相同的。它在洛陽以西、潼關以東、黃河以南、紫荆關以北縱深三百里的地區，似乎也在作建立伏牛山根據地的打算。在上月十二日靈寶、十七日陝縣兩場大戰以後，它就自恃「折損了胡宗南調援的精銳」，不久就宣稱建立了這地區十二個縣的新政權。如所週知，這地區是有名的豫棉產集地，共軍的矚目於此，大概除了求戰、求兵、求食以外，還具有直接的求衣的意義在內（按一般情形，所謂求衣，是包括在求食之內的）。可是，這個地區正是歷史上的重要戰場，東有洛陽、西連秦嶺、北爲隴海、南俯紫荆，共軍是不能如此自恃無恐而安心經營它的新根據地的。若是不

能在這個地區週圍打幾場漂亮仗，則國軍在東邊有劉茂恩將軍，西邊有胡宗南將軍，隨時還是可能合擊這個地區的。

共軍似乎看到這點，陳賡、謝富治並沒有留在那裏做山大王，這個新根據地的經營工作，按申報通訊，是由秦基偉在那兒經營。陳謝本人，依然統率其部隊向東、西、南三面作擴展的活動，並以與西北國軍有淵源的孔從周向陝西方面活動，似有相當巨大企圖。

這兩天，退休共軍在東路的，又重佔新安鐵門，尋求分散的國軍（如六十四旅等）作戰，甚至直薄洛陽西關，探求洛陽中央軍與劉茂恩將軍所部中間的間隙。看這些目的，還是伺機求戰，以作鞏固伏牛的打算，要說它會化上很大力量強攻洛陽，乃是不可信的。在西路的一股，於佔領盧氏以後，不久就進佔陝境的三要司，迫近陝南維南；然後折而向南，與國軍在龍駒寨打下了幾次運動戰，最後奪了鄂豫陝「山區之鑰」的商南縣城，看整個的活動趨勢，是想利用孔從周在陝西的淵源，作推進西安的打算。

說到這裏，我們就必須指出陝北戰局對整個西北的影響，因爲陳賡的活動，是與陝北的動向有着重大關聯的。近來報上很少提到陝北情形，甚至如上海一家報紙的通訊所說，即使在西安這樣與陝北唇齒相連的地帶，「雖有十家以上報紙，却多異常沉默」，這些報導機關，也許因爲不久以前說過「陝西已無匪蹤」，所以決心不把陝北作爲一個戰場。如果真是這樣，却是對大家判斷戰局有着重大妨礙的。事實上，中外各方（甚至最近發表那篇「訪華觀感」的蒲立德氏），均認爲過去胡宗南的進兵延安，是件得不償失的錯事；上月蔣主席飛赴西安，京中傳說當局已經決心抽調胡部勁旅南下，「保留若干兵力駐守延安一地，以作象徵佔領，其餘均撤出陝北，以作鞏固西安，保障川鄂之用。」這個計劃，就現實的情況說，不能算不重要。但是，共軍似乎也早看出這點，當國軍在八月中「佔領陝北全部縣城」之時，共軍於榆林米脂地帶伏擊戰以後，不與國軍在長城綏寧等附近活動時，豫西戰局正緊，胡宗南將軍下令葭縣、吳堡、米脂、綏德各地國軍佔領部隊南撤，而共軍於九月十四至十六日在延安東北之岔口地區，即與此南撤的五個旅打了一場大阻擊戰。自此以後，共軍即大舉南移，佔了延安東南的大小勞山等地，胡將軍遂下令延長延川國軍撤往延安集中

(十月二日)。這樣，國軍在陝北的拱衛線，只剩下了清澗以南沿公路的一條狹長走廊。但共軍尚不滿足，竟長驅直入關中地區，以兩路分進合擊，會師黃龍山（白水南），佔領韓城（黃河邊上）。佔了以白水為中心、黃河以西、咸榆路以東、耀縣以北的整個地區（這地區已在舊陝甘寧共區以南，西安之東北）。到了十月十一日，共軍更對清澗國軍來了一次總攻，據大美報說，七十六師師部、廿四旅旅部及七十團七十二團等，頗有損折。看這些情勢，共軍似已把延安及其以南沿公路的幾個縣城拋在後面，而移其主力隔斷陝北與西安間國軍的聯系，這一着，是與陳賡、謝富治的箭頭互相呼應的。它的目標，顯然是追求對胡宗南將軍的攔擊戰，追求豫陝的新兵源，追求富庶的陝豫物資——糧食與棉花。

(四) 膠東之戰

山東戰場，以及與山東唇齒相連的蘇皖（蘇北以至皖北）戰場，情形較為複雜，但是總的趨勢，也可以從我們上面的這一尺度來觀察。

山東戰場的複雜性，主要在於國軍集中了重兵，要把山東造成一個主戰場。近來，雖則由於皖鄂形勢的變化，國軍已抽調了山東好幾個旅南去，可是山東仍是國軍兵力集中最多的省份。國軍希望利用這一雄厚兵力，大大跟共軍主力打幾場硬仗，則在折損共軍主力以後，國軍就能便於實踐它「深入匪區，底定關內」的策劃了。國軍統帥部，對於這個策劃，是堅持到底的；雖則南邊的形勢已與起初大不相同，山東國軍兩個月來還是按照這個計劃作戰。用一張陸軍機關報的話來說：「就是國軍決不為匪徒竄擾所迷惑，相信共軍為維持其威信，不能不死守煙台，優勢國軍終能求得所期待的決戰。」

國軍在膠河、濰河、大澤山等地，應付了重重的阻擊戰以後，終於十月一日進入了煙台，接着又進入了威海衛。對於國軍的這些進展，紐約時報會譽為「剿共戰事的最大勝利」；而鄧文儀新聞局長，也稱之為「其意義甚於延安」。因為，據說這有兩大意義，一在「關內關外共匪聯絡樞紐中斷，從此關內共匪補給困難」；二在「山東戰局已告一段落，從此山東作戰之國軍，只須分其實力之一半，即足以攻取空心之河北共匪根據地，更可以調動部隊增援關外，以收復東北領土主權」。這兩個估計，是否事實，不久當可分曉。值得注意的，就是天主教的益世報，在三日的社評中，對於這兩個估計完全持懷疑的態度，它認為：一、煙台雖對共軍有補給意義，但這數目是很小的，共軍主要的補給，還是在其「到處煽動民衆以助戰，其結果常是共匪愈打愈衆，國軍窮於應付」；因此不應把煙台對補

給的意義估計過大。二、國軍能否抽調他處作戰，要看山東共軍是否業已肅清；而對於這個問題，是不敢肯定作答的；因為國軍收復煙台之時，並未利用其優勢兵力，打幾個漂亮的色當，雖說共軍業已大部離去山東，但在山東境內的數量，依然不小，最近且揚言它們（留在原地）的任務，就是「不讓國軍退出去」云云。所以，國軍在山東的得失評價，是要看這些因素來判斷的。

至於共軍的作戰方針，我們可以從它兵力的部署上看得很清楚。按雙十節「申報」發表的濟南航訊，及十二日「時代日報」的軍事綜述報導：陳毅統率下的華東野戰軍主力共有十五個縱隊，（內計包括第一到第十三共十三個縱隊，又快速縱隊及兩廣縱隊各一）。每縱隊約三師，所以與今年年初號稱卅萬正規軍的情形，已經大大不同。據他說：這十五個縱隊的配置為：七個縱隊，「隨陳匪離魯南竄」。兩廣縱隊，「原駐惠民，現已移德縣」。四個縱隊，「於昌邑、岞山、亭口間地區」。兩個縱隊，「留於山東」。快速縱隊，「已隨劉匪南竄」。除此以外，在主力軍之外，山東共軍還有地方團隊。據他在「最近調查」：（一）黃河北岸：計壽張駐一萬人，阿城一獨立旅，聊城一千，茌平三千，齊河在平間二團，齊河禹城間二團，惠民二千，魯東北埕子口三千，原為魯北共匪補給中心之惠民所有各項後勤設備近已開始他撤。（二）魯中：計泰安萊蕪間一千，徂徠山二千，大汶口東一千，萊蕪東南三團，淄川東大和莊一團。蔣峪西二團，安邱西南萊戈莊一團，安邱東南景芝一團。（三）魯南：計費縣，向城間潛伏張光中部三個師。（四）膠濟路北及膠東：計章邱東五百，博興，桓台間一千，桓台東南一團，廣饒南一團，廣饒東北二團，昌邑北二團，平度南八千，掖縣東北朱橋鎮一旅，古峴東二團，萊陽東一師，嶺齒牙山一旅二團，海陽，威海衛各二千，文登七千。以上魯共地方團隊總計為四個師，三個旅，廿一個團，另四四五〇〇人，如以每團作千人，殘破的旅師作五千人計，合共約十萬人。

這些數字自不盡正確，但從這之中不難看出共軍作戰的大致部署來：它是採取了內線外線配合作戰的方針。它的大部主力，是跳到外線（魯西、蘇豫的、淮北）去了，但它仍留下了四個主力縱隊及數十萬地方兵團兵等，堅持在山東原地區從事內線作戰。地方兵團作戰的地區，是遍及山東全境的，例如在魯南臨沂附近及沂蒙南山中，最近就發生了十餘條公路被破壞的情形。峯縣等地，亦發生戰爭，蘭陵傳已被佔。在膠濟沿線，則因為「整個鄉間龐大的面仍是土八路的世界，所以國軍走是走的閻王道，

喝是喝的糊塗湯，住是住的寡婦莊」（十月七日申報通訊）。至於共軍留下的主力，則在煙台之戰以後，似已轉趨側後，而且比煙台之戰以前更外活動起來了。它在上月底，即奪佔了炸山等廿多個車站，佔了六十里鐵路線，折損對方數千人，斷絕了青濰交通，（同上）。到了本月初，它突然將四個縱隊主力集積於昌邑以南、亭口以西、炸山以東、濰河膠河之間；並陸續投入地方兵團的後備兵力，到七日，據說「兵力已達八萬餘」，向西進中的整六十四師、整九師、四十五師、二一及一二二旅等展開了「膠東最大的運動戰」，雙方激戰達一週之久，國軍公佈折損共軍二萬五千人，共軍則謂國軍猝不及防，計折損二一旅長以下一萬二千人。直到九日，國軍援兵到達，共軍始「向南竄去」（中央社）。與此同時，共軍並重新奪回掖縣。這些事實，說明了共軍在山東的作戰，今後恐將比煙台之戰前更多，這是一場共軍不讓國軍移出，而國軍須打垮共軍移師出援的戰略大角逐。

（五）三條外線

陳毅粟裕轉到外線作戰的部隊，似乎在三個方面從事活動。

一在魯西，本來在劉伯承南下之時，陳粟的共軍即已大部轉至魯西。八月初沙土集一戰以後，連續在魯西作戰了一個多月，其對象為邱清泉的第五軍，其中著名的有九月十日及十四日鄆城南楚城之戰，二十日至廿五日的曹縣之戰等。自此諸戰以後，陳粟主力大部即跨過臨海，（這在下段再說）。但留在魯西的，似尚有一部份，所以最近又傳來鄆城、鄆城、鉅野為共軍重新奪佔的消息，而陳粟跨過臨海路的一部份主力，於半月轉戰以後，雙十節後又北回攻佔民權內黃等站。這些消息，都說明了魯西——這個山東的側翼及主要戰略補給區，共軍是不會忘記的。

二在豫皖蘇。陳粟大部主力，在魯西轉戰以後，上月廿六日又橫越臨海，進入豫皖蘇大平原。其佔領的地區，約有六百里長寬，如河南之尉氏、通許、杞縣、睢縣、夏邑、柘城、沈邱、鄆陵、杜溝、安徽之太和、亳縣、渦陽、蒙城等。當它向東南移動時，並破襲了津浦路的宿州至符離集段，大約有一部份主力，是藉此越過津浦，進入舊新四軍的津浦路東淮北、淮南兩軍區，而與蘇北共軍攜起手來。十月五日以後，由於徐州等地國軍的回調，陳粟部隊也跟劉伯承一樣，把它的膨脹觸鬚向中央收縮了一下。但是雙十節以後，它又重新活動起來，並北回攻擊內黃、民權等地。總之，這一路外線範圍最大，它的計劃大有恢復蘇皖戰場，接應魯西與劉伯承作跳板、配合山東內線等作用。

三在蘇北皖東。當陳粟繞過外線，向東南移動的時候，蘇北等地的共軍，也開始了呼應戰，它在阜寧、鹽城等地國軍撤退以後，立即佔領了以阜寧為中心、南達東台、北至東海、東瀕大海、西臨兩淮的蘇北地區，然後在洪澤湖南北，分別插入舊新四軍的淮北、淮南地區，在泗縣附近之青陽鎮，與越過宿縣縣的陳粟東進部隊會合。

觀察這三個外線活動的箭頭，配合了山東原地陳毅部隊的活動，我們對於山東戰場以至整個華東戰場的形勢，也不致感到迷惘了。國軍在這個戰場的攻擊，共軍在這個戰場上的內線堅持與外線出擊，是跟其他戰場一樣明白的。

（六）東北鼙鼓

正當關內戰局如火如荼地發展時，關外也鼙鼓聲響，大地為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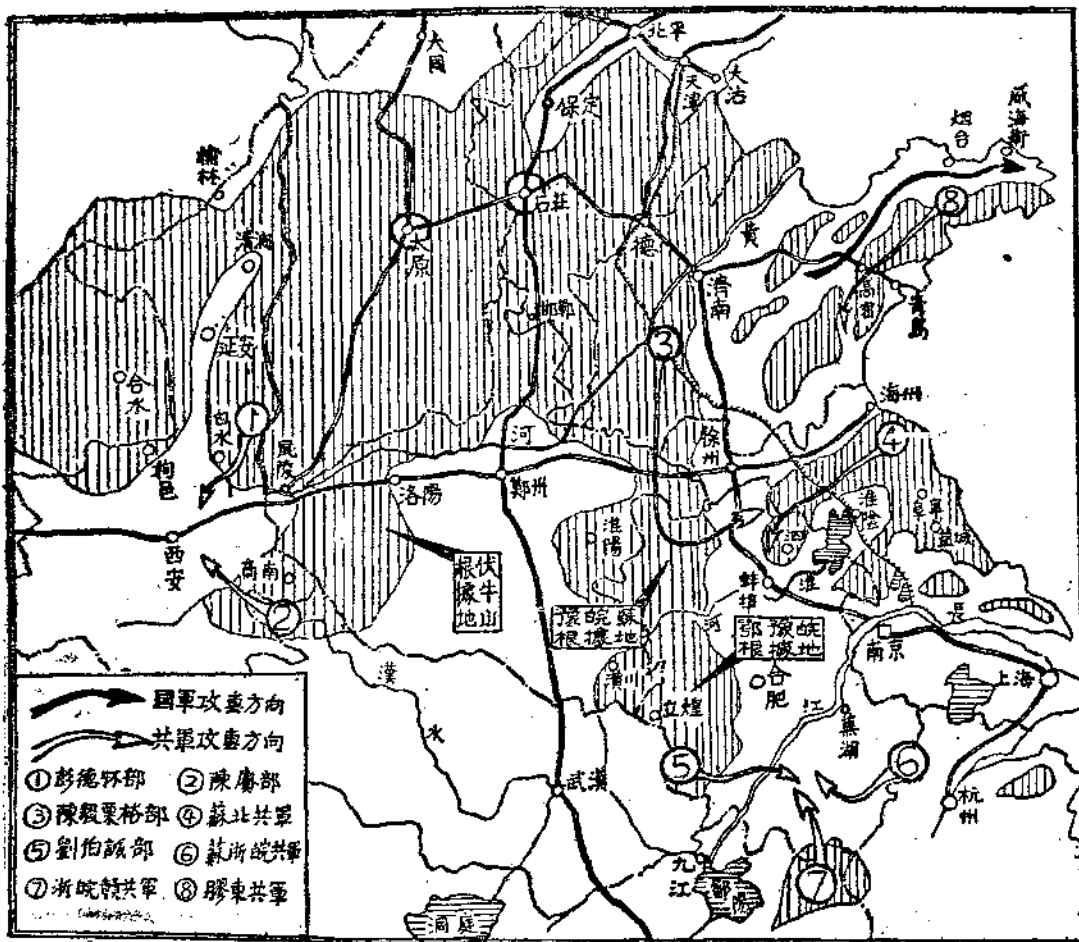
關於東北戰事發展的詳細情形，「時與文」二卷五期曾發表一篇東北通訊，詳實可靠，足以幫助我們解決不少問題。為了節省寶貴的篇幅，此處也就不再詳細敘述了。但是，為了幫助讀者瞭解最近發展的情形，似乎還有幾點不可不提。

第一：這次共軍在東北發動「秋季攻勢」，雖說是十月一日開始，但是九月十五日開始的遼西作戰，（第一次對九十三軍暫廿二師及暫五〇師作戰，第二次對四十九軍七十九師及一〇五師作戰），是對這次東北戰役有巨大影響的，用十二日聯合社軍事記者的話來說，就是：「它吸引了國軍主力分散，並造成軟化北寧路防禦的條件」。由於這一序幕作戰，使東北的這次戰事一開始就帶有巨大的規模。

第二：就中長路沿線來說，現在大致恢復到第二次四平街之戰以前的情形，共軍在「秋季攻勢」第一週中佔了九所城市，傳說獲得兩萬人之戰果，因此而使瀋陽以北的中長路沿線國軍又變成長吉、四平、瀋陽三個點。但是，今天的形勢與夏季有一個根本不同，那就是：在夏季時，瀋陽還是有後方與補給線的；今天則因營口、葫蘆島的被切，北寧路的中斷，而使瀋陽也變成長吉一樣。目下瀋陽的四顆衛星是新民（西）、鐵嶺（東）、本溪（東南）、遼陽（西南），在這個圈子中，是東北國軍的主力集中之地。

第三：這幾天共軍的作戰主要方向，在徹底切斷關內外國軍的聯繫，所以它要孤立營口，它要三度破襲北寧路，它佔領了新立屯與黑山，其目的就是在徹底使北寧線變成中長線。而國軍的目的，則要維持這一聯絡線，所以蔣主席要東北國軍堅持，而指派傅作義的部隊東進，攻襲熱中，以

關內戰局形勢圖



隔斷東北與冀察熱遼共軍的聯系。共軍的目的，則要切斷國軍交通線後，使自己變成一線作戰。這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角逐，國軍已在新立屯與黑山之役中，不惜以暫編五十七師與共軍相週旋，就是這個道理。

第四：聶榮臻指揮下的冀察熱遼共軍，實際上已參加關外戰爭同一範疇的戰事，它在冀東與北寧路錦榆段所作的活動，是與林彪的總方針一致的。因此，估量東北共軍的實力，應該加上這個法碼。照十三日前線日報最謹慎的估計，東北共軍（包括冀察熱遼邊區者）在此次攻勢中，還只投入了卅萬兵力，至少還有卅萬後備兵未出動。因此，未來的戰事會愈演愈烈。正如這張報紙所說：就今天東北國軍兵力來說，是不能與這個數字比較的；特別在遼西兩戰及此次第一週作戰二萬人的損失以後，國軍的戰略今後當以守衛為第一，這就是陳誠將軍所說的「希望不要再有第七次攻勢」，而這次攻勢會「有很長的時間」。

（七）內戰是一個土地戰爭

當我們對各戰場加以一番觀察以後，回過頭來再看一看本文第一段中所提到的兩軍戰略，真是無限感慨。

對於共軍的這種「空心戰術」的應用，國軍方面也許正在加以研討對策，有人主張國軍索性不顧共軍的「竄擾」，而繼續「深入匪區」的作戰方針。但是，戰略是應當跟隨情況的變化而變化的，國軍「深入匪區」戰略的原來目的，本是要「摧毀其人力物力，使其無法持久作戰」，而今天共軍跳到外線來求補給，似乎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如再繼續原定戰略，即使能順利執行，恐怕其効力也與原先有所不同了罷！何況，所謂「空心」，究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共軍的地方兵團，民兵及一部份主力，不是還在山東、山西、河北活動，甚至發動攻擊掖縣、運城、徐水這樣的大戰嗎？國軍是不應當忘記了後方所受的威脅而堅持過了時的舊戰略的。

那麼，國軍的希望寄托在什麼上面呢？按十二日申報專論所說，它是寄托在共軍「新地區活動」的困難上面，例如「新地區缺乏供應，缺乏人民擁護而難以進行游擊戰」等等。從某一時間與特定條件來說，這自然是共軍的困難，而且在戰爭頻繁的情形下，建立根據地也是需要相當時間的。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共軍的政治工作，它在雙十節已公佈了徵文式的宣言與口號，並且公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憲章」——土地法大綱。情形再沒有比今天再清楚，內戰乃是一個土地的戰爭，雙方所角逐的力量表面上是軍隊，實際上則是土地政策。從此以後，內戰的風暴會愈來愈大了，就像秋季的疾風變為冬季的狂風一樣。（十月十三日，上海）。

論美國外交政策

林煥平

一、馬歇爾和邱吉爾

邱吉爾先生自從在美國富爾頓演說以後，世界輿論罵得他狗血淋頭，認他爲世界最反動的象徵。他最初倡導西歐集團，後來又擴大爲歐洲聯邦，而這一切，人們都把它歸結到一個目標：反抗蘇聯。

馬歇爾將軍是戰時美國參謀總長，策劃西歐反攻，厥功甚偉。又會隨故羅斯福總統出席過許多次國際會議，人們誤認他爲一位中和的開明紳士。甚至他任駐華特使時，我國也有好些人把他讚美爲天神。然後他回到美國去當國務卿了。時間和歷史是估量一個人的真價的最可靠標準。以援助希、土爲開端的杜魯門主義，活不到三個月壽命，就由馬歇爾計劃所代替了。

討論實施馬歇爾計劃的巴黎會議，由全歐壓縮爲西歐十六國，幾經會商，反覆遭受克萊頓的申斥和訓示，才草成了一冊長達二百四十四頁的報告書，要求二百二十四億四千萬美元，以維持非共產主義的歐洲的復興。照計劃，其中有三十一億三千萬元，預定供生產設備之用，是向國際建設銀行提用；還有一百九十三億元，須經美國國會通過撥付。

這個報告書送給了白宮之後，邱吉爾所發起的「聯合歐洲運動」於九月二十八日發表聲明，「歡迎去週在巴黎舉行的十六國馬歇爾計劃會議所提出的經濟行動方案」。簽名這個聲明的，有該運動的英國委員會主席邱吉爾，法國委員會主席夏里歐，和歐洲經濟協會主席齊爾。這個聲明，自然是邱吉爾先生的好手筆。它裏面說：

「我們深信，這計劃不應僅視爲獲得一時美國援助的方法，而應視爲展開更大計劃的初步，以將我們的偉大大陸的生命和資源，作進步性和持久性的合併。一個永久性的國際機構應即刻成立，以便執行業經通過的合作辦法，並且進而利用每一個機會，擴大和發展這種辦法。……」

「倘若由於馬歇爾將軍有歷史性的創舉，使這十六國能樹立永久合作的基礎，那麼我們對於實現一個統一的歐洲，就有顯著的進步了。」（倫敦二十八日路透電）

這個聲明可以說得上是一份寶貴的文獻，它向世界人民暴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實（雖然明智者早已看出）：馬歇爾將軍原來是邱吉爾主義的執行人。而邱吉爾本人，如今只成了說明馬歇爾將軍的本質的丑角。歷史是多麼無情與殘酷。

二、大富翁山姆叔叔的釣魚

今天世界的財富已大部分集中在美國手裏。她越有錢，她對世界的野心就越大。正如美國前副國務卿威爾斯所說：

「我國外交上有一日漸增長的趨勢，認爲美國有武力和金錢，其他民族的安全和復興都唯美國是賴。故這些民族決定其國內政策的權利，以及被視爲平等主權國家的權利，美國都可置之不顧。」（中央社紐約二十三日電）。

華爾街的大亨們指使着杜魯門和馬歇爾左手拿着原子彈，右手拿着美元，向各弱小國家恫嚇着說：「你們不知道你們快被共產主義的洪水淹沒了？來！到我這兒來，我給你金元，又可以用原子彈保護你的安全。如果你不聽話，我就用原子彈炸碎你的腦袋」。

若干利令智昏的國家跑到美國的釣餌之前，躍躍欲試地想把它一口吞下去，可是山姆叔叔說：

「這不行，這不行，你們不能只顧自己貪心吞釣餌，你們一定要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你們不但要吃我的餌，全買我的貨，而且你們要對抗東面的熊，要抑制西邊海峽對面的狡猾的老鷹。」

大家知道，在巴黎十六國會議中，美國要歐洲建立關稅同盟，以對抗甚至抵銷英帝國的特惠關稅，這且留在下面再詳細說明。只是先要點出：凡是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則一切政治經濟和國防等主權，必須完全獻給了美國。正如漁翁釣魚，他所釣得的每一條魚，都成了他的私有物，聽任他自由處置了。

自然美國的貸款政策，有關方面也並非意見完全一致。譬如共和黨所控制的國會和民主黨的政府之間，共和黨內二大巨頭塔虎脫和范登堡之間，意見就稍有不同。在共和黨裏面，塔虎脫是內政的權威，范登堡是外交的權威。因爲照顧到內政——明年就是總統大選，不能不顧到選民的動向，所以塔虎脫說：

「美國應停止其全球規模的貸款。我不相信美國用錢可以救得了世界。馬歇爾的經濟援助計劃，應依照下述原則辦理，即是：一切特別貸款，僅祇是爲了使外國能以償付所欠美國貸款這個特殊目的。」（美聯社華盛頓九月二十六日電）

到九月三十日，他又公開聲明，反對於十二月一日以前召開國會特別

會議。

原來馬歇爾是竭力主張立即召開國會特別會議，通過撥巨款「援助」歐洲的。杜魯門到底是搞政治的，頭腦不像馬歇爾那樣單純，而且他自己還想蟬聯總統，再在白宮坐四年，故必須留心選民的心理。所以他雖用「深恐義大利和法國如非自美國獲得援助，或將被共產主義所吞沒」來恫嚇共和黨，然他方面他又說：「如事前未獲得對其方案的保證，即使召開國會特別會議，也是一徒然無益之舉」。因而他決定交由國會四個委員會開會，決定西歐經濟危機情況，是否需要國會在明年一月以前召開會議（中央社三十日華盛頓電）。這裏可以表明兩點：第一，九月二十八九兩天杜魯門總統召集參眾兩院領袖開會，要求他們擁護他的「方案」，召開國會特別會議，是失敗了。第二，杜魯門把召開國會特別會議的責任推給了共和黨。然而共和黨高級發言人對杜氏將召開國會的實際責任加諸他們身上的辦法，並未表示滿意（同上中央社電）。這又可見他們間的矛盾。

然而，我們必須重複強調：第一，在世界門羅主義的擴張問題上，他們的意見還是一致的。所不同者僅是技術問題，和由政黨及個人的私利（塔虎脫和杜魯門都是共和民主兩黨最有希望的總統候選人）出發的細節分歧而已。第二，他們雙方爲了顧慮選民心理，都不願負責召開特別國會通過撥款「救濟」歐洲，可見美國人民並不贊成馬歇爾計劃。

「魚，我所欲也」，然而釣魚也不是一釣到手的。

三、釣魚吞在咽喉裏的英國

假如是富於情感的人，必能體會出今天英國內心的痛苦。她正像把釣魚吞在咽喉裏的大魚一樣。

戰爭把大英帝國打窮了。她再也無法維持那帝國的場面。兩年前，幾經躊躇之後，她才決定向美國借了二十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巨債，以爲可以够用四年，來作英國復興建設之需。借款協定第九條，限制了英國的貿易自由，當時英國的忍痛犧牲，於此可以想見。那知道山姆叔叔正是天下最刻薄的吝嗇鬼，猶猶陰險，兩年來美國物價陸續上漲，約等於把英國的借款貶值了三分之一，到今年八月間，就只剩下四億餘元了。英國在極度的經濟危機之下，知道上了大當，朝野上下，大罵美國渾蛋！英國前任自治領兼印度大臣阿梅利，是世界著名的反動份子，可是他對人民反動，對英帝國却是很忠實的。所以連他也看不過眼，九月二十四日，他在出口協會作了一個充滿仇恨的抨擊美國的演講。他說：

「美國商人企圖把整個世界分割爲若干小經濟單位，每一單位不能以同等條件和美國生產競爭，而必須依賴美國的財力以彌補江河日下的支付差額，美國就可藉此保持其一個獨霸的地位，使他們自己的過剩生產獲得出路。美國政府不幸已決心要逼使世界（特別是英帝國）走進美國自己的經濟模式——這樣

式，實質上就是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七八年之間放任主義的國際經濟模式的復活。美國金融和出口商人的野心，已特別擴展到對散處各地的英聯邦各國經濟上（最後是政治上）的支配。美國因此才特別決定攻擊英國的優惠稅制和英鎊體系。」（路透社倫敦電）

再沒有這樣痛快淋漓，再沒有這樣敵意畢露的了。這裏充分表現了美英帝國主義者中間的尖銳矛盾。

美國罵英國已喪失了「三強之一」的資格。英國再不掙扎，便等於默認了美國的指摘。於是克里浦斯才據臂而起，宣佈他的「英國挽救經濟危機計劃」了。這是不依靠別人，而要自力更生的計劃。內容要點是：

一、維護經濟獨立——克氏說：「我們決心維持經濟獨立。我們不希望也不能打算讓經濟的繩索把我們跟別的國家的政策綁在一起，不管她們對我們是多麼的友好」。

二、加強英帝國關稅同盟，以促進輸出，並防止不必要商品的輸入。

三、實行節約，增加生產，以達到每月增加輸出三千一百萬英鎊的目的，如此來抵償收支差額。

這三個原則，都和美國的政策針鋒相對。因爲美國正要用經濟的繩索綁在英國的頸上，正要打破英帝國的特惠關稅，正要使英國永遠不能抵償她的收支差額。

英國不但要實現這三項主張，而且在這個計劃裏，還相當表現了她的遠大野心。

一、它表現出英國還想「領導歐洲」。克氏說：「不論煤斤缺乏情形如何，還須輸出若干給歐洲，俾切斷歐洲經濟對西半球的依賴性」。

二、它企圖以英鎊代替美元。克氏說：「實施兩邊貿易，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乃使英鎊執國際貨幣的牛耳」。又說：「不獨英國，舉世各國都缺乏美元；爲謀繼續正常貿易，各國將必須傾向於英國貨幣，因此英鎊的力量就可以加強。由於美元缺乏，不少國家必須由西半球轉向購取英國貨幣」。

這個帝國主義的美夢，今天的英國是否還有能力完成，固是疑問，然這個計劃和行動本身，已是美帝國主義的敵人。於是英美的矛盾鬥爭，更加迅速展開。首先表現在英美關稅談判的破裂。下面兩條簡短的電訊，是最具體的說明：

「據今日新聞晚報消息：在日內瓦舉行的關稅談判，實際上已告停止，英國代表團已返倫敦。談判破裂的原因，是由於英美兩國代表團對於若干基本問題意見不同。美國仍要求英國於兩年之內修改其帝國優惠制，而英國則堅持在恢復帝國繁榮之前，不作任何讓步。」（中央社倫敦二十三日專電）。

「英國官方今天說：現已很少可能避免英美關稅談判完全破裂。該方面說：只有美國降低其對帝國優惠制方面的要求，才能拯救這大的關稅談判和會議

。又說：英國和不列顛聯邦向美國建議減少和取消幾項帝國優惠稅確實是最後的讓步了，他們沒有可能對美國的要求再作讓步。」（合衆社日內瓦二十三日電）

英國既然還死抱着她的帝國殘夢，不願意向美國的獨佔資本低頭，美國的「救濟」政策自然就轉了向，杜魯門五億八千萬緊急援助歐洲計劃，對象僅爲法，義，奧三國，不把英國包括在內。然而英國並不表示快餒。她的財政部發言人說：

「英國自己的經濟復興計劃須完全不重視任何美國新的財政援助，我們現在甚至不期待馬歇爾計劃的任何援助，這樣的援助明春可能仍得不到，但我們關於彌補英國六億鎊支付差額的決定，是假定英國將須從現在起就自力更生。」（路透社倫敦九月三十日電）

自力更生！艾德禮首相於九月二十九日晚發表，任命克里浦斯爵士爲經濟大臣，克氏將從副首相摩里遜手中接掌英國經濟上的最高統帥權。他將負責調整政府各部門解決國內外經濟問題的努力。他將負責實施英國「不輸出就滅亡」計劃的全部責任。他實際上已成了副首相。或許也可以說，內閣的權力已集中到他的身上。

克里浦斯戰前爲左派，且曾別立爲「獨立工黨」。後來工黨裏有一批後起之秀比他更前進了，他又成了中間派。他對蘇聯一向頗抱好感，年來又常主張加強對蘇和東歐國家的貿易關係。他認爲這是救英國之道。這正和貝文的外交政策擊柝。假如是內政決定外交，則貝文將不能不作某種程度的改弦更張。假如是外交決定內政，則克里浦斯的滿腹經綸，也不一定能夠順利推行。這是英國內部的矛盾。在這蛻變期，英國也是痛苦的。

四、山姆叔叔釣魚的新魔術

今天在獨佔資本家支配下的美國外交政策，其主要任務有三：

- 一、貫徹擴張主義，務使金元支配各國的經濟；
 - 二、打散英帝國，使她再不能拾頭爲「三強之一」；
 - 三、遏止各國民主運動，防止蘇聯勢力的膨脹。
- 在西半球，上個月才訂了一個泛美防衛同盟，拉丁美洲各國盡入美國的懷抱。

在歐洲，從德國投降到去年底，美國還多少有點意思假手英國來領導和支配她。自今年以來，眼看日益不對路，故美國已放棄了扶助英國和假手英國的政策。她要直接扶助歐洲大陸國家，一面藉以控制西歐，一面賴以抑制英國。這是權術政治的翻版。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看到法國勢力太強大，有礙於自己對歐洲霸權的佔取，於是扶翼戰敗的德國，以抑制戰勝的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根就相對地種因於此。

今天，美國看到英國困獸猶鬥，不甘屈膝，又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法泡製，所以她要扶助法國和戰敗了的義大利和德國。在方針上雖然如此決定，在實際上美國却也非常苦惱。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黨執政的法國，本來最容易收買爲傀儡；然而有一個很大的隱憂，就是法國共產黨是國會的第一大黨，力量非常雄大，她經常躍躍欲試於推翻拉瑪迪政府而建立真正的民主聯合政權。假如這個目的一旦達成了，美國的一切援助就將如石投洋海。推而求其次，是義大利。但義大利一向不是歐洲的第一等強國，不能決定歐洲風向。且共產黨和社會黨左派的囂張，從最近義大利政局來看，實有甚於法國者。故今日美國對法義兩國的援助，首要目的，還在於穩定反動政權，抑制民主人民的拾頭。西德也是一個可利用的工具，一則已駐有美國大批佔領軍，可爲憑依；二則英美佔領區已合併，全德工業精華都集中在這兩區，大可有爲。馬歇爾計劃即是以復興魯爾作爲復興歐洲的中心。然而歷史的教訓太深刻了，德國四隣的國家，尤其是法國，完全反對首先復興德國的任何計劃。

扶翼法、義以抑制英、蘇呢？復興德國以防制英、蘇呢？美國獨佔資本家們真是煞費躊躇，晚晚不能睡覺，都不知如何是好。

在戰後的亞洲，美國所遭遇的情況，也相彷彿。最初她想扶翼中國以作防止民主勢力抬頭的堡壘。馬歇爾以特使身份來華，任務不外乎此。後來發見中國的人民力量太强大了，隨時有使美國的任何援助石沉海底的危險。撥華貸款的遲遲不到，足見美國的顧慮很深。另一方面，美國的方針就漸漸轉了向，決定復興日本，使日本成爲反民主的堡壘了。這在美國，有幾個較爲順利的條件：第一，日本已爲美國所獨佔統治；第二，美國在日本有強大佔領軍；第三，日本的工業水準遠較中國爲高。於是乎大量供給各項物資給日本（七月份供給石油即達十三萬 Kiloton），大批糧食給日本（七月份二十六萬噸，九月份共六十萬噸），十億貸款也已秘密成議。又天天催促，趕訂對日和約。

不過，一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以美國一國的力量，無論如何都壓制不了世界人民的解放要求，何況在美國內部，還有無數世界人民的友軍！一九四七年十月三日寫於香港

論「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李定中

(一) 寫作本文的動機

由於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古老國家，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一直都具有不可忽視的比重，所以在現代化過程中，舊式農業的改革，實在是極重要的一件事。這一點，近年來已逐漸爲國人所認識，所肯肯。然而迄今爲止，關於舊式農業向新式農業的發展途徑，論壇上似乎還未有過一致的見解。見解的紛歧，自然會招致實踐方法上的紛歧；中國農業之現代化，一直還踟躕徘徊於出發點上而不得暢快前進，自然有其客觀的諸般原因，然而如其提及主觀的因素的話，人們對發展農業的途徑，未會有正確的、一致的見解，從而在改革的實踐上不會有一致的努力方向，恐怕是難以辭其咎的。也正因此，理論上的探討，還是極富於現實意義的，特別對於一些願意獻身於中國農業發展的知識份子，是如此的。

最近，在第三卷第三期的「觀察」上，拜讀了八位留美學農的先生們的一篇「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大作，及陳衡哲先生的一篇介紹性的文章，印象頗爲深刻。八位先生的精神是可佩的，動機是可敬的。他們「出自中國的農村，還願意將自己的血汗流在中國農民的土地上」；他們「願意犧牲一切，冒着風險，不怕苦，不畏難的」下鄉工作，爲中國農業的改進而努力；他們並大聲疾呼：「知識份子要趕快和農民攜手」，以爲這樣「才能够打開一條生路」。他們這樣嚴正的態度，與今日一般消極或麻木了的自私的知識份子對比起來，寧是值得我們衷誠擁護的；也正因此，他們對於中國農業發展所提供的具體理論才更值得我們重視並加意研究與討論；也正因此，作爲一個經濟科學研究者的我，才覺得有對他們的觀點加以檢討與批評的必要。我的見解或許免不了錯誤，然而面對着這一現實性的問題，我却希望能拋磚引玉，由我的錯誤引出真理來。在這種認識下，我提筆寫這篇短文。

爲了行文的便利，我先將他們的中心見解扼要一述，然後再提供自己的看法。

的看法。

(二) 一種偏重技術改進的論見

仔細讀過這篇文章後，我覺得作者們貫通全文具有一種基本觀點，那就是他們把中國農業的發展，主要歸結於技術的進步。他們雖然也提到了要改良生產方式，然而在提供具體的見解時，却並不會對此加以應有的重視；同時，他們對生產方式本身的了解，也與經濟學者不盡相同，而顯現得多少有些偏重於技術的傾向，或者，至少他們並未抓住生產方式中所包含的基本的諸生產關係。

對知識份子如何與農民攜手一問題，他們「提出一條新的路綫：首先在全國各地創辦幾個生產試驗農場；然後以生產農場試驗的結果，組織合作農場」。他們的一手段是從技術方面着手，以增進農民的經濟生活。：一切措施，要能够提高農民經濟上的收入，才能發芽生根，因爲經濟是一切的基础。」

他們要創辦生產農場，「盡可能的應用一切現代的科學知識和技術：防旱、防澇，殺虫，除害，氣候預測，選擇種子，酌用肥料，引用新式農具，改良舊有農具等等」。

他們說：「中國的農民之所以窮，苛稅重賦，地主壓迫，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根本原因，還是農村人口太多」。所以他們也說「不但要改進生產的技術，而且要改良生產的方式。……就是由舊式的、個人的、人力的小農制，過渡到新式的，合作式的，機械化的中農或大農制」。

但大農制要求大的農場，他們以爲要擴大中國每個農民耕地面積，立刻就遇到兩個問題：技術問題與失業問題。前者「可以利用新式的機械以求解決；後者，他們以爲可在「生產農場內，設立小型工廠，從事鄉村工作，而使被農業機械化代替下來的人，從事工業生產。這樣一來，不但許多農民的失業問題解決了，而且他們藉此也學到工業上的技術，待中

國工業化建設需要大批技術工人的時候，他們便可立刻應命。一而一假設這一計劃成功的話，我們便達到了中國農業現代化，鄉村工業化的目標了。

他們的基本理論大略如此。他們並基於這種理論而計劃出創辦生產農場的一些原則。對於這些，我們沒有餘裕加以徵引並討論，只打算對其基本理論作一檢討。

(三) 社會條件與技術條件

我們且不枝枝節節地對其理論加以批評，而先將論點展開，就農業發展所包含的社會條件與技術條件之相互關係加以考察。

中國農業的暢順發展，原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主要任務之一。其實現，一定會使中國社會發生巨大的改變。因此，中國農業的改進決不只是技術性的問題，而更重要的還是社會性的問題。明白說來，在農村生產關係還未會大大改善前，是不能希望它有大成就的。並且，把問題全面來看，農業改進，在理論上與事實上，又常為工業發展所誘發，所限制，所促進；因此，如其工業發展的社會的政治的條件還不會出現時，農業的發展，是更少希望的。

就中國大農制的確立來說，誠然會遭到失業與技術問題，但因難決不只此，甚至主要的困難也不在此。首先，大農場要求解除一個矛盾，即土地所有之集中與使用之分散的矛盾。只要土地分散使用還是有利時，土地的集中使用便很難實現。當前中國農村土地的集中使用，以實現機械化的農業，至少還要遭受如次的困難：

第一，機械化的大農業原只能在社會主義制及資本主義制中存在。在最近的未來，中國可能實現的大農場經營，當不會逸出後一範疇。但資本主義農業的經營，基本上是以獲取利潤為動機的。農業經營中合法利潤的出現，原以封建性的租佃關係之摧毀為前提。否則，地租額之高是驚人的，它不但剝奪了利潤，甚至還侵吞了部分的「工資」。這是由農村佃農生活之苦作來反證的。再者，租佃契約是不固定的，租賃土地者很難安心投下資本。然而封建的租佃關係之摧毀，自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了。

第二，資本主義大農場經營，需要大批農業資本。當全社會的生產資本

還不會對商業買辦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取得主導地位，而工業資本的積累還不容樂觀時，資本投入農業的可能就更小了。事實上，只要高額地租還存在，擁有資本的人與其冒種種風險，遭種種困難，去租得土地，作大農場經營，遠不如購買土地，坐享高額地租之輕便與有利。人們投入土地買賣上的資本愈是多，則用於農業生產上的資本自必愈是少了。

第三，就全社會經濟的發展看，大農場的實現必需一種外在的壓力去促成。大農業會促進社會生產力，會增加農產物。然在私有制下，增加的農產物必須經由市場才可歸社會消費。在其他情形不變時，農產物增加了會使農產物價格低廉，這不但會誘致農業的進步發展，反而阻礙了它。因此，大量追加對農產品的需求，乃是必需的，因為這樣才可使農業投資有普通的利潤，以至於暫時還有超額利潤。但對農產物的追加的需求，不論是食糧或工業原料，又必須依賴於工業大大的發展。而如其一個社會的商業買辦資本與高利貸的金融資本還強力地遏制着工業的發展，如其官僚資本還佔在生產過程外從事超額利潤的非法追逐，如其政治的特權者還繼續其低能與腐敗的統治，並經由這種統治而誘致先進國的經濟榨取，則其民族工業的發展實在是難以期許的，然則農業的發展也一定是暗淡無光的。

第四，在傳統的農村社會關係下，低廉勞動力的供給是所在多有的。大農業的發展，破壞了獨立的小農，減少了對農村勞動力的需要，所以當勞動力不能在其它部門找到出路時，其在農村中所得的報酬，多半會降得更為低廉的，從而就會更加重勞動力仇視機器排擠機器的怪現象，更加阻撓了大農業的存在與發展。最近筆者一些友人，在黃泛區工作，他們用救濟分署的曳引機為農民開墾荒地，但依他們估計，此種機器耕種成本，就較河南一般農村中以勞力耕種的成本還高。八位作者主張同時發展鄉村工業，自是一種補救辦法，然而鄉村工業發展的各種困難即令克服了，問題還不會完全解決。鄉村工業實質上只是些農村副業的工業化，這些工業決不能是中國工業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部分。

這樣說來，在中國社會生產關係及政治條件未有合理變革前，農業機械化（以及工業之發展）似已無望了。因此，在當前局面下致力於農業技術的改革，究有何種可能，並會發生什麼結果，便難說得很了。

申論至此，似乎不能不一談生產的社會條件與技術條件的相互關係。大家知道，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的發展形態，而當生產力發展至一定階段時，原有的生產關係便不能與之適應了，轉而變成阻礙其進步的桎梏。隨着矛盾的日益尖銳，生產力終會打破原有的生產方式，而產生與之適應的新的生產關係。當前中國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之失調，是大家公認的。爲了具體地有助於解決當前的問題起見，我們要進一步看看兩者由衝突發展到新的適應，其間還須經過一些什麼歷程。以上的論述，會說明了舊社會生產關係的改造是新生產力發展的必要前提。然而這並不是說，在舊社會生產關係未改造成功前，努力於生產力之發展是不可能的或不必要的。爲什麼它是可能的？因爲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生產關係，一世紀以來已不斷附加了些新的因素：土著的商業漸買辦商業化了；舊型的高利貸業中，也湧現出新型的金融業；民族工業，特別是輕工業總算存在了；並且農業單一化的現象也出現了。這些無疑都可能使原有的生產關係有了較大的包容性；加以中國各地域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在許多地域與場合，生產力的發展還不是絕不可能的。技術上的努力也還有其活動的餘地。爲什麼又是必要呢？這可分兩層來說。第一，在當前局面下，一切發展生產力的努力，都可產生一種準備作用，技術的進步，原是艱辛的長期的過程。即令新的生產關係出現了，生產技術的改進也不會是突變式的，而必須在原有的技術水準上逐漸改進。因此，當人們一方面致力於生產關係的改進時，特別是新的生產關係之出現已有端倪時，人們又必須同時盡力於生產技術的改進。再者，生產力改進的一切努力，又在會對生產關係的改進發生助成與催促的作用。一切技術改進的努力，都會漸漸促進人們對舊生產關係的改革要求，都會加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技術上的一切成就，固會從正面加強生產力突破舊生產關係的桎梏之能力，加強新生產力的代表者的社會勢力，從而更加使新生產關係的出現有了可能，同時，即令改進生產技術的一切努力歸於挫敗與困頓，也會反面地以具體的事實去驗證生產力發展的困難所在，及舊生產關係改進的迫切需要，從而爲舊生產關係的消除造成更有力的條件。在舊生產關係大變革的前夜，一切生產技術改進的失敗，乃至生產力的停滯甚至萎縮，都可能助長了要求改革生產關係的號召力量，而爲來日改革的實現，更增進其可能性。

由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對上述八位作者那種偏重技術的論述給予適當的評價了，如其人們不把技術的改進看作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唯一任務的話，如其人們會了解技術改進的努力，在當前中國農業經濟的發展中的地位的話，便也知道：單單注重技術固然是絕大的錯誤，但在與生產關係改進的努力配合之下，一切生產技術改進的努力還是需要的。

(四) 知識份子與農民結合的道路

本文至此，本可收住了，但因八位先生會強調一個口號：「知識份子要趕快與農民攜手」，所以我願再就此點說幾句話。

八位先生提出了這個口號，並本着這個口號作成了具體的計劃，最後更強調地說：「我們希望政府和社會人士於談戰和之餘，多多爲中國的農民着想。並望和我們一樣苦悶的青年，多思索，少憂慮，尙行動，不空談，爲自己爲別人開闢一條出路」。我們佩服之餘，却願指出：和農民攜手的路不只一條。在技術上的努力，固然可能是與農民攜手了，但此外的路還是有的。如前所述，爲了農業的進步，除了致力於生產力的發展外，生產關係的改造，是同樣重要甚至更更重要的事。因此，一切爲了農村生產關係的改造而作的奮鬥與努力，直接間接都是與農民攜手的行動。又因爲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又是經濟改進的槓桿，所以一切爭取政治民主的努力，也同樣是在終極上有助於農業的發展的。因此，當我們表示了對有志於技術改進者的同情之後，更願指出：知識份子與農民結合的路正寬廣得很，我們願爲千百萬正努力於改進農村生產關係的人們及爭取民主的人們祝福。

九月二十日，河南大學。

合訂本第二冊出版

本刊合訂本第二冊（十一—廿四期）已出版，附有分類總目錄，用精美封面紙裝訂，極便參考珍藏或饋贈，定價低廉，僅收同成本四萬元，數量無多，售完爲止。

本刊訂閱價格

外國	內 國			三個月	十二期
	航空掛號	航空掛號	平寄掛號		
平寄一律	六萬九千元	六萬元	五萬元		
半年美金二元半					
加 照 年 全 年 半					

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歷史的經濟的解釋）之六

在任何一個階級的社會裏面，把握着社會物質的基本生產手段的階級，同時必定要佔有或支配社會基本的精神生產手段。這已經很明顯的表現為一個法則。社會基本的精神生產手段被把握着：那第一，將可能使不合理的物質生產手段的佔有，逐漸取得「合理的」依據；第二，將藉此繼續製造出或生產出維護那種佔有的動力；第三，將用以緩和或團結同一支配階級內部的分離力量。所以，就中國歷代王朝統治的經歷講，它們對於精神生產手段的把握是否牢固，運用是否得宜，頗有關於它們歷史運命的修短，雖然在實質上，它們的存亡興廢，根本的還是看它們對於物質的基本生產手段的把握方面，是否發生了破綻或動搖。

在西周之世，世卿世祿，子就父學，世世相承；一切精神傳授的手段，通在官府。當時農業勞動生產力尚因鐵耕未行，留在極低階段。剩餘勞動生產物既有限，在官府的精神生產活動，固受有限制，一般人民更自無此「清福」了。「不識不知，順天之則」，原來是貴族統治的安穩場面。但「自老聃寫書徵藏，以貽孔氏，然後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諸書復稍出金匱石室間。民以昭蘇，不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世墮。朝命不擅威於肉食，國史不聚藏於故府」（章太炎「檢論訂孔」上）。這段話是有不少漏洞的。精神生產手段把握不牢了，實際乃由於當時的物質生產手段，已漸在從貴族的手裏滑脫出來；暴君污吏在慢其經界，「田里不粥」的神聖規制亦維持不住了。然而，世卿世祿的秩序，顯然大大的受了九流百家舊雜議論的影響。

戰國的分立混亂局面，無疑是邪說橫議的溫床。秦併六國，從丞相李斯的建議中，知道它是在控制精神生產手段上，作過一番努力的。李斯很機智的表示：以前諸侯並爭，厚招游學，由是一般讀書的人，「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併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以其所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言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敢有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之不舉者，與同罪……若欲

有學，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這個建議被秦始皇接受了，於是秦及始皇帝，便被天下後世譏嘲謾罵；一提到「秦為無道」，就把「焚書坑儒」作為有力的註脚。其實，單就學術的立場講，秦朝所作的舉，與此後漢代相比，真不可以道里計。而依維護統治的立場講，秦禁造謗，禁巷議；只許「詩書百家語」藏之於博士官衙，只許學者「以吏為師」，想把私學重新回到官學，並不是念頭錯了，而是不得其法，不知道「百家語」中，究竟那一家之言之教，才宜於利用，而不必禁止，且無妨廣為宣揚。李斯師事荀卿，淵源孔孟，其所建議創制，大體皆本儒家精神，而對於罷百家，崇儒術，未肯公然主張，而必留待漢武帝董仲舒君臣去做，諒不是為了避諱，乃是由於不夠統治經驗。

所以，以小亭長出身而為天子的漢高祖，原本非常侮謾儒生，甚至「取儒冠以溲溺」，迫叔孫通略施小技，制定朝儀，始知此道有益於統治，乃不惜「至曲阜以太牢祀孔」。然儒家思想真正有益於治道的體驗，還是經過高、惠、文、景數世的不愉快事變，才逐漸領會到的。高祖在世有信越等功臣叛變，惠帝之世有諸呂外戚叛變，景帝之世有吳楚等宗室叛變。功臣難住，外戚難住，宗親也難住，該如何才能使此大一統的局面，好好維持下去呢？武帝一朝的君臣們對此是頗費了一番心機的。他們知道高帝那樣形式的尊孔是沒有用處的，文景治黃老之學，適足增野心者的勢鋒，要天下一乃心德，非專向一家學說不可。董仲舒謂「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這建議被武帝採納了，於是孔子學說乃開始定為正統。然則他們為什麼在「百家之言」中，獨選中了孔學呢？原來百家以孔老墨三者為最著。「封建社會重階級名分，君權國家重一尊威權；老子主無名無為，不利於干涉；墨家創兼愛，重平等，尚賢任能，尤不便於專制。惟獨孔學，嚴等差，貴秩序，與人民言服從，與君主言仁政，以宗法為維繫社會之手段，而達鞏固君權之目的，此對當時現實社會，最為合拍；帝王馭民之策，殆莫善於此，狡猾者遂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蘇淵雷：「孔學判攝」，見新政治第四卷第二期）。因此，夏曾佑推論漢武帝尊重儒術之動機，謂其「非有契於仁義恭儉，實視儒術為最便於專制之教耳

二

「最便於專制」的儒術，或者當作一種專制官僚統治手段來看的儒家學說，稍微仔細分析起來，就知道它備有以次這三項可供利用的內容：

- (一) 天道觀念。
- (二) 大一統主義。
- (三) 綱常教義。

這三者對於專制官僚統治的維護，是缺一不可的。

先就第一點天道觀念來說。儒家不言鬼，不言神，却昌言「天」。言神，在神學範疇，言天，進一步，在玄學範疇。在近代初期的歐洲，專制官僚政治的推行，例皆配襯以強調所謂「自然秩序」、「自然法」、「自然權」的玄學。以往貴族社會的秩序，原被宣揚為由神所定立；各國啓蒙學者殆無一不抬出「自然」的大帽子，在消極方面藉此否定神，否定神定的貴族政治的社會秩序，而在積極方面，則又是藉此定立新的專制官僚秩序；以為這新的專制官僚社會秩序，乃依據自然秩序而建立起來。這種玄學，在我們今日稍受政治科學洗禮的人聽來，雖覺得非常好笑，但當時作這種主張的，却是一些頭號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或法學家哩！

中國儒家所強調的「天」，顯然比歐洲啓蒙學者所宣揚的自然，有更多的神性，所謂「君萬物者莫大乎天」(「易」繫辭上)，所謂「天道福善禍淫」(「書經」湯誥)，所謂「皇矣上帝，降臨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詩經」小雅)……通像表明冥冥之中，有一個司吉凶禍福的人格神在那裏主宰；但同時却又有更濃厚的政治性，所謂「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左傳」文公)，所謂「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書經」秦誓)，所謂「天子爲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書經」洪範)……通像表明「天」或「上帝」不能自行其意志，而必假手於天子或帝王以行之，於是帝王或天子的所作所爲，就是所謂「天功人其代之」，換句通俗的話，就是「替天行道」。

可是「替天行道」的事，過於繁重，天子一個人作不了，要大大小小官吏在「一種政治組織下來代他或幫同他處理，結局，單是把帝王或天子的存在地位神祕化了神聖化了還不夠，必得使他的官吏們，使他們大家所由進行統治的政治秩序，也都取得一種「支之又玄」的或「先天的」存在依據才行。關於這一點，儒家的集大成者如孔子乃至以後的孟軻，都不會講得明白，直到漢武帝時主張罷黜百家，崇尚儒術的董仲舒，才因了要把專制官僚體制合理化神聖神祕化的要求，而痛快的予以發揮了，他說：

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按指上文之「有孟有仲有季」)，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變，人之氣也。先天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王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爲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歲，王以四位之選與十二臣相砥礪而致極(「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不僅如此，天有春夏秋冬之異氣，聖人則「副天之所行以爲政」，而分別出以慶賞罰刑，所謂「王者配天」。

這天人相通的玄學，與歐洲啓蒙學者所強調的自然秩序社會秩序相通的玄學比較，顯然表現得更低級，更牽強附會，但其本質的要求是極相類似的：即專制官僚政治秩序，沒有貴族政治秩序那樣有外部的一見明白的自然血統條件可資爲依據，它就需要託之於天，假手於不可見不可知的冥冥主宰，以杜絕野心者的非法覬覦。至若中國歷代王朝末期的犯上作亂者，往往也假託天命，譁言端異，以加強其政治號召，那正是現實歷史辯證表現之一例，而於專制官僚政治體需要一種玄學爲其政治出發點的主張，並無抵觸，每一個王朝的開國君臣，都是會把「天子不取，反受其殃」，「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的經典文句，背誦得爛熟的。

次就第二點大一統主義言。

前所謂「受命於天」的帝王或天子，乃是「天地」或「天下」的最高主權者，所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書經」大禹謨)。這句話的翻譯，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依着這天命最高主權不可分割的命題出發，而主張「尊王」，主張恢復西周形式上的大一統，而對於破壞那種大一統，並各霸一方各自爲政的亂臣賊子，不惜口誅筆伐。至於「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是否真正有些恐懼，當然是另一個問題，但孔子託春秋以明其一復夢見周公之志，想把當時分崩離析的局面，多少挽回過來，却是一個事實。又孔子所夢想恢復的大一統，原不過是西周那種只在形式上表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貴族政治秩序，可是專制的官僚的統治，却正好需要這種「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學說，來支持其中央集權的政治獨占局面。假使在四境之內，或在聖教所及的小天地間，有一個國土或有一個民族自樹一幟，不肯對那個自認爲「誕受天命」的政權表示服從，就算它安其土而子其民，治理得頗有條理秩序，也認爲非撻伐用張，使其解體屈服不可。而且，那種獨樹一幟或未曾就範的政權，愈是治理得有辦法，它便愈要成爲「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的征伐的目標。照理，「天下爲私」的專制者，自己既強制他人接受自己的統治，他究竟何所根據而阻止他人不自爲治？或者至少他將如何勸說他人不自爲治呢？在這種場合，「天命」和「春秋大一統主義」，

便被反復發揮與宣傳，大一統教義在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中，是講解得
非常明透的，而言「天人相通」的董仲舒，更公式化為「春秋大一統者，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由是久而久之，「謬種流傳，演為故智」，
致使在現代以前，中國人的政治辭典中，始終沒有「分治」，「聯治」那
一類名詞。「一統的江山」或「一統的政治」未曾實現，就稱為「創業未
半」，已實現而後為人割裂，就稱為「偏安」。每到一個朝代末期，羣雄
並起，互相廝殺，直到最後有力有勢者，混一宇內，才使那些為人忙打
天下的老百姓，得到一點喘息的機會；「真命天子」出現了，儒家「大一
統」的理想，又實現一回。

最後，就綱常教義來說。

任何一個專制君主，無論他的天下是怎麼得來的，是出於強奪，抑是
由於篡竊，他一登大寶，總不會忘記提出與他取得天下正相反對的大義名
分來，藉以妨阻他臣下的效尤「強奪」或「篡竊」，所謂「竊國者侯，侯
之門仁義存」，就是這個道理。

本來在統一的專制政治局面下，始終存在一個統治上的矛盾：一方面
要儘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圖，接受治化；同時，擴充的版圖愈
大，要使宇內道一風同，心悅誠服，就愈感困難。為了解決這個治化上的
矛盾，自漢朝武帝君臣起，就多方設法推行儒家的綱常教義。綱常之教的
重心在乎三綱，即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亦即君權、父權
、夫權的確認。從表面上看，只有君臣的關係是關於政治的，而父子夫婦
關係則是有關家族的。但中國綱常教義的真正精神，却正好在於它們之間
的政治聯繫。中國一般讀書人都很記得「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的格言，把表現的方式換一下，就是「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
治，國治而天下平」。為什麼一般人也有這大的政治作用呢？我們「聖人
」是這樣註釋得明白的：在積極一方面講，「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
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庭，故治可移於君」（「孝經」廣揚名
）；在消極一方面，「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所以，孔子答覆一個說他不肯從事
政治工作的人說：在家裏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就有政治作用，就等於從
政，何必一定要立在政治舞台上？（「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
政，奚其為政？」——「論語」為政）。這一方面說，是家族政治化，
在另一方面說，又是國家家族化，倫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但我們應當明
瞭這種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國的人，都變成一家人一樣的相互親愛，而
在使全國被支配的人民，都變成奴隸一般的馴順，所謂「居家庭，故治可
移於君」；所謂「移孝作忠」，都不過表示「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結局無非是要加強「君為臣綱」的統治作用；把防止「犯上作亂」的責

任，通過家庭，通過族姓關係，叫為人父的，為人夫的，為人族長家長的
，去分別承擔。在社會上，父子夫婦的關係，是到處存在的；亦就因此之
故，政治統治的功用，就無形滲透進了社會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間的毛
細孔。而且，家族政治聯帶責任，在有所勸的場合，就是「一人成佛，雞
犬皆仙」，「滿門有慶」；在有所懲的場合，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連。
其結果，父勸其子，妻勸其夫，無非是要大家安於現狀，在現狀中求「長
進」，求安富尊榮。而天下就因此「太平」了。

所以，儒家的「大一統」，由儘量擴大政治版圖所造出的上述統治上
的困難問題，就由其儘量推行綱常之教或倫理的治化，而相當的得到解決
，而這又暗示那些把廣土眾民治理得服服貼貼的專制君主及其「覺理陰陽
」，「參贊化育」的大臣們，真像是一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惟天生聰明時乂」（「書經」仲虺之告）！「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荀子」王制篇），這一來，天道觀念，大一統主張，綱常教義，就成功
為「三位一體」了。

三

當然，在長期的專制官僚統治過程中，儒家學說之被御用或利用，往
往是採用不同的姿態。據陶希聖先生的研究，孔子會有這樣七階段的發展
：「封建貴族的固定身分制度的實踐倫理學說，一變為自由地主階級向殘
餘貴族爭取統治的民本政治學說與集團國家理論；再變為取得社會統治地
位地主階級之帝王之學，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孔子遂由此成了神化的偉
大人格；三變而擁抱道教佛教，孔子又變為真人至人及菩薩；四變而道士
化；五變而禪學化；六變而孔學之經世濟民的探討失敗，所留存者，偉大
的孔子，為地主階級與士大夫集團之保護神」（「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第一八七頁）；還沒有說完，他接着指出：「現在孔子到了第七次發展或
轉變的時期了。有人想把孔子來三民主義化」。這所謂「有人」中，陶先
生「現在」應不辭把他自己也放在裏面；也許就因為他自己也在裏面的緣
故，當時他認定「把孔子來三民主義化」，為「不可能」，現在應相信是
「可能」的。但這是題外話。

我以為，孔子無論在這一發展階段的「變化」，在我們的社會，還
大體是為專制官僚統治的限度內，儒家的上述三種教義，始終仍在作着基
本的治化酵母；至多，只不過依着社會物質的與精神的現實條件的發展與
演變，分別在那幾種基本的治化酵母中，加進了或從儒家學說當中，抽取
了一些可以附比的有效因素，使原來的治道治術，改變了一些形像罷了。

原來孔子以儒者問世，備有三種資格：其一為經師，商訂歷史，劃定六經；其二為教育家，講述「孝經」「論語」，此二者章太炎先生於其「諸子學略說」中已明白道及，但還有其三，政治說教者，一車兩馬，歷訪各國，以冀學之見用，道之得行，而這點却為以後儒家政客官僚，作了投機干祿榜樣；至其教人以「中庸」，教人以「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其私淑者孟軻雖以「聖之時者也」目之，但後儒為目的不擇手段的實利主義精神，固因此淵源有自，而其學說之「應時」支離演變，亦不無來由了。

在戰國末期傳授孔門衣鉢的荀卿，他目睹當時社會的實際變化，知道恢復舊有封建秩序沒有可能，知道天命說，性養說，禮治說，都不大靠得住，於是他認定封建體制須予以改造，應崇功利，尚干涉，以刑法鞏固君權。到了他的兩大弟子韓非與李斯，更變本加厲，專為刑名法術是尚，韓非想用嚴刑峻法去造成有權有勢的絕對專制主義，而李斯則實行制定嚴刑峻法以體現那種絕對專制主義，他們無疑是太對儒家根本思想傍趨斜出了，但仔細攷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儒家，對於「五刑之屬三千」，是用「刑期於無刑」來遮飾的，他們始終都認為刑與德兩者不可偏廢，所謂「明主所以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曰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戮而利慶賞」（「韓非子」二柄上）。孔子於刑德二者之間，雖略示差別，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但從他所說的「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論語」子路），及「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貨）一類文句看來，禮義道德都不外建成治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要有助於治化上的目的，在相當範圍內，「雜以名法」的荀學，並不是孔學怎樣不容許的。

至若孔子學說在漢代被雜以讖諱神怪之談，那不過是「天道觀念」的發揮，「天人相通」理論的副產物。「天」既可以對「天子」「天命」，它就可以把它對天子乃至對人民吉凶禍福，用種種「自然的」災異或祥瑞，預為表現出來，使他們分別知所警或知所勸。原來「易經」就充滿了這種讖諱性的玄談，而「春秋」更如實指出了各種各色災異祥瑞的後果。董仲舒劉向父子輩之把自然界各種特異現象，拿來作着政治的附會解釋，無非是想藉此補充當時三綱五常教義尚未深入化和普遍化的缺點。

東漢末葉，道教曾經一度成為愚夫愚婦信仰的目標，但張角張寶一流黃巾賊所宣傳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一類讖語，顯然和劉向輩所藉以愚弄小民的讖諱說教，保有極密切的脈絡。同一被

愚弄得糊裏糊塗的小民，要叫他們相信「蒼天」，就沒有法子禁止他們不相信「黃天」；這種辯證關係，聰明睿智的大儒們，也許還是不會想得透澈的。

魏晉以後，佛教逐漸盛行；當時儒家綱常教義，雖已浸假成為一般人民精神生活中之重要因素，但儒家對於此種可藉以助成治化的思想工具，當然不會漠不關心。於是，心性之學，特別昌明於宋元明諸代，朱、程、陸、王分立門戶，道問學，尊德性，由無極而太極，由寡欲而無欲，禪意盎然，然任誰都未忘記援引經典，以明其說之有據。

降及清代，儒家研究重心，漸由理性玄談，而轉變到要求真憑實據的考據。此在研究的某一方面講，或為一種進步，但就政治立場言，其離隔現實，鑽入「國故」牛角尖中，使人忘懷異族統治，殆與玄談太極，求教良知，有異曲同工之雅。

四

要之，儒家學說之歷史的變化，殆皆如所謂「以夏變夷，而非變於夷」，以孔孟教義吸收名法，讖諱，道佛，直至較近，又還「鑿而不捨」，中學為體」的主張，真所謂「萬變不離其宗」。這原因，乃由於在一方面，中國專制官僚統治一日沒有根本變革，儒家的天道觀念，大一統主義，綱常教義，便一日要成為配合那種統治的支配意識形態；同時，又因為專制官僚的封建體制，究比之過去貴族封建社會秩序，有了更大的變異性，流動性，單是那種支配的意識形態，難免形格勢禁，在統治上不易收到運用自如的效果，於是，每隨着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就以孔變刑名，變讖諱，變道佛，以擴大其精神支配影響。但無論如何變法，大成至聖先師的牌位，始終沒有受到動搖，而在異族入主中華的場合，亦沒有例外。所謂「二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二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明李卓吾語），歸根結底，不是中國人對於孔子學說特別有好感，而是中國的社會統治，特別需要孔子學說。自經孔子學說被漢武帝君臣定為正宗正統以後，在實質上，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土地得相當自由買賣，農民得相當自由轉動，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樣的貴族身分的社會，却藉着知識的統制和長期獨占，而無形中幫同把士大夫的身分特殊化或貴族化了；這一來，本來在一般人眼中看得有些迷糊的中國官僚社會階級關係，就似乎因此顯出了一個明顯的輪廓。

星洲華僑慶祝雙十節的一場風波

鄭明禮

雙十節快要到了，關心祖國的華僑照例要慶祝一番，想不到國內的政局影響到了海外的僑情，竟

因為籌備這一次慶祝而引起了整個僑團社會分裂的風波。

黨團發起慶祝

旨在「通電致敬」

照過去的成規，國慶節慶祝大會都由中華總商會領導召集，但是今年，却因為一個月前九月的三日在慶祝抗戰勝利大會席上鬧了「致敬」和「不牽涉政治問題」的鬥爭，所以國民黨總支部和青年團決定了由黨團發起，起先籌備「新加坡華僑慶祝國慶紀念大會」。因為在九月三日那一次，現任總商會會長李光前，是主張慶祝勝利應該「全僑一致」，不該牽涉政治問題而引起爭吵，所以他事前就主張「祇祝勝利，不作

「左傾」，所以翁增之間感情並不太好，不過，這位李先生是典型的事業家，同時又是一個留過洋的聰明人，所以對政治不願的麻煩。他不贊成致敬，並不是思想左傾，而祇是抱定宗旨不捲入政爭漩渦，可見現實很殘酷，現在逼着這個聰明人也不能不

連瀛洲反對分裂

「左傾」，所以翁增之間感情並不太好，不過，這位李先生是典型的事業家，同時又是一個留過洋的聰明人，所以對政治不願的麻煩。他不贊成致敬，並不是思想左傾，而祇是抱定宗旨不捲入政爭漩渦，可見現實很殘酷，現在逼着這個聰明人也不能不

黨方提出黨紀問題

問題發生於「二百僑團」的籌備通知發出之後，以連瀛洲為會長的廣東會館立刻出來登報否認參加在道「二百僑團」之內。加上，連氏又是總商會董事，總商會也表示要決定另外召集慶祝大會。跟着，「二百僑團」內部發生了問題，許多被列名發起的團體紛紛起來否認參加，當然，一部分人就把過去反對李光前的一肚子不高興發洩到連瀛洲身上去了。

慶祝國慶雙包案

就是連氏當時未曾聞及，事後既知該二百僑團之大會是國民黨三青團所發起，連氏站在國民黨員的立場，且為廣東會館主席，理應加以追認，但連氏竟不如此，反登報聲明。黨團一向無辜負於連氏，而連氏竟出此舉，存心何在，令人費解，至於廣東會館之文件，既非經廣東會館董事會決定，僅可代表連氏一人之意見而已。

黨部與僑領對立

係，後來，爭得最猛烈的是國民黨對民盟（據一般所知，中共在星洲沒有活動，馬共是不大理會中國內部鬥爭的），這算是黨派鬥爭。而這一次，民盟正在開全馬來亞代表大會，對此事沒有直接參加，所以，門得利害的，變成了黨部對僑領，而連氏僑領，偏偏一向是親政府著名的人物。

總商會調和左右

主張「全僑一致」

國內的人也許不明白華僑社會習慣。在新加坡，黨派鬥爭鬧得很尖銳，任何性質的團體都有民盟和黨部的兩重組織，所以要「全僑一致」來參加，除非由中間的總商會來發

起領導不可，否則，左邊召集了右邊不來，右邊召集了左邊也一定要同樣的另來一套。李光前是新加坡首富，總商會會長，他雖然是陳嘉庚的女婿，但是因為他不同意他老岳的

舞合從暗鬥轉向到明爭。某報十月二日發表了一篇「連瀛洲可以代表粵僑嗎？」內容相當猛烈，說他以前在重慶做過官，現在又想投

報，結論是「滾吧，把連某趕出粵籍去！」連氏是潮州人，在新加坡，潮州人和廣府人之間，本來是不融洽的。

為了打開僵局，莊惠泉林師兩位出來調停，在十月二日下午召開了一次茶會，各方面都有代表參加，但是問題依舊停留在「致敬」這一點上。許多僑團不願意大會分裂兩處舉行，又不願意為了「致敬」問題爭吵，而黨部方面却堅持大會一定要「通電致敬」，會談沒有結果，總商會決定了另行發起慶祝，這樣，今年雙十節，和印度人慶祝甘地生日一樣，在星加坡就可以看到雙包案的兩個集會了。

宋子文接替羅卓英

林鬱

陳誠系統的大將倒了一個

關於廣東省府改組，自今年春就開始傳說了。羅卓英對此種傳說，雖然外表顯得鎮靜，實則僕僕京穗途中，四方張羅，可知他是怎樣提心吊膽的。上月宋子文主粵的消息發表後，羅卓英簡直弄得手忙脚亂，無限淒涼，而全省行政便陷入一種混亂無主的狀態，因為這個消息實在來得太突然了。在羅卓英想來，總以為大選在即，不致更張各省人事的，所以雖然各方消息對他不利，他却仍然裝聾作啞，不會自提辭呈，但事實終于幻滅了他的想像。於是羅的屬下便將槍決莫與碩一事與羅卓英的下台扯在一起，認為這是陳誠調離中樞的悲慘後果。

所謂「抱定樂觀實際之態度，不斷與環境鬥爭，雖未達預期成果，衷心至覺怡然」，又說「自維兩年歲月，尚非虛擲」，同時強調上任時環境之惡劣：「是時粵八年兵燹之餘，流亡載道，交通阻塞，……收拾殘破工作，即佔去數月之光陰」，遂後又有旱災水患，金融波動。總之，他一口咬定，在這樣的環境下是無法做得好的；人民痛苦，官吏腐敗，都不要怨我，只該怨天呀！真是推得一乾二淨。談到建設，他提到了他的「廣東五年建設計劃」，他無法辯護計劃消耗了無限腦力財力，所贏得只是空洞具文，却把計劃不能實施的原因推到中共的身上，於是一向諱言「奸匪」的他，這時也只好說出「奸匪」的嚴重情況：「環屋匪患尚未肅清，南路奸徒又從而蠢動，而國軍他調，團隊無多，此則彼寡，撲滅需時」。在自己統治的時候，遇上轄下，老是說「奸匪不足為慮」

，等到垮台，無法詭辯其過失與無能時，便和盤托出「兵荒馬亂」的恐怖狀態，來搪塞一切。這話著實說得很聰明，然而人民也不盡是傻子呀！

先下手為強

民政廳長詹朝陽還是九月一日走馬上任的，可是十月一日，却又要交代給別人了。但是這位先生，我們可不要小看了他，一上台，先來一個「用人唯才」的漂亮藉口，往後即大換縣長，短短一個月裏總共更動了三十多個，平均每日在一個以上。尤耐人尋味的，宋子文主粵消息確定後，縣長的更動不但未有停止，反而更加頻繁了，五個一批，六個一批的換下去。有人說他為了活動廳長，曾經投下一筆資本，所以不得不趁早撈些回來，但也有人說這是羅會合夥經營的最後一筆買賣。被委出的縣長，多數都存觀望態度，因恐新主席竟不又換人，倒

不知權且留在廣州，先看一下宋子文的臉色再作決定。

舊官卸職·扒進無數港幣黃金

宋子文主粵消息確定之後不久，廣州市金融會有猛烈的波動，港幣連破「八」「九」之關，美鈔亦破「五」字關，黃金則逾三百四十萬元一兩。此種黑市金融的波動，當然脫不了經濟上一般因素的影響，但就市場中的流言來說，則又與省府改組一事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做官的塞滿了腰包，倒台的時候，就搶購港幣黃金。在波動最劇烈的幾天，廣州十三行出現許多「生客」，他們的胃口很強，對港幣抓進的數量異常鉅大。最惹人注目的是「廣東實業公司」於九月廿三日一日之間，竟暗中抓進港幣達四百三十五萬，廿四日再進八十萬元。在倒台官吏搶購之下，當然難怪黑

市金融市場翻騰着險惡的風浪了。

新官上任大批游資何處來？

宋子文降格來做廣東省府主席，由於他是一個大「財神」，是一個中央的「親信」，而且又是一個對實業投資的「大亨」，所以當他主粵的消息傳出後，穗粵工商界人士都異常興奮，搭牌樓，去電歡迎，並寄以無限的期望，以為他來之後，生意是有所做的，貿易的限制是可以放寬的，工商界的困難是可以解除的，廣東經濟會因此穩定的。而且一般敏感的人，還以為最近資金南流之原因，是江浙財主要跟宋氏來粵做生意，所謂大軍未動，資金先行。還有一說：與宋敵對的派系特地匯集大量資金來粵，等他上台時，便從事於市場上的擾亂，掀起險惡的金融風暴，給宋氏來一個「登台打擊」。這一說，證之于十月以後廣州金融之暴漲，港幣再度破關斬將高至一萬二千多元

，黃金亦高達四百多萬一兩，愈加令人深信不疑。然而人們完全忽視了華中戰事與東北共軍第六次攻勢的影響，迫使資金南下，逃避到較安定的地帶。也有一些明眼人的看法，認為宋氏主粵，目的在求安定華南，作為內戰的基地，同時，可能更使廣東的政治經濟買辦化、殖民化，因宋氏主粵之另一目的即在招致美國對華南的投資，讓廣東成為美國的市場。關於這一點，有兩個事實頗可作為實證，第一是宋氏來粵未滿三天，美商煤油大王之孫洛克菲洛便匆匆飛穗，于十月二日舉行糧官會謁宋氏，長談半小時。第二是粵漢鐵路管理局局長杜鎮遠來穗，與宋氏商談黃浦開港之事，這也是為了便利美國商品的輸入的。

過去的施政「困難」·今後的施政「方針」

在九月最後一天，宋子文飛抵了本市，帶來的

只是他的太太和幾位隨員，似乎沒有「新官到來，嘍囉滿船」的俗吏姿態，而且在上任時，只貼一張白紙的小佈告，並沒有放炮竹、貼大紅條。接任後，對羅在職員，即使已爲羅卓英批准辭職的秘書處的幾位科長，亦都挽留，於是許多人就這些事實與宋的降格而來一併觀察，便說宋氏此番真是擺脫了官僚作風，真是爲廣東服務而來的了，但當我們看到宋氏在穗市漢民南路太平餐館食飯，五、六個人每餐竟用去一百四十多萬元巨款的時候，我覺得凡是對宋氏寄以期望的人真是愚笨得太可憐了。

十月三日宋子文與羅卓英在中山紀念堂舉行了「一個交接典禮，羅卓英語帶悽涼，反復說明兩年來施政的困難，自稱鞠躬盡瘁，問心無愧，大有炫耀他是光明的來，光明的去的態勢，但還只是「天曉得的」事。宋子文在這個會上，也揭開了治粵方針：一是解決水災善後各問題，二是維持治安和恢復實

鑑往知來：財神超度不了衆生

天眞的人，以爲今後廣東在政治經濟方面都會好轉，建設事業可望蓬蓬勃勃，但又有一些人想到宋氏在官場的地位與他一貫的作法與作風，却作這樣的預測：首先是對縣級行政一籌莫展，其次是廣東經濟的殖民地化，官僚資本化，第三是獨斷獨行風氣的變本加厲；總之，宋子文接替了羅卓英，也祇是官海中的此浮彼沉，人民在現治下的痛苦是解脫不掉的。（十月五日 寄自廣州）

魯迅傳「序

景宋

魯迅傳在中國印行的有一種日人小田獄夫寫的譯本。而直至現在，魯迅逝世了十一週年的時候，纔看到這一本是自國人寫的，即此一點，也可以說彌補了多年的缺憾。

日譯本魯迅傳未出版前，確曾有先睹之榮，也曾代借予幾本魯迅著作以爲查檢一些引證魯迅作品的文字。但不知怎的，在「文藝春秋」介紹時，編後記裏就硬被說是「許廣平校訂」的了。與之交涉：還不能算「校訂」，因爲我並沒有拿日文與譯本對校過，並且要求下一回予以更正。待到次一期的「文藝春秋」到手，翻開編後記一看，那更妙了，大意是說：魯迅傳許廣平並沒有從日文對校，不過是她校訂的。這是什麼話？自己不懂得日文，而却不怕汗顏冒充什麼大名流來掛一個校訂的空銜因爲榮麼？那時是日本人統治的世界，我沒有可以發表更正之詞的地方。一直容忍着，直至開明書店出版單本的時候，也仍然照樣登廣告說是我校訂的。但是我及犯不着爲這一點點小事來特別高聲明，感謝這一本魯迅傳要我說幾句話，因而連想起來，順便從我自己手裏洗掉被偷冒校訂之名的瓦心上數年來的不自在。

日譯本早先曾由柯靈先生向我提起，是否可以替它出版？我的答復是：那本書，原著者有若干主觀之見，拿來放到魯迅身上，這是不大好的。第一點，他看到中國文藝工作者，好一點的都往西方去了，沒有肯替他們做漢奸，因此頗有微詞，尋根究底似乎尋到魯迅身上，被推崇爲他的關係，因而說戰爭發生之後，中國文人把魯迅當作文化戰神云。這太抹煞各文藝工作者自己崇高的認識，我不大同意。其次是：大多數日人認爲魯迅的攻擊時弊，是對某一個負責者的斥責，是反對他。藉此作掩飾，辯護，以爲某人也被魯迅所反對，無怪日本要爲民伐罪，深入中國了。這是非常之惡毒的寫法，在那時候。魯迅的攻擊對象，有時固然找一個人物以代表某一集團，如陳源之與現代評論派。但是對於普遍的惡劣情形，以至無須拿具象事物即可以了然於中國政治的昏亂，則不是二人而是一大羣運某人在內的集體作，不過其間有程度深淺之不同罷了。廣泛些說，也可以與階級，思想制度有關的。因此我以為小田獄夫的寫法，是隨着戰爭環境，一如其他日人的通例，統統在戰爭時期，爲日譯主義者借詞解脫。在抗戰時代，我們替他出版是不大好的。待到譯者把譯文給我看的時候，曾經把這一點頗爲重要的處說明了，似乎譯本出版，多少刪掉了一些。

勝利之後，有機會看到這本真正自國人寫出的魯迅傳。他把中國歷史發生的重要事件和魯迅生平經過，從頭正確地，客觀地找尋出它的所以然。惟其如此，纔能了解魯迅行文，虛世的真意。這正是我多年心裏所願看到的，而希望竟在眼前實現，這不歡欣鼓舞，是不能言語形容的。

魯迅活着的時代，正是中國人民從睡夢中覺醒，從死的古文到活的白話文，從被征服到掙脫枷鎖，從帝國主義的統治高揚到人民起來自主；凡這些，魯迅生息其間，吸收其滋養，在道國土裏發芽茁壯。即是一棵稻苗吧，當然有肥料從旁擠軋，那是毫不不足爲奇的。然而人們還是要稻苗存在，因爲這是人類所需要的。魯迅著作的存在，一如稻苗，因爲是人類所需要，所以值得研究。而魯迅傳是提供我們研究作家所代表的時代，爲人類所需要的一部分歷史過程，而作者王士菁先生却把握到這些，凡我們所願意知道的，都盡力告訴給我們了。

本書的小疵不是沒有。據我看：有些地方略嫌例證過多，如魯迅原著，幾乎大家都容易看到，無需連篇引證的。至於別人攻擊的文字，引證出來，可以豐富讀者的另一觀感，未始不可作研究的資料，但倘使對魯迅批判得不甚確當，甚或含有若干主觀意見存在，反而無意中有使研究主題混淆之嫌了。

我學殖甚淺，或未能盡覓作者全意。大致說來，個人認爲這本魯迅傳總算值得一看，的確爲中國人自己寫出來的，到現在爲止，比較客觀的一本魯迅傳。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魯迅的避難生活

許壽裳

魯迅一生不過，歷盡了人世的艱辛，自己把整個的生命，獻了出來，為我們民族的生存和進步，勇敢奮鬥，至死不屈，患肺結核而至垂死的時候了，友人們勸他轉地療養，而他仍屹立不移，不肯輕易捨去。他在少年時期，就飽嘗顛沛流離之苦，孑身出走，毫不自餒，于世態的炎涼，人情的澆薄，看透而又看透了。其避難情形之筆筆大者列舉如左：

- 一、一八九三年秋，魯迅十三歲，因家事而避難。
- 二、一九二六年，因三一八慘案後，張作霖入京而避難。
- 三、一九三〇年三月，因自由大同盟事，負被通緝之名而離寓。
- 四、一九三一年一月，因柔石被捕，謠言蜂起而離寓。
- 五、一九三二年，因一二八戰事，家陷火綫中而出走。
- 六、一九三四年八月，因熱識者被逐，離寓避難。

「回家……」又「吶喊自序」有云：「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膠，我以為在遭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過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所謂親戚家是指他的外家，試看他當十一二歲時，「社戲」中所描寫的：跟着母親到外家，和小朋友們一起游玩，和大自然親近接觸，有時掘蚯蚓來釣蝦，坐白篷船看社戲，是何等悠游自在，曾幾何時，而竟被指為「乞食者」；這對比是何等尖銳！

二、為的三一八慘案以後，有要通緝五十人的傳說，我和魯迅均列名在內。等到張作霖將入京，先頭部隊已抵高橋了，經老友齊壽山的慫恿，我和魯迅及其他相識者十餘人，便避入D醫院的一間堆積房，夜間在水門汀地面上睡覺，白天用麵包和罐頭食品充飢。魯迅在這樣境遇中，還是寫作不輟。

三和四、連年逃難，都是在春天。其實他自旅滬以來，潛心著述，杜門不出，而竟被人乘機陷害，心中孤憤，不言而喻，成詩一首如下：

慣於長夜過春時，
翠鴉將雛翼有絲。
夢裏依稀悲母淚，

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處處，
月光如水照緇衣。

詩中「刀叢」二字，他後來寫給我的的是作「刀邊」。全首真切哀痛，為人們所傳誦，郭沫若先生在抗戰那年歸國賦投筆時，不是純用道首的原韻嗎？又魯迅於書簡中，也是感憤交并，有云：

……上月中旬，此間捕青年數十人，其中之一，是我的學生（或云有一人自曾姓魯）。飛短流長之徒，因盛傳我已被捕。通訊社員發電全國，小報記者盛造謠言，或載我之罪狀，或敘我之住址，意在譏笑當局，加以搜捕。其實我之伏處隱下，一無所圖，彼輩亦非不知，而滬上人心，往往幸災樂禍，翼人之危以為談助……魯迅書簡一五葉。

致李秉中信（二）

魯迅給我報告無恙的書信，體裁和平常不同，不施句讀，避用真名，且以換住醫院來代出字樣。茲錄如下：

季獻吾兄左右昨至寶隆醫院看索士兄病則已不在院中據云大約改入別一病院而不知其名擬訪其弟詢之當

久未通啓，想一切尙佳勝耶？
喬峯事迄今無復文，但今茲書館與
工員，爭持正烈，實亦難於措手，
擬俟館方善後事宜辦竣以後，再一
託蔡公耳。

此間商民，又復惘然歸來，蓋
英法租界中，仍亦難以生活。以此
四近又漸熱鬧，五月以來，已可得
申報及鮮牛奶。僅初以爲恢復舊狀
，至少一年，由今觀之，則無需矣
。

我景狀如常，婦孺亦安善，北
新書局仍每月以版稅少許見付，故
生活尙可支持，希釋念。此數月來
，日本忽願譯我之小說，友人至有
函邀至彼賣文爲活者，然此究非長
策，故已辭之矣，而今而後頗欲神
中國文學史也。專布。並頌
曼福。弟樹啓上 五月十四夜

(二)

季市兄：

上午得七月卅日快信，俱悉種
種，喬峯事如此鄭重保證，不勝
感荷。其實此君雖頗艱辛，而仍
不更事，例如與同事談，時作憤慨
之語，而聽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語
，但擬彼語以上聞，藉作取媚之資
矣。頃已函以忠告，冀其一心於館
，三緘厥口，此後庶免於咎戾也。
王公膽怯，不特可晒，且亦可
怡，憶自去秋以來，衆論譁然，而
商務館刊物，不致有抗日字樣，關
於此事之文章，東方雜誌只作一附

錄，不訂入書中，使成若即若離之
狀。但日本不察，蓋仍以商務館爲
排日之大本營，館屋早遭炸焚，王
公之邸宅，亦淪爲妓館，迄今門首
尙有紅燈赫耀，每於夜間散步過之
，輾爲之慨焉與歎。倘其三閩大夫
歎，必將大作離騷，而王公則豪興
而小心如故，此一節，仍亦甚可佩
服也。

近日刊物上，常見有署名「建
人」之文字，不知所說云何，而且
稱此名者，似不只一人，此皆非喬
峯所作，願亦不能一一登報更正，
反致自擾也。但於便中，希向蔡先
生一提，或乞轉告雲五，以免誤會
爲幸。原箋附還。此復即頌
曼福。弟樹啓上 八月一日夜
蔡先生不知現寓何處，乞示知
，擬自去向他一謝。同夜又及。

六、從略

綜觀歷次遊離，只不過離寓若干步
而已，大約爲的經費拮据的關係，雖經
友人多方勸告，總不能遠游或出國。他
自謂「時亦有志，去此危邦，而幸念奮
，仍不能絕裾徑去，野人懷土，小紳
戀山，亦可哀也」(魯迅書簡一六葉致
李秉中函語)。離離有云：「曰『勉遠
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
無芳艸兮，爾何懷乎故宇』！」又云：
「陟升皇之赫歔兮，忽臨睨夫舊鄉，僕
夫悲余馬懷兮，馳局顧而不行」。魯迅
的境遇和三閩大夫何其相像呢！
(一九四七·七·二八)

弔俞頌華先生

德明

俞頌華先生於本月十一日在蘇州逝世。噩耗傳來，使我感覺莫名的哀惋。

在上海拜見俞先生，記得是在今年四月間，我請他寫文章，他滿口答應。隨後俞先生去蘇州教書，雖書信時有往還，可是文章始終未見寫來，據八月二日來函云：「一因體弱天熱，憚於執筆；二因招考新生事須在校襄助，稍形忙碌；三因環境如斯，有許多話未能痛快的講，若吞吞吐吐，恐讀者多所誤會，不如暫時緘默。……擬於秋涼來申約談，先行交換一番意見，然後撰文。……」但後來上海之行并未實現，只寄下一封兩千字的長信，內容約有三點：

(一) 中國大多數的人民實在太痛苦了，凡是有良心的知識份子，都應該自己犧牲一點，而爲人民多作些事。

(二) 現時世界的潮流是傾向於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中國也應該朝着這方面走，知識份子不可不有此種認識。

(三) 目前中國的開明份子，要在一個大前提下團結起來，不可自相吹求，分散力量。

這封信，我寄回去請他修正後打算發表，當接九月一日覆函稱：「近因氣候悶熱，是以弟於前日起身體欠佳，醫生囑在最近數日內須完全休息，絕對不可用力用腦，則不久即可復原，是以囑將原函修改，容體寬復後當再遊辦。」豈知此兩便是俞先生的遺書，而四月間的見面竟成永訣了。

俞先生的爲人，從上述的幾封信裏已可窺知一二；他有對於時代的敏感，故雖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國家的患難和人民的痛苦；他有謙遜學習的風度，故雖對青年後學，亦無老朽倨傲之態。他是中國知識份子的良樞，給人以深刻印象，使人感動敬仰。俞先生的死，當不只我一個人抱無限的哀思吧！

三六年十月十二日

藝文誌

關於雜文

關 懷

讀「短長書」記
唐毅著 南國版

一般地說，雜文，比起其他形式的文藝作品來，是更有「時間性」的。特別是賦時弊的雜文。有些反對雜文的人，每每利用雜文要被「時間性」所限制這個弱點，來否定雜文底價值，說是藝術的特質是在能夠表現永久的人性，並不因「時間」的流駛，而有所腐蝕。雜文的內容既然是稍縱即逝的，可見並非是什麼藝術了。

然而愛寫雜文的人，似乎還沒有先查問了它有沒有永久的價值，是不是藝術，這才下筆。他們只是因為從現實裏，從社會裏，有了不能抹除的感觸，覺得用這一形式寫，更能傳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就這樣寫出來了。

真摯的雜文作家倒寧願自己的雜文能夠趕些腐朽。越腐朽得快，就越是證明社會的進步；決不願爲了自己雜文能夠永遠留傳下去，而拖住社會的進步的。

然而反對者雖然竭力誇張雜文要被「時間性」所限制，真摯的作者雖然在希望「時間」能使雜文迅速歸於腐朽，但我却覺得，「時間」對於雜文，從某種角度看來，似乎並沒有什麼決定的影響。有時，我甚至還要以為，雜文也一

樣有它的「永久性」，歷史而不變似的。

例如讀這本「短長書」，作者雖則聲明裏面大多是「抗戰初起時的作品」，有幾篇還是戰爭以前的，離開現在都有好幾度寒暑了，然而作者所搏擊，所刺射着的當時的醜惡，和現在實在並無不同。正如作者所說：「阮大鏡們的「視人人皆東林」，現在不亦如法泡製了嗎？」

「短長書」，這是「戰國策」的別名，作者爲了「這些長長短短的文章，大部份寫於戰時，也就沿用了這個老名稱。」它在抗戰時期是已經由「北社」出過一版的。但原書的份量不及現在的一半，有許多是新加進去的。

我特別愛讀其中的「漢羽雜記」，

「東南瑣談」，以及「馬士英與阮大鏡」等幾篇通過歷史的幕帷，鉅賤以實的文章。這些都是南明敗亡的事蹟。作者非常扼要而又警闕的指出：「小朝廷」的君臣們，怎樣在白骨堆和廢墟的旁邊重新捧起「昇平」的局面，忙弄玩完已經屈指可數的末日；而那些還「沒有生成奴隸的心」底人民，却又是饒着何等悲壯的——「野火焚山，林中有雄，入水漬羽滅火，往來疲乏，不以爲苦」的精神，抗拒着侵略者。但因為那時的統治者是寧願亡給外邦，而不歡迎「草澤勤王」的，存所謂「友軍的隊伍裏，時時伸出敵人的手來」，扯住他們的腳，還抗拒終於弄得一無結果。——在這

裏，歷史和現實打成一片了：作者一方面總結了歷史，一方面也透視了現在。在「漢羽雜記」底末尾，作者曾經這樣感慨道：「想從這（愛爾斯史的）癖好裏跳出來，把舊社會與冷酷變化的現實，一齊忘却。但當非拾起頭來，向眼前的現實注視時，我首先……看到了高大的牢獄，看到了在兩面夾攻下艱苦奮鬥着的青年，他們在友軍的鎗聲裏倒下。我知道這是怎樣的時代！明人的氣燄早已和他們的社稷一齊完結……」——作者的沉痛，我們是十分了解的。

我想，雜文只要像這樣似的抓住了那些最主要的東西，即使「時間性」非常有限，但是，成就却是大的。



法國兒童電影

屏 藩

這裏所談的法國兒童電影，是指以兒童作爲主要演員或以兒童作爲問題中心而攝製的片子，而青年也包括在內。

初看去，法國影界似乎是對兒童與青年問題遠不及其他諸國的電影界感到興趣。法國電影，彷彿秉承着十七世紀古典文學的傳統，對於人的問題的研究，僅以其壯年期的種種過程爲限；兒童期與青年期似不在研究之列，反

之，如美國、俄國、以及最近的英國與意大利，對兒童世界，在電影上却有較爲廣泛、深刻、動人的描寫。像這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類兒童影片，並不因迎合趣味，而忽視作爲演員的兒童的心理。俄國或意大利若十兒童電影，長於寫實，一代兒童與青年的苦命運，常以悲慘欲絕的場面，出現於銀幕之上，其逼動人，有如

從實際生活中攝來的一部紀錄片。但同一兒童題材，出自不同氣質與不同國籍的導演家之手，當然有其不同的色彩，不過亦具有一個共同點，例如要表現出悲劇的氣氛，一個出現在銀幕上的十四五歲的兒童，就必須扮演出粗暴、殘忍、或甚至一種暴虐。法國兒童電影的寫實性，並不亞於其他諸國同一類的影片，其特徵在於同時亦注重詩意的渲染，

左拉與社會主義



「德萊非事件」，是法國前世紀末年民主共和人士與反動派短兵相接的重要鬥爭，而且具有大無畏精神的文人左拉人格的最高表現。

林如復

當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三日，左拉的那篇驚世一世的「我控訴」在黎明報發表之後，法國社會各階層立刻騷動，在議院中的右派人士，因被刺着痛處而惱羞成怒，決定要用全部黑暗勢力來撲滅這真理的光明信火，乃至就是這法例行政藉此挑動反動政潮亦在所不惜的。自然，這些仰軍部鼻息的議員，幫兇幫黨的小丑，既然把持着議會，首先便要提議請政府和軍部控訴左拉。當時，在議院居少數派地位的社會黨議員，而且忍抑不住忿怒用拳頭粗暴的向桌上一捶，面紅耳赤的大聲說道：「怎麼呀，不是社會黨嗎？……我且告訴你吧，愛米爾·左拉這一行動，正就是本世紀最偉大的社會主義的行動呀！……」

在事情激發之中，有一位眼光狹隘的社會黨議員，却冷冷的提出了一個意外的問題：

「不過，左拉並不是我們社會黨人呢！」

「哦！怎麼呀？」素來頗有學者風度正在壯年的社會黨領袖讓·羅銳斯(Jean Jaurès)忽然變色

烈爭辯的時候，他堅決的反對反動派議員德·滿恩伯爵提議控訴左拉，而且聲色俱厲的指着那一羣仰軍部鼻息的議員喝道：「我給你們說，你們是正把民主共和國交給到將軍們手裏去啦！」

自然，誠如左拉本人所說，「真理在進行，在什麼也不能阻止他的」但在那時，全法國人士幾乎都為反動派無恥詭言所蒙蔽之下，也只有極少數的有正義良心的人如讓·羅銳斯能看清這一切，而且敢於奮勇真誠的呼叫。所以，在商場人類正義的戰鬥之中，我認爲讓·羅銳斯那動人的一怒，那豪慨的一拳，也正是可與左拉的「我控訴」並傳千古的。這是崇高，這就是美的！的確，狹隘的黨團或宗派的觀點，怎能不在爲人類爭真理正義的偉大情感之下黯然失色呢？

後來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剛爆發的時候，讓·羅銳斯因爲要阻止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國家間對無產階級民衆的屠殺行爲，發出反抗的呼聲，不幸被反動派無恥的暗殺了，但他那堅貞不拔的精神，實在是與左拉的精神息息相通的。

每於現實生活中插以虛無飄渺的幻想；另外有一類法國兒童電影，專寫學生生活，於現實中，滲入一種荒唐的意味，但亦不缺乏詩境，諷刺與幽默，例如「操行零分的芝昂·威果」一片即是。其次如「孩子們進行偵查」，仍然是注重學校集團生活的刻劃。至另具一種風格的法國兒童影片，可以「黃鶯鳥的樂龍」一片作爲代表。這裏有夢似的詩情，有溫柔的諷刺，有無聊的惡作劇。參加出演者，一部分爲木十字架歌頌隊的兒童。

法國兒童影片導演家，有不少特別顧到兒童與青年的精神狀態的描寫，如內傾的心理，愛好孤獨，喜歡親切的生活，以及舉凡一切法國文學所描寫的兒童性格多被搬上銀幕。開創這一派電影者爲費德爾導演的傑作「兒童的面貌」。

此外尚有幾部名小說，亦早經攝成影片，至今迄未停止放映，其中最著名者爲亞雷格赫著的「苦兒流浪記」，赫納爾著的「紅蘿蔔」(卅兩書皆早有中譯本)。最近接上銀幕者則有「素斐的不幸」。

最後談到目前正在攝製中的兒童影片「暑期生活」，是一部情節極爲緊張的較上述諸片都來得偉大的片子。在這一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兒童到青年期的種種生活過程，舉凡孩子們由嬉戲的性情而轉爲莊重，以及對成人生活的注意和漸漸發展的事業心等，都將在這一部鉅製中有着極深刻的描寫。

樸素，確切，諧和，幽默，機智，活潑，荒唐，詩境等等都是構成法國兒童影片的主要特徵。兒童可愛的生活，每一個人都有其一生消滅不了的回憶。兒童影片受社會一般男女的歡迎，也正因爲對自己逝去的童年，能從這一類影片中，喚起一段甜蜜的的回憶吧。

考驗



寒山

魯迅先生逝世十一週年紀念很快就到了，今年不比去年，一定是很寂寞渡過這個日子。

但是，我們又須領着儀式上的紀念呢？魯迅先生雖然逝世了十一年，却仍然時時刻刻活在我們的心裏。

魯迅先生逝世的時候，上海著作人協會有一對聯：

一生反對帝 至死不寬容

雖然僅僅是十個字，我以為已經可以把魯迅先生的一生的事業和他的堅毅的鬥爭精神，很概括的說出來了。其實，這也是魯迅先生給我們的偉大的教養。

我們試撫心自問，我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面前，曾經低過頭嗎？我們曾經和他們握手嗎？在最艱苦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動搖過，準備作一個降卒？如果不，我們就無愧於這位曾經用他的血肉哺育我們長大的「老師」。

現在不復再是空言紀念的時候了，現在正是我們受到考驗的時候。

讀者之聲

願美國莫再逼成「共產國際」的擴大！

周至誠

九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當然是國際間的頭號大事。我試用最經濟的文字寫出個人的看法。第一，它是美國逼成的。美國擅自援助希土，準備拋棄東歐而實施馬歇爾計劃，都證明她決心遠背聯合國組織的精神，決心拋棄國際全面合作，而企圖依仗金圓和原子彈的威力，君臨世界。最近聯合國大會開幕，關於否決權的討論，關於設立五十七國常務委員會的創議，都說明美國意欲獨霸這一個世界和平機構。

第二，它象徵蘇聯外交將由守勢轉為反攻。須知事實上美國也有她的「國際」。她有門羅主義，整個美洲不妨稱為「門羅國際」。她有英法、土耳其、義大利、乃至半個西班牙，那裏的獨裁或半獨裁主義的政權都靠她的支援而盤據統治地位，這就不妨稱為地中海國際。此外，她又想鞏固對非對華的「國際」的擴大！

麥克阿瑟來中國作皇帝？老百姓

美國波利特發表「訪華觀感」，主張貸款中國

華觀感」，主張貸款中國

，并建議由麥克阿瑟來華監督，以便有效的抵制共產主義。

他的「觀感」，荒謬到了極點。首先，中國是個戰勝國家，并非戰敗國的日本可比，要麥克阿瑟來做皇帝麼？其次，中國是個獨立國家，波利特公然主張由美國軍人來監督

對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友誼可言

姚海峯

剛才看到貴刊二卷三期對美私先生所作「兩條路」一文，對於當前政治制度的解釋和分析，客觀而仔細，我很佩服。不過在那篇文章的末一節，作者似乎忽略了一個小地方，作者說：「在國際上的強鄰有兩個，一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他對我們一個好處，可以供給我們的機器；可見他也有個壞處，即是他的工業品的輸入，便是我們幼稚工業的毀滅。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他有一個壞處，就是他沒有機器來供應我們的需要；但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可以告訴我們怎樣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發展我們的工業。在這兩個強鄰之中，我們必須選擇，我們對誰的友誼是第一位的？作者的這意思當然是在後者，但據說我們幼稚工業的難題還有「第二位」的友誼麼？他是我們的敵人

，不是把中國看成美國的附庸或殖民地了麼？再次，波利特要中國作美國反共的貓腳爪（工具），替美國火中取栗，吃虧的是中國，估便宜的當然是山姆叔叔了。

這是一篇中國老百姓的想法，且看官方的反應怎樣吧！十月十二日無錫

呀！這顯然不是第一位與第二位之分，而是友人與仇敵之分！

同樣，作者又說：「我們的朋友有兩個，一個是大富翁，他可借給我們錢；但要是我們給他作學奴隸；一個是小硬漢，他的腰包沒有錢，而且脾氣很古怪，但他却把我們當作小弟弟。在這兩個朋友之中，誰個的友誼應該放在第一，這也須得我們去決定。」難道要我們去決定誰的友誼有第一第二的分別麼？

意思是很簡單的，但友人和仇敵，我們必須認清，一些含糊不得。（九月廿七日 上海）

打開「新聞報」的商情表一看，凡百貨物都極有漲價的三角形記號，物價全面上漲，真是一觸目驚心！最近米價由六十多萬跳到八十多萬，差不多漲了二十萬元，現在還早秋收過後不久，糧食漲勢就已如此猛烈，轉瞬嚴冬即屆，將來如何得了？報載五萬元大鈔又將發行，通貨膨脹已至惡性階段，物價還要大漲特漲，像我這樣月入只有百萬的小

職員，以及待遇還不如我的，都無法繼續生活下去！這幾年，長城內外，大河上下，都是烽火遍地，戰鼓震天，老百姓流離失所，千萬人血流而犧牲，這是為甚麼呢？而且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打出一個結果來，也就是說，物價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安定，我們再也忍受不了了。（十月十一日 上海）

刊物胡亂造謠

編者先生：在北平出版的一個綜合性雜誌——太平洋月刊，內有一信箱，有一位讀者問刊及「觀察」的情勢，他們答說：「都是機關刊物，是有背景的，也是說有後台老闆的。」這就是我所要問的，貴刊到底是一派那樣的刊物，傾向那一派？難道不能儘情的說，難道不能儘情的說嗎？朱碧波謹啓（九、廿六 上海）

「背景」問題，本刊曾經在一卷十三期「讀者之聲」欄中答覆過讀者，這裏不妨重覆幾句：「我們的刊物是綜合性的，當然也討論政治，而且說重點於政治、經濟及社會一類問題……如有違背人民利益的，我們當然不吝批評，可是我們刊物本身并不是一個政治性的刊物。文是「太平洋」的刊物，果如所言，胡亂造謠，則不值一駁，徒然有損刊信譽而已。」

附庸或殖民地了麼？再次，波利特要中國作美國反共的貓腳爪（工具），替美國火中取栗，吃虧的是中國，估便宜的當然是山姆叔叔了。

這是一篇中國老百姓的想法，且看官方的反應怎樣吧！十月十二日無錫

呀！這顯然不是第一位與第二位之分，而是友人與仇敵之分！

同樣，作者又說：「我們的朋友有兩個，一個是大富翁，他可借給我們錢；但要是我們給他作學奴隸；一個是小硬漢，他的腰包沒有錢，而且脾氣很古怪，但他却把我們當作小弟弟。在這兩個朋友之中，誰個的友誼應該放在第一，這也須得我們去決定。」難道要我們去決定誰的友誼有第一第二的分別麼？

意思是很簡單的，但友人和仇敵，我們必須認清，一些含糊不得。（九月廿七日 上海）

打開「新聞報」的商情表一看，凡百貨物都極有漲價的三角形記號，物價全面上漲，真是一觸目驚心！最近米價由六十多萬跳到八十多萬，差不多漲了二十萬元，現在還早秋收過後不久，糧食漲勢就已如此猛烈，轉瞬嚴冬即屆，將來如何得了？報載五萬元大鈔又將發行，通貨膨脹已至惡性階段，物價還要大漲特漲，像我這樣月入只有百萬的小

職員，以及待遇還不如我的，都無法繼續生活下去！這幾年，長城內外，大河上下，都是烽火遍地，戰鼓震天，老百姓流離失所，千萬人血流而犧牲，這是為甚麼呢？而且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打出一個結果來，也就是說，物價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安定，我們再也忍受不了了。（十月十一日 上海）

時與文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發行部
編輯部
經理部

程博
上海文週刊編輯部
上海崑崙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四一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警第一號所用紙類

對峙

讀蒲立特「訪華觀感」……………馬敘倫
 論當前物價的上漲及其特徵……………林滄白
 法國的經濟困難……………郭森麒
 中國少數民族的厄運……………史靖
 論蘇聯的民族政策……………吳清友
 內戰的火燃遍了廣東……………于非
 成都政治風景綫……………何慧英
 湖南的黨團互鬥……………伍人
 益陽慘案紀實……………黃非

7

張君勱的悲哀

何幸之

藝文誌

絃外粗曲……………金穎
 柴可夫斯基……………冬耕
 「虎胆忠魂」觀後……………容方
 吳雨僧與「文學副刊」……………方蘭汝
 樂觀的華脫狄斯耐……………林其民
 藝文廣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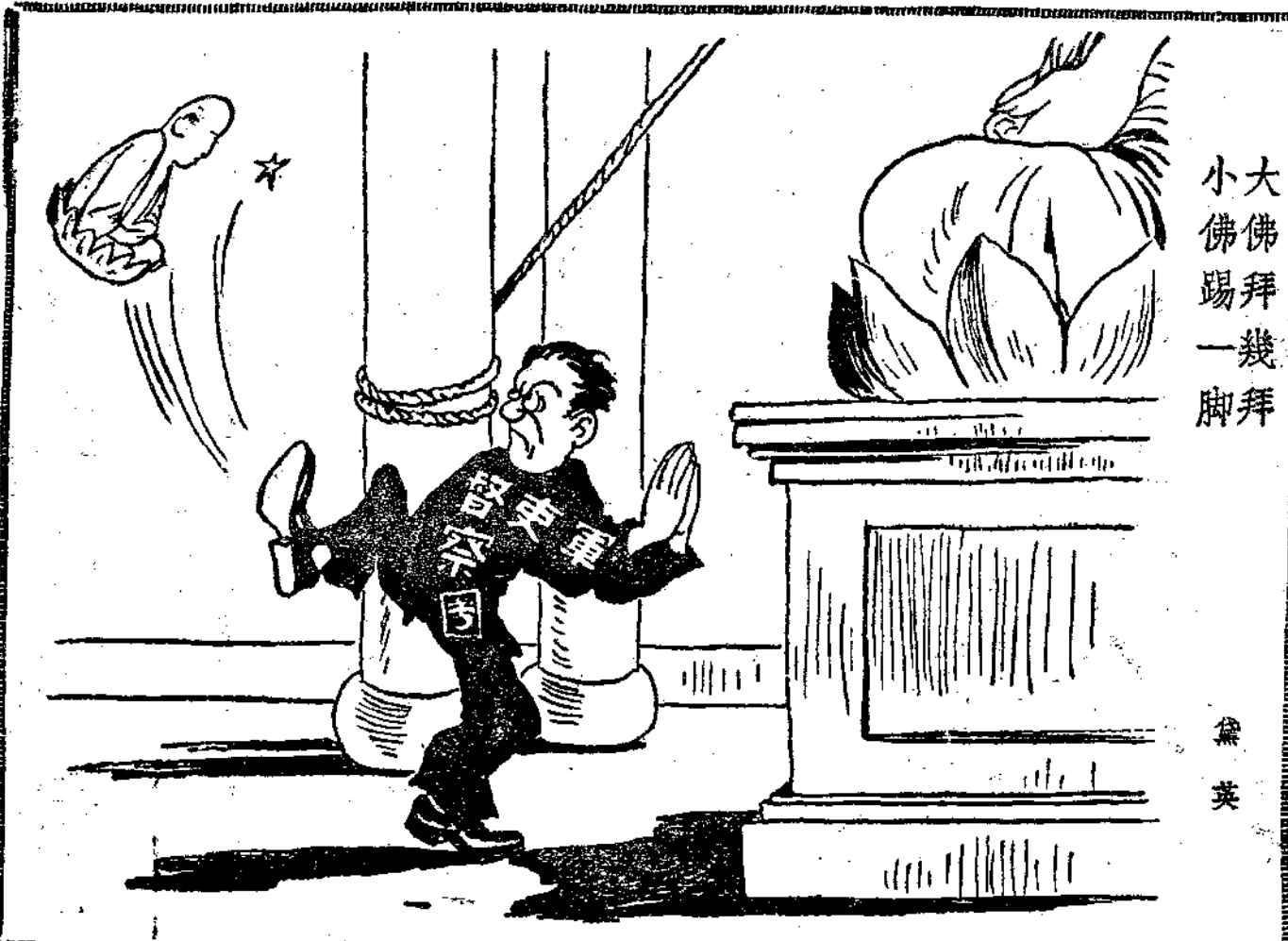
漫畫

黛英·方成·牛斤兩
 木刻……………李樺

讀者之聲

可恥的「同意」……………青島美兵強姦少女
 滿立德建議「石四島」……………今之丘邊
 怎樣替「時與文」寫通訊……………





大佛拜幾脚
小佛踢一拜

黛英



兩斤牛 一名成舉



成方 遇待整調

讀蒲立特訪華觀感

馬敘倫

這是美國前任駐蘇聯大使也會被美國前任總統羅斯福派來中國訪問過的蒲立特先生寫「給美國人民的一個報告」。但我把他激頭激尾地讀了一遍，覺得這是他向美國政府的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在他是孤忠耿耿地爲着「美國的自衛」，到底是不是「爲了美國的自衛」的好辦法，由美國人民自己去批評吧，不須我來多嘴。我是中國人，拿中國人的立場來看，開首見了「防止任何一國家統治中國而動員其四億五千萬人民來對抗我們，這是最關美國切身利害的事情。」「爲了美國的自衛，我們必須採取行動以防止蘇俄統治中國而動員其人力來對抗我們。」這些話，已够使我們中國每個人瞭解到這是美國人自己證實美國的援助中國，原來不是爲了中國而是爲了美國。

從邏輯來說，他怕「蘇俄統治中國而動員其人力來對抗我們」，那末可得到一個結論：美國的援助中國，就是要把中國放在美國統治底下，而「動員其人力」爲美國對抗蘇聯。所以他說：「杜魯門總統能派麥克阿瑟於現有職務及權力以外，加上大使銜的總統私人代表的稱號，飛往中國，……他一定能很快地和蔣主席聯繫在一起，成爲同一戰線上的二個同志。」我們中國每個人都看得明白，麥克阿瑟是日本的「太上皇」，日本是被美國統治了的；美國統治日本的目的，是拿他做對蘇聯戰爭的基地，「而動員其人力」，驅使到戰爭的前線上去的。那末，假使杜魯門總統接受蒲立特先生的建議，果然把麥克阿瑟派到中國，雖然大使和盟國統帥的名義不同，實際還不是來做中國的太上主席？我們看了魏德邁這次使華的情形，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中國不是四強或五強之一的國家？我們沒面孔再提這種話了，但是，就使我們中國已經不够稱強國了，在表面上總還算是一個獨立國家，一個獨立國家的人民，看到了「防止任何國家統治中國」的字樣，應該有什麼感想？至少在我個人，認爲這是侮辱我們的國家，而且把我們四億八千萬的人民，認做該被他們奴役的了，然而竟有希望他的建議成爲事實的，像

聯合社南京十八日電：「一般咸知蔣主席曾要求馬歇爾與魏德邁兩氏擔任軍事顧問，但均遭拒絕。至於美國前駐蘇大使蒲立特建議由麥帥會同蔣主席主持援華工作，尙未產生反響，衆料蔣主席將特別歡迎具有麥帥威望之人物。」這當然不是聯合社無根據的造謠，那末，不能說蔣主席願意來一個太上主席，或者一國兩主席，但是，畢竟有人在希望着「具有麥帥威望之人物」來「統治中國」。這個是「黃帝子孫」？

我聽到本市某大學校方重要人員，叫他的學生們都要讀蒲立特這篇大文；我不曉得這篇大文有什麼值得傳播的價值，而日報，期刊上卻都「大書特書」，不想某大學裏的重要人員還叫他的學生們都要讀這篇大文，那末，這篇大文定有他特別的價值。據我的淺見，這篇大文裏有值得某大學裏叫學生讀的，怕就在第一章裏他攻擊他自己的總統的話：「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羅斯福總統與史太林委員長邱吉爾首相，背了中國，於雅爾達簽訂秘密協定，這個協定，把東北數省的中國主權，犧牲於蘇維埃帝國主義；」和第五章裏「阻止史太林霸佔中國既是中、美二國政府共同任務。倘使杜魯門總統能派遣麥克阿瑟將軍……和蔣主席擬訂一個共同的計畫，以防止蘇聯的征服中國；」這頗有些刺激性。

雅爾達的密約，凡是中國人看了是要憤慨的；但是，我們該曉得這密約爲什麼遲不訂早不訂，偏偏訂在一九四五年的二月裏？那時，日本的侵略的勢力，猖獗得「肆無忌憚」，不但中國不能抵禦，連美國也被攪得手忙脚亂；那時且有中國政府將屈服於日本的傳說；試問不論什麼國家，處到這個境遇，有不先替自己打算的？羅斯福總統這種行動，在當時，自然只替美國着想吧，在這義上羅斯福總統該有他應負的責任，在事實上，中國沒法自保，還有屈服的傳說，羅斯福爲着美國，而拿中國已被日本侵奪了去的權利許給蘇聯，要求他的援助，這種在歷史上有多不勝舉的先例。況且密約裏說：「關於外蒙古、大連及鐵路等項之協議，當須徵得蔣主席之認可，美總統對此當接受史太林委員長之意見，設法徵得同意；」又

說：「三強領袖同意蘇方之要求，待擊敗日本後，必須無問題的予以履行。蘇聯對此，即希望與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協定俾以軍隊援助中國。」那末，最後之責任，不在羅斯福，也不在美蘇了。當時究竟徵得蔣主席的同意，和蔣主席認可沒有，我們現在還不甚明白，不過從勝利以後隨手成立了中蘇友好同盟協定看來，已經有過這個手續；那末，蔣主席可以拿這些來攻擊死去了羅斯福，在我們中國政府還有什麼話說；倒是政府認可了這種密約，我們人民卻被蒙在鼓裏，並沒得到參加認可的權利；那時，還有一個號稱民意機關的國民參政會呢。

由於根據這個密約而產生中蘇友好同盟協定，由於根據中蘇友好同盟協定，而有今日之旅大問題，在主張「剿匪」的人們看來，這是一塊大大的絆脚石，但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謾罵不了人家。如果我們再進一步研究旅大問題，蘇聯為什麼提出這樣的要求？我敢說，這並不是蘇聯對中國的野心，而是對美國的豫防。九月十六日合衆社電傳我們立法院院長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的話：「蘇聯欲使中國成爲他的善隣，但不願中國與其可能的敵國（美國）成爲聯盟。……蘇聯對中國所以不快，由於中美關係過於密切。蘇聯拒絕放棄大連及其在東北的行動，皆係其不愉快的表示。但此非蘇聯欲搗毀吾人的措施，蓋蘇聯此種行動，係防止美國深入的抵制行動」，也就說明這一點。凡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該有「知己知彼」的「深謀遠慮」。我們也不能責備蘇聯，而該諷怨自己；假使勝利到來，我們政府不把美國軍隊引到華中、華北，不叫美國幫助軍運，我想時局不會壞到這個田地；而且訂立中蘇友好同盟協定，或者還有磋商之餘地，而密約上則說，「必須無問題的予以履行」，這當然是怕在擊敗日本以後，英美故意發生枝節，背棄密約。

我們把這種事實弄清楚了，蔣立特這篇大文就減少真實的根據；而他對於勝利以後美國對中國的意圖和行動皆隱匿得一毫不見，卻說：「蘇聯在另一方面却裝備了我們的敵人」。這裏我們要分開兩層來說。蘇聯怎樣「裝備我們的敵人」？自然如他的大文第二意所說，日本投降之日，東北並無中共軍隊，蘇方的計畫是利用馬歇爾所轉旋的停戰時間，儘量把共軍自華北運往東北，而把接收自東北日軍的大量武器，配備共軍，利用停戰時間中共軍隊裝配齊全的時候，蘇軍再行撤退；我們論事，應該就複雜的

因果關係搞個明白，再求結論；如果那時情形果像蔣立特說的這樣簡單，馬歇爾難道「如響如桴」？假使果然這樣，蔣立特去責問馬歇爾吧。我們姑且退一步說，蔣立特說的都是對的，我們還是要追根溯源，只怕是美國的對華政策製造成功的；禍根就是美軍假藉代爲解除日軍武裝遣送日俘的名義，在華中華北做許多在解除日軍武裝遣送日俘任務以外的工作，固然已够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疑懼；如果用蔣立特的邏輯說來，中國共產黨是美國的敵人，那末，從蘇聯立場說來，中共是他的兄弟，打中共的國民黨，也可說是他的敵人，那末，蘇聯可以學蔣立特的話，說美國裝備了他的敵人，那末，蘇聯果然裝備了他的敵人，也是美國自己找來的。這是第一層。

其次，不論共產主義對於人類的利害是怎樣，也不論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人民的利害是怎樣；中國有共產黨，只是中國的事，至多他只是中國國民黨的敵人，怎樣會變做美國人的敵人？如果我們說美國的資本家是我們的敵人，在邏輯上是不是有問題？因爲我們雖然厭惡和反對美國資本獨佔去做他們的後臺老闆，主張援助中國內戰中的一方，使中國的和平被破壞，還影響着世界的和平；但是我們並不把美國的資本家都當做我們的敵人，因爲是沒理由的。照蔣立特的話來說，美國的援華政策，是來消滅美國的敵人——中國共產黨的，那末，我們中國人該大大動一動腦筋，考慮一番，是不是該讓美國來消滅中國共產黨？不管中國共產黨現在是否害了中國人民，到底他們是中國人呀！然而我想蔣立特這種失去理智的話，只是代表他自己，至多只是代表美國的資本獨佔者，我們決不認爲美國多數的人民會和他一般見解的。

在蔣立特這篇大文裏說：「中國獨立對於美國有莫大的利益」；又說：「馬歇爾使命失敗之後，美國對華政策陷入於一種疲倦的冷淡，採取一種漠然地讓中國自己攪去的傾向，這是一種特別危險的政策」；這都是蔣立特坦白地說明美國的援華，不是爲了中國的復興，而是爲了美國的利益；他援助國民黨是要國民黨做他的貓腳爪，向熱火裏抓栗子。而且說起來更可鄙可笑的，原來美國想做最便宜的買賣；據蔣立特說：「中國獨立對於美國有莫大的利益；這種利益，若與我們爲了維持他獨立而所付的代價比較起來，所付的代價實在渺乎其小。」他又說：「我們在三年計畫中的

全部費用，將為十三億五千萬美元。……我們把這筆款項，用作防止史太林霸佔中國，並利用中國資源人力以反對我們的代價，那末，所費並不高。」我們中國人民該不該注意一個國家的獨立，要由外國的援助而得到，這個獨立性該不該研究？在目前現實上，菲列賓已由美國的援助而獨立了，希臘又在由美國的援助而謀獨立了，菲列賓和希臘的獨立性怎樣？蒲立特建議美國化十三億五千萬美元，便可得到中國的獨立，「中國獨立對於美國有莫大的利益」；這樣的代價，現在自然只有美國可以驕傲地說出得起；出這樣的代價，就可以得到偉大的中國做美國的前衛基地，四億八千萬的人民供他的奴役，這樣的代價實在「渺乎其小」；但是我們中國人民賣身的價值，每個人得不到美金三元，拿現在黑市外匯來計算，不過合到法幣十九、二十萬吧；拿現在的法幣和抗戰前的法幣來折合，怕值不到十元吧；把中國及其人口只用十三億五千萬美元買去，真正便宜到無可便宜了。蒲立特替美國打算盤再精不過，不愧是金元國的計畫家；但是我們中國人民願意賣身？願意這樣地賣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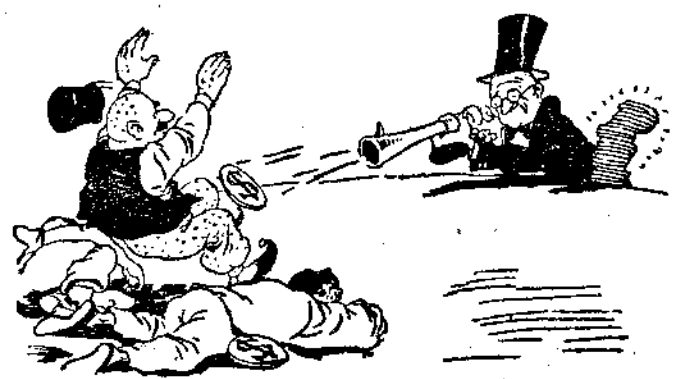
他又說：「我們有數千架棄置不用的飛機和飛機零件，自我國空軍觀點說來，已屬殘廢；但在中國看來，卻是上等物資。將此項物資宣布廢棄而後撥給中國，並不費我國一文，不過是簿記上一個項目而已。假使我們以原價一元作五分的價值售給中國，我們也已賺錢了，因為這批物資對於我們是一無價值的。」我們曉得，沒有國防重工業的國家，向人家買軍火，終歸要吃虧的，所差不過程度問題；至於像蒲立特所說，把在美國一無價值的廢棄的物資，百分之九十五的廉價折扣賣給中國，他們還賺了錢，中國卻拿來當「上等物資」，我們中國人民聽到了該有什麼感想？自然，中國政府要打仗，不能不依賴美國供給軍火，這就不必怪人家吧。可是，美國爲了他自己，拿他認爲「一無價值」的東西廉價賣給中國，使中國政府替他服務打他們的敵人；可是，他們的敵人，還不是蘇聯而是我們中國人民呀！我們想想，就說我們政府認爲共產黨有「十惡不赦」的大罪，他們可還是自己人呀！現在美國人這樣明明白白地說美國援助中國政府，是要中國政府替他打他們的敵人，我們不能曉得我們的政府，對蒲立特的大文怎樣看法？我們中國人民絕對該拒絕美國爲了打擊中國人而給我們中國人的「援助」。

蒲立特建議，強調要他們的政府趕緊援助中國政府打他們的敵人，他和魏德邁一樣而且更具體的指出中國政府政治上的壞處，因此，他又怕他們的十三億五千萬美元白費了，他不但建議「阻止史太林霸佔中國，既是中、美二國政府的共同任務，那末，主張此項信用貸款的用途不應由中、美二國政府共同管理，是毫無理由的。中國方面簽字聲請，而由美國政府的一個代表加以副署，方能取用該項信用貸款。」而且他還建議要杜魯門總統派麥克阿瑟兼做中國的太上主席，這樣就是美國援助中國的獨立！

三六，一〇，二〇。

金元萬能

黛英



點金術

方成



論當前物價的上漲及其特徵

林滄白

通貨愈發愈多，愈流愈快

五月間，財政當局在國務會議報告，承認本年一月至四月，國庫收支，確難適應，收入方面，不過二萬億元，支出則有五萬億元，換言之，紙幣又增發了三萬億元。

最近行政院長張羣在四中全會報告，謂本年一月至八月，政府全部支出已達三十萬億元。如除去一月至四月的五萬億，則五月至八月，支出二十五萬億元。

另據財政當局又一次報告，一月至六月，支出十五萬億元，則五至六月，就支出了十萬億元。七八兩月，支出在十五萬億以上。

由支出激增來看，則財政赤字，入不敷出，愈增愈大，而通貨的發行總額，也愈發愈多了。據估計：今日通貨的發行總額約當在二十萬億左右，去年年底，法幣發行還祇有三萬五千億，到今年上半年底已達十萬億，則今年下半年最先幾個月的發行量就特別增加得快。

據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密勒氏評論報的估計，今年的預算，支出九萬三千二百億元，此預算根據去年的物價編製的，假使今年六月份的物價作爲一九四七年的平均物價，則今年確實支出爲五十九萬億元。以此估計，則今年八月後的四個月，支出當在二十九萬億元以上了。就是說，八月後的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四個月的支出，約當於今年一月至八月八個月支出的總數。在收入方面，財政部長希望今年的收入，是十七萬億，假定如數收足，則僅够一月至六月的支出，其後，則全賴增發通貨，所以通貨愈發愈多，在官方的報告裏，已得到事實的證明，而今後通貨的增發，速度愈快，增發數量愈加是跳躍式的累進，則又可以預料的。

與通貨愈發愈多同爲特徵的，是今日通貨流通速度愈來愈快。由於人民對法幣信用的日見低落，以法幣換取物資的心情，益加迫切，於是通貨的週轉率大大增加，通貨週轉率增大，即通貨的流轉速度增快，而通貨流

通速度增快，其功效與通貨增加相同，今日物價的膨脹率遠在發行增加率之上，此點即可證明通貨流通速度對物價的影響了。現據本市經濟研究機關統計，根據票據交換和許多重要行莊的存款統計出來的結果，今日滬上銀行存款的流通速度，每個月竟不下六十次之多。即是說一塊錢每天可以流動兩次，其流通速度，是可怕的。

生產力枯萎，物資缺乏

據巫賈三先生的估計，三十五年營造業的營業，只及戰前的百分之十，礦冶業的生產只及二十二年的百分之五五，二十五年的百分之四十四，此外農業（包括牲畜、木材、漁產）的生產，爲二十二年，二十五年的百分之九十二，製造業爲二十二年的百分之九十五，二十五年的百分之七十六，運輸業爲二十二年的百分之九十一，二十五年的百分之八十三，商業爲二十二年的百分之九十七，二十五年的百分之九十四，住宅勞務役爲戰前的百分之九十八，二十五年的百分之八十六，就以這個估計來說，三十五年的生產減少，是我們經濟上重大的變遷，而三十六年較之三十五年內戰破壞的程度益加深廣，生產力益加萎縮了。生產力減少，直接影響到物資的減少。

物資短少的情形，隨着內戰的持續與擴大，以及服從於支持內戰的最高原則的經濟政策，處處推殘生產，受戰火直接破壞與威脅的不必說，收購政策的厲行，工業原料的缺乏，以及資金的短少，一般購買力的衰退，離發展生產力的要求愈加遙遠了，而物資減少缺乏的情形，自必益加嚴重了。

物價漲勢，愈來愈猛

通貨愈發愈多，愈流愈快，而物資的短缺，愈來愈嚴重，這個形勢的

發展，反映在物價問題上，則必是物價漲勢，愈來愈猛，跳動的週期愈來愈短，跳動的幅度愈來愈大了。

依上海中國經濟研究所編製的上海批發物價指數，去年六月份平均為二十五年時的四、六二六倍，降至十二月底，僅遞昇為七、九五八倍，故去年半年間的波動，是百分之七十。而本年二月風潮，從一月第五週到二月第二週半個月內，物價上漲即達百分之七十，這次風潮以金潮為首，半月內黃金漲了百分之八十九，美鈔漲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三，均在總指數變動以上。政府的緊急措施，禁止金鈔流通，社會游資都湧向證券和日用物品，故到五月風潮，從四月第二週到五月第一週，這二十天內，總指數再上昇百分之七十七，而同時期內證券上漲百分之一百五十，在總指數變動以上，而食物類，紡織類上漲約與總指數相當。及至九月開始的物價風潮，從九月第二週到十月第二週（十月八日），總指數再上升百分之六十二，而證券僅漲百分之二十七，遠在總指數的變動之下，但日用物品類如米却漲了百分之四十五，食油百分之八十一，棉花百分之八十八，棉紗百分之七十，人造絲百分之一百三十三，故大多在總指數的變動以上。

從上列統計看，物價漲勢的變動，第一個特點，是首由金鈔而轉向證券，繼而由證券轉向日用物品，此即對一般人民生活的影響愈來愈大。再以去年年底總指數七、九五八倍，今年十月八日止高達八八、七五〇倍來看，不到十個月變動在十倍以上，則第二個特點，可知物價跳動的幅度愈來愈大。再看這次漲風：

時 間	總指數
八月十一日——八月二十三日	五七、五九〇
九月二十一日——九月二十七日	六七、五六八
九月二十九日——十月四日	七四、三六七
十月六日——十月十一日	八八、七〇五

從上表看來，則物價跳動不僅連續上漲，並且，更顯示跳動的週期愈來愈短了。

一線上漲，還是可能小回？

那末，物價是不是就此一往直衝，毫不回頭，即所謂就此一線上漲去

了呢？

事實上還不盡然，此次物價漲勢，果然其勢兇猛，跳動的幅度愈來愈大，跳動的週期，愈來愈短，但是，還不至於如此。

物價每一次波動，社會財富隨着再出現一次分配，財富向更少數人集中，而大多數人民將再受通貨膨脹的剝削，一般人的實際所得隨之大大減少，社會總購買力亦將因此大大萎縮了。因此，除出一般日用必需品外，其他物品的實銷，必因此呆滯，這在相對程度內抵銷了物價的漲勢。

同時，隨着物價上漲，一切可能運用的貨幣資本不斷向商品市場傾注，利率就此上騰，當銀根緊迫和利率上騰到商業資本家預期囤貨所得的利潤，不足以抵付其所費的資金後，這時銀根與利息也就多少成爲物價上昇的束縛了。

除此外，如有其他突然的因素，則物價變動的行程也可能發生變化的。由以上幾點看來，物價的波動，將仍是週期性的上漲，中間可能有個間歇的階段。

但是，由這次物價漲勢看來，已可充分看出，這次漲風，不是上次漲風的重複，而是比上次漲風具有更大的規模。而且，每次的間歇，愈來愈短了。更重要的，此次漲風，以米棉二項而論，目前尚是新穀登場不久，棉產也較去年豐富，而漲勢却如此瘋狂，這正顯示出造成這次漲風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城市與鄉村，因內戰局勢的迅速變化，其間的連繫是在逐漸崩裂着了。展望今後，如戰事形勢，依然依着這個基本特點發展下去，而且，通貨愈發愈多，物資愈來愈少的話，則物價將因幣制的基礎崩潰而作直線上漲，是必然的結局。

總結起來說：除非幣制的基礎發生根本動搖，否則，物價的繼續漲還將循着曲線而非直線，也就是說，仍將是週期的，中間可能依然存在着間歇，但是，從上述基本形勢發展的前途看來，瀕臨幣制根本動搖的結局的邊緣，是極其清楚明白的事了。（十月十九日）

外 國	內 國				三個月	十二期
	平寄	航空	掛號	平寄		
一元二角半	六角九千元	六萬元	六萬元	五萬元		
加照	年	全	年	半		

法國的經濟困難

郭森麒

戰後新經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也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深深地體驗到自已舊有經濟體制確有若干根深蒂固的矛盾。如果她要想避免走向敗亡的道路，勢非把經濟體制加以徹底改造不可。本來，法國在戰前與其他先進資本主義的國家比較起來，就已經顯得脆弱了。首先，法國戰前工業的生產比起英美德等國，還是遜乎其後，所以法國在短短幾個月戰爭中，便證實她的工業水準是無法使戰爭繼續維持下去。其次，戰前法國在國際貿易上就有巨額的入超，國際收支赤字龐大。而且法國市場投機之風甚熾，隨時都有引起財政金融波動的危險。

在法國淪陷期間，商業，工業，交通，金融等部門都被德國破壞不堪。此次大戰中所受的破壞，遠較上次大戰為多，而且這些破壞大半都集中於工業區域和交通中心。單以建築物而論，即較上次大戰時多一倍，其餘如路基，鐵路車輛，輪船等損失也不在少數。據一般估計：法國這些資產的損失總在十二兆美元以上，如果戰後法國要想迅速完成重建的工作，就必須有一個通盤的計劃。

法國自第一次大戰之後，全國經濟的命脈便操在少數獨佔資本家的手裏，在這次法國淪陷期間，他們與德國攜手合作，來搜刮法國的經濟資源，其中最大的獨佔資本家波古埃（法國最大的化學工業，冶金工業，和商業銀行都操在他手裏），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間，因接受德國的定貨所得到的純益額便在二億五千萬法郎之譜。他們既然得到希特勒和維琪政府的支持，當然更無忌憚地把中小型的工商業都兼併在自己組織裏面，這樣使法國的資本更集中在他們少數人的手裏了！

光復之後，法國民主勢力獲得了政權，便一致認為叛國的獨佔資本家必須予以清算，所有大規模的企業必須收歸國有，由國家來經營，以便法國的經濟走上嶄新的道路。

兩年來，法國國內民主和反民主的勢力互有消長，因此大企業國有化的計劃不能順利進行，並且美國對法國的威脅利誘，更使法國經濟的復興

與發展增加了不少阻力，但法國全國大多數人民要求着對獨佔勢力澈底清算，認為國營計劃必須實現。據一九四四——四五年法國五次民意測驗投票統計，法國人民只有百分之一九反對大企業國有化的計劃，因此法國雖然在目前經濟危機四伏的局面下，仍然要向着新經濟目標邁進！

莫納計劃

法國要想澈底實行大企業國有化，進而使全國人民生活水準提高，首先就要促進國家的生產。去年法國國家計劃委員會向國會提出了一個四年經濟復興與建設的計劃，因為這個計劃是由法國經濟專家莫納氏(M. Jean Monnet)所主持擬具的，所以又被稱為「莫納計劃」。

該計劃的生產目標：第一，希望一九四六年底能夠達到一九三八年生產水準。第二，一九四八年夏季能夠恢復一九二九年的生產水準，也就是希望一九四八年能比一九三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第三，至一九五〇年希望比一九二九年再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為了要達到這個生產目標，莫納計劃便着重下列六項主要工業的發展：煤業，電氣業，鋼鐵業，水泥業，農業機械，和運輸業。

法國自大企業國有化實施以來，工業生產已經有顯著的進步。例如去年鑛業部門的生產量比一九三八年約增加百分之十六，電業部門的生產量約增加百分之五十，交通工具的生產量平均也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再以最大的雷諾工廠為例，自從一九四四年底收歸國有之後，一九四五年的生產量只有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二九，但是去年十月裏已經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了。

在莫納計劃中，非常重視今年（一九四七年）的建設方案，他以為今年將可以決定今後法國經濟復興與建設的前途，在這一年的內，希望盡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基本的困難，如：（一）人力問題，（二）煤斤問題，（三）財政金融問題。

人力問題

關於人力問題，似乎已經得到初步的解決，法國在戰爭停止之後，會僱用德國戰犯五十萬人，去年起戰犯解雇，國內必須有人補充，據估計在

去年年底復員與非生產事業工人轉業的結果，已獲得工人二三〇、〇〇〇名，今年可由同一來源獲得工人二五〇、〇〇〇名。此外，法國還可採用集體移民入境的辦法，以補充國內人力的不足。關於工人工作時間問題，法國共產黨所支持的總工會（CGT）原則上已經同意接受每週四十八小時工作的建議。今年六月間雷諾工廠雖然發生一次大工潮，但策動這次工潮的是右翼份子，總工會方面始終是站在政府方面的，所以這次工潮並沒有十分擴大。

除人力問題外，法國目前最嚴重的莫過於煤斤和財政金融兩問題了，它們已成為法國當前經濟危機癥結的所在！今年法國是否能夠渡過生產的難關，也就看這兩項問題是否能夠解決了。

煤斤缺乏

今年法國經濟建設各部門所需要的煤斤約在七千萬噸之譜，今年計劃中擬由國內生產五千五百五十萬噸，靠國外輸入的則在一千四百五十萬噸左右。不過，國內生產是否能達到預期的成績還是一個問題。據聯合國統計月刊今年六月號所載法國今年一月至四月平均每月煤的生產為三百九十三萬四千噸，以這個數字來估計今年全年的生產量，似乎與今年預期的數字還有若干距離。今年法國的煤靠國外輸入的一千四百五十萬噸，以目前世界各地普遍煤荒的情形看來，恐怕也不容易如數得到。

現在我們先來看看過去法國煤斤輸入的來源和它的噸量。其情形約如下表（單位：一千噸）

輸入來源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六年
英	六、五〇〇	一、三二〇	七、一八
美	—	二、四五〇	五、一八一
比	四、九〇〇	一九〇	四二六
德	—	—	—
薩爾	一、七〇〇	四二〇	一、二九五
魯爾	五、五〇〇	八一六	二、〇八八
波蘭	一、六〇〇	—	五六一
其他	二、六〇〇	—	一一一
合計	二二、八〇〇	五、一七六	一〇、三九〇

（資料來源：倫敦經濟學人週刊七月廿六日）

由上表可以看出法國去年由各地輸入的一〇、三九〇千噸的煤斤中，由美國輸入的即占五、一八一千噸，約合百分之四十九。這種現象是極端不合理的，美國與法國遠隔重洋，來往須要多花時間，而且運費又極昂。

同時美國的煤價比魯爾的煤和英國的煤都高出兩倍。目前法國正感美元枯竭的時候，要支付這筆龐大的煤款，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法國由波蘭輸入的煤去年只有五六一、〇〇〇噸，今年擬努力增至三百萬噸，不過波蘭也是要美元的，請問法國政府是否有足夠的外匯！

再看法國由魯爾輸入的煤有否增加的希望。魯爾本身的煤產逐年減少，大有江河日下之勢。例如：一九三七年的產量為一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去年竟跌至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噸。本來，照波茨坦會議的決議，魯爾應由英美法蘇四強共管的，但英國已經背棄上項決議案，在美國支持下，把全部魯爾煤礦管理權都搶到自己的手裏，那些獨佔資本家便在背後加以操縱。他們用種種手段阻止煤斤的生產，並且抬高煤價，規定支付工具必須用美元，這樣使輸往其他歐洲各國的數量更受限制了。上月英國因為佔領費用無着，美國才壓迫她把魯爾的管理權讓出來，現在魯爾煤的支配權可以說完全是在美國控制之下。

法國對於魯爾問題是十分重視的，她對任何談判都要求參加，甚至犧牲對德自主的政策，使法國佔領區與英美佔領區合併起來，而不能忘懷魯爾的權利。不過，以過去的情形而論，法國在魯爾方面並沒有佔到什麼好處。按照過去英美法三國所締結關於魯爾煤的協定：如每日出煤二十八萬噸，則提出百分之二十一供作出口，如每日出產三十七萬噸，則提出百分之二十五出口，但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的並沒有得到應得的分配，原因是英國藉口魯爾煤的生產量並沒有達到每日二十八萬噸之數。今年英美法三國不知道開了多少次會議討論煤斤的增產和分配，可是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

至於法國由英國輸入的煤，在一九四五年有一百三十二萬噸，去年已減至七十一萬八千噸，今年英國煤荒如此嚴重，自顧已覺不暇，難道還有餘煤供給別國嗎？

財政金融的困難

莫納計劃所遇到最大的困難要算財政金融上的問題了。

法國目前通貨繼續膨脹，物價不斷上升，財政收支無法平衡，使社會不安，生產困難。據去年九月間法國財政部長休曼氏（Robert Schuman）向國會報告：法國去年財政支出為五八一〇億法郎，收入方面僅有三七二〇億法郎，收支赤字二〇九〇億法郎（還未包括鐵路收支差額，交通建設費，及國營企業費等），今年法國預算尚無可靠的估計數字，但由今年七

月間法國政府向法蘭西銀行所已借的六五二一億法郎的數字看來，也可以推測今年赤字一定是相當驚人的了。

在去年法國財政支出中，一般經費約佔四一〇億法郎，軍事費約佔

一七〇〇億法郎。軍事費合總預算百分之二十九，這個數字與英美兩國（英佔百分之三十，美佔百分之三十一）相較，似乎不相上下，但法國戰後國內經濟情勢是不及英美的，維持這筆龐大的軍事費委實是不必要的。

其次，在法國一般經費的支出上，也有若干不恰當的地方。例如一九四五年對於若干貨品的津貼金即達五〇〇億法郎，佔總預算百分之九。在通貨繼續膨脹，一般物價水準不斷上升的時候，法國政府對於少數貨品的津貼，不但不能平抑物價，反而助長一般價格水準的上升。

誠然，法國近年來實行大企業國有化的計劃也增加了國家不少的支出，但他們爲了要堅持既定的經濟政策，自不能因噎而廢食！

法國這樣巨額的財政赤字要靠什麼方法來補償？據休曼氏自己的估計：去年財政赤字靠通貨膨脹的即達一〇〇〇億法郎。我們由下面所載法蘭西銀行鈔票流通數量和該行貨與政府的貨幣數額看來，便可以知道法國通貨膨脹的嚴重性：

鈔票流通量	貨幣數額（單位十億法郎）
一九三八年（平均）	一〇一、七〇
一九四六年（平均）	六〇五、一〇
一九四七年（七月）	八一六、四〇
	六五二、一〇

通貨膨脹使物價不斷上升，如以一九三八年法國物價爲基數，一九四六年批發物價指數爲六四八，零售物價指數爲六四七；至今年四月批發物價指數已升至八四七，零售物價指數升至八三七，九月份物價總指數竟達一〇九〇之高。

法國政府對於物價的管制是非常不合理的，尤其對於農產品價格的規定。如政府規定小麥只能比戰前提高四倍，肉類可以提高十一倍，牛油可以提高十四倍，蕃薯可以提高二十倍。這樣規定的結果，使農民不願將小麥應市，他們不是把它囤積起來，便寧願把它作爲飼料，這樣使都市糧食更加缺乏，黑市也愈加猖獗。

法國自勝利之後，國內物價水準始終相對的比國外物價水準爲高，結果便是鼓勵進口限制出口，使國際貿易有不利的差額。因此，法蘭西銀行的準備金逐漸減少，法政府迫不得已乃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再貶低法郎的價值——把法郎對黃金的比率又減少了百分之七十左右，計每法郎所含千分之九百的純金由二一、〇〇六公絲降至七、四六一公絲，而每公斤黃金的價格由五三、六〇〇法郎改爲一三四、〇二七法郎九〇生丁，黃金每鎊折合四八〇法郎，美金每元折合一一九法郎。這個法郎對英鎊和美元的匯率一直維持到現在。

但由一九四五年年底法郎貶值到現在，法國國內物價繼續上漲，國際貿易的逆差還是有增無減，照莫納計劃今年全年輸入的價值預計爲一九〇〇億法郎，但今年上半年輸入的價值已達一二〇〇億法郎，所以今年實際輸入量和莫納計劃所預計的大概不會有多大的出入。但輸出方面，無論如何是不能達到莫納計劃原定的數字——一七八〇億法郎，據說現在該計劃已經自動把輸出的數字改爲一四〇〇億法郎了。以美國目前關稅的政策和其他各國一般購買力的低落，這個修正後的輸出數字也不是容易可以達到的。

國際貿易的逆差更增加了國際收支的赤字。據一般估計法國今年國際收支的赤字約在十八億美元之譜，要補償這筆赤字主要的不外靠動用金準備與舉借外債兩種方法了。據聯合國統計月刊今年六月號所載：法國金準備到今年五月間僅有六億九千五百萬美元，在七月間國會辯論中，即有人指出這筆金準備可能在最近兩個月內全部用罄，至於舉借外債，只有乞援於美國。

美元與自由的選擇

法國經濟的確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了！據合衆社華盛頓九月廿三日電：一法國業已向美國提出一連串要求，如遭拒絕，則馬歇爾計劃將延宕六個月方能有效。傳法駐美大使羅萊會以下列二事通知美國：（一）法國將於十月下旬起停止在美國購買貨物，此一行動乃美元缺乏所引起之必然後果。按法國現僅向美國購買油脂、麵包粉、煤。（二）除非覓得一辦法能將上項物品繼續輸往法國，否則法國煤斤生產將減少百分之三十或以上，蓋因工人無足夠之糧食。由於這個電訊，我們充分了解法國經濟情勢的嚴重性，同時也可以看出目前法國政府非靠國外經濟的援助不可。

雖然，法國人民也明瞭當前國內經濟的危機，但他們更不能忘記在這次大戰中所受到的經濟打擊，他們要清算獨佔資本，把大企業收歸國有，實行社會保險，改良勞工待遇，他們寧可縮緊肚皮，也要朝著上述的目標努力。同時他們也知道：如果只靠自己的節衣縮食來實行法國的經濟計劃似乎也太艱苦了，這裏有一條比較簡便的道路，便是取得國外經濟的援助，法國民主份子爲了要獲致國外的援助，以加速國內經濟的復興與建設，即退出現政府也在所不辭。可是，美國援助的條件是苛刻的，法國如果要取得美元，就必須在政治經濟上右轉彎走。法國人民正在十字路口：還是要做希臘呢，還是要美元？十月下旬的法國選舉，無疑是一個嚴重的考驗。但以最近兩年來法國人民奮鬥的堅毅和貫徹，我們相信他們終將利用國際間的矛盾，渡過經濟的難關，走上經濟民主的坦途！（十月六日）

中國少數民族的厄運

史靖

——以一個西南衰亡的民族爲例

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時賢已有許多珍貴具體的意見，此文之作，自無需再一加以重複，祇是借用一個西南衰亡的民族作爲例證，來略述中國的民族政策，和實現政策所經歷的程序，并藉藉此來紀念那些曾經和我在一起生活過的善良夷人們。

正像近代白色人種對待有色人種的狂傲一樣，生長在中原地方的中國人，對待那些四境和內地的邊胞，在有意或無意之間總不免要流露出唯我獨尊的大漢族優越之感。傳統不正確的報導和印象鑄成了牢不可破的成見，在我們的想像中，苗、夷、蒙、藏、羅羅……這些民族的人照例是茹毛飲血的蠻族。偶然有機會親見這些民族的人，總缺少一些友好的心情，不是把他們純然當成一個研究的對象，就是利用他們的樸實忠厚作圖利的打算；專門學術的報告自然不易於改變久遠的成見，而一般性的報導又多半缺乏真實性，往往隨着個人的心情和偶然的經驗做標準，或者把這些民族和這些民族居住的地區描寫成恐怖驚險，或者帶着羅曼蒂克式的或迷世的心情把他們描述成世外桃源，然而不管怎樣，總容易叫人對那些地方發生蠻荒的原始的感覺，則是往往相同的。

抗戰使許多人撤退到西南西北的地帶，縮短了我們和那些邊胞們空間上的距離，但生活上空間的接近，却並沒有縮短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心理距離，而相反的，正因為彼此接近了還增加了許多新的成見。也像白色人種瞧不起弱小民族一樣，仗着物質生活水準的高便卑視多半在窮困中生活的有色人種，仗着物質文明的發達可以任意欺凌生產落後的民族。我們這個國家雖然整個地說來正是長期遭受白色人種壓迫的命運，然而，不知道是故意報復呢？還是自以爲了不起呢？我們對待邊胞的態度，在性質上是完全和白人對待有色人種相同的。再加上若干風俗習慣的不同，中原禮義之邦的人士，照例是看不起奇風異俗的；邊地的人常常顯得忠厚遲鈍些，和聰敏伶俐的中原人士比較起來，我們從外表直到心底，還很有理由地肯定他們不如我們。

這個肯定從個別的地區來說，也許并不錯誤，特別是對比着川滇湘黔

一帶的一部分苗夷（說是一部分，因爲夷人中也有文化很高的）來說，也未嘗不可。不過一旦把這些個別的特殊的肯定擴充爲一個以一概全的公式，作爲對整個民族問題的概念，錯誤固然要從此發生，而糾紛也不免重覆了。這因爲每一個民族都有他的自尊心，都有自認爲偉大的信念，失去了自尊與這信念的民族是不能自存的，因此誰侮辱了他的自尊心，誰打擊他這個信念，他便一定要和誰死拚。除非他已失去了任何的反抗力，他是不會心甘情願屈伏的。而且即使是屈伏了，在那個民族的心情與傳說中也必然要充滿着憤怒和哀怨的。

於今，試放眼自蒙疆繞向西北西南，到處有潛伏着的隱憂，和明朗化了的糾紛，若干還未盡失去自尊和自信的民族，爲他們自身生活之改善正在與干戈開解，由於地理的，血統的信仰的以及生活方式種種關係，這種行動最易和外在的力量匯合，便不免要加增事件的複雜性，傳統的成見稟上現實的反應，我們對於近年以來的許多此類的事件，自然難於得到合理的公正的反應。然而儘管我們覺得這些行動有欠純潔因而不滿，但倘如能對這些民族的處境加以審視，從而追究一下疑難而危險的原因，必然對深深地感到惡果的造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那不僅要牽涉到漢族人民自大狂傲的心情與態度，更要牽涉到因這類心情態度所製出來出的歷代治理邊疆邊民的政策。

評論中國政府邊疆政策的文獻以及報導這政策所發生的不良後果的文章已經很多，自然無需在此贅述。不過隱憂邊患既在不斷地醞釀擴大，合理的處理自不容繼續拖延，而足以阻礙合理處理的那許多成見，不良心理，抽象空洞式的一愛國一觀念尤必須從速予以清除，然後事件的發展，才可能有好轉的希望。

抽象地指出事情的原因和結果，并不能使人增加對事情的了解，因此，我們應該借用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證實前面幾節的敘述。我們不願意引用

正在進行中的糾紛事件，因為那足以引起更多的爭執。這裏，祇述說一個已經在大漢族擴張開拓之下被征服了的且已經被遺忘了的民族，怎樣從他們的過去淪為現在的情況。

地點就在雲南的中部，在羣山峻嶺中分佈着好些羅羅黑夷和白夷，現在正生活在貧窮綫下，在人為的壓迫之後，繼續受着自然的淘汰，體質日趨於衰弱，而生殖也逐漸銳減了。這無疑地是一些充滿了憂鬱和哀怨的民族，已經失去了自信和希望；他們祇能懷念過去的光榮，因此在他們中間流傳着許多和漢族鬥爭的故事，許多頌揚祖先英勇的傳說以及紀念失敗的節日。就從這許多故事傳說以及節日中，我們試着去整理一下他們由盛至衰所經歷的過程，就得到下述的那樣一個程序或者說是一個公式：

一、雲南昔日最富裕豐饒的地區，原都是夷人們的故鄉，「漢來夷走」這句近乎格言式的話，迄今依然深刻地印在夷人的心上，他們都信是漢人的武力把他們逐入深山，然後霸佔了他們的田地。從此，他們便隱藏在深山中，度着艱辛的生活，與山外不相往來。

二、但是這種撤退并不能拒絕更深的影響，最先進入夷區的要算盈利的商人，他們帶着比較花巧而有誘惑性的裝束布飾，騙取夷人的實物和現金。這一方面擾亂了夷人原始而樸實的心情，一方面也就必然要使夷人的經濟的與物質的生活開始有了變化。

三、繼商人而去的，是些手藝工人，他們好像游方的僧侶一樣，帶些必要的工具，漫遊入夷區，對自已說可以多賺些工錢，對夷人來說是逐漸改良了簡陋的建築工具和器皿，甚至還改變了衣食的方式。

四、夷區的富源又誘來一批圖利者，鐵鑛與森林的開發，引進相當多的漢人，漢人自成村落，不同的風習與行為既從這些征服者殖民者的身上表現出來，最易掀起夷人的注意和模仿（但必須注意這些先進入夷區的人，照例都不是漢人中的優良份子，因此他們的言行往往是低劣的，而其影響也自然是不好的了。）而產品的運銷也自然要促進山內外交通的頻繁。

五、滇中好幾次的戰亂，若干深山的夷區一再變成避世的桃源，山中雖然清苦，但和忠厚的夷人相處既容易佔得便宜，謀生自然沒有困難。從此漢夷乃漸有雜居的現象。

夷漢的接觸到此為止，由於商人的狡詐雖然予夷人以惡劣的印象，不過一切都在自然的狀態之下進行，夷人偶然也還可以有些報復的行動，接觸一旦發展到以下的階段，命運便更淪於悲哀了。

六、漢人數目增多，跟着有了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官吏之設置，貪官與奸商合流從此合法的苛雜剝削出現了，僅有的一點被開墾出來的土地被兼併了，夷人失去了自存的依靠了，也消滅了再生產的能力了。

七、過份的虐役，會逼使夷人作過最後的反抗掙扎，但終於為漢人的武力所平服，兵災之後，是改土歸流之類的設施。這時候作為夷人領導階級的土司貴族，正式和漢人互相利用了，夷人的內部固不免分化，而漢人的勢力是更膨脹了。

八、政治勢力侵入之後，文字教育的作用也隨之加大，吸收了一批較有閒的夷人，一方面是專充貪官奸商的走狗，一方面則是傳播着儒家思想，使夷人的意識形態倫理觀念也不能不逐漸隨着轉變了。

九、經過這一連串的影響，更加深了夷人的貧困，用降低生活程度勉強換來的可以自給自足的原始生活也終於無法維持，便不得不澈底地變成漢族文化和經濟體系的附庸奴隸了。

至此，漢族的開拓與同化的目的算是完成了，然而，夷人却失去了他們原有的一切了。

這就是我們對待異族人民的一個具體的例證，參照其他文獻的記載之後，更不妨把這一段歷程當作一個普遍的公式看待，這一類悲劇的結局，也許對於我們自己并不發生什麼反省作用，但對於另一些地區的邊胞則真够警惕，人既不甘於接受被迫害和淪落的命運，在他們還有反抗能力的時候，與干戈開解放勢必是非常合理而又必然的結果。如果我們祇是固執着成見憎惡仇視，問題不但不能解決，也勢必要繼續嚴重而擴大。

「化干戈為玉帛」這句古話，自然也是我們今日的希望，不過歷史告訴我們，僅僅是「玉帛」也并不是有效的辦法，頂多祇能緩和或敷衍一時的危急而已。時代既已不同，在人民的世紀要想澈底解決今日邊地的糾紛，除去必要的玉帛——物質上的補助之外，還需要一種兄弟之誼的關心和平等相處的態度。我們必須給那些遭際不幸的民族以鼓勵，提高他們的自尊心，改善他們的生活，發展并尊重他們固有的語言文字和文化的各部門。如果我們不能立刻做到這些積極方面的義務，最低限度也務必先做到不剝削，不壓迫，不干涉他們的自由，不妨阻他們的改革和進步，并賦予充分自治的權力。（關於具體的方案，時賢議論已詳，恕不多贅。）能够這樣，他們才真正成爲中華民國組成的一部分，而不是漢族的附庸。干戈固從此可以永息，解放鬥爭也就成了不必要的陳跡了。

論蘇聯的民族政策

吳清友

帝俄是多民族的國家，同時也是「民族的監獄」，因為沙皇政府所採用的處理民族問題的方針，是循着大俄羅斯主義的路線而進行，它所施行的民族政策與殖民地政策並無二致。當時俄羅斯帝國境內的俄羅斯人只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而其他民族則佔百分之五十七，即是說，大多數都是少數民族。帝俄政府把這些少數民族稱為「異族」，對這些「異族」，竭盡其剝削壓迫之能事。甚至於與俄羅斯人屬於同一東斯拉夫族系的白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也無例外。

俄羅斯帝國這個金字塔，是倚靠征服少數民族並兼併其領土而建立起來的。瓜分波蘭，掠取芬蘭與遠征西伯利亞，囊括高加索，侵佔中央亞細亞，都是沙皇政府的得意之作。這些邊區的少數民族備受大俄羅斯族的貴族、地主、商人、資本家的榨取和迫害，其結果，一方面是擴充了俄國貴族、地主的領地；另一方面則替俄國的商人和資本家開闢原料來源地並創立推銷商品的市場。

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兩次以帝國主義侵略為基調的，帝俄直接和積極參加的戰爭中，俄羅斯的勞動者固然蒙受了不小的損失，而非俄羅斯民族更作了巨大的犧牲，但事情並不以此為限，它還繼續施行其進一步俄羅斯化和殖民地化的計劃，以對付奴隸的方法，來對付勞動人民，特別是「異族」人民。在帝俄民族壓迫政策之下，在政治上談不到民主，自由，在經濟上談不到富裕，繁榮，而民族文化亦日趨窒息與枯萎。在少數民族的學校中，是不許用本族的語文來進行教授，上法庭也要用繙譯，因為俄文被奉為國語。在這些少數民族中，受害最烈的算是猶太人，所謂「糾察行兇」，是沙皇政府摧殘猶太人常用的方法，而挑撥民族情感，使其互相發生齟齬衝突尤為司空見慣的好策。沙皇政府這樣做，無非是要達到「分而治之」之目的。然而結果却造成了少數民族離心力的加強，要求獨立，自由，解放的運動瀰漫全國，加速了沙皇政權的崩潰。

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成立，其民族政策仍一本沙皇時代之衣鉢，企圖把各民族置於大俄羅斯的沙文主義影響之下，認為「俄羅斯是偉大而不可分的」，「一切分離傾向都應結束」。雖然為着緩和及鬆弛民族運動，臨時政府在表面上會經宣佈信教自由及取消民族限制，但對俄國境內各民族實際的要求，並未予以絲毫的滿足。反而繼續驅使少數民族作帝國主義戰爭的炮灰，藉以爭取「俄國最後的勝利」。可是形勢比人還強，臨時政府終於垮台了。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列寧為首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揭揚「民族自決權直至國家分立權」，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綱領。規定一切公民，不分民族及人種，在一切經濟生活，國家生活，文化生活，社會及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作為確定不變的法律。在經濟上，以蘇俄為中心，盡力協助過去落後的各民族共和國之物質建設，實行全國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藉以從「各盡所能，按勞取償」的社會往前發展。在文化方面，則標出「以民族為形式，以社會主義為內容」，藉以發揚各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提高其精神生活的水準。在蘇聯就這樣創立了包括一百七十多種民族的友好、和睦、團結、合作的大家庭而欣欣向榮。

這裏應當着重指出民族自決權在蘇聯的實施。

所謂民族自決權，就是各民族自身才有權決定它自己的命運，誰也沒有權用暴力去干與民族的生活，去破壞它的學校和其他機關，去打破它的道德和習慣，去排擠它的語言，去剝奪它的權利。

所謂民族自決權，就是一個民族有權自由地去決定自己的命運，它有權依自治的原則去組織自己的生活。它有權與其他民族結為聯邦的關係。它有權完全分立起來。民族是至尊的，而且一切民族是平等的。

一個民族有權自己組織起來，但決不可蹂躪其他民族的權利；一個民族有權自治或分立，但這不是說，在任何條件之下，它都應當這樣做去，這也不是說，自治或分立，隨時隨地都是有利於民族的，換一句話說，都

是有利於民族中的多數人，即有利於勞動者的。自治、聯邦抑或分立，都要依據某一民族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為轉移。

從這裏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民族問題的解決，祇有與歷史條件（從它們的發展中）聯繫起來，才有可能（參看「論民族問題」）。

蘇聯政府在三十年來一直遵重民族自決權。它堅決地否定對民族強制的任何方式；在建立自己命運事業上，承認民族的平等和主權；承認民族鞏固的聯合，只有依照合作和自願的原則。例如十月革命之初，它一方面，允許烏克蘭、阿美尼亞及阿塞爾拜然之獨立；另一方面，帝俄的若干屬地如波蘭、芬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先後脫離俄國而創立自己的國家。這件事情的發生，主要是由於西歐帝國主義列強對這些國家的反動派之慫恿，同時這些民族在帝俄時代備受壓迫，它們一時還未明瞭新政權的特質，對於俄人仍懷着過去遺留下來的怨恨心理，但蘇聯本着民族自決甚至民族分立之主張，對它們的舉動未便干與，祇有等待將來這些民族的勞動人民之自覺，而自行抉擇，這種願望以後為一九四〇年波羅的海各邦之加入蘇聯而實現了。同時這也是蘇聯徹底實施：「保證住在俄國境內的一切民族有真正的自決權」以及「少數民族和人羣自由發展」的正權民族政策的必然成果。由於所採民族政策的合理蘇維埃政府終於能夠把俄國從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泥淖裏解脫出來，順利地結束了殘酷的內戰，成功地擊退十四個國家的武裝干涉，最後擊潰了希特勒德國及其附庸的兇猛進攻，而從事戰後的和平建設與復興。

蘇聯的民族政策雖以「民族自決」為核心，但在運用方面，是隨着具體的情形而不同的。

例如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國，全國政治制度的完全民主化，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必要條件。在每一民族實現了此種民主化的條件下，應當賦予獨立解決自己命運的權利，即是民族自決權，獨立國家生存權。這個方針是與反對舊俄沙皇主義及地主制度的革命鬥爭有着直接關係的。其目的首在排除民族壓迫和不平等。但如果某些民族所居住的區域，是處於某一國家的腹地，而不是邊疆，分立是困難的，在此種特殊情形下，蘇聯提出自治的原則，以解決類似的民族問題，賦予那些民族在本國範圍內，組成國家行政單位，替它們創立民族政治、經濟及文化上自由發展的最順利條件

，使與別的民族建立平等的和睦關係。這個自治原則，在十月革命後成為在蘇維埃聯邦之內創立加盟共和國、民族自治共和國以及民族自治省的基礎。至於尚未形成民族，且無固定領土而散處於全國各地的少數民族，則根據民主的法律，賦予它們完全的自由，與其他民族（包括強大的民族在內）享受平等的權利。此種原則在蘇聯每次憲法中均有明確的規定，尤以一九三六年通過斯大林憲法更為顯著。對於民族的一此種權利之直接或間接的限制，抑或依其種族或民族之區別，而授予公民直接或間接的特權，以及任何民族偏見，抑或仇恨與輕視之宣傳，均受法律之嚴懲。同時為着切實保障民族的權益，「蘇聯最高蘇維埃之聯邦及民族兩院，享有同等的權力」。一九四四年蘇聯進行了憲法條文的若干修正，將蘇聯的國防人民委員會，改為聯邦——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將蘇聯的外交人民委員會，改為聯邦——共和國的外交人民委員會。即是說，將以前完全操在蘇聯政府手裏的國防權及外交權，現在個別共和國亦得獨立享用之。蘇聯採取此種措施，開闢了民族政策的新階段。其所根據的理由：前者是因為在此大蘇聯衛國戰爭中，徵兵普及全國的每一角落，不僅成立了各民族的紅軍部隊，而且也訓練了各民族的戰士和軍官幹部，於是加盟共和國的國防委員會之設立，成為必要。關於後者，遠在蘇聯成立之前，除了蘇聯的外交人民委員會之外，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阿美尼亞、阿塞爾拜然等共和國，均曾有過外交人民委員會之設立；而且在個別場合，曾經與其他國家發生過外交的關係。以後蘇聯成立，因國內外的具體環境，對外關係的一切事宜，均由蘇聯政府統籌辦理，而加盟共和國則無處理對外事務之權。但由於此次反法西斯的戰爭，蘇聯與聯合國的關係日益密切和擴大，為要滿足每一加盟共和國對外事務日益增加的需要，為着滿足每一加盟共和國特有的經濟及文化之需要，最好的辦法，祇有由它們與其他國家發生直接的外交關係。

「這一切措施是意味着蘇維埃國家已達到它發展中的新水準，轉化成更加複雜而生氣蓬勃的有機體了。」在當前國際環境之下，「蘇聯實行的民族政策之新的成功，就必將具有特別偉大的世界意義」（莫洛托夫語）。因為蘇聯的民族政策，是充滿着國際主義的精神，它是在反對大俄羅斯的沙文主義以及地方民族主義的兩條戰線上鍛煉出來的。同時它也與奧大利派的一文化民族自治——以及盧森堡的狹義愛國主義不相容的。這就是蘇聯民族政策本質之所在。

內戰的火燃遍了廣東

于 人

「土匪」與「

奸匪」

內戰之火已自北國蔓延至華中了。華南方面，廣東境內的星星之火，亦有擴大燎原之勢。

一百零三縣市內，留下了嚴重的「治安問題」。九月十日，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在出席廣東省警務處警務會議時，曾指出「匪」情的日趨嚴重，強調此後必須促進軍民合作，嚴明軍隊紀律，始能肅清「匪」患。

當局所稱的「匪」是些什麼人呢？是「土匪」與「奸匪」。有人認為：「土匪」是指一般匪徒而言，「奸匪」則是共軍及武裝民變的別稱。廣東當局認為「治安問題」最嚴重的地方首推海南島（尚未正式改制），次為南路，至於東韓江及粵北、西江及中區，則較為平靜。

海南島上

經過日人統治了六年的海南島，勝利後由於當局措置的失當，兩年來，人民還是在極度的紛亂中過活。島上的十六個縣份，大部為以馮白駒為首的「瓊崖縱隊」所控制，據可估計，所部現約有一萬多人（另一傳說為三萬多人）。政府所能控制的，是一些點綴，如海口（瓊崖的唯一大商埠），府城、三亞港、榆林港、崖縣等地，最近保亭、白沙、樂東等縣縣城相繼失陷。

儋縣正遭圍攻，瓊山要鎮東山城亦告不守，海口緊急。海口西南約十五里的府城為中央及省政府駐瓊機關集中之地。在此早已成立了「瓊崖清剿指揮部」，由專員蔡勁軍兼任指揮官，黃治國任副指揮。至島上的十六個縣，其中有十個縣亦已調派軍籍人員充任縣長，似已決心繼續

「清剿計劃」。

然而，因為生活日艱，治安未妥，交通困難，不但使全島陷於衰落貧乏的不安狀態，從而更增大了「瓊崖縱隊」的勢力。

南路及雷州半島

島

南路的陽江、電白、化縣、吳川、茂名等縣，以及位於粵桂邊境的防城、欽州、靈山、藤江、信宜、還有雷州半島上的遂溪與湛江市四週各地，是粵南一萬多「奸匪」出沒的地方。湛江市近曾實行夜禁兩月，入夜十一時半即行戒嚴，亦坎與西營間的交通亦告停頓，市面呈一片緊張狀態。近據本市報章消息，廉江縣除縣城之外，實已全部淪陷。而以十萬大山為根據地的「奸匪」亦甚活躍。當局近成立了「粵桂邊區指揮部」，與前經成立的「南路剿匪指揮部」聯合對付。

東韓江一帶

此外，東江沿岸的增城、博羅、河源、龍川和紫金等縣；靠近粵北的從化新豐；九連山下的和平、連平；韓江方面的揭陽、普寧、潮安；鄰近福建的饒平；廣海的海陸豐邊境，都有號稱「廣東人民前進救國隊」和「人民解放軍」的「奸匪」，人數據說約有一萬多，分股流竄，東剿西擾，使當地的團體甚感疲疲。這些「奸匪」，大都是四五百人結聚一地，人數雖少，却出沒無常。據近日報載，東江一帶往來船隻常有被襲擊的情事發生。下游惠陽博羅間的譚公廟蘇村經常聚有「土匪」三四百人，上游惠州與河源之間亦有三百人。八月二十日，惠陽縣馬坪山與龍崗界之間

，就曾發生過「匪」徒伏擊惠陽縣長梁國材的事，縣長被射傷，縣府科長、衛士及搭客多人亦中槍身亡。同月中旬，新豐縣長羅聯輝子進剿當地黃沙坑股「匪」時，為伏「匪」所襲，身中數槍，受傷後被股「匪」擄去。至八月廿六日，當地團隊前往縣屬林深鄉的黃京卯、西坑等地圍剿「江北人民自衛隊」，救出了被擄鄉民五人，但縣長迄未脫險云。

粵北的山岳地帶

帶

在山多林密的粵北境內，以靠近江西大庾嶺的南雄、始興及翁源等縣的「治安問題」最為嚴重，次為仁化、英德及花縣。據一般估計，此一地區的「匪」衆亦有數千，真實情形如何，不得而知。

西江沿岸

西江沿河一帶的縣份，地方治安目前還不致大成問題。但是近有「奸

，設卡收稅，但甚少搶掠的事。近據省參議員何敘霖的談話，南雄縣是粵北「匪」情最嚴重的地方。他說：「刻接南雄黨團參議員來電，本縣「匪」勢甚全縣，「匪」黨真有攻城檄，人心驚恐；又據南雄電話，「匪」黨襲擊城外珠璣鄉，激戰數小時，縣城商店受驚，紛紛閉戶，現地方人士正協助政府剿匪。查南雄「匪」黨人槍千五百餘，且以南韶路橋樑為「匪」黨焚燬，交通不便，誠非單靠地方力量所能肅清。……「匪」黨仍有建立粵湘贛邊區根據地企圖，望軍政當局勿以地方股「匪」視之，迅派大軍掃蕩，以免全縣陷「匪」手，造成一如南路一帶的局面。」

匪」二百人進攻西江的都城；高明邊境也發現了「奸匪」三百餘人。至西江河道上則常有「土匪」劫船的事發生。在如此政治情勢之下，中國是不會有尺寸安甯之土的。比較起來，西江一帶目前還算是平靜的，但還恐怕只是子彈插在牆上的平靜吧。

「中區」與廣州市

廣東省的「中區」是指南海、番禺、順德、中山、新會、開平、恩平、台山、新興、赤溪等地。目前除了中山、赤溪、新興、開平、恩平及台山之外，其他各地似還沒有「奸匪」發現，但搶劫案則頗有發生。警衛森嚴的廣州市內，劫船、劫車、擱途截劫等事，幾乎每天都少不了。通往東西北江的河道上，「土匪」常聚衆洗劫來往的般隻，打單勒索之聲時有所聞。

月前赤溪縣黨部書記長陳慶雲在由穗返鄉途中被殺死，九月五日，中山縣第三區西海鄉曾發生征糧血案。事緣古鎮田糧辦事處駐西海鄉辦公處於九月五日派職員及士兵多人

，前往四沙一帶催收卅五年欠賦，旋將欠賦農民拘返押追，致突被農民百餘人包圍截擊，並隨即湧到將古鎮田糧辦事處包圍射擊，死傷多人。據此間報載，此次四沙農民暴動的主因，是該地農民前已繳田賦達百分之六十，惟當時無「糧串」（即收據）發給。其後辦事處主任易人，對於此種已繳田賦未領「糧串」的，一律視為未繳，限令依時十足繳納，不遵者則拘案押追，農民無力再繳，便只得起來反抗。

當局的對策

事實證明廣東的「治安問題」已日趨嚴重了。近省參議會亦曾建議省政府：（一）請通飭各縣以最有效方法平抑物價，一面在可能範圍內，撥款興辦農田水利，及其他生產事業，收容一般失業人民，俾生活有著，不致淪為盜匪；（二）請派遺得力團隊，擇要駐守，以便巡邏，而實防範；（三）請各縣務將現有縣警兵名額，依照編制補足，以維持治安。而行轅方面據聞亦將成立六個清剿區：瓊崖、粵桂邊區、粵北、粵東、

問題的癥結

省參議會的建議，指出了造成「治安問題」的因素，而下面的兩件事實，或可作為當局「杜匪」與「剿匪」的借鑒：（一）前被伏擊未死的惠陽縣長梁國材，近被免職，惠陽民衆莫不眉飛色舞，並分電省府請將彼扣留。梁國材知情，於九月十八日夜藉名劇「匪」出走，民衆以掃把及對聯相送，中有一對為：「一竅不通，病商害民誤國；千夫所指，貪官污吏庸材」。（二）龍川縣政當局近訂定緩靖辦法，凡有子弟從「匪」，其家屬財產一律查封拍賣。後有縣屬黃石鄉婦路王氏，因其夫賈亞安有附「匪」嫌疑，被縣府扣押，勒繳贖銀一千元。又有裕德號店東賈亞炳，因其子附從「奸匪」，所有貨物被團隊搬取一空，其子因被扣禁，繳花紅一千元。

有一個剛由江西贛州來穗的湖南籍軍官，在談及粵北「土匪」時，搖著頭說：「廣東的「土匪」最麻煩，「土匪」就是老百姓呀！」（十月十四日寄自廣州。）

獲釋以後



本刊訂戶注意

- 一、訂閱本刊務請照本行現行訂價一次匯足，俾免折算延擱。
- 二、匯寄訂款務請檢視匯票是否入封，空函恕不答覆。
- 三、姓名住址務請寫清楚，萬勿草書，以免貽誤。
- 四、大額（千元以上）郵票代洋，十足收用。

成都政治風景綫

鄧家班死力掙扎

「六二」的意義，在成都是雙重的，除了是「反內戰日」而外，又為鄧錫侯與主席走馬上任之期。可是，不幸得很，主席是太被好運冷落了，上任以後，災荒接連發生，鈔票荒，水災，米潮……大概還是日子沒有擇好，而其前夕的「六二」大逮捕，犯了凶星照命，也非無因。

鄧主席是大逮捕在名義上的支持者，然而，事過之後，似乎又有些感到不安，總怕沒有標準「政治行情」。雖然他受制於人，一切秉承上峰命令辦理，才下此毒手，然而責任究竟落在自己身上，因為地方紳士，很多不同情他這一措施，也有人這樣說：「這樣胡搞，簡直要逼人上梁山」，於是，主席怕了，怕地方關係搞得不好，而失去政治本錢。

不久，綏靖公署在一再請求保留下仍被撤職了。八月初旬，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出巡到了成都，報上便大登特登，說綏署暫不裁撤，又說將設立行轅副主任公署，但到今天

為止，傳說只是傳說，並無兌現的跡象，而事實上，警備司令部職權擴大後，現由重慶行轅直接指揮；最近，更盛傳要設立全川警備司令部，由關麟徵主持。據說鄧主席有些消極了，他的僚屬們也不免慌張起來，因此，就掀起了澎湃的爭官狂潮，要作吃一嘴是一嘴的打算。

遠在五月初旬及七月上旬的兩次米潮時期，雖然許多人又認為這是出於異黨鼓動，但黨方却有人說：成都的米潮是政治上的一個「謎」。歸根結蒂，田糧管理處這個肥缺叫人看了眼紅。

綏署裁撤後，又還空增加許多必須照顧的失業人員，於是他們利用黨方與政學系的不調，與黨方勾結，在攻擊政學系的旗幟下統一起來，發出了致張岳軍院長的一封信，各自治達直接打擊政學系留川勢力的目的，與進一步取而代之的做官目的。那封信的內容，主要是四項詢問：

(一)省府秘書長鄧漢祥在四川一隅前後迴旋二十餘載，塵埃滿面與情，而反「將川康興業公司、省銀行、田糧處、財政廳等所有川康經濟機構任遷：猶疑者謂漢祥為閣下（指張院長）拉虧巨款，去則水清石現；或謂便於吸收西南幹部包辦選舉……或謂監督鄧錫侯防其對閣下不忠……掩護個人，而招全川怨仇，此望閣下答覆者一」。

(二)都江堰之崩潰，使成都百萬生靈坐受空前水劫……何伯衡（現任建院廳長）自是閣下嫡系，管理私財多年……但川人實難受其痛苦，望閣下答覆者二」。

(三)民盟領袖張瀾……利其為政治外圍，策動政協，擴充責任內閣，使共匪得有間隙，集中裝備，內外勾結，造成今日之局勢……已拘之張致和范濤等暴動分子，公然電令釋放，其意安在，望閣下答覆者三」。

(四)搶米惡習二十年由閣下開例，今日此風更熾……將何以善其後，亦望有所指示」。

這是譚肇甫等六百二十五人連署的一封信，鈔印為傳單，在各處散發。

是徐中齊，他現為四川特委會的負責人。去年六月張軍向主川政時，受張軍限制，不能為所欲為，頗不得意，又曾一度被撤職，落魄南京，而今由於情勢變易，來川再整旗鼓，駕輕就熟，自然一帆風順。他對鄧主席及其僚屬影響很大，因為他是可以直接上奏蔣主席的。八月十八日，全川專員會議閉幕的那一天，據與會的人出來說，當時徐氏以省黨部執行委員名義，居然出席講話，說：「民盟、民促、民建、民聯這幾個團體，是我們仇人……以後凡有關係到他們的案子，將人辦了就是，最好不必往上海報……你們別看京滬對付得那末好，那是做給外國人看的……六人一插人，成渝兩地因辦得很有成績，就得了上黨嘉獎……真是驚人的坦白！但他不但對敵黨如此，即對民青兩黨，也並不見得怎樣客氣哩！」

民青兩黨不甘雌伏

八月中旬，瀘縣青年黨籍的兩位負責人（一位姓游一位姓劉），因為揭發瀘縣選舉舞弊，被殺害了，青年黨就是臉皮再厚，也忍無可忍了，於是，一時喧嘩紛飛，像煞有介事地抗議、交涉、追悼。其黨報新中國日報，且以第一條標題，揭穿了友黨「上層對付，下層打擊」的陰謀，並聲稱有確實證據。更妙的是以前新中國日報最先稱中共為「共匪」的，現在政府明令正名之後，反而忽然改稱「共軍」了。無論在標題與其專電中，皆是如此。然而，國民黨對這些抗議、暗示、威脅，都並不需給以反應，正如美國對孫科副主席的談話不需要反應一樣，「相應不理可也」！這就氣壞了，更急壞了青年黨籍的一批國大代表們以及成都青年黨的主要負責人。他們連人就說：「當日拉我們退出民盟的時候，好像要他碰頭都幹，怎麼，今天就不認賬了？你的，他做他的，國民黨的幹部們怎麼會賣民青兩黨的賬呢？」

競選人依樣葫蘆

到今天，成都瀾漫着競選熱，街頭巷尾，茶館酒肆，都是一競選」。各個報紙也投機地開了「競選立委國代」專刊，依次由競選人發表他們的主張。青改制，「耕者有其田」……真是五光十色。同時某某已回原籍參加競選的消息，也是每日都可從報上看到。他們回去之後，召集士紳，詢問地方情形，幾乎是一套公式，得到的回答，也總是一樣：「我公望學望重，一致支持」。凡是競選者還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現職有地位的官吏，現在是官，以後怕還要兼為人民的代表哩！到此，我頗有所悟，「中華官國」，此之謂也。（十月四日寄自成都）

湖南的黨團互鬥

伍山

黨團的磨擦，在今日被指責為腐敗無能的政府裏，可說是件公開的祕密，無人不知。而表現得最尖銳、卑鄙和無恥的地帶，恐怕就要算湖南了。現在黨團在湖南人的心目中，像兩條可怕的毒蛇，談之色變。無論發生什麼事，人們的腦子裏都會閃現出黨團的魔影來，認為必定是黨團糾紛在作祟。凡是利權的地方，就有黨團鬥爭，凡是有鬥爭的地方，都有黨團的背景。在這裏，試拿具體的例子來說明。

邵陽「官匪」案的內幕

不久以前轟動全國的邵陽永和金號的慘案，表面上看來，彷彿真是「官匪」案，其實乃是黨團一場鬥爭。原來永和金號是黨方組織的一個金融機關，預備依仗着它來活動「大選」的。不想此一秘密，竟為團方知道了，於是握有實權的團（按當時設立於邵陽的湖南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的專員孫佐齊，為本案之從犯，已被判徒刑十年，即係團方

人物）便利用權力，將黨的這一金融機關，全力加以摧毀，這就是後來鬧得翻天覆地的永和金號慘案。該案主犯傅德明（已判處死刑），這一自認在「中國不合理的黨派鬥爭」下的「犧牲者」，最近寫了一封信給湖南日報的記者，這樣說：

「一鳴先生：對於你的訪問，我非常感謝。一個新聞記者，應有誠懇的態度與真實的修養，對任何事體，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場，用客觀的眼光來觀察，從各方面去研究，不主觀，更不可人云亦云。這許多條件，你都能具備，所以在我一個真正新聞記者面前，我也願意說幾句真話。我讀了十五年書，做了十年公務員，今日並非窮迫到必須鋌而走險之一途，難道甘心情願的落一個萬人唾罵的臭名，做這樣不法的事情嗎？我也不是傻瓜，決不會為了婚姻問題，而將寶貴的生命作輕易的冒險，這裏面是具有非常複雜的原因的。如果將所有的罪惡全部推在一個無辜的女孩子身上去，使她在精神上遭受嚴重

的打擊以後，再加上額外的刺激，我感到非常痛心。這種說法，完全是另具作用而不合邏輯的，因此我更想說幾句真實的話。我本來接受你的提議，準備把這一事件從開始到今日為止，在我本人心理上的變化全部過程作一個系統的分析，以提供心理學者作研究的參考資料。但是要寫心理上變態的因素，勢必要暴露事實的真相。這種內幕情形，如果刊載到外國的雜誌上，是會遺笑于外邦的。究竟我是一個中國人，不願意再出自己國家的醜。因此經再三考慮的結果，還是取銷了原意。但是我警告你的，就是我們生長在這樣一個黨派不合理的鬥爭的時代中，可以說是我們的時代不幸！一個政治慾望很高的人，沒有機會給他進入正當的途徑，於是苦悶與誘惑，迫使他走上了邪道，偶一不慎，就作了政黨的犧牲品。我就在陰謀的策動下，加上慾望的引誘，又受了良心與道德的感化，結果，却造成了毀滅自己的悲劇。

當初我會企圖將真情向一位毛先生陳訴，但是

却沒有適當的機會。所以不願意在法堂上供述，自然其中有不得已的苦衷的，因為那時我還不相信我是被出賣的。現在事已至此，我亦決不怨天尤人，我生活得很平靜，一切聽諸天命而已。專此佈達，並頌旅安！

傅德明手啓，八，廿六。這封信在湖南日報發表後，邵陽地方法院檢查處以該信作證據，再三質詢，據供：某方為了集中競選的人力與財力，故組織了一個集團云云。這裏他所指的「某方」，無疑即上述的黨；而他信中所謂的「黨派」，當然是指的黨和團。即使現在在統一黨團組織的建議案被通過之後，這種笑豎相的現象也仍然是越燒越厲害，越燒越蔓延開去。這不是誇張，也不是聳人聽聽，而實在有事實為證。

衡陽血案

九月十三日日本市的官報中央日報刊載這樣一則新聞：「衡陽近因競選而發生之流血事件，據悉國民黨員致死者已有多人。刻衡陽縣黨部書記長唐清

和已率該部全體執監委員，于十日晚督省，次日即謁省黨部張主任委員煩，報告經過，并提出請求二項：（一）從速採有效辦法制止恐怖事件之繼續發生；（二）如不克達成上項任務，即請省黨部明令撤退衡陽縣黨部及所屬各黨務機構，以策安全。記者昨夜晤省黨部張主任委員，談及此事，張氏表示悲憤萬狀。……張氏以痛心之語氣告記者稱：「此事件之一面，固已昭然若揭；但另一面則實為本省一嚴重之治安問題。在王主席倡導「治安第一」之口號下，陰謀者竟肆無忌憚，誠令人為之悚然！」

在此大選前夕，這只是黨團鬥爭的開始，精彩節目，還在後面。最近我們一打開長沙的報紙，每天都可以看到黨團鬥爭的新聞，什麼兩派將有競選鬥爭哪，什麼兩派競選鬥法哪……有時黨方甚至指團員為共產黨，或者團方指黨員為共產黨，紅帽子滿天飛。在這裏，讓我抄錄本市九月廿二日力報以「革誰的命」為題的短評：「據說黨團鬥爭，全

國以湖南為最烈，全湖南又以衡陽為最烈，看了省黨部唁慰死傷黨員家屬的電報，這個「據說」，却無法否定它的真實性。省黨部撥給衡陽黨員的治喪及醫療費，總算犧牲者獲得了代價，但是，我們覺得：這個三民主義的信徒，被那個也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打死，犧牲雖有代價，犧牲却無意義。參加黨與團，是為了革命，黨團的領袖們，時常昭示三民主義的信徒說：「努力完成後期革命的工作。」難道這個三民主義的信徒打死那個三民主義的信徒，就是「後期革命的工作」嗎？其實明眼人都不難看出，力報的這一短評還是替黨團、替憲政、替選舉作遮羞師非之用的。三民主義的信徒云云，後期革命云云，自娛而已，騙人而已。傅德明的那封信自然旨在替自己洗刷過失，但是也供訴了一個事實：黨團人物的「政治慾望」就是搶奪奪位，為了這個目的，任何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於是而有同室操戈，於是而有笑豎相前。（九月廿五日寄自長沙。）

益陽慘案紀實

黃非

學生又一次被槍殺了。地點在湖南益陽，時間是三十六年國慶日，死傷達四五十人之多。

「球我們打不贏，打人！」

箭蓬雙十，當然應該大事慶祝。開了一個會，演了一通說，少不得又有一點餘興，像什麼籃球比賽之類的，何況又碰上大人先生們高興，鑄了八個銀杯，算是「彩頭」？

比賽的雙方是連軍隊與五英隊。前者是團管區的官員代表隊，後者是益陽幾個學校義員生合組而成的雜排軍。這年頭，碰上穿黃綠制服的，自然應該讓三分，可是五英的隊員偏不識相，硬要現本事，眼看時間就要到了，連軍連輸三分球，於是惹怒了團管區的官員們，一聲呼喝，汪副官主任脊榮跳進場來，大聲喊道：「球我們打不贏，打人！」

「打死幾個再說」

這一喊，可嚇壞當評判員的縣中校長，他馬上上前低聲下氣說好話，那曉得汪主任置之不理，而且更言：「打死幾個再說」。

「旋即調來三四十個兵士入場，鳴槍示威，肩扛（槍得小販的），竹槓，槍托，刺刀，瓷磚，皮帶，向羣衆揮，砍，擊，追逐奔馳。頓時秩序大亂，羣衆四散奔逃，有的跌入塘中，有的滾入堤下田中，繃繃小孩於出口處被擠倒踐踏，哭聲震天。當即打傷兩個學生，正待挾走，學生遂羣起救護，並圍着肇事首領汪春榮，擬扭送五區專員公署，依法處理，但專署衛兵竟不敢收受。於是學生擬再送頭堡益陽縣警察局，而團管區士兵多人，荷槍實彈，如臨大敵，由司令部及新兵大隊分兩路衝出，至西門口會合，再向頭堡

追擊。一部把守青年路口

，一部由縣黨部後門衝入，轉向參議會搜索，逮捕學生數人入城。臨湖新兵營。繼由兩路沿街向上直追，至賀家橋已槍聲大作，見穿制服者，不問青紅皂白，橫加毆刺。往前勸阻者，亦遭同等待遇。又有與團管區稍有認識的人上前求情，其答覆爲「有口頭命令」。警察勢力孤單，恐怕當衝，避在一邊，呆若木雞。直到三聖殿（隔體育場至少三里半路了）才追上學生，將肇事禍首奪回，並捕商乘職業學校學生一名，沿途用槍刺毆而返。事後據稱福星宮門口還架着一挺輕機槍。

血的數字

學生又一次被槍殺了。這一幕絕妙的巷戰鏡頭，就如此演出。「雪亮的刺刀，刺入了無抵抗的學生的胸膛，鮮紅的血，灑滿了美麗的益陽的街頭」

六大罪狀

（學聯會的宣言中語）。據事後的調查，共計中小學生輕傷三十九人，重傷六人，失蹤八人。三人翌日不治而死。此外尚有各保校及龍州師範迄未調查清楚，而市民傷亡損失也無法估計。

忍耐也有限度

中國人民是頂能忍耐的，但忍耐也有限度。鮮紅的青年人的血，使他們憤怒了。於是大夥兒不約而同的聚合起來。剛巧碰上團管區的官員們正在民衆食堂舉行「集團結婚」，吃得酒酣耳熱，羣衆在悲憤之餘，加上這又一層刺激，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湧上前，打得個落花流水。——誰說人民不會反抗的呢？

「深爲震怒」

民衆所以會這樣同情學生，痛恨團管區的軍人，另外一個原因，也是不可忽略的。原來團管區在民間積怨已久，這一次不過是把歷來的冤恨一齊發洩出來而已。長沙湖南日報列舉了團管區的六大罪狀：一、強買強賣，人民敢怒而不敢言。二、動輒仗槍桿勢力，逕自逮捕或毒毆人民。三、兵役案件，弊端千萬，有錢者生，無錢者死，連長警官不問兵之身體，只問有錢沒有錢。四、各級幹部驕橫奢逸，氣勢凌人，揮金如土，人民爲之側目。五、團管區自以爲是大得不得了的機關，偏偏要舉行什麼「團管區第一屆集團結婚」。而在慘案發生後，高級官員，還多在那裏飲酒作樂，全不理會外間的交涉。六、在集團結婚中間，七對中有六位新娘都是來自鄉下；據說此等青年女郎，均不甚願意，然

收場

益陽慘案的發生，自然少不了一番代電宣言，自然也會有當局「驚聞此訊，深爲震怒」，自然總要撤職和宣慰一通，如是而已。根據以往的經驗，我們知道，是不會再有什麼結果了。

儘管大談其民主憲政，人身保障，然而學生總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槍殺了。人的生命，這樣不值錢，人的血，這樣容易的白流。憤怒和抗議，這樣沒有力量，血寫的悲慘的教訓，這樣容易遺忘。這到底是一樣的時代，怎樣的時代？（十月十五日寄自益陽）

本刊合訂本第二册（十三—廿四期）已出版，附有分類總目錄，用精美封面紙裝訂，極便參考珍藏或饋贈，定價低廉，僅收回成本四萬元，數量無多，售完爲止。

張君勳的悲哀

何幸之

一、「君勳雖老，風情可愛」

張君勳對於國大選舉，確是煞費心機，對內，他必須把握住這好時機，收集黨員，增多黨員，以提高其「領袖」的威信；對外，他還必須會要手段，擺姿態，而同時不失「政治家」的風度，以提高政治身價。儘管烽火燒遍域中，張君勳的眼睛仍然巴在國大選舉上面，原因在此。張君勳雖然和青年黨有爭寵之嫌，時生意見，然而關於選舉這件事，他又不能不和曾琦採取聯合陣線，有計劃的一齊向政府伸手。張君勳爲此事曾不惜躬親南京一行，謁見當道。結果怎樣？請看中央社十月四日電：「張氏返滬前語記者：關於選舉提名事，原定今日與陳立夫再談，因昨日陳氏與青年黨方面商洽未獲具體結果，故未再談，今日亦未與政府其他人士接談」。張氏當然不願就此罷休，原電說下半段接著說：「吾人對民社黨名額並不堅持，對民社黨立場言，行憲後之政府，不必一定爲聯合政府，如能一黨代表大多數人民，則由其單獨執政，亦無不可。」還有漂亮的話呢：「如在此情況下，民社黨願退居在野黨地位」。這一篇談話的趣旨是甚麼，凡是稍有政治頭腦或是娶過小老婆的人，都不用多向他解釋了：「好！你連一付繩子都捨不得麼？要男人又做啥仔呢？我得放你離婚！」如此而已。故張君勳有數十年交情的某名人曾有評語謂：「君勳雖老，風情可愛」。「民社黨」這塊招牌現在已變成時髦婦女的手皮包了。然而事情之壞，並不止此，京滬各地的參議會却又此鳴彼和的打起助陣鼓來：報紙上喧嚷着「反對政府遴選民青兩黨參加地方參議會」的新聞，首外之音是：「有本領自己去競選哪！」張君勳雖有時髦的手皮包，到底還不敢弄假成真，於是沉默不答，

他的發言人也祇有表現一個醜惡的姿態：「看你政權怎麼！」「這幾天，張氏已經準備提出名單，看來是金子得不到，銀子也就夠貴了。」

二、昨改「共軍」爲「共匪」 · 今朝又叫劉將軍

張君勳的民社黨，有個機關刊物叫「再生」，歷史很久，銷路很少，據正確的估計，黨外銷行不過二、三百份。此自不能怨編輯無能，主要還是因爲民社黨（張君勳道一派）的聲譽低落的緣故。政府頒行總動員令後，「再生」爲奉行國策黨策（君不見三黨協定乎），亦即遵行政府命令，改稱「共軍」爲「共匪」，此在一八〇、一八一、一八二各期均可見到。然而當牛月前「共匪」劉伯承率部南犯豫鄂皖邊區，京滬人心浮動之際，「再生」却又戰戰兢兢轉弱如也的不但恢復了「共軍」，却竟「劉伯承將軍」（一八三期）起來，更從此時起，盡力攻擊政府的重要外交措施，真如：「民社黨願退居在野黨地位」一樣了。政府方面自然不滿意，旁觀者也笑破了肚皮。

三、張君勳的「令色巧言」

革新民社於九月十七日曾在滬金門飯店招待各界，羅隆基沈鈞儒致詞時，均曾涉及張君勳，羅說：「今天中國的民主憲政戕害了中國，民主憲政至此境地，張君勳所負之責任比任何人爲大，政黨政治水進的低落，亦爲張君勳所造成。」沈說：「張君勳並未將民社黨組成，民社黨是從今日開始的，張君勳可能以政府勢力壓迫人民，獨裁獨斷來對付民社黨（按指革新民社一筆者）。張不僅爲全國民主人士所不容，就是他的本黨黨員也

要拋棄他了。他本人變成民社黨的敵，自己已成了一個算人。」

張君勳在其自辦的再生週刊一八五期的首頁以「答復羅先生沈鈞山兩君評語」爲題答辯了。上半段是答復羅隆基的，依然是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的老「三點主義」，全文甚長，頗像自說自話：「君勳之所爲，可以與天下共見乎？不可與天下共見乎？」又頗像傲悔似的：「應自己反省，自己思索，不可以人言爲不足重而不與計較」，然而張氏在繞了一個圈子後馬上就談到參加政府的問題，臆測的說：「雖然民社（張氏寫爲第三派）不參加，戰爭依然不能停。到底爲什麼參加呢？張氏自答云：「國民大會，因第三派參加而開成，在國民黨可免「清一色」之譏」。張氏寫此，心境似不甚佳，歷數理由之後，他頗憤憤的說：「男生竟有「張君勳所負責任比任何人爲大」之言，「難道我之責任，能在蔣先生之上乎？能在黨國要人之上乎？」張君勳最後的一句話是：「公等之成功，應自人民方面多方努力」，接着的是「別專以打倒張君勳爲促進民主運動之一件大事」。

張氏對沈鈞儒的不承認他是民社黨，頗爲憤怒，他提到黨內糾紛時，把責任全推到孫寶剛、盧廣聲、汪世銘三人身上，對伍憲子也不客氣的指爲有意侵奪。對於出賣國大與立委的指摘，張氏支吾其詞之後，竟說：「此亦是爲國選賢之道。」然後又與沈鈞儒論誰老的問題：「吾人立於社會之中，亦既有日，生育在數十年前，學歷亦經數十年之久……」。

讀完了這篇文章，唯一感想，信如張氏答復沈鈞儒所云：「其爲由衷之言乎，其爲令色巧言乎？」一代「憲法專家」，其悲哀如此，可嘆可嘆。

藝文雜誌

絃外組曲

金穎

來個「抗毒運動」

中國人民面臨著無邊的苦難，「香格里耶」、「心相印」等等淫靡歌曲又到處猖獗了。有人歸咎於政局，這是並不準確的。因為，即使在以往開朗的陽光底下，那批小醜也慣以殺人不見血的嗎啡，注入純潔的心靈；慣以自己卑污的梅毒，傳染清白的下一代。

目前，彷彿更是小醜

向深處踏進一步

跳樑的時代了：「那呀那

唱甚麼歌好呢？

「……」。——播音

一些朋友惶惑地問。

「……」。——播音

這一問，不但提出當

「……」。——播音

前音樂創作的中心問題

「……」。——播音

而且也問起以往音樂作品

「……」。——播音

的究竟。

「……」。——播音

有一個時期，音樂創

「……」。——播音

作配合着和平民主運動的

「……」。——播音

高潮而飛躍發展，而且，

「……」。——播音

因為時代的需求，戰鬥氣

「……」。——播音

息當然較為尖銳強烈。然

「……」。——播音

而，由於全國進步程度發

「……」。——播音

展的不平衡，以及戰後政

「……」。——播音

局的動蕩，就使朋友們時

「……」。——播音

常為適合環境及現實的教

「……」。——播音

材而苦惱。過火的論調是

抗拒毒藥運動！

個能唱——太尖銳了！於

是有的轉向名歌——一首

找教材，有的居然呼起低

劣的「流行歌曲」。

不錯，目前險惡的現

實教導我們攻虛切實的表

現手法，但隱藏不就是退

縮，避免刺激諷刺不就是

抽掉戰鬥性。

在以往，我們已經有

了不少深刻的優良的作品

了，今後也必然向這方面

再努力，那麼，避免尖銳，

要求含蓄，不正可以促使

我們擺脫或多或少的標語

口號式傾向，更向深處踏

進一步麼？

優良的歌曲已經有了

一些，這一些是既有現實

性及教育意義，既能激勵

人們的思想感情向上昂揚

，而表現手法也極其深刻

而踏實的。

朋友們可以介紹這一

些。

願詞曲作家……

當然，我們應該喊醒

沉睡已久的詞曲作家，重

新拿起紙和筆。

抗戰中，這些朋友的

的確盡了極大的力量，

他們銀鐮鋼鐵般的音符射

向敵人，支持大後方的音

樂刊物及創作研究。然而

，從戰時應運的進入低潮

的計劃；或許，他們正在

埋頭研究；或許，他們正

在專心琢磨一件偉大的藝

術品。恕我率直：激蕩的

現實需要大量的七首機槍

，需要富有戰鬥氣息而表

現深刻的曲作。

沒有現在就沒有將來

，願沉默已久的詞曲作家

重新拿起紙和筆。

卅六年十月十四日晨三時

柴可夫斯基

耕多

柴可夫斯基的先天受東西兩方混合

的影響，他的家系是法蘭西的。西方人視

他為純粹的俄羅斯人，但他的本國人却

設想他不若其他一般俄羅斯作曲家那樣

富有「鄉土」性。像不少

斯拉夫人，他從法蘭西音

樂所獲得的泉源比德國的

更多，他認為勃拉姆斯

(Brahms)是愚鈍的，對

瓦格納(Wagner)也從沒

真正的了解。他愛音樂，

他說音樂發自靈魂的深處

，正如格利格(Grieg)

一樣，表現的應該是一完

美的人格。他以他的民

族長久所積聚的將要爆發

的激情，灌輸給那些感情

綺綺和神經纖弱的現代人

，他用日耳曼民族強烈的音樂語言來表

現另一種極富悲愴色彩的文化。他的音

樂生命的色彩，由幽暗的蒼白到深沉的

黑色，到處燃燭着憤怒的火花，驅走溫

或許，他們有着長遠

的計劃；或許，他們正在

埋頭研究；或許，他們正

在專心琢磨一件偉大的藝

術品。恕我率直：激蕩的

現實需要大量的七首機槍

，需要富有戰鬥氣息而表

現深刻的曲作。

沒有現在就沒有將來

，願沉默已久的詞曲作家

重新拿起紙和筆。

卅六年十月十四日晨三時

比起抽象深奧的音樂美來，他對戲

劇的情緒要有興趣得多，他通過常規的

交響樂形式而創作，但却遠遠地超過了

他，他所創造的是樸實純真的交響詩，

描繪的是人生的真義。他的樂曲能刻劃

出一般的概念，那是有生命的，有感情

的而且是誠懇的。他認為音樂應以情趣

為首要，因此便極力避免像勃拉姆斯

那樣僅顧無感情地發展着一些藝術的技

巧，而寧願用裝飾變奏來重複舊的主

題。

他在音樂史上真正的貢獻，除掉他

創作上所表現的一般優美，主要的在於

：他打破了交響樂形式的陳規而賦以詩

的生命，他承受了裴達

士(Bethoven)和李斯特

(Liszt)的遺產，趨向完

美真實的境界。





「虎胆忠魂」觀後

容方

看了「虎膽忠魂」，我們爲這裏的革命者的人格感動了，本來一個革命者的偉大處，不僅在他能夠悲壯的從容就義，尤其在他日夜與困難危險鬥爭的事實。當我們看到這裏的約翰被追捕着，帶着傷一路像乞丐那樣躲藏的時候，尤其那鮮血一滴一滴流出來的時候，我們會感覺到比斷頭台上的鮮血更重的分量，更大的苦痛吧！我覺得「虎膽忠魂」的好處，就在它看得更深，在淺平的地方，看出了轟立在那裏的偉大的人格。

這是一個多麼簡單的故事，你說它情節變化繁多，但要說的，不過只是追捕一個受傷的革命者罷了，但是，就是這單不驚人的故事，它却告訴了我們多麼重要的事情。或者說，從這一點，就看到了世界。我想這是編導非常成功的地方，他既能深刻集中的揭示生活的真理，又能緊密的組織安排情節，這樣一來，觀衆直接感受到了此處凸出的思想和感情，再不必去思索歸納了。這一點，是值得我們

的風格了。自然，「虎膽忠魂」所以獲得這樣的成功，這裏一個個非常出色的演員，是其重要的因素，詹姆斯梅森在那疲倦衰弱的神色之中，是多麼真實的傳出了革命者爲理想受難的情狀，凱絲玲雷恩在那殷切的視線中，又表現了怎樣誠實堅定純厚的性格。其實不必提出這兩位主角，以演游民沙爾的麥考密克爲例，一個神經質的熱心的空虛的靈魂，是比一切生活中的沙爾，都更覺得真切完整了。神經質是因爲他日夜要與這欺凌他的社會相周旋，空虛是因爲他朝夕所思索的只是一塊麵包，熱心是因爲他爲着麵包在掙扎。你看他跳躍着的步伐吧，那形姿，那動作，不是一個神經質的空虛的游民，又是什麼呢？這部片子的演員，實在值得一個個提出來加以讚美。

「虎膽忠魂」是有高度成就的藝術製作。

「虎膽忠魂」首飾台銀幣

樂觀的華脫狄斯耐

林其民

從「木偶奇遇記」說起

「木偶奇遇記」，一本孩子們的書，不但適合他們的口味，而且，還要他們做一個好孩子，給他們勇敢，給他們一顆向上的好的心靈。

像這樣一本孩子們的書，把它拍成卡通片，那是再好也沒有了，雖然，這已是早幾年的作品，但是我覺得它是會延續多少年下去，而不會失掉了它的光彩的。不但這永久使人覺得年青的想像不會磨滅；而且要一個孩子勇敢，也不會成功什麼老舊的思想吧！在我自己，在幾種不同的境遇下看了那張片子，我却沒有一次不是帶着歡喜快樂的心情看完了它；而且有的地方，還使我非常感激。

事實上，不但「木偶奇遇記」這本書本身好；尤其攝成卡通之後，又經過了一類想像力更豐富的心靈的灌溉，一切是顯得更更有色彩，更爲動人了。這裏不但想像力豐富無比，更緊要的是華脫狄斯耐常常能在最平凡的人生事物中尋找出別人所不注意的東西，而那裏却常常有着最單純的歡喜存在。人們說這種「尋找」，是「華脫狄斯耐」的智慧和，他比別人更爲透澈，具有洞見一切的聰敏。但是原因吧！而一切色彩上的運用，以及技術上的純熟，如果沒有這根本的精神在發生作用，那是絕不會出現今日的華脫狄斯耐的；因此，華脫狄斯耐，不但是外的一個技術上的天才，他本身也代表着一種人格。

「木偶奇遇記」，我特別歡喜開始的一段，後面的一段，沒有能更濃烈的加上華脫狄斯耐的色彩。自然，這是他早期的作品，如果和「小鹿斑比」等一比較，不管在想像上，在精神上，在表現情緒上，在製造氣氛上，在運用色彩上；尤其在一種程度上，都要差錯一等的，現在的華脫狄斯耐，是走遠了。只是，在這種飛躍的進步裏，這了它的「幻遊南海」等；却極端令人憂慮的；似乎正是造成華脫狄斯耐的那種善意的對人生樂觀的情緒，在這裏壓滅了！華脫狄斯耐爲什麼不從這裏來探索他的出路；而竟成功了一個膜拜技巧的人物呢？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吳雨僧與「文學副刊」

過去我曾經談過一點大公報初期的「文學副刊」的故事，意有未盡，現在想繼續說一點，至於它的「前身」，或者是所取而代之的吳雨僧主編的「文學副刊」，本來應該先談一下的，現是却想放在後面去再說了。

這個新出的「文學副刊」，一開始真是有朝氣，作者大抵是新月派的一批老人馬，羅繼北方的教授輩，陣容是異常堅強的。刊名文藝，一直到現在的大公報上還不曾變，用意全在別於學術派的「文學副刊」，其實裏邊有涉於藝術者是少極了。一開始還有林徽音到山西旅行調查古建築的通訊，董作賓的談「寶」，凌視池的說墨，鄧叔存的話藝術音樂……的通訊。後來也就慢慢淡了下來，一直到現在，除了木刻之外，幾乎沒有一點「藝」的氣息。然而一般人動輒說文藝，代替了文學的意思，說起來也是這一段小小筆故的遺澤。

久不寫小說的決心女士也寫了並不預備發表的「我們太太的客廳」，為沈從文拿來發表。這篇小說後來收在一期「冬兒姑娘」集內，看到過的人却非常少。在第二期文藝副刊開始發表時，那文章的中間就夾雜了被描寫的主角的一首新詩，「微光」，以現實的人物作模特兒，描寫並非完全出於惡意，而更因

觀察細膩的原故，小說本身是容易成功的。這却使被描寫的人很愉快，當她從山西旅行回來時，帶給作者兩瓶山西的名產——醋。這些盛世閒情，文人韻事，在現在看來，自然是沒有什麼意思的了。然而這也牽涉到作品時人身攻擊問題。被用來做模特兒，自然也是無可抗辯的。然而作者的態度却必須嚴肅，有真幹而勿喜的心情才好。然而文人相輕，薄世絕少君子，我們的壽命詩人吳宓後來也做了一齣滑稽戲的主角。倒是可悲的故事。

吳雨僧（宓）的與毛彥文女士的戀史，大家是都知道了的。在吳宓詩集中更是處處都有着材料的。自然，這本身也是種「可笑」的事。在廿世紀，吳還做着十八世紀的佳人才子夢，正如在民國二十二年，他還在編文官的副刊，那失敗正是命定了的。

吳氏極愛讀紅樓夢，抗戰期間在昆明西南聯大還在開着「紅樓夢講座」，自比賈寶玉而恨世無林黛玉。他又喜讀兒女英雄傳，嘗言「想我吳宓才貌都不亞於安龍媒，奈何竟沒有何玉鳳。」在昆明西倉坡，同學會開設茶館，名「瀟湘館」（其地即開一多先生遇刺地之左近），開幕之前，吳曾親去勸說不可用此名，以免唐突了林妹妹。這一些都被認為極怪謬可笑，然而我却覺得他那真實的態度是極難得的，正是非二十世紀有所的了。如果說吳宓是詩人，他起碼是有着詩人的真誠的。

在抗戰時，報上有譯吳的情詩「我未負卿卿負我」為「我不要她她要我」者，這的確是「神譯」，然而正可以看出一個人作人態度之分別了。末了，我想在大本的吳宓詩集中抄錄首詩，以見「一般」。

徐志摩贈機開山，吳挽之以詩云：「牛津花園幾經巡，檀德雲萊仰素因。殉道殉情完世業，依新依舊共詩神。曾遙羈鳥驚鸞社，忍憶開山火燄塵。萬古靈香留片影，歡愉瀟灑性靈真。」後又有「再挽徐志摩」一首：

「君亡三載我猶存，異道同悲付世論。碎骨紅顏知己淚，嘔心詩卷爪痕痕。名山路險輕孤注，情海冤深甚覆盆。離合是非都不省，明星燦燦遠天繁。」

在「故都集」下卷又有仿沙克雷所作反少年維持之煩惱的「吳宓先生之煩惱」四首，今錄其二：

（一）「吳宓苦愛口口口，三洲人士共驚聞。離婚不長聖賢識，金錢名譽何足云。」（三）「空自字可奉前文」

（二）「奉勸世人莫戀愛，此事無利有百害，寸衷擾擾洗濁塵，請天空漢逃色界。」

詩雖不佳，然可見吳氏的真誠則一也。



許先生最近出版的「亡友魯迅印象記」，是一本很有價值的魯迅回憶錄。一翻開了書，我們就覺得似乎看到魯迅先生的面影。

威克家最近為「文訊」編一個文藝作品特輯。文化生活社將出版李健吾的「福樓拜小說選集」，共五本；「包法利夫人」，「薩朗寶」，「情感教育」，「三個故事」，「聖安東的誘惑」。

許先生是魯迅先生留學東京時便認識的老朋友，所以我們在書中可以讀到魯迅先生的怎樣剪髮、背誦「天演論」，為「浙江潮」撰文，辦「新生」、譯「域外小說集」，聽章太炎先生講「說文解字」……。

卜之琳的「西窗小書」，已出了三本（「紫羅蘭姑娘」、「浪子回家集」、「翠門」），尚有那雅曼、賈斯黨的「阿道爾夫」，紀德的「新的糧食」，亦將付印。

唐健的雜文集「談小錄」，已交上海出版公司排印，很快就可以出版了。這一本集子，所收的都是短文。

劉北汜近來除每週為大公報編一期「文藝」版外，正在埋頭寫一個長篇。

馬敘倫以前在文匯報「浮世繪」上連載的「石屋餘瀟」，將由建文書店出版，這是一本用文言文寫的雜記。

朱自清的「聞一多全集」的序文，已經在二卷五期的「文學雜誌」上發表，題為「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道路」。——「聞一多全集」由朱先生負責編輯，將由開明書店出版。（但）

讀者之聲

可恥的「同意」

關外月

本月十八日上海大公報刊載如下一段新聞：

（本報南京十七日電）十七日晨國務會議報告事項中，有中美換文聲明，現在美國駐華武裝部隊係由中國政府之同意而駐紮案。該案乃根據外交部所呈，內稱：為聯合國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通過議決案一項，建議各會員國將其未經駐在國同意而駐紮於其他會員國領土內之武裝部隊，予以撤退。美國大使館為美艦履行此次決議，來照請由我正式聲明。案經照覆美方如下：「現在駐紮中國領土內之美國武裝部隊，係由中國政府之同意而駐紮。雙方了解，倘中國政府或美國政府承認此項美國部隊應撤退時，此項部隊即須撤退。」美方有此請求，我方自然笑允，這是毫無疑問的。此後美代表在聯合國會議上和任何國際會議上，都可以拿出這一項換文來堵塞他國代表的嘴巴，這是美國人的絕頂聰明。只是我不明白：日本投降迄今已兩年，為甚麼中國要同意外國軍隊駐在自國境內呢？而且恬不知恥的要用書面公開表示這種「同意」！（十月十八日，上海）

青島美兵強奸少女 代價美金二十元正

M·P

在我國媚美外交政策下，青島又發生了一件慘無人道事件，茲將北平平明日報（九月廿四日）關於此案之報導照抄如下：

（本報青島二十三日專電）本市南海路大興飯店女侍張麗華，年十七歲，二十日工畢返家，在福山路附近為美兵三人拖至

受人凌辱，收了二十美元就完了事！我們沒有親眼看見，說不定是美軍拿槍口威嚇張麗華接受美金的吧！

蒲立德建議一石四鳥

李木子

蒲立德在所著「防華觀感」中說道：「我們有數千架棄置不用的飛機和飛機零件，自我國（美國）的空軍觀點說來，已屬廢廢，但在中國看來却是上等的物資，將此項物資宣布廢棄而後撥給中國，並不費我國一文，不過是簿記上的一個項目而已，假使我們以原價一元作五分的價值售給中國，我們也已賺錢了。」他又說：「現在我們有數十萬噸積存的彈藥，棄置在世界各地任其霉爛生銹，如在菲律賓的更多，在阿留申羣島也更多，在日本的數量更大，還有在美國的，上項彈藥中可在東北使用的應該立即宣佈廢棄，售予中國並迅速運輸。」我讀了他這兩段話，只覺得美國人真是「頂好」，既慷慨好義，又聰明理智。美國自己用不了的物資，拿到中國來，一則可濟人之急，

每一個女同胞就都有被凌辱的可能！我們要向政府抗議！我們要求美軍退出中國！我們為避免再有同胞被凌辱，而要美軍滾蛋！（十月十四日，天津。）

今之丘遲

北方

自趙（壽山）孔（從周）二人反叛以來，此間與彼有關係者人人自危，因之曹紳張鳳翹，宋聯奎，寇遐，馬彥祥等為自白計，聯合寫信給趙孔，勸

其歸來，內云：「關中秋來雨晴時，崑山如帶，瀟湘未黃，足下松柏不凋，親故安居，三徑依然，骨肉健在，融融之樂居既遠，悠悠寸心何忍！」頗似丘遲與陳伯之書，惟趙

孔親故並不安居，虛會故居亦屬新貴，三徑既非，骨肉飄零，此可使有志之士負載嘆者也。好在目的只求表白：我非與彼同謀者也。（十月十五日，西安。）

怎樣替「時與文」寫通訊

編輯先生：

鄙人有志應徵為貴刊通訊員，但不知貴刊需要那類通訊稿，又不知怎樣寫法才合用，便中請賜指教……

咸可敬啟上
十月二日徐州

（答）我們所需要的通訊稿，可參閱本刊以往各期所登載者：它的範圍本雖嚴格規定，寫作也無刻板方式，不過一般地說，下列各點應請注意：

- 一、通訊題材，須在政治、軍事、社會、或經濟範圍內。
- 二、注重事實的真實性（能帶有若干內幕性更好）和敘述的系統化，避免主觀臆斷，少發空泛議論。
- 三、分段，加小標題。
- 四、每篇字數最好在四千以內。

時與文

週刊

發行人
編輯部
經理部

程博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上海法租界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時與文

8

卷二第

館書圖東

魏德邁報告之謎

程程

馬歇爾援歐計劃的現階段

費正

英國的抉擇

王韻霞

私立大學裏的壞現象

張雲橫

看東北戰場

軍事觀察者

李先念威脅下的四川防務

默沙

成都報業貸款案內幕

默沙

廣東水災的回顧

陳微子

馮至講「魯迅在北大」

趙鎮乾

關於「魯迅傳」的一點事實聲明 范泉

魯迅對自己香譯的訂正

寒山

星海先生二三事

金穎

介紹「城與年」

子菊

新生活和新性格

容方

孩子們的甘霖

林其民

藝文廣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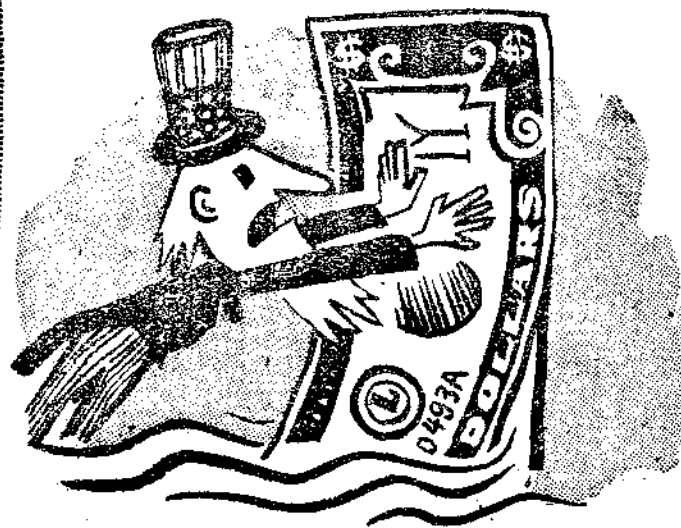
老馬·方成·黛英

漫畫

公教人員自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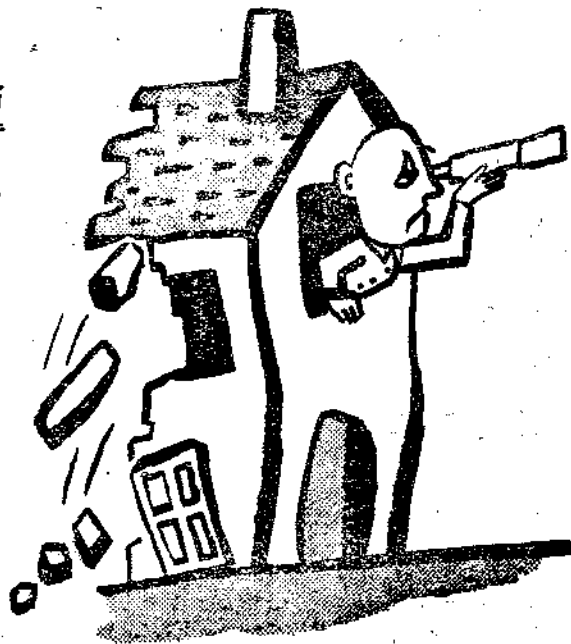
太平洋月刊負責人否認進諺中傷「時與文」





擋得住嗎？

老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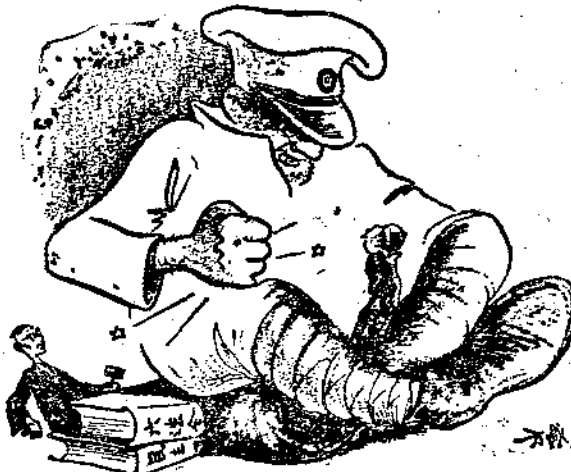
救星快來了嗎？

老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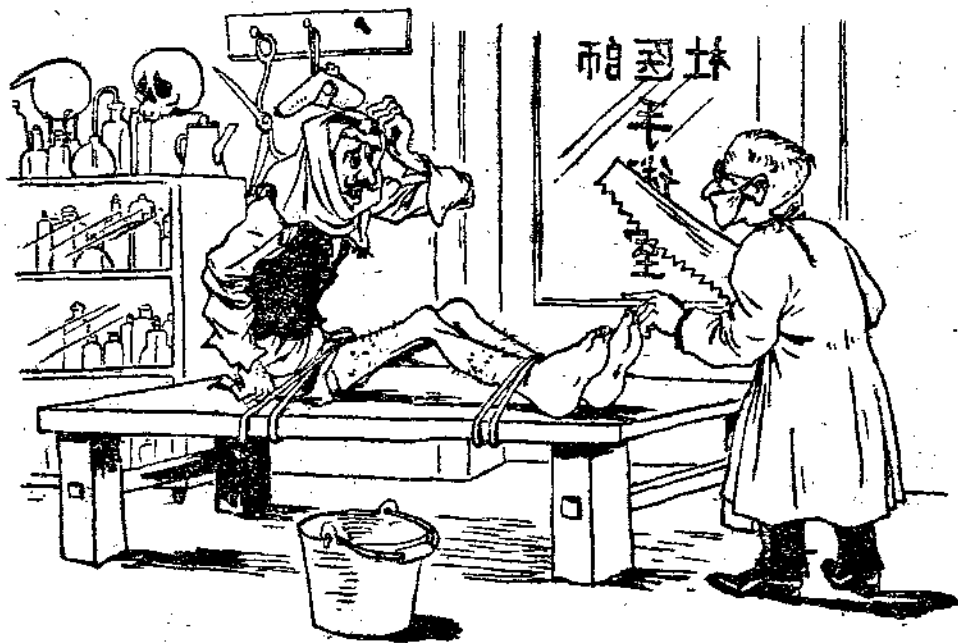
對美政策

禰



審判

一歌



巴勒司坦的命運

金英

魏德邁報告之謎

程 程

勿外洩！羅凡特不問自招：「中國方面提供情報者事前獲得保證，報告書將守秘密。」

魏德邁「調查」中韓兩國事畢，回到華府，呈遞給杜魯門一份報告書，拖到現在一個月了，猶不見美國政府發表；副國務卿羅羅凡特於十月廿二日還正式宣告：「這報告一送到國務院時，即標「極機密」字樣，鎖入檔案」，美政府「將守秘密」。——如此說來，世人至少在最近的將來不能享受這份報告書的眼福，是確定不移的了。於是美國在野份子嘩然，報章雜誌闐然，只有中國政府默然；至於我們人民呢，因為事涉軍火美元，跟自己的身家性命與油鹽柴米息息相關，自然熱望知道葫蘆裏究竟藏着什麼藥，然而葫蘆的洞口被塞住了，故又不至悶然。世間事物，愈是藥品，愈惹人眼癢心跳，不覩不快，一旦入了眼簾，「真面目」倒又不見得十分神奇了。謎之所以為謎，謎面都帶幾分玄秘，等到揭穿謎面看謎底，那就無一不是平常之極的東西。

美政府何以故弄玄虛，硬把魏德邁報告書搞成一個謎呢？有關朝鮮部份，不在本文範圍以內，撇開不談。就中國而論，不得不先點明一個常識：內戰形勢演變到今日這步田地，真是大不利於國民政府，軍事經濟兩者都極糟糕，扭在一團互相牽累，尤其大糟而特糟，美國要想「援華」反共而獲得實效，勢非大傷腦筋忍痛犧牲不可。切莫輕視這一個小小常識，須知魏德邁報告書的神祕氣氛全是由這個常識導引出來的。痛快地说一句：此時此刻公佈了魏德邁報告書，對中美兩國政府，實在都是不利的。中國政府歷來愛講門面話，虛張聲勢，忌避諱疾，縱令聲嘶力竭病入膏肓，而作風不改。然而門面話是對門外一般老百姓說的，魏德邁此番前來「調查事實」，準備援助，就得開門迎進，關起門來講門內話了。好容易聘來一位大醫師，只望他妙手回春，還能忌避諱疾嗎？再要虛張聲勢，豈不是跟自己搗蛋，等於謝絕援助？可是提供不利的（偏偏就是真實的）情報畢竟不大穩妥，萬一傳播出去，於自己聲威總有損害，所以務請同守機密，暫

其次，公佈之後對於美國不利。這又可以從三方面分別說明。第一，中國政府處於今日之逆境，軍事與經濟上對美的需求必定驚人。這浩大的需求，縱令給魏德邁打下一個折扣，必定仍很可觀，當然不是美政府一口答應就能全部兌現的，大部份還有待國會通過。這就需要在朝的民主黨慢慢誘導輿情，疏通在野政黨，然後可望做到。如果此刻就把魏德邁報告書公佈出來，其中建議部份勢將遭致兩黨若干有力人士以及一般人民的唾棄，那又怎麼下台？截至今日為止，兩黨共同外交政策還是限於對歐，並未擴及遠東，這是馬歇爾一個不小的苦悶。何況明年便是大選之期，右傾如范登堡和塔虎脫，尚且要仔細研究民意一般趨向，那末，增加納稅人負擔的政策還可以隨便確定隨便執行麼？再說，杜魯門生不逢辰，已在敵黨口中罵為絛袴子弟，現在又貿然建議填塞中國戰場的無底洞，儘管防共防蘇的道理勉強自圓其說，在道大選前夕，人家會不罵他慷人民之慨麼？四面八方一看，倒不如預先放空氣（如浦立德的那篇長文以及訴說不盡的援華呼籲），看看反響，再作計較。

第二，馬歇爾駐留中國時的任務，是要拉攏國共，返國之後，對華政策大體上總算是消極的，口頭上也仍然念念不忘美英蘇三國的莫斯科聲明。如果此刻忽來一個大轉灣，明目張胆的替國民政府「戡亂」（像以往售讓剩餘物資和一億三千萬發子彈等等方式的援助，恐已無濟於事），官樣文章中的邏輯便不好鋪排。世間的官樣文章都是注重承上啓下的，上下之間必須接續，縱然強辭奪理，也要不露「強」一奪」的痕迹。這就難為了美國，因為無論蘇聯怎樣別扭，她在中國一隅總不及你美國強橫。在你製造不出遠東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之前，你就很難公然大量支援遠東的希臘；否則你就明明在干涉內政，你那「戰爭販子」的帽兒便從此戴定而脫不下來了。所以在公佈魏德邁報告之前，馬歇爾實不得不絞

盡腦汁趕寫一篇官樣文章。

第三，援華必須與緊急援歐分案辦理。杜魯門張羅了許久，好容易得到了國會反對黨的諒解，才決定召開國會特別會議，以處理緊急援歐事宜；至於整套援歐計劃的實施，從目前看去，自然還相當遙遠。近來義、法、奧三國的窘狀日見顯明，美政府深恐貧窮促成左傾勢力的擴張，無論如何要用美元迅速平息歐西國家內部的風浪。美國的金元似乎是無限的，然而納稅人的度量却是有限的；歐洲究竟還算安定，現在投資下去，將來的收穫也多少有些把握，中國則戰禍不已，拋出美金的效果是難以確定的。援華空氣的迅速散佈，是否會影響援歐提案的通過呢？恐怕美政府不能無所顧忌。這也是它把魏德邁報告書暫時擱置的一個原因。本月二十日國務院正式聲明這個報告暫不發表時，就說得很坦白：公佈之後「對於各有關國家之利益實有損害」；這裏的所謂「各有關國家」，除中韓兩國之外，自然祇剩下一個美國。這倒是老實話，並非什麼官樣文章。

二

猜謎並不能有特別訣竅，祇能從研究謎面入手，而謎面倒是够多的。魏德邁離華之前，發表過一篇聲明，多少帶點胡椒味兒，刺激了當道諸公，這是大家所熟知的。這篇聲明，我也曾細讀兩遍，總覺得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早已確定，魏德邁也早已有定見，因而在說明中國局勢時，總不能把道理講得如何高明。他說：「我確信如果中共是真正的愛國，而且對於國家前途感覺興趣的話，他們會自動的放棄以武力來執行主義的努力。」在這裏，我不準備多打筆墨官司，祇願道破兩個顛撲不破的道理：一、此刻要求中共放棄武力，等於叫它自殺。二、中共確會準備放棄武力，主張軍隊國家化。然而「國家化」並不等於「國民黨化」，並非要把鎗桿搞得變成一黨的專利品；同時，在實行「軍隊國家化」之前，必須先就成立一個尊重反對黨的民主聯合政府，根據共同施政綱領來推進國務。這就是政協決議。然而政協早就成了碎片，和平早被破壞了。誰破壞和平呢？偏私有如魏德邁的老上司——馬歇爾，尙且不好意思把責任專推在一邊頭上，他說：政府之內有的是一「反動份子」。

上引魏德邁的幾句味心的話，是極其重要的，我們可以由此看到他的

真正動機是在先打一個「理論基礎」，以便於支撐國民政府從事「勦亂」；而他的這一些理論修養，又正是得益於國民政府，從後者方面學習得來的。你記起看：每當我們國內發生「停止內戰」的呼籲的時候，那一次政府不是使出這個法寶，窮究「內戰責任」問題？即此一端，我們可以放胆作出一個結論：毫無問題，魏德邁原則上必定主張幫助中國政府「戡平內亂」，決不會「放棄以武力來執行主義（反共主義）的努力。」

然而事情決不這般簡單。「戡平內亂」不自今日始，怎麼會愈「戡」愈「亂」的呢？怎麼中共的力量倒愈來愈強了呢？魏德邁對這一問題的解釋倒還像話：中央政府失掉了中國人民的支持。然而魏德邁究竟說得不够透澈。他認為「只要撤換目前在政府負責地位而不能勝任和貪污的官吏」，那末中央政府便仍然可以恢復中國人民的支持。然而事情壞就壞在「撤換」不了，即使「換」了也是換湯不換藥，貪污和無能是有大來歷的，絕非魏德邁一道手諭所能掃蕩。這恐怕需要略加說明。

三句話不離民主這個大道理。在獨裁局面下，政府任何舉動不受管束，可以爲所欲爲，財政一項更彷彿成了「家醜」，從不「外揚」。民國有了三十幾歲了，從北伐成功到現在也有了二十來年了，老百姓納糧繳稅，何會知道錢是怎樣花掉的？沒有一「民治」的政府，「民有一便」是一個諷諷，「民享」更是滑稽名詞，中華民國的一切的一切，全部爲官所享有去了。或有人說：以中國今日種種條件而論，還不配談民主政治。但是要知道：今日中國問題的解決，全在一個關鍵，首先必須得到一個能够制止獨裁不容專制的反對黨的存在；像今日的民青兩黨，大家心裏明白，只能稱爲贊成黨的，乃是先進的統治集團的應聲蟲、酒肉朋友，他們的目的在於分得一杯殘羹，這樣一來，它們多少玷了一點「家醜」，就死也不會「外揚」的了。所以我要點破：魏德邁既已決定幫助一方消滅異己，真正民主便無由實現，而貪污也必然成爲死症，無法醫治的。「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艱」，那怎麼辦得到呢？

說明「無能」之來由，不妨聽用孫中山先生的學說。孫先生反對「無能」最力，他爲中國規劃了一個「萬能政府」，很爲不肖「信徒」津津樂道。然而「信徒」們只背誦得出先生學說中的這一概，而忘了更重要的另一概，弄得當中斷檔，因而可謂不肖。依照先生的安排，政府應該有能，

這是一概；而人民必須有權，爲另一概。這兩概之間必須搭上一根橫樑，使它們結連起來，才構成名實相符的權能學說。如果弄得人民一無所有，而政府反而大「權」在握，那末政府自然跑入歪路，倒行逆施，到頭來就是今日的局面：貪污萬能，而其他則一無所能，包括「戡亂」在內。

美國人可以說得的，我們中國人自然應該更其說得，但因魏德邁說得不甚週到，所以我來補充幾句。魏德邁有軍火美金在手，如此一說，宜乎政府要設法改弦更張，「撤換目前在政府居負責地位而不能勝任和貪污的官吏」了吧？不然，照上文簡單的分析，要幫政府「戡亂」，就不能指望根絕「貪污」和「無能」。如果不信，請看國民黨的四中全會以及魏德邁離華之後一個月來的情形。「黨團統一」這一番盛舉，因篇幅的限制，此處不能談論，但顯不是「貪污」與「無能」的統一！那末，又撤換過什麼大官麼？撤了羅卓英，換上宋子文，換了一碗湯，反而加上幾味老藥了。

現在，我們可以作出第二個結論來了：魏德邁雖然原則上主張幫助中國政府「戡平內亂」，然而送來美金恐怕肥了貪官污吏，送來軍火恐怕中國官吏無能使用，他還得另有妙算。

什麼妙算呢？據美國新聞處十六日電（見十八日大公報），他寫給援華會柯立芝夫人之信件中，曾「強調稱：美國若真予中國任何援助，必需僅交入「良好之中國人」手中」，「務使可尊重之中國人受到此種援助」，「而切勿爲不法之軍政領袖作僥倖」。我想，他這幾句話恐怕要說得中國的軍政領袖們面面相覷，只能自相「尊重」，互讚「良好」了。「賢路」在那裏呢？「退讓」給那些人呢？民青兩黨參加政府之時，馬歇爾固然會經讚賞這是有些民主傾向的，可是只此一次，魏德邁這回便乾脆不提了。老實說，連外國人也看得清楚：民青兩黨連酒肉朋友都不如，成事既不足，敗事且不能！到今日這步田地，人們很容易想起一張「王牌」來：清流。在美國人看來，清流是些「自由主義者」，受過英美文化薰陶，肯反共，有才識，講氣節，必定有能，必定不會流於貪污，若把他們拖進了政府，也就必定有助於「戡亂」。但是依據我們中國人的經驗，這是靠不住的。政府之延攬「清流」，不自今日始；而這些「清流」捲入政治漩渦之後，也儼然在政府裏自成一套系統，相互攀援，力求自保，學盡官場惡習。事實很明顯，清濁之分即在朝野之界；在野的清流，越進廟堂一步，大都立

刻變濁。其猶能潔身自好者，爲數極少，無補於大局。清水倒入濁水，至多沖淡污濁，却不能變濁爲清。如果希望全是清水，只有乾脆倒掉濁流，整個兒換上清流。然而這就有「顛覆政府」之嫌了。說到「顛覆政府」，「清流」當然本身沒有這股衝勁，也斷不會有此意圖。

援助中國政府是勢在必行的，目的在於「戡亂」，不幸愈「戡」愈「亂」，毛病出在貪污與無能；要剷除貪污，不行，提高效率，又不行，那末只好希望出現幾個「良好的中國人」；可是好人進了政府之後，可能變壞，縱使不變，也無法叫已壞的人變好，而且壞人必定仍比好人多！怎麼辦呢？只有讓美國人特別支持「良好的中國人」。於是我們得出第三個結論，用魏德邁自己的話（致柯立芝夫人書）來說：美國若真予中國任何援助，必需僅交入「良好之中國人」手中；余欽佩並尊敬中國人民，深覺彼等應得吾人之援助，但附有一項規定，即此種援助須受監督……「不管麥克阿瑟來担任監督的職務也好，魏德邁出馬也好，任何人都好；總之，誰來了，誰就是六星的超特級上將！看他如何用鎗炮和美金來尊敬中國人民吧！

二二

文章寫到這裏，我們可以說，魏德邁報告書在大綱節目上就是蒲立德那篇「訪華觀感」。蒲立德那篇長文，就文章技巧講，真可說是出自大手筆：站在美國政府立場對中國人說話，站在中國政府立場對美國人說話。惟恐美國人吝於掏錢，便說「援華」如何如何合算，傾軋蘇聯如何如何必要，中國政府決心革除貪污與無能又如何如何受到中共的破壞，「援華」必定如何如何收效……惟恐中國人說他主張助長內戰干涉內政，便誇說美國的感情、慷慨與禮貌；在關於「禮貌」的一小段裏，尤其精彩，他先說「蔣主席較目前任何美國人顯得更爲偉大」，然後提到美國「在遠東有一位權威的將軍」——麥克阿瑟，要他們「聯繫在一起成爲同一戰綫上的二個同志」，「爲了他們共同目標而攜手合作」。

謎底揭開了，魏德邁報告書大體上應與這篇東西不多出入，一點也不神奇奧妙。至於細節方面，畢竟謎面並不完整，我實無法臆測，我不是寄生在美國人身上的花旗蠅蟲。

馬歇爾援歐計劃的現階段

費正

喧鬧了四五個月之久的馬歇爾援歐計劃，到現在顯然還沒有完全脫出混亂、遲疑與困惱的泥坑裏。

美國帝國主義的經濟擴張與奴役政策，雖然已經在馬歇爾援歐計劃的推進中表現得那樣瘋狂和叫囂，但是，毫無疑義，它距離完成的目标依然很是渺遠，甚至將是不可能的。

我們不願過早的來判斷在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危機中佔有這樣重要地位的瘋狂反動計劃的結局，可是，現在來指出其在現階段上相當定型化的發展特點，却不是完全不合時宜的。

馬歇爾援歐計劃在現階段的發展上，表現了那些特點呢？

第一、西歐十六國今後四年經濟互助及美國援助的計劃書，業已大體依照美國的意志和要求交了卷，美國國務院也接受了，但美國國會那邊還不可測；

第二、白宮雖已決定召開國會特別會議，以提早審查和實施援歐計劃（包括緊急援助法義奧方案在內），但美國大資產階級統治陣營中過去所表現的混亂、困惑、分歧和徬徨等種種情緒，是否已告完全消弭，仍不無疑問。

第三、馬歇爾援歐計劃的推展，顯然未免太遲了，那些危急萬分引領待救的西歐國家，早已焦急不堪，「自力更生」的呼喊漸漸掩蓋了「經濟合作」的熱鬧，這顯示西歐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危機正在日趨尖銳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何以西歐十六國的計劃不能迅速順利實施？何以美國國會鬧整扭？何以美國大資產階級統治陣營會發生分歧、徬徨和困惑？西歐國家的反動政府真能捨棄美元而自助自立嗎？

這我們首先應從西歐十六國計劃書說起。

西歐十六國互助與美援的計劃書，雖然是依照美國獨霸與奴役歐洲的帝國主義擴張原則擬訂的，西歐各國也是低首下心，爲了獲取美元，以解救其經濟危機，情願放棄獨立主權和民主建設努力，參加計劃書的擬訂；然而，儘管如此，在這兩者之間到底還保留着一些距離。這就是說，西歐各國爲接受美援所願付出代價，還不能完全滿足美帝國主義的要求，至少也是不能完全滿足美國大資產階級統治陣營中個別不同利益集團的全部要求。

計劃書強調各國自助互助，然後才要求美國給予必需之援助，這原是馬歇爾演說所課予求援各國的任務。可是，所謂自助互助的涵義及其範圍，馬歇爾事先並未明言，而計劃書所規定的，雖不是單憑西歐各國的願望得出的結論，却顯然不能全中美國的下懷。

計劃書第二章規定十六國復興方案以下列四種行動爲基礎：一、是努力增加生產；二、是導致國內財政安定；三、是會員國間高度合作；四、是解決各會員國對美洲貿易入不敷出的問題，尤其着重於增加輸出，以求平衡。在某一方面說，這些努力目標，並不與美國的擴張要求相抵觸。因爲，惟有西歐各國能增加生產，始能擴大生產規模，和提高國民購買力，以大量消納美國的製造品（包括生產用品及消費品）；也惟有財政安定，才能使美國放心投資，不虞風險；此外，各國的高度合作，在目前減輕美國的援助負擔上固有其必要，在將來使美國能獲得一個完整的西歐市場上，也不可缺少；各國確保解決對美入超問題，更是美國向西歐投資的前提條件。

然而，這只是事實的一面，而在更重要的另一面，問題是不這麼簡單的。

最主要的一點是：歐洲是資本主義的發祥地，如英如法都是一等的工業強國，現在雖然落後了衰落了，却還不失是美國有力的競爭者。美國所

要求於西歐各國的，不是競爭力量的再起，而是消納美貨和受美元支配的市場的開闢和擴大（包括西歐各國的殖民地市場在內）。當然，借錢給西歐國家搞「社會主義」，更爲美國獨佔資本集團所深惡痛絕；所謂安定財政與西歐合作，如果是象徵英鎊或法郎勢力的再起和鞏固，並進而建立以英鎊或法郎爲中心的西歐經濟布洛克，亦爲美國金融寡頭所不容。雖然美國資產階級統治階級熟知英國搞「社會主義」是什麼玩意兒，它們也深信英鎊或法郎都不復可能成爲美元的勁敵；可是，作爲以政府力量強力統制國家經濟及排斥美國深入這一意義解釋的「社會主義」，英國却是正在那兒起勁的幹着的，西歐集團也正是邱吉爾計畫而由艾德禮忠誠推進着的把戲。因此，美國必須確實有保障的在西歐建立「美元區」，并在美國一手控制下去組織反蘇反民主的「西歐集團」，它才會願意拿出錢來扶植西歐各國「安定財政」和「增進合作」，也是理所當然的。

計劃書中規定：十六國互相保證於財政安定成功之後，必根據國際貨幣基金協定使各該國通貨對外兌換無阻，這是表示了它們願對美元的王座低頭。但美國也還不能十分滿意，不能十分滿意於「財政安定成功之後」的保證，要就馬上實行，不可等待。何況貨幣互兌，及其價值訂住，與多邊貿易，關稅統一，不能分割，前者更必須與後者同時實施才行。

其次，在經濟合作一章中，計劃書贊同建立「關稅同盟」，及接受「通商自由」，也頗能博得美國的歡心。然而，扭結是打得更多更緊。「關稅同盟」問題在計劃書中還沒有具體解決，而尚須交由十三國委員會研究，於三個月內始能完成研究報告書。同時，十六國中的瑞士、瑞典、挪威三國對此已採懷疑態度。至於「通商自由」，計劃書向美國提出一個要求：「美洲國家容許歐洲和非歐洲製造的貨品在美洲市場能大量暢銷。」這一要求的用意，雖然是着眼於平衡西歐各國對美貿易的打算上面，但無異是叫美國答應增進西歐貨物的輸入，以改善美國只輸出而少輸入的長期現象。自然，如果這樣，美國減低關稅壁壘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這是美國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嗎？

最後，還有一點。西歐十六國的計劃書，對於德國西部的工業地位，沒有明細的確立，也與馬歇爾計劃的主要精神，不能符合。這自然不能怪西歐十六國家，因爲美國政府雖會口口聲聲說要以復興德國，作爲復興歐

洲的基礎，但總是躲躲閃閃的沒有向西歐十六國坦率提出。可是，在美國的整個計劃中，對於魯爾的支配及由此聯接到對西歐經濟的控制沒有確切完成以前，美國「援助西歐復興」的行動是不會很爽快的。西歐十六國計劃書在這方面留下的空白，或爲美國的預定程序所能容許，却無疑是促使美國國會對馬歇爾援助計劃遲疑不決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

但是，如果我們根據上面的論點，認爲美國支配和奴役歐洲的擴張計劃，已受到了西歐各國爲維護獨立主權而採取種種保留條款的嚴重阻撓，那又是錯誤的。西歐各國採取的保留條款，比起它們在其他更重要的方面所放棄的獨立主權來，真是微不足道。

問題的癥結不在這裏，是在於：這裏所牽涉的問題，是一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總危機的問題，一方面是美國資本主義本身存在着特有的難以克服的矛盾，另一方面是歐洲資本主義在現階段面臨着總崩潰的危機，這兩者互相滲透，互相剋制，遂使美國儘管變得如何有力、瘋狂和反動，終不免舉棋不定，難以措手。

美國「援歐」，不是答應施捨，也不再是救濟，而將是一個極其實際的貿易問題。即美國如何一手貸出美元，一手輸出貨物，然後如何求得投資利益及貿易逆差的補償等問題。但在這問題上，矛盾和困難便立刻湧現出來。第一、是美國正感生產力超過國內市場的苦悶，當然渴望大量的資源的輸出，然而，美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特質（工業業均極發達，而又由獨佔資本所壟斷），使它只要大量輸出，而幾乎不需要輸入，這就必然的阻塞了西歐各國平衡貿易的可能途徑，造成美國無法取得超補償的難題。第二、是美國給西歐貸出美元，當然能夠解決清算問題，但在西歐外匯及黃金資產枯竭，美國又不能增進歐貨輸入的情形下，美國祇能不斷貸出美元，塞無底洞，而這却不是投資，投資利益的收回當然也成問題。第三、是美國必然要求西歐減低關稅，撤除貿易壁壘，但美國本身却只能減低某種他們所需商品的進口稅，而他們所要售出的商品的進口稅則反要增高，且前者爲數至爲有限。因此，結果勢必徒然便利美貨泛濫西歐市場，摧毀西歐競爭力較弱的工業，使西歐各國的復興流於幻滅。

這些事實，恰如瓦爾加所指出的：「它告訴我們，美國企圖將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式生產蒸蒸日上時的貿易原則強加於今天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身上，不可能引致資本主義經濟的任何「繁榮」，而祇會使得它更加不穩定。」正是因為這樣，西歐國家雖然不惜出賣獨立主權，接受馬歇爾計劃明顯的奴役企圖，而却仍想採取一些保留態度。同時，美國獨佔集團也正是由於深深懷疑着西歐資本主義極度的不穩定性，才更加不能接受西歐各國所採的雖然很不足道的保留態度，才對馬歇爾援歐計劃遲疑困惑起來。

我們不可過高的估計美國大資產階級統治陣營中在對馬歇爾計劃上所表現的分歧現象，但也不應忽視它，抹煞它。因為這一現象是深刻的反映着美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在現階段潛伏的內在危機及其發展的特點的。美、爾斯特提出這樣一個分析的觀點，把美國資產階級在外交政策上分為三個集團，一、是絕對好戰集團，二、是徬徨不定的集團，三、是開明的集團。其中第一集團是少數派；第三集團更是少數的少數，但深得人民擁護；第二集團是最強大的決定外交政策的集團。這個分野，表現在對馬歇爾援歐計劃上，便是第一集團堅主迅速「援歐」，特別強調「援歐」的反蘇反民主的軍國主義目標；第三集團反對這個目標的「援歐」計劃；第二集團則徬徨不定，雖然都認為美國應該「援助」西歐，但中西部以國內市場利益為主的財團，却對馬歇爾計劃表示反對，對西歐十六國計劃深致不滿，對召開國會特別會議堅持異議；而另一東部以對外投資和輸出的利益為主的財團，也有點三心兩意，一方面他們宣傳甚烈，另一方面抱怨歐洲社會主義，責他們不自己努力；一方面認為錢非出不可，另一方面和孤立派一樣不放心（大公報特派員語）。現在，第二集團的後一財團，比較有力而具有決定影響，他們的「三心兩意」，正是我在上面對西歐十六國計劃書及現階段美國擴張政策的特質所作分析的事實的反映。

四

我們必須着重指出：不管怎樣，馬歇爾計劃所充分體現的美帝國主義擴張政策，是不會因有上述許多困難、剋制和矛盾而停止推行的。因為，這些困難、剋制和矛盾，只能困惱它，遲滯它，而不能取消它。

如所周知，馬歇爾計劃的目的，有四：一、驅取西歐弱國在經濟和政治上讓步，並使其降為美國附庸；二、加強西歐反動派有效地打擊民主力量，並使其成為他們期待中佈置中的美蘇戰爭的有力的一環；三、藉此擴展國外市場，挽救日漸逼來的經濟恐慌，特別是為了維持軍事工業的繁榮；四、作為一種煙幕，利用它來打擊國內民主力量，在國內實行大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和法西斯主義。

這樣的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產物，一方面西歐反動政權，不會不效忠於這個計劃；另一方面，美國大資產階級統治陣營也將會逐漸取得協調和一致，來推行這個計劃。

現在的事實，即已足資說明。在西歐方面，英法為解救美元恐慌所採取的「自力更生」的種種步驟和措施，是十分虛偽的。法國天天在企盼着美元援助，不去說它。英國又何嘗有擺脫美元束縛的根本打算，如關於德國煤產及工業水準問題上對美國的讓步和合作，為了減少負擔德國佔領費用而把魯爾管理權讓予美國，以及最近只因美國作了一些不可靠的關稅讓步即與美國成立減低帝國特惠制的協定等等，都是最好的例證。我們知道，英國的這種讓步，對於替馬歇爾計劃掃清道路一點，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在美國方面，杜魯門於數度召開政府及國會首腦會議後，突然宣佈定期召集國會特別會議，以討論緊急援歐及馬歇爾計劃，這也是顯著的標誌，告訴我們：美國大資產階級統治陣營已對馬歇爾援歐計劃的實施，獲得了初步的協調和一致了。

所以，顯然地，能够擊敗和粉碎馬歇爾計劃——美帝國主義制霸和奴役歐洲的政策，不是西歐反動政權採取的某些保留態度，而是歐洲人民維護獨立主權的堅決鬥爭；也不是美國大資產階級統治陣營一時所表現的分歧和徬徨，而是美國人民反獨佔集團和法西斯好戰份子的廣泛的經濟政治鬥爭。特別是前者，最具決定作用，在目前歐洲資本主義總崩潰的時期，也較美國民主鬥爭更有獲得勝利的把握。

十月廿五日於上海

英國的抉擇

王韻霞

英國面臨着抉擇的時候了。繼續依賴美國，在盎格魯、薩克遜集團裏做一個「小伙計」呢，還是毅然擺脫美國的束縛，走向「自力更生」的坦途？

誰都不能否認，大英帝國是衰落了。雖然它成爲資本主義國家，比其他各國都早，但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早就定型的工業機構，很少改進。到十九世紀末葉，新興的工業國家美德便趕上了英國，尤其美國，現在她的電力和鋼的生產量比英國大六倍，煤產量大三倍，小麥收穫量多十一倍，商船比英國多三倍，軍火生產量至少也比英國多三倍。英國的生產遠落在美國之後了。

更由于帝國主義國家的寄生性與腐爛性，愈加深了英國經濟的危難。英國早就是一個靠着國外投資來滋潤本國資產階級的國家。十九世紀末葉，英國從國外投資得來的收益即達一億鎊，超過對外貿易的收益五倍；一九二九年，海外的息金收入是三億七千五百萬鎊，超過對外貿易的收益七倍之多。這樣，資金便逐漸離開生產，而相對地阻滯了煤、鐵、鋼、紡織等工業技術的進步。

英國經濟機構中另一不可忽視的特點，便是農業的比重非常之小；全國從事農業的男子，爲數反在僕役、馬夫和飼養狗的人之下；婦女之從事農業者只佔千分之十一，而充任家婢之類者却

佔千分之二百十四。許多可供農業生產的耕地却給貴族們作爲狩獵和開闢私家花園之用。這一方面說明了英統治階級的豪華生活和寄生性質，另一方面也就是說，英國不得不從國外輸入大量糧食（五分之四）和幾乎全部工業原料（除煤在外）。

這樣，英國爲了輸入糧食和原料，就需要大量的「支付手段」，除了一部份以輸出製成品去抵償外，另一部份就要以「無形輸出」的收益如國外投資的利潤，殖民地的利潤、和航運業的利潤等去抵償，才能彌補巨額的入超。

在戰前，一九三六年至三八年，平均「無形輸出」的收益是三億五千二百萬鎊，同時期入超是三億九千五百萬鎊，收支相抵，不足僅爲四千萬鎊。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却帶給英國嚴重的創傷，不但損失了人力一百廿三萬七千人，並且損失了國民財富的三分之一（七十五億鎊），損失了海外投資的半數（二十億鎊，其中包括着一些歷史悠久而獲利豐厚的投資，如南非金礦、印度鐵路、印度茶場及在美加等國的股票等）和航輪的百分之廿八。到一九四六年三月，英國竟負債三十五億鎊了。

戰爭摧折了英國的經濟基礎。因此，到了一九四六年，英國經濟情況就非常惡劣了。「無形輸出」的收益減少和生產力的低落，影響到輸出貿易的減低，更由于貝文的國外軍事冒險，駐軍開支達三億鎊，對德佔領費用五千萬鎊，收支便

無法相抵，財政赤字達四億鎊。今年的財政赤字更大得驚人，半年之中，逆差已達七億鎊了。到現在，美國貸款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已用得只剩四億美元，給美國凍結着（本預備五年之用的）；而從九月十五日起，又開始動用其黃金準備，以八千萬美元的黃金賣給美國，換取美元。這批黃金是英國二十四億美元的黃金準備的一部。英國經濟的確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工黨政府怎樣應付這樣深重的經濟危機呢？首先，我們不得不指出艾德禮所宣佈的經濟改革政策的妥協性和脆弱性：（一）它把最大的負擔放在工人身上，要求工人犧牲利益（礦工每日增加工作時間半小時）；對於資本案却優容妥協（決定延緩實行銅業國有）。（二）不肯大量裁減軍隊，到明年三月，仍要保持一百萬零七千人（最近纔決定裁減至一百萬以下）。艾氏固然主張增加輸出，明年上半年的目標是一九三八年輸出量百分之一百四十，下半年爲百分之一百六十，但這是必然會在「生產力」，「支付原料的款項」和「市場」等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難的。難怪在艾德禮宣佈此項政策後，馬上引起同黨左翼份子的不滿。他們認爲裁軍與鋼鐵國營兩事是工黨政策的考驗。政府完全置之不理是不可能的。只有使他們在這兩事上獲得滿足，才能使他們支持增加工時以及緊縮犧牲等計劃。

當然，英政府另一種打算是很值得注意的。

私立大學裏的壞現象

張雲橫

今日教育界最感困難棘手問題，就是經費問題。每當學期開始的時候，各學校當局便殫精竭慮的來討論收費的標準，既要顧到學校的開支，又要計及學生家長的負擔，很難得到一個二全的辦法，最後仍必要決定一個足以使貧苦的家長和清寒的子弟觸目驚心的數目。我們知道，世界各國戰前很早就推行着普及教育、免費教育、強迫教育等的文化政策，而今日中國的失學問題，則正在日趨惡化和嚴重，真叫我們懷疑這世界是否已經進入了一個所謂「真材教育」的時代。封建時代的教育爲士大夫階級專利的觀念，現在雖已打破；但很明顯的，在目前的中國，因爲連年戰亂而造成大多數人民普遍貧困的情況，公立學校既設置太少，名額有限，而私立學校的大門則雖是暢開，而事實上能够跨進這些華麗的學校的門檻的，早已不是貧苦的青年，而是有錢人的子弟。因此我們便在今日若干私立學校裏，發現了一種由於「金錢教育」所產生的「經濟淘汰」的不良後果，這就是說，在私立學校裏有許多窮而成績優良的學生被排出校外，成績不良而有錢的學生則仍可繼續就學，因此就造成了學生在學業方面質的改變，同時更發生了其他許多不健康的現象。這種經濟淘汰（非教育淘汰）的情形，表現在大學裏面，自較小學中學內更爲具體，更爲清楚。我們知道國內若干私立大學已日漸變成貴族的大學，變成了清寒子弟們望門興嘆的場所。一學期一學期直線上漲着的學雜費之外，再加上書費、膳費、宿費以及其他巧立名目的諸項費用之支出，一般家長皆不勝其負擔。依着家庭經濟情形的差等，一批一批的學生自動的由學校裏淘汰出來。這種因經濟關係而造成失學威脅，雖有獎學金、助學運動以及工作自助等的舉措，仍不足以阻遏其擴大的傾向，終乃逐漸由貧寒家庭的子女，進而加之於中等階級子弟們的身上。他們之間大多是學業優良、品行端正、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在教育祇施于有錢人的情況之下，他們被迫着離開學校。這雖是太不公平、太不合理的事，但是當前的社會制度和教育政策，已經在他們和學校的中間，劃下了一條很深的鴻溝；這可憐無告的一羣，他們一些保障也沒有。

與其說學生「思想偏激」「行動不軌」不是國內一般國立大學裏的好現象，倒還不如說，思想遲鈍、行動散漫是一般私立大學學生普遍的壞現象。在國內各校思想問題正鬧得嚴重的時候，在大多數私立大學裏確是平平穩穩，很少波瀾。這在學校當局看來，正是值得驕傲而求之不得的情形。縱然國立大學內的學生，因爲處境不同而思想不免偏激，但他們的意志卻都是向上的；他們大半在苦難中成長，熟悉奮鬥的意義和必要；他們重視現實而不滿現實；追求真理和光明的意念勝過了謀個人安樂幸福的希望，理性和正義感克制了對惡勢力的恐懼和威脅；他們有時不免要衝突，但除去了歧見和私偏之外，餘下的便都是赤裸裸的熱情；有時在經過縝密的相互研討之後，也就可能合作而共同攜手起來；他們關心國家民族的前途，他們肯自由運用思想來辨認事物，他們畢竟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但在經過「經濟淘汰」之餘的私立大學裏的學生，他們的生活環境大多是優裕的，他們對於現實很感滿足，沒有痛苦，沒有悲愁，什麼事都與他們不相干涉；無論什麼國內外驚天動地的大事，在目下都不與他們發生關係，他們都不加注意，他們對於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都不大

商務大臣克里浦斯曾於九月十二日宣佈其新計劃：「決心維持經濟獨立，不希望也不打算讓經濟的繩索把英國跟別的國家的政策綁在一起」，「貿易與貨幣，均不宜與美元過事發生密切關係」。「海外貿易司長威爾遜于九月十五日也曾宣稱要「重建英蘇貿易」。這些都不失爲正確的途徑。但是還有一些別的消息，又使我們不得不懷疑英國仍舊存着依賴美國的幻想：貝文時而要求重新分配美國存款，時而要求美國恢復租借物資的援助；同時，「華爾街報」駐華盛頓記者又報導說：「抵美談判的英財政部司長伊特爵士曾向美國表示，甚盼美國借以巨額新貸款等等。」

其實，依賴美國的教訓，應該可使英國警惕的了。去年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協定，就是以英國撤消特惠稅則和解散英鎊集團作條件的。近幾月來的經驗更說明了貸款協定正絞殺着英國的經濟政策和復興大計，會使英國進一步走向經濟破產和奴役的道路上去，淪爲美國經濟的附庸。

挽救的方法應該是：（一）要有一個勇敢的改革計劃：建立計劃經濟，實施鋼鐵工業國有，提高工資，加強物價管制和限制利潤；同時要使農業的比重增加，幫助農民提高糧食生產。

固然，工黨政府在資本主義經濟範圍內已實行了部分的改革計劃，最顯著的就是：煤礦國有，英格蘭銀行國有，民航、無線電報與海底電報的國有。但是除煤礦國有稍具規模外，其他都是有名無實。所以，「從整個來說，英國的經濟仍然在資本主義控制下；在國營工業裏服務的工人

感到興趣；雖然他們之中也很多讀政治經濟的人，但這僅僅是爲了他們將來有着很好的出路和背景
的緣故；美滿的生活，使他們忽略了思想的機會，他們不去想，根本也不用想；奢侈的享受、淫靡
的娛樂麻痺了進取的雄心，誘起了利祿的慾望；他們糊裏糊塗的過日子，企圖混到了拿取文憑的一
天，然後再毫無計劃地踏進社會去實現他們升官發財的夢想。人有腦子，是要用來思想的，一個人
即使走入了思想的歧途，祇要他肯去研究和磨練，終究是會發覺錯誤而使思想日漸鋒利精進起來。
唯有不思不想的人，才會墮入深淵，不知自拔，而遭遇錯誤到底的危險；大學教育是培植專門人材
的機關，但像這樣的人物，將來走出學校，我們真懷疑他們會對社會國家能有什麼貢獻。

今日青年在無人指示下自求指示，無人開導中自求開導，非有賴於集體的學習、共同的研究、
和相互的切磋和幫助不可。但這種團體性的行爲，除非是有志的青年，經過相當時間的練習、研
、改革，決不是輕易可以成功的。所以上述這一批私立大學裏思想腐化而生活優裕的年輕人，顯
沒有這樣的能耐。他們對於團體根本無所信仰，無所依賴和要求，尤其在校方嚴格的監視、禁止和
破壞之下，他們更不屑去反抗，去爭取，何況消閒尋樂的方法和計劃正多着呢？誰耐煩做這種無聊
乏味的事來？遊行請願，誰又願意來領受鐵棍巨棒的味道，冒着斷肢折腿的危險？無論什麼羣性的
行動都不能持久，誰企圖在這些學校裏發動組織，推動學潮？響應聲援的那才真是勞而無功。雖然
這些學校中照例也有若干學會團契之類的組織，但這不過是祇開一次成立大會以滿足某些人慾望的
名存實亡的團體。當學生運動正在國內熾烈地展開的時候，他們大多抱着觀望的態度。這是一般國
立大學學生所不能瞭解的。

雖然私立大學收費的標準特別高，但師資和學校的設備却並不好。校方一味祇求外表的美觀，
耗其大半的資金以修飾房屋佈置校場，至於圖書實驗的添置，良好教授的聘請等有益於學生學業的
措置，則絕不顧及。校方管理腐敗，教師敷衍塞責，窮而肯努力的學生紛紛離校，同時更由於在校
學生思想的遲鈍，生活的奢靡，一般學生課業的荒怠，程度的低落，自是必然的結果。雖然他們平
時不大用功，但考試的時候倒也不生困難，這好像是很神奇的事。由於校方經濟上的需求，他們正
受歡迎挽留之不暇，那裏會有退學的威脅與留級重讀的麻煩？他們很可以平平易易地混到畢業的時
候。當抗戰勝利各校復校的時候，學校當局會有提高程度裁減學生的呼聲，但事實上我們現在所看
到的祇是各校學生量的增加，而未見質的提高，相反的，在學生程度的水準上，卻祇見每況愈下。
以上所述，不過是我隨意提出的側重於學生方面的幾點，其他私立大學裏的壞現象還多得很。
但也許有人會說：國立大學內的學生未必都是好的，私立大學內的學生也未必都是壞的。那是當然
的事實。我不過以爲一個人的生活環境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思想，一個人的思想可以支配一個人的行
動。私立大學內大多數學生的生活環境至少都是比較優裕的，國立大學內大多數學生的生活環境都
是比較貧困的。這就是說，私立大學內的學生富的多於窮的，故思想比較緩和，行動比較散漫；而
國立大學內的學生窮的多於富的，故思想比較急躁，行動比較前進。私立大學裏自然也有一部分有
朝氣肯上進的青年或是經濟情況不大好的學生，但他們爲數不多，他們也常是最苦悶的。

還不到全國產業工人的百分之五。物價的增長遠
較工資的增長爲速；工業利潤在一九四六年第三
季比一九四五年增加百分之五，而比一九四三年
這一戰時生產的頂點高出百分之二十，而且還在
繼續增長，與證券交易市場的漲價相應合。一
見英國「現代季刊」：「英國的經濟戰略論」
在這裏，我們看到「計劃化」是多麼的微弱了，
以後繼續向這方面努力是刻不容緩的。

(二) 在國際貿易上，澈底改變跟美國以及
歐洲的關係。根據英國白皮書的報告，英國百分
之四十二的進口是從西半球來的，而在輸出方面
，只能向西半球輸出百分之十四，因此，她對這
些國家負擔了極大的不敷額，這些不敷額必須以
美金或黃金的支付來應付。這就是說，英國與西
半球的貿易是對英國不利的，出入相抵，英國要
吃虧百分之二十八。

英國與蘇聯和東歐的貿易呢，却是與英國有
利的。在英蘇貿易裏，英國一向是出超，一九四
四年英對蘇出超二千一百多萬鎊，一九四五年九
百八十多萬鎊。英與東歐貿易，也於英國是有利
的，如以一九四五年爲例：英對波蘭出超二百五
十四萬鎊；對捷克出超一百八十六萬餘鎊，對南
斯拉夫出超二百四十多萬鎊。

由此可見如果英國能改變對外貿易關係，即
減少與西半球的貿易，加強與東歐和蘇聯的貿易
，則一方面可以抑止入超的劣勢，節省美匯的消
耗，避免美元危機的牽累；另一方面才能擺脫美國
的經濟束縛，走向經濟獨立的道路。

(三) 應該大量裁減軍隊，至少五十萬人以
上；這不但能節省一筆可觀的軍費開銷，還可以
節省大量的人力，移用到生產上去。

道路是明顯的，英國抉擇吧！

看東北戰場（通訊）

軍事觀察者

一 試鍊場

著名的美國記者司特朗女士，在巡遊東北以後，立即以這樣的句子，開始敘述她的東北印象。她說：

「誰得到滿洲，誰就得到了中國；——耶非先生的名言，是每個旅行中國的人，都能加以證實的。但是，這句話在今天更有新的意義，因為滿洲大陸上正在進行的國共兩黨大角鬥，乃是整個中國內戰最標本的縮影，東北戰場上的雙方角逐的變化經過，正是說明整個國內戰形勢變化的索引。……要了解中國戰爭形勢，滿洲的戰爭形勢是最能代表的。這也就是說：誰能在滿洲的戰爭中取勝，大概它也就能利用這些取勝的經驗，在全中國爭取勝利。」

這位美國記者所以如此重估東北戰場，不是沒有理由的。兩年來東北戰場的昇沉變化，往往就是全國戰場總的昇沉變化的指標，而且都是走在全國各戰場的前面，使東北戰場成了研究中國內戰最好的具體對象；國軍對共軍控制區的進擊

，是在東北開始的，是在東北首先取得若干成就的；國共兩軍戰略形勢的膠着，以及此後攻守易勢的形成，也是在東北開始的；東北駐有國軍精銳的美械師的四分之三，東北又是共軍裝備供應比較優勢的地區；……所有這一切，使東北戰場成了名符其實的「內戰試鍊場」。東北戰場雖是全國戰場的一部份，但却是一個最能生動反映雙方昇沉變化的戰場，它是一個「標本戰場」。

從前年秋季的「接收戰」開始，經過第一次四平街之戰，直到去年十月國軍佔領安東爲止，這是東北戰場的第一階段。這時候，國軍挾優勢節節進展，收獲了相當廣大的土地之佔領；打通了北寧、安瀋、吉瀋、錦承、鄭梅及中長路松花江以南六段。共軍這時候步步防禦，在防禦中企求折損國軍兵力，是所謂以土地換人力的時期。

去年冬天以來，直到今年夏初，這是所謂膠着時期，國軍曾四次進攻臨江地區，共軍也四次渡江（松花江）作「進攻演習」。此時期

國軍目的在「鞏固佔領區」，共軍則在「抵止攻擊臨江等役中力求折損對方兵力，在渡江演習中折損對方而提高自己」。但更重要的，則是在等待東北人民的「觀感」變化。共軍看準了國軍在接收東北時的許多弱點，遂以時間來增長東北人民對這些弱點的憎恨，把人民的同情從「合法」中爭取到自己方面來。因此，這是一個相持時期，若如一般報章，把共軍的渡江演習稱作第一次到第四次的攻勢，乃是不十分妥切的。

實際上，被一般人稱爲「第五次攻勢」的共軍上次攻勢，乃是夏季攻勢，才是東北共軍第一次真正的反攻。當時林彪還很小心地稱它爲「過渡攻勢」，以示與他心目中的現在這樣的攻勢相區別。這一場戰事從五月打到七月，以四平街之戰爲最後戰而告結束。戰鬥的結果，共軍是推向了一步：遼南半島打到大小橋南邊，安東重新被共軍控制，北邊向南壓到懷德、遼源一線；共軍在中長路兩側屯集了主力，西側以梅河口爲中心，以西安爲前

哨，東側以遼源爲中心，以康平懷德爲前哨；此外在熱河方面，國軍的陣線壓縮向西，錦承路中斷，國軍保持朝陽、阜新一線。

七、八、九三個月，南線的戰鼓震得人們耳膜上激起老滿，而東北是比較平靜的。國軍以「小拿破崙」陳誠將軍親臨指揮，剷除熊杜系「予人民不良觀感」的官員，統一軍隊指揮，確立軍政配合方案。共軍則以「土地改革」消化「新解放區」，以整修交通佈署後勤，以「大練兵」總結作戰經驗，以生產節約支持前線。……雙方都在調整，在佈署，準備在夏季作戰的基礎上，進行新的試鍊。

二 交響曲

新的試鍊，終於在九月下旬，跟着滿洲特有的狂風暴雨，降臨東北的大地了。

夏季作戰以後，國軍在東北的佔領區，雖然比去冬要大大縮小，但究竟還維持着一條狹長的走廊，還以北寧路及中長路的一段，分別維持着對關內及對營口的交通。（見圖）。而且陳誠將軍坐鎮瀋陽以後，先後更調動了五個以至六個師的兵力，到關外去。由於這一增援，加上在東北當地的補充，大概國

軍在關外的兵力，尙有卅萬人之衆，這數目字跟夏季作戰以前相差無幾。陳誠將軍對這兩點是很重視的，他對東北以後，所採取的佈置就是：（一）以「整肅吏治」來「挽回人心」，「至少也要使狹長佔領區中的人心，不要再有失去，才能從事作戰」。（二）集中物力修補中長路的長藩路，已決定雙十節通車，以利狹長走廊的兵力運輸，而使共軍處於南北「兩面作戰」狀態，國軍得收內線作戰之利。（三）確保北寧路交通，要求調派關內勁旅，協助維持長城線內外國軍交通。（四）集中相當兵力，向熱遼邊清剿，以冀重開錦承線交通，配合北寧線交通，「使東北華北打成一片」，則東北國軍便能實行「有後方的作戰」。如果陳誠的這些計劃都能一一實現，那麼，他認為「以三十萬大軍，隨時機動作戰，則至少可維持東北現狀，壓制共匪不能進一步發展，而待關內戰事之澄清，國軍當可最後致勝也」。

但是，正如前線日報的特派員所說：「時間，時間，一切都是時間，時間是國軍的敵人。」在時間的競賽裏，國軍落後了一步。當九月下旬，陳誠向熱遼邊實行「打通錦承線，確保北寧路」的計劃時，共軍已經消化了新佔領區，獲得了後方的補給，而實行反擊了。滇軍盧濬泉部在錦西與共軍交鋒，竟告折損；老東北軍王鐵漢的四十九軍以「還鄉團」姿態二次「貫徹打通錦承線」計劃，亦在同一地區受損。參加這一地區作戰的共軍，乃是夏季作戰時「牽制方向」攻擊熱河的李運昌部，該部在夏季作戰時，頂多不過折損過國軍兩團，現在竟在休整中長大了胃口，發明了什麼「一點兩革」的魚鱗戰術，這是令人大大為驚奇的。陳誠將軍遂改變原定計劃，而以機動兵團之一的新六軍調援遼西。誰知正如合衆社所說，「這是共軍吸引國軍主力的計劃一部份」，當新六軍南調之際，共軍於十月一日向中長路兩側走廊地帶，發動了「秋季攻勢」，新六軍遂又折返。

東北秋季大戰，已經開始了一個月，儘管這一個月的戰訊是混亂的，戰鬥忽東忽西，重點時南時北，但總起來說，戰鬥不外兩個範疇：一個是「補給角逐戰」——國軍要維持關內關外的補給線，甚至擴展關內關外的補給線；共軍則要「關起東北的大門來」；所以又可稱爲「輸血管之戰」。爲了這一個角逐的目標，所以共軍不肯放棄北寧線，至今不離北寧關外段兩側，不讓國軍修復榆瀋線。爲了這個目標，所以共軍要孤立營口。爲了這個目標，所以共軍又集積重兵攻取彰武，佔領新立屯，並與國軍爭持黑山——義縣——朝陽的鐵道線。由於這一角逐的結果，國軍暫時是難以打通北寧線（關內外的大陸上動脈了），葫蘆島與營口，也暫時成了「孤港」。直至廿四日，國軍宣佈放棄了打通錦榆交通的希望，而「在錦州葫蘆島間，重開交通線」，這是一個水陸聯運恢復關內外交通的計劃。可是，同一天路透社電傳共軍又佔領葫蘆間的高橋站，所以整個「補給角逐戰」已經「第一回合終結」。目下雙方所角逐的焦點，已移至黑山——義縣——朝陽這一「與北寧平行之交通線」；共軍在這一角逐中所爭的，恐怕不僅有消極上「澈底切斷遼熱國軍箭頭會合之希望」的作用，而且也有「使熱遼共軍完全打成一片」的積極意圖了。

另一個範疇，則是「孤困城市戰」——國軍要繼續維持它的狹長走廊，共軍則伺機想把這條走廊切爲數段，以至數塊。爲了這一個角逐的目標，所以共軍有對瀋陽和四平街的四面攻勢。爲了這個目標，所以共軍要對長吉地區，用「打斷缺口」的方法，分別包圍了長吉兩市。爲了這個目標，所以國軍還是不遺餘力要求會師。由於這一角逐的結果，秋季大戰前國軍比較完整的狹長走廊，現在是分成數塊了，（請參看附圖）：長春、吉林、四平、鞍山、營口……這些都成了或大或小的圍城；瀋陽周邊，則是最大的一塊，而據南京中央日報的估計，這一大塊，也正遭遇共軍「從彰武營口兩地配合攻擊」的威脅，而有被分成兩塊的可能。自然，在這些戰鬥中，由於外線的集積機動，內線的分散孤立，有生力量的消長是很大的，國軍會宣佈共軍損失了三萬人，共軍也宣佈國軍廿天內就損失了五萬人之譜。對於國共兩軍所從事的這一種角逐戰，合衆社的軍事記者說得很對：

「實際上，滿洲的戰爭，是以特殊的型式演出着，並不與通常的戰訊所報導的相符合；共軍也許奪去近廿所縣城，但是它之不攻擊瀋陽，正如今天之不攻擊上海一樣，它是在從事一種預擬好的戰爭技術……所有的戰役情形，說明共軍的目的，是在破壞交通，困疲城市

，消滅那些軟弱而又士氣不振（因此便於消滅）的國軍主力，以圖用這些方法，使政府的東北補給系統完全中斷，使它的兵力更見劣勢，而在東北的地位，也將逐漸不能維持。共軍一般不攻堅，它僅止於包圍大城市。但是，它常常集積它的主力，滲入像開原鐵嶺之間的這種地區，尋找到國軍的弱點，很快打一記，佔了很大的便宜之後，都不繼續攻堅，而放下少數部隊圍困大城市，主力却又去繼續它的下一行動了。（十九日上海各英文報）。

顯然的，這樣的作戰方式，乃是以「孤困城市戰」為目的，而以「削弱對方有生力量的運動戰」為過程的混合形態演出着。戰鬥時：以運動戰削弱有生力量。戰鬥後：達到孤困城市的結果。正如國軍的負責人所說：「共軍在這種戰爭中，吃去小據點與一部兵力，但國軍乃努力保衛大據點，使小部隊不再被吃掉」（廿三日申報）。

「補給角逐戰」與「孤困城市戰」的混合交雜，組成了東北秋季大戰的曲調。這一枝悲慘的戰爭交響曲，已經使整個東北的戰場，發生重大的變化，而將進入一個更新的階段了。

三 新角逐

看國軍方面的意圖，今天大概是放棄陳誠將軍的原定四項計劃了。正如前引那位軍事負責人所說，國軍所希望的，乃是「不進一步惡化，而能打開關內外交通。」所謂「不進一步惡化」，就是「孤困城市戰」能告一段落，長、吉、四、鞍等孤困小塊，能繼續作「象徵的佔領」。所謂「打通關內外交通」，就是使以瀋陽為中心的「最大的一塊」能重新與華北維持交通，形成一個「滿洲的大橋頭堡」，進行「有後方的作戰」。正如陳誠將軍的幕僚柳克述氏所說：

「東北國軍在一袋形地帶中處境至危。然在陳兼主任領導下，已有新生氣象，但不能希望有什麼奇蹟發生。如果共軍六次攻勢粉碎，東北始能在安定中求進步。國人不能以長城劃分東北與華北之區域，要保持並收復東北，必須擴開通往東北之走廊，使東北華北打成一片」（十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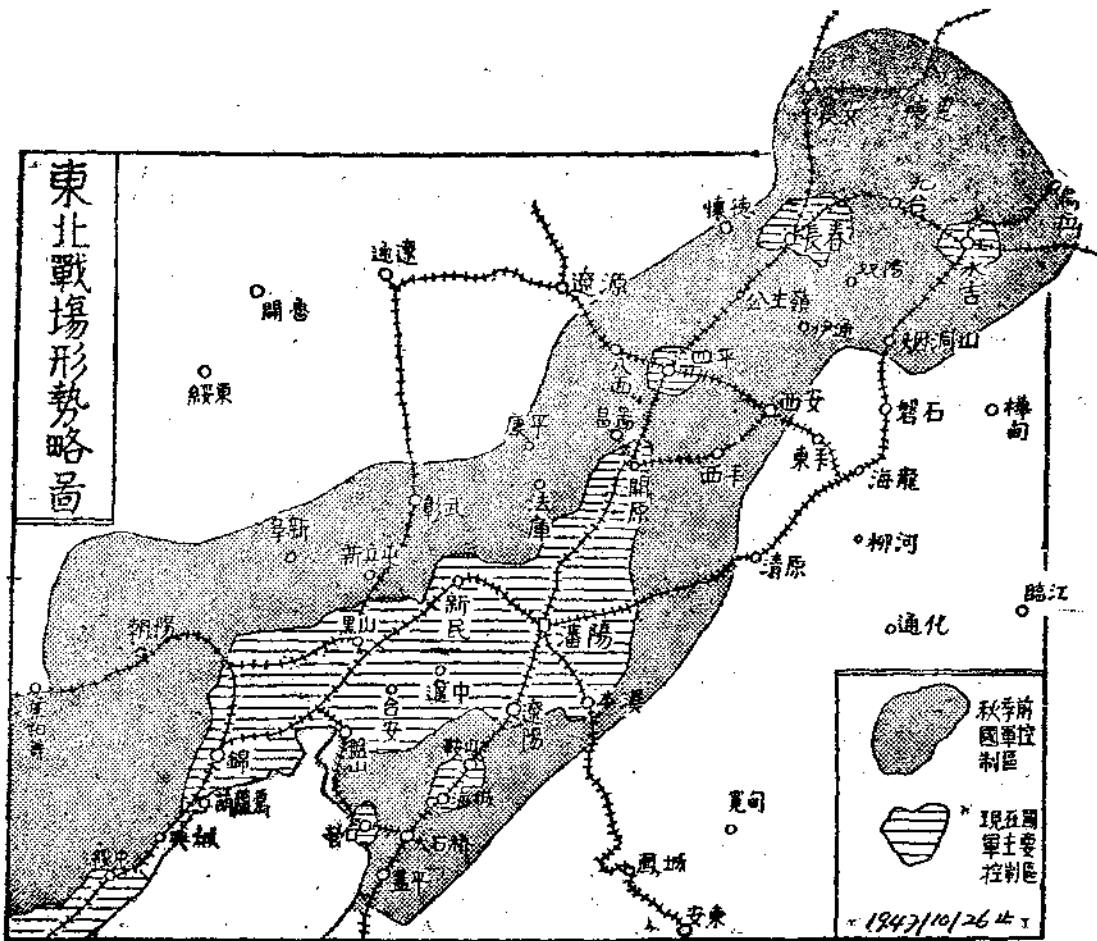
根據這段談話的透露，當局對於「剿共以來損失最小」的傅作義將軍，是寄以很大希望的。如果傅作義將軍能移師東攻，而粉碎共軍「補給角逐戰」的優勢，並與東北國軍完全打成一片，則陳誠將軍「維持東北以持關內澄清」的希望，

至少暫時是可以做到的。而陳誠將軍也許認為這種「內線作戰」是可以「以逸待勞」，在「硬碰硬的決戰」中大大削弱共軍一番的罷。

但是，要實現這一計劃：（一）分散支持危局之兵力，必須力量甚大，才能分頭應付。（二）援兵之來必須較多較快，才能防止對方消化新佔領區之生長。（三）必須對方暫時沒有第二個攻擊隊。……這三個條件，就今天來說，還是不夠的。一則，國軍在東北者，雖說有卅萬，但在秋季作戰後，似已不及此數，而且經過連年戰爭，質上大不如前，即連新一軍新六軍，也有四分之一以上為東北新兵補充，且有缺額。以視鄧文儀局長所估計共軍六十萬之衆，雙方兵力對比似甚懸殊。再則，膠東戰事雖告一段落，但戰鬥反較以前增多，山東調兵一時尚難；傅作義將軍的援兵，東來者究竟是少數，大部還在綏察贛付新的戰機，且北寧沿線一時還澄清不了。三則，共軍的攻勢一時尚無停止之象，而且前線日報估計，現在還只拋出一半兵力，尚在源源拋出後備兵力之中。根據這些原因，我們恐不能馬上看到國軍計劃的實現。

其實，國軍這一計劃與現實的

矛盾性，還是因為國軍的基礎在大城市的緣故。如果國軍的社會基礎不是在大城市裏，就不必分兵守衛各大城市，也就可以集中機動作戰了。無奈政治限制了戰爭，為了避免大城市易手對兵心民心的不良影響，為了國軍不便在農村中分散作戰，所以國軍的計劃，依然是分兵困守大城市的老辦法。如果傅作義的援兵打不過來，則將成為各個被孤困的城市的「分散內線作戰」。按蔣主席手訂「作戰綱要」說：「此乃作戰軍處於被包圍被夾擊之形勢，而從事作戰之謂也。」在這種情形之下，內線作戰本來應有的優點，却會受到別的内線的耗費而反變為弱點：（一）兵力因分兵困守而更加削弱，強劣對比更大。（二）因無交通工具可運轉，所以內線作戰的交通便利條件是不存在的，其兵力轉用將與外線作戰相差不多。（三）變成各個的無後方作戰。（四）內線作戰一般可激勵居民從事保衛戰，但目下的戰爭却會因為戰爭的延長、城市的破壞而增加城市人民的隔閡。（五）分散內線作戰，無法主動尋找決戰機會與處所。根據這些情勢，陳誠將軍的戰略大概是儘量調動兵力到東北來，以增強各個分散之點的防衛能力，就



這兩天空運部隊的大批調動，很可能證明這點，國軍是以極大希望寄托於這上面的。

看共軍方面的意圖，似乎是預計到這些特點的。所以它在「補給

角逐戰」方面，始終不放鬆。它一定要切斷北寧，把各地國軍造成分裂之勢。而且就全國來說，它的戰線逐漸南移，它在山東不斷加強作戰，它最近又在河北平津保三角地

帶加強作戰，一方面將牽制山東等地國軍不易外調，一方面恐將因望都會戰後河北情勢的轉變，而加強對傅作義部隊的牽制戰。共軍是決心要把東北大門關起來的。如果這個目的達到，它恐怕還會把正在進行的「孤困城市戰」更進一步發展起來，使東北各大城市更被分割。如果它能達到這個目的，則恐怕不外乎兩種可能：（一）以少數兵力監視各被分割之城市，而以多數兵力集中逐一解決各個已分裂了的據點。（二）以少數兵力監視各被分割之城市，而以多數兵力集中轉用於其他戰場。即使在這種情形下，共軍恐怕也不會耗費大量彈藥人力強攻每一個大的城市，因為

「孤困戰」畢竟是可怕的，共軍也許認為這樣可以有利它「獲得人心」的變化，而寧肯讓這個「第二戰線」（前線日報語）去「在無情的經濟戰中最後取勝」（合衆社十五日電）罷！

究竟是國軍的意圖實現呢？還是共軍的意圖實現呢？正在進行的角逐，是有決定影響的。從長城到長春，雙方正在角逐中。這是中國內戰進入新階段的開始，雙方將在東北考驗「決戰的能力」。在這個「內戰的試煉場」中，將顯示明天全國戰爭的演變：「誰能在滿洲的戰爭中取勝，大概它也能利用這些取勝的經驗，用之於全國」罷！（十月二十七日寄自南京）

本刊經理部重要啓事

本刊自第二卷第八期起，零售價格調整為六千元。這是出於無奈的，我們實有很大的苦衷。大家都知道，白報紙的價格已從十月初旬的六十幾萬漲到目前的九十萬左右，排印工也自本期起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還有其他費用都隨物價上漲而提高了，一個像我們這樣全靠發行維持生存的刊物，爲了平衡收支，就不能避免稍稍提高售價了。同時，爲了減輕讀者的負擔，我們建議愛讀本刊的讀者從速直接訂閱；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訂閱價目照舊，以示特別優待。

李先念威脅下的四川防務

默沙

內戰的烽火燃燒著苦難的中國，就是遠在西方

曾經支持過八年抗戰的四川，現在也不成其爲人們幻想中的「世外桃源」了。

近來謠言紛紜，說李先念部在川鄂川陝邊境大事增兵，意圖進窺四川，一連風聲鶴唳鬧得人心惶惶不安。四川省府爲了鄭重

關防，安定人心，擬由保安處按日派員廣播省內外戰況及設防情形，使一般民衆瞭解時局「真相」。

關於川省設防和共軍襲川動態，記者特根據所有官方的消息，作一綜合報導。

當局的焦灼與士紳的關切

據說鄧錫侯在接任川省主席前，赴京晉謁蔣主席，曾作如下表示：四川秩序，可以保證無虞，但如爲外來的力量（暗指李

先念部），則難說一定把握得了。

川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月前由京返蓉，曾語中央社記者：「中原戰事緊張，本人在與主席兩度晤面時，均曾提及，請求

注意防止「共匪」西竄，建議加強民衆自衛武力；一方使具有戰鬥能力，另

方則須有一健全之指揮機構，軍需方面則請中央大量補充，原則已邀主席同意。」

蔣主席對西南各省甚爲關切，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在京時，蔣主席曾指示朱氏在渝召集西南各省軍事政治負責人，舉行會議，現行轅已着手籌備，大約在軍糧會議後，即可召開，會議由朱氏主持，西南四省府主席、各省市

長及軍事機關首長、各部隊長官，均將出席參加。

另外，川籍參政員李璜等十二人，以共軍襲川

，亟須設防，而川東北各縣位於大巴山麓，（記者按：大巴山脈蜿蜒川陝界上，主峯在陝西鎮巴縣境，東南走，至長江濱，結

巫山十二峯，成巫峽之險。尤深，特聯名建議行政院，電飭川省府趕修大巴山公路。原建議中，全線共長七百七十餘公里，分兩期辦理：第一期完成：（一）自南部經儀隴至巴中，（二）自萬縣至開縣，（三）自達縣經平昌、清江渡、巴中、河沙子而至

南江，以上三線共長五百八十五公里；第二期完成：（一）自通江至清江渡，（二）自廣元至旺蒼，（三）自梁山至開江，以上三線共長一百九十九公里。爲實施上項建議，第一期中央補助工程費用五百八十億元，已經立法院預算委員會通過，短期即可匯到；第二期由中央補助工款十九億元，尙無消息。

不久以前，十五區行政會議在達縣開會，亦強調會議主題是鞏固大巴山的防務，保衛四川門戶。

軍事佈署

川省各有關當局在軍事上所採的緊急措施，報紙上公佈得相當多，異常刺激人心：

（一）川省府爲現時軍事緊急，特於保安處設立軍事委員會，聘請擅長軍事的人才，研究整個川省軍事計劃。

（二）川省將劃爲川東、川西警備區，川西區由孫德操出任司令，川東區司令由孫元良充任；此兩警備部，均歸重慶行轅指揮。

（三）川康綏署撤銷後，將另置成都警備司令部，司令一職，重慶行轅擬請川省府主席鄧錫侯兼任之。

（四）川省保安隊待遇，政院准予提高，與國軍待遇平等，並撥大量軍械，加強其武力；省會設八個總隊，各行政區設保安大隊，所需經費由地方供給。

（五）爲防禦共軍入川，除已在大巴山脈建築完成碉堡一千四百餘座外，其尙未興工建築者約一千五百餘座；通、南、巴、旺、廣、宣漢、開縣等十一縣建碉工程，正加緊進行中，須定十一月底全部完成。又，廣元至巴中，南江至通江，萬源至巫溪、巫山、奉節、開縣等九縣，均發動義務徵工，趕築及補修縣境鄉村公路。

（六）駐防崇慶、大邑、邛崃的保安第四總隊，奉令開拔，移防川陝邊區的劍閣、昭化、廣元等地帶；又，第六總隊進駐達縣、萬源、通江、巴中等縣戍守，並成立昭、廣、劍、通、南、巴、旺

、蒼、閬（中）九縣清剿指揮部，及萬、通、南、巴、開防辦事處，同時委派督導員李蜀華前赴通、南、旺各縣，推動民衆組織；此外，並加強各該縣鄉鎮警察隊及義務警察隊之力量。

（七）川省府以本省各地零星股匪，迭經清剿，而未徹底肅清，特通令各縣市，以後清剿零星股匪，應不分畛域，窮追窮剿；不得假口逃竄贖濟，敷衍塞責。

（八）重慶警備司令部，爲清剿華蓉山股匪，特擬訂清剿計劃，已送請行轅核准，限於短期內完成清剿工作，並將設清剿指揮所，以期調度統一。

（九）川省當局爲加強大巴山防務，特會同省參議會擬定新辦法兩項：甲，請中央增強大巴山外圍防務，以防鄂東共軍

及陝南共軍進剿；乙，請求中央將二百三十萬元的還款，部份撥予保安隊、保警大隊、自衛大隊等，作為添置新式裝備之用。聽說這兩項建議，經提交省府會議議決後，即呈行轉主任朱紹良轉請中央核示。

李先念部動態

至於共軍李先念部活動情形，成都各報僅有零星記載：

「頃自關係方面獲悉：川東北大巴山一帶，防務極為堅固，惟近日川北通、南、巴與陝屬鎮、漢、寧等縣及川北昭、廣、劍、江、彰（明）、平（武）、北（川）與甘屬康、文等縣，頗傳匪警，聞有奸匪支使，擁大批新式武器，常與地方團隊及駐軍發生衝突，川省府及重慶行轅均極注視，聞必要時，將請中央調動空軍，配合地方自衛團隊與駐軍，全面動員，武裝清剿。」

「李先念部，企圖竄擾川邊，因政府方面對川

北防務早有嚴密佈署，未能得逞，乃命匪軍陳益率兵三百餘人，與安康叛變之趙某，夥同進窺青川、平武、北川等地，分股竄擾，日來情勢猖獗，各該縣均電請省府保安處，急派部隊堵截。」

保安處處長答記者問

者問

關於川省設防部署，保安處處長王元暉於十二日答大陸社記者問，可供關心川局者之參考。

問：川豫鄂及川陝鄂邊境，最近情形如何？

答：國軍已部署周密，毫無危險因素。

問：中央令各縣成立自衛中隊，省府對此意見如何？

答：自衛中隊為民衆組織之一種，目的在組織民衆，加強聯繫，鞏固地方治安，對自衛中隊之成立正考慮中，將來或可能就現有鄉村警察中隊組織起來。

問：若自衛中隊成立，當局估計其力量如何？

又所需費用，槍彈，由中央撥發，抑地方自籌？

答：自衛中隊之成立，主旨在加強力量，相互團結，使共匪不得輕易混入或乘機有勾引行動，至所需槍彈全就現有應用，經費開支由地方負擔。

問：今後共匪在關內若仍發動政治攻勢及心理攻勢，或散播謠言，鼓動風潮，指使鄉村股匪暴動，則將如何防制？

答：此為共匪之一貫陰謀，今後吾人軍策實力，針對其陰謀，予以強力之打擊，目前本處對各縣，尤其邊區，決加強情報工作，對政治匪徒予以密切防範，以政府之力量而言，可以控制。

問：本省治安，除軍事上（大巴山設防，興築碉堡等）應有之努力外，其他有無善策？

答：軍事固重要，離開政治亦不行，今後本處當注意於政令之統一，以配合軍事，使川省成爲一片乾淨土。（十月十三日寄自成都）

馮至講「魯迅在北大」

趙鎮乾

十月十九日，爲魯迅逝世十一周年，北大舉行紀念晚會，由馮至教授演講「魯迅在北大」，大意如下：

魯迅先生是民國九年到北大來的，那時正是「五四」以後，新文藝作品比現在單純，幼稚，然而那裏面帶着一種睡醒後的新的聲音。魯迅先生和周作人是當時的兩大吸引讀者的作家，他們的文藝經常的登在晨報副刊上。那時的晨報週刊是學生們主要的課外讀物，學生們每每爬起來，便找晨報副刊，如果有魯迅先生或周作人的作品，不啻是一段甚至一個字，都擊互相傳誦，當天就寄給外地的朋友；外地的朋友發現有他們兩人的作品時，也用快遞寄到北平來。

魯迅先生在北大是兼任講師，開一堂「中國小說史」。（說到這裏，馮至先生揚手向東南角上一指），在紅樓第三樓，伴着那小鐘的間，就是魯迅先生當年的講堂，每星期五下午二至三時，有他的一堂課。最初兩三年，聽講的只有二十餘人，到馮先生去聽講時（十二年），已增加到百餘人，其中不僅有中文系外文系的學生，還有其他各系的學生；不僅有北大的學生，還有外校的學生。

魯迅先生的教材，先是手編的「中國小說史略」，教法也並無奇特之處，也是念一遍後，再抽出幾個問題講一講。雖然，就在這樣的指點中，學生們得到了不少的寶貴智識。魯迅先生曾告訴馮先生他們：漢唐宋諸統治較久的朝代所以歌功頌德的作品多，乃因統治者已將不利於他們的文章查封了，毀滅了。又告訴他們：一個強盛的朝代，極願與外國文化交流；只有在本身有病的朝代，才排斥外國文化的輸入。……十三年，「中國小說史略」印成，魯迅先生便改教「苦悶的象徵」，藉這書作橋樑，他發表了許多珍貴的文藝理論。

魯迅先生從民國九年來北大，到十五年離開北大，這幾年中的寫作，有個顯明的分野。民十三年以前，他寫的很少，只出了吶喊等兩三本書。十三年，曹錕賄選勝利，引起全國的不滿，馮玉祥便打進北平；同年，曹錕下野，孫中山先生來平與段祺瑞等協商國事，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到孫先生身上。這時，文化界很活躍，語絲，現代評論和莽原是當時敢於說話的三大雜誌，魯迅先生便是這三大雜誌的首腦人物。此外，魯迅先生組織未名社獎勵翻譯，又給年青作家出版烏合叢書。這幾年中的他，自己寫的東西也很多，如彷徨、華蓋集、朝花夕拾……這許多書，當時就有廣大的讀者羣，不過，那時許多人都只覺得文字美，沒有人像今天這樣明白其中的含義。今天，人民都大徹大悟了！（十月二十二日寄自北平）

成都報業貸款案內幕

默沙

近年來，成都報業的怪現象特別多，這裏只根據各方面的消息，報導一件轟動成都的有關報業貸款的新聞。

「偏惠黨團嫡系」

所謂報業貸款，在成都是數見不鮮的事了，現在激起好些報社通訊社不滿者，蓋由於「偏惠黨團嫡系」(新中國日報十月六日新聞標題)所致。十月四日午後二時，黃埔日報、社會日報、新中國日報、中央社、青年社、建設日報等二十餘單位，特爲此事召開緊急會議，作了如下的決議：

- (一) 函國民黨四川省黨部執行委員會質問；
- (二) 函四川省黨部監察委員會請予聲援；
- (三) 呈四川省府主席詢問貸款經過及分配情形；
- (四) 推代表張益弘等持書前往省黨部及省府

質問；

(五) 函請報業公會開會。

其致國民黨省黨部監察委員會的信，原文是：

「近查貴部執行委員會宣傳處長李白英，利用職權，假借補助本市與黨團有關之報社及通訊社爲名義，私向省政府接洽貸款六億元，事先並未提交執行委員會公決，亦未經過報業公會之決議，純然擅自任意分配，純以私人關係爲依歸，多數民營報紙及通訊社，固不免向隅，即與黨團有關之報紙，亦或有或無多少不等，漫無公平之標準，是否從中漁利，殊難究其真相。……目前物價高漲，報業困難情形皆然，無論黨報民報，均有生存之權利，政府既准其發行，自宜獲得貸款補助，且此項貸款，應由政府，出諸人民，政府非一黨一派所得而私，何僅限於黨團有關之報社，始享受分配之特權？且」

與黨團有關」一語，究應作何解釋？豈黨員各人所辦，即與黨團無關，而必限於黨官；况黨團主辦之報紙亦有未得分配者，揆諸情理，豈可謂平？當此黨團統一之時，貴會監督黨務，勵精圖治，自不容李白英有此偏私措置，以玷污黨譽，失望於民，如欲扶助新聞事業發展，代向省政府貸款補助，報業同人自甚感謝，惟須取得報業公會之同意，作公平之分配，方爲適當，倘如李白英之所爲，……適足引起糾紛，釀成報界之分裂現象……茲經本社等緊急會議決議，除電請執行委員會公佈此次貸款之全部真相外，特請貴會行使監察職權，彈劾李白英，予以瀆職之處分，以維黨譽，而儆貪污，不勝感荷！

新中國日報(青年黨機關報)十月七日刊載「讀者投書」，指出「李白英是過去建設日報社長，現任省參議員」，並聲稱：「在民主國家中，黨團經費應由黨員供給；政府經費，政黨及其機關一文不得沾染，國民黨早以此種表示，目前李白英竟以行政機關對新聞界之貸款，作黨團有關之部份報紙之用，此不僅爲國民黨惜，抑且爲實施黨政前途惜也！」

接着，中央社又發表省黨部發言人談話：本黨同志，向本黨申請貸款救濟，經本黨籌集專款，分別貸給，略資援助，此爲黨部對於同志必然之責任，如今後本黨經費充裕，不獨新聞事業，即其他事業，本黨對於同志，亦必盡其扶持之責。

遣筆貸款，總額計六億元，據說，分配得較多的，民意報八千萬元，中興日報，新新新聞等各四千萬，其他報社通訊社，則「多少不等」。另外，中興日報社長羅泳森，選由南京中宣部獨家領得補助費二億元。

日前蓉市報業公會又經各會員請求，召集全體會員大會，清算此次貸款，經決議，推出民風日報、建國新聞社等九單位負責辦理一切。十三日午後三時，九單位負責人在新新新聞社集議，通過：(一)代電國民黨四川省黨部，請求公佈此次報業縣市貸款之詳細分配數字，及其真相與經過，同時並請求對此次未能領得貸款之報社及通訊社，撥已貸款單位之標準，繼續貸予。……(二)呈請省政府援例比照此次已領得黑市貸款之單位標準，補行貸款，以昭公允。(三)發動五百黨團員聯名簽署，檢舉李白英，以肅貪污之風。(四)定十五日邀請省黨部政軍各機關首長報告詳情。又悉：報業公會定十五日午後三時，召集全體會議，以便連帶具報四川省府，援例申請貸款。(十月十五日寄自成都)

廣東水災的回顧

災民四百萬人

廣東水災起於六月旬的連綿細雨，日久終於形成山洪暴漲，除瓊崖和南路各縣外，災區遍於全省，東、西、北三江都十分嚴重，雖然事情已成過去，但它對於國計民生有着鉅大的影響，我們略加回顧，也許不是毫無意義的吧。

首先，當時在東江方面，梅縣、興寧、五華、蕉嶺、翁源、豐順、新豐、連平、和平、龍川、河源、老隆等地都是一片汪洋，沉船、塌屋、溺斃人命和牛豬牲畜，時有所聞，被視為羅卓英治粵唯一得意之作的馬鞍圍也被沖毀，以致承辦負責人晝夜私逃。當時曾為了馬鞍圍工程舞弊問題在省參引起了激辯，有的認為建廳應負責任，但建廳却說善後救署短發了賑米，而善後救署又來了一個否認，一推了之。

四五人；烏石崩屋一〇四間，災民四〇四人；東義鄉崩屋四二間，災民一三一人。災後難民搶米，彷徨道左，露宿街頭，景象淒涼。

統計東江的惠陽、博羅、河源三縣，塌屋達萬餘所。從化由六月一日起即有八八個基圍被水沖潰缺口，共長五十餘哩，損失田禾五萬餘畝，屋宇二千間，鄉村三四十條，死去四十人，被災人民共五萬餘。

在東莞，全縣人口八十萬，災民達三十餘萬人。惠陽共五十餘鄉，有二十餘鄉被浸，災民二十萬人以上，耕地損失達三十餘萬畝，尤以馬鞍圍一帶為甚。（六月二十三、四日廣州各報）

其次，西江方面的三水蘆苞，為西北江及各支流交錯之處，水勢遠較東江洶湧，水淹程度，也較東江為甚，不少村莊，盡被水淹沒，常見巨樹梢及山坵在水中露出頂部。據西江散賑團長謝鶴年對記者談，西江七縣災民達七十萬人，受災田畝一百萬零五千五百九十八畝，崩缺基圍六十餘個，毀屋三千七百六十八間。田禾被

水浸半月以上，時間過長，以致農產品盡行失敗，即種籽也蕩然無存，災民於水退後仍無家可歸，露宿郊野的比比皆是。

中區番禺縣屬各鄉受災水田面積達三千餘頃，禺北之禾風、同風兩鄉已沒有收成希望，滘湖、蚌湖附近，災民遍野，江村鐵橋亦被沖壞，災民集中在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之旁，搭棚露宿的千餘人。滘湖方面災民，集中中山農場高地等待救賑，上馬北禾田損失約四成，下馬北約損失八成以上，受災面積約十五萬畝。禺南則自南山峽以上，受災面積遼闊，如古墟、三山、勒竹、石壁、九如一帶盡成澤國。

總之，這二十多年來所僅見的廣東水災，災情的嚴重與廣泛，實毋庸多贅，各地災情也舉不勝舉，除了南路因地勢較高，河道低下，少受禍害外，東、西江各地基圍高於屋頂，一被沖破堤基，便不可收拾了。

據水災緊急救濟會七月十一日招待記者的報告，謂截至十日止，受災縣份六十七個，受災鄉鎮四百三十個，損害耕地一千

陳微子

一百四十七萬三千五百九十八畝，屋宇全部被毀七千三百三十二間，局部被毀二萬一千六百七十間，沖潰圍基四百七十五處，缺口長度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一百零五公尺。受災實在人數三百九十萬零九千三百一十七人，死亡五千六百一十四人，受傷及失蹤一千三百九十七人云。可見災情一斑了。

得不到賑濟的

實惠

整個六月廣東都在水災苦難中，連綿了一個月，雖然很快地成立了，但工作始終不見展開，災民不處於水，也死於饑饉之手了。雖說救災如救火，但救災請公却不曾像火燒了自家房子的那麼緊急。

暴風狂雨襲擊了各地，農村老百姓面臨着這危險的日子，是如何的嗷嗷待哺。但是儘管災民踏入死亡的路，儘管有人高唱救災的調子，却從各方面傳來了背地里發水災財的

消息。其中善後救濟的米估了二成混雜的米糠和碎粒砂石，連性者也不下去，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即使連這些性者也不會吃的東西，災民也不是個個能夠受惠的。而且廣東省水災緊急救濟會本身就很有些不安。

水災會是水災初起時在六月間成立的，幸賴各方面人士的捐助，賑款日有增加。一般人以為水災會自六月成立至七月四日止，收到捐款二十餘億元的時候，經第六次委員會通過過放於銀號拆息，可是這項消息從沒正式公布。到了七月二十七日，該會第十一次會議時，纔由保管組報告放息的结果；據熟悉金融市場的人說，那報告所列的利息數字實在大有問題，恐怕實際上要超出很多。

這樣，却叫水災會諸公慌忙來了一個否認，說水災會的工作是義務性質，並沒有利權可圖，賑款涓滴歸公，沒有舞弊或放高利貸云云。後來並公開會計數目，刊之報端；之後，也沒有人尋根究底，便算完了一回事。我希望這備拆息之說，不要像常

言所道「中國人遇水漲脚，痛了良心吃死人骨灰」纔好。

不過，這次水災會收到各方捐款計達國幣八十九億一千六百四十二萬餘元，另港幣二萬九千九百一十八元，美金一千零六十元，藥物及罐頭一大批，究竟災民得了什麼實惠，詳細的賑濟情形又如何，却是一般人要明白的。

農民不能等着

餓死

已經是災難重重的農村，又加上了一重難以忍受的災害，廣東的農民在殘喘中過着日子。他們的苦難辛酸，在這無聲的社會裏沒有人來代他們申訴，他們的呻吟被壓着使外面聽不見一點點聲音。中國的鄉村老百姓是富於忍耐力的，但挨苦也要有個限度，連活命也活不來，他們是不能等着白白地餓死的。不久以前，增城方面的「奸匪」數目增至數百人，準備聯合攻城，致使廣州方面趕快調了一團人去「圍剿」，以鞏固「外圍」。另一方面，連個學期裏，農村出身的災區學生，許多是停了學，眼見問題是會漸漸更嚴重起來的。（十月十二日寄自廣州）



1



2



3

關於「魯迅傳」的一點事實聲明 范泉

「時與文」二卷六期上載有景宋先生的「魯迅傳」序一文，因為文內述及拙譯「魯迅傳」的「校訂」事件，謹就事實聲明如左：

(一) 景宋先生說：「日譯本魯迅傳未出版前，確曾有先睹之榮」。又說到原著者有若干主觀之見，「待到譯者把譯文給我看的時候，曾經把這一點頗為重要之處說明了，似乎譯本出版，多少刪掉了一些」。是可見景宋先生閱讀譯文，並將錯誤的事實予以糾正，實甚明顯。

(二) 景宋先生說：「在『文藝春秋』介紹時，編後記裏就硬被說是『許廣平校訂』的了。」其實文藝春秋的歷期編後記中，絕未有「許廣平校訂」字樣。僅僅在一卷二期，在書前的文化報導小新聞裏，提到一句，且亦並未說到「校訂」，而僅言事實上的「校正」。

(三) 景宋先生說：「與之交涉，這不能算『校訂』，因為我並沒有拿日文與譯本對校過，並且要求下一回予以更正。待到次一期的『文藝春秋』到手，翻開編後記一看，那更妙了，大意是說：魯迅傳許廣平並沒有從日文對校，不過是她校訂的。」其實當時的事實是這樣：景宋先生向譯者提出必須更正時，特別強調未懂日文，恐被人誤解一點（至今該序文中還是堅持這一點）。所以在文藝春秋一卷三期的編後記中聲明，「並未經日文本校訂」。作為一個編輯人的實職，似已盡到最大努力。否則唯有說該書景宋先生並未當目，且亦並未提供任何意見，並未糾正任何事實，但與事實違背，似

更不應昧沒良心。至於景宋先生說「不過是她校訂的」一句下文，那是純係景宋先生的臆測之辭，絕非事實，且亦無此存心。

(四) 景宋先生說：「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的時候，也仍然登廣告說是我校訂的。」其實開明刊登廣告，事先未交譯者閱看，等到通知，已經不及。譯者未敢擅刊景宋先生名號，早在請錢君甸先生設計封面時已可窺見。無論該書之封面或版權頁上，均未刊景宋先生校訂字樣，此可見譯者絕對無意沾污於景宋先生，實甚明顯。

(五) 至於在拙譯「魯迅傳」的序文中，說到「譯者邀請許廣平先生加以詳細的校閱。許先生曾把原著歪曲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紙片記錄下來，賜贈譯者加以改正，並且當面又獲得不止一次的解釋。」這些都是事實。譯者所以這樣聲明，其一是感激景宋先生的盛意，其又一是譯者不願以景宋先生的寶貴的糾正作為自己的功勞。事實具在，無庸贅述。

總之，譯文本魯迅傳的出版，能夠糾正了不少錯誤，這都是景宋先生的教益，譯者自應鄭重致謝。至於該書原作者為日本軍閥辯護，根本不值得一讀，那是另一個問題。而說到譯文與日文本對照閱看的工作，則在該書「附記」中說得很清楚，是夏丐尊先生，並非許廣平先生。

以上云云，純係事實，譯者不敢昧沒良心，歪曲事實，絕不存有任何成見與偏見，向讀者申述原由，以釋誤會。最後，仍向景宋先生謹致謝忱。

藝文雜誌

魯迅對自己著譯的訂正

寒山

誤譯和誤排

「譯文月刊」終刊號上，有魯迅先生的一封信，編者加了一個題目，叫作「訂正」，現在抄在下面：

編輯先生：

有一點關於誤譯誤排的，請給我訂正一下：

一、「譯文」第二卷第一期的「錄」裏，我把 Gannove 譯作「怪物」，後來覺得不妥，在單行本裏，便據日本譯本改作「頭兒」。現在才知道都不對的，有一個朋友給我查出，說這是原出猶太的話，意思就是「偷兒」，或者譯為上海通用話：賊骨頭。

二、第六期的「戀歌」裏，「雖是我的寶貝」的「雖」字是「誰」字之誤。

三、同篇都一切「解」字，都是「懈」字之誤；也有人譯作「椽」，我因為發音易與製膠皮的「椽皮樹」相混，所以避而不用，却不料又因形近，和「懈」字相混了。

魯迅 九月八日

關於「錄」上的「賊骨頭」的譯文，在「魯迅全集」第十四卷第三二八頁上：

「孩兒們，一個頭兒來了！」「什麼？」「被帶加想。」「我是頭兒麼？」

依然是根據單行本作「頭兒」，還沒有改正。

至于索陀威奴的「戀歌」的「誰」字，在「譯文補」上已經改過來了；但一切「懈」字，仍然錯作「解」字。

「譯文」終刊號在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這封信沒有收在「魯迅書簡」裏。

「博徒別傳」的作者

「阿Q正傳」有一個小小的錯誤，魯迅先生在民國十五年寫給章索園的一封信裏，曾提到過的。

「博徒別傳」是 Roaney

Stone 的譯名，但是 C. Doyle 做的。「阿Q正傳」中說是迭更司作，乃是我誤記，英譯本可改正；或者照原誤譯出，加注說明亦可。

原來在「阿Q正傳」裏，有這樣的幾句話：「雖說英國正史上並無「博徒別傳」，而文豪迭更司也做過「博徒別傳」這一部書，」（見「魯迅全集」卷一頁三六〇）。我個人的意見，以為「全集」也不必改正這個筆誤，但是應當加註說明。

我手頭沒有英譯的「阿Q正傳」，不知對這個錯誤有沒有改正或註明；至于俄譯，據朋友說似乎還沒有改正。非大文豪，而其筆下的福爾摩斯，在中國亦可以算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

蘇聯·裴定著

曹靖華譯

路翎書店版

在介紹蘇聯作家的作品的工作上，曹靖華先生的貢獻，是非凡的，「城與年」又是他的一本新的翻譯，譯者自己說：自從他讀了「城與年」，就好像一片鐵屑接觸着一塊磁石似的，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牠的吸引。他覺得藝術價值愈高的作品，也愈難譯，或竟至不能譯。譯，那就恐怕要在某限度之內，損傷了牠的藝術。而且詩須要詩人譯的，把詩譯成解釋的散文，那結果，就無異成了榨盡了汁的甘蔗的殘渣了。譯更者說：「城與年」——這是抒情詩，他這非詩人，所以十多年來，每念及，也只有酷愛與贊歎而已。這一方面，固然是譯者的謙虛之詞；但也由此可以知道「城與年」藝術價值之高了。

「城與年」介紹

子菊

關於作者裴定的生平，在這裏，自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好在「城與年」的譯本前有作者自己的自傳可以參考，並有郭列斯尼柯夫的序言及譯者的後記加以補充，由此，對於作者，是可以得一個鮮明的印象的。

「城與年」的譯本，更可寶貴的，是有著列格勒寧木刻家亞歷支舍夫的本

刻插圖，而且因為這插圖會收藏在魯迅先生處，所以有先生在上邊題著的說明，因此這譯本又使我們多了一層紀念的價值。

那麼「城與年」這本書，究竟是描寫什麼的呢？當你一打開書本，或且接着翻下去好幾頁的時候，或且你會覺得摸不清線索，事實上，這是因為作者把故事倒置的緣故，「道倒置」，使小說增添了無限秘密，動力，使小說的情節緊張，使事件急轉直下的展開來，使讀者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到底，不終卷是不會釋手的。」因此，這本小說，首先有着一種吸引力。而它的內容，則更是寫的戰爭與革命的年代，這是一個驚魂動魄的時光，「我們還沒來得及從這一小時裏醒過來的時候，另一小時又把我們撞倒了，」作者把這樣的生活，描繪在這一部作品裏，更刻劃了在這動亂的時代裏，彷徨，矛盾，竟至瘋狂了的知識份子安得列，由此，提出了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基本問題，並非難了知識份子安得列的與社會脫離的個人主義，使這部作品，更有了一種強烈的教育性與啓示性。我覺得今日把「城與年」翻譯出來，是有現實意義的。

讀這本場面廣大，內容深刻的作品，介紹於讀者之前。





星海先生二三事

金穎

洗星海，正像一顆燦爛奪目的星，照耀着新音樂運動發展的道路。關於他的優點，朋友們已經說得很多，比如：生活的刻苦，學習的強烈，意念的堅定，工作的熱情，以及音樂作品的充滿着光、熱和勇氣……

對於星海，我了解的並不多，然而，確實確實，我是接受他精神的感召，走上了音樂工作的道路的。

隔了七八天，他想通了！明敏和星海相處多年，他告訴我兩件星海的事。

關於音樂問題，星海是懂得較多的，談話也很虛心精細，因此，朋友們就時常喜歡求教於他。

有一次，一個有關中國音樂的問題把他難住了，但星海並沒有強不知為知。

「我回去想想。」他說。當時，明敏並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隔了七八天，一個冬天的深夜，星海叫開門，歡躍地告訴明敏：「想通了，那個中國音樂問題。」

於是一五一十說出他的意見，然後如釋重負的回去。

又一次，一個蘇聯音樂問題再難住他。他要求回家想一晚。隔晨，他老早等在明敏的辦公室，急著要把答案說出來。

澈頭澈底熱愛人民

一九三八年，星海離武漢北上，這雖然不是他的新轉變，但無論如何，總是另一種生活的開端。如果說：這之前，星海的創作也為了人民，但那只是意

識上的，或者想望上的；到了北方，他才真正感到人民的可愛，不但思想上，在情感上也澈頭澈尾表現了對於人民的熱愛。一位同學的回憶足以說明這一點：

在一個盛大的晚會上，聽衆請他唱一個歌，他說喉嚨不好，他可以拉提琴，聽衆答應了，他就拉奏修伯爾特的「小夜曲」。拉完後，聽衆再要求他和他太太錢韻玲來了二重唱，他頗爲難，聽衆鼓掌不停，他倆也就欣然唱了一首歌。他這樣說：「我未學過樂，不能唱歌，但聽衆希望我唱，不答應，就給琴來搖，唱了，就給了人快樂。我們學音樂的最好不要擺出一個專家面孔，什麼人不對不唱，錢不對不唱，地方不對不唱，非要在音樂會的時候才唱，這樣成了「錢」的歌手，不是人民的歌手。」

就是這樣：他愛人民，人民也喜愛他；他向人民學習，人民的鬥爭生活也滋養他的靈魂。

寫壞了好幾支派克筆，絕不含糊一個音。

星海是非常用功的。「新的歌子，合唱不斷地產生，他寫一個大合唱總是緊張地寫七八天即完成。有時我們到他窩洞里去，他把他正在寫着的「民族交響樂」的寫成部份搬出來給我們看。那已是厚厚的好幾大本了。他向我說，他已經寫壞了好幾支派克筆。」（何其芳語）的確，星海創作生活的緊張是無可

新生活和新的性格

容方



這種風派，在斯大林格勒之戰裏，是達到了火熱燦爛的地步了；而在這艱難的戰鬥的火光裏，俄羅斯人的影子，是更高更大，是更加不能比擬。因此描寫這次戰爭，就成了一件極有意義和莊嚴的工作。我記得，我們曾經看過過了新聞紀錄片的「斯大林格勒」，那裏，雖然是一堆火的交流，然而却一樣的可以感覺到跳動着人類的真心，翻滾着人類憤怒的感情，矗立着蘇聯人民鋼鐵的意志。而「日日夜夜」則更把這真心，這感情，這意志，具體的顯現在銀幕之上了。我們不但看見了大炮、衝鋒槍，我們更看見了作爲炮手、槍手的俄羅斯人。這是描寫這大戰役的一部好片子。是，的，而且我們會奇怪，爲什麼一個女孩子能危險，不辭勞苦的工作；爲什麼能夠因爲在死亡鐘

的關問題，但是從這種性格的無比的力量裏，我們也看見了這生活的無比的力量，表現了它要克服一切困難；而且也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所以「日日夜夜」，雖然是一部戰爭的片子；或且說，是一部發揮著死的威力的片子，然而正因爲「日日夜夜」表現了那生活與性格的無比的威力，因此死亡好像在這裏也被征服了。當人死了的時候，但是你想到了他的信念，你會覺得他還是活著一樣。在這裏，「日日夜夜」這部片子，是把那勝利、真真的因素告訴我們了！

是什麼決定著歷史呢？是人，是新的。自然，看完了「日日夜夜」，我們會覺得它不免片段和單調，爲什麼這不能經過渲染，而表現得很有聲有色呢？我想這理由很簡單，因爲這種傳奇式的故事，在這次蘇聯的抗戰中，是極爲平常的事實，所以表現要取其生活化，看整個故事單純的和實際戰爭的日期和平行的描寫，就是一個證明。「日日夜夜」要你知道，這是蘇聯人民的性格；而不是單獨特殊的英雄的性格。同時，我們有一分尊敬的話，那麼我們在每一個片段之中，也會感到，那鋼鐵鑄成的形象中，所給我們的

推薦「日日夜夜」我讀過了「日日夜夜」，我也讀過了作者西蒙諾夫的其他作品：「穿蘇聯軍服」等，這些作品的英雄的性格，因此，全篇響著莊嚴的語言，皆瀟灑著英雄的氣息。讀了這種作品，你會覺得你面前立著一棵不能搖撼的巨樹，它的根鬚則盤根錯節的深植在泥土裏，除掉把整個大地翻轉了身，你是不能把它移動分毫的。這種精神時可來侵擾的伏爾加河上往來，是一種光榮，是一種生命的必需；而且我們會奇怪的，爲什麼一個營守住了了一處陣地，只剩下少數的幾個人，還能繼續的戰鬥，堅持的戰鬥，難道他們不懂得死和生的分別嗎？而且我們會奇怪的一個人的體力和精神能夠允許在火線下爬行幾個鐘點？不是幾個鐘點，而是無數次嗎？這是什麼東西，在克服，在衝過那精神和體力上的極限呢？

或且我們會奇怪的，爲什麼一個人，能夠沒有任何猶豫的，爲了別人，用自己的生命去擔任那從敵人處射來的子彈？或且我們會奇怪許許多多的事情，在我們中間是什麼東西，在改變了人們通常的面目。一句話，就是從新的生活裏成長起來的新的性格。自然，我們在這裏，不預備研究這生活與性格之間

的關問題，但是從這種性格的無比的力量裏，我們也看見了這生活的無比的力量，表現了它要克服一切困難；而且也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所以「日日夜夜」，雖然是一部戰爭的片子；或且說，是一部發揮著死的威力的片子，然而正因爲「日日夜夜」表現了那生活與性格的無比的威力，因此死亡好像在這裏也被征服了。當人死了的時候，但是你想到了他的信念，你會覺得他還是活著一樣。在這裏，「日日夜夜」這部片子，是把那勝利、真真的因素告訴我們了！

是什麼決定著歷史呢？是人，是新的。自然，看完了「日日夜夜」，我們會覺得它不免片段和單調，爲什麼這不能經過渲染，而表現得很有聲有色呢？我想這理由很簡單，因爲這種傳奇式的故事，在這次蘇聯的抗戰中，是極爲平常的事實，所以表現要取其生活化，看整個故事單純的和實際戰爭的日期和平行的描寫，就是一個證明。「日日夜夜」要你知道，這是蘇聯人民的性格；而不是單獨特殊的英雄的性格。同時，我們有一分尊敬的話，那麼我們在每一個片段之中，也會感到，那鋼鐵鑄成的形象中，所給我們的

的關問題，但是從這種性格的無比的力量裏，我們也看見了這生活的無比的力量，表現了它要克服一切困難；而且也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所以「日日夜夜」，雖然是一部戰爭的片子；或且說，是一部發揮著死的威力的片子，然而正因爲「日日夜夜」表現了那生活與性格的無比的威力，因此死亡好像在這裏也被征服了。當人死了的時候，但是你想到了他的信念，你會覺得他還是活著一樣。在這裏，「日日夜夜」這部片子，是把那勝利、真真的因素告訴我們了！

是什麼決定著歷史呢？是人，是新的。自然，看完了「日日夜夜」，我們會覺得它不免片段和單調，爲什麼這不能經過渲染，而表現得很有聲有色呢？我想這理由很簡單，因爲這種傳奇式的故事，在這次蘇聯的抗戰中，是極爲平常的事實，所以表現要取其生活化，看整個故事單純的和實際戰爭的日期和平行的描寫，就是一個證明。「日日夜夜」要你知道，這是蘇聯人民的性格；而不是單獨特殊的英雄的性格。同時，我們有一分尊敬的話，那麼我們在每一個片段之中，也會感到，那鋼鐵鑄成的形象中，所給我們的

的關問題，但是從這種性格的無比的力量裏，我們也看見了這生活的無比的力量，表現了它要克服一切困難；而且也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所以「日日夜夜」，雖然是一部戰爭的片子；或且說，是一部發揮著死的威力的片子，然而正因爲「日日夜夜」表現了那生活與性格的無比的威力，因此死亡好像在這裏也被征服了。當人死了的時候，但是你想到了他的信念，你會覺得他還是活著一樣。在這裏，「日日夜夜」這部片子，是把那勝利、真真的因素告訴我們了！

比擬的，在北方僅十八個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却寫出了他那短暫的創作生涯（約八年）中最豐富最輝煌的作品：「軍民進行曲」（三幕歌劇），「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三幕造型舞歌），「九一八大合唱」，「婦女大合唱」，歌劇「斧陽河」，以及「第一（民族解放）交響樂」，「生產舞曲」等等。

星海創作的速率是十分驚人的：包括八個曲子的清唱劇（Cantata）「黃河」——這是星海創作生涯第二期的代表作，連器樂伴奏就僅僅寫了一個星期。

當然，星海創作的緊張迅速並不意味他的粗率、馬虎，恰恰相反：一個降三度（「九一八大合唱」），一個裝飾音（「怒吼吧黃河」），他都給予精密的推敲安排，「一個音都含糊不得的，甚至連終止時應該延長多少時間或應該休止多少時間，都像天生的一樣，輕易動不得，否則便「面目全非」了」（星海）。因此，星海不愛隨意修改作品，寫不好，寧願從新寫過。「黃河大合唱」里的「黃河頌」就接受朋友的意見寫了三次，「黃河怨」也重

寫一次。

星海的創作態度十分緊張嚴肅，星海的每個作品確實是新音樂創作道路上的一顆明珠。

星海是不朽的

星海探究問題的負責，創作生涯的緊張嚴肅，以及尊重羣衆、熱愛羣衆等等優點，雖然只是所有優點的一部份，但也足夠我們學習了。

學習星海！星海是不朽的！

廿六年十月十七日

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正在偵查好萊塢的共產黨活動。這是一件極「有趣」的事。

據亞道爾夫孟都說，「好萊塢充滿了許多危險的導演與演員。」

但埃第康泰、亨利方達、寶蓮高黛、凱絲琳赫本、康納維爾德等十五個人，却指出此種偵查爲「可厭而令人憤怒」。

一個參議員說：這種偵查「威脅美國人民之自由」；另外一個參議員「抨擊衆院委員會乃具有「法西斯蒂思想」。



郭沫若已把歌德的詩劇「浮士德」譯完，全書一萬六千行，十二月出版。又，Franz Statten 所作的「浮士德畫冊」，亦將同時出版。

按：「浮士德」以前有周學普的譯本。商務出版，列爲「漢譯世界文學名著」之一。

中華全國木刻協會主辦的第二屆全國木展，定下月三月起在大新樓舉行，全部作品，即將裝框展出。

第一屆木展于今年四月四日舉行，據「觀察」測驗的結果，大家最喜歡的是對現實作啓示性或反抗性的作品。

孩子們的甘露

林其民



看「小馬戲班」演出

看了「小馬戲班」的演出，我一方面爲台上的孩子們的苦痛的遭遇所感動；但是，我也更爲台下的孩子們的天真熱烈的反應所感動了。這是一羣多麼稚氣的靈魂，心地坦白，感情純真，他們是一朵朵正在開放的花朵，他們多麼渴望着精神上的甘露來滋潤。但是他們得到的是如此之少；而一生沒有得到過甘露的清甜之味的，更不知有多少。想到了這一點，我們是多麼盼望中國福利基金會兒童劇團，能夠經常演出；並且把演出的地區擴大，因此使更多的孩子受到滋潤啊！

只是，雖然兩者兼顧了，它們卻沒有更合適的結合起來，情節的發展，覺得非常單薄，不能緊緊的抓住孩子們的注意。實際上，作者應該在這方面

有嚴密的構思，而不僅僅僅僅依那時起時落的熱鬧場面，來吸引孩子們的興趣。而且試到時起時落的熱鬧場面，在實際的馬戲班裏，就有很多東西給我們利用，我們絕不該用「王大娘補缸」插在裏面，反的，小孩子開火車，則非常的有興趣，有想像

，而且在這想像裏，更閃爍着孩子們的稚氣與天真的感情。在一齣兒童劇

，正需要着這種東西，我們才能貼進孩子們的心靈；而且引領他們的感情到一種非常優美的境界裏。

同時，在全劇看起來，寫紅鼻子壓迫孩子的情

形，是夠分量了。但是，寫孩子應該怎樣生活，或且說應該做怎樣一個好孩子？這種人格上的啓示和教育，却是不夠和不完整的。自然，上面所提出的，只是，我期望他們更臻完美的意見，而編劇者現在的努力，却已非常令人敬慕了。

這次演出，佈景設計，非常成功，尤其第三幕與第四幕的兩個景，打開了幕簾，就給了我們一個新鮮的印象，尤其在色彩上，隨着設計者的想像，確能自由揮灑，不見拘束。

第三幕的一座茅屋，前面一顆果實繁榮的樹木，那種濃烈的幻想的氣氛，是多麼的動人。第四幕的馬戲班，它比一個馬戲班的實際情形，似乎更能表現它的趣味。最好的，它是一個孩子想像中的馬戲班，所以更多了一層幻想的色彩；更充滿了蓬勃的興趣了。

「小馬戲班」是描寫一個叫紅鼻子的，他騙來了許多孩子，開了一個小馬戲班，他對這些孩子，用盡了剝削壓迫的手段，逼迫着這些孩子們，結果不得不逃了出來，於是他們就憑了自己的能力，組織了一個大家在一處工作和學習的馬戲班，大家在一塊快樂樂樂的生活。

這故事，用紅鼻子做代表，貶責了許多吮吸孩子們膏血的辦兒童事業的人，用孩子們組織馬戲班，來鼓勵他們勇敢和創造的精神；「小馬戲班」這



讀者之聲

公教人員自嘆

編者先生：

這幾個月來，公教人員調整待遇的消息差不多總在報上佔了很大的篇幅，局外人或許以為公教人員的待遇總已改善了些吧！然而按諸實際，却每每愈下。同人等謀養常積，荷包空空；飢寒有份，借貸無門；有家室之累者，更欲泣吞聲，自悲命苦。茲將自覺身受苦况，草成小詩八首，願借 貴刊披露，以資呼籲，而鳴不平。

讀者 朱絳上

十月二十六日 上海

公教人員自嘆！

(一) 日日盼加薪，夜夜盼調薪；耐著氣兒等，種帶東東等！
(二) 盼到八月臨，加薪十萬整；莫怨數目小，猶勝於餓餅！

太平洋月刊負責人

否認造謠中傷「時與文」

編者先生：
我也最貴刊的忠實讀者，所以我的話也可以算是他們的「讀者之聲」吧！在貴刊的第二卷第六

期的讀者之聲裏，載有一篇叫做「刊物胡亂造謠」的「讀者之聲」，說北平太平洋月刊刊造了你們的話，說它在信箱裏說過貴刊是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四一八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機關刊物」是有背景的，也就是說有後台老闆的。我看了之後嚇得渾身亂顫，因為我是太平洋月刊的負責人，如果這種造謠成了事實，貴刊訂問起來，我是要負刑事責任的，可是我翻遍了我們的刊物，並找不出以上那些存毀於貴刊名譽的話來，我想多半是貴刊的「讀者」，故意惡作劇吧！我們同是中國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而且我們還是年青孩子，正當本刊現在上海試銷，需要諸位先輩指導提拔的時候，突然來了這麼一件意外事情，真使我輩年青人不知所措，以貴刊在上海的勢力而論，足以能夠打擊我們不能立足，這使我們不能不低頭，因為「時與文」是「可靠」的刊物，「時與文」上的文字當然不會「造謠」，「時與文」說太平洋月刊胡亂造謠的刊物，在上海人心裏，當然太平洋月刊就是一個胡亂造謠的刊物，誰肯看胡亂造謠的刊物呢？這樣我們就永遠沒有希望在上海出頭露面了，所以懇請貴刊慈悲慈悲，把上期的那段「讀者之聲」的地位讓給我一次，叫我也訴訴冤屈吧！我們不敢要求貴刊對我們道歉或更正一類的話，因為我們是我們的

先輩，我們應當尊重您們！我們更不敢也來一套類似「讀者之聲」的玩意，對貴刊有所「不禮貌」，我們只敢以晚輩對長輩的禮貌與程序，請求您們把我們這封信一字不漏的登在貴刊曾經說我們胡亂造謠的那個地方！
您們的北方忠實讀者 耿笑天（蓋章）十月廿一日。

(答)關於本刊二卷六期「讀者之聲」錄載「刊物胡亂造謠」的經過，我們願先作一個較詳細的說明。據我們所知，朱先生是一位常讀本刊的青年，他似對漫畫有著很濃厚的興趣，曾經一再把他的畫稿找來，有時郵寄，有時還親自送到，所以本刊經理部同事對他的印象很深；但每當他親自送稿之時，照例送掉即走，從無一語交談。這次編輯部讀到他的投書，雖然並不感覺十分驚訝，却感覺他所提出的問題實有即予答覆的必要。我們之所以有這二重感覺，原因只是一個：外間造謠，亂說本刊是機關刊物、有背景、有後台老闆，前後已經不止一次；我們對這一類的謠傳，一面認為滑稽可笑，一面管覺這是惡意的中傷毀謗，不堪默爾忍受。這次朱先生來函所曾情節，非常逼真，我們便想把太平洋月刊找來一看，不幸找了幾處，並未發現。當時我們為慎重起見，故於答覆中，除覆述本刊歷來的聲明，表示本刊並不隸屬任何政黨，而是一個超黨派的刊物之外，又說：「太平洋月刊，果如所言，胡亂造謠，則不值一駁，徒然有損該刊信譽而已。」這裏的「果如所言」，當然即指朱先生之所言，可見本刊對於太平洋月刊，並不存心疑慮。現據耿先生的來信，又同想到處理朱碧波先生投書的經

過，覺得很慚愧，承認這是編輯部同人一次不小的疏忽，未將太平洋月刊找來一查。
在寫這復答之前，跟上一回一樣，我們為慎重起見，仍想拜讀一下太平洋月刊，藉明究竟，但結果僅找到第九、十期各一冊，在這兩期信箱及「問答」中，并無涉及「時與文」之處，其他各期，尚未找到，但是為了迅速了結這一樁不大的事情，我們決計不再等待，就把耿先生的來信與我們的答覆一齊登在這裏了。耿先生鄭重聲明太平洋月刊並未「胡亂造謠」；果如所言，則朱碧波先生殊有對人不起的地方，幸係一時糊塗弄錯，則猶情有可原，若為胡亂造謠，則徒然有損他的信譽而已。願朱先生對此有所解答！
——編者。

時與文
刊週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發行人 程博
編輯者 洪博
經理部 上海估嶺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附刊

美國的高物價與

新經濟危機

林滄白

大學教授精神的墮落

向曉

今日大學教育的病象

陳際雲

及其診斷

英國統治馬來亞的

新花樣

鄭道傳

9

國立南大圖書館

卷二第

通訊

內戰在安徽

許柏

宋子文到任後的

林鬱

廣東政治·經濟與治安

幼耕

浙大校友學生被捕案

辛莘

秋風裏的北平文化教育界

于華

華南的走私

方成

漫畫

東北官吏每月貪污款項，可辦九十五所著名大學
有人「扶導學運」！
救濟物資原來是救己物資
蘇北的所謂自衛隊、肅奸隊、人民服務隊



讀者之聲

東北官吏每月貪污款項可辦

九十五所著名大學 嘉文

本月二十日大公報載：行政院會計處之兩點說明：一、每月官俸與教薪比較；二、北洋等六大學，在九月底以前的經常費用、建築及擴充改良費、生活補助費，共計六八、四五三、五〇八、〇〇〇元，藉以較斥大公報本月十二日星期論文所稱：「不論平常時期，非非常時期，都是官俸高于教薪，教薪連用來維持生活也不夠；現在辦一座大學，每月只有三千多萬，謂此兩點絕非事實等語。

按以上六大學係國內規模較大者，至于其他較小學校用款當更少于此數。依行政院會計處所公佈數字，則此六所大學，每月用款為七、六〇五、六

有人「扶導學運」！

胡誠

雙十節那一天，我親眼去某大學訪晤一位數月不見的老友，在該校民主牆上發現了一則該人聽聞的消息。

據揭示在上面得自某方面由該校某學生加註的

會選舉中打擊反對派，取得自治會領導權，如何操縱會場，採取有效辦法，請選自治會理事，如何使出種種偽善姿態，取得同學的信賴與擁戴，如何打入反對派，刺探敵方的機密……等等。

救濟物資原來是救己物資！

思粵

善後救濟物資本來是用來救濟受過戰爭災禍的人民的，但一到了中國，却變質為救己物資了。難怪在長沙鄉村中曾經流行一首這樣的對聯：「救濟署救濟救濟署員，看守所看守看守所長。」雖然也有些微的物資能深入農村，但麵粉變成麥糠了，奶粉變成麥粉了，儘管窮人餓得沒有飯吃，麵粉却被豪富之家拿去作包餃點心。在有些地方，就根本不分配給窮人，而把物資變賣，充「鄉保辦了費」或各種地方捐稅，以減輕富人的負擔。至於省府縣府，更是整批標賣，以充經費，如南岳市之修環山公路費三億元、修築市街費一億元、以及中正圖書館的建築費等。在農村中，分配救濟物資沒有一點標準，全由鄉保甲長擅自決斷，因此要平日討得他們歡心的人纔可領到。有

上面演講，在該期行將結業的時候，曾舉行過一次學運檢討會。該會官冕堂皇標出了一個漂亮的動機：討論以後如何扶導學運。當然，其實他們是討論如何去抑止學運。

蘇北的所謂自衛隊·肅奸隊

·人民服務隊

高燦

勝利後不久，我就回到了家鄉——口岸，這時候新四軍已經撤退了，一切都混亂。隨即國軍進駐了來，情形就更加混亂了：物價拚命的往上漲，軍隊隨便把人抓來，編入自衛隊，要他們放哨，加之縣政府又不分皂白，到處逮捕所謂「不良份子」，弄得人心惶惶，終日不安。

「人民服務隊」成立於今年四月裏，它所吸收的幹部，大都是一輩無知或受騙的青年，雖說要中不違反他們的意見，阿諛阿狗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參加進去的。團員每天須受幾小時的黨訓，餘下的時間在外面做些宣傳工作。

勝利後不久，我就回到了家鄉——口岸，這時候新四軍已經撤退了，一切都混亂。隨即國軍進駐了來，情形就更加混亂了：物價拚命的往上漲，軍隊隨便把人抓來，編入自衛隊，要他們放哨，加之縣政府又不分皂白，到處逮捕所謂「不良份子」，弄得人心惶惶，終日不安。

「人民服務隊」成立於今年四月裏，它所吸收的幹部，大都是一輩無知或受騙的青年，雖說要中不違反他們的意見，阿諛阿狗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參加進去的。團員每天須受幾小時的黨訓，餘下的時間在外面做些宣傳工作。

時文

刊週

發行人
編輯者
經理部

程博
時文週刊編輯部
上海崑崙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ning Road, Shanghai, China

美國的高物價與新經濟危機

林滄白

越來越近的新經濟危機

美總統杜魯門於上月底，為解釋召開國會特別會議，對全國發表廣播演辭，他認為「救濟歐洲之路綫，務須與壓制國內高物價相配合」。他在提到國內高物價時坦白地說：「我們發現最近的情勢已經在我們前途上起了障礙，我們國內的繁榮已經受到通貨膨脹的威脅」，這因為「生產雖高，物價跟着上漲」，於是「有不少人無力購買必要的物品，有不少人的購買力減縮了」。這結果是：「當那麼許多人享不到繁榮的時候，不景氣的路就擺在面前了，因為糧物價膨脹以後，跟着經濟的崩潰，因為不景氣之後，跟着普遍的危機」。

造成國內高物價的原因是什麼呢？杜魯門說：「國內物價高漲的主因，是我們人民對物資的求過於供」。於是他指出：「物價過份高漲，意思就是物資的分配不公和不智，我們祇有使物價配合人民的收入，才能應付這個問題」，因此，他「迭次催促物價自動減低」。在他提出國會應採取行動，制定廣泛的立法內容以後，就是上面所說的，他主張救濟歐洲之路綫務須與抑制國內高物價相配合，就是說，對外援助與國內高物價併為一談。

今年四月間，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實業股票的市價急劇地下跌以後，杜魯門也曾經過一次演說，在那次演說裏，他承認物價的繼續高漲，而且，惡劣地影響着幾百萬美國家庭的地位。於是，他呼籲美國商人自動減低物價。那次演說，是這次大戰以後，美總統第一次承認過份高漲的物價將引起「蕭條或不景氣」。在六個月後的今天，杜魯門總統却不得不面對着較前更為惡劣的情勢了。

兩次演說，充分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一切真正恐慌的最後原因，是羣衆的貧困及其消費力受限制，一方面是獨佔資本家的生產增加，物價高漲，利潤加厚，另一方面是美國大衆的收入日益減少，生活愈趨惡化，兩

道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法則。不過，今天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先前美國獨佔資本家還說危機是不存在的，是陰謀的煽動家用來恐嚇善良的美國人的一種幻象，而今天，美國總統已不止一次地發出警告，促起美國人民的注意，現在不景氣的路擺在面前了，最近的情勢，已經在他們的前途上起了障礙，跟着將是經濟的崩潰和普遍的危機。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今天美國的情勢，比六個月前更壞了，新經濟危機的恐怖正迅速地在美國越來越近地生長起來了。

高利潤來自高物價

這次演說，美總統雖多多少少認識了越來越近的新經濟危機的恐怖，但是，他認為美國人民對物資的「求過於供」，是刺激物價高漲的主因，這說法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美國物價的波動，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上漲百分之二十。戰爭結束以後，各種物價統制與定量分配，逐漸取消，物價繼加速上漲，計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上漲百分之十五，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七月，却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三。而七月以後，九月中旬，據美國紐約一個商業調查機關發表的統計數字，表明：九月十六日美國三十種基本商品，的物價指數已達二八六點二八，而上週為二八〇點一七，上月（八月）為二七三點七，去年為二二三點九八；另據華盛頓政府勞工局九月二十五日發表的數字，在上一星期中，一切物品的批發物價指數，到達一九二六年平均物價的百分之一五八·一，較一年以前增加百分之二七·七。

美國在戰時生產的最高峯，即在一九四三年，公司的利潤在付稅以前，達二百五十萬萬元，這數目相當於一九二九年的利潤總額的二倍半，比一九三六——三九年的平均利潤，幾乎大了五倍。戰事結束，原是重利來源的優厚的戰時合同，隨着取消了。這種利潤，無可避免的一度下跌，在一九四六年的春季，即在物價管制還沒有取消以前，付稅前的利潤總額是

一百五十萬萬元（以年計）。這數目較一九三六——三九年的平均數字大三倍。可是，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季，實際上物價管制已被破壞，全盤廢除以後，利潤的年率又升到了二百二十萬萬元以上。在第四季，利潤更形高漲，終於達到了一九四三年的最高水準，到了一九四七年的第一季裏，利潤還在增加，據「華爾街雜誌」的觀察，一九四七年的最初三個月，一百四十九個主要產業的利潤比一九四六年同一時期的利潤平均數，高出百分之二八二·七。此次研究遍及十五種工業，包括了最大的廠家。鋼鐵工業的利潤，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至三月間，合計一〇五，六七一，八八一美元，而一九四六年同一時期內，則為二二，四六二，一六二元。鐵道利潤為七，三九八，七三三元，而一九四六年同一時期為一，六一七，八〇四元。

付稅前的利潤，已略如上述，付稅後的利潤，也有一提的必要，一九四三年付稅後的公司利潤，達一百萬萬元，這數目超過了一九二九年的高利潤，那時戰時捐稅雖然激增，但仍相當於一九三六——三九年的平均額的二又二分之一倍。重利稅廢除後，一九四六年付稅後的利潤昇到一百二十萬萬元，那年第四季，利潤年達一百五十萬萬元，超過一九四三年達五十萬萬元。一九四七年第一季利潤爬得更高。上面所引述的數字，是曾任美國戰時政府經濟機關主管人員所組織的「經濟穩定委員會」的報告。

報告書的作者引述這些數字以後，認為這些利潤「太膨脹」了。他認為這些數字的重要，在於「估量了價格和成本之間的距離，表示出兩者間是否如此地合理平衡，就是：不要那末接近，商人無利可圖，也不要那末懸殊，使購買的一方感覺無力負擔」，而結果怎麼樣呢？「膨脹得超過商業的健康所需要，膨脹得犧牲了大眾的購買力，而商業和國家其餘部份的繼續繁榮是依靠着購買力的」。報告書的作者，不能不提出這樣的警告。

記得在一九四六年六月間，美國國會在全國製造業家協會（老關們的組織）指使之下，擊破了物價管制。那時，他們向社會有過諾言，他們說：「物價的「自由」訂定，會刺激生產，一旦生產增加，物價便會自然而然的跌下去的。一九四六年二月間美國全國製造業家協會的一個廣告中說：取消對於製造品的物價管制，生產就會迅速的增加。這就是你能够出得起價錢，購買你所需要的東西的辦法」（美國勞工研究會），然而，物價

管制廢除以後的情形怎麼樣呢？物價是高漲了，利潤也增多了。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美國總商會（與產業家協會一樣，是美國獨佔資本家的組合）的年會席上，副會長薛利夫表示物價將經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正常程序而調整，將伴同着一次「溫和的生產減縮」。這就是說，物價管制取消以後，獨佔資本家就可一無顧忌的展開自由競爭，就此可以併吞若干企業，一方面，造成廣大的失業隊，可以削弱勞工運動，另一方面，高利潤的維持，在某個限度內，生產量的減低可以取償物價的上漲，這也就是他們所說的，一次溫和的減縮，在他們看來甚至是有用的。

所以，杜魯門總統所說的：「國內物價高漲的主因，是我們人民對物資的求過於供」，是不能使人同意的，如果物資求過於供，則不是應當趕快大量的生產嗎？這不是對獨佔資本家展開自由競爭的鼓勵嗎？是廢除物價管制能促使生產增加的一種通詞嗎？現在，美政府勞工局的估計：在本年上半年，棧房裏囤積的商品之總數達三百四十億元之鉅。若為了消費這些商品，以現行的生產及維持當前的物價水準計算，照美國「商業週報」的估計：消費者必須在一九四七年內擴大百分之廿五的消費量纔行。以此看來，怎麼可以說是物價高漲的主因是「求過於供」呢？既不能對症下藥，則呼籲「催促物價自動減低」是可能的嗎？

物價高漲的兩個標誌

物價高漲，獨佔資本家的過份利得驚人地提高了，紐約牛奶場合作社的主席，巴洛德尼亞會經指出：「他們的合作社以每夸特牛奶一角六分的價格出售，已經獲得驚人的利潤，而最大的牛奶公司已經賣到每夸特二角一分或二角二分。」物價高漲標誌的一面，就是獨佔資本家的發財，另一面，則是美國大眾購買力的減低和美國人工資的減少了。

美國商務部會以一九四六年前八個月內的美國各級人民（包括獨佔資本家）之所得，跟一九四五年同一時期的比較：

項目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五年
工資及薪金	六八,三七〇	七五,七四三
股息及利息	八,三八八	七,三七九
企業家所得	二一,一二〇	一八,六〇一

政府補助金	七五〇	六四五
其他	七, 三三六	四, 一〇三
總數	一〇五, 九六五	一〇六, 四七一

從上表看來，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五年同時期內，獨佔資本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四左右，可是，工資和薪金的所得却減少了百分之十，但實際尚不祇此，據美國勞工局的統計數字，一九四六年的工資比一九四五年減少百分之廿三。假如因一九四六年美國物價高漲，再計算美國工人購買力的損失，則實際工資與一九四五年比較，却減低了百分之三十。再看下表：

年份	平均每週工資	物價	每週實際工資
一九三九	二二·八六	一〇〇	二二·八六
一九四四	四六·〇八	一四四	三一·九八
一九四五	四四·三九	一四七	三〇·二〇
一九四六	四三·七五	一五七	二七·八七

從上表看來，每週工資平均而言，雖較戰前增加了二分之一，可是實際工資，却又回返到接近戰前的水準。以一九四五跟一九四六年比較，則一九四六年的平均工資減少了兩元三角三分，即百分之八，工人購買力的低落，由此可知了。

再看前經濟穩定員吉斯德·鮑爾斯於六月間的報告：「在上十月中，工資率增加了百分之九·五，而批發的價格，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在同一時期中，消費者的價格「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於消費者的信用借款的擴大，也足以證明美國的所謂「繁榮」究竟是怎麼回事了。據商務部的一個報告，信用欠賬，即裝置欠賬，服務欠賬，單純的支付借款以及掛賬的容量，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底，總數達美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那便是以十二個月為一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並且，比一九四四年中的驚人的消費者信用借款的數字，還要增加了一倍之多。

美國的人民大眾，尤其是工人，生活日益惡化，而失業人數的增加，還在獨佔資本家是並不担心的。一九四七年三月間，工業生產指數為百分之一百八十四，去年九月為百分之一百七十四，今年三月間的在業工人為五千六百萬，去年九月為五千八百萬，這就是說，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十，

而在業工人却減少了兩百萬。現在失業人數的統計，官方說是二百卅四萬人，而經濟學家畢特曼却說，這個數字只包括長期陷於失業境遇中而且經常尋找職業的一部份人。真正失業的，約八百萬人。

總結起來說：一方面，是獨佔資本家的生產繼續增加，物價高漲，利潤加厚，另一方面，是美國大眾的收入不斷減少，生活繼續惡化。這結果，國內市場大大收縮了。於是，他們就會遭遇到這個問題：那裏去銷售他們的生產品？

「杜魯門跡近玩弄政治」

不用說得的，如果能把數百萬的無業游民吸收到生產事業，提高所有薪工階級的所得，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那末在實質上，就擴大了美國工業的國內市場，也就不會有商品過剩和資本過剩的問題發生了。可是這能做得嗎？這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這個法則就成為經濟危機的基因了。同時，如果美國真正願意援助被戰爭所摧殘了的世界各國作經濟復興，在正常的經濟基礎上提供借款，決不干涉他們國內的事務，決不附加苛刻的經濟條件，和要求採取他們所指定的特種內政外交的策略，甚至如指定內閣總理和閣員等等，那末，美國也不會有什麼過剩問題了。可是，美國能這麼做嗎？以往的歷史是最好的見證，這正是服務於獨佔資本的一種向外擴張的必然。

美國獨佔資本家是不會走這兩條路的，而經濟危機又到了迫在眉睫，絕不可能避免的時候，於是就把危機的主要負擔加在國內人民身上，同時，更積極的向外擴張了，所謂「援助」所謂「救濟」所謂「剩餘物資」就是隱藏着如此自私的打算。杜魯門為什麼要求救濟歐洲（自然，也包括亞洲在內）的路綫，務須與壓制國內高物價相配合，也就不言可知了。所以無怪乎連美國共和黨領袖哈勒克及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黎斯也說：「杜魯門在跡近玩弄政治」了。

十一月三日清晨。

來函照登

時與文編輯先生：頃閱貴刊第七期第二十頁何幸之一文，對於本刊任意侮辱。本刊從未自一八〇期起改稱共軍為共匪，亦未自一八三期起改稱共匪為共軍，不特查無實據，抑且事出無因。如此造謠誣人，與火燒廬家何殊，望本愛護真理尊重事實之旨，予以更正。再生社啓（蓋章），十月卅日。

大學教授精神的墮落

向曉

士大夫是中國的特殊階級，在今日，大學教授便是這種人最好的代表。士大夫本質上是封建制的產物，他們有財產，有知識，有身分，不參加生產，而為官僚制度的後備軍，入則處，出則仕。在社會遽變的時期，一部分能秉承先哲優良傳統思想的，倒富於正義，也能為國家為人民，或為文化而奮鬥，甚至於殉身，表現出守正不阿的精神。但也有一部份則熱中於利祿，為身家門第計而阿附權勢，做獨夫的弄臣，做巨惡的幫凶，甚至做漢奸，幫助異族，出賣國家與人民。

隨着近百年來東西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中國變化為封建勢力殘存與帝國主義角逐下的半殖民性的社會。因此影響所及，士大夫一方面尚保有濃厚的舊日身分與意識，一方面又具有買辦性。而這兩種性質也同樣在大學教授的身上具體的反映出來。

舊日的士大夫從制舉入仕。不登賢書的只好狩守林下，作田舍翁或豪紳幕客。在今日，學校制度雖未能代替制舉為入仕之途，考試制度雖也未認真的實行，但因諸般社會機構的發達，反有利於士大夫的活躍。——做吏做幕，結社辦黨，辦刊物報紙，以至於辦教育做教授，以及做社團領袖，公司經理，都可視為入仕之途了。而大學教授近些年來更為仕途的終南捷徑。

本來近代的大學，既非舊日的書院，也不是西歐中古教職的訓練所，而為資本主義生產制下為要求生產技術的提高，以及配合此條件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改造而形成的學府。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影響所及，大學教育必須具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始能有利於學術的發展。因此，大學教授多是博學深思而專心致志從事於學術研究的專家，而非孜孜於利祿的政客黨棍。大學也自然然是造就高深學問作育人才的學府，而不是官僚的逐鹿之場。

民國以來，中國也有了幾所大學。雖然在設備與師資上尚不足達到世界學術的水準，但當着第一次歐戰，各帝國主義者正窮於應付戰爭時，中

國的輕工業得有少許的進展，伴隨而興的有「五四」俱來的新思想新文化的發展，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上也不無貢獻。當時的大學教授大多尚能從事於學術的工作，故這一短時期尚具有進步性。但近二十年來，雖然國民黨取得了政權，事實上封建軍閥官僚豪紳地主買辦以及一切惡勢力都未消滅，進而偽裝了新的姿態。因「一黨專政」「以黨治國」而實施「黨化教育」，結果，不僅無助於學術的發展，甚至扼殺了學術研究的自由的風氣。統制教育的毒素滲入了各級學校，特別是大學影響至鉅，使高等學府漸成為政客黨棍的逐鹿場。每當世界情勢或國內情勢遽變之秋，大學中的醉心利祿的教授也就更顯得活躍。

今日大學中，當然仍有不少好教授繼續着研究生活，不為利祿所動，在飢寒交迫下仍咬着牙工作，繼續有輝煌的貢獻；甚至也有忠於自己的思想，為呼籲和平、民主、自由而獻身，以至於以身殉道的大師。這足以代表士大夫愛國愛民敬業樂道的精神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則代表了士大夫沽名釣譽，熱中利祿的醜惡的傳統，雖身於大學，而於學術無興趣，藉教授的頭銜裝成專家或名流的身分。以「學有專長」或「青年導師」的名目為政治資本，更易招致當局者的青睞，很容易的走上「學優則仕」舊日士大夫的老路。近些年來，大學教授入仕，起身即至「簡任」，故教授遂成為終南捷徑，比之那些由吏員出身的慢慢升遷要快得多。因此，固無論封建性的士大夫或買辦性的文化人，遂多混入教授之林，大學也就成為「儲才養望」的階段，而視為「傳舍」。風氣一開，逐之若鶩，大學教授精神的墮落，遂演至不可想像的地步。

這種大學教授精神的墮落，表現出幾種嚴重的可怕的現象：

第一種為出賣國家，做漢奸。中國本為列強角逐的半殖民地，帝國主義者在政治上實居太上皇的地位。以前日帝國主義者便是最好的實例。他為要在中國建立偽偽政權，以便獨佔市場與原料，並榨取中國人民，除了軍閥政客黨棍外，士大夫身分的大學教授也是有用的漢奸，利用他們嘴

裏的「中日親善」、「文化合作」、「經濟提攜」、以及「共同防共」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來麻醉人民，阻止反抗，進而策劃偽組織，技巧的出賣中國。例如在汪精衛決心投降敵人企圖成立偽政權的預謀中，便有一批大學教授為高官厚祿計，參與組織漢奸機關「低調俱樂部」，密謀為日本軍閥樹立幫凶的傀儡政府，一個個成為汪逆的佐命功臣，日本的忠順走狗，担負起出賣國家屠殺同胞的任務。日寇投降後，偽組織雖然消滅，而這些為虎作倀的詭譎的教授却並沒有全數伏法，有的仍以當年教授的頭銜重新化了裝，再向一個新主子出力。目前當國際情勢一度消長之後更有一批新的教授又在另一個帝國主義者面前高唱「傳統友誼」、「文化合作」、「經濟援助」以及「共同防共」，令人容易想到簡直是十幾年前漢奸口號的再版。這種言論的背後是什麼，以及這批教授將來如何的出處，根據當年媚日者的過程推測，不難想到他們今後的道路。

第二種為出賣青年，做幫凶。「黨化教育」實施以後，公開的以黨來控制教育文化事業，小學中學姑不論，對於大學教育則為極大的迫害。學術研究的自由剝奪殆盡。為貫徹思想統制，一方面不惜以不學無術甚或從未在大學教過書的黨棍來做大學校長、訓導長或教授；一方面則利誘一些學問上毫無成就而熱中於利祿的教授來辦黨，利用教授的頭銜，以及和學生接近的機會，名為領導青年思想，而實則企圖控制師生的思想，陰謀強姦學生意志，甚至誣陷學生，開黑名單，出賣青年以為進身之階。這種藉黨而濫充教授，藉教授而辦黨的作風，尤以近十年來為甚。例如抗戰時期人力物力本不夠，却新創立了許多師範學院及獨立學院，名義上儘管有堂皇的理由，但揆諸事實，當時的黨化教育當局無非是為了幾所老大學的教授大都守正不阿不易指使，而有意的建立自己的黨化教授來對抗。試一一檢視戰時許多師範學院院長的人選，便不難明瞭他們是那一派系的角色，也不難明白創立這些學校的動機。抗戰時期直至今日，各大學設立訓導長及主任導師，這一批是什麼出身？學問道德如何？他們何以會做訓導長？以及他們做了些什麼工作？這只須稍稍一想，便可洞若觀火。他們根本是黨棍政客的花裝（只有極少數是例外），站在大學的青年裏，做的是賣野人頭的勾當。因此，這許多人便有的做了黨官，參政員，或部院中的一官半職。大學教授便成了無聊的士大夫的階級階梯。

第三種為出賣真理，做幫兇。在黨化教育精神墮落的現象中，這是一種最精緻最惡毒的陰謀。這些人物，大都是作過一個時期的研究工作，博得了一時浮名，雖然他們的作業並不是堅實的貢獻，而只是西洋學問皮

毛的裨販，即丁文江先生所謂只懂得ABC而不懂XYZ的學問。講哲學的只會談形而上，而不講魏晉玄學；講歷史的只知道魯濱孫，而不講史通；講地質的只知道意大利有Alps地形，中國有沒有不知道。這種皮毛之學的轉運與不能生根的文化傳播，也可以說是伴隨資本主義國家商品而俱來的「買辦文化」，但在學術水準低落的中國，有時也會被人捧為專家或學者。這種教授，到後來自知研究工作無望，為新進的學者的業績所威脅，為了藏拙，也為了利祿，便不得不翻然改計，利用學術壇上的地位，大學教授的姿態，作歪曲事實出賣真理的說法，為獨裁作理論上無恥的響應與辯護。例如德意法西斯興起後，一部分中國無知的軍人便成了忠實的信徒，一時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肖像居然高懸在國父遺像之下。某些哲學與政治學教授也接連大講大譯「汎繫主義」，歷史教授在「獨立評論」上「論獨裁」「再論獨裁」。當有人想做陶爾菲斯的時候，這些教授馬上榮任了文學侍從之臣。十年以還，此風大熾。教哲學的大講「應帝王」，希望把元首捧成帝王，「作之君」，而自己便好「作之師」。西安事變後，教歷史的便提出元首指定的大位繼承法。研究考古學的會設計「九鼎」，古史家會撰「九鼎銘文」，部定大學用書主持人會寫「民生史觀」的上古史，圖書館專家會發明三民主義圖書分類法。物理的教授會為勘亂匪獻策設計原子彈。在這些人物的手法下，學術全失了真面目。學國文為了知制誥，寫歷史成了萬言書。哲學成了勸進表，教育成了精神講話。這種假借學術創製美新的言論，實盡了歪曲事實與誣蔑真理之能事，為了做幫兇，做弄臣而不惜利用學術的幌子來麻醉人民，欺騙學子，在學術上增加無數的荊棘。其影響之深入，手法的詭譎，最為可怕。

目前已是一個爭民主與反民主的搏鬥的時代，大學教授也將在這個時代裏經過考驗。一個好的大學教授必須仍是秉承學術自由的信念，不為利祿所誘，專心致志於真理的探討和宇宙的認識。在政治上必須為民族為人民的前途着想，好好的教導青年如何的認識世界，認識現實的真相。學習工作的大任原在掃除愚昧發揚人類的智慧。那種塗抹事實，掩蓋真理的作法，不僅污辱了大學教授的身分，實且毒害了人類已有的文化。

今日的青年，以及一切社會人士，該對大學教授持有分析的態度。要仔細認清那些作業是學術上真正的貢獻，那些是無聊的捧場的「偽學」。不要為一些偽裝大學教授的漢奸、屠伯、弄臣、官僚、黨棍所迷惑。對於那些真正埋頭於圖書館、實驗室、沈潛於學術工作的教授，我們自應該給予無上的敬意，雖然這些人反而在他人忽視甚至迫害之中。

今日大學教育的病象及其診斷

陳際雲

(一)

自胡適先生「十年教育計劃」發表後，全國各地報章雜誌檢討大學教育的文字甚多，可見國人對大學教育的重視。我國經過八年抗戰，物質及精神兩方面所遭受的破壞至深且鉅。勝利之後，百廢待興，建設工作千頭萬緒，同時進行，事實上殊不可能。在精神建設方面，我們認為教育的復興，學生程度的提高，學術研究的著重，專門人才的培養，都是當前最迫切的工作。

在抗戰期間，因為時局動盪，環境變遷，生活不安定，物質條件不充足，弄得各最高學府的教授和學生都不能專心致志於分內的工作。大學及專科學校有的時常遷移，有的設備因陋就簡，有的缺乏課本、圖書、儀器及一切參考與實驗的材料，有的因教授紛紛改行而缺乏適當的師資，學生有的因中學根基不固，程度十分低劣，有的因缺少參考和研究的工具而停滯不進，有的因環境多變，養成一種投機取巧、敷衍塞責的心理，故不能由大學教育裏獲得應該獲得的益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欲期學生程度的提高，學術工作的推進，無異緣木求魚。

講到大學生及專科學生程度的低落，今年暑期各大學及專科以上學校的入學考試，其所得的結果實在給予我們一個新的啓示。各種基本科目的考試成績不及戰前遠甚，而且據說考卷中的答案，牛頭不對馬嘴，荒謬絕倫，笑話百出者，殊不在少！其國文及英文之未臻通順者，各種基本科目常識之缺乏者，竟佔相當大的百分率。如果我們讓這種程度低落的學生進入大學或畢業大學，我們怎麼能夠推進學術研究？又怎樣能夠培養專門人才？

在另一方面，教授之不能安心工作和適當師資之缺乏，也是今日大學水準低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過去十餘年中，多少著名教授與專科學者受了經濟的壓迫，不得不兼課或兼差，終日挾着皮包東奔西跑，拿原有的舊

講義一次又一次的販給學生；要獲取一些新的材料和新的心得，已經沒有工夫和心情，遑論自作專門學術研究！遑論指導學生從事專門學術研究！同時，有一部分教授因待遇菲薄而忍痛改行；有資格的教授越來越少，學校當局只得尋找一些學識和經驗較差的人來替代。這也是大學適當師資發生恐慌的一個因素。負教導之責的教授情形如此，一般大學及專科學校學術空氣之缺乏，又何足怪？

(二)

在學生方面，不讀書不用功，確已成了各大學普遍的現象。天天上班不曠課，在他們已算盡了責任，好在平時教員又不大過問，天天刻板似的混下去，到大考時翻一翻講義，一知半解的記了一點定義，也可敷衍及格了。他們毫無競爭心，及格是他們最高的目標！其次還有各種不同的嗜好的：賭錢，跳舞，整天在校外東跑西轉，學校差不多成了客棧，——這當然佔極少數，然而也仍是嚴重問題。

教員兼教三四個學校也是嚴重病象之一，他們整天在路上趕車換車，東奔西走的忙個不了，上課時把陳舊的講稿敷衍學生，下了課早就不知去向。這種商業化的授課，在學生眼裏好像在參觀百貨商店，並且是匆匆忙忙而有時間的限制。學生與教員在課外猶如陌路人，各不相干，所謂課外指導乃是佈告欄裏給參觀人欣賞的名詞而已。學生與教員不但沒有感情上的聯絡，就連請教會見的機會都是很少。

校長政客化，竟有不能經常駐校的，就是到校也不過是例行公事，一轉身就走了；對於校事以耳代目，只知外觀，不察內容。於是同等地位的主要職員鉤心鬥角，互相排擠排擠，隱蔽校長，顛倒是非，學校也就變了政治舞台。

這些都是中國各大學幾種比較顯著而嚴重的病象。

(三)

我們試從這些病象上研究那病源的所在。

(1) 大學的教育成了政治的寄生蟲。牠們的生死都握在大政客的手中，教授的言論行動都得唯大政客之命是聽。大學教育在這種可憐的情況下，要校長清高超脫，教授維持學者的尊嚴，學生一心向學，又如何能够呢？

(2) 在野政黨闖入大學。自國民黨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政策厲行以來，社會上除國民黨外其他黨派已無活動可能，於是就不能不另謀出路，被逼潛入工廠與學校，視為活動的根據地。國民黨北伐成功以後，大學從此捲入政治漩渦，成爲各黨的大本營，學潮洶湧，日趨惡劣，卒陷於萬劫不復之境。

(3) 教授的生活及人格無確切保障。中國不乏學者，但爲了生活的壓迫和人格的受輕視，都漸漸的脫離教育界了。教員們縱令自己不分黨派，黨派的名號却會加到他頭上去，因此教員位置的安全與否，完全視某黨某派的得失爲轉移；換言之，教員宛如主任或院長的附屬品或私有物，院長主任有更動，你就站不住；就算你微侍而沒有被辭，那末新主任一定以異黨視你，看你是他的障礙物，知趣一點的人，稍知尊重自己人格的人，早就借事引退了。因爲生活上的不安定，教員不能不預謀別的出路，因爲薪水的不可靠，不得不兼任別的差使，於是就造成東西奔走兼課兼事的商業化的教授。還有教員的思想也受政治的支配，倘認爲某教授思想「反動」，就可以命令停止其教授職位，甚而至於逮捕入獄。學問的尊嚴，在中國已完全掃地，怪不得學生認教員爲可侮辱可驅逐的了。我們相信，如果師道不尊，中國大學教育永無納入正規的希望。

(四)

經過多年的動亂，國家經濟情形惡劣萬分，因之百年樹人的國家教育基本大計，亦遭遇到重重困難。從今日整個教育界的情形看，是一般的貧乏。尤其是造就專門人才的高級學府——大學及各專科學校，不說局外人的批評，試問負主持責任的校長和教授職員們，又有誰能够承認其所辦的學校是滿意的？我們知道許多國立大學，設備之簡陋實在駭人聽聞，私立院校更不必說，然而事實却會使我們非常的不可理解，儘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不容易辦得出一個像樣的學校，而在近兩年來，公然還有許多人在重新

創辦大學或學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大學及專門學校的教育，是爲國家培養後一代的建國人才，在教育行政上無疑的是最重要的一個部門，而辦教育也應被認爲神聖之工作，絕對不許輕忽視之，喊幹就幹。因爲粗製濫造的結果，不僅影響到青年的品德智能，而且由於青年之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將使國家民族受到重大的損害。對於那些要創辦新學院的先生們，有些人揣測，認爲他們想借學校造成個人的地位，或者造成一個勢力，一個團體，甚至有人說：辦學校也是生財之一道。我們當然不願意作如此想法，但是從目前的情形來看，我們覺得還是需要把握住「重質不重量」的原則。今天的中國，並不是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單位不夠，而是牠們的內容不够充實。與其東辦一個，西添一個，爲什麼不集中力量就現有的來充實？無論從人力與財力那一方面來講，都是應該如此。

在通都大邑，無論公私，要辦好一個大學，絕不是容易的事，尤其處在現今的環境，做校長的，即使拿出他全副精力，拚命苦幹，還不一定就能有把握辦好。如果政府更要在其本身職務以外，找他東開一個會，西掛一個名，亂跑一陣，則大學校長縱具有天大本領，也一定會弄成校務廢弛，紀綱掃地。

如果校長本身，更存着乘機獵官的野心，手揮五弦，目送飛鴻，於是方面不得不交結權要，廣通聲氣，一方面不得不佈置徒黨，準備活動。社會關係，因此複雜，敷衍酬應，迄無寧日。

雖然現在人們的兩眼，多半只看見勢力和金錢，對手無寸鐵、家無恒蓄的大學校長，並不一定就怎樣敬重，但平心而論，大學校長的一舉一動多少對社會還起着示範的作用，如果他們自己不珍惜本身的地位，而讓大家想像中的大學校長降到和官僚政客並無差別，這對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均將是一個不可補救的損失。

我們不反對學者論政，但反對學者獵官。假使真想做官，則最好先辭校長，這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事。

此外還有一種十足的政客官僚，却偶因政治失意，無事可做，就千方百計，要掛上一個大學校長的頭銜，國立大學不够格，即降而求其次，私立的亦所快意，甚至鼓動風潮，煽惑青年，均非所惜。這種政客的作法，簡直非將高貴尊嚴的大學風範盡量破壞不止，其罪大浮於一面辦學一面獵官之人。我們爲淨化大學教育起見，對於這種人的企圖尤其有根絕打倒的

必要。

(五)

當前的大學教育問題實在很多，茲就最重要的幾點提出檢討，作為今後改進大學教育之參考：

一、大學教育方針——大學教育雖是國家事業之一種，然與政府行政部門中各種制度迥乎不同。行政規制有時宜于整齊劃一，故需要統制；教育則必須聽其自由發展，方可奏效，故不需要統制。美國統一後，學術思想蒸蒸日上，教育的「質」與「量」急速進步，完全基於自由發展；春秋戰國諸子爭鳴，在中國古典哲學上，放出奇葩異卉，足以證明學術非在思想自由之下，不能有所創獲與發明。時代是在前進，人類文化也在進步着，立國之道不祇是求統一，而且要求進步，大學教育應該培養民族的自由思想和民族的創造能力，以奠立國家進步的基礎；不然的話，必使人民個個只有盲從愚昧的頭腦，不唯不能協助建國，甚且產生嚴重而長久的後果，人民喪失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將永遠無法有效地行使民權。因之大學教育政策，應該傾全力注意於自由精神的培養，不應該着限於政治權力的統制。

二、大學教育目標——教育過分強調道德價值，似乎與思想自由無抵觸，尤其是一味提倡固有道德以為人民行為準則，那更不免有加人之惑、錮民之知的嫌疑。中國向以「禮義之邦」自負，為學以「明明德」為目標，做人以「聖人」為模範，這個歷史傳統，一直到今天，還是一成不變，相繼因襲。大學訓導制的建立和導師制的推行，純粹是基於此一觀點。西洋與中國，則恰恰相反，希臘哲人多崇拜理智，闡明真理，近代歐洲教育，仍保持這種精神，英國大學所養成的「君子」，是以追求真理為至善，他們的導師祇是注重學生理智方面的發展。實在說來，道德基於知識，人民道德的低落，十九是由於無知。許多人之所以盲從、自私、卑鄙、貪污，與其說他不道德，不如說他不知利害，西方人常說：「大多數的苦難之來，由於無知比由於惡意還多」，這足以說明理智與道德的一致性。追求真理，是理智的，也是道德的。所謂道德乃是積極的，要有知識的發展，如果離開學問而尊德性，結果必養成「不誠無物」的偽君子。因此我們主張大學教育第一應該尊崇理智。

三、大學教育內容——大學教育對於實用價值和文化價值，雖然應該

並重，但是教育最基本的理想，為養成健康純正的人格，在這個理想下，教育內容應該力求單純，追求知識即以知識本身為目的，而不是知識以外的其他的實用目的。有了這種為知識而求知識、為真理而求真理的精神，而後才能使科學發達，學術獨立，有真正的創造。一般人以為近代文明乃西洋功利主義的產品，而中國物質文明的落後，是由於中國人一向不注重功利。殊不知這種看法適得其反，正惟西方人不把實際的活動參雜在純粹追求知識的活動裏面，所以他們有更大的功利成就；正惟中國人的精神，都被吸引在應用的實際的活動範圍以內，而應用範圍以外的純粹追求知識的活動無形受到抑制，不能有所創造發明，所以功利成就也永遠遠落在人家後頭，不得翻身了。這個啓示，大可修正教育上急功近利的偏見，進而注重文化價值，不再聽任應用科學喧賓奪主的壓倒了純粹科學，斷送科學教育的前途。

四、大學教育方法——學校以內正規的教育應該完全是教育方式，學校以外的特殊教育才可採用訓練方式。訓練祇可以補充正規教育之不足，但不能代替教育。過去由於我們對於教育和訓練分辨不清，乃至發生教育濫用訓練，和訓練代替教育的流弊，青年活潑的創造性，被狹隘的課程埋沒了，學生個性差異，被死板同套的教材抹殺了，設施與生活脫節，學校與社會隔離。扼要的說，教育即生活，教育的目的即在適應生活的需求，現在受大學教育的人漸多，教育設施必須以千萬能力不同、興趣不同、需要不同的青年為對象，而各求其適應本身，求得最高發展，倘還是根據社會的傳統和共同陶冶的原則，而採用同一的訓練方式，則此種與時代背馳的教育，於「量」終不能提高，於「質」亦無所改進，尙有何效果之可言呢？

五、大學教學方法——今日我國大學教育有一種普遍現象，就是各校師生除於排定的時間在教室裏見面外，平時很少有接觸機會。這種現象，自從新教育實施以來，便已存在，大家都是搖鈴上課，搖鈴下課，習以為常，恬為不怪。師生授課聽課，如同買賣一般：「日中為市，市畢而散」。下課之後，學生往往找不到教授，作學問的探討。學校等於旅舍，教員等於販賣知識者，學生變成知識店的顧客，彼此相視若路人。我國舊時書院制度，師生朝夕相處，一如家人，實行「因材施教」之辦法。美國大學除去課程組織之外，對教法也很講求，力求改進，教授定了種種計劃，使得學生在教室中的工作含有超乎講授之上的意義。這也是值得做效的。

英國統治馬來亞的新花樣

鄭道傳

一、馬來亞人民的覺醒

去年九月份亞美雜誌對馬來亞戰前情形有一段描述：

「從官方的記載看來，在戰前，馬來亞這地方，比英國殖民地的總和還要富饒，由於美國是它的錫和橡皮出口的最大顧客，所以成爲英國美匯的寶貴源泉，它的財政非常穩固。……總之，這個沒有政治問題的島嶼，雖然安靜的湖面上的漩渦正在擴大，但和英國其餘地方相反，馬來亞的政局卻很安謐。」

可是第二次大戰帶給馬來亞人民以新的洗禮，他們終因下述幾件事實而變得不慣於戰前的一安謐了：(一)當荷印、越南、印度、緬甸各地都掀起民族解放的巨浪，同命運的馬來亞人民自不能再安於舊有的現狀。(二)在英國勢力爲日本趕走期間，日本的懷柔政策已經啓發了馬來亞人民的政治興趣；佔駐馬來亞的日軍當局，曾經一再表示，儘可能選任當地人民爲官員，而且不願種族、信仰或社會地位的區別，直接自當地居民中選出。姑勿論這種「表示」的本質及其可能實現的程度如何，但對於一向被歧視的馬來亞人民，確爲一種誘惑，而那些對抗日軍的地下工作者（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四年的艱苦鬥爭中，更把他們鍛鍊成爲一批愛國份子。當英國的宗主權捲土重來的時候，馬來亞人民當然更不能再安於原狀的恢復。況且(三)英國統治者重返馬來亞以前，會與這些「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取得聯絡，作爲進攻馬來亞的內應，到日本投降後，他們被正式請求維持地方秩序，以待英軍開入，後來英軍到了，立刻命令他們從主要城市撤退，這種「繳械」的措施已予馬來亞人民武力以極大的不滿，再加以在經濟方面廢止日本軍鈔，低壓錫膠的官價，強迫售與政府（當時馬來亞的膠價低壓到十便士一磅，而錫膠的膠價爲十八便士一磅，香港更高），同時英澳商品源源輸入，引起物價下降，本地商業也因此不振，如此種種，已經把馬來亞人民的怒火引到噴火口的邊緣了，接着以去年三月間的「宋光事件」爲引線，就惹起全馬來亞五十萬人的大罷工。

二、「白皮書」所引起的煩惱

然而英國畢竟不愧爲有經驗的帝國主義者，早在前年十月十日，她便宣佈要改變馬來亞的政制，十一月間，即派遣前任巴力斯坦高級專員麥克密契爾爵士(Sir Harold Macmillan)赴馬來亞各蘇丹處進行修約談判，並於去年一月間發表有關馬來亞聯盟與新加坡新政制的「白皮書」，其內

容大致爲：(一)廢除「海峽殖民地」而單取新加坡爲直轄殖民地，原屬「海峽殖民地」的檳榔嶼和馬六甲併入原有的「馬來聯邦」，與「馬來聯邦」統一爲「馬來亞聯盟」(Malayan Union)；(二)撥奪蘇丹前此「統治權」，而僅使之爲「宗教主宰者」；(三)憲法未完成前，立法院僅爲諮詢機關，否決權仍握於總督；(四)關於馬來亞公民權的享有，必須爲在馬來亞出生者，或於新政府公布後於最近十五年中居留於馬來亞滿十年者。同時在「白皮書」中指出革新政制的理由爲：「舊制度的分治已不適時，且與馬來亞人民的利益相違反。戰後的國際關係與英國的安全利益，都需要馬來亞成爲聯合的國家，適應它本身經濟及戰略的重要地位。再放眼看這些，戰前的制度無助於它本身的政治調整，而這些調整卻有裨於馬來亞達成自治政府。」接着馬來亞聯盟便於去年四月一日成立，第一任聯盟總督會德爵士在十七響禮炮聲中宣誓就職，新加坡也於同日恢復民政，新任總督金森於三日正式就職。

可是這個新計劃在馬來亞卻被喝倒了，當聯盟總督舉行莊嚴堂皇的就職典禮時，馬來亞各州的蘇丹竟沒有參加，馬來亞人民也一律擱白頭誌哀，表示沉默的抗議。一向以馴服見稱的蘇丹爲什麼會有這麼嚴重的反對表示呢？因爲「白皮書」中會規定：「新的政策應賦予英皇在各土邦的權力」，這種危及各蘇丹的命根的計劃，他們自然表示十二分的反對了。關於各蘇丹與麥克密契爾爵士修約簽字的內幕，去年三月二十九日新加坡出版的「海峽時報」會登出各蘇丹的自白書，如柔佛蘇丹說：「我簽了這個協定，沒有把它攷察得周詳，而且很不幸地，也沒有看出它的深遠的影響，因此我在二月十五日寫信給殖民地大臣，……我不能再保持那原已給予的同意」；又如吉打蘇丹的信：「我被給予了一種口頭上的哀的美敦書，附有一定的期限，萬一我拒絕簽字於這張我稱之爲賣身契的新協定，那麼一個肯簽字的人將繼我而被任爲蘇丹」；其他如吡叻、雪蘭莪、森美蘭的蘇丹也有類似的表示。至於馬來民族反對的理由，則是受了一馬來民族統一協會(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的煽惑，它鼓吹「白皮書」上的公民權不能爲其他民族所有，「馬來亞是馬來人的馬來亞」，因爲馬來人在馬來亞人口中所佔比例只不過百分之四十二點四，據一九三七年的統計，馬來人佔二百一十六萬九千人，華僑佔二百二十一萬四千人，印度人佔七十五萬五千人，歐亞混種及其他佔七萬四千人，於是馬來人認

爲如果實行「白皮書」中的新計劃，則馬來亞公民權有被「外國僑民」尤其是華僑平分的可能，這在要求殖民地獨立同時要求民族自我表現的現階段，馬來人的恐懼是難免不發生的。可是「馬來民族統一協會」是否真爲馬來民族的利益着想，而英國的「白皮書」是否有意垂青於馬來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却是一個值得慎重考慮的問題。

三、「聯邦政制建議書」與「聯合行動」

由於「白皮書」遭到馬來蘇丹和馬來民族的反對，英國立即於去年六月間派遣兩位議員卡曼斯和威廉斯赴馬「談判」，談判的對象即爲「馬來民族統一協會」；該會爲馬來蘇丹及封建貴族份子所組成，它的主席爲柔佛州首相拿督翁(Dato Onn)，成立之初，由於熱烈反對「白皮書」，頗得大眾擁護，但到了經過兩位議員的「談判」以後，它便成爲一個御用機關了，這表現在「十二人委員會」的建立以及此委員會所提出的「馬來亞聯邦政制建議書」上最爲明顯。按「十二人委員會」由馬來聯邦總督、各州蘇丹及一馬來民族統一協會代表聯席會議所委任，拿督翁是其中最得力的一員，此委員會的精力作「馬來亞聯邦政制建議書」於去年十二月廿四日正式公佈，其內容大概爲：(一)以「馬來亞聯邦」(Malaya Federation)代替「馬來亞聯盟」，讓各蘇丹保留自己的權力和國家的歷史面目；(二)最高專員有權指派無公民權的英籍僑民任非官議員；(三)不限制雙重國籍；(四)各州政府都有英籍顧問，凡有關政府或聯邦的問題，各蘇丹須接受最高專員的指導。同時根據「英皇已經宣佈，在馬來亞的有關民族尚未充分自由發表他們的意見之前，與憲法提案有關的任何事情，將不作任何的決定」，於是又委任了一個委員會，以便「聽取民意」，這個委員會由四位馬來亞聯邦諮詢委員，每位委員再介紹一名，及總督委任的聯邦教育司池士曼及一位秘書等十人組成，稱爲「十人委員會」。據說該會成立以後，總共收到了十一封書信及備忘錄，經過三個多月的「研究」，於本年三月卅一日發表一百九十多頁的「報告書」，其中除了在聯邦的行政會議與立法會議中增加幾個非官方議員，及對公民權的取得年限略加減少以外，其餘跟「建議書」並沒有兩樣，這樣的「建議」和「報告」，對馬來蘇丹和馬來貴族算是滿意了，但馬來亞人民包括馬來族與其他各族，卻掀起廣泛的反建議書運動。

關於反建議書運動的發展，其歷程是極曲折但也極令人興奮的。這一發展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局部的聯合也就是各民族本身的聯合；第二階段是全面的聯合，也就是各民族、各政黨、各團體的聯合。前者如馬來民族方面，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吉隆坡有包括六十七個馬來團體(後增爲七十四個)所組成的「馬來人民聯合戰線」(United Malay People's

Front)；在其他各族方面，有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在吉隆坡成立的「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Pan-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他們都堅決反對「建議書」，並要求解散「十人委員會」，主張包括星洲在內的統一的馬來亞，實行普選以建立負責的自治政府，並贊同以馬來亞爲永久家鄉的效忠者才應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到了今年三月間，上述兩個各自「聯合」的團體，在「聯合爲一個共同目標而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作總的「聯合行動」，重申上述的意見，並特別兼顧馬來民族的特殊利益，這麼一來，迫使英國預定在今年四月開始實施的新政制，不得不宣佈延期了半年。

四、第二個「巴力斯坦」中的「替罪的羊」

無論「白皮書」或「建議書」被英國當局及其所「御用」的委員會渲染得如何「進步」，但馬來亞人民知道英國不願意放棄馬來亞，她將繼續在這裏榨取每年一億四千萬美元的外匯，不過爲了要適應這次戰爭所帶給馬來亞的「轉變」，不得不玩着新花樣以分散並離間馬來亞人民的反帝鬥爭；她要單獨統治新加坡，正因爲那裏是馬來亞的軍事據點和經濟中心，有了這個據點和中心，便可以繼續控制着馬來亞的咽喉；她要提出公民權，正爲了要利用這張支票以轉移馬來民族的鬥爭目標，如倫敦經濟人報就會拚命向馬來人灌輸「恐華」心理，硬說華僑在過去已經操縱了馬來亞的經濟，假如再讓他們操縱政治，則馬來人的前途將不堪設想；當馬來蘇丹和馬來人反對白皮書的時候，總督府的秘書長愛迪生竟說「宣佈新加坡的保留，是因爲那裏是馬來亞中國人最多的地方」。華僑何辜，英國人竟不惜將馬來亞造成第二個「巴力斯坦」，讓這裏二百多萬曾經歷過苦辛的華僑變成「替罪的羊」(Scapegoat)，使他們也遭受着猶太人的慘遇？其實新政制中的公民權，對華僑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爲對公民權的享有有居留年限和必須精通英語或馬來語的限制，華僑將因此被分爲有公民權者與無公民權者兩個對立的陣容，這種對立一旦形成，華僑本身必因此引起許多無謂的糾紛，何況新加坡與聯邦分離，馬華的經濟關係也被割爲兩個互相隔離的單位，這對素以「做生意」爲主要目標的華僑更是極大的不利。所以僑馬的華僑對於反對建議書運動也表現高度的熱情，所有在馬出版的華文報紙幾乎全部是反新政制的，上述泛馬行動委員會的主席也便是僑生的陳楨祿先生，他們除了參加「聯合行動」外，本月二十日又由新加坡中華商會及馬來聯邦中華商會發動中印僑商停業一天，報紙停刊，學校停課，表示進一步抗議不民主不公正的「建議書」和「報告書」。他們懷望着戰火連天的祖國，他們輕撫着客居南洋所遭受的歧視，想起近在咫尺的荷印越南的同胞的不幸遭遇，他們心頭的感受是多麼沉重呵！

(卅六年十月二十日于福州)

內戰在安徽

許柏

打開地圖來看，如今的安徽真可以說是全境騷然了。

在報導共軍陳劉兩部

安徽境內的「土八路」

自去冬共軍的主力退出蘇北後，在安徽境內，他也只留下了一些地方部隊，與國軍作長期的周旋。

一 洪澤湖沿岸的

「皖東北人民自衛總隊」

這是一支四千多人的武裝隊伍，包括七七、八一兩個團及「泗縣人民自衛大隊」，由共區泗縣縣長謝楠兼任大隊長，經常出沒於洪澤湖沿岸的蔣集、老子山、仁和集、新集、鮑集、雙溝、青陽、馬公店以及泗縣、靈璧、五河、盱眙、天長一帶，而

二 定鳳邊境的「淮北游擊大隊」

「淮北游擊大隊」是由正副司令孫傳嘉周依賢兩人所率領的一支兩千多人的隊伍，經常「竄擾」於定遠鳳陽間之紅心舖、卸甲店、殷家湖、朱家灣一帶，給淮南和津浦路浦

南下的經過之前，我想先就目前共軍的兵力及分佈情形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這些地方部隊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土共」或者「土八路」，可以分幾個區域來說明。

三 「皖西人民自衛大隊」

劉伯誠未來以前，在大別山中以及岳西、潛山、太湖、桐城、廬江一帶，其實早就有三四千「土八路」在那裏活躍了。這就是鍾太湖所領導的「皖西人民自衛大隊」。他們雖然人數並不多，而散佈的面積又相當廣闊，但却也牽制了地方團隊（指政府方面的）以及另外的一個旅以上的兵力。

四 皖南的地下火

在表面上看，從「皖南事變」後，皖南是已經安定了下來的，其實皖南，在目前是最不安定的了。無須隱瞞，共產黨在這裏是有着一股相當大的潛勢力的。「清剿」在這

五 糜爛的淮北

淮北這個區域，可以說是在安徽境內遭遇得最慘的一個。水災、食污災、內戰災……在這裏表現得太深刻了。人民的財產被泛泛的黃水沖走了之後，倖存的一條性命又像錢末一樣給他們洒來洒去。

內組織有「蘇皖豫邊區政府」，領導着全安徽「土八路」和國軍的鬥爭。

半年以前，他們還不過只是一支三四千人的小隊伍，彈藥也缺乏，武器也簡陋，但如今竟有了兩萬多人，而且還有了美式的擲筒彈和火箭炮一類的新式武器。

國軍爲對付這支「頑匪」，從今年元且到八月，曾用過兩個整編師（整編第五十八師和「新興」的第四十六師）專負「清剿」的責任，但是不但沒有「剿」清，反而使共軍活動的範圍擴大了，被他們「竄陷」過的城市就有阜陽、太和、蒙城、臨泉、渦陽、亳縣等六個，而亳縣縣城竟被他們「竄陷」過四次。

七月末，魯西戰事，國軍第五軍邱清泉部在羊山集被圍，爲應付「緊急事態」，五十八師也奉命調到蘇北碭山去了，於是這支共軍更得到活躍的機會。八月初，他們攻下了豫東的鹿邑、太康和柘城，算是替八月十日劉伯誠部的南下，吹奏起了迎接的號曲。

六 其他

這些政治「匪」，是在敵偽時期就有了的，日本人頂傷他們的腦筋。關於這一點，地方政府方面也是承認的，常在給「上司」的呈文裏說：「國會在本縣××一帶招募青年，毒化民衆……」。

的。他們常常使縣政府派出來催兵催糧的差丁和保丁不但得不到壯丁和糧食，甚至還時常被他們活捉了去。國軍曾爲此「小股共匪」傷過很多腦筋，並特別爲了「清剿」他們而成立了一個「定鳳邊境防剿匪辦事處」，但仍是沒有什麼成績。

西人民自衛大隊」。他們雖然人數並不多，而散佈的面積又相當廣闊，但却也牽制了地方團隊（指政府方面的）以及另外的一個旅以上的兵力。

四 皖南的地下火

在表面上看，從「皖南事變」後，皖南是已經安定了下來的，其實皖南，在目前是最不安定的了。無須隱瞞，共產黨在這裏是有着一股相當大的潛勢力的。「清剿」在這

五 糜爛的淮北

淮北這個區域，可以說是在安徽境內遭遇得最慘的一個。水災、食污災、內戰災……在這裏表現得太深刻了。人民的財產被泛泛的黃水沖走了之後，倖存的一條性命又像錢末一樣給他們洒來洒去。

以上所說的是比較大的幾支，至於「小股奸匪」呢，可以說就無縣無之了。像定遠邊境有吳萬領領導的「定遠游擊大隊」約兩三百人，鄂皖邊境的魏體學部四五百人，繁昌、銅陵一帶前有紅軍十九旅參謀長葉茂楓爲首之一的「皖南游擊隊」五百人，「巢縣自衛支隊」蔣天然部兩百人，甚至蚌埠、懷遠、合肥附近也常有「奸匪」的活動。

在安徽境，共軍雖然沒有佔有一個縣城（指八月十日以前），即使「竄陷」一縣之後，不幾天，國軍來時，他們又走了，但大於城市若干倍的廣大的農村面，差不多完全控制在他們的手裏。他們在每縣也有縣政府的設立，並且已經在實行「土地革命」了。

這些政治「匪」，是在敵偽時期就有了的，日本人頂傷他們的腦筋。關於這一點，地方政府方面也是承認的，常在給「上司」的呈文裏說：「國會在本縣××一帶招募青年，毒化民衆……」。

劉陳兩部的南下

現在我應講到劉陳兩部的大舉南下了。爲敘述的方便起見，還是先講劉伯誠。

大別山下

八月初，劉伯誠部一、三、六、七、八道五個縱隊在魯西定陶、城武一帶聽到了魏鳳樓的「歡迎號曲」以後，十一日，他們就開始越路南移了。當時皖境國軍只有一個「新興」的第四十六師和四十八師的一個旅以及兩個交通警察總隊，但他們還要守備淮南及津浦兩段，和監視洪澤湖兩岸的「土八路」；因此，雖然是費盡心機，也只能將一個殘破不全的整編四十六師調駐太和和阜陽兩地，企圖堵止共軍的東竄或南竄。共軍似乎早就明瞭國軍後防空虛，在二十天之內，沿沈邱、臨泉、新蔡、潢川——固始——商城直衝而下，越過經國軍嚴密封鎖了的淮、渦、沙、洪四河和潢水，進佔了大別山的心臟立煌縣——昔日赫赫有名的紅軍根據地——的金家寨，以及沿大別山區外圍的各大據點，把脚

一直伸長到了長江邊岸。其中單就安徽來說，被他「竄陷」了的城市就有立煌、葉家集、六安、霍山、岳西、潛山、太湖、舒城、望江、桐城、舒城、廬江，無爲等十三個，在最緊急的時候，離合肥六十里的桃溪鎮和離市郊三十里的化子崗也都「陷入敵手」。

九月初五日，陳毅也率領着他的一、三、四、六、八、道五個縱隊，在礪山西馬牧集的地方越過了關海路（另一股在五天後，由內黃車站越路南下），第二天即陷夏邑、永城。之後，就佔領了寧陵、杞縣、睢縣、淮陽、柘城、太康、項城、商水和皖境的亳縣、渦陽、太和、臨泉、阜陽、蒙城。十月十一日，他並以第三縱隊自宿縣南北任橋、西寺坡、符離集、夾溝等地越津浦路而東，配合「皖東北人民自衛大隊」，「竄陷」靈璧、泗縣、五河，猛攻蘇北睢寧。幸而陸軍

淮河上的陳毅

總部在此早有佈置，即急調五十一、二十八等師馳援，用四倍於「匪」之兵力企圖在運河以西、津浦以東、洪澤湖以北、臨海路以南地區「圍剿」。但共軍似乎也看清楚了這一點，於是主力回鋒西轉，在西寺坡龍皇廟「越路西竄」，只留下了兩千多人加入了先前在洪澤湖裏的「土八路」的隊伍。

目前的形勢

劉伯誠已把隊伍集結到大別山區，岳西、潛山、太湖、桐城這幾個在皖境的大別山的大核心，他是準備固守的。很顯明的，他的目的是在建築大別山的根據地，一面則威脅着自漢口至浦口的一段長江。在必要時，他可到南岸去，燃起皖南的火把。

陳毅的一、四、六道三個縱隊，現在已回到豫北和魯西去了，只留下第三和第八兩個縱隊配合着魏鳳樓張太生的「土共」，在淮河兩岸及豫東活躍着。他可以牽制國軍一部

傷兵力，並可以隨時策應劉伯誠和陳毅的作戰，同時在必要時，他也可以在皖豫邊境建築根據地，或者南下或者西進，與劉伯誠或陳毅部合流。

國軍的兵力與部署

政府把長江以北的安徽和豫鄂邊區的幾個縣城合起來，劃成了「第八縱隊區」，司令部設在蚌埠。它原轄有整編第四十八、五十八兩個師，一個第七軍及兩個交通警察總隊和三個補充團，總共約八萬人左右。但四十八師（留下了一個一七四旅）和第七軍今年春季就被調往魯南去了。補充而來的，是萊蕪和孟良崗兩地頗多折損的整編第四十六師和七十四師兩隊人馬。聽說四十六師到途蚌埠時，剛好還剩下四十六個人，但因為是廣西部隊，第八縱隊區司令官夏威將軍也就慨允將其留蚌負責「整訓」，並把三個補充團及皖省保安第X總隊併進去，換譚何易爲師長。於是這「新興」的整編第四十六師又負起了「淮北剿匪」的重任。

現在，四十八師和五

皖豫邊境建築根據地，或者南下或者西進，與劉伯誠或陳毅部合流。

十八師以及第七軍已由臨海而平漢，而長江，到了大別山的外圍，專門負責監視劉伯誠的行動。此外，就是在皖中新調來的一個八十八師（此師在舒城折損了一個旅以後，視已調往豫東與某部合併了）和在安慶蕪湖兩地的青年軍二〇二師和二〇三師的各一個旅。

劉伯誠和陳毅的部隊到底又有多少人呢？那就傳說不一了，有說一共只有十萬，有的則說光是劉伯誠就有二十萬。但我們根據共軍一個縱隊有一萬二千人來計算（共軍每縱隊有三個師，每師有兩個團，每團約爲二千人），十萬人是無論如何也不止的，何況他們沿途又在「滾雪球」，再加上從前在這裏的「土八路」呢。

我們把國共雙方在安

數的兵力對照一下，可以看出：談「圍剿」，國軍在目前是沒有這力量的，他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在防止共軍「流竄」津浦以東和長江以南，以及守備蚌埠、合肥、安慶、蕪湖各大據點。這從最近皖境戰事的沉寂以及南京正在召開「海陸空江防聯席會議」的消息，就可以看得出來。

而共軍呢，則在蒙固其大別山根據地，並且適時以機動部隊威脅着武漢和江西。

當然，國軍何嘗不想在平漢以東、津浦以西、臨海以南、長江以北的這一個大四方框子裏來一個大的「圍剿」呢？但「圍剿」就必得有二倍、三倍甚至於四倍於對方的兵力，才能辦到，但等得你把這些兵力調來時，誰又能預料整個內戰形勢發展到怎樣一個階段了呢？

至如「土共」，我敢說，如果政府的政治一天不清明，則千年萬世也是「剿」不完的。（十月廿八日寄自皖北）

宋子文到任後的廣東政治·經濟與治安

林鬱

新官不算舊任賬

十月中旬的時候，這裏風傳廣東實業公司的經理羅楚材被宋子文扣留或看管。這風謠的來因，是當時財廳及審計處曾派人去查核該公司的賬目，而且在九月尾經濟暴風吹來的時候，該公司曾要順德糖廠拋糖狂吸港幣，直到現在，社會上各人士猶對此事嘖有煩言。故當羅楚材被扣的消息傳出來後，大家都認為這是千真萬確的事，甚至羅的家人，一連幾天也承認羅楚材確實着落不明。但當羅卓英飛京的時候，在送行人的隊列中却突然出現了他，新聞記者曾詢他被扣的消息，他以肯定的口氣說：「這是謠傳！這是誤會！」自這次出現以後，他在實業公司經理室照常辦公，諸言也似乎寢息了。但羅楚材之不被扣留或看管，在市民眼中，這簡直是一個頂不愉快的消息。實

業公司自李漢魂掌政時起，就已成為地方官僚資本的大本營。羅卓英主粵，派了真正的嫡系人馬羅楚材做經理，這位經理除了為羅卓英大盤搜求做官資本之外，還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在一德路開設了一家裕泰行。原來該公司所屬各糖廠之產品，乃由貿易部發賣，但自裕泰行開張以後，省營的糖却完全由其壟斷，任意起跌糖價。有時賣糖更索取港幣，從中漁利敲榨，而糖商們則只有仰該行的鼻息。聽說裕泰行每一季的店例收入，就達四十多萬元之鉅。最近因羅卓英下台，順德糖廠改屬建廳，該行已無法再從事於糖的壟斷，而且各方責難，深恐株連封閉，已準備頂讓給入了。商人們一聞到羅楚材的被扣，就連想到這一連串的事實，認為宋子文這位「大亨」非扣留羅楚材就無法表現他是為做事

張發奎的苦悶

而來，可是事實破滅了人們的希望。不少人傳說宋子文所以不扣留羅楚材，就因為他是羅卓英的嫡系：「扣留了嫡系，不太令慈威將軍難過嗎？」關於瓊崖改省，張發奎簡直是望眼將穿，然而多方活動，依然沒有成果。宋子文的主導對老張有兩大不利，其一是瓊崖不改省，其二是行轅主任這個職位不穩。在十月十三日下午五時，宋子文假省府會議廳邀遊瓊崖留省同鄉舉行茶會，他玩了一套好把戲，就瓊崖改省的問題「徵求民意」。在他的導演下，這個會通過了要求中央並發動地方響應瓊崖暫不改省。張發奎聽了這消息後，據說一連氣了幾天。

攔車告狀的怪劇

雙十節在中山紀念堂前，這裏出演了一幕攔車

告狀的怪劇。事緣新會鄉民林沃五以鄉長等特勢連續械劫林所辦之生利種植公司，縣府又以受賄不理，乃於雙十節候宋子文出來時，即雙膝跪於車前，雙手高舉投詞乙通，訴說八載沉冤，跪求申雪。但宋子文對此，並不以蟻民之隱痛可哀，又於弱者之前露出了官僚本相，他不接狀來看或有所詢問，只叫警察局長黎鐵漢接了，即驅車而去。事後有人說：大家都以為宋子文降格主粵，是為做事而來，什麼事都對他寄以一點希望。這次林沃五不攔羅卓英，而攔宋子文的車來告狀，就因為當他是為蟻民昭寬的活菩薩！

人事的謎

關於省府的人事問題，現在還是一個謎。宋子文帶來的鄒琳僅以顧問地位襄理政務；陸文瀾雖出入省府，但也狀似客卿。由於他到任一月來還沒

有換過一個人，而且所有的表現只是要四行貸款八十億給順德糖廠、限期修復廣州至黃浦的公路、積極從事於珠江河道之疏濬等，所以許多人認為宋氏是「先經濟而後政治」，「先建設而後人事」，「大事而後小節」。但記者認為問題並不如此單純，其實人事問題之所以成謎，主要是因為地方政權的分贓還未協調：民青兩黨請求參加粵府，黨方又想控制若干部門，太子系的人馬也要來。……在這樣的情形下，宋子文與政學系怎能一手包辦？十月下旬宋子文的飛京，主要的目的恐怕還在設法取得人事上的協調哩！最近從上海來的江浙籍的官員據說已有五六十人到穗，分住于新亞、新華、白宮等酒店，大肆活動，準備在專作官了。看情形，將來怎能免却「樹倒猢猻散」這一幕官場的老劇呢？

一塊肥肉引起省市間的磨擦

在經濟上，廣州始終是上海和香港的尾巴，但這尾巴也許較港滬更為敏感，在發生經濟狂瀾的時候，它總有適時而深刻的反映。現在，港幣已在廣州居了領導地位，不但租界要算港幣，而且「近因港幣波動之幅度增大，一般商行貿易多用港幣為交易本位」。在市面上，誰都會關心港幣的漲落，誰都會談一談港幣這一位「客卿」！由於「十月暴風」的侵襲，當局又玩出了「這完全是人為因素，必須加以撲滅」的把戲，所以也由省市府組織了「經濟檢查隊」，一口氣封閉了二十多家「非法炒賣外幣」的銀號。但是這種作法不但未曾完成「衝散風氣」的去願，却反而引出了財廳與市府間的吵鬧。財廳竟退出

浙大校友學生被捕案

幼 种

同學們的隱忍

曾經被譽為「東方劍橋」的浙大，在上學期五月間為響應整個學運而開始無限期罷課，到六月底，經校方一再勸阻無效，最後祇得宣佈提早開始暑假。九月十一日後，三年級開始溫課，緊接着便是補行「學分考試」，於是，四個月來的長期罷課才正式由大會通過宣告休止。

校方對於這次學潮的處置，一方面是由校務會議通過有四位同學被處罰停學一年，這在全國各大學間，還算是比較開明的一種處置的辦法。但在這四位被停學一年的同學方面說，無疑是白白犧牲了。其中有幾位不但是時間上的損失，而且這一年的生活也成爲很迫切的問題。

除此之外，便是再從學分上對全體參加罷課的同學定出一種折扣的辦法。爲特別重視這一點，

故就稱爲「學分考試」。

在未補行考試前，校方先在形式上命令各同學辦理申請復學手續，這一手續很快就辦完了。以後便是溫課與考試。在考試前後，同學方面會一再向校方交涉，要求准予不及格者有再補考的機會，但都沒有答應。對於學分的折扣方面，各學院各學系甚至各種課程都有不同，公佈的辦法也先後不一。大概三個學分的扣去一個，二個學分以下的扣去一個。就一般說：工學院方面扣得比較嚴緊，其他各院也有很多是通過過去的。再就同學個人方面說，最多的有被扣去六七個的，也有祇扣二三個的。既扣去了以後，有在本學期內補足的，但也有不再補授的。這是一個學生隱忍的時期，像這樣的一些使人感到氣悶的問題，也就無所阻礙地解決了。

「普選」運動

在痛定思痛中，新的

漲潮終於重新出現在一般

充滿着愛國精神與正義感的青年大學生之間了。在學分考試既結束了以後，生活壁報上就開始揭示了幾篇建議「普選」的文章。關於學生自治會負責人與的產生方法這一問題，早在上學期學潮未發生前，就已經有人提出過，頗爲一般同學們關切。但後來因五月學潮發生，大家爲急於應付眼前事變，因此對於這一件事也就不再提起了。本學期開始，在學生自治會方面，無疑普選是最重要的一件中心工作。

上星期間，學生自治會方面成立了一個普選委員會，他們所負責進行的工作有好幾種：(一)繕印及公佈本學期學生自治會章程草案；(二)統計各院系級同學人數；(三)按規定比例確定各級候選人數，並公佈之；(四)限期分級選舉；(五)公佈各級候選人名單及票數；(六)辦理普選。在浙大，這還是民主的第一課，因此也就更容易促進

全體同學的注意與興趣了。

在競選聲中，一向被認爲正反對兩派的同學就開始積極地(有組織的或零星的)活動了。

於是生活壁報上，又有人在大聲疾呼了：我們不選「出風頭主義者」，不選「能說不能做的人」，不選「讀書雖好而自私自利的人」，以及「負有任何特殊使命的人」。他們所要選的，無疑是思想進步，熱忱服務，而且敢說敢做，能反抗惡勢力的好學生！

驚人的消息傳來了

普選運動剛才展開，普選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由學生自治會代表會主席兼任)突然與另一同學及二位校友在市區的一家旅社裏被當地警察局在夜半裏逮捕去了。消息的內容是這樣：十月二十四日，有一位浙大農經系畢業的校友在市區旅社舉行結婚典禮，那二位被捕在內的校友便是趕來賀禮的；而主任委員與另一同學也

了「經檢隊」前于廿三日發表談話，解釋其不參加「經檢隊」的原因：(一)「經檢隊」非奉命組織，欠缺法律根據。(二)「經檢隊」每日到各商店去，跡近騷擾。次日市府財政局長陳秉鐸爲此發表談話，謂市府並無「經檢隊」的組織，只于旬日來派人處理金融波動，此固合法，而且並未發現弊端，亦無人檢舉派出人員之不法，並謂不論有無其他機關參加，市府仍繼續舉行檢查。

這是官方的正式聲明。但實際上，財廳與市府之爭執是爲了「權」和「利」。關於職權方面，在改爲直轄市前，綜理廣州金融之責屬於財廳，改制後，此項職權自應移至市府；於羅卓英任內，市府曾五次函請財廳將金融管制事項移交，財廳迄未置復，亦未就財部授權該廳辦理之事項通知市府。所以財廳退出「經檢隊」，即要使市府停止參加這「有錢扒」的金融檢查，而獨享「經檢隊」之作弊，差不多是人所共知的事，

私貨行不幸中之大幸

大幸

還有一件大事，就是西關柏榮行販賣私貨一案。海關遣一次偵緝大員，竟裝了兩吉普車的關兵警察，包圍柏榮行，當即查獲出私貨顏料、鋼線、玻璃紙、西藥、織料、錫紙等共一八五大件，價值四十多萬元。聽說該行開設逾兩年之久，專做走私生意，盈利之多，竟成天文數字。而該行之敢大批走私，是因爲它的老闆第一個便是「健膽」(即陳策之妻)，第二個是陸匡文。這兩個後台，自發生此事後，即多方活動，到最近已有相當成就。海關亦承認所檢私貨，其中一部份爲客商寄存，凡持有關單者可到海關申請發還。這已經是給柏榮行的老闆開了路。

就是到旅社裏去會晤二位校友的。他們在旅社裏談話到十時多，另一位同學因脚痛沒有回來，主任委員又因第二天早上要去參加該校校務長張紹忠先生的追悼大會，因此四個人也就決定一起住在同一旅社裏過夜了。那知當第二天上午有同學到旅社裏去找尋他們的時候，四個人都已失蹤，經一再追問旅社方面，方知在當晚夜半裏，被警察局捉了去了。

消息傳到校裏，代表會當即緊急佈告各宿舍同學，同時於二十六日召開代表理事緊急聯席會議，商討營救對策。商討結果，決定提出要求兩點：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捕同學，及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並通過組織「營救被捕同學後援會」，發布「為抗議四同學被捕申訴書」，及協同學校當局及校友會向當局提出交涉。

被捕的原因，同學間傳說不一：有謂與這次發動普選有關；有謂因當晚在旅社裏發言不慎所致。至於同時被捕的緣由，有說他們四個人都是在浙大農經系畢業或讀書的，爲了集合一起商議創辦一

個小型的實驗農場，因此造成了這一次被捕的機會；甚至有人說：是由於在旅社裏住宿在警察的隔壁房間之故。這些傳說有許多自然很不可靠，但總之，構成這一次被捕的理由與法律責任，却是不明不白的。

訓導長探監

爲了探問及營救被捕四位同學，同學們與教師們，訓導長及校長，先後忙於奔走設法。四位同學究竟犯了什麼法？捕去之後爲什麼不依法移送法院，或者當即釋放？這是他們所急需探問明白的，同時也爲設法營救的第一個步驟。校內同學的情緒十分激憤，大家都希望被捕同學經交涉後當即安全回來。然而事實並沒有這樣簡單，經同學與訓導長向有關當局交涉後，方知四位同學確被禁閉在警察局內，據說當局正在整理有關的嫌疑證件，要想釋放，暫時是不可能的。二十七日，再由校長與訓導長驅車前往交涉，當局回答的話是這樣：「偵查手續一時尚來不及整理完畢，如果今日不移送法院，明日一定移送」。非司法機關逮捕犯人，本應於二十

四小時內移送法院，否則即應釋放，然而現在已經過了法定時間，移送與釋放，却一件都做不遲，這未免引起校內同學更大的憤怒了。

二十八日，訓導長單獨前去探監，當局總算答應了。四位被捕同學關在警察局裏，每個人住一間，房裏置有一床一桌一椅，同學在情緒上都十分不安，其中有一位正在寫字。訓導長慰問了他們一番，因有人在旁監視，因此也不好說什麼話。訓導長最後問他們現在缺乏什麼東西應用，他們回答：「祇是床上沒有被舖，最好校裏有被舖送去。訓導長當即答應代爲設法送到。他們都深表感激。據當局對訓導長解釋，四同學在裏面飲食與生活當無問題。訓導長回來後，當即召集代表談話，並表示校方當竭力設法營救，希望同學亦能冷靜應付。然而釋放或移送，一直到二十八日晚上，仍然沒有消息，於是，情勢就更趨嚴重了。

情勢嚴重

同學的憤慨，已經都集中在主要一點上，就是：「爲什麼不依照法律規

定，在二十四小時內把被捕同學移送法院？」因此，在第二次代表理事聯席會議裏，就決定發動簽名：如果到二十八日當局還不移送法院，就召開全體大會，決定再進一步的行動。結果簽名的人數佔全校同學二千數百名中二分

之一以上。後來因召開全體大會的手續比較繁雜，又由代表理事會議議決再發動全體簽名一次；如果警察局在二十九日內還未把四位同學釋放，再由多數同學簽名通過，全校即罷課三天，表示抗議。那天，校長曾再度向當局交涉，希望從速釋放或者移送，結果毫無頭緒就回來了。這無疑又激起同學加倍的憤怒，到二十九日晚，簽名的同學人數已經有一千二百人以上，罷課的議案無疑已因過半數同學的同意而通過了。當天晚上，學生自治會方面在校裏招待本市新聞記者，在另一方面，校長亦召集全體代表理事談話。隨後獲悉于三不明不白死於獄中，浙大同學悲憤萬分，社會人士亦表同情，杭州全市宣布戒嚴，局勢似乎已進入嚴重階段了。（十月卅日寄自杭州）

聞現在該行的人馬已四處出動，搜購關單，而造成關單繼「通天證」之後大漲其價的情形。所以「大台柱」的作用就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也可以打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來！

五個團沒人願意

統率

近月來，各江輪渡的被「打單」，被洗劫，真是不勝枚舉，廣東已經成了賊匪如毛的所在。那一個時候沒有搶劫發生？甚至連住在本市的中山大學的教授也被匪徒捉去了。

在南路的若干縣份，政府所控制的也許只有縣城和市鎮，聽說那裏的「奸匪」活動已日漸擴大，連陳沛的怨怒起勁，也還是一場無結果。我們看不到官方所宣傳的李濟琛和蔡廷鍇的招兵買馬和準備造反，却看見生活的艱困逼迫人民造反，官吏迫人民上山。窮鄉僻壤的地方，爲什麼人民會全情「奸匪」？爲什麼「奸匪」的隊伍會越來越大？此中原因真是太易理解了。

宋子文畢竟還算頭腦清楚的人物，到任之初，即強調治安之重要，最近曾分別徵詢李福林、陳策、莫雄等的意見，並且請他們分區負責維持治安。初時李福林尚若有其事的召集舊部，準備在廣東的「中區」幹它一下，但因其他幾位都無確實把握，就一齊委婉地辭謝了。

還有一說：宋子文爲了解決治安問題，曾向李福林需要若干兵力，這位過去的「福將」說：「要五個團」。當時宋子文信以爲真，願私人借出款項，裝備並給養這五個團。雖然宋子文是如許熱心和慷慨，但答應營兵去打的人，却是一個也沒有。這不能不叫宋子文痛憤，但也正說明了當前廣東是怎樣的不當，「奸匪」的活動又是怎樣的不可小視了。（十月廿五日寄自穗市）

秋風裏的北平文化教育界

辛莘

市中教員「集體請假」

十月廿四日，北平各立中學校教職員突然全體罷教。罷教的方式儘管用「集體請假」代替，可是在這「罷教動員」的時期，這種舉動不能不說是大膽。

罷教的原因，不盡數教職員們發表宣言，任何人都會知道是爲了要求吃得飽，爭取合理待遇。公教人員的苦況，是每個身在其位的人領略得到的。其中從「教」的人員更苦，他們不能像某些公務人員一樣，還能利用職權調劑調劑，只好在自己的收入項下拚命打算盤，緊縮預算了。但是這可憐的收入，還常常受到「緩發」的處分。薪津晚發一兩天不稀奇，物價却等不及地又翻了身。這讓在飢餓線上掙扎而已瀕於死亡邊緣的人們怎樣忍受得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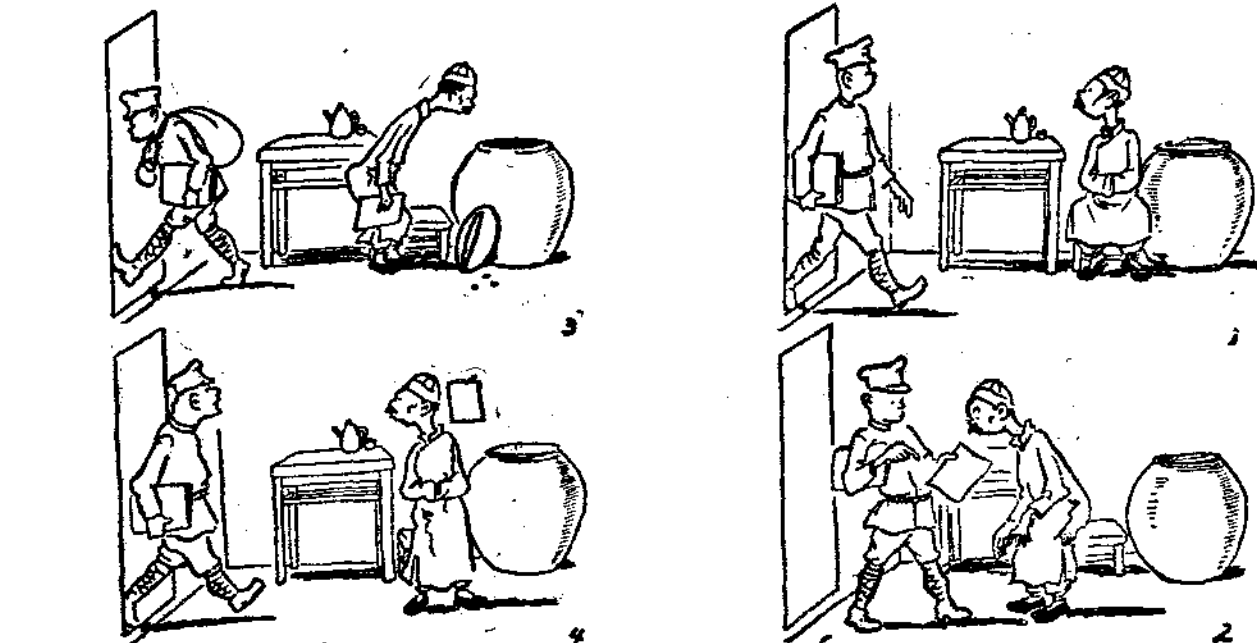
去，但是另外一個飢餓問題又將怎樣解決呢。還是說中學教職員吧，十月究竟還沒有過完，十月份薪津不發自然不足爲奇。而九月呢，九月份薪津的實物配給部分也沒有發全，還差着一袋麵粉；八月呢，八月份薪津的實物差額金二十萬元也是毫無音信。當然二十萬元和一袋麵粉在大家先生們真不是不足掛齒，無須計較的，可是在一羣月入不到百餘元的教職員們身上，便成爲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十月二十日的下午，全市市立教職員們開會集議，請求「教育會」轉呈市教育局注意教職員的待遇，他們要求分內應得的麵粉和實物差額金從速發下，附帶還要求撥照大學的例子，能得配管冬煤。在這個請求書中，簽名的有六百多人。教職員們並決議，假如這個請求得不到圓滿答覆，便用「集體請假」的行動來支持。

「集體請假」是一個很巧妙的辦法。在清苦無權勢的教職員心中，它原只是最後不得已纔用的武器。而對「教育會」來說，更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了，正好用這辦法來打擊和自己不同派系的市教育行政負責人。假如結果功德圓滿，便可以向教職員們賣乖討好；要是困難到教職員們的身上。「集體請假」便在這個前提下，得到了一「教育會」主持人的支援，在二十四日正式演出。

六百多教職員聯名的請求書當天便由「教育會」送到市教育局，教育局最初沒有想辦法解決這問題，而只想應付它時，二十三日各立中學校教職員便圍攔罷教了。教育局一看來頭不對，立刻召集各學校校長談話，局長王季高聲明保證麵粉、冬煤和差額金都不成問題，却沒說發給的準確日期。教職員也知道這些都不會跑掉，而只是要求早發、快發。當天教育局便發佈新聞，說「問題圓滿解決」。問題究竟圓滿解決了嗎？這是沒有人知道的，而人們所見的却是在第二天（廿四日）全市市立中學校教職員都「請假」了。這時教育局纔着了慌，立即分頭向各有關方面交涉，弄麵粉，弄錢，並且保證在三天之內把這些發給各教職員，而只求立即復課。這個保證通知了「教育會」，但又彷彿沒有轉達給各教職員。廿五日各立中學校教職員仍舊「請假」，有的學校則不說停課、停教，而說學生乘著秋高氣爽，集體到郊外看紅葉去了。

「魁風記」難產經過

北平畢竟還是個老城市，受歐風的洗禮不如沿海都市深。就舉電影來說吧，在北平看國產片的比看舶來片的多，一則是舶來片多是七八年前的古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聽不懂舶來片那套對白。國產片最受歡迎的，又推「大膽」和「驚險」的作品。



「魁鳳記」。一個假空軍騙坤伶的故事，影射一個不久以前在北平發生的不幸事件（這事件的主角坤伶杜鵑珠正是三廠所拍另一新片「天橋」中的女主角，這位坤伶在兩個月前又現身說法表演自殺，為這部「天橋」作宣傳），劇中穿插了不少劈紡一類的肉麻鏡頭。在一個月以前，當這部片子還在開拍時，便遭到北平不少劇評家的非議。但是非議儘管非議，開拍照舊開拍，到了本月初，洗製，剪接，配音，一切完成，三廠心滿意足地擇期上演，等待賺錢。沒想到這時候，突然發出了一枝空軍。空軍司令部提出抗議，認為「魁鳳記」有辱空軍人格，不准上演。空軍是得罪不起的，於是三廠把原片剪去五十多公尺，重新修改好，特地請空軍第二軍區司令部的一位秘書主任光臨指導，經過仔細檢查，才認為大致還過得去。

空軍方面算通過了，三廠總算敷衍，防於事先，免得上演時發生後患。誰想這時又出來一位「秋媽」，認為「魁鳳記」是影射她，侮辱她，非提起訴訟，或停止上演不可。「秋媽」呢，據說是前三年在淪陷區演勞勃成名

的坤伶吳素秋的母亲。這一位「老太太」口氣真不小，說三廠若不經她同意而上演這部片子，她就領人去「砸」三廠，那三廠豈不又變成月前北平的「北平新報」了嗎？三廠真因她的恫嚇而震恐了，立刻又請人出來打圓場，結果據說三廠方面答應上演後抽出一部利潤送給「秋媽」，這纔了事。

這兩場風波過了，「魁鳳記」便定於本月二十日在二平上演，但是空軍方面忽又通知必須等到南京總部批准後纔算沒有問題，否則發生糾紛概不負責。三廠方面只好又把上演日期拖下來。好在影片也是商品，愈等行情愈漲，不妨待價而沽。

三廠的黃色路線，原來爲了賺錢，沒想到錢未到手，連着招來幾場是非。北平人有一句諺語：「沒打到狐狸，先惹了一身騷氣」，「魁鳳記」就是這麼一部片子。

麗人行矣

今年也許是藝術界的不幸年。電影遇到「人格問題」，內容隨時有被修改的可能。譬如人所共知的「假鳳虛凰」吧，在上海和理髮師周旋了一番後，到了平津，又遇到理髮樂的留難。舊劇界的底包角色因爲生活問題，使名角成了光桿牡丹，登不得台。話劇呢，又時常是有礙「觀風」，遭到禁演。北平的話劇界，說不上有蓬勃氣象，但是有些劇人的努力却是不容否認。官方把話劇演員看成曲藝界，強迫他們和說評書、唱大鼓的在同一登記（在官方的腦子裏，劇人不過是「唱文明戲」的）。這種近侮辱的辦法，劇人們也都忍受了，爲了爭取「合法」的演出，他們不拘於這些小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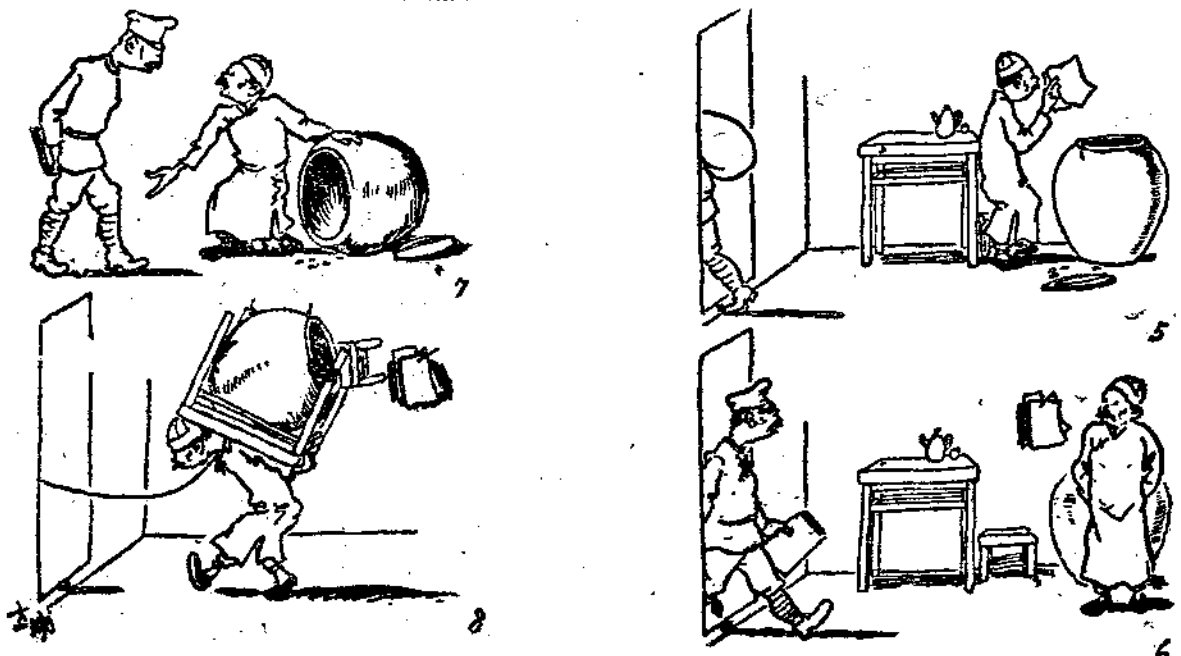
劇宣二隊從山西復員到北平，的確給北平觀眾留下相當好的印象。劇宣二隊在北平曾經演過的劇有「夜店」、「大雷雨」、「孔雀胆」等。在一般觀眾的心目中，認爲這些演出不過是二隊認真戲劇工作的表現而已，根本談不到宣傳什麼。而在官方，却認爲二隊這種做法是旁門左道，不但有問題，更且有危險，於是不僅時常加以警告，還要想辦法解散它，至少也得阻礙它的發展。

二隊既是配屬於保定綏署的政府劇團，在名義上自然不便利刻下令解散，於是便從經濟上想辦法，讓它自生自滅。二隊便在經費緊縮的題目下苟延殘喘地過日子。經費窘迫，並沒有把這羣劇人難倒，反而使他們更加緊工作與學習，真正做到了「自力更生」。

一個月前，二隊在北平唯一的話劇場建國東堂（這是保定綏署新開處的官劇場）演出了「麗人行」。這個劇的演出，服裝、佈景、道具各項費用便用了國幣五千元，這在經費拮据的劇團，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大的冒險，很多愛好二隊的人們也爲它捏了把汗，深恐演出結果入不敷出。幸好皇天不負苦心人，連演二十天，場場滿座，盛況空前。二隊的「麗人行」有了這樣結果，雖然不會賠錢，却更加深官方對它的忌諱。

假如按法來說吧，無疑二隊的組織是合法的，演出的劇本又非違禁品，這個解散二隊的題目確是很難做。於是只好把它驅逐出境，眼不見爲淨。二隊是配屬部隊的，按法理來講，到各作戰部隊中去巡迴公演「賞慰」，自是義不容辭了。

這個「出差」的辦法，已經不是第一次使用了，但是過去幾次都沒有做到。這次官方是下了決心這樣做，二隊呢，爲了生存，只好含着眼淚出去「應差」，暫時離開北平，到唐山等地去「賞慰」。（十月廿五日寄自北平）



新華

教費與軍費·教薪與官薪 蔡尙思

青年須要重新估定

政治環境 樊弘

官僚貴族化與門閥 王亞南

看自殺 碧遙

政治的心理談 商翼

10

國立商書館

通訊
從羅卓英到宋子文 陳紀
北平的浪潮 凌華
浙大被捕同學慘死案續誌 幼翀
記昆明助學運動 顧同

讀者之聲
變戲法
關於益陽慘案的一點尾聲
太平洋月刊的確造謠



教費與軍費·教薪與官薪

蔡尙思

——兼答官方對我的質難

在還沒有說到本問題以前，我得先誠懇的表示一下：如果教費真的能够高於軍費（或教費與軍費相差不過），便會馬上變成文治國而不再是武治國了；如果教薪真的能够高於官薪，便會馬上變成學迷國而不再是官迷國了。（黃遠庸有「官迷論」，孫中山先生也說：「名雖民國，實爲官僚國。」）因此，我倒希望中國現在真的做到教費超過軍費，教薪超過官薪，而被中外朝野公認爲「真民國」「真強國」！現在把本問題分爲教費與軍費、教薪與官薪，約略辯證於左。

一、教費與軍費

上月十二日大公報星期論文拙作「民國三十六年」，有一師兵每月的開支便是十二萬萬元，而辦一座大學每月的預算却只有三千多萬。養一師兵的費用可以維持三十九座大學——一段文，爲了求簡，只加括弧，表示是引用的話，而未註明「引用李濟琛氏在過去發表的話」。教育部陳東原督學便因此點而發表特別談話，謂：「按目前教育經費，誠然不敷實際需要，但任何稍用思考的人，俱不會相信每月三千多萬元即可辦一座大學。大學開支因爲學校規模有大小，所在地區物價亦有高低，實際並不一律。以南京中央大學而言，按照目前標準，每月開支已達二十九億餘元，包括……學生膳費等四項。……重慶大學規模較小，……然每月亦達七億餘元。蔡君以書面預算來喻實際開支，在邏輯上實犯以偏例全之弊。」（見十月十七日各報）殊不知教育軍事兩種經費的預算和實際開支都是大體照比例的增加上去的；而絕對不是教育經費時常增加，軍事經費永久不動的。陳先生只看到過去的三千多萬元，已經不够此刻一座大學每月的費用；而未看到過去的十二萬萬元也同樣的已經不够此刻一師兵每月的費用。只看到教育上的書面預算和實際開支有不同；而未看到軍事上的書面預算和實際開支也同樣的有不同。只看到各大學有規模大小與所在地區物價高低的不一律；而未看到各師兵也同樣的有質量優劣（例如機械化部隊與普通部

隊等）與所在地區物價高低的不一律。只看到教育經費是常常增加的；而未看到軍事經費也同樣的是常常增加的。不但如此，軍事費用恐怕比教育費用增加得還要厲害些。如果陳先生也能够同時兼顧軍事費用方面的數字，那麼對於教育費用方面的數字就不會覺得奇怪，而對我說：「任何稍用思考的人，俱不會相信……」以書面預算來喻實際開支，在邏輯上實犯以偏例全之弊。「讀者千萬不要爲了看見陳先生的談話，便把此刻一個中央大學的費用已達二十九億餘元去和過去一師兵的費用只有十二億元對比，以致反而誤認爲：「辦一座大學的費用可以維持兩個半師兵，現在的中國確是世界上重文輕武的國家。」要知道近幾年來中國支出總數目字，是純粹的教育費用佔百分之四以下，軍事費用佔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關於前一點，已詳於拙作「民國三十六年」；關於後一點，如美國眾議院議員裘德來華調查，謂軍費佔總預算百分之七十五（見十一月一日大公報），英國訪華團長亞蒙謂：中國稅收仍有百分之八十用於裁亂（見五日同報），而大公報倫敦特派員說的「有些政府在「軍事第一」的思想下治理國是，軍費竟有佔全國預算百分之八十的，結果國家血本被「軍事第一」吸盡了。」（同上）這也是指現在的中國而言。這些人只會說得少些，絕對不會說得多些；無論如何，總也可以說是「雖不中，不遠矣。」只要軍事費用佔總支出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這個「大前提」能够成立；至於其他一切的統計和比較，即使還有點出入，也是不會大成問題了！

二、教薪與官薪

我的「民國三十六年」一文另有一段說：「不論平常時期和非常時期，都是官俸高於教薪，教薪運用來維持生活也不够，那裏談得到去安心專門研究學術？」行政院會計處特爲此事而發出辨正的專電，謂：「此絕非事實，現國立大學教職員，最高薪爲簡任三級，六百元年功加薪可至八百元，教職員尙有學術研究費及特別補助費，公務員則無。如以八月份第二

區標準為例，教職員支薪六百元者，生活補助費為一百三十五萬元，學術研究費為五十萬元，特別補助費十七萬元，合計為二百零二萬零六百元。同級公務員僅支薪俸六百元，生活補助費一百三十五萬元，合計為一百三十五萬零六百元，教職員比公務員多領六十七萬元。……教職員支薪二百元者，……合計一百一十萬零二百元；同級公務員支薪……合計七十一萬零二百元，教職員比公務員多領三十九萬元。（十月二十日各報）我讀後益多感慨。

第一、爲什麼連國家最高學府的最高教職員的薪水也只能等於「簡任」第三級的官吏？官吏在「簡任」第三級以上者尚有第二級第一級，「簡任」之上尚有「特任」，「特任」之上尚有「選任」。即此一點，便足證明中國政府的看重官吏而輕視大學教職員了。爲什麼蘇聯的大學教授與工程師的薪水可以比普通官吏的多，其生活可以比普通官吏的好？此又可知大學教職員並不是天生命定式的永久封建化的要位低薪薄的了。

第二、許多較高級的官吏有辦公等費，而所有大學教師却絕對沒有。第三、現在不少官吏於正薪之外還有外快，還可貪污，如「時與文」第二卷第九期「讀者之聲」南京讀者說：

「行政院說明……北洋等六大學，在九月底以前的經常費用、建築及擴充改良費、生活補助費，共計六八、四五三、五〇八、〇〇〇元。……按以上六大學係國內規模較大者，至於其他較小學校用款當更少于此數。依行政院所公佈數字，則此六所大學，每月用款爲七、六〇五、六一二、〇〇〇元，若與陳誠主任於臨去東北前，發表整飭東北辦法談話中，所公佈東北官吏貪污款項，

每月兌回國內者在一百億以上（東北流通券）者相比較，則東北官吏每月貪污款項，爲法幣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等於六大學每月所用款項之一五、八倍。換句話說，東北一地每月貪污款項，可辦九十五所規模較大的大學。由此可知國家並非無錢增加教育經費，以提高教育水準，祇是把民脂民膏投入私囊。」

可見在此以貪污出名的國家裏，一部分高級官吏的薪水只是對外的，就不拿薪水，而其實際收入，也會比大學教師多得多。反過來說，假使大學教師能够拿到和選任官特任官相等的薪水，結果還是比簡任官薄，因爲大學教師除了薪水以外是絕對沒得措油或中飽的，所謂「薪水階級」中再也沒有比教師更清苦的了。

第四、現在連所謂「部聘教授」的薪水，最高也不能超過六百四十元；至於普通的「校聘教授」，那裏有加薪到八百元的希望？不要說八百元，純粹教授（不是校長院長系主任）能拿到六百元的，也爲數不多。

第五、行政院的聲明，還有不合事實的地方，如十月三十日大公報載：「行政院解釋教授與官吏薪給的比較，北大胡適校長特別指出：大學教授只有研究費，沒有特別補助費。此說法有錯誤。談及年功加俸，進一級不過增加底薪二十元，以四千倍計，僅增八萬元，與事何補？」他又說：「北大校長的薪水過去不啻當銀行的起碼練習生。」

第六、抗戰前國立大學教授的最高薪水約三百元左右只等於薦任級官吏的科長縣長，單以官階而論，還比現在低些。所謂「尊師重道」，原來如此如此！

青年須要重新估定政治環境

樊弘

——自錄在北京大學于子三追悼會上演詞，勸同學這一次莫要遊行示威。

今天我來參加于同學的追悼會。一來呢，表示我對於于同學自殺的哀悼。二來呢，是來表示我對於于同學之死，站在一個教育者的立場，不是向政府示威，而是向政府表示抗議。于同學在政府的看管之下據說自殺了。如果自殺，在自殺以前，政府疏於防範；在自殺之時，政府疏於救助。這都是表示政府對於青年未能盡到政府所應該盡到的愛護青年的責任。從法律一方面說，政府無論依何理由逮捕學生，都須要在二十四小時內送交

法院。這個法律是政府所製定的。當于同學被捕以後，浙江大學會要求政府在二十四小時內依法移送法院，但政府不准。可是于同學就因政府不立即移交法院而據說自殺了。足見于同學之死，政府在法律上，實在負有責任。再從社會正義上說，政府在這抗戰並勝利以來，常不惜以嚴刑峻罰，懾服老百姓。但政府的高級大員是否個個守法呢？假如中國的檢察官，果有執法的精神，將政府大員之犯法者加以檢舉，並由刑庭依法舉行公開審

判，恐怕審判結果，其應受刑事犯罪的處分者，亦不能說沒有，而且恐怕還不只一個。可是這類高級大員，縱令身係刑事罪犯，但結果却讓其逍遙法外。而青年學生稍有不是，政府便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以為在一個傾向憲政的國家，任何人在法律之前，都應平等。可是今日的政府官吏在在法律之前，顯然不與老百姓平等。從社會正義上說，我以為一個教育者的立場，對於政府實不能表示抗議。從人道的立場上說，政府對於青年學生的態度實應該盡量的寬大，因為青年畢竟是青年。他們在行為上縱有感情用事之處，若其動機純為愛國，亦應從寬發落，許以自新，替國家培植一點讀書種子，替社會保留一綫進步生機。可惜現在的政府對於青年的態度，完全出於吾人的想像之外。他們不但要嚴懲犯過的青年，而且即對不會犯過的青年，他們亦要向他吹毛求疵。例如北大孟李兩位同學被捕業已逾月，既不宣佈罪狀，亦不送交法庭。遑論站在人道的立場，我恐怕無論站在什麼立場上說，都是說不通的了。再回憶過去北洋軍閥失敗的往事，我不禁在一方面替政府就心，在他方面對於自己表示慚愧。為什麼慚愧呢？

我願向大家作一坦白的自剖，即我乃是一個想在象牙之塔裏面偷度愉快的讀書生活之一人，以此未曾對於社會的不正、不義和不法，作過無畏的反抗。我實在是一個怯懦者啊！所以，今日我來參加這個盛大的充滿着熱情和憤慨的大會，心中實在含有一種說不盡的羞慚。但是，我想，凡是青年人所能到的地方，除非我不願，我也許都能去！在冰山和雪地裏旅行我能去，在火山和油沙裏煎熬我亦能去。我雖然不信中國儒家的哲學，但是我已讀過文天祥正氣歌，即在正義之前，我想我也許還能夠做到不低頭這三個字。不過我不願學文天祥，我願學一個頂沒出息的廢人，阿Q。就是我要勝利！我要勝利！我要最後的勝利！

最後我還想向大家作一委婉的勸告，即我輩青年們須要重新估定我們學界所處的地位與環境，特別是政治的環境。我沒有勸同學對於現實的醜惡作讓步的意思。我想向大家報告一個我所親身經驗過的一段故事，「將

死之狼」，來提高我們的警覺性。

有這麼一年，我在一個荒山上讀書。荒山上夜裏有狼，我很害怕。不料有一月夜狼竟來了。農夫見着狼來，為了勝利，他於是急忙放出一隻豬，頭上給牠包滿了火藥，這個火藥是能爆炸的。狼一見着豬，牠便一躍而進，張開牠的血紅的巨口，來咬這個豬的腦袋。那知一下咬着火藥。火藥爆炸了，把狼的下巴炸掉了。他在那裏哀鳴不已。農夫聞聲趕出給他一鎗，鎗中要隘，狼立倒地。「狼已死了！狼已死了！」大家都高興得了不得，趕來湊興。那知道這狼兇猛異常，他在臨死之前，不吃一人，絕不罷休。正看之際，他忽然仰過頭來，翻身一縱，以牠的全力撲在一個小孩子身上，牠雖然已沒有下巴，但小孩子竟然死了，而牠也同時死了。我報告這一段話的意思，是說，我們對於這個將死之狼，頂要注意。你可以鉄棒去打狼頭，但你千萬不可去同狼開頑笑。

我想，我應特別聲明，我沒有說政府是狼的意思，不但政府不是狼，即共黨亦未必便是農夫。共黨不是常被呼為「農夫的敵人」，「共匪」！「共匪」！麼？而且政府這次從事動員勸亂，常說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得意洋洋，焉有咬着炸彈之理。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把我們的政府也看成「將死之狼」了。

可是，我們莫要忘記了一件事，就是任人皆有狼性，連我們自己也有。政府在這動員勸亂之際，也許亦不免多少有點。現在政府正在勸亂期中，過去雖然得意洋洋，但最近亦常勝常敗，心情極亂。誠恐偶不小心觸犯了他。我以為青年們無論作何行動都儘有你們的自由，但莫要忘了這個將死之狼的故事，即你如果不願意，你雖然是個小孩，亦可以用石頭去打狼頭，但你千萬莫要去當優孩子。這狼雖然已經失掉了下巴，但對於你這幾根嫩骨頭，牠至少仍可以撲死你的啊！

三六年十一月六日，於北京大學。

關於「魯迅傳」還有幾句話想說

許廣平

編者先生：
閱十月三十一日出版的 貴刊，范泉先生「關於「魯迅傳」的一點事實聲明」，我還有幾句話想說：

因我寫「魯迅傳」時，手頭「文藝春秋」期刊不全，僅就記憶所及，誤「校正」為「校訂」，好在范泉先生的聲明也承認：「所以在文藝春秋一卷三期的編後記中聲明，「並未經日文本校訂」。」可見仍有「訂」字，而且平常訂正兩字多連用的，實在「差異」有限。我以為不管是校訂也好，校正也好；不管是登在文藝春

秋「書前的文化報導小新聞裏，……事實上的「校正」。或在「編後記中聲明，「並未經日文本校訂」。而仍被尊為曾經校正。總之，依我說，都不應當。偶或貢獻些微意見，未必即對，也不能就算校正，否則要濫學校正實在太多了。為尊重校正這一榮銜，我以為倘使要把他（或她）加以校正之名，不能如此草率，所以我始終對日譯本不同意算是校正，就是這意思。特煩 貴刊再實情揭載，不勝感謝！即候
撰安

許廣平啓 十一月一日

官僚貴族化與門閥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歷史的經濟的解釋）之七

一般的講，在歐洲的專制官僚社會，官僚是貴族的轉化物，貴族愈來愈官僚化，而在中國專制官僚社會，只因爲它在實質上，不是由封建制向資本制轉化的過渡性質的東西，而根本就是又一形態的封建組織，故它的官僚，它的士族，愈來愈帶有貴族的品質。

本來，一個封建社會的支配階層，最後都是靠着對於農奴或農民的剩餘勞動生產物或其價值物而生活，它用貴族或官僚的名義，享有那種勞動剩餘，正如同其被支配者用農奴或農民的名義，提供那種勞動剩餘，同樣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然而，官僚貴族化，相伴着，形式上自由的農民的農奴化，却對整個專制官僚統治，有着莫大的影響。

現在先來看這種變化所由發生的基本原因是怎樣的？

貴族最基本的形造條件，是世祿世官，就政治支配的關係來說，是「生成的」統治者；官僚立於政治支配地位，在最先，即以中國而論，在秦代乃至漢代前期，並不是「生成的」，而是依「以學干祿」或「學而優則仕」，或所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做成的」。「生成的」與「做成的」不同的分野，就是說後者不能靠血統，靠家世，取得統治地位，而必須多少具備有當時官制所要求的某種學識，能力或治績。而所謂官僚的貴族化，乃表明官僚取得統治地位，即使沒有完全把當時官制要求的諸般條件丟開，却至少在某種限度，反而藉着其中的學識那一項條件的幫助，把「生成的」作用加大了；血統、家世、門第，愈來愈變得重要了。

然則爲什麼有這種變化呢？

我在這裏得指出：在專制官僚統治下，作爲官僚大頭目的帝王，除了王朝的開基者以外，通通是依着血統，依着「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的繼承法，而行使統治的。這種繼承法，原是周代推行貴族政治當時定下來，以期確保王權，而杜絕王位繼承的爭端的。到了秦及其以後的王朝，雖然所施行的是專制官僚政治，而貴族政治的繼承法却依然照樣

保留着，於是，被我們理解爲最大官僚頭目的帝王及其同一血統的皇族，就無疑百分之百是屬於上述「生成的」統治者羣了。他們這種立在統治金字塔頂點的人物或族姓，既如此被先天的決定起來，在一切由上而下的治化局面下，就無異成了一個拉着一切其他大小官僚貴族化的起點；於是，頭等以下的官僚乃至士族的貴族化，

第一，就是由於皇家或皇族雖然自成一個特殊優越的體系，但他們究不能和一般「人間」隔離。而在「同姓不婚」的規制下，尤不能不有地位、家世、財產等方面都和他們相周旋的異姓疆宗、巨族、名門，來同他們這些「皇親」，結成「國戚」；而且，與他們結成了姻婭關係的，即使不是什麼疆宗、巨族，也很快就會列在大貴族的陣營。其升官錫爵，全憑由此取得的貴族身分。例如漢高祖以亭長出身，「貴爲天子」，他那位「妻因夫貴」的亭長太太一家，不旋踵間就佈滿朝廷要津，而演出第一幕外戚之禍；而西漢因以結束的最後一幕外戚之禍，也是由王氏「五侯同日封」的大場面導來的。皇族拉着大官僚貴族化，大貴族又拉着中小官僚貴族化，任何開明的專制政治，都是不可能貫徹「選賢任能」的用人尺度的。而且，

第二，王位繼承法的推廣，即由帝王推行到他的臣下，而成爲所謂宗統，更會加強上述的貴族化傾向。中國的宗法組織，原是創始於周代，周代的封建秩序崩潰，這組織理應發生動搖。但因宗法組織的最大特點，就是君權不可分不可犯，就是父權夫權無限大，所以，崇尚儒術，主張綱常教義，便必然要求變相恢復或加強宗法組織。同時，中國專制官僚統治，又如我們前面所說，一直需要以族長制爲中心的宗法社會組織，作爲其政治組織的補充，於是，具有濃厚原始性的氏族制，便與專制官僚統治一同千古。而在宗法社會組織下，一個人的繁華富貴，不僅被理解爲「宗族交遊光寵」，且確實要爲宗族交遊所共享共榮的。

第三，作爲中國官僚社會選賢任能的「賢」一能「程度」，一般是用士子對於孔家學說的修養或實踐來測度的。孔家學說原本是被「載」在不易閱讀，不易理解的「文」中，後來又分別爲歷代的儒家玄學化、禪學化，

於是，它本身便成爲非一般人所能接近的深奧東西；愈顯得深奧，愈使人莫測高深，而對它有一知半解的學子或士大夫，就因此在一般「下民」的心目中，也相應顯得高超和優異。結局，作爲取士、評臨人才，乃至實現「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官僚政治理想的所謂學問或知識，竟反而變爲造出特殊身分的武器。這知識的封鎖，同以上所述諸原因連同作用起來，就相當補強了官僚貴族化在經濟上的比較薄弱的條件。

第四，我們已知道，貴族有貴族的經濟基礎；官僚貴族化如其同時沒有伴隨着經濟條件的改變，那就不論帝王或皇族怎樣經常需要一批與他們格格周旋的人，怎樣加強宗法組織，乃至怎樣厲行知識的封鎖，他的貴族身分，終究是不易形成，不易固着起來的。幸而，事物本身總像在爲自己作着種種配合的安排。秦漢乃至以後的歷代王朝，迄未忘記把「普天之下」的一部分土地，賜封於其親故。除此以外，厚祿與高官總是相連的；聰明的統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賜贈，以結臣下的歡心，甚或鼓勵貪污侵佔，以饜野心者的壯志。漢高祖對「蕭何強買民田宅數千萬」所表示的優容安慰心情；宋太祖勸石守信等「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的深謀遠慮打算，皆說明專制官僚社會統治者對其臣下，或其臣下對於僚屬所要求的只是「忠實」，不是「清廉」，至少兩者相權，寧願以不清廉保證「忠實」。結局，做官總有機會發財，有官斯有財，有財斯有土，有土斯有社會勢力和身分，而這又反過來成爲知識獨占的前提。

然而，所有上述諸點，通只可理解爲中國型官僚可能貴族化，可能形成門閥的基因，而其在現實上的作用，則還有待於下述諸種事態的誘發。

二、

大約從漢末歷魏晉南北朝隋代以至唐之初葉，中國典型的專制官僚統治，發生了種種變態；照應着當時封建局面的離心化，官僚貴族化的色彩，愈來愈加濃厚了；古代初期封建制度下的世卿世祿在名義上雖不會恢復過來，而其代替物的門閥，却正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門閥該是在如何表演着貴族的場面呢？方壯猷先生曾對此有一段頗概括而精闢的說明：「在這個時代的門閥的力量，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充分的表現他們的優勢。就經濟方面觀之，他們不但領有廣大的土地，而且庇蔭着多數的部曲，隨身、典計、佃客、衣食客之類，替他們從事生產勞動，對國家既不納稅，亦不當差。就社會方面言，他們從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統優越的傳說，自高自誇，與一般平民隔絕，既不肯與庶姓通婚，亦不肯與寒族交際應

酬。就政治方面言，他們憑藉祖先的餘蔭，不但壟斷官吏選舉之權，凡州郡掌管選舉詮敘的官吏，如中正、主簿、功曹之類，都非由他們中擇人任用不可，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級長官亦由他們包攬獨占，使一般平民不易有參加的機會」（見所撰中國中古時期之門閥，中山文化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然而，門閥的地位，是積漸養成的。中國專制官僚制的封建主義的特質，既有我們前節所述的那些促成官僚貴族化的可能條件或因素存在，一遇到其他更有利的情勢，就會很自然的向着門閥的途徑發展。

首先我們得指出，任何一種固定的等級的身分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兩漢前後統治四百年。雖中經王莽的篡亂，但很快就中興起來。同一王朝統治如此之久，其間又有相當長期的承平安定局面，在最大官僚頭目的帝王及其皇族，固不必說，即在中上級的官僚們，都無形會由生活習慣，累世從政經驗，乃至相伴而生的資產積累等方面，產生與衆不同的優越感和階級意識，而他們藉以千祿經世的儒家學說，更無疑要大大助長那種優越階級意識的養成。他們在「法律上獲得種種特權；他們享受高爵厚祿，作官發財，在本鄉多購買土地，退休後就成了地方的豪紳，死後留給子孫福祿。他們創造了一種生活水準和文化水準，够得上這水準方能成爲一個世家。既是世家，子孫便該世世作官，宗族便該代代顯赫，同宗同族便該團結互助，提攜鄉黨後進，在本地成爲一個名族或「郡望」。他們闡發並實行儒家的宗族道德觀念。他們自以爲自己的地位，相當於封建時代的貴族階級，所以借來很多古代的宗法觀念禮儀習俗放在自己生活裏面。這樣到了漢末，名門世家的宗族團結及強烈的宗族觀念便養成了」（孫毓棠漢末魏晉時代社會經濟大動盪，人文科學學報第一卷第二期）。然而，所謂貴族化的官僚或變相貴族的門閥，在社會的意義上，是從他們對於被其統治的農民大眾所表現的特別優越關係顯出來的。他們逐漸的貴族化，必然要與其對極的農民的農奴化，相輔而行，所以，

其次，我們得考察到當時農民地位的變化。中國西周貴族政治下的農奴，到戰國之世，就由種種「復其身」的方式，轉變爲在形式上有相當自由的農民了。可是農民的那種自由，是就他們不再隸屬於個別貴族講的，事實上，他們對於整個支配階級或地主階級的隸屬，却並不會因此變得輕鬆。比如，在專制官僚社會被宣揚爲德政的輕租稅的措施，往往是更有利於官僚地主，而更不利於直接生產者農民的。王莽會對西漢的輕稅政策，

指出了其中的癥結：「漢氏減輕田稅，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糶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漢書王莽傳）。這是說，地主向政府納稅，三十只出其一，而直接生產者向地主納租，却須十出其五。不僅如此，官僚政府的開支，是會隨着官僚機構的膨大，和官僚排場的增華而益加多的。結局，輕稅的狡猾伎倆，就由最不平等的入頭稅——算賦，及最苛重的徭役（凡二十歲以上，五十六歲以下，每年須提供一月無償勞動，並須成邊境三日，不供此等勞役，即以貨幣代，名為更賦），完全曝露出來。這就是馬端臨所謂「漢代對於人丁，不但稅之，且又役之」，而况「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夕改」（晁錯語）。無怪在此種統治方式下的農民，不得不「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以饑餓自賣」，並「嫁妻賣子」了。然則我們御用史家們吹噓的「漢唐盛世」，應當不是指着這些在他們看為污濁寒酸的光景，而是就其對極的「豪人之室」，「連棟數百」，「奴婢千羣」（見後漢書仲長統傳）的闊綽場面了。還不僅此也。

這裏得再指述到使農民農奴化的另一大事件。在分離的封建局面下，商業資本的活動，是要遭受嚴厲限制的，而在集權的封建局面下，集權政治在交通、貨幣、稅制統一的諸般努力，都大有助於商業的發展。農業勞動剩餘，既須以現物地租或算賦更賦的方式，提供政府，政府又須以所收得的穀物、米、絲、大麻等投出市場，獲得其支付官吏及其他開銷的貨幣，於是商品貨幣關係的基礎，便被好好安放在農業剩餘生產物或其價值的轉移上；商業資本與租稅，或者商人與官僚，在這裏發生了利害與共的密切聯繫。官僚愈是以超經濟榨取的方式，使農業生產者佔有的必要勞動生產物部分愈少，剩餘部分愈多，商業流通循環的規模就愈大，所以在漢代長期承平局面下增加起來的農業勞動生產力雖然再大，一般農民的生活及其社會地位，却反更形惡化了，此在官僚豪商聯合榨取的情形下，固屬如此，而在官僚與豪商相互火併的場合，亦並沒兩樣；社會同數量的剩餘勞動生產物或其價值，豪商佔去的分類太大了，官僚們雖然會運用所謂抑商政策，運用漢武帝時所推行的種種商稅乃至錢令限制它，打擊它，但在這種社會終須商業來集中並分散農業勞動剩餘的場合，商人或豪商們由此妨阻打擊所受到的損害，最後終將取償於農民。所以，就一般通例看來，商業資本活動的強化與擴大，理應促使封建生產關係的解體，促使農奴從原有土地束縛上解放出來，但農奴解放，是以容納農奴到產業方

面的前提條件逐漸成熟了，才有可能，如其那種前提條件不存在，則因官僚豪商兼併，而從土地上，從小農或佃農地位游離出來的比較獲有形式上自由的農民，結局，不乾脆變為官私奴婢，就得以更不利的條件，再依附於土地，而轉化為私屬或道地的農奴了。

在西漢之末，奴隸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化了。東漢的官僚統治，在宰輔制上，在宮中府中的財政體系劃分上，在吏治上，還遠不逮西漢，而官常的腐敗，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猖獗活動，比西漢尤有過之，但延至桓靈之世，奴隸問題反不若西漢末造表現的厲害，那原因，決不是由於光武「免奴隸為庶人」，發生了何等根本解決的效果，而是由於當時由土地兼併失去生存依據的農民，除了為奴為婢，滿足那些日益增大其消費慾望的官僚豪商之闊綽排場外，還有互為影響的兩個出路：

一是散之四方而為匪寇——中國農民為生活所迫，起而「犯上作亂」，西漢之末，已有聲勢浩大的綠林與赤眉，但農民暴動規模的全國化，第一次可以說是發生於東漢末葉。「桓靈之世四方盜匪的蹂躪，與日俱增。到了黃巾之亂爆發後，受蹂躪最厲害的地方是幽冀青徐兗豫一帶人口最繁密農業最發達的區域。正統的黃巾平安之後，十餘年間黃巾餘黨和各地盜匪之擾亂，遍及於整個華北，如河北的黑山賊，并州的白波賊，青徐一帶的黃巾，涼州羌漢混合的匪軍，都有幾十萬人……黃河流域的這種擾亂，也波及於江南，益州的黃巾，荆州的「散盜」，揚越的「妖賊」……這些匪盜在各地殺守令，劫財貨，滋意擄掠，弄得道路阻塞……」（見前揭漢末魏晉時代社會經濟的大動盪）。

一是依託強豪而為私屬——在上述匪盜橫行的局面下，沒有為匪為盜的那一部分農民，他們不但要承担起更繁重的租稅負擔，且無法安穩的進行勞作，於是前述以宗族團結為重心的名門、巨族、郡望就不但分別集中有大批為他們服務、報恩、效死的「門生」、「故吏」、「賓客」，供其驅策，且還很自然的變成了那些尚未參加匪夥的農民及其家族依託為命的靠山；無論在防衛時，在逃難時，抑在苟安情形下，都當作強豪巨族的自衛武力或生產的勞動隊伍。他們依託強豪的名義是代有不同的，但不論是「家兵」，是一部曲，是「蔭客」，是「私屬」，乃至其他，他們只是半自由的農奴的身分是確定了的；這正如同立在其對極方面領有他們的不論是「郡望」，是「場主」，「寨主」，是各霸一方的刺史州牧，乃至後來依官品高下決定領蔭佃客多少的官僚，他們顯然都具有大小領主的身分。

當官僚與農民相互間的關係或其各別社會性質一開始上述的改變，中國古典的官場政治場面，隨即就發生了與其相應的諸種特異現象。

三、

那些現象中第一個表現得大家都十分明瞭的，就是分立割據的局面。由漢末的羣雄崛起，三國鼎峙，甫經司馬氏混一宇內，不旋踵間就由八王之亂，五胡之擾，演出南北朝的長期分立，到隋代統一未久，接着又是一度羣雄崛起；混亂割據之局，直到唐代才算扭轉過來。

至此種局勢的造成，歷史家會形式的指述了許多表面的原因，但稍一仔細考察，就會知道那與我們上述的門閥，保有極密切的因果關係。比如，漢末崛起的羣雄，幾乎沒有幾個不是出身豪族、郡望或「世官」；也沒有幾個不是由於他們利用其社會經濟上的地位，招收或集中有大量的賓客、部曲，以為角逐爭衡的政治資本。像袁紹初起時聲勢喧赫，無非因為他的「賓客滿天下」，只汝南一郡，就達二萬人；又孫堅父子崛起江東，無非因為他們「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羣，郡吏常以千數」(三國志治傳)，因為「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三國志鄧艾傳)。其他如劉表、公孫瓚、馬騰等，殆無一不是靠着「賓客」部曲的力量，各霸一方。迨三國被統一於晉室，晉武帝又襲曹魏故智，明令許九等官吏各得庇蔭一定額客戶，各得占有一定額田地；所謂占田制，實質上，雖在企圖藉此予豪貴們以蔭戶占田的限制，但施行不通，却使前此非法領有國家公民方式，得到合法的保障。於是，在整個晉代乃至以後各王朝，豪族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各方面，都分別立下了深固基礎。

本來在統一局面下，專制帝王的權力，是無限大的。一到羣雄割據現象發生，那在一方面是表示王綱不振，同時，却又正因為王綱不振，而使偏安朝廷，更不能不受制於據地稱兵的豪族或地方勢力者。漢末獻帝變為野心割據者相互爭衡所挾持玩弄的犧牲品，實為此後每一代亡國亡朝君主，提供了悲慘可憐的榜樣。司馬氏之欺凌曹魏孤兒寡婦，完全是依照曹丕父子欺凌獻帝母子的作法。可是當懷愍蒙塵，偏安江右局面一經形成，晉元帝遷都建業，吳之士族，竟毫不理會。後經由王導王敦多方誘導，始肯與周旋。王導當時勸元帝好好接納江東士族的論調，充分反映出了那些豪右們的聲勢。他說：「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義。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願榮賀循

，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晉書王導傳)。「為政不得罪於巨室」，在「天下喪亂，九州分裂」的場合，當然更是真理！可是巨室之間往往利害衝突，靠巨室撐場面的君主，這時就不能不和事老的姿態出現了。東晉初渡江時，江左豪族，以人與地的便利，聲勢顯赫；迨北方豪族聯袂東下南渡，拖帶大批宗室部曲，益以政治上之傳統因緣，和流寓者的團結需要，很快就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威脅南方豪族的力量。介在南北兩豪族鬥爭中的君主，既不能拋開患難存亡與共的北方豪族，又不敢開罪南北豪族，於是就以所謂「寬大為懷」的政策，掩飾其「兩姑之間難為婦」的苦衷。此後直至侯景亂梁，蓄意屠戮蹂躪僑裔大族，對「富室豪家，委意剝削，子女妻妾，悉入軍營」，於是土著豪族特別顯露頭角，正所謂「村屯塢壁之豪，郡邑巖穴之長，委凌侮而為暴，資剽掠以為雄」(南史賊臣列傳論)。由東晉以至宋齊梁陳的半壁江山，殆無異巨姓豪族的勢力角逐。而同時在異族統治下的北朝，入侵時的社會組織，原為氏族部族，而對於當時却後的漢族豪右巨姓，又不得不利用為統治工具，結果世家右族權勢之大，竟至自行樹立州郡，如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詔云：「魏自孝昌之季，祿在公室，政出多門，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北齊書本紀)。當時州郡在南北朝均兼武職，南朝郡守加都督銜，北朝令長皆以將軍居之。這種場面，已顯然表現是中國古典封建的一種變局，而在某些方面逆轉為中國初期封建形態的復活。至於我們將在下面述及的官爵世襲情形，那不過進一步顯示官僚貴族化的深度罷了。

我們在這裏應當注意的是：封建制無論採取向心的形態或離心的形態，統治者無論是用官僚的名義或貴族的名義，被支配者無論是被稱為農民或滿含有農奴性質的蔭客或部曲，於他們相互間所結成的提供農業勞動剩餘和佔有農業勞動剩餘的社會生產關係，沒有何等本質的改變，而所改變的，在被支配的農民方面，不過是每經歷一度上述的轉變，他們的痛苦即一度加深，而在支配者官僚貴族方面，那種轉變內容，乃意味着全社會農業勞動剩餘在他們之間分配比例的變化，並意味着他們全支配階層對於農民統治經驗和技術的增加。所以，結束這中古封建變局的後事，就統治者內部來說，在一方面是圍繞着精神生產手段爭奪戰而展開的田制稅法的變革，在另一方面是圍繞着精神生產手段爭奪戰而展開的科舉制的採行，而這兩方面的大成就，就是中國古典封建專制官僚制向着更高階段的發展。

看自殺

碧 遙

杭州人每到陰曆十月初一，常到初陽台上看「日月合璧」，以為奇蹟。今年上海的陽曆十月，卻有「春秋合璧」的奇蹟，可惜大家煙花似的看過便了。

今年上海的十月，有兩大特徵：一是物價狂跳；一是自殺者激增。物價之跳，有如「春花」怒放；自殺者之激增，則有如「秋葉」飄零，所以是「春」

「秋」合璧。物價之狂跳，由來已久，大家已不以為奇，而但認爲「不可抗」。小百姓力竭聲嘶地呼天，上天冥冥，一無反應。政府出盡大力，嚴格查辦，而人海茫茫，並無所獲，結果是此現象一如風霜雷電，以「不可抗」視之；各人硬起頭皮，聽天由命。

聽天由命，原是祖先傳統的哲學，而今便最道地地實踐。

自殺也是聽天由命的哲學的實踐之一。經濟壓迫了，或是家庭壓迫了，或是那方面壓迫了，逼得無路可走，便走死路。死路是最平坦，最安穩，最自由的，任憑你最大的壓迫者，手指也觸不到此。不死逃不出被壓迫的惡運，這惡運社會上無可告訴，無人聲援，等於是「不可抗力」。事不可抗之謂「天命」，「天命」不可違，活不了，死了好了。是這樣的哲學。

「順天命」的哲學不斬草除根，「抗天命」的哲學不培植長成，自殺是較得看的。

前時政府有過嚴禁自殺的命令，有此命令後不料自殺者反而多了。這竟像看禁書一樣越禁越多人去。依常情禁令應該祇是禁止「避死」，如同對付避兵役，避監禁之類。現在禁令反而是來對付避「生」，這應該是一奇聞。而人們竟然如同對付一切的禁令一樣：消極地漠視，反其道而行之，這更是奇聞的奇聞了。

但是生命畢竟可愛，爲對禁令整扭而殺身，很少有的。然則自殺者爲甚麼如此之多呢？

有人說：「他殺」多了，自殺不得不多。不見東西南北的戰場，每天倒下多少？又不見都邑鄉鎮的刑場，每天倒下多少？如此之多的生產的健壯者連同億萬的國庫，化爲煙花，哀怨苦難盈於四野，自殺自然要多的。但是話雖如此，我以為活的人還是比死的多得多，爲甚麼不求減少枉死呢？

爲來爲去爲了許多人祇顧「看」。「黃鶴樓上看翻船」，「城隍山上看火燒」，「看」而已。碧海青天月，「他家瓦上霜」，「看」而已。秋行春令，物價如春花之放，慘象如雨後之筍，啼淚如春水之長，「看」而已。一切可以賞心者，看之；可以刺激者，看之；可以快意者，看之；可以驚心動魄者，也看之；看的事求其多，愈多愈妙。動手的事，動肩膊的事求其少，愈少愈好。於是社會儘管天翻地覆，五花八門

，烏煙瘴氣，好看而已。一部分人祇顧「看」；另一部分人如在熱鍋上的螞蟻，祇顧爬。爬得不好跌倒了，看的人好開開眼界。

以筱丹桂案而論：張春帆是甚麼東西？自己有了妻子，憑甚麼來佔有筱伶？退一步說，憑他戲院經理優越地位，無恥地玩弄了她，也不能再要求她的貞操。然而事前從來沒人非難制裁，事到今日，還祇是問他的虐待罪與殺殺殺人罪；他的把筱伶當做小星，他的多妻行爲，就沒有人提過，似乎並不犯罪。

上海還有不少不少的筱丹桂，全中國還有萬萬千的多妻的張春帆，然而不到發生自殺案，大家看看而已。對於具體的暴虐婦女的行爲，尙且祇是看看；至於那個無形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那個以人爲搖錢樹，爲牛馬的剝削制度，那個憑優越地位魚肉他人的強權霸道，更是連看都看不見，自然更沒有人伸手過問的。因之，社會者是黑漆一團，無告者唯有暗中摸索那條死路。

自殺者的創子手雖是他（或她）本人，而驅使他（或她）赴刑場的則有無數無數的「冷血漢」。像筱案那樣，單單責難張春帆一人，未見得公平的。不有萬萬千對社會現象袖手旁觀的「看客」，何至於有張春帆呢？

推而言之，無論那一個自殺者，背後都有無數無數推他（或她）下水的人。倘使追根究底地審問起來，沒有一個不是被人陷害，受人教唆；也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是「他殺」。不必像子三那樣，才算有他殺之嫌。

看啊！自殺是冷清清靜悄悄的行爲，然一般人未必都能冷靜，倘有一天這種人不選擇自殺而竟「他殺」起來，那又是較得看的。不是今天報上，就有一

個瘋漢，拿了斧頭站在馬路當中，高喊：「我是中國人，我要殺盡大亨，我才有飯吃。我要殺人呀！」發瘋與自殺，原是殊途同歸；自殺的多了，瘋漢前敵不多起來麼？倘使看的人不把他攔腰抱住，他一個人就不知要殺死多少人；不一定大亨，袖手旁觀的看客，都有被殺的可能。

鄉間殺牛，父老都教人不要去看，要去看時必須雙手籠在袖筒裏，表示不會動手，免得對着天負罪。這又是傳統的「看」的哲學，祇要叫別人動手殺，自己是袖手旁觀，那麼事前或者竟是我主張殺牛，事後又完全是我來吃牛肉，都可以無罪。這種自私的哲學，誰個不愛信奉？

看客有其袖手旁觀的哲學，自殺者有其順天安命的哲學；這似乎自殺者祇顧自殺，看客祇顧看，各得其所，兩不相關。所爭的是：重層的壓迫不一定單能使人自殺，也能使人發瘋；瘋漢殺人，就有不便看的一天。而且壓迫多了，自己也難保不走到自殺的路上；那時望着別人袖手旁觀，自己垂着眼淚的耕牛似的倒在地上，心裏也未必有做看客時那麼的好受。

陽曆的十月過去了，上海人身邊物價之狂跳與自殺者之激增的兩大奇蹟，大家並沒有帶一股熱情，仔細地看。現在陰曆的十月初一快到了，還是讓杭州人熱熱誠誠地半夜跑上初陽台，去看日月合璧的奇蹟罷。

航訂讀者注意

茲以航空郵資漲價，本刊自第二卷第十期起每期增收航郵費一元，倘航郵定戶不願訂費內扣除，請即賜補，不另通知。

政治的心理談

商翼

情調對比

記得幼時讀過一篇「羊老人」，說一個讀書人年輕時落魄，餓得半死，幸得一個老人煮了一鍋羊頭給他吃，才救了性命。從此他一直記着這羊頭的滋味，認為那是天下最美味的了。後來中了舉，做了大官，還常常想念。可是叫廚子一次一次的煮，却都是味同嚼蠟。想必是羊老人有特別的烹調法吧，於是就去找了那老人來，叫他再煮一次。煮好了一嚐，想不到仍是味同嚼蠟。那羊老人便趁此機會大發一通議論，大意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羊頭比餓肚雖勝過千倍，但比起你現在享受的山珍海味，却差得多了。

這故事可說明心理學上的「情調對比原理」。所謂情調，指愉快與不愉快的等級。和餓肚一比，羊頭在情調的表格上可打個（十），那就是最愉快的配號。但和山珍海味相較，就說不定要打最不愉快的（—）了。

現在常聽得人說：勝利後不及敵僞時期，敵僞時期又不及抗戰以前，中國人的生活真是每况愈下。「况」即是比，這說法也即表示情調的對比。假使中國人一向茹毛飲血，吃樹皮草根，那現在也不會覺得不幸福。不幸的是我們原來能吃飯，敵僞時也還可以吃粥，現在却真的要吃樹皮草根了。儘管北平市長何思源鼓吹樹皮草根富於營養，維他命含量極多，可是比起飯和粥來，在情調

的表格上實在只能打個負數。這就使人覺得難堪了。

以上是就縱的歷史方面說。就橫的現實方面而言，情調對比原理也同樣適用。如果中國人一視同仁地，都只能住棚屋或宿露天，短褸穿結或衣不蔽體，那就無話可說。不幸的是「十個手指有長短，山林樹木有高低」，有少數同胞不但腰纏萬貫，金屋藏嬌，而且在巴西買了橡樹林。這樣一對比，當然使得無業可就，無家可歸的小民覺得不平了。不平則鳴。如果不想自殺，還有點求生的慾望，那就只有挺而走險一途。用不着歸咎於什麼特殊黨派，也用不着什麼高深的政治經濟的理論，只這簡簡單單的情調對比四字，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現在到處是騷動，到處是民變。

國格分析

人格有所謂內傾與外向。外向的人善於適應環境，多作進取反應。內傾的人不善於適應，多作退避反應。前者喜歡隨便表露他的情緒，後者在情緒上却比較容易受刺激。當然，這中間並無嚴格的界限可劃分。除了極端內傾與極端外向的變態者之外，極大部分正常的人，總是既內傾又外向，在某些方面退避，而在某些方面又表現進取的精神。例如一個科學家，他或許不愛社交，見女人就臉紅，但在實驗室裏作試驗，或到野外採集標本的時候，他却異常進取。

人格又有所謂自尊與自卑。譬如跨進一個公共場所，有人大大方方的就走到那引人注意的位置上坐下，有人却戰戰兢兢的躲到壁角裏去。前一種人較自尊，後一種人較自卑。當然，這中間也並無嚴格的界限，而且可以轉化。如阿Q，根底是個非常自卑的人，可是自卑之極，居然自尊自大起來，開口老子，閉口第一，這就是所謂精神勝利。

國格亦如人格，有上面所說的分別。例如美國，是個有強烈外向的國家，多進取而少退避，喜怒多形於色。並且在今天，它幾乎已自尊到了瘋狂的程度，處處氣勢凌人，以執牛耳自命。但是我們的國家，或者確切點說，我們的政府的性格又如何呢？

我們有不得不內傾的苦衷，因為在「動亂」；有不得不自卑的理由，因為曾經是，也許依舊是「次殖民地」。可是我要指出：我們的自卑已成了心結（Complex），我們的內傾也已發展為變態，和太平洋彼岸的「友邦」一對照，正是「東西相反」，居於地球的兩面。

因為自卑已成心結，所以我們早已在蘇精精神勝利的方法，以求自我陶醉。

所謂四強之一，五強之一，就都是這種阿Q精神的表現。體面必須維持，腳板底最挖不得。歡迎貴賓時，筵席要考究，牆頭要粉飾，貧民窟必須遮蓋起來。人家識相點，自然捧場喝彩，我們也就揚揚得意。不識抬舉的只有魏德邁，居然撻起爛瘡疤來，這可真令人傷心透頂。但是我們仍有辦法：一則說無則加勉（我們並無爛瘡疤），再則說錢還是不要，如果不給，那你瞧着吧，老子要投人懷抱裏去了。

又因為內傾到了變態的地步，所以在別的國家，處在我們的地位，誰也能作進取反應的時候，我們却必定退避三舍。外交，本來應該外向一點。可是我們在聯合國大會上，却表現得那麼慙慙尷尬，毫無攻擊的火力。對於荷軍撤退印尼問題，放棄投票；對於否決權問題，舉棋不定；甚至對日和約，我們應該有最大發言權的，也老表示模稜兩可。內傾者必敏感，再加上自卑的心結，就越發顯得神經衰弱，疑神疑鬼了。你小聲說句話，就以爲「處士橫議」；你豎豎手指，就以爲「犯上作亂」。真是比林妹妹還多心眼兒！至於迫人自行失足落水與用玻璃片割喉管之類，那也是神經衰弱到極度時，常有的變態的行爲。同樣焚書坑儒，比起秦始皇來，氣概却何啻天壤之別。秦始皇是個外向而又自尊的人，殘暴或不及今人，手法却是冠冕堂皇的。

作者孤陋寡聞，不知佛洛伊特尙健在否？如果此老尚活着，要對我們的國格作一精神分析，其診斷想必亦如上述。要是他已經死了，那我更敢大膽的說：「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救濟、爲僑胞力謀匯業的
通暢、爲青年解決求學的
困難等等，我們誓必竭盡
全力，認真執行，並期迅
速見諸事實」。(二)肅
政風，補政本：「厲行法
治，所以肅政風，推行自
治，所以植政本。我們誓
下最大的決心，整肅官常
，爲人民保障合法的自由
；刷新縣政，爲地方奠定
民治之基礎……嗣後無論
官吏人民，在莊嚴法紀之
下，不容有貪污遠抗的行
爲，在健全的民意之前，
不容有玩弄欺詐的伎倆」
。(三)民生建設，「尤
以對於農業增產，工業的
建設，經濟的發展和對外
貿易的加強四事爲中心，
央盡最大的努力，以求其
實現」。就職後第二個星
期，他又以三件大事要儘
速舉辦曉諭全省官民：第
一是協助軍事復員，第二
是維持交通治安，第三是
趕辦救濟撫輯。

兩年來，羅卓英並沒
有把「以最大的決心求其
實現」的工作辦得像樣，
還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
，他在「廣東省政府復員
後施政概況」一文中自我
檢討，便說：「在交通治安

方面，……土匪搗亂時有
報聞，本省還治之初，頗
感困難重重，繼經多方努
力與各方積極協助，情形
已日見進步，然與吾人之
期望相距尚遠。至若救濟
撫輯，因救濟款物深感不
足，救濟技術尤欠充份，
以至救濟事功尚未能盡量
發揮」。今年五月間，他
出席廣東省參議會第二次
大會作施政報告，檢討施
政得失時曾說：「關於治
安問題，基層組織未臻健
全，自衛力量殊嫌薄弱，
保甲清匪亦屬鬆懈，使匪
徒易於潛匿活動，而我團
警官兵又有不守紀律擾民
妄殺的情事。其次公路修
復的里數數字固屬可觀，
但省內主要幹線還未能完
全通車。其三煙賭禁政未
能雷厲風行，栽種罌粟者
敢於反抗，查割煙苗者敢
於舞弊，這是政府和人民
共有的恥辱。其四是水陸
走私，此風仍熾，明眼人
說，這是政治風氣與社會
風氣互爲因果交相敗壞的
鐵證，這話非常的正確。
」這就是他治粵失敗的自
供。

再從廣州行轅主任張
發奎、副主任鄧龍光、國
民政府副主席孫科、以及
陳濟棠等對兩年來廣東政
治的抨擊，也可以證明羅
卓英治粵，確是失敗了的
。張發奎九月底報聘港
督在香港僑胞歡迎會席上
發表的談話，與鄧龍光於
八月間在廣州對京滬記者
團發表的談話，愈認爲目
前廣東治安問題的嚴重，
造因於政治不真，「土匪
」愈剿愈多，要肅清廣東
當前的嚴重禍患，必須用
九分政治一分軍事的方法
，纔克有效。孫科九月間
南來，也在廣東各界歡迎
大會上公開指摘廣東年來
吏治腐敗，貪污低能，指
明要廣東省政府注意。

統治集團內部的「輿情」

和陳濟棠談起兩年來
的廣東政治建設諸問題，
他更是牢騷滿懷，感慨甚
多，他敘說當年創業的艱
難，現在後繼無人。他說
：「我當時修築全省一萬
六千餘公里的公路，都是
合於甲種標準工程的。每
一條橋樑，都是洋灰鋼骨
石屎的建築。我籌劃開辦
了大規模的紡織廠、繅織
廠、水泥廠、造紙廠、製
糖廠、酒精廠、飲料廠、
兩年復員，通通都完了，
全省公路已成寸寸斷，木
便橋也修不一條。各工
廠的機器所存不到三分之
一了。就連我當年發動全
省官兵捐餉三個月建築的
中山大學圖書館，屋樑牆
壁都建築好了，只差屋頂
未曾蓋好，現在竟沒人繼
續完成這一點工程。海珠
橋就快要塌了，要是塌了
，便永遠都修不回了。
」談到吏治，他說「現在
貪污是公開了的，你去問
問吧，那一個縣長、處長
、局長……不是在錢裏來
的」。

羅卓英就職之時便提出「推行自治所以植政本」的口號，又說「尊重民意，培植民主政治」。但

是兩年來的事實說明羅卓
英並不是這樣做的，他於
省參議會成立之初，便想
控制這個民意機關，曾因
派他的社會處長李東星兼
任省參議會的秘書長，被
議長林翼中拒絕了。這件
事鬧到內政部，後來內政
部電復：現任省府官吏兼
省參會秘書長是沒有法律
根據的。還芥蒂纏持了許
久才獲得解決，後來省府
還是以一個湛江市長的職
位易取省參議會的秘書長
。省參議員凌維素公開撰
文抨擊羅卓英，他說：「兩
年來，省參議會議決送請
政府辦理的提案不下五六
百件，但政府不採擇施行，
而且對參議會本身地位毫
不尊重。例如在上次大會
，利用「特務秘書」終日
穿插會場，并輪流條召各
參議員，要求簽署收回提
案或提出提案，如任意刪
改參議員發言，包辦選舉
，如控制發言，包辦選舉
，使會場陷入醜態百出等
等，都是輕視民意的表現
，氣煞專橫，使正氣消沉
」。

自誇自獎的傑作 人笑人罵的劣跡

羅卓英自認爲是兩年
來最大的政績之一的，便
是完成了惠陽馬鞍圍防禦
工程。據說這是勝利復員
以後，全國第一個規模最
大的水利工程，羅卓英在
「馬鞍圍防禦工程碑記」
上說：「計本工程土方一
百一十萬公方，水閘七座
，每日工作人數約六七千
人，全期工款二十八億三
千五百萬元，救濟總署廣
東分署援助振米一千二百
七十公噸，至三十六年五
月初旬而工竣，爲本省歷
年舉辦水利所未有之鉅大
工程也，今後親與觀成，
以慰以奮。今後圍田二十
萬市畝，畝可增產稻穀二
市擔，年可共增四十萬市
擔，堪以調劑本省民食，
斯可少紓饑渴之懷……
化洪潦爲甘澍，資水利作
長城」。因此在五月間，
省政府花了三千萬元宣傳
費，招待各界及新聞記者
到惠陽，參與馬鞍圍的落
成典禮，並大事攝影，編
成畫冊贈送。但落成未及
一個月，這偉大的防禦工
程却被一場大水沖毀得乾
乾淨淨，連紀念羅卓英的
惠成水閘，也沖得坍塌無
遺。於是羅卓英的「化洪
潦爲甘澍，資水利作長城
」的頌詞，便成了諷刺之
語了。因爲馬鞍圍的崩毀
，把附近橫沙鄉數十個村
莊幾百萬畝的農田沖割殆
盡，真是蘆舍爲圩，田園
盡成澤國，洪水捲去了五
百餘條生命。留下了成
千成萬劫後餘生的災民，
造成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

石屎的建築。我籌劃開辦
了大規模的紡織廠、繅織
廠、水泥廠、造紙廠、製
糖廠、酒精廠、飲料廠、
兩年復員，通通都完了，
全省公路已成寸寸斷，木
便橋也修不一條。各工
廠的機器所存不到三分之
一了。就連我當年發動全
省官兵捐餉三個月建築的
中山大學圖書館，屋樑牆
壁都建築好了，只差屋頂
未曾蓋好，現在竟沒人繼
續完成這一點工程。海珠
橋就快要塌了，要是塌了
，便永遠都修不回了。
」談到吏治，他說「現在
貪污是公開了的，你去問
問吧，那一個縣長、處長
、局長……不是在錢裏來
的」。

自誇自獎的傑作 人笑人罵的劣跡

浩劫。事後省政府委員丘

新民馳往橫沙辦理急振，

災民成羣結隊向丘委員下

跪泣訴說：「這都是你們

政府做的好事啊！你們少

劃我們兩塊草皮就好了！

一感動得丘委員也流同情

之淚。記者爲馬鞍圍崩毀

的事情曾與省政府某高級

工程顧問談了兩天，他透

露了標投工程時包工者與

主辦方面有了「烏龍」，他

證明馬鞍圍工程確係偷工

減料才致於崩毀的，在落

成典禮的時候，羅卓英叫

他先看看完工的情形，以

作典禮中致詞的參考，他

發覺惹感開的柱墩位置不

妥，正迎衝流頂點，工程亦

欠鞏固，洋灰混石屎的比

例不合規定標準，洋灰落

得少了，拉力不夠，其他

新圍基的厚度不合標準，

填土時又不加樁實，於是

他皆訴羅卓英說：「這工

程恐怕靠不住，主席致詞

的時候不要太過誇耀，並

要強調當地民衆今後時常

注意護圍」。馬鞍圍到底

是被一場大水沖毀了，這

給與羅卓英很大的煩惱。

有位省參議員說：「由此

可見廣東兩年來的建設，

完全建築於空中樓閣之上

，於人民毫無實益」。

依情據理，勝利復員

兩年來，由於廣東第一沒

像華北東北那樣的烽火連

天的內戰，應該可以和平

建設的；第二日本人留在

廣東省境內的物資尙足以

支持其作戰三年之用的；

僅交通工具即有輪船二百

六十餘艘，大小汽車萬餘

輛，工廠設備亦應有盡有，

廣州一地便有大小工廠一

百五十餘單位，汕頭、湛

江、海口、榆林、江門等

地尙有數百單位，若能好

好的恢復、保護、運用，

決不會出現今日之慘象；

第三，僑匯隨勝利到來

而激增，三十五年一年之

內，廣東一省的僑匯總值

佔全國的僑匯的百分之八

十以上，達五六百億元之

多，當時確是發展廣東實

業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但結果弄得敵僑留下的堆

積如山可供作戰三年之用

的物資，散的散，失的失

，偷的偷，賣的賣，蕩然

無存，即使剩有多少，也

是一堆廢料，不能使用了

的，談起來殊令人痛心。

羅卓英認爲是政績傑

作之一的省營實業公司，

恢復了徒有虛名的水泥廠

、飲料廠、紡織廠、造紙

廠等，但宋子文上任不到

一星期便拆穿了實業公司

的西洋鏡，宋氏在省參會

駐委會指指說：「他們簡

直不是在辦實業，如紡織

廠只有一天的原料，我已

切實加以整理了，我担保

三個月可以整理好，六個

月內見成績。」在實業方

面可說羅卓英有成績的，

倒要算他私有資本經營的

華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了

，這個公司羅卓英佔有三

分之二的股本，其餘便都

是大埔同鄉投集的資本，

因爲靠了政治的權勢，他

們從敵僑產業處理局，「

投標」買得了原是僑產的

鹽步紙廠，雷水布廠，和

重先電池廠。當時以數百

萬元代價「標買」得來的

，經兩年的經營擴充，現

在已經規模具備，價值連

城了。鹽步紙廠現在每天

可以出產白報紙五噸，其

他道林紙、火柴紙、鴉皮

紙等數量亦不少，據說僅

這個廠每天可以賺六千元

美金，雷水布廠可以織造

細綉、帆布、斜紋布，以

及厚薄絨料等。在廣東公

私營工商業呈凋敝狀態

，面臨崩潰危機的今天，

華先企業公司及其各廠却

獲得畸形的繁榮和發展，

但羅卓英是怕談及這些的

，所以他不曾列入其政績

之中。

羅卓英在「廣東省一

年來復員工作報告」中，

大言不慚的說：「廣東復

員第一年的施政，已從傷

殘中邁進了小康。」真

的邁進了小康嗎？用羅卓

英自己在九月廿九日「留

別新聞界同人」的書面談

話來答復，他說：「回思

過去兩年，無日不在苦難

之中，念地方父老奔走協

助，民衆疾苦尙未解除，

斯令人感念無既。」「民

衆疾苦」既「尙未解除」

，又怎能說得上「已從傷

殘中邁進了小康」呢？還

是省參議員凌維素在十月

廿二日廣州前鋒日報發表

「寄生於貪污政治下的廣

東經濟」文中說得中肯「

兩年來，由於廣東社會經

濟結構的腐爛所引起工廠

倒閉、商業不景、農村破

產、社會貧困、金融動盪

、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其程度遠甚於敵僑時代，

已不待指說，同時由於政

治腐敗，至千百萬人民被

壓迫、榨取、掠奪、剝削

，并在飢饉、流淚、寒凍、

貧窮的威脅下，迫得挺而

走險，使全省盜匪如毛，

國民經濟因此益呈枯竭，

更爲有目共見的事實。」

魏德邁特使剛到廣州

調查的時候，他的政治顧

問斯普魯斯邁見記者，問

及「廣東復員兩年來有什

麼建設呢？人民的生活比

戰時改善了多少沒有？」

我指着他身邊堆得厚厚的

省政府送給他的報告回答

他說：「我想你已經從這

些報告中獲得解答了。」他

很幽默的笑着：「就僅僅

是這些滿紙計劃和圖表嗎

？呵呵！」傳說羅卓英這

次下台的原因之一，便是

他被列入魏德邁的「貪污

、低能者」的黑名單之中

。這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一枝鎗桿

造成羅卓英從政失敗

，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於羅

的硬性軍人脾氣太大。他

經歷了二十年的戎馬生涯

，從排長升至總司令，平

生不知失敗爲何物，勝利

使他「自恃過高」，真正有

才能有魄力有遠見的專家

幹員，是不願也不可能和

他合作得長久的；願意追

隨他的便祇剩下那班看他

臉色，迎合其喜愛的人。

現在我們來看看他的幹部

吧。構成他督軍團的是丘

馨，李東星，黃文山，羅

香林，以及章鎮福，蔡勤

軍兩位勇士。

丘馨總算還有一些風

度，和氣寬容，處理事務

尙有些計劃和遠見，在公

文政治的圈子裏，他作爲

一個批閱公文的神書長還

算是稱職的。但魄力不足

，官場習氣太深，善於「

知難而退」，「最怕自己

吃虧」。今年六月間，當李

東星惡惡羅卓英大事捕敵

授，封報館，拘記者，捉學

生的時候，丘原是不同意

這樣胡搞的，他明知這樣

做會冤枉別人多面樹敵，

但他却默不作聲，事後他

又以「紅臉」的角色出現

，去慰問被捕而又獲釋的

敵授和記者，他道歉說：

「對不起，我事前一點都

不知道。委屈你了！」但

丘先生還是羅卓英的八拜

之交哩。

李東星追隨了羅卓英

十五年，苦幹出身，可稱

得是羅卓英的心腹，他是

羅任內的省社會處長，有

人批評他八個字：「聰明有餘，學問不足」，他和人家談話的時候，總是用「斜視」的目光看人的，他的度量與性格和羅卓英是半斤八兩。他幹「民衆運動」頗有經驗。在羅任內，他對於「健全」民衆團體的組織和「加強」民衆團體幹部的訓練，很博得羅卓英的稱賞，羅在

本年五月間省參第二次大會上報告時有云：「回顧本府過去的政治措施，檢討得失，認爲應行鼓勵的有：人民團體組織比較健全，活動力量頗強」，因此六月間全國學潮洶湧聲中，廣州中山大學的學生遊行的時候，便發生與「工人」衝突毆打的情事。以後大捕教授，記者，學生，封報館，搞得平靜的廣州掀起熾然大波，風聲鶴唳，人人自危，連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也如墮五里霧中，莫明其妙。這捕中山大學名教授梅贻彬的時候，疾聲厲色，要加梅教授以五花大綱，激起了中大數千師生的憤怒和平不平，連訓導長、教務長等都以爲「這樣對待教授

，將使斯文掃地」了，大的要不得。據行轅的一位高級人員說，這次捕人完全是由羅卓英授權給李東星、章鎮福主辦的，他們還封鎖了行轅的消息，張主任曾打電話或寫信給他們，叫把遞捕人犯名單、經過以及如何處置等情形具報，但始終置之不理。當彼等抄封每日論壇報時，指稱該報爲「奸匪」的暴動總機關，又說從該報社搜出大批軍火、炸藥、電台文件等，並將該報全體員工（甚至連到該報去訪友的來賓）數十人，不問青紅皂白的一起抓去了。不久之後，連張發奎介紹的粵北第二區行政專員沈秉強也成了「思想犯」，被扣留撤職了。某軍方要員很憤慨的說：「如果我不是還有三顆金星（上將）作護符，我看他連我也抓去了的！真是無法無天了！」事後不久，有人提醒羅卓英說：「東星這種變幹作風，長此下去是不成的，危險得很哩！」

後來中央也屢次致電羅卓英，指示對於遞捕人犯時務求證據確實，手續完備，千萬不可冤枉別人，招致反感。於是即使像每日論壇報那樣被加上了嚴重的「罪證」，終於也將其中人員陸續地開釋了。這次圍捕的措施，惹起許多人的反感，可謂失盡了人心，官吏都替羅卓英惋惜說：「東星爲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次又替憲公幫倒忙了。」

說到黃文山和羅香林，原是兩位「學而優則仕」的「學者」。黃曾任廣東文理學院的院長，是羅任內「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有關省府的計劃、工作報告等，都是出諸黃氏的手筆。羅香林曾在中山大學教書，現在是省府委員兼負責廣東建設研究會的業務；省建廳派去接收揭陽糖廠產業，舞弊貪污，被法院通緝歸案的主任秘書朱祖英，便是他的妻舅。黃文山和羅香林可以說得是羅卓英的大腦，思想的源泉，但是，這個源泉是很枯竭的。

至於章鎮福，是北伐時代的第四軍老幹部，和蔡勁軍是同一類型的硬性人物。他兩人指揮下的廣東省保安隊，軍風紀欠佳，已成爲各地民衆及省參議員們所厭惡指摘有據的了。很多人都說，羅卓英治粵兩年尚能獲得相對的安定，靠的是一枝槍桿，而促使他施政失敗的，也是這道一槍桿。章蔡二人就是替羅卓英扛槍桿的勇士。

還有一點也是促成羅卓英官運乖逆的，就是在廣東朝野政要名流發動「廣州市改特運動」的時候，大家千方百計派代表入京請願，在報刊撰文鼓吹，開大會，發通電，辛辛苦苦熱熱烈烈，但羅卓英却以「政費不敷極限削減」致電蔣主席，反對廣州改特，甚至到了中央已經通過此案之後，羅卓英還要「懇請暫緩實行」，使全體廣東政要都把羅卓英恨透了，甚至有人提議要「開除他的廣東籍」。好些在朝政要，本來一向對「倒羅」運動保守中立的，但爲了這件事，中立的政要名流都一致加入羅卓英的反對派方面去了。據說孫科就是最後參加「反對派」的一個。至於各地地理屋同鄉「倒蔡」（勳軍）運動，羅卓英却始終予以漠視，他說：「蔡勁軍在公事上沒有錯誤，祇是他個人修養欠佳，我还需要他在瓊崖負責。」於是他甯願留一個蔡勁軍而開罪全體瓊崖的政要同鄉，如省黨部的書記長曾三省，和陳策，韓漢藩等要人。

鎗桿換算盤，算盤又如何？

當全體廣東政要名流和大多數民衆，都成了羅卓英的反對派的時候，他那一樣槍也打不響了，怎會不失敗呢？

羅卓英把異己者都劃入「李（任潮）蔡（廷鍇）份子」或「奸匪」的賬內，也是愚笨的，他先說沈秉強是「李蔡」份子，有勾結奸匪的嫌疑，把沈冠而後，也是由於李被戴「和李濟深有關係」的帽子。魏德邁到廣州調查時，特別注意於「李蔡」的活動力量，外國通訊社於宋子文主粵消息發表後，揣測「宋南來可以阻止華南的分裂運動」，便是指此而言的。羅卓英排斥「白話佬」，專用客家人和羅姓的姻親，使「白話佬」和「客家人」成了對立的派別，也是促使其失敗的原因。

宋子文是由羅卓英的反對派擁回來的，也是奉命來收拾羅卓英的敗局並底定西南支撐長期內戰的。宋子文能否完成他這個任務呢？宋子文本身確實具備許多比羅卓英優越的條件：第一，他到底一向是搞慣了政治的人。第二，宋的聲望較高，人緣較好，從國府的命令發表以後，在廣東的政要紳耆一致歡迎。第三，是他對於錢很有辦法。聽說中央授權與他就地指揮廣州的四行分行，宋氏就職之後，時常下條子給四行分行的經理，叫他們貸款五十億元給紡織廠買棉花，馬上就是五十億元，好像四行經理就是宋公館的管家一般

；叫四行派人查實營業公司的賬，查賬的人便應聲而到，可謂指揮自如了。○從前羅卓英召開什麼金融會議，四行經理總是請都請不到的。十月上旬，廣州市金融物價激漲，是使宋子文感到頭痛的事，他一個電報給上海，叫四行暫時停止撥兌滬穗間的匯款，阻止游資南流，結果也收到抑制一時的效。據說他就職後第二天召見警保處陳沛查詢有關粵省治安問題，陳沛訴苦似的說：「保警隊兵力單薄，此剿彼竄，難於肅清。」宋問他「爲什麼不增加實力？」陳說「礙於法令和錢糧，裝備，不能擴充。」宋很慷慨的告訴陳沛，叫他馬上負責去找人，錢和裝備他負責解決。第四是他和美國人的關係好，他就任粵主席之職以前，先就邀請紐約太晤士報的記者安特生來粵航空攝取有關廣東水災的照片，最近又電邀美大使館參贊基普拔來粵會商水災善後問題。近又傳出宋主席可以通過基氏的幫忙獲得聯邦剩餘的價值三千萬美元的救濟物資的消息，中央社甚至發表了美領館某上校參贊將應邀來粵協助宋氏「剿匪」的消息，煤油大王的孫兒也來看過他，並傳說年內將有一批美國實業家來粵投資，建廠或開礦。關於建設和開發問題，他表示如需要請教於外國的或國內的專家，他一封電報便可以把這些專家邀來的。第六，宋本身就是華僑，廣東在外的僑領對他尚有好感，於是他便可以運用僑資於廣東今後的建設了。

但是今日的廣東，已遠非昔比了，確是農村凋殘，工商崩潰，百孔千瘡，人民窮困到了極點，地方也糜爛到了極點了。於是復興傷殘的廣東，其關鍵不僅僅是人事上的調整，而正確政策的配合和客觀環境的改善是最重要。例如宋子文回來，首先揭示渠此次回粵第一個任務是解決水災善後的各項問題，換句話說要救濟災民，要興辦水利，這是政府拿錢出來辦的，但是另一方面，宋子文要擴編相等於兩個旅的地方武裝，即是說廣東人民除了現在已經養了十個保安總隊之外還要養兩個旅，僅就兵源糧餉之出自農村一點而言，這已經是增加人民的負擔和促進生產的萎縮了。這無異是左手「拖捨」右手「奪取」，基本上是互相矛盾的。其次如廣東地接香港澳門，省港澳間的大規模走私與廣東政治貪污結了不解之緣，港澳環境特殊，貪污者不旋踵便逃到了港澳享其清福去了。這問題，宋先生也是沒辦法解決的。廣東的土地集中，佃農地主間的紛爭最多，對立最尖銳，宋先生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又是什麼呢？有人把廣東比喻爲一個着畢挺的西裝，留八字鬍子而滿口「子曰」的入股先生，生活的享受全部洋化，但思想和行爲却還停留在封建的世紀。宗族與宗族，區域和區域之間的衝突，大規模械鬥，每

因爲一個女人，爭風吃醋而致於打成了十世冤仇的，這些直接間接影響到治安，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將如何去解開呢？還有安定金融，穩定物價，也不是宋先生一個人的力量所能解決得了的。這個基本問題不解決，影響於吏治貪污、治安不靖、民生凋敝，是不可數計的。今天廣東的政治，想避開國內擾攘不安的大環境，躲開金融物價的浪潮襲擊

，而企圖「自行建設爲安樂土」，更以爲宋子文來了會有奇蹟出現，那是最愚昧的人也不會有此念頭的。有人說，過去羅卓英治粵辦的是一枝槍桿，搞得不好，宋子文雖是搞慣了政治的文人，但他今後治粵仍離不了這桿槍，不過他比羅卓英多了一隻算盤吧了。他的算盤打得通嗎？他做過行政院院長的，心裏自然懂得如何答復這個問題。

北平的浪潮

凌華

開始罷課

浙大自治會主席于子三在獄中慘死的消息是十一月一日傳到北平的，那天正值星期六，清華有一個紀念聯大校慶的晚會，到了二千多人。會場得到消息之後，就非常激動，第二天清華就有七百多人簽名要求開代表會，十一月三日清華學生自治會

代表會開會的結果，決定在四日、五日、六日罷課三天；同時到各校進行宣傳工作，爲死者募捐。

北大方面，反應比較遲緩，因爲一方面工學院、醫學院、「四院」(文法兩院大一同學的場所)都遠在西城，農學院更遠在郊外了，一方面沙灘區也

分爲西齋、灰樓、紅樓、三院幾處居住，同學接觸

起來不像清華近便；直到星期一(三日)，才有許多壁報呼籲罷課，星期二(四日)更有幾個社團主張遊行，其中一個社團說：「是學生們的行爲算陰謀，還是出賣國家者的行爲是陰謀？這個社團列舉了五月以來半年間的例子，有的失蹤了，有的用麻袋裝起來丟到海中去，「我們何辜！一個同伴死了，無數同胞踪跡不明，多少中華青年呻吟獄中，每一個正直的有血性的人，

污結了不解之緣，港澳環境特殊，貪污者不旋踵便逃到了港澳享其清福去了。這問題，宋先生也是沒辦法解決的。廣東的土地集中，佃農地主間的紛爭最多，對立最尖銳，宋先生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又是什麼呢？有人把廣東比喻爲一個着畢挺的西裝，留八字鬍子而滿口「子曰」的入股先生，生活的享受全部洋化，但思想和行爲却還停留在封建的世紀。宗族與宗族，區域和區域之間的衝突，大規模械鬥，每因爲一個女人，爭風吃醋而致於打成了十世冤仇的，這些直接間接影響到治安，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將如何去解開呢？還有安定金融，穩定物價，也不是宋先生一個人的力量所能解決得了的。這個基本問題不解決，影響於吏治貪污、治安不靖、民生凋敝，是不可數計的。今天廣東的政治，想避開國內擾攘不安的大環境，躲開金融物價的浪潮襲擊

，而企圖「自行建設爲安樂土」，更以爲宋子文來了會有奇蹟出現，那是最愚昧的人也不會有此念頭的。有人說，過去羅卓英治粵辦的是一枝槍桿，搞得不好，宋子文雖是搞慣了政治的文人，但他今後治粵仍離不了這桿槍，不過他比羅卓英多了一隻算盤吧了。他的算盤打得通嗎？他做過行政院院長的，心裏自然懂得如何答復這個問題。

無不在恐怖或災難之中，我們何辜！中國青年起來！中華民族的正氣回來！

下午二時在民主廣場舉行的，清華到了六七百人，燕京到了三百多人，北大到了二千餘人，中法、朝陽、輔仁也有人來參加，貝滿女中到了數百人。其他的師大和幾個中學，都受種種人物阻撓，沒有能來。曉聯和獻詞近百種。會場由燕大佈置，掛了于三同學的遺像。

節目：報告于同學生平之後，就是魏歌，以後是教授演講。周炳琳先生是第一個，他說：自己是中年人，不是青年人，今天來參加，看見在「政治鬥爭高潮中」又犧牲了一個有為青年，只覺到可悲，並不想「示威」。他又說：目前中國已到大革命前夕，「雖然到底是哪一種革命我還看不出來」；但是同學應當鎮靜，守住學校。在半年之前，周先生還說政府「有小進步」，今天周先生的看法也變了，但他仍止於悲哀。悲痛的心情固然人皆有之，可是如果大家都止於一把

悲淚一把鼻涕的悲哀，我們不是太可憐，中國不是也太絕望了嗎？

許德珩先生因病未來，他送來了一張講稿，由同學宣讀。他說：希望同學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留作來日更大更有用的使

用。

接着樊弘先生演講，他不認為年齡會造成很大的分別，但也希望青年慎重，珍惜自己。（樊先生的講詞，由他自己託下，亦登本期。——編者）他站在教育者的立場向政府抗議，抗議政府迫害學生；也站在正義的立場抗議政府自己制法，官吏自己違法，「如果把這些官吏送到他們自己政府的法庭上去，大部份就是犯罪的！」（大鼓掌）

會議進行時，有主張馬上結束，集體探監的，當時沒有實行；閉會之後，因為清華有人被捕（五個學生因赴北方中學宣傳而被捕），有主張留在城中不去，堅持罷課，明天遊行的，頓時一呼百應

，事情沸騰。燕大、北大，都表示清華同學之被捕，就等於自己的同學被捕，廣場上聚議紛紛，終於由華北學聯主席團宣佈：一、延長罷課，二、如可能就於次日舉行示威遊行。於是會議才告結束。

中法同學首先整隊回校，不料甫出北大東門，就遭到便衣人物和警察的攔阻，紛紛投擲石頭磚塊，中法的同學紛紛奔逃回來，便衣和警察直進到門口，向門內擲入不少磚頭。同學們緊閉校門，廣場上馬上又激奮起來。一個同學預備爬到牆外去，「和他們拚了」。他已經爬上牆頭，又被別的同學拉下來。

於是方面由主席團請胡校長向地方當局接洽，一方面同學們就在廣場上四個人一排，繞廣場而行，北大的同學愈來愈多，這五千人的隊伍就在廣大的民主廣場上激昂地走着，喊着口號。黃昏中，他們唱着「團結就是力量」，唱着一獨裁××，要

會第三號快報，將供狀抄錄在下面：

（一）（你姓什麼？）姓元名偉，河北靜海人，中國大學法三學生。（二）（你來幹什麼？）爲了這次罷課，政府認爲共黨挑撥，本人身爲廿四區黨部執行委員，市黨部指定來制止學潮之蔓延，不幸發生衝突。（三）（爲何到自治會來？）我跟着國民黨員來制止學潮的。（四）（那位領你來的？）今天我到行轅爲私立院校聯合會交涉貸款五十萬之事，有同志邀我前來。（五）（爲何帶利刀來？）因了自衛，我們帶的有手槍、刀子、鐵尺，不但到師大如此，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帶着刀子的。（六）（你的刀子帶來有什麼作用麼？）沒有作用。（七）（爲何把簽名單帶走？）名單我不知道。（八）（爲何撕佈告？）不知道。（九）（爲何無理罵人打人？）我元偉沒有動手打人。（十）（怎樣來

子三追悼示威大會是六日

子三追悼示威大會是六日

下午二時在民主廣場舉行

下午二時在民主廣場舉行

的，清華到了六七百人，

的，清華到了六七百人，

燕京到了三百多人，北大

燕京到了三百多人，北大

到了二千餘人，中法、朝

到了二千餘人，中法、朝

陽、輔仁也有人來參加，

陽、輔仁也有人來參加，

貝滿女中到了數百人。其

貝滿女中到了數百人。其

他的師大和幾個中學，都

他的師大和幾個中學，都

受種種人物阻撓，沒有能

受種種人物阻撓，沒有能

來。曉聯和獻詞近百種。

來。曉聯和獻詞近百種。

會場由燕大佈置，掛了于

會場由燕大佈置，掛了于

三同學的遺像。

三同學的遺像。

節目：報告于同學生平

節目：報告于同學生平

之後，就是魏歌，以後

之後，就是魏歌，以後

是教授演講。周炳琳先生

是教授演講。周炳琳先生

是第一個，他說：自己是

是第一個，他說：自己是

中年人，不是青年人，今

中年人，不是青年人，今

天來參加，看見在「政治

天來參加，看見在「政治

鬥爭高潮中」又犧牲了一

鬥爭高潮中」又犧牲了一

個有為青年，只覺到可悲

個有為青年，只覺到可悲

追悼大會

華北學聯所主持的于

的？(坐卡車來的。(十) 一) (誰叫你們來的？) 市黨部的命令。(十二) (同來的有誰？) 有周家珍等廿餘人。(十三) (把你來的情形說一下。)(十四) 天從中大出發以後，和他同志到和平門下車，到師院與貴校穿運動衣的同學到自治會去的。(十四) (你來除了干涉罷課之外還有什麼任務？) 沒有其他任務，至於逮捕人當然有逮捕的機關。(十五) (你的手槍呢？) 有手槍就不帶手槍了。(十六) (來到這裏追究罷課的原意何在？) 現在憲政未行以前，黨權高於一切，本人身為中國國民黨員，為服從上級命令，來貴校調查並加以制止，事為必然。(十七) (刀子時常帶着嗎？你怎麼來的呢？) 刀子是天天帶的，來時就拍發生衝突。卡車是從中大開出，我回到學校時遇到，即上車了。(十八) (一百萬元的收據是作什麼的？) 一百萬元收據為私立院校聯合會之用款，是中分會由總會支到的。(十九) (一百五十名名單那裏來的？) 為難區

同學會之名單。(廿) (對此項狂舉暴動作何感想？) 站在同學立場，我認爲此次舉動爲不對，但在黨的立場無話可說；而對架走同學之事，站在同學立場，我也認爲不對。(廿一) (對於于子三慘死事你有什么看法？) 對於于子三同學被殺死事，我根本不明白。

元偉(自簽)(手印) 問：臉上的傷是從何處來？答：自己跌的。(此處按有手印)

此外，另有從元偉身上搜出的東西，經師大人權保障會四號快報詳載，現在把這些物件擇要抄錄如下(號碼都依原報)：

- 一、凶刺刀一柄(帶鞘)
- 二、市黨部證書一枚(卅六年度，527號)
- 三、行政院機密公文一件
- 四、北平市黨部命令其加強工作訓令一件
- 五、二五〇名名單一紙
- 六、中大復校文件一紙
- 七、檢討工作文件一紙
- 八、黨證一件(一七六二三號)
- 九、法幣一千四百元名片十張

廿八、工作計劃紙條
四三、調查政三五學生紙條一張

(王意正、沈國松、沈俊學、郭桂秋、曹柏陶) 四六、五八、學生三人調查表(周志傑、高芬、白淑玉)

五四、中正手令一
五六、下級黨團統一辦法草案一紙

五九、蔡大志志願入社登記表一紙
六一、收條一紙(總會支給一百萬元)

二時出發。
這時在清華燕京連城必經的公路上的西直門外萬牲園附近，已經有一卡車武裝人物在等候；城內北池子和西安門大街，一路都有武裝警察，據說西單一帶也是打手遍佈；至於北大附近也有二百以上的警察和打手在巡邏。北大學生自治團再三考慮後，決定不單獨出外遊行，但服從華北學聯決議，並勸阻清華，但同學的一般意見都認爲如果清華出外而北大不去，在道義上說不過去，所以如勸阻不成，也還是要去的。

在爭持、勸告、討論得最緊張時，忽然聽說清華被捕同學已送到法院，而且法院也答應學校去函保釋，所以清華留校同學也討論到暫緩遊行的問題

下午三時，清華被捕同學釋放回來，大家便在原則上同意下午不遊行了。

這時清華燕京大隊已經出發，離開公路，改沿鐵道進城，到下午五時許，才由後門繞到北大，北大學生預備列隊歡迎，出西門時受到四個警察阻攔，學生大叫「警察學生是一家」，警察軟化了。經前面的校門到東門，又遇到幾十名徒手警察和一隊持槍警察，學生們再叫「警察學生是一家」和「警察好」，警察不打學生，警察的口說，才得通過。從城外來的隊伍，燕京打頭，旗上大書「燕京大學反迫害大示威」，後面是紅字的旗「踏着血跡前進」，以及多幅漫畫和「請政府守法」等旗幟。歡迎的同學學聲雷動。

歡迎會畢，清華燕京同學分乘十九輛卡車返校，北大同學送中法同去之後，自己又舉行了一個小規模的營火會。(十一月八日寄自北平。)

浙大被捕同學慘死案續誌

遊行的決議和打銷

七日早晨，清華留在城內的學生在北大北樓前開會，決議在任何情形之下，當天下午總要示威遊行。同時城外清華留校學生一部份和燕大的同學，也決定進城，他們定在十

自殺乎？

在十月二十九日深夜，真，正當浙大全校同學已多數簽名通過自三十日起罷課三天，抗議浙江省府

當局非法逮捕于三等四同學，並離經一再提出申請仍延時不移送法院之際，校方突接省方電告，謂其中于子三同學已於當晚六時二十分慘死保安司令部獄中。浙大校長、願

訓導長、校醫及學生代表，當即趕往，見于君倒臥床上，咽喉有創口，早已氣絕。當時保安司令部負責人出示染有血跡之玻璃片，據稱此片即係用以「自殺」者，並已由法院初

步檢驗係「自殺」身死云云。校長因那幾天正在病中，當時目睹這種慘狀，當即暈去。經校醫注射強心針後，方才醒來。但司令部方面已預爲寫好證明書一紙，要校長在上

面蓋章，證明于君確係自
殺。曾校長答稱：「我祇
能證明他已死，但不能證
明他是自殺致死。」並對
玻璃片來源請問再三，
據答乃在獄中于君所臥之
床上下拾得，或謂即係房
內窗玻璃，但又不答不知。
於是曾校長憤憤地說：「
你們做事也太疏忽了。」
至於其他三同學，則已於
當晚移送杭州高等法院去
了。

「冤沈何處？」

噩耗傳到校長，警救
委員會滿夜出版號外，天
剛放亮，哀鐘哀鳴，全校
悲憤慟泣。三十日上午九
時，在文理學院綠色洋房
前曠地召開緊急全體大會
，由顧訓導長及學生代表
報告于君慘死經過，全場
失聲痛哭。嗣經討論抗議
及警救緊急對付方針，羣
情激憤，一致誓為死者雪
冤，為生者爭取人權保障
，尤對當天本市東南日報
標題「于君一畏罪自刺
殞命」，提出嚴重抗議。下
午三時，同學千五百餘人
，整隊出發赴地方法院慰
問被押三同學，又赴保安
司令部探視于君屍體。各
人身佩白紙條，隊伍以于
君遺像及「冤沈何處」四
字橫幅為前導，沿慶春街

向法院路行進，沿途張貼
標語：「反對政府非法逮
捕」、「抗議于三同學
無辜慘死獄中」、「澈查
慘案真相」、「並發傳單
。及抵法院門前，便派代
表數人隨顧訓導長向院方
交涉，當由高檢處首席王
秉彝接見，准派代表十人
進見在押三位同學。但各
同學要求全體與見，僵持
逾十分鐘，繼雙方再三
磋商，最後決定加派代表
十人分四組進內分別慰問
。隊伍則繼續由延齡路經
中正街、三元坊、保佑坊
行進。至鼓樓前，即見保
安隊士兵數排，全副武裝，
掛彈筒，手榴彈，隨時
戒嚴。行人車輛不准通
行，惟浙大隊伍不准通過
。一時情勢甚形緊張，最
後終以同學避免再度發生
血案，答應分組通過鼓樓
，至上倉橋保安司令部瞻
視于君屍體。一路上皆崗
位密佈，戒備森嚴。屍體
已由該部移至草鞋嶺空地
上，同學獻奉花圈，並一
一行禮畢，至晚八時，方
整隊返校，沿途唱「團
結就是力量」，歌聲悲痛
激憤，街側觀衆如堵，皆
為感動嘆息！

師生共憤

首先響應的，是浙大

教授會。下面一段是從他
們所發布的宣言中節錄的
，我們借此就可見此次
慘案的實情了：「同人等
對於監守情形及如何在監
守之下致令慘死，多所不
解，特於卅一日召集全體
教授大會，請曾校長顧訓
導長校醫就經過事實向大
會報告；根據法醫檢定書
及已知材料，同人等認為
有可異者數點：(一)顧訓
導長前往探視該生時，見
其常帶之眼鏡已卸除。送
去紙烟一包，據看守人員
云：眼鏡是玻璃，吸烟用
火柴，皆所不許，則是防
其自殺，頗為周密，何以
反致容其用長達五六寸之
玻璃片自殺？(二)曾校
長於二十九日晚到保安司
令部，其負責人出示玻璃
片，曾校長詢問此玻璃
片從何而來，則或答不知
，或云是房內窗玻璃，而
室內一窗殘餘之破玻璃，
又與此染有血跡之玻璃不
能併合。詳閱法醫檢定書
，其中所刊事實，對於該
生自殺之推測，亦不能自
圓其說。同人等以絕對超
然之立場，為維護憲法保
障人權有不能已於言者，
當以剝離勘亂時期，在實
實治安機關，逮捕嫌疑犯
，固屬職所應為，惟既為
治安機關，則尤應嚴守法
律，尊重人權，方足以安

定地方，而乃違反法律，
遲延時日，不送法院，此
應任其咎者一。既不能迅
速辦理移送法院，而又監
守不謹，致令慘死，此亦
所，此應任其咎者二。况
綜合事實，是否出於自殺，
頗多疑竇，如非自殺，則
治安機關有草菅人命之嫌
，此應任其咎者三。」大
會並決議於十一月三日罷
教一天，以示抗議。
一日下午，講師助教
會亦召開緊急大會，通過
：(一)為一〇·二九
「慘案提出抗議書；(二)
慰問移送法院同學；(三)
捐款一千元充作營救
會基金；(四)十一月三日
罷教一天；(五)參加籌組
人權保障委員會。於是在
全校師生團結一致下，抗
暴的力量就更形堅強了。

用「普選」哀悼于故主席

學生自治會的「普選」
，在十一月二日那天內光
榮完成。先於十月卅一日
下午起，由普選委員會在
文理學院及農學院兩處分
別公佈候選人名單，除一
年級新生外，共有候選人
九十二人。自十一月二日
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六時止
，全校分設四處領票，規
定手續為：(一)同學必
需親自持註冊證向領票處
領取選票，(二)同學可
自擇一處領取選票。填票
採取記名式，在候選人中
選擇二十三人。選舉人必
須自填學號，姓名，系級
，缺一作廢。投票的時間
與地點與領票同。規定開
票後得票最多的二十三人
當選本屆理事。其餘候選
人即為代表會之代表。二
日晚上漏夜開票，當普選
委員會用麥克風報告開票
結果時，一部份同學皆已
從夢中驚醒。於是此一民
主之第一課，乃以極迅速
與順利之過程光榮完成，
正如在標語上所云：「我
們要用普選來哀悼于故主
席」，「紀念于故主席，
我們更應認真普選！」
十一月三日，全體教
師罷教，同學也繼續罷課
一天。晚上，新代表會召
開第一次大會，首由校長
及訓導長說明校方對「于
案」所採取的行動，繼即
討論新方針，經熱烈辯論
二小時，最後決定向校方
建議三點：(一)趕速成
立包括校方及同學之控訴
委員會，(二)保釋被捕
三同學並定期審判，(三)
請教授會央請校長趕赴
南京向有關各方申訴。又
為積極支持校方行動起見
，並決議：(一)四月再
繼續罷課一天；(二)如

繼續罷課

上列(二)(三)兩項建
議於四日內均未實現，則
繼續罷課，如有一項實現
，則自五日起停止罷課五
天，再決定新行動。後因
校長已於四日晉京，向朱
部長報告慘案經過，並報
待新聞記者對「自殺」表
示懷疑，對治安當局未通
知校方擅即進行驗屍深表
不滿，因此校內就自五日
起停止罷課。在休止罷課
期間，紛紛接到武大、燕
大、北大、中大、重慶浙
大校友會、南開大學、及
津北學聯來電，一致表示
慰問與聲援，同時各地响
應罷課消息又不斷傳來，
全校空氣緊張，並加緊準
備！

校長從南京回來了，
當即召集全體學生自治會
理事談話，他報告已經見
過教育部長、青年部長、
司法行政部長，但是所得
答覆都是：「表示遺憾」
，「過時移送法院，於法
不合，然而在亂亂期間

記昆明助學運動

顧同

「用自己的力量解決自己的問題！」

，另當別論！」關於拘留在法院內其他三位同學，據顧訓導長報告：「可能在十一月十二日公審」。對於教授會所提出的三點主張：「澈查真相，追究責任，及保障人權」，以及全體同學向校方提出並堅決與校方協力爭取的：「（一）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捕同學及校友；（二）對於三三同學慘死獄中須由保安司令部表明責任；（三）賠償死者家屬損失；（四）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皆沒有達到目的。於是從十一月八日晚六時起，再度在禮堂召開全體代表大會，一時情勢又趨緊張，自動旁聽的同學很多。經激烈辯論數小時後，一致通過在上列要求未能在最低限度內達到以前，繼續罷課一星期（自十一月十日至十六日）；在繼續罷課期間，對於營救、申訴、聯絡、以及治喪等部門工作，決定分頭加緊進行。（十一月九日寄自杭州。）

窮苦的先，站在大家面前，將自己唯一的一件穿在身上的棉大衣脫了下來義賣。同學們都流着感動的淚珠。他們用錢買回來送給這位先生，然而這位先生又捐了出去。同情，到處都洋溢了一片偉大的同情。這一個晚會一直舉行到深夜兩點鐘，露水已淋濕了每一個孩子的頭髮，然而他們的心仍舊是那裏興奮而激動。就在這一個晚上，光憑了五百個孩子的力量，他們就得到了將近一萬萬元的捐款。

助一些失學的朋友。另一種力量的阻礙

一句老話：自己的力量

團結就是力量！

自從十月廿七日起，昆明學聯發動了全市的學生，展開了熱烈的助學運動。大多數的學校都臨時停課了，多少個學生爲了這一個運動而廢寢忘食，從天亮起工作到深夜三四點鐘，沒有一句怨言，大家都搶着工作，是那裏興奮而且熱烈。在這一運動中，我們看見同情、互助、團結到每一個人的心坎裏了。大家都嚷着：「用自己的力量，解決自己的問題！」

爲了瞭解助學運動工作的情形，我參加了一所中學所辦的晚會。那些熱烈而動人的場面，我將永生不能忘記。有一位同學講着，他因爲繳不起膳費，每天不得不餓着肚子吃兩個燒餅過日子。當時，在場的五百位同學，都哭了，有的甚至於抱頭大哭。大家立刻掏出錢來，立刻將自己所心愛的一切東西——自來水筆、口琴、皮箱、手錶、金戒指，都捐了出來，有的甚至把鋪蓋也捐了出來。有一位

正當着助學運動開始展開的時候，官方却來阻礙這一個運動的進行。他們拘捕了鹽務管理局職員李仁壽夫婦及新民書店經理王平。他們封閉了華僑書店、金馬書店、新民書店，而且正式具文給雲南大學，凡是在學聯及雲南學生自治會工作的馬蘭等三十一名全都列上了黑名單，限他們在三十一日以前去警備部報到自首。盧主席發表了談話，勸同學們重氣節，說：「見人就伸手要錢，並不是好事。在民意日報（省黨部主辦）上，又出現了「雲南大學生自治會」的「告各界書」，說是接受了盧主席的勸告，助學運動取消了。街上所貼的一切助學的壁報與標語都被扯毀得七零八落。警察們到每一家住戶去通知，如果學生來募捐的話，不許捐，否則要處罰。

然而學生們並不會被嚇倒。十一月二日的早晨，全昆明市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都集中在雲南大學的操場上。大約是一點鐘的光景，隊伍出發了。每一個衝衛要道或者十字路口，都有一隊人。接着也必定有壁報、標語、演講、花燈。壁報前面，或者是演講者的前面，都有一大堆人，從四方八面像潮水一般湧了過來。他們都說：「只有學生可以替我們講講心中想說的話」。真的，只有學生才了解他們的生活苦痛，然後又將這種積壓在心頭的苦痛表現出來，他們怎麼會不感激涕下呢？甚至於有些軍官和公務人員，站在旁邊望着也哭了。唱歌的時候，場外的人都跟着場內的學生們一道唱。他們的歌聲是那麽宏亮而壯大，

每一個人好似要將一生所受的委屈都吐露出來，都喊一個乾淨。團結就是力量！學生們經過了一週以來辛勤的工作，都晒黑了臉，臉都顯得消瘦多了。十一月三日的早晨，他們又排好了隊伍，帶好了一切的義賣品上街去賣。出乎意料之外，他們的隊伍走到任何地方，都受着熱烈瘋狂的歡迎。各處的邊報在劈劈拍拍地響着，迎接他們；樓房上的老闆，由窗口上撒下大把的鈔票。同學們都仰着頭，高舉着手作揖，有的高興得幾乎要哭了出來。挑扁担的，黃包車夫，洗衣服的，老太婆，都攔過來要捐錢。學生們不肯收他們的，可是他們都說：「拿去，這就是我們憑力氣賺來的錢，不是吃冤枉來的。我們這一生受夠不識字的苦……」學生們把自己搗出來的衣服、毛毯、心愛的書籍、水筆、手錶，都攤在街頭上賣。他們大聲喊着：「請伸出你的同情的手來！」「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團結就是力量！」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四一八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第六三三八號

新華

援歐與援華.....范承祥

大學教授程度的降低.....王念昆

爭取學術獨立應有的警惕.....朱聲紱

兩個美國.....吳子

支持官僚社會高度發展

的第一大槓桿——兩稅制.....王亞南

11

卷二第

一個公務員的談話.....與稷

北平各方對民盟解散

的態度 and 看法.....文琪

石家莊之役結束以後.....凌華

水災兵禍之下的安徽人民.....杜漸

中央大學師生對浙大慘案

的反響.....廖哲煌

余英

漫畫

院長的幸福

好萊塢英勇的一面

告轉載「時與文」作品的報刊



讀者之聲

院長的幸福

老弟

今年的暑假內，且明師範學院的院長查其劍，不知被什麼風吹得往鄉下亂跑，曾在路南的一個小學教員暑期講習班裏訓了一番話。我還記得查院長曾經這樣說過：「我們中國，現在已是民治民有民享的了。……」查院長把這些小學教員當做三歲孩童似的欺騙他們，但事實終不會被查院長的油嘴滑舌得過的！或者應該這樣說：人民病了，請不起醫生，只得來「民治」了！人民有「不得自由」的權利，這就是「民有」。人民能享受饑寒貧病的生活，這叫「民享」。這些都是除中國以外的任何國家的國民所不會享受得到的「特權」，或者也就是令查院長沾沾自喜的原因。

此外查院長還教這些小學教員唱「義勇軍進行曲」。我想只要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覺得這曲子的歌詞的確寫得很好，

好萊塢英勇的一面

一讀者

最近讀者收到留美同學的來信，他告訴我一段好萊塢英勇的「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故事：

「好萊塢的演員及電影工作人員，為了反對「非美活動委員會」的違反憲法和侵犯人權，早已組織了電影協會。十月廿六日，他們向全國廣播了「好萊塢反攻」的節目，控訴「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暴行。接著又選派男女明星廿六人，由著名性格明星 Humphrey Bogart 領導，飛赴華盛頓，聲勢浩大，理直氣壯，誓與「湯馬士委員會」(進步刊物稱「非美活動委員會」)為湯馬士委員會，因為湯馬士是該會的頭子)奮鬥到底。與「非美活動委員會」開庭審訊十九名被告同時，那廿六位大明星在法庭附近舉行隆重的報界招待會，由大導演葛斯頓致詞，略謂：個人有言論自由，「非美活動委員會」無權過問。繼而全體直趨法庭旁聽，以壯被告一志。

「第一位被傳訊的是名劇作家約漢羅生，「非美活動委員會」問他是否共產黨員，並且問他是否「是」或「否」。他馬上昂然答道：「我有我如何回答的自由，用不着你來問！」隨即拿出其本人的書面聲明，要湯馬士士讀首句，便拒絕讀下去，約

告轉載「時與文」作品的報刊

編輯先生：「時與文」是有用的，而且是為人所歡迎的。舉個例說，長沙各大報載相轉載其論文，各小報則轉載其通訊，藝文雜誌的小品甚至讀者之聲的類似雜感的短文，都成為各報副刊轉載的材料。差不多每本「時與文」都在這兒以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翻印了一次。

附告

關於報紙刊物轉載本刊文章之事，各地朋友及一般讀者的來信中時常說到，不勝長沙一處如此。我們對此一向緘默，因為在社會劇烈動盪而文化極度荒蕪的今天，一版極實在不值得計較，重要的還在首路的開闢與文化的傳播。同業中凡認為本刊裏還有值得流傳的作品，而決定予以轉載的，這對本刊毋寧為一大榮幸，顯示本刊獲得廣泛的同情與鑒賞。然而另有一層倒是不宜過於忽視的，經過考慮之後，我們決定提出

來商討一下。多數報刊肯擇手段，轉載便是轉載，照例出版的現代文藝，如上海週刊、密爾士評論(漫畫)等，漢口出版的星報等，然而也有不少同業者，或不拘小節，或無意中疏漏，連這一項最經濟的手續都懶於辦理或不暇辦理的，即以長沙為例，還有若干報紙，我們忘記了報名的。這裏面有一個小毛病：讀者不察，或認爲本刊轉載了別家的東西，而故意估價已有存心掠人之美哩！萬一發生類此的誤解，對本刊聲譽難說沒有損害，豈不應了「賠了夫人又折兵」那句老話？從此以後，希望同業們在轉載作品之時，切記標明出處，無任榮幸之至！

還要聲明一句：這倒不是蓄意沾光同業，招搖過市。事實上本刊並未央求轉載，只是不反對轉載而已，誰以被轉載為榮幸，倒不想以被轉載為手段。這倒也是不能不說個清楚的。

時與文

刊週

發行人 編輯者 經理部

上海文週刊編輯部 上海牯嶺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援歐與援華

范承祥

美國國會特別會議定於十七日開幕，討論馬歇爾援歐計劃的問題。喧鬧了四五個月之久的所謂「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這纔算正式走上了立法程序的具體階段。

這次特別會議究竟可能撥多少錢出來呢？為什麼美國行政當局強調援歐，而共和黨國會議員却拚命要誇張援華的重要性，並且用種種宣傳攻勢來迫使馬歇爾計劃中把援華計劃也包括進去呢？何以馬歇爾所提的援華計劃只有每月二千萬美元這樣一個「滄海一粟」的小數目呢？這裏想就這些問題加以解答。

一、歐洛克作風

綜觀這四五個月來美國輿論對於馬歇爾計劃的辯論，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就是，美國儘量想在所謂援歐計劃之下，一方面從西歐各國獲得最多的權利（經濟的與政治的），一方面却又要儘可能自己少拿出錢來。所謂「以極小代價獲得極大利益」的歐洛克式作風，在辯論中表現無遺。到今天為止，美國所已經獲得的代價，是巴黎十六國會議報告書中的許多保證（在「安定財政增加生產」的原則上放棄企業國有化運動，在「各國相互合作促進貿易」的原則下放棄自己的獨立主權來接受美國所提示的貿易自由幣制互惠等原則）；是英國的放棄魯爾工業社會化政策；是法國的「如倫敦四外長會議不幸失敗，法國境內佔區應與英美佔區合併，使西部德國成爲一個統一單位」的祕密保證；是英法義等國地方選舉中右派勢力的突然高漲乃至得勢；是英法義等國現政權的反蘇政策。這些已付和待付的代價不可謂不大了。

可是，美國準備償付些什麼報酬呢？共和黨最有希望的總統候選人之一的杜威曾說：「對外援助須以純商業之立場出發」；財長史奈德也說：「對外援助決不能無條件供給」。於是范登堡要求歐洲各國應以鈾金屬之專利及重要戰略物資之供應償付美國援助；眾議員赫特建議「調查外人在美之財政資產，並以此作爲援助計劃之附帶担保品」。前者所以保證美國對原子能祕密的長期獨佔；後者則更想拿人家的錢來行美國援助之實。至於美國本身却希望越拿錢出來越好。共和黨決定政策的重要領袖之一的塔虎脫就明白地說過：「余贊成合理之援歐，惟反對龐大之支出」，因爲支出如太龐大，「勢將造成增加苛稅、通貨膨脹、復活戰時管制，實屬危險已極」。其他國會次要人物也有不少類似的表示。由此可知，這次特別會議必然要耗費相當充長的時間來辯論兩個問題

：其一是援助貸款的數目；其二是美國現政權是否會因執行援助計劃而可能復活物價管制，以致損及美國獨佔資本家的利益。

建議中的對外援助的四年貸款數目現在有兩個不同數字：一個是哈里曼報告書中所提出的一百二十億至一百七十億的約計；另一是馬歇爾所提出的一百六十億至二百億的約計。馬歇爾又曾提出要求，希望「本年度增加撥款廿六億五千七百萬元，其中三億九千七百萬元用於對法義奧的緊急援助，五億元爲對德日的佔領費用，十五億元爲長期援歐計劃第一期的費用，六千萬元爲援助中國的第一期費用」。根據目前美國國會的一般空氣觀察，無論是哈里曼數字抑或是馬歇爾數字，本年內都沒有通過的希望，辯論可能延長到明年四五月份間。最可能在這次特別會議中完成的，恐怕只有三億九千七百萬元的對法義奧緊急援助，五億元的佔領費用和六千萬元的援華費用；至於十五億元的援歐第一期費用恐怕也非拖到明年不可，否則就一定要大打折扣。

二、政治皮球

援歐計劃將不僅因美國獨佔資本家的歐洛克作風而受到阻礙，同時也將因民主共和兩黨把它作爲一個大選期間的政治皮球踢來踢去，而把情形弄得更加複雜。

必須指出，援歐貸款在原則上是美國各個利益不同的獨佔集團所已經一致同意的了，問題是在數目的多寡、管理的技術、代價的大小等等具體辦法上。所以對原則方面，是沒有政治皮球好踢的。於是共和黨就集中目標於具體辦法的攻擊上；特別是「計劃不完整」與「過去管理不良因而浪費美國金元」，迄今爲止，一直是共和黨的主要攻擊口實。杜威及范登堡一再痛斥杜魯門政權「處理對外救濟，充滿官僚主義作風，表現極度無能」，「一兩年當中浪費了兩百億美元」，從而要求「今後援外必須以純商業立場及真正之兩黨合作之基礎出發」。這就是削弱民主黨政治資本、加強自己政治資本的手法之一。

但更重要的攻擊資本還是在「計劃不完整」這一點上，共和黨一直在「要求政府發表全部事實並擬定全球性援助計劃」。這種要求，基本上是符合於獨佔資本家的「出小錢賺大利」的原則的。因爲在獨佔資本家不肯多出錢的情形之下，行政當局一定會對擬製全球性援助計劃感到十分爲難；如果真提出全球性的貸款，那數目一定會很大，共和黨國會一定不容易通過，縱使通過也必然要經過過大的削減，但却可以免掉零碎付出大批款

項的麻煩和危險。反之，如果行政當局只能局部地提出計劃，那共和黨就可以借此大事攻擊，替自己聚集政治資本。

基於這樣的策略考慮，共和黨纔在特別會議開幕前夕，突然發動了援華的宣傳攻勢。他們顯然看準了馬歇爾計劃的漏洞，是中國問題不會包括在內。

試一檢查兩週以來主張援華的言論，幾乎全部出自共和黨人之口。范登堡、塔虎脫、普魯斯特、史密斯、楚德、富爾頓、馬丁、杜威等都是共和黨的傑出人物；民主黨方面只有一個人發言，偶然提到援華問題，而不會把它當作一個主題來希望引起辯論。在上述共和黨人之中，除楚德是拿中國問題起家吃飯，當然非談中國問題不可之外，其餘的人幾乎一向都不大注意中國事情，也從來不大為中國求援。可是這些人今天居然都大發其「立即迅速援華」、「援華計劃必須與援歐計劃同時考慮」的議論了。他們難道有所愛於中國的國民政府麼？自然不是。像范登堡等人容或是因為主持共和黨外交政策的緣故，不能不提到中國問題；但在其他的人則主要的是把「援華宣傳」當作一種武器來打擊杜魯門政權，並且與政府為難。說得明白些就是，援華問題也成了美國大選期間的一隻政治皮球，而且是主要的皮球之一了。

共和黨把這隻皮球踢過來，對於民主黨政權自然是相當窘人的。民主黨政權明知美國輿論對於中國問題興趣日益淡薄，有時甚至還感到厭厭，目前提出大量援華計劃，決無通過的希望；但看着這隻皮球踢過來，又不能不設法應付。好在援華之議是共和黨首先發動的，所以只要提出數目不太大的計劃，則既已造成了援華空氣的共和黨國會，當然決無根本加以推翻的理由。這就是馬歇爾決定提出三億對華貸款的緣故。

三、徬徨無計

為什麼只撥這麼一點點，而且還要分期給付（第一期六千萬，明年七月一日起按月付二千萬，至一九四九年七月為止）呢？

第一、馬歇爾會說：「吾人在歐洲業已獲得復興之基礎，而在中國則不然」。是的，停戰兩年以來，美國雖然對歐洲化了一百五六十億元，但到底買得了歐洲經濟的復原和中間偏右的鞏固。法國工業生產已恢復至戰前的百分之九十三，義大利達百分之六十，英國達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五，比荷盧達百分之百，德國西部英美佔區亦達百分之四十六。各國的政權幾乎都是握在右翼或中間偏右的政黨手中，共產黨（除義大利外）一時都還不能發動奪取政權的鬥爭。美國只要再化百把億，放一個總督到歐洲，就可坐收利潤，至少也不會有很快碰到倒帳的危險。

這在中國就完全不同。不僅內戰軍事不知哪一天纔能告一結束，而且外電頻傳如果美援不至，政府在明年三四月間將遭遇到嚴重萬分的危機。

中國不僅沒有具備復興的基礎，反而具備一切投資家所最畏懼的風險。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如何敢把援歐的一套經濟手法拿到中國來用呢？假如用了，萬一將來債務人垮了，所有放的帳一個銅子也收不回來，那怎麼辦？我們只要抄一段楚德和馬歇爾的問答就够明白了。楚德問：「余同意中國局勢之關鍵係屬軍事而非經濟；惟當局勢之關鍵係屬軍事之時，吾人亦可採經濟行動以補救否？」馬歇爾答稱：「當中國以其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資源用於軍事之耗費存在時，問題即具有巨大困難。這也就是說，除非國民政府在軍事上有相當表現，使美國投資家能够消除擔心風險的心理，否則美國就不能輕易大量借錢。」

其次，美國國務院某高級官員會說：「援華計劃已發展至需要確知究竟將產生何種結果之程度」。據一般估計，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援助，至少已達三十餘億至四十億元；即據美聯社本月初所發表的統計數字，美元總數也已達十一億五千餘萬美元，較蔣立特所建議的十三億五千萬美元只不過相差二億美元不到。然而這結果是什麼呢？與蔣氏所預料的完全相反，戰火是愈益蔓延了，戰局的危機是愈益嚴重了。抗戰以來所剩餘的一點點薄弱經濟基礎愈益破爛削弱了。縱令中國政府能在兩三年內撲滅中共，恐怕也不見得能在短期內把中國變成美國的好市場，何況這種撲滅的可能性現在一點也看不到呢？

正因為局勢如此麻煩，而所產生的結果又如此難測，所以共和黨的紐約先鋒論壇報也說：「任何自共產主義中挽救中國之建議均屬荒謬；在目前情勢之下，數十億元之援助或亦不能完成此項任務。」這種幻滅、悲觀、徬徨的苦悶也表現在馬歇爾的談話中。在答覆眾院外委會關於援華問題的辯論時，他說：「我國僅會派四十餘名軍官及若干軍事物資前往希臘，同時則已派遣一千名軍官前往中國，吾人且曾供應甚多之軍事物資給予中國。……此乃余平生所遭遇之最困難及最複雜局勢之一。」在這種心理之下，美國大量投資又如何肯來？

美國這樣小小的援助，自然使中國政府大失所望，孫科先生且大發牢騷，甚至明白表示「余一向懷疑美國友誼殊不可靠」。其實，馬歇爾很老實地答覆了孫先生的牢騷了：「國民政府必須更進一步，然後吾人始能更進一步……一切癥結當在中國苟不能大有作為，則無能為力。南京方面須大有作為，然後吾人在此始能更有所作為。」換句話就是說，中國政府必須滿足美國投資家的安全感，拿成績給投資家看，否則就不必對美國更有期待。

如此說來，決定美國援華的規模以及遲速的，不是美國某些人的主觀願望，也不是中國國民政府要員們的牢騷與懇求，而是冷酷現實的中國內戰形勢的發展。

大學教授程度的降低

王念昆

許多人都喜歡說到大學學生程度的降低，甚至道貌岸然地以此作為當前「學風敗壞」的原因，從而唱其消除大學教育危機的高調。我們自然不否認學生程度在某些方面（請注意，說是某些方面，因為今日大學生除課業稍差之外，其他方面的進步是驚人的）降低的事實，但是如果把所謂學風敗壞的責任一概歸於青年學生，特別是歸於學生程度的降低，那不僅是不公道的，而且是錯誤的。

因為如果把學業程度的降低看成很重要的原因，那麼我就要提出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大學教授們的程度也同樣的降低了。而且，就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情形來說，大學教授們不僅在學問的領域裏呈現出程度降低的現象，而且在對現實和對中國的實際的了解上（除去少數數堅貞求真的學者值得我們致敬外），尤其是非常落後的，乃至不如青年學生！如果說大學教育發生了危機，我可以說，危機的原因並不在學生程度的降低，而實在大學教授們知識和見解的落後。

說是大學教授們在對現實和對中國的實際的了解上是落伍的，是不如青年學生的，這從兩代之間在歷次學運和愛國行動上的衝突對立可以獲得充分的證明。試拿彼此的思想言行用時代的需要加以衡量，青年學生們總是站在進步的方面，而教師們則照例是偏於保守或是游離於保守和進步之間的。

就在這一明期的分野裏，作為教育下一代人的重鎮——大學教授們——既遠落在時代的後面，他們所能完成的任務就很顯然的不僅談不到使下一代人能超越現實而前進，往往是要發生惡劣的倒退的影響。學生倘不另求進步的途徑，大學教育的結果勢必要造成一批阻礙社會進步和促成社會停滯的人物，中國社會也許真的要因此更長期的停留在落後保守的階段。

為整個民族的前途着想，這才真是大學教育危機的所在。
為證實以上的說法，讓我們對大學教授羣試作如下的分析。

在今日大學中的確仍有孳孳為學教人不倦的學者大師，在生計交迫中始終維持學術的水準，和維護研究的風氣，使中國學術界還保存一縷生機。但大師雖有，大師實不多得。因之充斥於大學門牆之內的人，就有以下幾種：一種是以大學教授為終身「職業」的人，但求保全飯碗，圖一個安定（雖然現在已不如戰前舒適）的生活，在學問上並無特殊成就，不過多半是較好的教書匠。一種是以教授作為進身之階的「終南捷徑」，心存五日京兆，教書實非其心願，上焉者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教書還可勉強應付，下焉者則仗着油腔滑調敷衍塞責，或者拉攏學生，惹是生非，以學校為宦海實習之所，機會一來便乘機而去。一種是反正找不到什麼更合式的職業的人，既沒有本錢經商，又沒有本領活動做官，落得做個教授，莫明其妙的分享清高的美譽，結果就變成了上述的第一種人。還有一種人看起來倒很不錯，實際上極有問題，那就是終日埋首書齋食古不化的人，研究一些於國計民生毫無裨益的東西，偶有所得便沾沾自喜，而自認為神聖不可侵犯。

這幾種人雖然表現各自不同，彼此意見也未必一致，但在應付進步思想進力量上則向例是團結得很牢的，因此在以這些人為主體的中國各個大學，也許除在政治上胡鬧得太不成話的時候，他們顯得似乎非常開明而外（張奚若教授有一句名言：「這些開明的表現乃是由於腸胃的衝動，非由於理智的思考也」），骨子裏是非常保守的，不僅在政治見解上是保守的，在學術思想的接受上也必然是保守的。因為是保守的，所以進步份子極難插足其間。許多國內知名的進步學者，固然多半是由於政治壓力而不得在大學任教，但在某些學校，確也有由於校內系統不同而遭排斥的。也有少數進步教授勉強留在大學裏，他們的處境非常可哀，除了特別能得學生愛戴外，在學校行政上或學校政策的決定上是極少能發生作用的。

這就是今日中國大學師資的情況。如果沒有年輕學生的一不安分及其影響，如果不是物價與生活的高壓，我敢說中國的大學定是最馴服最易於指揮的一個部門。

然而，大學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畢竟祇是個傳授知識的機關，希望大學教授思想進步，實在是種苛求，因為大學教授的責任與其誇大為教育下一代人作為國家進步建設的生力軍，毋寧承認他們不過販運知識的這一事實。

平心而論，一個青年經過小學中學十餘年的教育之後，走進大學，一般的行為大致趨於定型，祇要中小學辦得健全，似乎也無需再強求大學教授在傳授知識之外，還要做別的工作。因此，且讓我們暫且收斂起以上的苛求，僅就傳授知識這一重大的任務加以追究，我們將可以更具體而肯定地指出大學師資程度降低的事實。

我們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一方面讓我們看看那些「三四流」的大學，另一方面再不妨看看幾個所謂名震中外的「最高學府」。試先就前者而論，牠們所發生的問題，最嚴重的是由於量的缺乏必然的變為質的貶低。因為中國學術並未獨立，而多少年來限於能力，主要的還是限於「鍍金主義」的自卑心理，又未曾盡心注重國內研究院所的發展，因此大學師資的缺乏，在戰前雖不嚴重，已成事實。但其時交通方便，留學者尚多，留學者雖不盡高明，却究有選擇補充的餘地。戰時情形轉變，國內既不能自給，靠留學生補充又不方便，而各方需用人才又皆急迫，原有的師資每被其他部門拉借，大學師資缺乏的現象乃明顯暴露，雖所謂第一流大學也照樣有感於教授陣容的不齊。

然而天下事之荒謬者，莫此為甚：正當師資缺乏的嚴重性與日俱增的時候，新的大學、獨立學院以及專科學校却如雨後春筍一般，紛紛設立，師資既無法作合理的補給，就祇好因量而貶質，胡拉亂湊，以資點綴。加上複雜微妙的人事安排，若干大學師資的標準自不能不降低，不得不開方便之門，聽濫芋者充斥其間。在國外胡混個資格歸來的留學生固然可以名正言順地做了大學教授，在國外揮耗盡與歸來的統統子弟也同樣可以做主任做院長。夫大學的招牌雖已堂堂高懸，而大學的內容實已空空，不堪問矣。

至於那些所謂的第一流大學，自然比前述的情形高明得多，有制度，有標準，至少沒有名位濫予濫授的弊病。但在安定中依然存在着一個嚴重的危機，說明着大學師資程度的降低。

試就吾人所常稱道的幾座大學來說，裏面有許多知名的學者大教授，資格既硬，資歷又久，聲望極高，門生極衆，於是乎名聞全國了。我們自不否認這些學者大教授成名的確有其根據。不過一旦撇開了歷史光榮之後

，當前就呈現出這樣一個事實：這些人正因為資格硬，有博士碩士頭銜，遂有恃無恐；正因為資歷久，便可以倚老賣老。他們自然已成為學校的台柱，可以舉足輕重，後進的前途都操在他們手裏，他們更可左右年輕的一代，結果必然形成派系，人事關係重於學術成就，一切升遷都繫於人事。年輕人為了找個好的快的出頭機會，祇有盡量表示恭敬逢迎，他們的聲望因而更隆，地位也更穩了。

學人既流於倚資歷賣資格，自然無心於學術的研究。因為他們不能繼續研究，學術界的進步與發明固然談不上參預，往往連接受也非常困難了。結果對於課程的教授，便祇好和他求學時代的一部筆記講稿共存亡，歷十年二十年也不加更改，講起來也許津津有味，內容實不勝其空虛和陳舊了。就在這個落伍的情勢下，相對地證明了他們程度的降低。

他們或者已自覺到精力的不足，既不能在學術上謀進步，乃盡量向行政及事務上圖發展。在地位上和權力（校內）上求鞏固與提高（也不容否認，由這批教授們治校，自然比較有規則和制良化點。可惜的是制度却又僵化了。）而把研究指導的工作盡量推託給較年輕的教授們去担任。這從某一方面說也許還意味着提攜後進的作用，而實際不過是逃避責任而已。而且因為他們向行政事務上發展，結果對他們自己說是正式告別了學術的追尋，却又不肯放棄教授或系主任院長的榮銜。這對學術的進步說和對於後進說，必然是阻礙着和延緩了新陳代謝的功能，而任落伍的學術見解繼續控制着學府，無法去吸取新知新見。中國的學術便祇好始終不如別的國家，永遠也莫談學術獨立了。

要挽救大學師資程度降低的危機，牽涉自然很大。不過在原則上，最意資格資歷誠然是選聘大學師資的基本條件，而著作的有無及其水準的高低更應具有決定的作用。如果一個人儘管有博士碩士頭銜，或者儘管有十年二十年的資歷，而著作毫無，教材又極陳腐，這種人就絕不應該再懸棧於大學中。相反的，如果一個人有很好的著作，有教書的才能，則雖然資格不夠，資歷不足，也應該加以選聘。自然，這裏需要靈活的公平的決定，以淘汰錢老，鼓勵青年，而更主要的還在設法加速學術的獨立，擺脫掉崇拜錢金的觀念，儘可能地從自己的國度裏訓練培養一批批了解國情的學者來。

願主持大學教育的人莫再諱疾忌醫，坦白承認這一個事實，並迅速設法糾正它！

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於北平市郊。

爭取學術獨立應有的警惕

朱聲紱

自從胡適先生發表談話提議爭取中國學術獨立以來，一時論壇上研討留學政策和學術獨立的文字很多，其中贊成或響應者多，持異議者較少。筆者默察持異議的多半是由於胡先生自謙為「偏私」的舉荐五個大學先行充實而起。其實這「偏私」雖非絕對客觀，却決非純憑主觀的情感。在胡先生所荐第一個五年所充實的學校中，就並未偏私到把當年西南聯大的組成分子全體列入，則這一點偏私並無妨於主張之正確。所以胡先生認為他的主張已經造成輿論，至於這輿論能否發生力量，為主持教育當局所採納，目前自不能預料。

學術獨立原為多年來中國學術界努力的目標。抗戰時期物質環境惡劣，整個大後方在與國際隔絕的封鎖狀態中，圖書設備都無法採用新的，所以學術進步受到窒礙，而獨立更談不到，復員以後學術界自然應該重新以學術獨立為目標而繼續努力。而近年來自費留學政策的弊多利少，更促使學術界感到學術獨立的迫切需要。

雖然胡先生並未給學術獨立下定義，從胡先生所建議的十年計劃裏却可以看出所謂學術獨立決非學術上的閉關主義。凡是國內未設的科系，我們仍當審慎遴選學生到海外研習。據筆者之意見，則即使已有之科系而水準較國外低得很多的，亦應派員出國研求，最好是派已經有深厚根基的學者，俾回國之後能作獨立的研究。主要的是在國內發展各大學的研究院，使之與外國研究院水準相仿，以免各種高深的學識均須外求。就是在學術「獨立」以後，也仍要與國際上學術的發展互相觀摩，續求進步。

關於學術獨立的技术問題，在胡先生的十年計劃中已揭櫫綱要，此地不贅。筆者所要提出的是爭取學術獨立時，我們不能忽視了它的社會任務，因此學術界在爭取之先對於態度方面必須有所警惕，否則學術即使獨立了，對於社會、對於人民未必有多大好處。

首先，引起筆者感觸的是近年來的自費留學政策。自費留學本是一古已有之，在抗戰以前富家子弟自備外匯留學者每年都有，毛病是出在抗

戰時教育部在外匯管制以後所採取的自費留學政策。以第一屆（卅二年）的自費留學而言，考試是在重慶舉行的，報考約千二百人，錄取約六百人，差不多每兩個報名者中可有一個錄取，水準之低，自不待言。而考取之後以官價購買美金，即每廿元易美金一元，比之購買力平價固然相差甚多，比之當時黑市匯率約亦只及五六分之一。結果自費與官費無別，都由政府供給外匯。第二屆若以一萬二千結算，衡之今日黑市匯率，情形一樣。就此舉本身說是不公平，就遠大處看，更有很不好的社會影響。因為這種政策無異於津貼富家子弟留學，姑不論這些富家子弟讀書成績如何，就一般情形論，他們自幼錦衣玉食，全不知民間疾苦，他日學成歸來，做較高級的工作，踞中上的位置，在社會上就是延長多財有勢者的統治，徒然加強保守的陣營，阻礙全體的進步。由此就使我們需要同樣警惕在爭取學術獨立時學術界本身的態度。

中國社會傳統上士大夫是特權階級，在抗戰以前各學術機關中的工作人員也都得到很高的待遇。固然環境優良，生活餘裕，是專心研究的必要條件，但是這些條件却發生過附帶的作用，使學術機關變成了象牙宮，宮中人物自視為高人一等，傲慢榮譽以俱來，結果自由思想只限於宮門以內，而且每多紙上談兵，對社會現實是隔靴搔癢。自由思想的學者雖高懸改良社會民生為目標，其實與人民隔離很遠。老百姓對於這特權階級敬則敬矣，見了面却連實話也說不暢快。抗戰以還，通貨膨脹剝奪了學者的收入百分之九十幾，戰火更毀壞了或奪走了他們的花園洋房，學術界由小康的中產階級一掉而為赤貧。他們住着不蔽風雨的破房子，與臭蟲跳蚤為伍，吃着糙米雜糧，甚至以稀飯延命，一年四季一襲藍布長衫，終日愁眉愁米，挑水買菜，親自操作，此中苦况實為過去想像所不及。但他們堅貞不偷，恪守崗位，孜孜研究，諄諄教導，這是值得景仰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意識上也與在生活水準上同樣空前地平民化起來。士大夫再不是特權階級，而是赤貧的勞動者。現實告訴他們過去的象牙宮只是點綴，現

在他們羞於做這種點綴，懷疑一切特權在這個社會裏能否合乎公平與正義。當政者的政策與投機者的高價使他們恥於依賴過去的特權，施捨式的待遇使他們明白今日學術界在當局目光中的渺不足道，困頓的生活更使他們同情於貧者的痛苦，於是第一次，中國的士大夫變為平民，學術界與平民站在一起了。他們不再多為自己乞討喪失了的權利，却大聲疾呼為民間作切實的呼籲，這個劃時代的轉變是可喜的，健康的。現在談學術獨立，仍然必須先充實學校設備，改善學術界的生活，然而這決不是重建象牙宮，決不是讓學者們脫下藍大褂重回官中做珠寶珍玩。學術界必須保持堅苦生活所鍛鍊出來的平民意識，不與人民脫節，鞏固他們在崗位上繼續為人民工作的那份堅貞。我們現在是要用人民的錢來建立充實的學術研究機關，不是想用特權來建立上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皇家圖書館，不是靠施捨來建立中古歐洲的寺院。

其次，筆者想到德國日本的學術水準很高，尤其是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比之英美略無遜色，可以說德日的學術是獨立的了。但是這樣高的學術水準仍無從阻止戰爭的失敗，其國家民族仍然免不了災禍與飢餓。德日的學術界徒然發展了自然科學，間接加深了戰禍的慘酷，而國內政策由好戰的法西斯黨徒與軍閥財閥操縱，社會科學和哲學日形萎靡，國內無輿論阻止弄火者的冒險。學術界幫助了軍火的發明與動員的實施，作為參謀本部的顧問支部，則學術只發生了破壞的影響，未發生積極的貢獻。

純粹學術的研究，固然不摻雜道德倫理的色采，但是學術必須與人民的生活發生關係，由學術的昌明更促進社會合乎理性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日臻健全。因此學術界應當以理性的尺度來衡量人民呼吸其間的社會秩序與政治制度，詳細闡明各種政策設施的利弊與應行改良之點，使學術研究的結果應用於實際文物制度的發展，然後人民才能得到學術的實惠，整個社會的文化才能提高。否則學術只是手段，儘可以為少數有力者奪去，完成與大眾利益相違背的目的。

要使學術能服務於社會之改良，則學術的指導原則首應發生影響現實政綱政策的力量。這力量就在輿論，簡單點說就是取得一般人信仰的意見。中國現社會有多少弊病；有多少可以改良之處；每一政策執行雖糟糕，然而幕後確有專家在制定辦法，則這些政策用意如何，深遠的社會意義如何，及於整個民生之影響如何；舉凡這類老百姓應該知道而且迫切需

要知道的，學術界都應該作深入淺出的說明。目前不但一般人民對於現社會一切設施變遷不知其意義，即中學生亦均茫然。而這些設施固無一不具深遠之社會意義，有待學者專家之闡明，從而造成輿論，產生力量，合乎大眾利益者取之，反乎大眾利益者捨之。因此學術界對於國內社會的一大任務是造成健全公正的輿論，而首先要爭取學術思想之自由，言論發表傳播之自由。一定要有學術自由之後，學術獨立才能得到發揮其建設性作用之保障，而就研究來說，學術自由也是必不可少的搖籃。我們希望胡先生不但要造成爭取學術獨立的輿論，更要造成爭取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輿論與其他對人民更有利益的輿論。學術界的研究結果不能專作有錢有勢者的工具，而應當是為人民服務的。學術界不應只是政府的智囊團，而應當是人民的一個忠實的僕役。美國此次戰後有一度為管制原子能生產而引起爭執，政府要以軍人充任管制委員會主席，而學界力爭要以科學家充任主席，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深思敬仰的。

最後，筆者希望爭取學術獨立同時應以促進國際合作為任務之一。一國學術之落後，在戰時固然因國防不現代化而有滅亡之虞，在平時也會因生產之落後而日趨式微，但是爭取學術獨立單從國家的立場看是不夠的。即使世界各國的學術均平衡發展，但是由於種種偏見與其他實際的差別，仍可發生爭端。諸如種族的偏見，宗教的缺乏容忍，經濟力量之不同，國家民族主義之過分，絕對主權觀念之存在，均可導致國際爭端或甚至於戰爭。以今日國際間之密切關連，一旦再有戰爭，大多數國家必然捲入漩渦，而由於學術發達而發明巨大破壞性的武器，戰爭難保不招致全部的毀滅。各國儘管有獨立的學術，而仍然難免為偏見所蔽而同歸於盡。所以愛因斯坦曾說過，他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武器是什麼，他却可以說第四次大戰如果發生的話，一定以木石為武器。我們瞻望前途，人類的理性終要使世界上不分膚色，不分種族，不限宗教，而互相依存。在這遠景之下，也許現在給我們害多於利的國際界限與主權觀念都會被將來的人認作迷偏或偏見，進而予以摒棄。甚願中國獨立後的學術能共同推進聯合國文教科學組織的工作，共同實現天下一家的理想。免得當我們也有原子彈去摧毀敵國時，迫使子孫以竹弓木箭去進行第四次世界大戰。

如果當局採納學術獨立的主張，改正現行留學政策，充實國內研究機構，則學術界對於上述三點，似有引為警惕的必要。

支持官僚社會高度發展的第一大槓桿——兩稅制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歷史的經濟的解釋）之八

由唐代以至清代中葉，是中國官僚社會向着更高高度發展的一個階段。雖然在這一階段的每個王朝，都各別在它們統治上發生了極大的破壞和困厄，但從整個官僚社會立論，這一階段的官僚政治，確已前後參差的把它的包容性，貫徹性，乃至對於經濟可能發生的彈性，提高到了這種社會形態允許的極限。

中古分立變亂局面，在中國典型封建史上，彷彿是一個「逆轉」或「倒退」，但我們評價這一段歷史，也正如同評價中古歐洲的封建史一樣，須得出以極大的審慎的鑑別。那個時期，並不是在一切地域，一切方面，都由戰亂退步荒廢了。「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的慘象，不論在三國時代，抑在西晉五胡之亂的時代，並不會出現於南方，而在北方，亦是破壞與恢復相並相間的表演着。此後由南北朝以至隋末，大抵亦可作如是觀。如其我們忽略了此種事實，過分強調當時社會經濟的荒廢情形，以為那是全面的衰落或退步，那末，我們對於隋唐特別是唐代經濟的迅速發展，就將感到非常突然，而對於那種在分立局面下益加強盛跋扈起來的門閥或豪族的社會存在基礎，也將無從說明了。

中國的官僚社會統治，確會由中古分立局面顯示一個大分水嶺。在這以前的秦漢，和在這以後的隋唐，恰是一個先後輝映的對照。秦漢與隋唐乃至此後諸王朝，在統治上有一本質不同點，即前者，至少在秦及漢代前期，正從社會政治各方面，剪除封建特權，使貴族官僚化，而在經過了前述官僚貴族化，或門閥形成階段的中古分立之局以後，那些王朝的官僚政治裏面，已經廣泛滲入了特權階級所具有的不少因素；那就是說，隋唐及其以後的官僚統治，須得比較大的努力，妥善處理或對付這一新課題。又到了這一階段，中國社會不但在經濟方面已經在既有基礎上有了更廣闊的更多方面的更有流動性的發展，而由領土更大開拓，和與異族更多接觸所形成的對外關係，也變得複雜了。這些課題開始是向統一的隋朝大帝國提出的，隋朝沒有適應這種新環境的認識和經驗，就由唐代專制君主和官

僚們接受下來。他們對這些新歷史課題，也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很適當的處理辦法的，經過了不少的嘗試努力，為他們自己，也為了此後其他各專制王朝，在經濟上提出了兩稅制，在思想訓練與仕途控制上提出了科舉制，而在對內對外的武力上提出了府兵制。這三方面的體制，不盡是由唐代所首創，但却是由唐代使其更具規模，而由唐以後各朝代在同一或相異的名目上將其延續改進的。賴有這幾方面的創意的成就，中國官僚政治乃得在中古分立局面以後有着更高度的發展。

本篇先就關係整個田制兩稅法加以說明。

封建社會的經濟權力，歸根結底是建立在田制稅法上。

在那種社會中，田制稅法不但體現着支配階級對被支配階級之間約制剝奪取深度，同時也體現着支配階級內部對於那種榨取物分配的實況。與初期貴族封建社會比較，官僚封建社會財富在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分配，畢竟是有更大的變動性或更不易刻板固定下來的。也許就因此故，中國秦代以後，每個王朝在田制稅法上，就圍繞着各種各色的鬥爭。大約在每個朝代之末，都有被支配階級的農民起來，要求改變土地的分配關係並反抗租稅，而在這以前，則是支配階級——貴族、官僚、地主……們相互不絕由整理田制稅制而掀起內訌。支配階級中貴族官僚化的成分加重，乃與全部賦稅逐漸集中到中央的事實相照應。就被支配階級的農民說，究是把賦役直接貢獻到專制君主於他們有利，抑是以私屬的名義，把賦役貢獻給強豪於他們有利，他們似乎很不易抉擇，因為他們始終就不會由任一統治方式，得到負擔比較輕鬆的好處。可是，在支配階級方面，那種轉變，就關係很大了：門閥或強豪對賦稅多一分的控制，那就不僅意味着中央經濟權力的削弱，且意味着政治離心局面的造成。

由漢末經魏晉南北朝形成的門閥，對那一歷史階段的分立局面扮演了極關重要的角色，可是，隋唐統一大業告成，並不就是那種門閥的沒落。有許多事實證明：隋代王朝的短祚，正如同秦代王朝的短祚一樣，都是賦

乏統治新局面的經驗，在秦，我們已指明它是太不善應付新起的官僚，而在隋，則是太不善應付新起的貴族。漢懲秦之弊，在學術仕途的統制上收到了極大的成功，唐懲隋之弊，在更有組織的科舉制上，在靈活運用的賦稅政策上，分別收到了穩定統治，並使官僚政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唐代租稅體制是代有變遷的，到了楊炎實行的兩稅法，始在中國後期官僚政治史上，展開一個新的篇章。

但是要解述楊炎兩稅法及其對唐代以後各專制王朝統治的補強作用，勢不能不對唐以前各王朝關於田制稅法改革上的鬥爭糾紛，有一概略的理

解。

田制稅法所反映出的官僚階層內部的傾軋，在漢代不但已表現得明白，且已被下面這段話暴露得够透澈了：「古者什一而稅……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強豪佔田逾限，修輸其賦大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荀悅漢紀論）。「官家之惠」，是否「優於三代」呢？我們把漢代算賦更賦的措施加以考慮，就知道是不大可靠的。但「豪強之暴，酷於亡秦」，却是事實。不過，官家或中央政權所注意的，並不是人民的死活，而是「威福分於豪強」。

在「威福」已經「分於豪強」的魏晉及其他諸王朝，爲了招收流亡，墾闢戰亂之餘的荒野，曾分別由政府統制土地分配的種種田制稅法，曹魏的屯田制，晉代的占田制，北魏乃至隋唐的均田制，均富有向豪強搶救土地人民的深意。但除屯田制係屬帶有軍事性質的臨時辦法外，晉代的占田制是毫無結果的，像石崇王戎型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出現，正好說明「廣收八方田園」，或「強豪兼併，孤貧失業」（晉書劉頌傳），是對於占田制的強烈諷刺。東晉而後的宋梁諸代，每况愈下。其在宋爲「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偏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爲私藏」（宋書王弘傳）。在梁則爲「頃者豪家富室，多佔取公田，貴價徵稅，以與貧民」（梁書武帝紀）。

其實，晉室東渡以後不久，阻制一般貴族豪右的占田制，固然無法施行，就是專門向北方南渡豪族爭奪財源的那所謂土斷制度，亦不曾收到多大效果。原來西晉戶籍，在北方稱黃籍，在江南稱白籍。北方豪族率領家丁屬戶南渡，仍僑立寄寓郡縣，享有不輸不納特權，但此暫時權宜辦法，一旦永久化，不但負擔上太不公平，許多規避賦役人士，都相率由白籍變爲

黃籍，於是政府爲了收入，乃不得不對一切享有上述特權人士，依其所居之土，斷其戶籍所屬，以爲稅役張本，是謂土斷制。由桓溫以至劉裕，雖認真設法「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但其結果，仍只把那些小民細戶的戶籍清查了一下，至於名宗大族，依舊依「本注」，持黃籍，享特權，卒至由白籍冒牌黃籍的問題，轉化爲小戶僭充士族的問題，劉宋以後，更無論矣。這與我們前述及的豪族把持政權的事實關聯起來看，却毋寧是當然的。

然而在同一時期的北方，雖然也有新舊的巨族名宗，畢竟因爲在大亂以後，北魏就開始施行了一種與其說類似晉代占田制，不如說類似曹魏屯田制的均田制。在今日研究起來，均田制的最後目的，實在增產而非均產。經過八王叛亂，五胡紛擾的北方局面，土地荒蕪，人民流散，如何招收流散人民，以墾殖荒蕪土地，就是均田制度實施的本質要求。我們始終不會發現「均」豪右之田的記載，而所見到的，却不過「主將恭儉，專擅肥美；瘠土荒曠，分給百姓」（魏書賀懷德傳）。這就是說，均田制是在豪右佔有以外的荒瘠地面上，依勞動生產力的大小，而配給以可能耕墾的土地數量，而由是獲取可能提供的賦稅定額的田制和稅法，所以，除一定的永業田而外，還授田的主體，並不限於主男，有勞動能力的婦女，奴婢，乃至耕牛，都在其列。像這樣依照勞動生產力配給耕地的辦法，在當時的情況下，確有助於經濟的恢復，且會在相當範圍內，阻止了農民對於稅役的逃避。所以，均田制又近似一種強制執行的半徭役制或力役制。北周北齊沿襲魏制，略有損益。隋文帝混一宇內，推廣均田制實施範圍。到煬帝即位之初，田野墾闢倍增，「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大縱奢靡……兵車屢動……數年之間，公私罄竭，財力既殫，國遂亡矣」（舊唐書食貨志）。李唐懲隋之弊，然仍在半徭役的均田制基礎上，確立起中央集權的專制官僚統治。均田制及其相伴而行的稅法，更系統化，並且更推行得徹底。授田的對象，不再是男丁、婦女、奴婢、耕牛，而集中在男丁方面，統一多了；其稅法，「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條理系統多了；除某些特殊場合，原則上禁止田地買賣，又規定「諸田不得貼質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而「諸在官侵奪私田者，一畝以下杖六十，三畝加一等，過杖一百，五畝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園圃加一等」（唐律疏議第十三卷），其嚴厲徹底更可想見。

然而，這種半徭役性的田制稅法，雖然是唐代專制官僚統治的經濟基

礎。且使那種統治的集中力量，更形強化；但其施行效果愈大，即經濟上土地愈墾闢，人口愈繁多，生產物愈富有，隨即就會顯示它不大適合那種統一的統治形態；比如，由廣土衆民及豐富物資所必然招致的流通經濟或商業資本活動，在在會使那種把土地人口定着在一定秩序下的體制，顯出異常的窄狹性，而破綻百出；結局，原來用以限制或禁止王公百官特別是豪右們佔公家稅源泉的租稅體制，就由他們這些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優越權勢者，利用它露出破綻的機會，開始來破壞了。其所採取的破壞方式：（一）使農民開墾荒地，迫其變爲熟田，乃橫奪地租；（二）違法收買口分田與永業田；（三）塗改籍書，以便隱漏隱占戶口；（四）依典貼等方法而行使收奪（參見拙編中國社會經濟史綱第二一一頁）。所以，延至「開元天寶以來，法令廢弛，兼併之弊，有踰漢成哀之間」（通典）。而前此用以限制兼併者，反促起更猛烈的兼併。特別在安史之亂以後，各地方權勢者，相率招收流亡，隱漏戶口，橫奪租賦。據沙哈諾夫所說：「國家的封建勢力在這時恰好比地方封建勢力弱了五倍有半，它少了五倍半的納稅戶口。這種變動關係，就是世襲藩鎮要反對所謂中央政府及叛變中央政府的原因」（李譯中國社會發展史第三一六頁）。到此地步，唐室依均田制和租庸調稅法而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物質基礎，根本發生動搖。

三、

均田制度及其伴行的租稅制的失敗，不僅說明流通經濟相當發達的官僚社會，不可能再把土地與農民束縛定着起來，不使變賣，不使移轉；並還說明這種社會由長期因緣積疊所逐漸形成的門閥及其有關的社會政治勢力，再不會允許把他們已經領有或將要取得的土地所有權力，交由中央政府統制支配。所以，爲了適應這兩種客觀情勢，唐代統治者經驗到維持統治的最安穩最聰明辦法，不在壟斷土地分配權，以長期控有賦稅源泉，而在承認既成土地所有關係，以改進賦稅收入。這即是代替均田制及其租庸調體制而出現的所謂楊炎兩稅法。

楊炎兩稅法的精神，原不在字面所示的每年兩次徵收，即「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而在所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尤在所謂「戶無主客，以居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唐書食貨志），這種稅法施行，顯然把前此由國家統制土地分配的規制，從根取消了。也許正因此故，楊炎在舊歷史家心目中，就被視爲是罪浮於，或者至少是罪等於商鞅了。請看下面一段話：「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

漢魏南北朝之制，雖或重或輕，要之規摹尚不失舊。德宗時楊炎爲相，以戶籍隱漏，徵求煩多，變而爲兩稅之法。兩稅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楊炎所以爲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歷代之典制。唯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呂東萊語——見文獻通考田賦考三）。特把楊炎比之於商鞅，却正說明了廢均田與廢井田同樣重要。在應時達變，解放社會生產力方面言，商鞅之功爲不可沒，楊炎之功是同爲不可沒的。漢董仲舒非難商鞅，謂其「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唐陸贄亦因此評許楊炎，謂「疆理墾墾，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見陸贄奏議）。其實，沒有商鞅變法，沒有楊炎改制，由兼併而引起貧富懸殊的現象，依然是存在的。而我們在這裏所當注意的，却不是它在實行當時的利弊與是非，而寧是它對於整個官僚社會之存續與發揚上的促進作用。

首先，兩稅法在稅制本身，比之前此系統化了的租庸調，更簡單多了。自然，一種簡單而系統的稅制，須得與實際經濟狀態相照應。唐代商業的發展，是前代無與倫比的，流通經濟活動範圍的加廣和深入，已經需要一種較爲進步的稅制，爲了配合，兩稅制簡化的徵收手續與程序，避免繁多項目與轉折所給予納稅的因素，是值得稱許的，雖然當時幣價與物價的不斷變動，會使人民在以實物折價繳納的場合，要受到許多的不利。此後由明代施行的統徵折徵混一的「一條鞭法」，及清代簡化徵收的諸般規定（特別是丁銀撥入地糧的辦法），顯然是兩稅法簡化原理在經濟發達環境下的更進一步的發展。

其次，兩稅法「不問主客，以居者爲簿，不問丁中，以貧富爲差」的規定，至少在形式上是合乎賦稅平等負擔的原則的。「王公、官僚、浮客，均在被稅之列」，也許其着眼只在增加政府收入，但施行時無論澈底到了什麼程度，這種貧富以資產爲差的稅法，至少，和所謂「王子犯法，庶人同罪」的律法，同樣會使士大夫們振振有詞的宣揚「公道」，「公平」，「平等」，而由是緩和農民對於支配者階級的對立情緒的。事實上，每個王朝開國之始，中央政府例皆利用其統一宇內的餘威，多方設法整編戶口，經理田畝，宋元兩代雖格於豪右阻擾，成效殊微，明朝以戶爲主的「黃冊」和以土田爲主的「魚鱗圖」，並行互證，成績甚大；清代沿襲明制，於徵收稽核方面，更增詳備。明清兩代官僚政治的高度發展，在經濟基

礎的確立上，得益於此稅制者甚多，而跡其發端，則不能不溯之於兩稅法。

又其次，兩稅法的建立，一方面雖確定以資產為課稅對象，予兼併侵奪者以打擊，同時却又無異默認兼併侵奪的結果，而由是為大土地所有或莊園開一方便之門；中國莊園組織，由唐迄宋，大為擴增。明初由官家所占的官莊，其畝數已達全部民田七分之一。元清兩朝以異族行使統治，王公勳官皆有采邑，軍隊亦有祿田、皇莊、官莊、寺莊、軍功田莊，所在皆是。此種大土地所有形態或莊園形態的產生，顯然與兩稅法的施行，無直接關係，但兩稅法都分明是建立在一種事實上，即中央政府統制土地所有權的分配為不可能，乃不得已而從賦稅方面予以限制。

像這樣一面聽任土地為王公、官僚、豪強佔有，或乾脆由專制君主任意賜予他們以大土地莊園，同時又多方加以限制，在形式上、法令上，不讓那些大土地所有者享有歐洲莊園領主所享有的「不輸不納」(Immunity)特權，彷彿是非常矛盾的。但這却正是中國官僚社會長期存在並發展的強點或韌性。且進一步予以簡括的說明。

四、

本來，在一個交通經濟或流通經濟相當發達的社會，要維持一個那怕是官僚的封建統治，也是非常困難的。封建社會的經濟重心仍是土地，土地如其不可能由國家統制分配，又不可能使它不流通，不買賣，而土地的

兩個美國

吳子

由於近百年來中美兩國商業交換與文化交流的頻繁，美國的花旗牌子似乎已在中國一般人的心目中造成一種不易變色的印象；許多人提到美國時，都會聯想道：一個民主自由進步的國家；尤其因為美國在對抗法西斯侵略國家的世界大戰中出了極大的力量，使中國所「傳」的勝利早日來到，許多人就不免遺囑想，美國對抗法西斯既出了這許多力，當然堅決反對法西斯無疑，既然反對

法西斯，當然是民主自由進步的標準國家了。因此不免得出一個極其自然而其實太過簡單的結論，認為凡是站在民主自由進步的立場上的，美國一定會引為同調，換言之，對於一切民主自由進步的事業，美國一定無條件予以支持的。我說這個結論太過簡單，因為許多人把「美國」這個本體看得太過純粹太單純了。美國人自己早已承認，「美國」是一個太複雜，裏面什麼真金銀銅都

買賣流通，又必然相應引起人民的轉移變動，結局，這個社會的政權，便隨時要感到根基不穩固或太不安定的危險。

不論是王公，是官吏，是巨族，是豪商，乃至是大僧道，他們歸根結底，畢竟是與這種社會統治最休戚相關的人，讓他們這批人分途佔有大量土地，形成各種各色的莊園，把「浮游的地客」，用各種各色的方式和條件，束縛在他們的大地產上，莊園上，那就無異為這種社會的鞏固統治，憑添了一些安固定着的力量。這使我回憶起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納粹德國新官僚們的統治花樣來；他們依所謂「帝國世襲農場法」(Reichserbhoftgesetz) 造出的「世襲農場」(Erbhof)，就曾明號大召的說是要造成一種定着於土地的階級，使他們全權主義的統治，得到更堅實的保障。當然，我們唐代的官僚專制君主們，顯然還不會進步到具有這種認識。但「利害也往往使人智慧」，這樣的打算，定也會出現在他們的一深謀遠慮中。

可是土地的過分集中，莊園的無限發展，又將引起政治上否定集權官僚統治的作用，和經濟上倒退往自然狀態的不利傾向，所以，把極有彈性的租稅體制作為一個調節的槓桿；在原則上不讓步，有土斯有稅，有人斯有役；而在實施上不持堅，擇其可稅者而稅之，就其可役者而役之。那就成了恰到好處和面面兼到的靈活妙用。

其實，何止在租稅方面，官僚社會的矛盾的矛盾的本質，在任一場合，都會加強講形式，不肯過於認真，不能過於澈底的官僚作風。

有，是否能溶化成為單純的東西，那是美國人自身的問題。我們外人倒可以根據它內容的多樣繁複性，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看出幾個不同的——至少是兩個不同的——「美國」來。怎樣兩個不同——甚至相反的「美國」呢？從何處看出來呢？

在宣布杜魯門主義的同時，美國會衆議院的「非美國行動調查委員會」便開始活躍了。這個委員會首先對政府機關學校「行動」起來，把一切認為「非美國行動」的官吏與教師都一律清除出去。後來又把這一「行動」擴大到好萊塢

，因而引起了軒然大波，在「美國進步公民」組織的主持之下，五十位紐約劇場演員、作家、導演所組織的代表團，特地飛到華盛頓，準備在法庭偵訊十九名好萊塢的被認為「有問題」的電影從業員的時候，示威性地出席聽審。結果使該委員會突然終止審問。美國產業職工大會主席羅萊會致函國會各領袖，猛烈抨擊該委員會，認其「行動」為「在最近一次戰爭中成為我們敵人的警察國家所特有的一種思想統治。」

從這些事態發展中可以看出，在美國國內顯然存在了兩個互相反對的「美

「至少從支持「非美國行動委員會」的美國人看來，已經有了「美國」與「非美國」這兩個敵對體存在着。同時在反對這個委員會的美國人看來，那些支持該委員會的人才真是反對美國傳統的，才真正是「非美國」的。」

現在支持「非美國行動委員會」的這批人所標榜的是美國主義；凡是違反美國主義的，即被認為「非美國行動」。這似乎像一加一等於二，再簡單明瞭不過了。可是令人胡塗者也在此；因為什麼叫做「美國主義」，又誰也不能明確地說出來。

最近大公報轉載了一篇哥倫比亞大學史學教授康梅傑的文章（題為「誰忠於美國」），載十一月十二、十三日大公報），其中有許多材料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那些支持「非美國行動委員會」人們所標榜的「美國主義」究竟是什麼內容。

康氏舉了三個例子，其一是「路易斯夫人」是講講蘇聯就被人認為是攻擊「美國主義」。其二是，「美國藝術家聯合會」在希特勒進攻蘇聯後，曾寫了一封信給羅斯福，請求協助蘇聯和英國；班西安曾在這封信上簽過名，因此班西安所作的畫也被認為「非美國」的，其三是 Survey—Graphic 雜誌裏有一百二十九頁的內容「顯然企圖消弭南方種種分化的習慣」，因而寫這些東西的人都被認為「愛管閑事而又非美國的仇恨和罪惡的煽動家」。這三個例子還不過是所謂「美國主義」的消極面。那些支持「非美國行動委員會」的人們究竟打算把「美國主義」安進什麼內容呢？康氏更明確地指出：

「一意孤行的把美國主義和某種經濟實施制聯在一起還有一個危險。許多有學問的經濟學者預測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次和一九二九年一樣的經濟崩潰。如果把美國主義和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等處置觀，等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倒了，美國主義又將如何呢？如果忠誠和私人企業成爲難捨難分，私人企業失敗之後，又將如何保存忠誠呢？把美國主義和某種經濟實施制聯在一起的人們担當着一個嚴重的責任，如果這個政綱失敗了，他們使美國主義也有分崩之虞。」

這裏顯然指出了有兩個美國存在。一個是企圖把美國主義與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與私人企業，與某種經濟實施制相結合。這些是什麼人呢？他們是藍金之流，畢爾包之流，美國革命女兒會的職員，軍人會和全國製造業協會，羅斯福之流和麥可馬克之流，換言之，便是支持「非美國行動委員會」的人們。可是從另外一個美國的人們看來，藍金之流其實「譏諷了獨立宣言和人權法令，他們致力於鼓勵種族和階級的仇恨，他們想摧枯美國的精神，他們想種人懂得什麼忠誠？真的，他們又何嘗了解美國？」換言之，藍金之流雖標榜着美國主義，其實倒是根本違反美國主義的。

康氏說得好，假使讓美國歷史上的英雄們給「非美國行動委員會」考驗一番，恐怕沒有一個能及格的。

「誰能夠通過他們的委員會？華盛頓不能，他是一個叛逆者。傑弗遜不能，他寫過一切人都天賦平等而他的格言又是「反抗暴君就是服從上帝」。甘利生不能，他公開焚燬了憲法；溫德爾斐利普斯不能，他到處替剝削者說話而自認是個哲學上的無政府主義者；相信更高的法律的西華德和主張種族平等的索納也都不能。林肯不能，他忠告我們不要對人懷惡意，要對一切人慈善；威爾遜不能，他曾警告過我們的國旗「不但是代表意見自由，也是代表政治自由的國旗」。何莫斯法官也不能，他說過我們的憲法是個實驗，而當這個實驗正在進行中時，「我們永遠應該提防任何阻止發表意見的企圖，即使這些意見是我們所憎惡的是我們所認為充滿了死氣的。」

現在正是藍金之流的美國高坐在法庭上面，左手擎着「美國主義」的旗幟，右手揮着鞭子，而被告欄內却坐着華盛頓傑弗遜林肯之流的美國，以叛國之罪被檢舉審問着。而那面「美國主義」的旗幟正是法官從被告手裏奪過去的。

九月十一日華萊士曾在紐約麥迪生廣場向二萬餘聽衆說這這樣的話：

「美國現行的外交政策是借了自由之名替反動辯護。他的真相愈快表露，我們避免戰爭，避免備戰的巨大代價的機會也就愈好。」

「共產主義的路不是我的路，但我要對恐共的自由主義的朋友們，指出簡單的兩點：

「第一，我們不能用武力或立法來壓抑思想，倘如這麼做，我們就等於自動表示了對民主方法的缺乏信心，表示

我們對於我們制度繁榮生產的能力毫無自信。

「第二，如其我們認爲與共產主義不能並立世界，那等於是接受了自衛戰爭的不可避免性。」

「我不相信神志清明的民主的人們，能夠接受這樣的結論。」

這便是被告欄內，華盛頓之流的美國的代表申訴。假使這些申訴被判爲「非美國」的話，那只是說明了華盛頓傑克遜林肯之流的美國非藍金赫斯脫麥可馬克之流的美國而已。

我們中國許多人心目中的美國究竟是哪一個美國呢？我們引爲民主自由進步的同調的，我們認爲無條件支持民主自由進步事業的，究竟是那一個美國呢？假使說是藍金之流的美國吧，那麼華盛頓傑弗遜林肯之流不正是民主自由進步事業的英雄麼？爲什麼他們的「美國」會坐牢被審問呢？在藍金之流的美國正對於華盛頓傑弗遜林肯之流的國內信徒們以叛國罪起訴的時候，對於國外信徒們忽然會同情起來，還不是太稀鬆了麼？假使真有同情的表示，那也不過是翻臉手段騙騙國外的蠢獸子們了。

西遊記上的唐僧虔心誠意地向西天拜佛求經。他的一心想，只要望見雷音寺，便是聖地了。不料怪冤便利用了這一點假設了一個雷音寺，把他騙了進去，要把他蒸來吃。世間原來有真假兩個雷音寺，這是唐僧所想不到。可憐他肉眼凡胎，見佛便拜，結果不特拜取不到真經，險送了自己的性命。

美國是有民主自由進步的傳統的，誰亦不能否認。可是今天這座金碧輝煌的民主廟堂內究竟坐的是真佛還是假佛，倒得弄弄清楚。假使真佛已經進了廟，那麼拜佛進香的就得小心一點，切莫上當。

一個公務員的談話

與 稷

翻開近來的報章雜誌，幾乎天天可看到關於公務員的文字。有的仗義執言，激昂慷慨；有的報導真實，字字血淚。在戰鼓聲中，這可算是個小小的插曲。我這裏把我和一個公務員的談話記錄下來，卑之無甚高論，更談不到立言垂教，也只是湊湊熱鬧而已。

公務員的典型

我認識一位公務員，姓李，姑隱其名。他是我的長輩，也是我的朋友。在重慶時，他有次對我說：

「幹公務員幹了二十年了，公家的油，我連五分錢郵票都沒有借過。」

我相信他的話。李先生為人，稱潔自好，極不含糊，而且奉公守法，吃苦耐勞。那時他在什麼經濟作戰委員會工作，着實立了點功勞，還因此得到上級召見，頒給獎章呢。雖然，我覺得他未免迂闊了點，開玩笑地稱他為「公務員的典型」，而且說：

「過五十年，過一百年，你是標準的公務員。但是現在，你一輩子出不了山。」

一別數年。某天，在街頭忽然碰見了。瘦得同甘地一般，拉拉手，什麼也不談，只說：

「老弟，我想通了！」

「怎麼想通了？」

「算我混帳王八蛋，自己打自己嘴

巴！幹公務員道玩意見，仔細想想，就是幫兇！」

我一聽，知道他必定有一肚子牢騷要發，就拉他進了咖啡館。

「高不攀，低不就」

一坐下，他就告訴我：「我的姪子，那個進幹訓團的，升了處長了。前天他來看我，那麼得意忘形，好叫我生氣。我罵他：『你有什麼希奇！你這樣人，給我倒洗腳水都不配！』你猜他怎麼回答，他捋捋袖子，把手錶露出來：『

大叔，你看看這錶，短針走一圈，十二個鐘頭，長針走一圈，一點鐘。』他是說他跑得快，走捷徑，趕上我了。我現在是個幫辦，論地位，處長和幫辦也差不多。可是他個什麼樣的處長呀，專做那些喪盡天良的事情。我就罵他是幫兇。他可回答得更妙了：『大叔，要說我是幫兇，你也一樣是幫兇。做公務員都是幫兇！』……我當時和他爭辯，可是後來想想，他的話真說中了要害，吃公務員這碗飯就是幫兇。」

我想他一定是因為老不升遷，所以牢騷滿腹，就說：「你也想法走走捷徑吧！」

「走捷徑，談何容易！而且單是爬得快也沒有用，主要是要能打通貪污的圈子裏去。這却不是我們的事。我既不願意，也不能夠。我研究過了，要打通

貪污圈子，靠四種關係：第一是裙帶關係，像女婿、小舅子之類，就可以做總務，管會計。第二是黨團關係，像我的姪子就是。這已經比裙帶差一點了，不過同流合污，總要互相包庇。第三是歷史關係，同鄉、同學或同事多年，看你靠得住，可以做幫手，也可分給你點好處。第四是利害關係，如你是上級介紹，他不敢得罪你；或者你有點小聰明，會得扯他後腳，他就有所顧忌；又或者你會趨奉，逢節送禮，陪他太太打打麻雀；……如此這般，你也就可以檢點牙齒縫裏漏下來的渣滓。』至於我這樣人，孤芳自賞，而又沒有背景。俗語說：『朝中無人莫做官。』捷徑又在那裏呢？所以我真是：『高不攀，低不就』。」

「怎麼又是低不就呢？」

「當然是越就越低了！待遇越來越壞，生活越來越苦，已經可說是晉羅階級了。可是我告訴你，我是公務員，我是小市民。公務員是永遠不會同工農似的鬧革命的，因為這是個寄生的階層，最沒有力量，是小資產階級中最保守的。公務員是什麼？公務員就是狗！狗要對主人忠心，搖搖尾巴，裝裝笑臉，才有飯吃。主子有時罵你，而且不給你吃飽，當然也使你滿肚子氣。可是拿塊肉骨頭逗你一下，你就又生幻想了。」

「你太過分了！我敢說，現在的公

務員百分之九十九對現狀不滿，不滿就是一種反抗。問題在於組織，有組織就有力量。你看法國的公務員有全國性的組織，一決罷工，政府就嚇慌了。」

「可是中國就不行。第一，中國的機關大半還帶行幫色彩，各自成小集團，就是同一機關，主腦一換，一朝天子一朝臣，馬上又換另一幫了。這樣，你又怎麼能作組織性的反抗？第二，正因為是行幫，所以主腦人一定大量引用私人。誰不安插幾個耳目在他的機關裏呢？你要組織，要反抗，他先發制人，早把你各個擊破了。第三，中國的機關又最官僚化，那種機械的工作，等因奉此這一套，每天在板檯上消磨八小時，極易使人失去朝氣。幹上幾年，一有惰性，養成得過且過的習慣，這一生就完了，還談什麼革命？第四，公務員又多半是中年人，有家室之累，不免瞻前顧後，考慮很多。現在找職業這麼難，要一關，把飯碗敲碎了，一家老小怎麼辦？第五，中國公務員的思想，又是繼承着中國士大夫的哲學發展來的。有的明哲保身，『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有的講黃老之術，用陰謀詭計，徵伴圖進；又有的混混沌沌，簡直無頭腦可言。至於革命的理想，那是沙裏淘金，極難發見的。」

公務員的哲學

「可是我看你就頭腦很清楚，頗有點革命的思想。像你這樣的人，在公務員裏想必也可以發現不少。」

「那當然不少。但是我革命嗎？並不！我只是還喜歡動動腦筋而已。而且我的思想，也並不能代表一般的公務員。你說過我是公務員的典型，其實是過譽。真正的典型，我倒發現了一個。那是我的同事，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物。他說他致力於公務員哲學的研究，已數十年了，結果却只得了兩句話，八個大字：『非巧即盜，得過且過。』這真可說是天才的發明，公務員的人生觀，八個字實在已概括盡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你解釋一下。」
「其實這可以更簡單，只需兩個字：『厚黑』。厚黑學這本書，把中國幾千年來官場的玩意兒，歸納成了幾條簡單的規律。半部論語未必可以治天下，半部厚黑學却的確可以混飯吃。非巧即盜，也就是這意思。做強盜，要良心黑。白刀子送，紅刀子出。殺人千萬，眼睛一睜不眨。做乞丐，要臉皮厚。這種討飯的精神，著實可以學習。你說給他伸出手，你說不給，他也伸出手來。釘在店門口，同石臼一般，怎麼也攪他

其身的法子。做公務員，要記得三句話：『無事不找事，有事就推辭，遇事再請示。』沒有事，你切不可太熱心，去自尋麻煩。只整天呆在辦公室裏，抽煙，喝喝茶，翻翻報紙，把日子混過去算了。有公事來了呢，推辭，『事關什麼什麼，相應轉致貴處查照辦理』，會計推出納，出納推事務，……轉來轉去，時間性失去，說不定文件中途丟了，就萬事大吉。最後，萬一終究推到你頭上，真逃不了，那就只好擬個計畫大綱之類，向上級請示。科員請科長的示，科長請處長的示，……一層層請示上去，又不知何年何月才批下來哩。所以，牢記這三句話，不但會出岔兒，而且可做到『案無積牘』。如此得過且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小公務員們就把這一串平凡的日子敷衍過去了。」

兩難論式

「這八個字的哲學，的確有點道理。但我也都是憤激之言，根底裏還是對這腐敗的官僚機構不滿。不滿，却又脫離不了，所以只好隨波逐流。可是無論非巧即盜地求發達，無論得過且過地混日子，結果還是在促使這官僚機構更腐化下去，在拆政府的台。」

「當然在拆台。公務員本來是這台台的磚塊和木條，現在他却同白蟻一般在做蛀蝕工作。這裏面就包含着Dilemma。真的，現在一切都是Dilemma，一切都是兩難！別的不談，單講待遇問題吧：就政府方面說，在『動亂』的大前提下，你說調整好，不調整好？不調整，公務員心裏直嘔吐，白蟻的蛀蝕工作越發做得快一點，真是你所謂不

滿就是一種反抗。這樣，後方不穩固，也影響前方。那末調整吧，痛痛快快地照生活指數發薪，可是這樣一來，國庫忽然增加一筆大支出，不但使通貨如速度膨脹，而且也影響到買軍火和發兵餉的錢。所以調整也不行，不調整也不行，這是政府的兩難論式。而就公務員方面說，在待遇這薄非薄的情形下，你說幹下去好，還是乾脆不幹好？他老不調整，即使調整，也同烏龜一般，總趕不上物價。你說大聲呼喊，提出要求好，還是乾脆閉聲不響？這也都是兩難論式：呼喊，要求吧，在總動員令的大帽子下，極易受處罰，被開革，甚至忽然自行失蹤。咬緊牙關，悶聲不響吧，那又實在生活不下去，更無庸說『仰事父母，俯蓄妻子』了。公務員這玩意兒，真是同雞肋一般，嚼之無味，棄之可惜。我們機關裏流行着幾句幽默的話：『一家數口，兩袖清風，三餐不飽，四肢無力，五內俱焚，六親無靠，七竅生烟，八面無光，九腸迴轉，實無十全之策，理應呈請辭職，懇即照准為荷！』那末理應辭職了，可是我剛纔已經說過，現在找事這難，辭了職，又那裏去喝西風？——所以一切是兩難！這國家就是兩難的國家，這時代就是兩難的時代。東也不是，西也不是，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反正死路一條，完蛋大吉！我悲觀得很！」

我們在咖啡館的談話，至此為止。當時，我完全為他的絕望的語調壓倒了，找不到什麼話和他申辯。到今天，當我重溫回憶，把談話記錄下來的時候，那『兩難，兩難』的聲音初度刺如絕食後的甘地一般的幽厲，還生動地在我耳目。

「？麼什吃們我叫」



英 集

北平各方對民盟解散的態度 and 看法

文琪

民主同盟被內政部宣佈為非法團體以後，所引起各方的反響，很可以為中國的政治局面和各方人士的政見作一個明晰的寫照。

就民盟本身的力量而論，在國內除了京滬以外，就要數到平津。民盟的盟員，在平津并不少，可是這裏有着許多自由主義者的教授，其中一部份就是民盟的盟員。而北方自由主義者教授在今日輿論和政局上所起的影响，其重要不僅及於國內，而且達於國外，這是衆所周知的事情，因此北平各方對民盟解散的事件都相當重視。

官方的態度

從內政部的宣佈到民盟總部發表公普這一段期間，官方的態度大體上是很一致的。在北平，無論市政府、警察廳、憲兵團、警備司令部等等機關，都有過許多大同小異的口頭上及書面上的談話發表

，說要嚴格取締，不過在未奉到命令時，只要民盟停止活動，就可以暫時無事。實際上民盟早無活動，因此一切意外的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但據說北平各公私立大學都接到當局送去的「黑名單」，要學校當局注意，并希留意出具體的處理辦法。各校當局因之大為頭痛，都曾集會商討過。據傳商討的結果是「盡量保護」，最近還可能共同為這問題集會來商議怎樣「保護」。

在天津，除了像北平官方的那一套談話外，警備司令部還宣稱，天津的民盟盟員人數及活動情形，當局早已清楚，限定要在十一月十日以前按「後方共黨人員自首辦法」去辦理登記手續。那時民盟總部的公普還沒有發表，自然也沒有人去「自首」。

兩種「看法」

五月三日，北大、清華、燕京三大大學四十八位知名的教授發表了一篇「

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正因為他們都是國內聞名的學者，有着別具慧眼的看法，才受到重視。當然也有人看得不順眼。上面有許多話都是能背人所不敢言：「今政府壓迫民盟之舉，實難免於「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之詬病。充此而言，勢必至於惟依附政府之政教始能活動，惟順從當局之人士始得自由。一不合作，遂謂之「叛」，稍有批評，遂謂之「亂」，又且從而「嚴」之，試問人民的權利何在？人民的自由何在？……我們還願意尊重進其忠言：對於一個持異見的在野政黨如民盟者，橫施壓迫，強加摧殘，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舉動。……」在一長串文字之後，還向政府嚴正陳言三點：（一）重作決定；（二）倘民盟解散，不得稍有騷擾人權；（三）恢復集會，實已容人

發表以後，河北平津人民自衛委員會立即發表宣言，題為「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的看「法」，并電請國府及行政院對周炳琳等予以制裁。自內政部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以後，一直對此事件保持沉默的天津大公報，這時便替這宣言安上的標題是「憤激的宣言」。這篇宣言的確是「激憤」的，其中有這樣的警句：「我們恨，恨政府太容忍，反對的意見，我們怨，怨政府太「恢宏氣度」了。同時我們更恨，恨政府處置民盟太晚太輕，更怨，怨政府把民盟民膏供養一羣專門罵街，祇會風涼，使人民更悲慘，使國家更危險的「自由國民」，——用全國國民自由，造成四十八個「自由國民」。我們要革命，逼得啞叭自己說了話啊！」這是宣言最後的一段。

就在這宣言刊在報上的那一天，華北學聯為浙大子三主辦了「追悼示

威大會」，許德珩送去一篇書面演講稿，其中有下面幾句話：「今天，我們四十八個人被人罵了，社會上的情形，我們大家都懂得得很清楚，今後，不僅全北平的學生要團結起來，全北平的師生也要團結起來，為民主而奮鬥。」

從民盟裏退出來的民青兩黨，不敢說是幸災樂禍，但至少是有點沾沾自喜，沒有被宣佈為「非法」。

青年黨、民社黨

青年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陳德武對於民盟的被宣佈為非法有過這樣的意見發表：這是政府主權的問題，而非黨爭問題，為鞏固社會治安，政府自有此權利；民盟勾結中共若屬事實，則政府這樣的措置實為正確而且必要；青年黨一向的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至於民盟是否為國賊，尚不清楚；民盟以前排擠青年黨，青年黨此時既不願有所表示，亦不願加以報復，主要認為是純係政府

主權問題，決不是黨派之爭，而且是政府為鞏固治安而出的措施。

民社黨的負責人曹聚仁已到南京去，還未回來，所以我們還不會聽到他們的高論，總來也不會和他們的難兄難弟相差得太遠吧。

至於民社黨革新派方面，在正式發表意見以前，曾有梁秋水作如下的表示：這次政府對民盟的態度，民社黨革新派對此仍保持沉默而不願發表任何意見，至革新派內部雖然有民盟人士，但佔極少數；除張東蓀先生是民盟人士外，或尚有孫寶毅，此外則不詳；革新派亦不便因政府此次措置而請民盟人士退出革新派，但革新派中的民盟人士是否自動退出，那是個人的自由。

到十一月六日，民社黨北平市黨部整理委員會才發表伍憲子、沙彥楷代表革新派發表的聲明，認為這是應該平心靜氣與公開研究的一件大事；政府既決心走上民主建國之路，則對所有民主自由人士皆應抱寬大容忍態度，愛護之，培植之，而不應予

以歧視與權殘；民盟中即有非法份子，亦不乏真正民主自由與公正進步之士，自應公允慎重處理，以保存國家人才與元氣。

民盟自己

民盟本身，在公告發表以前，一直都很慎重而鎮靜。張申府劉清揚夫婦，本是民盟華北總支部和北平盟務的負責人。在那幾日裏，劉清揚仍在家裏爲他的幾個孩子縫衣服，張申府則整理和書寫書局打交代，蒐集古書，準備籌建一學術機構以紀念他的尊翁。其他在各處的盟員也沒有任何表示。但據天津益世報載，十月廿八日晚，民盟華北總支部北平市支部各負責人曾假某大學教授家舉行緊急談話。

等到張稱的通告發表以後，張申府曾就此事說明幾點：自從政府宣佈民盟爲非法團體以至現在，華北盟員并無任何人受當地政府之任何監視。民盟華北支部事實上早已沒有活動。華北盟員總數不到三百人，以平津兩地而論

，北平還不到一百人，天津只有二三十人。

除張申府外，民盟華北負責人尚有張東濤，他兩人的會面還是在十月十四日北大哲學會上。最近已好久沒有見面。張東濤在滬大有事，忙得很。張申府正在寫一篇「科學方法與科學組織」，另外還從事翻譯，主要的有「高等代數學」等書。他說，一個在城內，一個在城外，返往不便，而且事實上無事可談，開會尤不可能。

關於周炳琳等人發表的文章，他事前不知道。這回事，他在民盟立場對那篇文章不便發表意見，但站在個人立場是很感激他們的同情與支援的。

最後，在六日的晚上，張申府發表了書面的通告，正式宣佈了民盟華北總支部的結束，除通知停止一切盟務活動外，并對華北當局的開明與民間的同情表示感謝。直至目前爲止，民盟的事情似乎已經算是過去了，但「黑名單」的風聲仍一起一伏的在古城中流盪着，只有讓以後的事實來證明今日的傳說罷！（北平）

石家莊之役結束以後

凌華

一星期來，學生已經沉默休罷了，人們注意的目標不再是學潮，也不是報紙上大字刊載的懲食問題；奪去了全體市民的注意力的，不是大選，也不是蘇聯獲知原子彈秘密，而是一步一步逼上頭來的戰火。石家莊失守的消息使天津二十天來陸續上漲的股票忽然猛跌兩成到三成。我們由此可見戰局對人心的影響。

石家莊失守

石家莊的失守，當局雖然（根據公開發表）處之泰然，但是對北方一般市民却是一個震動。石門是平漢，正太，滄石三條鐵路的交點，接收的時候並無損失。直到去年年尾，平漢路保（定）石（門）一段雖告中斷，但是無論如何，老百姓總不以爲國軍會放棄石家莊的。根據各方面的傳說，好像政府也沒有減縮石家莊公務機關的規模的打算，例如石

家莊現在還存着六十幾輛火車頭，和一千多輛車皮，以及大批的預備用來修築保石段鐵路器材；據有五萬紗錠的大興紡紗廠並未停工，千餘噸的棉花和大量的棉紗也沒有運出來；華北唯一的井陘鍊鐵廠有一萬多噸的焦炭和近二萬噸的存煤，並沒有停止鍊焦工作。其他如著名工廠也沒有停頓，所存汽油在一萬加侖以上，甚至一向以嬌嫩出名的國家銀行人員及其眷屬都還沒有撤退。不料六天激戰之後，就情況不明了。

石家莊失守的原因，據北平行轅宣稱，是「衆寡懸殊」。南京新聞局則說「主力已作戰略轉移」，那麼爲什麼把主力轉移掉了的呢？事關軍事秘密，沒有人知道。石家莊和平津民間雖屢有傳說，但都無法證實。據傳說，十月中國軍曾得到情報，保石段義榮榮部共軍已經他調，天津民國日報且曾刊載此消息。根據這個情報，

國軍就擬定了打通保石段的計劃。另一個傳說在石家莊甚爲流行，據說石家莊一部份國軍北上時，路過一個小村鎮，軍中情報員曾說這一個村子不能住，但國軍因爲人困馬乏，不願住在郊外，所以還是住了進去，不料半夜裏地道中鑽出大量共軍來，兵不血刃，羅軍長以下全部失陷。這一個傳說的可靠性我們無法知道，因爲共區的「地道」一向是被神話化的了，有的說廚房的鐵鍋下面就是地道，有的說茅坑邊上就是地道。不但老百姓如此說，上過前線的軍人也如此說，所以凡是有戰鬥經驗的人們總喜歡造一點地道故事，也許根本是附會亦未可知。

總之，石家莊只有一個團的兵力了，連同三十餘縣的團隊（石莊共有兩個專員公署，三十幾個流亡縣政府），才一萬多人。後來據說又空運了一些兵去，所以新聞局說有兩團守兵。在守兵動員民仗

挖掘戰壕的時候，傳說市郊的共軍就在收購糧草和麥稈，收購了五六十萬斤之後，攻勢便開始了。五日有小接觸，十一日下午六時，電訊中斷，情況不明。其後的消息都是空軍偵察來的，一切都憑着偵察者的眼睛，我們也只有相信之一法。據說「共軍共軍若干萬」，但國軍也沒有突圍而出。

我們不妨再轉引天津益世報十一月十四日蔣主席在國務會議的報告：「石家莊失守，並不重要。因平漢線既不能暢通，石家莊當不如昔日之重要。該處物資雖有損失，但國軍在膠東奪回之器材機器鋼板等類可補此損失。國軍現在戰略，在華北東北僅圖控制北平平綏兩綫，大部兵力則集中消滅黃河以南共匪。」

希望和幻想

由石家莊令人想到榆林，榆林由前西北軍的鄧寶珊守衛著。鄧上月來過北平，他對人說，共軍第一次攻榆林之前，曾經開過一次會，討論是否進攻榆林的問題；當時共軍中有一部份人認為鄧寶珊雖不革命，但也不反革命，主張不打榆林，但是另一部份則認為榆林重要，不可不打，到底還是進攻了，但是並沒有成功。這一次的攻勢也是乘榆林守軍減少，可是動員的共軍並不多，也許只想牽制傅作義的隊伍而已。今天北平傳說昨天有一架載了榆林軍政人員的飛機在榆林附近被擊落。北平所能得的也不過是這類一紙一節的消息。

却說在東北六次攻勢之後，他的軍隊可能調來北平，圍內一段來「剿匪」，這種估計恐怕失之忽略。地方情形，傅本身是否願意還是大成問題的。察綏的軍事所以能成功，全靠一套反共政治的配合，而那種封建氣味很濃的反共政治，也只有在小圈子中還可以實行。

但是政府對傅將軍抱了很高的希望，張學良次北來就曾被過張家口。在張學良之前，大公報總經理胡霖到張家口去，據說在對傅作義幹部講話時，居然哭了起來。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人，要到這種舊式軍隊前面去我寄託我，那也未免太可憐一點了吧。但是竟還有人就這般地幻想著，希望着。今天的要求已由底定華北退為保守平綏北甯兩條鐵路，明天又會如何呢，傅作義的六軍人馬，不能夠派多少用場。鐵路被切斷時便利了城市，城市像棋子，一個個的被圍了起來，自然也有被吃掉的可能。

前次西安吃緊時逮捕了一千多人。而這次繼北平的逮捕之後又引起了天津、瀋陽等地的逮捕，在瀋陽

方面還有中正大學一個數，用不到說，就可以想知的。平津的教育界文化界

，一方面饑饉難耐，一方面迫害打擊隨時隨地（北平書店有的封了，有的屢次查抄，有的奉令禁售生

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的出版物），真是暴風雨將至了吧？（十一月十四日寄自北平。）

水災兵禍之下的安徽人民

杜漸

在內戰打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一般貧苦人民的災難和疾苦，倘若仍用「哀鴻遍野」「餓殍載道」或「水深火熱」之類的詞句來形容，似乎已經不夠動人了。目前的情形，已經嚴重到人人不能生活（除了少數的貪官污吏豪商巨賈而外），人人都感到沒有勇氣掙扎下去了。古人有所謂「哀莫大於心死」的老句子，頻年越打越兇的戰爭已經把人們的心給壓死了。對於現實，他們幾乎感到絕望。

一個數字確實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但究竟精確到什麼程度，則不敢斷言，可是我們相信官方在這一方面是不致於有所誇張的。列在那數字裏面直接受「水災」和「匪災」之苦的，固然不能活；試問間接受其影響而且根本就在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昂的輾轉之下的人們，又有幾個活得下去呢？

出省；著名的米市場的蕪湖與蘇州市場的蚌埠，都是皖省食糧運銷的集散地和吐納口。沿江及巢湖流域的魚米之鄉，以及長淮兩岸的肥沃的黑土地上，到處都是糧食的寶藏。

中農銀行拋價收購而促成的，如蕪湖的米價原只八萬元一担，因其拋價收購的影響，一日之內陡漲三四倍之多，於是使一般升斗小民無處購得，而大量的食米則流入運商之手。這種人為的米荒激怒了社會其他各階層的人們，連一向只知道發表「擁護」或「響應」通電的議員們，居然也發出了正義的呼聲。

「第二糧食倉庫」的崩潰

安徽在地理上的自然條件，不能不算是優厚的：形勢險要，襟長江而帶淮河，山脈起伏，河流縱橫，土地肥沃，出產富饒，號稱我國「第二糧食倉庫」。在太平年間，糧食產量之豐，每年除供全省食用外，還可以大量運銷

可以說自中國農村經濟開始崩潰的那一天起，農民離村的意向和行動便一天比一天厲害了，現在更加上征兵拉伕的威脅，又是不可收拾。壯丁一天少似一天，生產力便逐步衰退。近數月來，內戰的烽火燃遍；全皖，許多的田園任其荒蕪。所謂「第二糧食倉庫」也者，焉能不崩潰呢！

最近安徽省社會處發表了一個驚人的數字，說是皖省受「水」「匪」兩種災害的區域已達四十餘縣，受災害的人口除皖南十餘縣不計外，已達九百四十一萬七千，論面積是全省的三分之二，論人口則為全省的過半數。這

河水暴漲 田園成汪洋

「堤壩不修河水漲，田園萬頃成汪洋」，這兩句曾經流行一時的歌謠，用來形容安徽的水災，是最恰當不過了。安徽境內淮河流域的堤壩和長江的堤壩，都因為年久失修，每屆汛期，輒即潰成災。尤其自黃河花園口潰決以後，黃水灌入，水災為害益烈。去年皖省東北兩部空前的大水災，從淮河流域到洪澤湖一帶，縱橫千里，盡成澤國，災區遍及二十四縣市，災民達六百萬之眾。飢寒交迫，顛沛流離，一頓悲慘的流民圖，尚活現在人們的記憶裏，而新的災難又跟蹤趕來。根本問題還是在淮城的防汛工程。

內戰打得如此起勁，國家的財政支出百分之八十以上用在軍費上，那末用於水利建設上的究竟能有多少，還是不言而喻的。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我們不能厚責於承辦機關，尤其是那些有良心的工程人員，他們徒勞無功，

然而並無罪過。淮城的防汛工程，如淮堤的修復、支流入口之疏濬、水系之清理，工程都很浩大，非有很多經費不可，過去雖在所謂「軍事與建設並重」的原則下，施工搶修，但畢竟軍事與建設之間實際上不能得到「並重」。須知淮城防汛工程的浩大，絕非單靠民力所能濟事，只一味的注意到發動民力，而對於工具設備一絲不管，則工作效率是極為有限的。譬如正陽關附近本只有一哩長的淤塞，但因人工無法疏濬，迄今仍為隱患，一旦淮水暴漲，又必是萬頃田園一片汪洋了。

這些年來，淮城汛區人民的担負是奇重的。他們除了跟別的區域的人民一樣的負着徵實徵借、服兵役與勞務的担子外，還得為了防汛工程而服役。他們個人都是有苦說不出的。他們的力量已經枯竭了。

今年入夏，因雨量過多，淮河各支流同時汎溢，竟又釀成巨災，蒙受其災難的計有亳縣、太和、阜陽、霍邱、蒙城等十六縣，皖中因山洪暴發而成

災者又有舒城、廬江兩縣，共計受水災者十八縣，受災人民近四百萬，恰當去年水災面積人口的三分之一。

烽火燎原 殃及大江南

天災之後，跟蹤而來的又是「人禍」，是內戰的極度擴大。八月杪，劉伯承部自魯西越隴海路南下，進入皖省西北境，暴風似的席捲了亳縣、太和、阜陽、舒城、廬江、桐

城、懷甯、合肥等十八縣，迄今仍在大別山區，積極從事根據地的建立，不特有久據大別山的可能，最近並積極企圖渡江。十

月底，陳毅部繼劉伯承之後，從豫南永城夏邑間進入了淮北，攻入宿縣、靈璧、太和、阜陽等十縣。綜計共軍劉陳兩部在皖省江北地區出沒的有二十八縣，被捲入戰災區域的人口約八百餘萬人。江南方面原有潛伏的新四軍，因劉伯承部渡江，便顯現了

空前的活躍，現在皖南的涇縣、太平、績溪、甯國、廣德、旌德、郎溪等十餘縣，都是他們的活動地區。

內戰的極度擴大，愈演愈為慘烈，在此來彼去，此去彼來的大騷動中，無辜的人民所經歷到的災難和疾苦，是不堪想像的。況且軍隊的紀律又普遍的不好，只要是其足跡所至之地，種種慘絕人寰的不幸事情必然發生。皖省今日水災和戰災

區域之廣闊，受災人口之衆多，災情之慘重，都是空前的，是歷來所罕見的。政府要施行救濟固然艱難，但這一樁事却又深含着政治意味，所以從中央到省府都不能不高聲疾呼：救濟、救濟！但結果究屬雷大雨小。受災人口太多，那末那龐大數字的賑款？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困難。中央先後已撥發「賑災」救濟費達四十億元，但用之於萬千的災民身上，仍然是杯水車薪，又何濟于事呢？

中央大學師生對浙大慘案的反響

理性世界

中大吳校長在出國之前，留給學生們一句話：進步基於安定。幾週來他們沉着氣在開拓自己曾經的領域，看那擠得滿滿的來回於四牌樓丁家橋之間的汽車以及教室內走廊上的性急情形。他們似乎遺忘了現實的顛覆，盡情在追求一個有意義的理性

世界。

從平津傳來非法捕人的消息，學生們再度感到自身的危殆。中央社發表「民盟違法活動真相」，其中有一段關於中大的歪曲事實的記載，又傷害了學生們的純白與學府的崇高。然而理性終於使他們沉着氣而忍耐下來了。

教授談話

浙大校長辦公室的談話、公報上發表的公報、浙大教授會為學生于子三慘案

消息又傳來了，學生們頗為震動，然仍報以冷靜，等候事實的答覆。這證明在這樣苦難的時代裏的學生，他們的感情經過了錘鍊，已很堅實凝固了。

的宣言、浙大教師的罷教……都給予學生們以極大的刺激和提醒。大家開始走訪教授。下面是二位教授的談話。吳世昌教授說：于案可疑之點當然很多，除如竺可楨氏所談者外，更要注意的，按道理及慣例言，檢驗官之報告對於死傷情節必須明確斷定，而此次報告書則僅稱「尚屬相符」。今天有人既

，予既是共黨黨員，就非有應得，死有餘辜。這是不公平的，也說不通的。在未捕共黨以前，蔣主席還曾與毛澤東一席長談，同登共桌呢？要捕他也得先來個通緝令。在專制時代，賣國奸賊，還須經過三堂會審，然後才驗明正身，擄赴刑場。就說漢奸吧，通敵賣國，罪該萬死，也還有不服上訴，請律師依據有利條件為之辯護的權利。共黨之罪總不會超過漢奸吧？何況未經審訊，罪證尚難確立呢？種種誰都可以說上一套，血腥的事實却只有一個。政府要人民守法，自己須先守法。

該考究考究呀！

賀昌羣教授說：我的意見與報載浙大各校長之談話完全一致。如要辨別是非，亦以笠校長之談話為最佳依據。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是非黑白，凡是人民，皆可發表意見。我們身在南京，對於予君是否為共黨黨員一點，無法確定；但笠校長為權威之科學工作者，與余同學多年，其對浙大政務之熱心，余知之頗深，故余深信笠校長之談話，確係根據事實，毫未偏袒。予君為浙大自治會主席，而自治會之組織又為教育部頒佈之大學組織法中承認之合法組織，然則政府於逮捕予君之先，實應通知學校，撤除其現任職務，而在逮捕之後，尤須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但浙省保安司令部之行動，顯與法律步驟不合，這就是一项根本的錯誤。

同學公論

六七兩日，民主牆上貼滿了各種意見。絕大多數的同學提供建設性的意見。他們要大家提高警覺性：予案不是單在杭州才能發生的事件，而是一個會臨到全國同學頭上來的慘劇的信號。

校方佈告

學校當局看情勢有釀成罷課的可能，自然緊張起來，八日貼出大佈告：「查學校進步基於安定，吳校長臨別訓話，猶諄諄以此為囑。數周以來，同學均能體善此旨，勤勉奮發，洋溢向學，乃比日有少數同學企圖煽動罷課，實極不智。蓋此舉僅有損學業，抑且妨礙學校建設；……為同學學業計，為學校前途計，務希各同學恪遵吳校長於安定中求進步之訓。」

罷課一天

但這些話並未發生多少作用，九百六十餘人簽名要求召開臨時系科代表大會。九日下午，系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三項：(一)為浙大提案聲援，罷課一天。(二)通電全國，呼籲浙大提案聲援，並發表抗議書。(三)要求學校當局轉請政府切實保障本校師生安全。

十一日又復課了，此事遂告結束。抗議書和告全國同胞書還在印刷中，波瀾算是暫時平靜下來了。不過學生們已經有一個堅定的見解：尖刀上沒有真正的和平，口頭上沒有真正的民主；安定的條件沒有建立，便無法產生永久的安定。(十一月十二日寄自南京。)

十一月十五日 航訂讀者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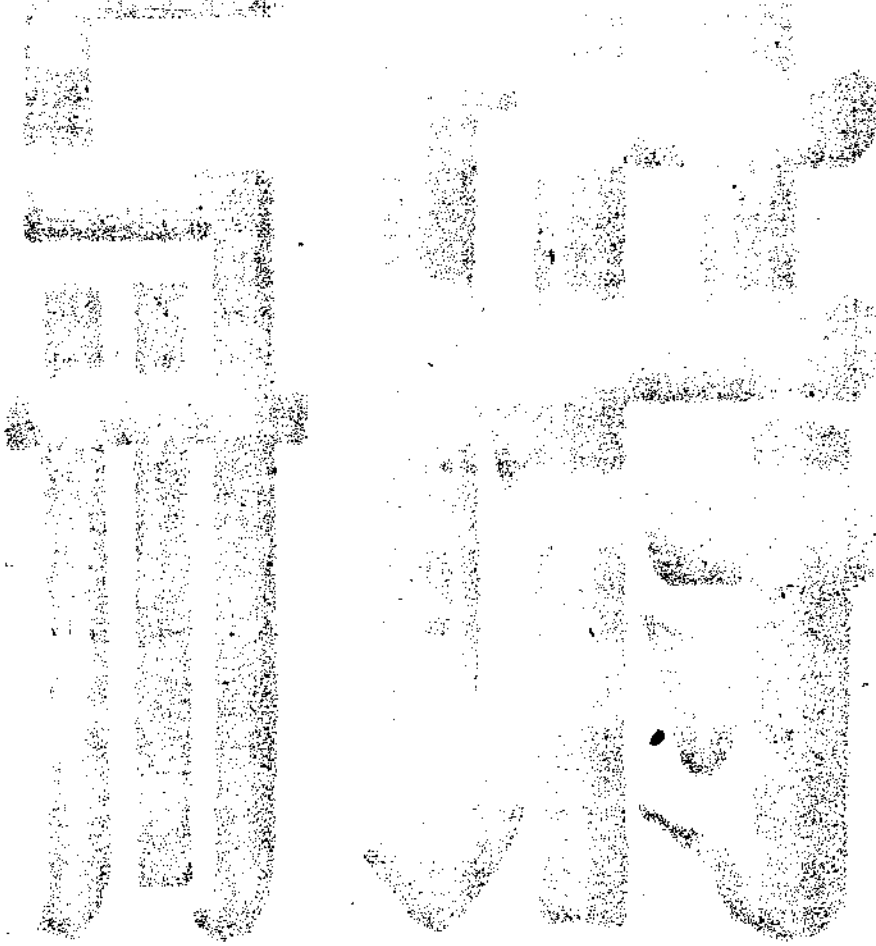
茲以航空郵資漲價，本刊自第二卷第十期起每期增收航郵費一千元，倘航郵訂戶不願自訂費內扣除，請即賜補，不另函告。

時與文週刊訂閱辦法

- 一、本刊採定期訂閱辦法，一次至少三個月，訂閱期間不受零售價格調整影響。郵費漲價，另函通知照補。
- 二、如匯款不便，可購大額(千元以上)郵票掛號寄下，十足通用。
- 三、訂戶儘先寄發，且較另售為廉，外埠讀者尤可不受加成影響。
- 四、訂費務請一次匯足，姓名住址，請勿草書，以免貽誤。
- 五、續訂請註明原訂單號數。

訂閱價目

外國	國內			三個月十二期
	平寄	掛號	航空	
一律	六萬元	七萬元	八萬五千元	
半年美金二元半	九萬五千元			
加	全年	全年	全年	



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湯德明

論民主的法治

與反民主的法治……慶德章

如此「獨立」外交……王寄籬

越南問題……鄭道傳

忠孝仁義解……林布

河北戰區的農村面……一榮

廣州的黃色文化與倒退教育林鬱

浙大被捕學生校友公審記……席人

漫畫……方成·穆企

讀者之聲
大學中的上課制度
北風日日涼
關於「時與文」的篇幅與容量



讀者之聲

本欄投稿簡約

- 一、來稿署名應便，但務請於稿末書明真實姓名及地址，否則不便刊登。
- 二、來稿請勿超過六百字，愈短愈好。
- 三、來稿例不致函，僅以登載該稿之本刊寄奉一冊。
- 四、來稿除附有貼就郵票、寫好地址之信封者外，概不退還。

大學中的上課制度

翁錫益

號稱黑厚教主的李宗吾先生，曾在其著作「考試制度的商榷」一書中，對時下教育制度發表如下的感嘆。他說：「依現在學校的組織，學生的勞力和時間，無謂犧牲的地方太多了，比方這一點鐘功課，某個學生是早已了然，但是鈴子一響，還是要上去坐一點鐘，這就算犧牲了一點鐘的勞力和時間；某個學生程度太差，聽講了還不了解，也要叫上去坐一點鐘，這也是犧牲了一點鐘的勞力和時間。」他又說：「王壬秋先生在四川重慶書院，前後不過六年，只要一個先生，造出來的學生有幾萬專家，八股專家，詞章專家，歷史專家；現在的廖季平宋雲子兩先生，不出四

過去的，而認真看書的時同反只能放到寒暑假去了，多麼無聊！每天在課堂裏呆坐着去筆記教授陣年的講義稿子，而考試的時候又必須逐章逐段的死記硬背。逃課，當然是不可能的，每課教授要點名，若是缺席了三點鐘，就得扣一個學分，缺課了三天以上，就要開除。請假，當然是可以的，但要是超過一個禮拜，也照樣要扣學分。縱使拋開上面那些都不講，即單就效率而言，上課制度也是不行的：每點鐘抄教授的講稿，頂多兩頁，而若是自己閱讀的話，則至少可達三十頁以上。說來也很奇怪，考試時不管把講義稿子看如何滾瓜爛熟，考試後又會忘得一乾二淨，倒是平常隨便走馬看花的讀兩頁書比較多得一些好處。

所以我們大膽作一建議：現在大學裏的上課制度最好取消，代之以自由研究的方針；每一門功課，由教授指定一些必要的參考書籍，讓同學們自己去閱讀研究，教授只從旁鼓勵，誘掖，幫助，因才指導，而在每個禮拜裏則作一次扼要的演講，並考問課

北風日日涼（詩）

不雅詩人

北風日日涼，
枯葉滿階。看家門炊烟繚繞，
柴、米、油、鹽不易找，
那來餘資裁寒裳？
北風日日涼，
擊鼓震天邊，
聽哀鴻聲聲淒訴，
啊！
災、難、禍、害相繼起，
無辜老弱受瘡痍！
北風日日涼，
吹入破落廢墟牆。
開烽烟，殘味未了，
夢、艱、妻、子何處去，
哪日始能團圓？
北風日日涼，
掠過原野疆。
荒蕪田園盡衰草，
啊！
穀、麥、瓜、蔬減痕跡，
那時重聞大豆香？
北風日日涼，
願你吹盡瘴癘傷，
乾乾淨淨，
刮去人間苦與痛，
安樂、愉快，
重過欣喜平安年。
（十一月十九日，汕頭）

關於「時與文」的篇幅與容量

貴刊以前每期二十四頁，現改為每期二十頁。敝人認為減少篇幅縮小內容，在讀者方面實為損失，特函建議最好恢復前狀。如物質條件困難，不妨用小一號鉛字（六號字）期達以前之容量。此致時與文編輯部諸先生。讀者王慶全上言。三十一日，十一月十八日，江蘇。

（答）本刊縮篇幅，是遵照政府紙張節約的法令（周刊連封面在內限二十頁）。我們除選購多用六號字外，並擬將每頁行數增加，以期在容量方面補償頁數減少的損失，事非得已，希望各位讀者諒察。——編者。

時與文

刊週

發行人 程博
編輯者 洪
經理部 上海姑蘇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

湯德明

現時每一個人都在要求着民主，而且政府還在籌辦大選和憲政。但憲政和民主並不能憑空產生，它必須具備適當的經濟基礎。

議會民主與資本主義

以英美的民主政治而言，它是建築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上的。自馬克斯著「資本論」以後，資本主義便被一般人所詬病，其實資本主義原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第一，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由於機械的使用，資本的技術構成提高了，或者說生產力提高了，人可以從自然，從土地獲得解放，由鄉村轉向城市，由農業轉向工業。生產方式的這一改變，伴以生產數量的激劇增加，使人民的生活程度也提高了。

第二，法治精神與個人自由。工業的發達和農業的沒落，象徵着新舊兩個階級的興替，資本家置代了地主和貴族。資本家所生產的是商品，商品之所以成爲商品，能有交換價值，是由於凡百商品都是勞動的體現物，而凡百勞動又都是一般人類勞動。在商品經濟之下，勞動本身也成爲一種商品——特殊的商品，它同樣可以買賣。如此，勞動的等一性和勞動的商品化，便使人類平等的概念確立了。所謂平等，不僅是天賦平等，而且要法賦平等，即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在合法範圍內，每一國民享有種種基本人權，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身體、信仰、擇業、置產等個人自由，國家或政府不得任意干涉，但法律不能是一人法，它必須是「普遍意志的表現」（見法國人權宣言），然後大家才願意共同遵守，所以制定法律時，一切國民都有親自參加或委託全權代表參加的權利，於是產生以普選爲基礎的議會民主政治，這比先前的專制政體當然進步得多了。

同時，男女的社會關係也有改變。由於機械的使用，體力勞動減輕了，婦女也可以參加生產，求得經濟獨立與參政權利，以使男女地位趨於平等。

第三，創意和效率的注重。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徵有四：一是私有財產

(Private property)，二是雇傭勞動 (Wage-earner)，三是謀利動機 (Profit-making)，四是自由競爭 (Free competition)。由於私利的驅使和市場的殘酷，生產者必須想盡方法，改良生產設備，經濟人力物資，以求減輕成本，推廣銷路，於是發明，講效率。由於雇工生產，契約自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工人要時時顧慮到有被解雇的危險，不能不努力工作。工資以時或件計算，則人們對於時間和數字的觀念日趨精確，更有助於效率的發揮。這比之舊日官僚腐化和「差不多先生」的作風自然是大不相同了。

第四，民族主義的昂揚。人類平等的概念和個人主義的作風，不但存在於人與人之間，而且存在於民族與民族以及國與國之間。商品是沒有邊界的，利之所在，無遠勿屆，所以狹隘的鄉土家族等觀念隨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民族觀念、國家觀念。國家不能沒有邊界，國界阻礙着商品的流通。尤其當生產力發達，生產品增加，需要國外市場的時候，不能不有「自由貿易」(Free trade)的要求。工業國向農業國求發展，久而久之，農業國也工業化了。於是工業先進國與工業後進國之間，以及工業先進國彼此之間，都發生市場競爭的衝突，而以國家力量爲後盾，民族主義隨之勃興。民族主義可以說是國家的個人主義 (National individualism)，各民族也和各個人一樣，要求着自由與平等。由家鄉觀念擴大到民族思想，即表明了人類社會的進步。

第五，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孕育。商品生產雖然由個人經營，但却不是以魯濱遜式的方法而是以社會的規模進行的。參加者不只一個人，而有多數人，社會上的人都是互爲勞動，個別企業各種製成品，個別工人的各種工作，都好像一架巨大機器的小螺絲。機器把很多個人的命運聯爲一體。又前文中曾經提及，國家是有邊界的，而商品却是沒有邊界的，國與國、族與族的關係並未因爲國界或種別而疏遠，反而日趨密切。於是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發生了，二者都是對於個人主義的一種反動，一方面是

對小我的個人主義，一方面是對國家的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同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可是却有否定資本主義的可能，因此也就有人認為不應列入功績之內，但由私到公，由己到羣，由部份到全體，似乎是事物之合理的推移，至於某些人願不願意那是另一個問題。

自由經濟的病態

為甚麼資本主義有被否定的可能呢？因為資本主義到後來已發生了種種流弊，而且有些流弊正是由其功績而來。人們只知歌頌英美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而不追問這種提高是怎樣得來的。英美對海外國家的擄取，以及對國內勞工的剝削，都是耳熟能詳的。我們羨慕英美的機械，可是不羨慕機械的資本主義之使用，我們羨慕英美國民的生活水準，可是不羨慕那種嗷人自肥的生產制度。美國商品堆積如山，假如在國內能够平均分配，或用以周濟貧乏的世界，又何至於要把小麥傾倒到海裏去餵魚，或者把馬鈴薯燒上煤油來燒燬呢？我們目迷於大馬路的繁華和紐約城的摩天樓，可別忽視了百老匯的人市和東倫敦的貧民窟！

人們只歌頌英美的個人自由；但這種自由是大多數人所能享受得到的麼？不見得吧。如言論出版的自由，只是少數有錢有勢者所特有的自由，美國報紙便包辦在霍華德系和赫斯特系二者之手。如集會結社的自由，也決不能超越某種財產關係所賴以維持之現行法律社會制度，否則便是違法造反或革命了。如果要實行「和平變更」(Peaceful change)，必須依照合法程序，由普選和議會來決定。在表面上看，人人有選舉權，就應該有相等的政治發言權了，但實際上，由於經濟的不平等，則受教育，被選舉的機會也都不能得到平等，結果國會的議員大多數只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者，要他們投票反對本身或後台老闆們的利益，那是不可思議的。又如擇業置產的自由，在資本主義的盲目經濟力量之下，實際上只是失業的自由，無產的自由。

至於創意和效率，原是自私自利的副產物，因此也只在有利可圖的限度內才具可能，而且在謀利過程中便產生了種種罪惡。利用機器生產，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但因貨增價跌，利潤率（淨益與總資本的比例關係）也隨之下降。這裏有幾個因素可以阻礙利潤率下降的傾向。首先，是工時的延長，工作的加強和工資的減低，淨益得以增加。工人（尤其女工和童

工）被奴役着，喪失了人性和自由，更談不到自動自發的精神。同時由於所得少，購買力低落，不能消費日益增多的生產，於是產生生產過剩的病態。其次，是既成資本的減值。因為新貨比舊貨低廉，所以代置成本降低，無形中使固有設備的價值減少，而工資復因生活資料跌價而降低，淨益得以增加。並且由於既成資本的減值，所以再生產時即使資本價值和原先相同而總資本量也已增加了，這對於擴大生產規模又是一個刺激。何況，第三，擴大資本量，正可以由量來補償「率」。因為利潤率雖下降，但利潤量仍可能維持或增加，只須總資本量能够擴大到相當程度。資本原可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勞動，一部份是勞動對象，即生產設備及原料等。資本擴大時，雖然可以運用更多的勞動，使勞動的絕對量增加，但勞動就生產設備而言，却是相對的減少了。機器和人搶奪職業，一部份人被機器排斥而失業了。於是造成人口過剩的現象，並發生階級間的衝突。又在職業的搶奪中，女子往往競爭不過男子，而被趕回廚房、教堂或家庭，以至娼寮。女人也商品化了，在女人身上可以找尋價值！不過資本量並不是可以無限擴大的，利潤率的下降雖然可以阻礙，可是不能終止，如果增加了的資本，比未增加時得不到更多的利潤，甚至只得到更少的利潤，那就會發生資本過剩的現象了。此時，新的機器便會被閒置不用，資本主義的腐蝕性也就顯露出來。更由於以量來補償「率」的努力，促成了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自由競爭變為獨佔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自由經濟變為獨佔經濟，後者或採取私人獨佔的形態，如美國，或採取國家獨佔的形態，如納粹德國，都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不過納粹資本家在一國家一名義下更為強暴橫蠻而已。第四，是海外市場的開闢。所謂生產過剩，資本過剩和人口過剩，都是相對的，只是生產方法和生產目的，亦即生產擴大和價值增殖間衝突的結果，在另外的情形下，却毋需是不足的。資本家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所以向海外輸出商品和資本，實行帝國主義的掠奪，引起國與國，族與族間的衝突。——這種聚財謀利的個人本位經濟制度，反映在政治上便是集團利益的無休止的爭辯，故單就效率而言，議會民主是大可替議的。

再說到民族主義，也只有適當條件下實行真正民族平等的範圍內才是可取的。但由於民族主義的濫用和被利用，已經產生了種種流弊。如首

次大戰後，「民族自決原則」實施於歐洲，便產生了嚴重的「少數民族問題」(Minority Problem)。因為「血與土」的界限殊難劃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談何容易？就歐洲一地而論，就有三十個以上比較大的民族，交相錯雜而居，如何能够個個自決？少數民族之中更有少數民族，問題就解決不了，因此民族與民族間不能和平相處，反而糾紛時起，被野心國家所利用：一方面，民族主義以對抗國際主義(共產主義)，另一方面，民族敵視，以造成均勢局面。後者尤為英國所常用的辦法，好比巴力斯坦的阿猶衝突，以及此次印度的印回分治，都可以達到「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目的。又如某些國家藉民族主義來推行帝國主義，如帝俄時代以斯拉夫民族為號召，納粹德國視猶狄克民族為選民，過去日本以同文同種相誘騙，以及歐美某些人士誇口「白人文明」，「操英語的民族」，對外實行侵略或對某種族加以壓迫。

民主觀念的蛻變

英美的民主政治及其經濟基礎——資本主義，都是一種進步，但因為經濟起了種種變化，民主觀念也在蛻變中。

過去的民主準則是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但現在的趨勢是：共有、共治、共享。因為民有是很少的，同是民，所有不能均，則所得有多有少，社會有富有貧，並且由於獨佔，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貧富懸殊，「有」只限於少數人，「無」却佔大多數，而事實證明，不能有，即不能治，不能有且不能治，又何能享？故民治、民享云云，實際上只限於少數民有者，或極少數獨佔資本家。由此可知：要共有，才能共治，要共治，才能共享。故談民主，必須着重在「有」的方面，即所謂「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以別於「政治民主」(Political democracy)。二者並非對立之物，而是相輔相成的，並非把政治民主取消，而是將民主擴大及於經濟社會方面，不過必須以經濟民主作為政治民主的基礎。假使在經濟上不能民主，在政治上一定很難民主，即使實行民主，也是一襲偽裝，那就是寡頭民主、獨佔民主，而不是全民政治、平民政治了。

由於對民主已有新的理解，很多國家正朝着新方向走去，這大約又可分為三個類型。一是蘇聯，二是東歐各國，三是英法以及新政時代的美國。

在蘇聯，一切生產工具皆收歸國有，私財限於自用，不得雇工生產和經營貿易，故私有資本絕跡。生產按照計劃進行，不為個人利潤而為全民福祉，供求平衡，全民就業，無過剩，無恐慌。在經濟上可以說是真正民主了。至於蘇聯政治，對於個性似嫌過於束縛，這大約因為一種新政制的建立，難免沒有脫棄過去傳統的強烈傾向，而舊傳統及所處環境對於新事物又往往橫施壓力，蘇聯三十年來手段徹底，神經過敏，每為外人所不瞭解。在此次對德抗戰期間，蘇聯強調祖國之愛與光榮史蹟，戰後並且廢除死刑，各地白俄紛紛返國，這不能說是小的進步。

戰後東歐國家，實行經濟改革，一方面，耕者有其田，另一方面，工者有其廠。而且她們實行這次改革，並沒有發生內戰，實在難能可貴。在政治上，各階層的代表都可參加，又是聯合政府的典型。並且有很多國家，共產黨力量並不大，或者說很小，由此又可以得到一個例證，共有並必然與共黨有關。雖然東歐國家的經濟現在仍沒有超越資本主義的範疇，但由於量的變化，遲早一定會導致質的變化的。

新資本主義與凱因斯學說

戰後英法的大企業國有化計劃與羅斯福、華萊士時代的新政 (New Deal)，雖然在外貌上和程度上有若干不同，但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在現存經濟制度上縫補破綻，不能如東歐國有化之改變國內分配、管理等制度，可以統稱之為新資本主義或修正的資本主義。其目的，正如英國貝佛利芝 (W. H. Beveridge) 所著書名，在求「自由社會之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即保持原有的自由制度(政治的以及經濟的)，而又沒有恐慌、失業的威脅，這在某一種意義上說，也是將政治民主擴大及於經濟社會方面的一種企圖。其理論則以凱因斯 (J. M. Keynes) 集大成。他於所著「就業，利息，與貨幣之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一書中，認為就業數量定於生產盛衰，生產盛衰定於有效需要 (Effective demand)，有效需要的來源有二：一是由消費所產生的需要，一是由投資所產生的需要。如果消費傾向 (Propensity to consume，即消費與所得的比例關係) 不變，則消費需求定於所得水準，通常都是所得大，則消費增，不過並非成比例的增加，而是消費的增加小於所得的增加，尤其在所得不均的情形下是如此；既然消費傾

向一時不易改變，所得中的消費部份即難削減，只有設法增加投資。投資不但可以維持原雇傭額及原投資額，並可因此項實際投資額而輾轉擴張促成若干倍之就業量與所得量，這就是所謂「就業倍數」(Employment multiplier)與「投資倍數」(Investment multiplier)。投資倍數(即所得與投資的比例關係)與消費傾向(或嚴格地說，邊際消費傾向)成比例，如果消費傾向小，投資倍數亦小，如欲達到充分就業，則投資需要量大，否則反是。然則如何增進投資呢？投資水準定於利率與資本的邊際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資本邊際效率是利潤率的別名，視物價與成本而異；利率由流通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或譯現金偏好)曲線與貨幣供給數量的關係而定，如貨幣供給數量增，則利率低，利率低，則資本邊際效率高，亦即借款的成本低而生產的利潤大，結果投資增加。故凱因斯主張通貨擴張(Expansion)以別於通貨膨脹(Inflation)，低利放款，以刺激私人投資，增加國民所得與就業。

不過在英美社會中，利率已經低到了，壓低利率有一定的限度，故同時須輔以公共工程政策(Public works)，由政府經營無錢可賺或得不償失而私人不願意經營的事業，譬如英法的國有化和美國的TVA之類。

同時政府還可以實行社會救濟(某些公共工程常帶有救濟性質)，或賦稅政策，以平均國民所得，增進消費傾向，減少資本儲蓄，提高邊際效率，刺激投資，以期消滅失業。

要而言之，決定就業水準的因素有三，即消費傾向，資本的邊際效率以及利率，可以就此三因素想辦法而達到充分就業，辦法是擴大社會的總支出(有效需要)，藉以增加生產的總收入。

凱因斯的「一般理論」，自一九三六年出版以來，恰值資本主義遭逢大恐慌之後，得以風靡遐邇，國內且有不少經濟學者引用到中國經濟問題。但細加探究，也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回春妙藥。既然失業的原因，在於資本過剩，資本過剩，在於無利可圖，無利可圖，則在於生產過剩，生產為甚麼會過剩？一則由於國民購買力的不足，一則由於生產的無計劃性。資本家的生產，依賴市場價格的自然調節而趨於平衡，供與求，生產與流通，價值與價格間即有相當距離，不能由生產者自行控制，故常有供過於求的現象。同時，生產工具的所有者與直接生產者，亦即勞資兩方的利

益不一致，資方的利得基於勞方的損失，故所得分配不均，多數人「無」，少數人「有」，多數人無力購買，少數人盡量生產，產銷焉有不失調之理？凱因斯只看到了資本過剩，生產過剩，資方無利，勞方失業；却忽略了生產的無計劃性和勞資利害的衝突，而建議貨幣擴張，低利放款，公共工程，以提高資本的邊際效率(利潤率)，刺激投資，而增加所得與就業。這些建議，只能阻礙利潤率的下落，並不能終止它，因為利潤制度還是照舊存在，而依存於利潤制度的許多弊害即難祛除。凱因斯雖然著眼於投資，實際仍是頑弄貨幣的魔術，如低利政策，要錢；公共工程，要錢；企圖以貨幣的機能來調整生產的關係，尤其量只能延緩恐慌的爆發，並不能真正消滅失業。連凱因斯自己也承認，如果消費傾向小，則投資擴張倍數亦小，達成充分就業所需之投資量亦愈大，則增加投資更困難。此尚未計及市場供求的情形。凱因斯所謂現金偏好，預期收入，消費傾向，都屬於主觀的心理的範疇，很難捉摸，個別生產者雖欲投資，仍感徬徨無所適從之苦，這大約就是自由經濟的自由特徵吧。至於通貨擴張所引起的流弊，和公共工程中工資的低落(英國國有化企業的工資低於普通工資，實可以稱之為救濟性的工資)，於此且不詳細贅述了。

經濟理論與經濟基礎如此脆弱，英法新資本主義的前途實在未許樂觀。何況開明人士的這種努力還要遭到頑固派的反對呢！

現狀不能維持

頑固派為甚麼要反對社會的改革？因為資本主義自由階段發展到獨佔階段，失業，恐慌，戰爭，革命相逼而來，資方要麼對勞方讓步，犧牲既得利益，要麼對勞方施以高壓，緊握特權不放，把虛偽的民主乾脆取消，而代以獨裁政治。議會民主雖然是不够進步的，但人民有時仍可利用普選權以爭取議會席次，如首次大戰後歐洲很多國家，以及二次大戰後英國工黨上台與法國社共兩黨競選獲勝，於是獨佔資本家感覺原先對於自己有利利的政治形式現在已經構成不利的嚴重威脅了。他們感覺議會民主太脆弱，無效率，不足以應付新的局面，而需要強有力者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希墨的繼承者如戴高樂、莫斯萊、麥克阿瑟等一流人物了。不過因為英美法或則牌子很老，或則都是所謂「有」的國家，經濟基礎比較穩固，還沒有走上極端。

既然世界是趨向全民政治與全民就業，現狀不能維持，必須改變，最好是和平變更與無血革命。由新舊兩種力量經由協商途徑而獲致必要的改革。「有」者放棄特權，「無」者分享權利。這需要雙方讓步，而「有」者更應該讓步得多些，然後「有」「無」才能平均，能均才能和，能和才能安。但事實上，由於成見，觀念所困（成見觀念出於一個人的經驗，經驗又出於賴以生活的財權），有者常不讓步，甚至認爲此種讓步非但對於本人無益，抑且損及社會的健全，如視變爲亂，視動爲暴。無者則亦有其看法。有者嚴法律，無者言要求。有無互不相讓（某集團中的個人也許可以讓步，這就是所謂開明人士或溫和份子，但整個集團是決不會自動退讓的），就只得動武，一方是討伐，一方是革命。於是發生流血的大悲劇。

中國的哈密雷特

目前中國也正在扮演着可悲的哈密雷特。窺究其原因，亦是不能和世界趨向自外的。中國固談不到共有、共治、共享，也談不上民有、民治、民享，只可說是官有、官治、官享。中國所行的是官僚政治，而其基礎則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經濟。

中國專制官僚政治的基礎原是地主經濟（王亞南氏關於中國官僚政治與官僚資本的研究，很可作爲參攷）。由於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故滲透着濃厚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色彩。半封建半殖民地之間，而官以貫之。所謂官，包括軍、政、黨、紳等在內，他們控制政府，繼續家天下的傳統，採用前資本主義的方法，在國家的名義下，遂行貪婪的獨佔。官僚資本穿上「國家資本」的外衣，所以民間資本無法發達。官僚資本帶有商業資本的性質，所以產業資本被其犧牲。官僚資本既與外國資本合流而兼爲買辦資本，所以民族資本不易抬頭。官僚之所以爲官，而且爲農業社會中的官，又必然以非官，即以老百姓尤其農民爲主要剝削對象。

於此，對於中國的所謂「國家資本」，尙有稍加詮釋的必要。它既不是蘇聯式的國家資本，也不是納粹式的國家資本，陳翰笙氏在所著「獨佔集團與中國內戰」一文中（譯載經濟週報第四卷第一期）曾經指明：

「西方的國家資本主義表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高峯，中國政府對國營事業的統制，只是將資本集中在少數高級官僚之手而已，依然是一種前資本主義的形態。在中國政府統制下的一切剩餘價值皆非來自正當的商品

循環，相反的，一切額外利潤，只是借政治勢力的榨取。政治的獨裁亦依賴經濟的獨佔而存在。」

經濟的獨佔，如金融（銀行、貨幣、外匯、農貸），工礦業（鋼、鐵、煤、錫、鎢、錫、汞、鉛、電、油、紡織、造船、水產、煙、糖……），商業（國外貿易、交通運輸、國貨公司、以及抗戰時期絲、茶、桐油、豬鬃、食鹽等的專賣），農業，都是範圍廣而程度深。專以農業中的土地分配而論，據南京土地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所載，十六省統計如下：十畝以下的小土地所有者佔總戶數百分之六十，但所佔土地僅百分之十七，百畝以上的大土地所有者佔總戶數僅百分之一，但所佔土地則爲百分之十八。（轉引自吳文暉著「中國土地問題及其對策」一書）

另據吳文暉氏估計，佔總戶數百分之三的地主，擁有耕地百分之二十六，而三分之二或百分之六十八的貧農僱農等，僅佔耕地百分之二十二。地主平均每戶佔一千七百三十餘市畝，貧農平均每戶只佔七市畝。（見前揭書）

更據陶直夫氏估計，佔總戶數百分之四的地主，擁有耕地的一半，而百分之七十的貧僱農，僅有耕地百分之十七。（見所著「中國現階段土地問題」一文）

由上三種統計或估計，可知大多數農民足無立錐，而少數大地主則田連阡陌，尤以抗戰期中，無論陷區或後方，土地的集中趨勢更加顯著。農民在這種有無懸殊的情形下，受着高地租高利貸的壓迫，加之以外戰內戰所給與的痛苦，如徵兵、徵工、徵實、徵購、徵借，以及由此派生的種種敲詐，還有其他苛捐雜稅。他們流血，流汗，流淚；無衣，無食，無命；結果就只有造反的一條路了。

由上所言，中國的問題貌似複雜而實簡單，就是有與無，特權與非特權，民主與不民主的問題。此一問題原可遵循政協路線，以和平方式解決，但不幸而演成今日的戰爭。戰爭結果，現狀必難維持，自將順應世界潮流，切合中國情勢，在某種爲衆所公認的新的經濟基礎之上，建立新的法律體系與新的政治制度，這種法律，大家才願意共同遵守，這種政制，大家才熱忱參加擁護。如果官有照舊，特權不變，則競選變成競鬪，民意只是官意，法治等於槍治，不但談不上民主，而且也決不會有和平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論民主的法治與反民主的法治

慶德葦

沒有一個人會否認，在目前的中國，要想澄清紛亂的局面，改造經濟的情況，推行一切政令，非施行法治不可。一切皆須依據於法，人人都須守法，這是建國的基本條件。但尤其重要的，我們要法治，乃是要建設一個民主的國家，保障人民的權利，使大家獲得合理的生活。法治的作用就在實現一種政治環境，以達到此目的。所以法治是一種手段，離開了目的，牠自身便成爲空洞的，抽象的。牠能够和各種不同的政制相配合，可以爲民主政治的基礎，造成平等自由的國家；也可以爲專制魔王所利用，做壓迫人民的工具。法治如果與民主的原則脫離，本質上便會變成與我們所期求的完全相反的東西。

一般人說起來，都好像以爲我國從來沒有實行過法治，其實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法的涵意本來包括公法和私法，民法和刑法，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以及一切規章法令而言。任何民族一自國家生活發生以後，便必得施行相當程度的法治，尤其刑法是統治階級最有力的武器，更不會不被利用。我國三千年以前，老早就有了法治思想，虞夏殷周之世曾經留下許多關於法制的記載。紀元前三世紀戰國時代，商鞅韓非等法家輩出，法治學說便發展到了最高潮。自此以後，隨着中國統一帝國之成長發達，法治主義愈益興盛。每一朝代都明白法治的功效，從未輕忽。但是如同我國古代其他各派學說一樣，自秦而後，法家思想也就停滯不進，一直到西洋文化東漸，大體無甚變化。所以我們可以把戰國時法家學說來代表我國固有的法治思想，和現代歐美傳來的法治思想比較一下，便不難發見二者名同實異，一個是以民主爲依歸，一個是反民主的，其間距離實不可以道里計。

我國古代法治主要目的是擁護君主的威權，壓迫平民；而西洋法治運動自始便是要限制君主的權力，保障平民權利。遠自紀元前五六世紀希臘的梭倫和伯利克里斯立法，羅馬十二銅牌法，中經英國一二一五年大憲章，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所產生的權利法案，十七八世紀洛克和盧梭等英法學者倡導的法治理論，美國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乃至晚近歐

美各國憲法，其中很明晰的可以尋出一個一脈相承的線索，就是不斷的限制君權，伸張人民權利。這個運動循着一個上升的軌跡前進，迄今未止。但是我國古代法治的理念實在與此背道而馳，牠的作用僅在別君臣貴賤之分，要「強君」「弱民」，完全替統治階級張目，不過利用法治爲擄取以及鎮壓人民的手段。商君書說得很清楚：「聖人別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君臣篇)；又說：「人主爲法於上，下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以下爲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人主奪威勢滅社稷之道也」(定分篇)。顯而易見，這全然是一種專制獨裁的理論，要使大家作順民，安守本分，聽天由命，接受政府官僚的宰割。這種法治當然只合乎統治階級的需要。

法家主張信賞必罰，但實際只是要嚴刑酷法，實行恐怖主義，以鞏固統治階級的地位。所以商鞅要「刑不善而不賞善」，他說：「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開塞篇)。又說：「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強國。……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說民篇)。這裏明白指出要用重刑立威，以使人民懾服而成爲統治者的絕對順從的奴隸，並且還要把每一個人民都看作姦民，施行特務工作，監視人民，實現最可怕的警察國家。這是沙皇和希特拉統治人民的方法，和現代民主精神根本衝突。

這種法治思想當然又是反理性的，韓非說：「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有度篇)。他主張君無爲於上，不必費心智之勞，只須「同合同刑名，審驗法度」，使「刑罰所施，如合符契」，便可使「羣臣懼於下」。一切法律都只是就普遍事實，制定抽象的法規，在其適用於特別事件時，如果對於所有實際具體的情形，不加以深思明辨，僅靠法律條文，還是不行的。古代法家却要統治者根據自家的打算制定法律，實行時把法律條文當作符契來使用，憑着籠統的判斷，採用最殘酷的刑

罰，不准別人疑問。這樣，統治者便很容易把做好了帽子，戴上任何人的頭上，加以殘害殺戮，使之死而無怨，還要發出「君王聖明，臣罪當誅」的歌頌了。這實在是一種極端機械論的理性的思想。無論如何，在法律不過保護君主和官僚貴族利益的時候，這種理論只能做統治階級殘民以逞的工具，愈是執行法律嚴格的人，便愈是統治階級的忠實無恥的奴才和劊子手。在這種法治之下，立法的進步無由獲致；至於歐美先進國家所謂賢明的司法往往可為立法改進之先聲，更是談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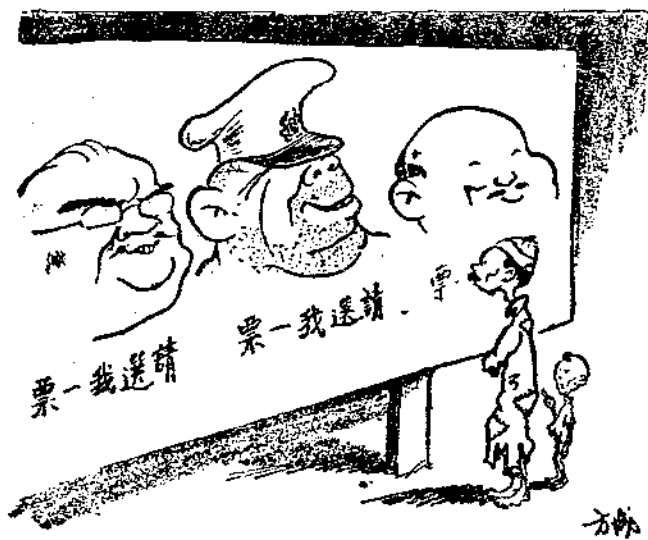
不幸三千年來我國法治思想尚不能脫出商鞅韓非的窠臼，現在民主潮流激蕩於全世界，而一般人口雖言法治，心目中大抵還是古代反民主的法治。牠和現代民主法治的思想，大不相同。舊瓶不能裝新酒，勉強裝入，必至新酒變質，甚且發生毒素，可以殺人。

其實，這個舊瓶也已破裂，根本不堪再用。商鞅任法而強秦國，雖然主張嚴刑重罰，但他的成功大部分還由於他能够順應時代要求，改革了秦國土地制度和政治經濟機構，提高了當時的生產力以及人民生活水準，纔奠定秦國統一關東諸國的基礎，可是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却也成了他自己所倡導的專制的法治主義的犧牲品。秦始皇完成空前未有的集權帝國之後，製定更完備的法制，殘酷不仁，視黔首如草芥，在歷史上最有名，以為這樣就可鞏固一姓的統治權，傳之萬世，却不料民怨沸騰，二世而亡，反而替秦達大度，與民約法三章的劉邦，造好做皇帝的機會。本國史上還有兩位政治家實行法治最出名，就是蜀漢的諸葛亮和秦符堅的謀臣王猛，二人都主張「治亂世用重典」，二人都因為自己所依附的統治權不穩，一個是以詐術奪取了劉璋的地盤，一個是輔助外敵治理本國人，當然怕人心不服，隨時有被推翻的危險，所以不得不用重罰嚴刑，以圖鎮懾人民的反抗。可是兩人成績都不見怎樣好，蜀漢始終蹙蹙於一隅，維持一個小朝廷的局面，再傳而為司馬氏的俘虜。符堅則肥水一敗之後，一朝失勢，身死名裂。

確實，我國法治的發達並非不早，周穆王時就有五刑之屬三千，除墨、剕、剕、宮之外，單是大辟——死刑——就有二百餘種之多。秦之法律更密，有榜掠、鬼薪、黥為城旦、謫、籍沒、連坐、棄市、戮、腰斬、車裂、阬磔、鑿頤、抽脅、鑿烹、戮尸、梟首、具五刑（漢書刑法志云，當

三族者皆先斃，剕，斬左右趾，笞殺之，梟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辨誑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族、夷三族等等，這還是比較重要的條款，此外當然更多。漢代雖較秦略寬，但法制更加完備。此後每一朝代都有詳細周密的法典，一部分遺傳到現在，陰沉慘酷的程度至今令人見之心悸。如果我們需要這等法治，那末我國過去法治真可算已經發達到了極點，大可不用我們今日來提倡；而現在歐洲若干國家之無死刑，以及最近英國之準備廢除死刑，反而可認為法治的退步了。我國歷史上每一朝代的創業之主往往都是比較寬大，減省刑法，對於社會經濟，尤其是土地問題，能够予以相當合理的解決，纔會得到人民的擁護。而每一個朝代之亡，大概都由於官僚腐化，政治黑暗，榨取人民太利害，使社會上貧富懸殊，大多數人沒有飯吃，鋌而走險，到了這時，雖「置天下於法令刑罰」，亦不過使一怨毒盈於世，下（民）憎惡之如仇讎，終不能至於土崩瓦解之禍。

現代民主法治的精神不單要政府與人民大家都守法，法律必須經過立法程序，不經過立法程序的不能算法律，政府的命令不能代替法律或高於法律；而且還要法律以及所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機關的一切法令，都須以保障人民權利為旨歸，不得違反理性，更不能實施恐怖主義以威駭人民，否則便決不是大眾所需要的法治，而祇不過成為反民主的法治。我國歷史各朝代的循環無已的內亂，便可證明反民主的法治完全失敗。幾乎主張法治是不够的，我們要求的是保障人民權利的民主的法治。



怎麼沒有一個像我們的？

如此「獨立」外交

王奇籬

揭開了表面的現象

由於在召開對日和約的問題上中美之間存在了歧見，由於美國在實行明朗的軍事經濟援華之前的刁難與責備，中國外交官員玩了一套前所未有的把戲。這把戲以傾向蘇聯為姿態，以服從美國為最後目標，而在聯合國機構裏，則獻演了幾次的「調和」與「折衷」，但其實却始終沒有越出美國班主所規畫的跑道。中國官方在這一種把戲的道具箱上，貼了一張彩色的紙招：「獨立外交」。

有一位漢口的記者先生，在訪問司徒雷登大使的時候，問道：「中國正在實行獨立外交，大使感想如何？」大使沒有作答。事情十分明顯：西洋鏡是不可拆穿的。

「獨立外交」是前所未有的新鮮把戲。看看中國外交官員那麼賣盡力氣地大吹大擂，好像真的成了五強之一，在世界上扮演一個主要的角色了。

一個政府應該代表國家民族實行獨立外交，這是不在話下的。中國是從反侵略的戰爭中勝利地走了出來的（先不管這是如何的慘勝），那麼當務之急就應該是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反對扶植舊日的敵人；因為一旦這個敵人再起，首當其禍的必然還是中國。其次，為了遠東以及世界的和平，我們必須幫助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反對繼續榨取繼續奴役的殖民地舊秩序。我們也應該努力促成強國的合作，把戰時團結的崇高原則貫穿到戰後的和平歲月裏來。祇有這樣的政策才符合中國人民的願望。祇有這樣的政策才是積極的，自主的，獨立的。

獨立的外交政策非但是不盲目的追隨，不固執的偏私，甚至也不消極地僅僅搭起一座浮橋來，專供某些國家的登橋相會。獨立的外交政策應該是並列的五根支柱之一，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共同建築一座和平大廈。

中國官方，上自院長部長，下至主筆記者，「獨立」「自主」的話題不知說了多少。但是如果揭開了表面的現象，加以仔細的觀察，我們便不能不知道：宣傳是宣傳，事實是事實，這完全是兩回事兒。

借款與對日和約

關於對美對蘇關係，國內論壇發言甚多，讀者也自能明辨是非，這裏不想贅述了。

我們首先要談的是對日和約的準備問題。準備問題是關於程序方面的，包括哪些國家可以參加會議、表決方式、會議地點等等。這還不是和約問題的實際內容。雖然如此，以日本侵略下中國犧牲的慘重，我們對於程序的決定也實在是馬虎不得的。這完全不是單純的美蘇之間的問題，而是有關各國如何以對日和約奠定世界和平的問題。中美英蘇既然在對日戰爭中起過主導作用，在締定和約上自然也應該保持強國一致。因此，我們認為美國倡議者的目的無論如何是破壞團結的；我們認為由十一國準備對日和約，也實在不過是挾持多數的假民主而已。

世人以為美國的立場是對付蘇聯的，其實更重要的倒還是對付中國，對付中國人民的。中國政府多少看出了這個問題關係今後的國運至深且鉅，所以未敢照常依附美國。然而有一個相當長久的時期，中國的態度是不明朗的：一會兒傳說贊成十一國，一會兒又傳說贊成四國；一會兒傳說十一國會談之前，無妨先開四國會談，一會兒又傳說要以遠東委員會（也是十一國）作為討論的模型；一會兒傳說同意三分之二表決制，其中要包括三強的可決票，一會兒又傳說包括四強的可決票。直到九月廿五日，張羣院長才在北平燕京大學演說，正式宣示：「美國主張早日由遠東委員會之十一國起草和約，多數通過後即可成立。我國則認為十一國中須有三分之二國家贊同，且此三分之二國家中須包括中美英蘇四國。美國對中國此項建議，至今尚未答覆。蘇聯則主張由中美英蘇四國起草和約。而中國則認為十一國共同起草也無不可，惟十一國中必須有蘇聯參加。」（大公報北平專電）直到現在，中國還是堅持如此立場，而美蘇却還沒有正式答覆。

蘇聯在兩次拒絕美國建議之後，便默無一語，不動聲色。美國是有重度的焦慮的，但還不斷地放出就要開會的傳說，對於中國的「獨立外交」

，則始終相信是可以擊破的。美國並不絕望，譬如九月十日華盛頓合衆社電有云：「此在某方人士則相信即使中國採取此立場，美英勢力仍有使其採用原來方針之可能（原來方針就是美國的方針——引用者）。」又譬如華盛頓相信：「中國與美國談判後，將同意美國之建議，召開一十一國無否決權之對日和會。」（九月廿八日華盛頓合衆社電）十月間，另有幾條外國電訊也報道美國官方還是如此自信。在美國看來，中國的主權獨立是可以跟着美國團圓轉的。

關鍵是在什麼地方呢？關鍵是在借款。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獨立外交」不過爾爾。

中國政府要在這裏打仗，就要向美國借款，其他一切可以不顧。對於日本這樣重大的問題竟然等閒置之，這怎麼算是符合中國人民願望的獨立外交呢？據王世杰外長個人的觀察：「日本現內閣片山哲等確有誠意領導日本走向民主和平之路。……麥克阿瑟將軍對於日本人民現在及未來之饑餓十分憂慮，故採取若干步驟來解除此種威脅；但對日管制並未放鬆……」（十一月一日大公報南京專電）其樂觀也如此，我們又怎能希望中國政府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扶植日本的政策呢？

忘記了探明美國行情

關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的否決權，張院長王外長會在九月初表示應該成立一般合理的解釋，限制其濫用；修正與否，準備尊重大多數國家的意見。

大多數國家的意見是怎樣的呢？以美國爲首，後面跟着菲律賓、墨西哥、阿根廷、澳大利亞、英國、法國……對於否決權都主張修正，限制或廢止。馬歇爾在開幕致詞時說：「美國願意接受以任何適當方式取消對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書以及安理會中一切決議使用否決權，但援用制裁行動之決議須除外。」（九月十七日紐約合衆社電）美國明明知道修改憲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對於否決權並沒有提出什麼更具體的意見，美國的主張是另起爐灶，倡議組織一個「小型聯大」。

中國代表會經幾次聲明無意放棄否決權。但到了十月二日，中國向聯大提出建議，要點如次：「一，建議安理會確定若干種類之決議係屬於程序事項，按照憲章不能使用否決權；二，籲請五強對和平方法解決紛爭之

事項，放棄使用否決權；三，籲請大會宣布單一國家之否決權，不能取消安理會會員對憲章之義務，並建議安理會多數國家得就履行此種義務進行磋商，或則於單一國家否決權阻礙安理會之行動時，行使其召開大會特別會議之權利。」（成功湖中央社電）中國的此項建議，比馬歇爾最初所宣示的還要完備。這就是把原屬於安理會的幾項職權送給全體大會，並且把大會的職權提高；更重要的，制止了所謂「單一國家否決權」的有效行使，事實上即等於取消否決權。——這便直接違反了憲章，並減低了安理理事會在聯合國組織中的重要性。

美國還僅僅主張在下屆大會中提出討論，中國倒更進一步地主張本屆大會馬上採取行動。這大概就是「獨立外交」。

其實中國代表團忘記了探明美國的行情。美國是把重點放在「小型聯大」上面了。祇要組成了這個「小型聯大」，安理會也便歸於無用，否決權便不成問題了。聯合社電會傳中國主張摒棄美國「小型聯大」的建議，到十月十五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博士在政治委員會中的發言便明白表示贊成設立「小型聯大」，認爲不失爲一個聯大的有用的輔助機構。王外長歸國後的解釋是：「美因任何國家在大會中無否決權，不易討論問題，且一年開一次會不合適，故建議設立五十七國常設委員會。反對此案者，認爲大會係定時開會，現變成常開會，足以減少安理會之權力。中國認爲此項委員會可以設立，但不能代替大會，一切議案應到大會中解決。此外亦不得侵犯安理會職權。」（十一月一日大公報南京專電）其實，把美國的提案隨手翻閱一過，便可以知道不祇是代替了全體大會，而且是侵犯安理會職權的。

中國在聯大中的立場，可以說並沒有維護憲章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一味以美國的視線爲轉移，有時比美國還跑得快一點，但事後也不見堅持，這樣還可以美其名曰促成一致。張院長在北平發表演說，就是以限制否決權爲例，說明「中國要促進全世界各國間之相互友好關係」（同前）。但是限制否決權就是取消強國一致原則，試問這又如何能促進各國間的良好關係呢？

中國政府的政治邏輯

中國贊成朝鮮獨立。對於如何打開目前的僵局，中國毫無積極主張。

大體上是美蘇混合委員會也好，四強聯合會議也好，聯大全體會議也好。從決定程序的綜合委員會到審議提案的政治委員會，再到全體大會，中國跟着美國亦步亦趨，有時跟踪得較慢，但很快地就會趕上去。譬如在討論到將來美蘇兩國撤兵問題的時候，中國便主張聯合國所派遣的臨時委員會不僅應與美蘇協商，而且應與中英協商；後來又改正為舉行特別會商，而不特別提及四國了。關於撤兵，中國贊成蘇聯提議，但主張要解決先決條件，先決條件就是要保證不發生無政府狀態或內戰。怎樣解決呢？中國沒有說明，自然也不同意蘇聯所提聽任朝鮮人民抉擇的主張。一九四五年的莫斯科協定，規定朝鮮要由中美英蘇負責託管五年。馬歇爾在聯大開幕致詞中，關於朝鮮一段，對於託管制度並無交代。十月初，聯大會場諸傳美國主張改由聯合國託管。中國代表團也會表示希望在某一時期內由聯合國託管朝鮮。等到美國正式提出建議，中國也就不再管什麼託管不託管了。

對於印荷爭端，按道理來說中國是應該反對荷蘭帝國主義的侵略的。但實際却並不這樣。正如一九三五年國聯討論阿比西尼亞問題時中國並不積極反對義大利一樣，現在中國對於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態度，還不如印度澳洲那樣的積極。惟一的理由或許是因為當地華僑的遭受橫禍。但我們應該認清這是荷蘭侵略所引起的結果，絕不應該以此為由而停止對印尼的支持。蘇聯主張印荷雙方軍隊撤回原陣地，中國並不同意。中國代表團蔣廷黻博士說：「願請安理會在採取進一步行動前，應先待實地調查人員最後報告。」（十月七日成功湖聯合社電）這完全是拖延政策，對於印尼每日發生的流血慘劇，毫無阻止的效用。接着中國代表團又表示如果能够以某種國際警衛軍維持印尼的治安，則可以贊成蘇聯的撤兵建議。這看來好像很積極；但實際上却是好高騖遠，不著邊際。等你把國際警衛軍組織起來，印尼早就被荷蘭帝國主義吃盡了。後來，實地調查人員提出了關於荷蘭破壞停戰令的最後報告，中國也沒有給蘇聯撤兵建議投一票。蘇聯建議就這麼被否決了。

在希臘問題上，中國代表團會自稱在希臘並無直接利益，可還是非擁護美國建議不可。我們不必再敘說每一一次的辯論了，因為中國並沒有反法西斯，反侵略，反干涉的立場。聯大通過設立巴爾幹邊境監察團以後，顧維鈞博士對中央社記者說：「聯合國大會此項行動，將予世界愛好和平民

族以新生希望，並加強其認為聯合國即國際和平之保衛者之信心。」（十月廿一日富勒與電）美國硬生生地認定希臘局勢是由於阿保南三國的「侵略」，這便會使和平的前途更加黯淡，那末又怎能產生什麼「新生希望」呢？英美玩的把戲是把希臘「內戰外患化」。按照中國政府的政治邏輯，倒是應該贊助英美立場的，因為這裏也搞過「內戰外患化」啊！

宣傳和事實是兩回事兒

檢討了聯大工作的一般發展，我們絲毫也沒有找到中國獨立外交的影子。有一次，安理會表決羅馬尼亞加入聯合國一案，中國還投了一張贊成票。中國並未積極支持蘇聯主張羅保芬匈義同時入會的主張，投一票也不足以構成多數。這真是惠而不費的小技巧。

最近，中國政府又在要求參加起草對德和約，聲明任何決議如無中國政府的同意，不得視為有效。中國對於歐洲方面的前敵國和約總願意插入一脚（一九四五年秋，中國會要求參加對羅保和約的起草），但關於自己身邊的前敵國日本的和約問題，却一再用來作為爭取美援的工具。對於這一點，是似不可解而又很可解的。

張羣院長在北平演說中說：「盡力增加對友邦之友好關係，戰時既並肩作戰，平時亦應共同維護和平。中國當力求增強與所有友邦之情誼。」（同前）但是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很難相信中國外交政策是遵循着張院長的原則去實行的。宣傳是宣傳，事實是事實，這完全是兩回事兒。

時與文訂閱辦法

- 一、本刊採定期訂閱辦法，一次至少三個月，訂閱期間不受零售價格調整影響。郵費漲價，另函通知照補。
- 二、如匯款不便，可購大額（千元以上）郵票掛號寄下，十足通用。
- 三、訂戶儘先寄發，且較另售為廉，外埠讀者尤可不受加成影響。
- 四、訂費務請一次匯足，姓名住址，請勿草率，以免貽誤。
- 五、續訂請註明原訂單號數。

訂閱價目

外國	內國			三個月十二期
	航空掛	航空	掛號	
平一寄律	九萬五千元	八萬五千元	七萬元	六萬元
半年美金二元半	加	照	年	全年

越南問題

鄭道傳

一、從談話打到全面衝突

由於殖民地與殖民帝國間的矛盾，自大戰結束到去年年底，法越關係已經由談話打到的局面發展到全面衝突。

當前年八月日本投降以後，越盟 (Viet-Minh) —— 擁有一千多萬黨員的越南第一大政黨，於八月十九日解放了河內，接着越南皇朝最後一個皇帝保大 (Boa Dai) 於廿四日在其國都順化建忠殿上，頒佈他的退位詔書，九月二日，越盟主席胡志明 (Ho-chi-Minh) 以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的名義，發表「越南獨立宣言」，完成越南人民所稱「八月革命」，這種光榮的成績是越南人民用自己的鮮血從日軍的侵略下戰鬥得來的，作為越南舊日的宗主——法國，早已成爲日本的俘囚，他們沒有理由重返這塊被他們自己所遺棄了的土地。

可是聯合國關於處置越南日軍投降的辦法，卻把越南分成南北兩部，以北緯十六度以北爲北部，指定由中國軍隊接受日軍投降，北緯十六度以南爲南部，指定由東南亞聯軍（主要是英軍）接受日軍投降，這樣既便利了英國對印度、中東、近東及地中海的聯繫，同時法軍也藉着英軍的幫助，由 Cedille 和 Riviere 所率領的隊伍很快的便佔有了西貢，但因為法軍的佈署尙未就緒，而越盟的力量相當強，迫使法國不得不在去年三月六日與越盟簽訂一個初步協定：法國承認越南有自治權，可以自行設立議會並享有財政上與軍事上的自主權；越南共和國聯合政府所統轄的區域，包括東京和安南；交趾的地位俟三個月後再舉行公民投票決定。這其中關於交趾的處理遂埋下此後一個大陰謀，當四月十八日法越代表繼續在中部茶叻 (Dalet) 會商法越共同的問題，法殖民當局竟不惜用鄙下的手段在南部舉行關於交趾地位的所謂「公民投票」，接着於六月一日宣佈成立「交趾支那共和國」，因爲交趾是越南的麵包籃，如果將它割去，法國殖民者就可以用飢餓的武器來對付越盟了。同時對東浦寨和老撾也盡力拉攏：如法國自動放棄對東浦寨前此的保護國地位，部分地承認其自治，並允許它得

回一九四一年被暹羅奪去的地方巴塔邦；對於老撾，也允許它得回被暹羅奪去的地方，並由法國代爲驅逐那些反對法國的「自由老撾人」，這樣，幾乎把越南民主共和國整個包圍起來了。此後於七月六日法當局又邀越南代表團在巴黎近郊封騰布羅 (Fontainebleau) 繼續初步協定和茶叻會議未了的談判，但交趾的法軍當局却又在西貢召開老撾、東浦寨和交趾各地的一代表會議，並聲明「交趾支那共和國」與越南聯邦無關，法國政府也承認了這個所謂獨立國，如此聲東擊西藉以延挨着法越關係的改善，此後雖因胡志明親赴巴黎簽訂九月十四日的臨時協定以及又繼續在河內召開軍事政治等小組會議，但關於幣制問題，特別關於越南在法國聯邦內的地位問題，以及越南的外交權和南部的地位問題，都沒有適當的解決，而且自三六一至一九一四一這段談判期間，法軍對越盟的進攻也沒有止歇，如「交趾支那共和國」被導成的時候，法軍在北圻會發動大規模的進攻，河內方面也嚴重衝突過，到了十一月二十日，海防法軍故意破壞越南的關稅主權，於是法軍便率性向越北發動大規模進攻，飛機火箭炮都使用出來了，戰爭發生以前，法駐越最高專員達尙禮安 (Dr. Argentiou) 曾向巴黎保證不出三週便可以「肅清越盟」，但越盟接受了過去一年談話打打的教訓，它知道只有堅強抵抗才有光明的前途，因此戰爭遂由海防擴及河內、建安、諒山、南定、順化、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二、「和平廣播」與「香港會議」

頑固的法軍閣掀起了全面的侵越戰爭，但越盟的堅強抵抗粉碎了他們速戰速決的迷夢，然而大夢方回，他們又走進另一個夢境。

本年春天，拉瑪迪聯合內閣組成，隨即召回達尙禮安，另派急進社會黨員波拉特 (Emere Polart) 任駐越最高專員，但拉瑪迪並沒有改變法國過去那一套不合時宜的殖民政策，波拉特也繼續在越南玩着離間的陰謀，他到了越南以後，即開始執行兩面政策，一面與胡志明聯絡，公開表示他將以越盟爲對象進行和平談判，一面派代表赴香港向遜王保大拉攏，揚言

保大將出面調解越南問題，可是對前者卻以「越盟軍隊全體放下武器為談判前提」，結果遭到胡志明的嚴詞抨擊，而後者由於保大的否認，也碰了一鼻子灰，然而波拉特並不「灰心」，七月末，他飛到巴黎與拉瑪迪重新商討新步驟。接着於九月初演出了「和平廣播」與「香港會議」兩大傑作。

九月十日，波拉特在河內河東省發表由巴黎交給他的對越和平建議的廣播演說，他首先把造成越南問題的責任輕輕推開：「法國政府屢次決定將整個中南北三地的和平復興，……而所以未成事實者，其責任實不能歸諸法國」，接着他提出三點為「越南民衆劃出的道路」，第一是恢復越南在法聯邦中的自由；第二，軍隊只有聯邦的軍隊，除了聯邦有軍隊外，各國不能有軍隊；第三，聯邦對外，應只有聯邦的外交政策，在這篇廣播中，所謂「聯邦的」，即是「大法蘭西的」。他對於越盟有一段不符事實的批評：「民主原則，應加以尊重，文明國家，更不容許抹煞民主原則，例如秘密拘捕紳士，企圖消滅其對立之人物等種種行動，以建立其政治組織之基礎。吾人所以顧及該項自由權利者，其原因並不是將個人之自由犧牲於無人道之政治機構……」，所以胡志明於十一日即向越人廣播，指出波氏的建議令人完全失望，不能予以接受，他說：「全世界除法國外，均已不復企圖控制其他民族的外交事務，然法人雖向我人建議獨立，仍不許我人就我國的對外關係發表意見，此非獨立，乃愚魯可笑的帝國主義」。胡氏又有一妙喻，他將波拉特的「和平廣播」比作「以無肉之骨養犬」。

其實，波拉特的「和平廣播」，與其說是「為越南民衆劃出的道路」，勿寧說是為越南另一批政客們所安排的一條道路，當波氏返越之日，河內和海防的維持會舉行盛大的歡迎，到會的有幾百個越南人，女人比男人多，還有些是老頭子，他們垂頭喪氣地被數十名警察趕來開會遊行，會場中有兩條惹人注目的標語：「要求法人與保大調停」，「擁護暹皇保大」。保大，這位曾經發表過有名的「退位詔書」的英主，波拉特早就屬意於他，可是他起初尙愛惜羽毛，不願自毀歷史，但不幸他的意志畢竟是脆弱的，經不起那些失意政客的包圍和進讒，他終於在九月七日電邀越南各「黨派」代表赴港開會，這裏面並沒有越盟的代表參加。十九日，保大發曾人高德明發表一篇對越宣言，他說轟烈的抗戰的目的是為了國家民族的

獨立自由，又說他不忍見祖國飽受種種痛苦和精神上物質上的毀滅，因此人民「委托」他出來和法方談判，他正在研究法方所提出的准予越南獨立自由的條件。到底什麼人「委托」了他呢？看看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名單，有越南國民黨領袖阮海臣，前越南外交部長阮祥之，前經濟部長阮祥龍，越中部代表文能、何春海、陳春遠，越中部政府主席陳文理、陳文璉，越南抗戰陣綫主席代表阮文台，這些在越南弄得聲名狼藉的人物，不是國家的後裔，就是保大的舊屬，他們早已脫離了越南人民，越南人民也早已忘記了他們，如果保大真藉着這些人物作為返越執政的「資本」，則他也只有重戴「奴隸集團皇帝」的舊冠，對越南問題的本身可說毫無解決的可能，而法國利用保大，也毫無疑義的是騎錯了一匹馬。

三、「秋季攻勢」與「積極戰爭」

當波拉特的「和平廣播」經胡志明嚴辭駁斥以後，接着河內便傳來消息：「此間法方人士預料，於十月初越南將有大規模軍事行動，以擊破越盟之抵抗力」（見路透社河內九月十一日電）。到了十月九日，法國果在東京發動軍事攻勢，其目標為河內西北一百里處胡志明總統部所在處——巴根，並擬在東京週圍佈置封鎖綫，以切斷東京海岸越盟軍所佔的土地。同時胡志明的電台「越盟呼聲」也於九日證實法軍對越盟確已發動全面秋季攻勢，並聲言越盟人民當不惜代價，抵抗侵略。戰局的發展，法軍行動以傘兵活躍為主，法軍公報宣稱除已佔領河內西北的森泰外，並佔領森泰附近的通安和另一要城惠平，而且河內及惠平的法軍業已會師。至上月底止，胡志明已移駐越南北部近中國邊界處，有人說此項行動將為法越戰爭的新階段，胡志明可能離開越境，而進入中國或暹羅，惟胡志明進入中國的可能性，將因政治上的理由而不致實現。但有一件與此相並行的事實即為保大的行動益趨活躍，前月十日法國新聞社宣稱保大將晤波拉特，討論越南戰局，會晤地點或在「中立船舶」之上，又據聯合社二十五日香港電稱：保大夫人於是日攜同兒女五人以休養名義啟程前赴法國，據接近保大的人說，夫人將與法國官方談判保大復辟事宜，如此則今後的越南可能有一個傀儡政權出現，而這次所謂「秋季攻勢」實不過為「和平廣播」的另一面，其目的都在鼓勵並促使保大早日登場而已。

但胡志明早在拒絕波拉特的「和平廣播」時便已經號召全國越人須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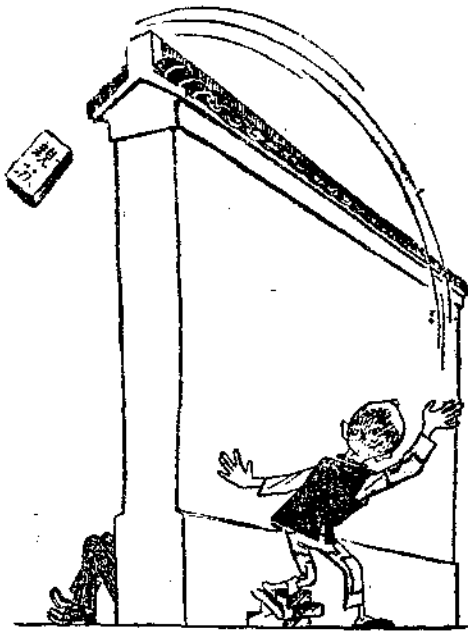
停頓狀態中醒轉過來，即時恢復對法人的積極戰爭狀態，並聲言越盟解放軍將在戰場城市各處繼續作戰，直待最後一個法國侵略者被逐出越南海岸為止。我們知道越南民主政府自去年三月三日成立並經過十一月三日及今年七月十九日兩次改組以後，它已經成爲一支堅強的抗法勁旅，它在政府組織方面已包括着妥協份子以外的各政黨人士，尤其難能可貴的，它已經有了一部進步的憲法，而且已付諸實施，目前正開始實行土地改革，把一切土地作適當合理的分配，使貧農都獲得耕地。至於對法戰爭，在表面上看來，它似處在劣勢地位，但實質上已經把法國「拖」到提不起放不下的地步。在法軍的佔領區內，越盟的遊擊隊非常活躍，單就西堤（西貢和堤岸）一處而言，一出市區，晚上就不是法國人的世界，即使在白天，不是有大隊人馬，法國兵也不敢在市區外的公路上出現，常常一隊汽車離開西貢後就再也不見回來，同時因爲法國兵力不夠，便利用德義戰俘組成「志願隊」送來越南服役，這些亡命者對法國根本提不上忠誠，當越盟答應他們更優越的生活時，他們便一批一批地跑過去，因此在越盟的隊伍裏，除了中國人外，還有一批白色的外國人，素有訓練的德義官兵，這樣，使得胡志明所呼籲的「積極戰爭狀態」越加「積極」。

四、從法國市選看越南問題
在越南的政局和戰局的發展上看越南問題，同時不可忘記法國本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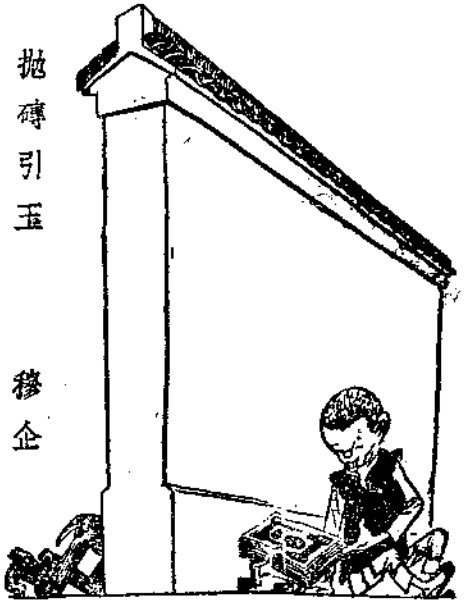
外交政策和內政動態給予越南問題的影響，作爲「西歐集團」中一顆有力的棋子，法國是不愁沒有「朋友」的，要是沒有它的「朋友」在「接收」時給予的方便，越南問題決不會演變到今天這麼微妙，目前的第四共和國雖然標榜着「法蘭西聯邦跟各組成部分享受平等權利」，但一直發展到今天爲止的對越戰爭已經證明着這僅僅是一句空談，並且本年三月間還會因爲共產黨提出停止徵兵結束對越戰爭而引起一次嚴重的閣潮。

十月下旬，法國舉行市選，結果戴高樂所代表右翼聯合的「法蘭西人民聯合」(Rally of the French People) 佔了優勢，共產黨保持原來的地位，中間的社會黨和天主教人民共和黨則失票很多，雖然按諸法國憲法總選在明年五月前不能舉行，但這次市選總可以顯示法國政局的動向，一句話，法國的政局益趨兩極化，今後的國內情勢恐更加動盪，戴高樂最近已經唱出明年復活節登台的口號，我們觀察着戴高樂自今年三月三十日在浦魯內瓦、四月七日在斯特拉斯堡以及七月二十七日在法北勒恩各地的演說，我們再觀察着今年三月起杜魯門主義到馬歇爾計劃對於歐洲的攻勢，則我們對於戴高樂的再起自不難明白他的來路和去向，雖然未來的事實不會如戴高樂所想像的那麼樂觀，但我們單從這次市選的結果來看越南問題，我們對於越南人民今後仍須走着一段艱苦曲折的道路，實不勝萬分同情與懷念。

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于福州



拋磚引玉



移企



乞靈·哭靈

移企

忠孝仁義解

林布

五四運動時代有人非孝。這種主張似偏激而實不偏激。宋朝韓琦對英宗說，假如父母慈而子孝，這原是自然的事，無足稱述。惟有父母不慈而子孝，才是大孝。因此古來言孝者首稱舜。由這幾句話可見孝是專制家族制度下子女的義務。子女沒有這種義務感，父母便專制不了。非孝不是要天下兒子都起來打老子，而是要打倒專制的家族制度，把民主精神灌注到家庭中去。

反對忠是爲了促進民主，這沒有人能否認。像桀紂那樣的壞政府，忠它幹甚麼。偏有龍逢比干之流死活要維持它，而後世言忠者都奉他們爲典型。不打倒這種奴隸義務，專制政體就不能倒。這個工作離完成也還遠得很。有人把忠君改爲忠於政府，是換湯不換藥。更有人把忠君改爲忠於國家，這不過是忠於政府的另一種說法。民主未完全實現以前，非忠的工作仍須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五四時代把忠孝攻擊得體無完膚，對仁義卻批評得不够。近年馮友蘭先生大倡仁義，認爲這是任何社會的基本道德。其實，忠孝是下對上的義務，仁義是上對下的義務。這兩類義務正是撐持專制社會的兩根台柱。只有在專制政體下，政府可以爲所欲爲。它可以暴如桀紂，也可以仁如文王。但是暴政必然引起革命，所以爲了維持專制政體，必須行仁義。民主社會何以不要仁義呢？因爲民主政治是要使政府根本不能爲所欲爲。

好多老百姓給仁義騙了。從前的老百姓希望出真命天子和清官，現在許多人希望出好人政府，或是相信民主會像熟透了的蘋果，你睡在樹下，它就掉到你口裏來。這都是一套專制時代的想法。有了這種心理，就忘了自身的力量，忘了應當爭取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必須等到貧民討厭慈善，人民討厭仁義時，民主運動才能算是真正開始。

從前的人要我們明義利之辨，重義輕利。現在我們應當倒轉來，教人重利益輕義務。老百姓好好保護自己利益，不要受忠孝節義那一套義務的

騙，才會有民主社會出現。

從前的人要我們用天理良心克制人欲。忠孝節義一經努力提倡，就變成了老百姓的天理良心，然後用這個天理良心去克制欲望，等到老百姓情願爲這些義務而犧牲任何欲望時，就再沒有人反抗，世界也就太平了。

統治者自己也做天理克制人欲的工夫，因爲他們要行仁義。理學家以爲能够正心誠意，居仁由義，雖聖人可期。於是使得一般知識青年窮年累月，主靜主敬，持養省察，專在自家心田上做工夫。這種工夫好有一比。讓我引羅素幾句話：

從前有兩架臘腸機器，構造精巧，用以把豬肉製成臘腸。一架機器對豬肉很感興趣，做出無數臘腸來。另一架說：「豬肉與咱有啥子關係？咱自己的工作要比豬肉有興趣得多，奇妙得多。」於是拒絕接受豬肉，開始研究自己的內部。因爲沒有了豬肉，內部停止了工作，他愈研究，愈覺得它空虛而愚蠢。

所以那些做理學工夫的人愈做而愈覺得克制之難，操存之不易。也有一種自欺欺人之徒自以爲有了甚麼境界，甚麼氣象，但在實際生活的考驗中，無不原形畢露。所以過去的統治者中間，真正想在實際上發政施仁，有所興革的人，莫不痛斥所謂理學。現在看來，理學家實爲統治者中的最死硬最保守者。專制君主主要讀書人因循保守，莫談國事，即大倡理學，好讓那些青年在持養克制的工作上弄得精疲力竭，或是變成十足的鄉愿。所以過去理學的功効與八股文相等。

現在馮友蘭先生又大倡理學。且改頭換面稱之爲新理學。可惜現在的知識青年的地位已與過去不同。在民主運動中，王安石尙且沒有人願意學，況乎學理明道嗎？現在的讀書人不會再白天做夢，把自己看成統治者，或是統治幫忙者，搞甚麼仁義，因此也不要做甚麼操存仁義的工夫。理學是到了應該收拾起來的時候了。

河北戰區的農村面

看河北農村

石家莊失守之後，平津保馬上緊張起來。南面失了一個樞紐，北面的東北又在六次攻勢中損折了兵力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民間紛紛傳說東北熬得了嚴冬，熬不過暖春，所以天津某報載保定專電稱：

「此間某有地位人士談：翻開今日河北省地圖一看，則知河北省是如何的危急堪慮，保定以南，早為共匪生根區域。平津保三角地帶，僅少數縣城駐有國軍。而冀東區域二十餘縣，惟有一條羊腸小道通往關東，而此小道復時遭切斷。河北省一百三十餘縣，完整者恐只有平津兩市，如同兩隻眼睛，乾瞪着對其餘縣鎮着急。共匪忽忽靡定，隨時可以集中力量，蹈覆乘瑕，國軍則東填西堵，日打日少，為我們河北全省計，更為平津計，應廣泛發動生死存亡鬥爭，既不能專靠

政府力量求安全，亦不能依賴現有駐軍維持生命財產，必須由共匪手中救出痛苦百姓，救出自己。政治的壓污，軍民的配合，緩不濟急，唯一的辦法，要河北軍民每人拿出自己的力量，保衛家鄉，埋怨誰，要求誰皆無用。河北省是河北人的河北省，不能對焦頭爛額的政府再做何種奢望。」

鹿鍾麟和張繼在南京也呼籲「不能放棄河北」，這都使我們想起社會賢達莫柳忱先生數月前痛哭流涕「不能放棄東北」的呼籲，也可見戰局中危險地帶的南移。

石家莊的戰事結束了，隨着難民和難官一起來的是「一堆陷落之後的消息」。據說正式的戰事是從七日開始的，外市城由團隊作戰，團隊後面有裝甲車架了機關鎗督戰，後退者即以機關鎗掃射，到九日夜外市城棄守；休息一天，共軍攻內市城，九小時後攻堅戰結束。十一日戰

事結束，十二日轟炸機就乘汽車入城，打開倉庫，物價大跌，物資紛紛運出。此外，這些難民口中還夾雜了許多怪事，是我們在抗戰末期桂柳大撤退中會聽到的，如飛機討價還送銀行眷屬之類。

我們若想想明白石家莊失守對河北全省的影響，恐怕必須先明白一點河北鄉間如今的情形。共軍進入石家莊後，登記各縣的地主及其眷屬，願意遷鄉的竟達九萬餘人。說起來似乎他們都是自願送死去的，因為即照觀察週刊的讀者投書來看，也好像清算鬥爭是可怕得很多的。記者曾經訪問過一個從難區裏來的青年，我們之間的問答是這樣的：

問：清算鬥爭果然像外間說得那樣殘酷嗎？

答：在我們這種人看起來，當然不免殘酷一點，但決不如傳說之甚。而

且數量上是不是如外間傳說那樣多，也成問題。

問：你們村中有因鬥爭而致死的嗎？

答：有，而且我的姑丈也在內。說起來當然是不太光榮的，不過我這位姑丈也的確素來對農民太苛刻一點。在「鬥爭」他之前曾開過一個訴苦大會，在這會中，農民訴說直接間接死在他手中的人有一百多人。一個老太婆牽了她十歲的孩子來「訴苦」，據說一家有六七口人全死在我姑丈手中，如今只剩老幼二人了。

問：這話確實嗎？

答：我不願說自己姑丈的壞話，但我以為農民不會都在胡說的，尤其是一個老太婆和孩子——中國的老太婆向來是心腸很軟的。

問：最近這一次又鬥爭，你們村中曾有過這種舉動嗎？

答：我們村中沒有，鄰縣有過，但沒有死人，分財產是有的。

山窮水盡的情形看，那麼回去也許比在都市餓死略好一些。一個地主告訴我，他們鄉間戰前是極貧困的，如今那些窮人都和戰前的地主一樣，每天一頓白麵一頓雜糧，隔三天吃一回肉，吃飽穿暖，與高采烈了。

地獄小景

只上面一點對鄉村的瞭解恐怕還不夠。我們再試看從報紙上發現的一點材料。最近天津戒嚴時間從晚間十時半就開始，這是為了「津南緊張」的緣故。天津南面津浦路上的靜海縣，一向是被認為「津南門戶」的，讓我們看看它的情形。

此間報載，靜海保警團「空額太多」，三個中隊三八四人，空額即達二五六人。槍只有三十來支，外號叫做「腳蹬子」，因為往往拉不開槍，必須用腳蹬開。報上形容道：「這樣的警隊，根本談不到軍紀。他們僅是集體的飢民，十個人也許只有兩床被，棉衣服還沒着落，住着四面通風的潮濕屋子

。糧糧不上來，就得挨餓。催糧時吃老百姓的，臨走還偷幾個白麵餅或高窩頭藏入乾糧袋。」於是「負着治安責任的自衛隊副總隊長劉慎修，對現狀很抱悲觀，他說：如果在兩個月內想不出好辦法，津南門戶的靜海縣便要塌台。」

靜海縣各鄉鄉長都已攜眷進城當「流亡鄉長」，但却要向地主催糧，以供軍需。「叫他拿什麼去催，拿什麼去徵？空手去，等於送死。相反的，八路要糧則只有一個徵字，沒有備字。他們徵糧的使節，可以深入縣城附近，憑一張紙條，糧便送到了。政府方面徵糧全憑武力，在牛治安區，沒武力便征不了糧來。因為共方的政治活動是放射性的，政府方面的政治活動僅拘束在中心點上，沒有放射的力量。」政府方面政治力量所能控制的地域，佔全縣五分之一，這五分之一區域內的農民，負擔着全縣的總費。「此外，還有流亡縣政府、流亡警團隊、專員公署、省屬保警隊、甚至屬於國防部的團管區

，也得叫農民負擔一部份攤派。據統計，本縣有一百多個大小單位。」「有許多攤派是不合理的，而且是非法的，沒有限制的，沒有止境的。總結一句話：是隨便出花樣。」

「要糧要款，動不動就派隊出發，沒有分派量，沒有目的地，……不分貧富，有糧就得套車拉。」已經繳過許多次的也仍須照繳，或換上一個「預借」的名目，永遠無盡無休的「預借」。」「此外，還得供養吃食；不然就自己動手，找鷄子，找白麵，殺豬宰羊，吃個不亦樂乎，然後揚長而去。其甚者，就是搶掠，奸淫，殺害。在鄉村間，風行着一個拆被套倒棉花的名詞，就是把棉花拆出挾帶着被套走，以圖輕便。」

之外，連油鹽醬醋茶都得供給。此外就是借：借柴子，借板凳，借舖板，借葦席……無所不借。借完之後，由甲地開到乙地，在甲地借的東西不還，到乙地再借一次。」「本來

以前警察所「平均每天要押三十個密不報案的農民，非刑拷打，灌凉水，灌醋，居然繼承着日本憲兵隊特務隊的遺風。這是壓榨錢財，沒錢你總保釋。」

一點事情沒有，却最少每天要二十個伏，多時到一百以上。要車，要牲口，有用嗎？沒用。這叫做「聽差」。這些工夫，沒處吃飯，沒處睡覺，餓死凍死，活該！他們說：「死

一個背着走，死兩個扭着走。」

「農民最引為苦惱的建築防禦工事，動不動要幾丈深幾丈寬。……在工不力的藉口下，打傷了無數的農民，並且有打成殘廢的。在某一地方，建

築營房和工事，建成後又迫令拆毀，拆毀再建。」

「我可以停一停了，因為這裏正在選舉國大代表，街上紅紅綠綠，不勝熱鬧，還有汽車接送選民哩。」（十一月廿一日寄自北平。）

廣州的黃色文化與倒退教育

林鬱

廣州，這個南方的大都市，除了在政治協商會議前後的一段時期內比較能夠給人們呼吸到一口自由的氣息之外，它簡直天天都處於悶沈沈的低氣壓下：好的人走了，敢說話的人也沈默了，剩下來的便是一片靜寂無聲。住在這鬼一般的城市裏的人們，除了迷感於肉慾上的享受，整日去找尋感官的刺激之外，那一個不感到精神 and 情緒上的彷彿苦悶呢？

報紙帶人走
向墮落麻醉

廣州的報館雖有十多家，但沒有一家不走「黃色」的路線。越華報、現象報、星報之類固然是讀之肉麻的讀物，即其他

如大光報、廣州日報、和平日報等有「立場」的報紙，為了銷路起見，也不能不降格，闖出一欄「鹹濕版」，藉以吸引讀者。比較上還算帶一點高級趣味的，就只有建國報一家，它有「每日文藝」，也特約京滬的教授們寫點專論，但它的銷路特別壞，每日不過三四千份。這並不是說廣州只有黃色新聞的讀者，實際上因為建國報所登載的多是一些偽自由主義者的文章，社論方面更是黑黑白白不辨是非，因此也不為讀者所歡迎。結果它就成了一家最可憐的報館！至於電訊方面，廣州的報紙從來不登外電，即使是美聯、合衆社的電訊也不刊登，滿紙都是中央社的「入股」。規模大一點的，也只是加上一兩條「本報特訊」而已！

要之，廣州的報紙沒有一家站在開明公正的立場，大家都走着黃色路線，愈黃就愈有銷路。我們讀不到好的真的新聞，社論則言之無物，電訊則全盤入股，副刊以性感與煽情爭勝，社會版更以刺激性的姦、殺、劫、打見長。我們也看不到一個嚴肅的作家的名字，到處都是靈靈生，滄桑客，怡紅山，相思館主之類的俗得令人發嘔的黃色明星。廣州報紙真成了蒙蔽人們眼睛，帶人走向墮落與麻醉的東西了！

海淫書報泛濫全市

在廣州任何一條馬路，我們都可以買到海淫的書籍。這些書籍較報紙上的黃色小說更下流，有的完全在使讀者作性的衝動，有的則是荒誕的俠義故事，其中大都用俗語或「鹹濕」的文言寫出「操命少奶」，「姨姪談我」，「滿房春」……或「五娘離記」，「俠義誅仇」……等的東西。還有連環圖，大多根據俠義小說繪成，它是小孩子和粗識文字的人們的最流行的讀物。這些書籍和連環圖在各書店都有出賣，並且還有一些人將這些書籍擺在街頭租給讀者，每本每次租閱費為一百元。最特別的，還有一些書販手裏拿着幾十本淫書，到處搖擺頭腦地講述書中的內容，引誘下級市民，以便於大量推銷

。所以誨淫書籍簡直是不
經而走，在每一檯誨淫書
攤的邊邊，我們總可看到
不少成年的人在租賃，更
看到不少的孩子在迷頭迷
腦地翻看連環圖。有時在
公共汽車上，也有一些少
婦拿着一本道類的書在讀
着。關於誨淫書報，社會
局也曾下過幾次命令禁止
銷售，可是始終沒有見效
。在最近，這些東西泛濫
得更爲厲害了，但當局却
熟視無睹。

辦性質，一方面它又誘惑
青年從事于肉慾上的陶醉
，斷喪了青年人的創造的
熱情和本性！

學生沈默了！

在教育方面，更有一
奇特現象，那即是學校公
立的要人情，私立的要金
錢，否則你就只好被擯斥
在校門之外。學術自由根
本談不到。偶然說錯一句
話，就得擔心背後的特種
學生。在中山大學，這
學期因爲行轅送來「深造」
的軍人達數十個，原有的
特種學生之外又加上這一
批黃衣大漢，遂使學生更
顯得沈默了。學期裏中大
當局以「不堪造就」四個
字開除了八個學生的學籍
，而最近因各地學潮的影
響，使中大也處于躍躍欲
試的狀態之下。上週，學
生們舉行了一次具有試驗
意味的文藝晚會，節目有
歌舞和獨幕劇，但當這
晚會正在進行，特種學生
就出來搗亂了，而且到處
聽到「要以槍桿對待」的
風聲！在這樣惡劣的環境
下，中大只好在「避免同
學的無謂犧牲」的教訓下

大膽電影

廣州的電影片完全是
美國的產品，國片在這裏
全不吃香，輕歌妙舞以及
一些「美國大膽」佔有着
整個市場。百分之九十以
上的看客不是企圖去欣賞
影片的藝術和找尋一點知
識上的進益，而是神往于
銀幕上情人的醉吻，大膽
酥胸的肉感，或者是打鬥
的驚險鏡頭。所以在廣州
最吃香的就是以打、情、
舞、輕佻爲內容的影片。
這是一件在文化上相當危
險的事，一方面它表示美
國大膽文化的侵入，使廣
州的文化更帶上深濃的買

沈默了！至於國民大學，
更是一所著名的開倒車的
大學，最近吳鼎新這個老
頭子愈來愈頑固，不但追
令全校學生作古文，而且
還要他們背誦那些幾個世
紀以前的老古董。

浙大被捕學生校友公審記

戒備森嚴

十一月十七日，爲浙
江高等法院公審浙大被捕
學生鄺伯達及校友陳建新
與黃世民的一天。他們三
人都以內亂罪而被提起公
訴。早在公審的前幾天里
，杭州市區就有人盛傳十
一月十七日爲共產黨企圖
發動全面暴動之期，同時
也有人傳說浙大同學企圖
在那一天把法院包圍起來
。浙大校方爲防範起見，
特在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在
校長公舍內召集全體學生
自治會代表及理事，竭力
勸導必須自十七日起立即
復課，並希望從法律上追
求公平的結論。十五日爲
繼續復課之最後一天，當
晚再召開全體代表大會，
商討以後新態度，經一小
時多之認真討論，最後表
決自十七日起休課，最後
這一新的決定，一則爲靜

最近市教育局準備成
立一所「市民大學」，六
個月內畢業，入學資格則
不限年齡學歷，校址設在
青年會二樓禮堂。初時記
者不曉得這是一所什麼性
質的學校，後來看過它所

被告聲辯

九時正，要提被告陳
建新、黃世民、鄺伯達三
人審訊。陳建新供述年齡
籍貫後稱：起訴書中所指
之新潮社係民國三十四年
間在廣州創立，被告三人
均是以後才加入的，所
有社員均爲浙大同學，畢
業後頗有散佈在滬杭京台
灣各地工作者，乃擴大大
務，由他擔任杭州社長兼
聯絡員，但其上並無一指
揮及監督機構，各社員繳
納月入百分之五之基金，
用在奉化創辦耕農場。
他並否認新潮社與浙大學
生自治會、全國學聯、及
讀書會有關係，更無秘密
爭取浙大學生自治會代表
席位之活動；此次由滬來
杭，純爲參加校友汪敬堂
之婚禮。繼爲黃世民對檢
察官起訴書之答辯，大致
與陳建新同，他說：他們

公佈的科目，才大爲領悟
，這原來是個準備黨化市
民的機構。
× × ×
廣州的文化與教育，
在低氣壓下，是沈默了，
無聲了。文化只好走黃色
（日寄自廣州）

席人

此次由滬攜來之書籍多種
，均係普通書場中可購得
者；所有來往函札，其中
措詞並無秘密可言；他們
來杭與于子三相遇，實乃
偶然而非有意相召者。
最後有鄺伯達之答辯：他
否認起訴書中所指他是浙
大讀書會負責人之一說，
更不知共黨外圍爲何物。
他所有各種書籍，均係陸
續自各地書場購來供平日
讀書時參閱者，就書本性
質而言，並無違法之處。

朗誦筆錄

至是，庭上乃朗誦筆
錄，此筆錄據稱係十月二
十九日下午四時于子三未
死前所供錄者，原文如下
：「新潮社尙未經政府立
案與校方之登記，渠乃杭
社實際負責人，中心活動
乃在吸收社員，發展生產
事業，並爭取浙大學生自
治會代表名額。鄺伯達則

負責聯絡上下意見向外發展。至浙大自治會乃學聯組織之一環。學聯主要分子皆接受共黨與民盟之領導。問：新潮社是否學聯的外圍組織？于答：是的，在各種活動上我可承認是接受了共黨民盟的方式。問：政治立場人各不同，但不能違背國族的利益，望你轉變。答：當加考慮。問：請你自動將各種活動及民盟等聯繫地白地寫出來。

庭上質訊

法官宣讀畢，陳建新當即答辯：二十八日曾有談話，但到第二天方令補行簽名，故曾加拒絕，今對此談話，自然不能承認。庭上再期讀十月二十九日黃世民之談話筆錄，內容與陳建新的相同，惟黃世民答辯時，對新潮會暨應昆明學潮，因新潮份子大多同情共黨一點，表示並未說過。最後期讀鄧伯達談話筆錄，有幾場在奉化開辦，但經費困難，新潮並無秘密圖書組織，至秘密信一封不便指明係何人所寫等語。歸稱上述各點，他確曾說過。庭上繼問：信內暗語為什麼這樣多？汝等來杭參加婚禮，為何要帶這許多書？陳答：書籍是汪敬蓋的，于子三事前接到我們通知，故到城站迎接，同至大同旅館，開二十二號房間，在房中並未用紙條談話。又問：于子三在保安司令部對浙大學生普選事有所隱瞞，謂自己也不知道，說這是一種力量在推動他，不知是什麼力量？陳答：大概同新潮社沒有

律師辯護

浙大教授徐家齊乃開始以被告辯護律師身分起立發言，歷時一小時多，其要點如下：
(一)三人非新潮社發起人。共黨有新潮社組織，如三人為共黨，決不致用同樣名稱。此足證明其非共產黨。且新潮壁報經向浙大校方登記，校方已證明其內容並無不合。至須政府登記一點，法令並無明文規定，縱有，不過手續不合，罰幾個錢而已。新潮社員僅十七人，佈告範圍有限，怎得指為會員公佈全國？
(二)起訴書稱活動經費二千餘萬，更非事實。

徒刑七年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浙高院當庭宣判，其主本如下：
(一)陳建新、黃世民、鄧伯達，共同以暴動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及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各處有期徒刑七年，各處各處均沒收。
(二)法院在判決書中所陳述之理由甚長，對被告律師所提出之辯護，有所批駁。
(三)既云新潮社與共黨無關，何以被告等筆錄中有云：該社各種活動無形中似受共黨影響，將來也有投共黨之可能？又其組織學術團體，在政府及學校方面，迄未立案，而又秘密工作，時在戒備而顧慮安全問題。

上訴請願

判決書全文送達浙大後，學生自治會於當晚召開全體代表大會，對於該項判決表示不服，除由該會等三人要求代為提出上訴外，現在竭力設法集議證據，俾於規程上訴期內向浙江高等法院提出外，並請校長偕同學生代表赴京請願。代表會並為不服該項判決並支持上訴起見，公決自十一月二十一日起罷課三天云。(十一月二十一日寄自杭州。)

什麼關係的。庭上再問鄧伯達：你開列書目單，曾否叫所有社員每週作讀書報告？答：這不過為一種建議，並不一定做到，且送來讀書報告也沒有人加以批閱的。
以後，就開始辯論，首由李檢察官陳述要旨後，被告三人同辯，認新潮社組織散漫，社員間互相通訊祇能由個人負責，所收基金皆供創辦農場之用，並無用於秘密活動之事。最後，庭上再問：新潮社與辦農場是否同一件事？被告答稱：不錯。
(三)起訴書謂新潮操縱浙大自治會競選，實則浙大已行普選，且結果新潮社員僅獲候補理事一名，其未有事後操縱可知。
(四)鄧身邊之名單，乃浙大歌詠隊隊員之姓名。
(五)新潮社之學習綱要，係根據中央核准之「讀書與學習」刊物中所示之書目而開列，至起訴書所指五十七種書目，除毛澤東七大文獻等四種外，餘皆大學叢書之類；而此七大文獻之類，在抗戰期內與動員領袖綱領未實施以前，亦屬普通可購之書。
(六)于子三之口供在法律形式上並不完善：第一指印係蓋蓋，第二大學生而不令其親自簽名，第三無二人以上證明，第四于前後口供不同。且被告避重就輕，依法仍須有事實證明。

問：受何派領導？答：並未與共黨聯繫，但無形中受其影響，將來又可能降共的。
庭上再問：黃身攜帶賬單是桃園經費，共計七百二十四萬，來源都有證據，並無共黨車貼。支付亦有確實著落，有付款收據租約存根可查，且與身上賬單完全相符。陳身上僅搜出四十九萬。黃身上有一百三十萬，內有一百十六萬二千元是復旦大學學生自治會託帶致浙大吳教授購書者，數目甚小，非活動經費可知。
庭上再期讀十月二十九日黃世民之談話筆錄，內容與陳建新的相同，惟黃世民答辯時，對新潮會暨應昆明學潮，因新潮份子大多同情共黨一點，表示並未說過。最後期讀鄧伯達談話筆錄，有幾場在奉化開辦，但經費困難，新潮並無秘密圖書組織，至秘密信一封不便指明係何人所寫等語。歸稱上述各點，他確曾說過。庭上繼問：信內暗語為什麼這樣多？汝等來杭參加婚禮，為何要帶這許多書？陳答：書籍是汪敬蓋的，于子三事前接到我們通知，故到城站迎接，同至大同旅館，開二十二號房間，在房中並未用紙條談話。又問：于子三在保安司令部對浙大學生普選事有所隱瞞，謂自己也不知道，說這是一種力量在推動他，不知是什麼力量？陳答：大概同新潮社沒有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京警漢字第四一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第一類新聞紙類
七海報女警電局第九號第一二六三八號

對時文

中美蘇之間

王寄羅

通貨膨脹對財政的影響

伍丹戈

法義的緊張局面

杜明

暹羅政變剖析

鄭道傳

「收拾人心」

商翼

13

卷二第

館書國京

通 訊

河南——山東第二？

廷光

長江以南的動亂

王士章

皖省國代選舉內情

杜漸

廣州大選趣聞

于 人

讀 者 之 聲

大救漢奸

湖南二三事

機鎗刺刀屠殺難民

一位青年朋友對「時與文」的觀感



讀者之聲

本欄投稿簡約

- 一、來稿署名簡便，但務請於稿末書明真實姓名及地址，否則不便刊登。
- 二、來稿請勿超過六百字，愈短愈好。
- 三、來稿例不致酬。僅以登載該稿之本刊寄奉一冊。
- 四、來稿除附有貼就郵票、寫好地址之信封者外，概不退還。

大赦漢奸！

諸家麟

據十一月廿七日申報載稱：「(本報鎮江廿六日電)：據可靠消息：卅七年元旦為行憲之期，政府當局為與民同樂，將舉辦大赦。凡已判處徒刑之罪刑，均將減輕三分之二之罪刑，並准假保釋。刑處無期徒刑者，將減處有期徒刑，以示政府特殊之恩典。」我看了這件消息，正是欲哭無淚。如此的「特殊恩典」賜給賣國賊，真是「皇恩浩蕩」了。一班小民的吃著，一班烈士的犧牲，都是在自討苦吃，活該受罪。不過我總

湖南二三事

歐石

一、根絕「異想」
 亂軍與，湖南的精銳部隊早就派往北上了。除了警保處和軍管區所

大的恐怖，雖然沒有好久，「奸匪」便回來了，可是湘西永順、慈利、華陰等十餘縣的治安，又受到了嚴重的打擊。王主席東原爲了根絕收復區的「異想」起見，親蒞各縣「訓導」，並劃定永順爲政治剿匪區，成效如何，只有當局者清。最近邵陽、衡陽、湘鄉毗連的地方，時有不明來歷的部隊出沒。(十·二五·湘湘民報) 甚是震盪人心。大公報登載潭潭路上有新四軍活動的通訊新聞，被斥爲荒謬，並鄭重屬語：「沒有此事。」譏疾忌諱，是一貫的政治作風，人民對此也就不該怪了。

希望不是真的。

在八年的抗戰中，小民吃了多少的苦頭，在物質與精神方面有多少的犧牲，親戚朋友枉死了多少，真只有自己的肚裏明白。本來希望一個總清算，可是非但沒有嚴懲，反而坐了兩年牢監就碰到大赦了。兩年與八年之比呀！

本來已有「協助地下工作，有功抗戰」在前，對於傳說中的「大赦」，真是毫不稀奇。這祇有使我再記起一句話：「在下大戰爭中，孫子王入蛋才不救漢奸！」(十一月廿八日，上海)

屬的幾個隊與團外，很少武裝同志的英姿出現，因此「奸匪」王人林等的乘虛竄擾，給了當局一次重

機鎗刺刀屠殺難民

幸美

安徽難民二百餘人，不知經過多少艱辛，多步苦難，徒步跋涉，攜幼并老，還環肩挑另物，方經天目進入浙江，於上月中旬抵達海寧縣界。十九日傍晚，這批難民自慶雲橋上南到豐鎮，豐鎮鎮公所爲防阻難民入境「騷擾」，當即調集警察保警隊等將其看管在橋南一角。

二個刺刀戳破一女難民肚腹，立時斃命。另一難民逃至一店門口，中彈死在門檻上，毒態遂擴大。保警隊架起機鎗向難民掃射數百發！結果死傷多人。至此「難民以勢難復還，遂回原地，後押逐出境，至……以北看守」，「並將煽動難民四人拘押，代表二人留豐交涉。」

位被拘「禍首」如何，須待將來揭曉。
 這年頭，當難民也不容易呀！就像這次事件之後，各方面非但一無同情，一無援助，却還要硬硬地們爲「奸匪」！二百餘難民被鎮壓後，又來了一次搜查，因爲當局確定他們不是善類，並且攜有鎗械，但搜過一番後，一支也沒有，於是又換了口氣，說難民人數少了，一定有人潛逃，同時又派警巡查搜捕，那些身爲人民公僕的大人先生們不體身處地的替難民們想想悲苦狀況，殺之不足，又給他們全體冠上「奸匪」罪名，卸脫責任。

大魚漏網

駐邵陽湖南省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孫佐齊，機要秘書傅德明，共同有計劃的在邵陽永和金城號燒殺毒劫的勾當。打着旗幟的官匪，畢竟太刺戟人心了，經邵陽各界後援會不斷的追訴，傅已伏法了。但如何處分主犯孫佐齊一節，却因「青山」是中央某大員，已其可誰何的攔道了。小魚犧牲，大魚漏網，豈獨邵陽官匪案爲然？

據悉難民二代表以同行者慘死，已向地方法院控告，結果如何，和那四

一期上「水災兵禍」之下的安徽人民」的通訊，可知現在確實已不是難民便是「匪」的地步了。(十一月廿四日，浙江海寧。)

一位青年朋友對「時與文」的觀感

張嘯虎

關於時與文各方面，我不敢說有所批評，僅就一個忠實的青年讀者略抒觀感：第一，在內容方面，專論中精彩的文章甚多，但富有建設性的學術文則少見，且針對當前現實的政論文字亦不具有尖銳性。大家所需要的是猛烈的刺激與痛快的抒寫，青年人尤愛讀大刀闊斧的作品。

中美蘇之間

王奇籬

一九四五年春天，中國國民黨在重慶召開六次大會，在外交報告決議案中有這麼一段：「我中英美蘇四大盟邦，經自長期並肩之抗戰，情感融洽如手足，今後自當永久保持此種患難之友誼，共同負擔戰後建設之使命。……中英美蘇法及其他盟邦之精誠團結，實為世界和平之基石。」這一個決議案的時代是舊金山會議初告成功的時代，也是中蘇兩國準備締結友好條約的時代。如果把上述一段話作為我們獨立外交的真諦，遵奉五強團結一致的原則，那麼便是符合我們人民要求的。

然而現在看來，這已經是明日黃花。

近來，國內外有關中國局勢的許多議論，常常要把美蘇衝突作為直接的因素，甚或是惟一的因素。我們認為這是不頂正確的。一陣子，有人認為東北局勢不是內政問題而是外交問題；又一陣子，有人把國內戰爭「外患化」，認為是抵抗「侵略」的問題。這些看法就是想把賭注壓在美蘇衝突上，一旦這衝突採取了戰爭的形式，局面便會開朗，而「勝利」便又會「在望」了。

我們承認美蘇關係對中國局勢是有影響的，但並不相信它是惟一的決定因素。中國不應該是在美蘇之間的一個馬前小卒。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與美國或蘇聯同樣的是獨立的國家，它便應當平等地與兩個友邦合作，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促成美蘇更進一步的諒解。

我們並不是說，要實行獨立外交就應該反美；也不是說就應該反蘇。獨立外交應該是既不反美也不反蘇的。倒轉過來一看，更重要的是既不親美也不親蘇。獨立的真諦是自主，是平等；獨立的外交關係是互惠，是合作。親此而疏彼或親彼而疏此，發展起來，便必然會破壞國際團結，危害國際全面合作。

我們所說的國際團結也並不是無原則地廣交天下。我們必須照國父遺囑所說選擇那「以平等對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舉凡侵犯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的某一國對華政策，我們不能屈從俯仰，甘之如飴。一國如此，

我們反對；多國如此，我們也反對。中國局勢已經弄得一團糟，自然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國際關係。某一國的對華政策有害於中國人民的民主要求，我們便反對。所以我們要反對國際干涉，也不能忽略國際中某一特定國家以援助為名的干涉。

祇有這樣不帶有任何虛假，才能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

X X X X X

杜魯門總統說過：「美國的支持將不擴展至以美國軍事干涉去影響中國任何內爭的過程。」這話我們完全贊成，但這是兩年前的舊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對華政策聲明）。即使是在杜魯門說這話的當兒，美國的軍事干涉也不是小規模的了。其後經過中國人民多次的抗議，美國政府反覆辯解，初則謂駐華美軍是執行日軍投降，再則謂是保護北方路礦，再後來就乾脆說是要協助中國的和平統一了。他們應允了無數次的諾言，直到十月間又由中國政府聲明同意美軍駐華，這軍事干涉便算取得了合法的根據。有一個已經退休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官萬特傑夫脫說：「事實上所有離開中國之美海軍陸戰隊皆係駐紮青島。」（十一月廿四日華盛頓合眾社電）視察太平洋後返美的眾院軍事小組委員會提出報告，其中「主張以青島作為美海軍之永久基地，並預料美太平洋艦隊之活動，將逐漸自菲律賓移至中國，而青島現已為美海軍之臨時基地。」（十一月廿一日華盛頓路透社電），再找一點權威的證據，馬歇爾說：「美國軍官約一千人正在援助中國政府從事剿共戰事。美國並已允在臺灣援助中國訓練新軍。」（十二日華盛頓合眾社電）美國以「軍事干涉去影響中國任何內爭的過程」已經到達完全公開的階段了。

美國的這一套對華政策是放在一個假設上面的。這假設便是蘇聯的擴張，蘇聯有把中國囊括而去的危險。既然如此緊急，美國便必須先蘇聯而擴張，先蘇聯而將中國囊括。蒲立特的「遊華觀感」開宗明義第一章便是「防止任何一國家統治中國而動員其四億五千萬人民來對抗我們，這是最

關美國切身利益的事情。」接着又說：「那繼承着帝俄帝國主義的蘇維埃帝國主義者，利用中共為蘇維埃強權政治的工具，意欲把中國淪為蘇聯的附庸。」蒲立特的這種見解，自然不算新鮮；年來作此主張者，在美國早已是不乏其人。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美國遠東問題專家和另外三位專家（麥克奈亞、費煦、杜萊斯），兩位議員（費爾斯、穆萊）發表過一個聯署聲明，其中有一段說：「在中美兩國間造成信託或信任的關係，必須以中國完全獨立為基礎。中國政府如果受蘇聯的操縱，就不能真正獨立。同時，我們也應該以同樣的坦白正視另一事實：就是，假如中國政府由一黨造成極權的控制，而該黨祇有倚靠美國的支持才能違背大部份人民的願望以維持其存在，則中國人民就不能認為這種政府為獨立的政府。要闡明美國的政策，必須先用事實來證明，我們既不希望操縱中國，把它作為美國的附庸，也不希望脅迫它，使它投向另一強國成為其附庸。」（譯文載「世界知識」十五卷一期）這是中國人民之友最有遠見的議論，對於蒲立特的「觀感」，簡直是預言式的評斷。蒲立特之流正是希望操縱中國，把中國作為美國的附庸。

魏德邁在離華聲明中把中國政府責備了幾句之後，孫副主席便發表了「傾向蘇聯」的談話。馬歇爾說出了一個三億美元的數目，孫副主席又說美國的友誼並不可靠。好像這個國家的對外關係是祇能拿美元去衡量的。每逢美元有了一點希望，官方便說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局勢已有更深刻的瞭解。言外之意，美元終於是要來的。於是，那「傾向蘇聯」的姿態也便可以藏諸箱篋，不再陳列街頭了。

蘇聯對於中國政府的姿態，始終不發一語，實在是因為早已看得絕頂透澈。這不是最近三數月的事情，而是最近三數年的事情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史太林說：「我們支持在為保衛他們自己的獨立而在戰鬥中成為侵略的犧牲者的民族。」

那時，蘇聯正在不聲不響地援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軍火，汽油，卡車自西北源源而來；蘇聯健兒無聲無息地血洒長空，參加保衛中國（那時的孫副主席應該最熟習，他曾幾次訪晤蘇聯領袖）。這前後，美國還在以廢鐵裝備日本，英國則封閉滇緬公路，窒息中國。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蘇聯自己遭逢了希特勒德國的侵略，才把對中國的援助暫緩下來。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前的蘇日中立條約似乎是中國誤解蘇聯的根源。那時官方報紙

不是詆毀蘇聯放縱日本南進，便是責備蘇聯的不參加對日作戰。等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以後，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即將水到渠成，那些責備的聲言漸漸換了腔調，變成懼怕蘇聯參戰了。隨之而起的便是一連串的謠言，就是蘇聯主張「國際共管」朝鮮和中國東北。八月，蘇聯參戰了，同盟國勝利了，有人便希望蘇軍一如美軍那樣干涉中國內政。他們認為重慶與莫斯科既然締結了中蘇條約，莫斯科便可以反對延安了。那時的謠言是矛盾百出的，一會兒宣傳蘇軍在長春把共軍繳械了，一會兒又宣傳蘇軍把地方交給中共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八日和十二月廿八日，中國政府曾經兩次請求蘇軍暫緩撤退。到來年二月，忽然又掀起全國規模的反蘇浪潮，責備蘇聯盤踞東北了。

上面的簡單敘述，在任何一家報館設備較好的資料室裏，是可以翻出來查閱一下的。

中國的對蘇政策如果真正是獨立的，那便應該教曉兩國人民的友誼，絕不能以美元的來否為轉移，絕不能以美國的政策為我們的政策。把美國變成一隻風信雞，巴望着它，看它指向那方面我們便往那方面走，這絕不能得到蘇聯的好感。

我們並不相信今日的世界是美蘇爭霸的世界。這樣的看法便不免會得出下面的結論：祇有美蘇之間的問題解決了，中國局勢才能豁然開朗。今日的世界是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鬥爭。中國人民自然也包括在內。但，我們人民所反對的是美國以軍事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我們絕不反對美國的和平人民。這之間是存在着很大的區別的。抹殺這區別，一古腦兒地判定罪名為「反美」，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今年三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有人既然熱衷地反對過國際干涉，按照邏輯就不應該祈求美國的干涉。中國政府既然要實行獨立外交，便不應該一意屈從美國，追隨美國的政策。

我們也不認為中國是美蘇思想戰爭的前線。世界局勢絕不是思想戰爭。中國局勢也不是思想戰爭。思想戰爭祇是一種藉口而已。

自然，我們也不能靜待美蘇關係好轉以後，再求中國局勢漸入佳境。中國人民加緊爭取民主，也可能倒轉過來促使美國獨霸世界的政策知難而退，並且從而促成美蘇從一個協議到另一個協議，重新開展和平的局面。現在的世界局勢不一定要趨向戰爭。路是人走出來的。通往世界和平的道路也是要人走出來的。

通貨膨脹對財政的影響

伍丹戈

通貨膨脹和財政的關係，一般人所注意到的，祇是財政收支的不平衡。對於通貨膨脹的作用，也就是說，財政收支的不平衡，是產生通貨膨脹的基本因素，當前的通貨膨脹，可以說，完完全全是財政收支不平衡的結果。

這當然是對的。但這祇是從通貨膨脹的角度看到的通貨膨脹和財政的關係的一方面。其實，除此之外，還可以從財政的角度來看通貨膨脹和財政的關係的另一方面。這就是說，在通貨膨脹的經濟條件之下，「通貨膨脹」對於財政發生了些什麼作用，什麼影響？這些作用和影響，在通貨膨脹定之下，是不會發生的，並且，它們在當前財政和經濟上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所以，這一方面雖然被忽略了，然而，它却是值得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通貨膨脹對於財政的反作用，是很多的，其中最嚴重的一個作用，就是在通貨膨脹之下，財政支出總是超過財政收入的現象。

單是說，財政支出超過財政收入，是太粗疏了，因為在通貨膨脹的局勢之下，通常也是如此。比較嚴格一點的說明，應該是：在通貨膨脹之下，無論財政支出或是財政收入，一般都是上漲或增加的，但是財政支出上漲或增加的速率和程度，總是超過財政收入上漲或增加的速率和程度，而這一種現象，又都是通貨膨脹的經濟局面產生的。

首先我們來看支出。關於支出，從性質上說，可以分成強制支出和自由支出兩種。強制支出是政府必須支出，無法節約的，例如保安司法等費用；自由支出是可以按照財政收入情形酌量伸縮的，如經濟建設等等費用。現在中央政府正從事「戡亂」，政府經費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軍事費用，剩下的百分之二十雖然不是軍事費，然而大部分也是強制支出，如司法費，行政費之類，都是省不了的，所以儘管財政收入非常拮据，但是支出却不能減少，這是第一點。支出從用途上又分成對物支出和對人支出兩類，前者是物料的支付，後者是人工的支付，物料的支出是和物價的上漲同時上漲的，人工的支出，雖然因為公教人員待遇總要經過幾個月調整一次，而且調整得很少，薪工的上漲比起物價的上漲後得很多，但是這種支出也是繼續上漲或增加的，所以，在通貨膨脹之下，支出不但不能減少，而且要多多少少隨着物價的上漲而上漲，這是第二點。在物價繼續漲之下，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一定都不安定，勢必發生工潮、學潮，以及其

他社會的動亂，而且經濟又要管制，金鈔票市要取締，囤積貨物也要取締，這些都是通貨穩定社會安定的情形之下所沒有的，因此，在正常的時候，政府就沒有一「戡平」這些亂事和管制經濟物價的工作和經費，但在目前，却新增了這些工作和經費。並且，這些工作和經費，並不都是臨時的，局部的，往往是經常的，普遍的。為了一「防患未然」，為了未雨綢繆，就必需設置大量的特務警察，而且這些特務警察的經費是要加速上漲的，因為物價愈波動，社會愈不安定，特務工作的範圍也愈加廣泛，不單是政治，軍事，而且要兼管經濟，文化；不單是「亂黨」，而且要兼管商民，甚至於「官員」。這就使政府財政支出的範圍擴大，數目激增。這是第三點。

像這種財政支出增加和上漲的情形，不但中央政府是如此，地方財政也是一樣。因為中國的地方政府，除了行政，保安，教育等等強制支出之外，其他經濟建設，公用事業，社會救濟等等自由支出本來就很少，所以支出的節省和中央一樣困難。物價上漲又是普遍現象，地方財政支出的增加，當然也不是例外。而且，為了要幫助中央「戡亂」，地方新增了許多「征丁」「征糧」「征工」以及其他「供應軍差」的工作和經費，此外，為了維持本身的安寧，又必需大量的「保安」經費。所以，地方財政支出也是膨脹的。

祇有少數大都市，例如上海，在財政上的表現有相反的情形，支出的增加不及收入的增加。但這裏應該要說明：就是上海這一類大都市中，市政經費中本來是以「市政建設」也就是「自由支出」做中心的，現在儘量將這些「自由支出」壓縮減少到最低限度，纔可能產生收入增加超過支出增加的現象，不過這畢竟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就照上海市目前的財政收支傾向看，已經也是轉入逆境了。

另一方面，在財政收入上却有幾種必然的因素使收入的增加，不但不能有貨幣實質上的增加，而且不能隨着幣值跌落在貨幣數字上有着同樣比例的增加；收入的上漲不但是落在物價的後面，而且還要落在支出上漲的後面。財政收入中正常的，主要的收入是稅收，然而稅收却是逐漸在貨幣價值上銳減着。這裏舉出幾種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物價繼續漲之下，雖然產生了小數暴富，然而暴富的圈子，却隨着通貨膨脹的程度，愈來愈狹，就一般說，國民財富是逐漸耗損減少了

，生產是低落了，大多數人民是赤貧化了。這種情形，不但表現在日常生活消費的減少之上，而且現在已經表現在奢侈生活的減少之上。這就使政府的課稅，在稅源上起了短少的現象。關於關稅，貨物稅，我沒有詳確的數字分析，但對於上海市的筵席稅，我們曾經根據上海市茶館菜價調查和

時期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三十五年	100%	147	151	161	121	227	276	278	334
三十六年	100%	182	224	266	290	412	466	547	697
全年平均	100%	81	67	60	58	66	59	59	57

從上表可見，今年十月的筵席稅在稅收上雖然比較去年增加了五倍餘，然而同時期的菜價却漲了九倍餘，這就是表明茶館的營業額減少了將近一半，也就是筵席稅在稅源上將近減少了一半。這是在通貨膨脹，消費減少情形之下，使財政收入減少的一個最顯明的例證。

第二，在通貨膨脹之下，一般物價可以天天上漲，時時上漲，但是稅捐的稅額却決不能隨時變動，天天調整。而且即使調整，調整的倍數也往往落在物價上漲的倍數後面。這最顯著的是有固定稅額的稅收，或者是從量稅，稅額都是規定在稅法上面，要調整稅額，就必需將稅法修訂，等到稅法修正，公布，一直到各地實施的時候，物價老早跑在前頭，稅額和事實早就相不符了。例如，汽車牌照稅，去年十二月國府修正公布的使用牌照稅法，規定乘人小汽車每輛應繳的牌照稅，是全年最高不得超過三萬元，這種稅額在當時就嫌定得過低，然而當時的三萬元貨幣價值，却超過今年稅法實施時候的六萬元，更超過目前的三十萬元，因此，實際的汽車牌照稅並沒有達到稅法所希望的稅負程度。所以，定額稅的稅額，無論如何是和實際脫節的，它完全失去了財政收入上的意義。至於許多從價稅，情形雖然好一點，然而它們也決計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率和程度。上海市的屠宰稅是從價征收的，最近一次的調整納稅肉價是在十一月十一日，調整規定的豬肉價格是每斤一萬二千餘元，但當時豬肉批發價格實際上已經是每斤二萬餘元，現在已經快要到三萬元，而且這一次的調整價格，總還要延緩一個相當時間，所以，從價稅的納稅價格和實際價格往往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從價稅的收入，實際上是遞減的。這種稅收增加趕不上物價增加的現象，是通貨膨脹打擊財政收入表現，也是由於通貨膨脹的結果產生的。

此外，在通貨膨脹之下，收入的增加不及支出的增加，還有一個直接

稅收實數，作過審慎的比較研究。從這個研究所得的結果，是稅收的貨幣數字固然每月增加，但是稅收實值却是逐月減少，因為稅收的貨幣數字並沒有隨著菜價的上漲，作同樣比例的上漲，反而表現相反的傾向。這在下列的統計數字上是表現得極清楚的。

時期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筵席稅收入定比
三十五年	100%	147	151	161	121	227	276	278	334
三十六年	100%	182	224	266	290	412	466	547	697
全年平均	100%	81	67	60	58	66	59	59	57

的「通貨」因素。從收入方面說，征收捐稅，在計算稅額時候，所根據的是一種比較高的幣值，稅額的貨幣數字並不多，但在實際征收時候，幣值却兩樣了，因此，所收到的稅收的貨幣，在實值上是更降低了。這就是因為徵稅手續，無論如何，是必須計稅在前，收稅在後的。例如，利得稅和營業稅，都是在事後計算納稅人的「所得」或「營業」，再根據這些「所得」或「營業」來計算稅額，所以等到這些捐稅收到，在財政收入上的意義，就很微小了。而另一方面，在財政支出上的現象，却完全是相反的。一項支出，在預算時候，總是根據當時的物價，也就是以較高的幣值估計的，在領到經費時候，幣值已經跌落，不夠預算支出的用途，再等到實際支出時候，自然更是感覺到不夠應用，因此，實際支出總是超過預算支出的數額，而且，這種超過的數額可能有好幾倍。這種財政支出隨着物價上漲而增的現象，是當前政府機關所感覺到的最大的困難。

財政收入根據高幣值而少收，財政支出要按照高物價而多付，這種財政收支受到「通貨膨脹」影響而產生的剪刀形發展，雖然是潛在的，隱晦的，然而却加速財政收入的不增加不及財政支出的增加的過程，因此，這也是一個極重大的因素。

然而在前述通貨膨脹局面之下，也不僅具有產生和加速財政支出的增加超過財政收入增加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若干條件或若干經濟措施，是緩和或減少支出的增加，或是提高或增進收入的增加的。這在一般的支出超過收入的過程中，也有相當的緩和與沖淡的作用。

在緩和支出增加方面的因素是：

(一) 儘量的減少自由支出，甚至必要的支出也能省就省，使政府的支出，直接間接的祇有一個用途，就是一「戡亂」，也就是使支出完全屬於強制支出。隨手舉一個例，像二卷十一期「時與文」所刊的一篇「水災兵

鵬之下的安徽人民「通訊裏，就說過：「內戰打得如此起勁，國家的財政支出百分之八十以上用在軍費上，那末用於水利建設上的究竟能有多少，還是不言而喻的。」興修水利，並不單是為了人民，間接的也與軍事極有關係，然而這項支出也節省不用了。

(二) 儘量的減少對物支出，就在無法節約時，也寧可用增加對人支出的方法來代替對物支出。這就是說，儘量的用人來代替對物支出，因為政府雇用人工是不費什麼錢的。像這一類事情，大一點的在前引文章中就說過：「須知淮城防汛工程的浩大，絕非單憑民力所能濟事，只一味地注意到發動民力，而對於工具設備一絲不管，則工作效率是極為有限的。」這是用人工代替對物的一個例。至於小一點的，像機關中用不起計算機，就改用人工打算盤之類的事情也是普遍的。這也是節省經費的一種方法。

(三) 儘量的壓低對人支出，這是最明顯的，用不着再說，應該附帶說明的是：對人支出為什麼能夠壓得這樣低？也就是說，公教人員的待遇，為什麼能夠比任何一種薪工階級都低微？這原因很簡單，就是公教人員，不論文武，始終沒有達到「充分就業」的地步，在抗戰時期，曾經一度靠近充分就業的邊緣，然而，到現在距離這個邊緣又遠了，在有職的公教人員的周圍，正有着大量的文武「公教人員預備軍」的存在，這就使政府能夠儘量的壓低公教人員的待遇，仍舊不會感覺到「公教人員荒」，因此，也就可能儘量的壓低對人支出。而這一項，也正是緩和財政支出的增加程度的最有力的因素。

至於在收入方面，也有幾種加大它的增加程度的因素：第一，捐稅的改征實物，像田賦征實，可以保持捐稅的貨幣價值，不受幣值跌落的影響；第二，提高稅率，例如田賦除了一「征」之外，還要「借」，這就等於加重了田賦，其他的稅捐，捐率都是相當高的，這種方法可以彌補一部份的稅收貨幣貶值的損失；第三，擴大稅課以外的收入，像過去的舉借美債黃金，用廉價拋售，以及出售敵偽物資等等，也都可以得到很多的貨幣收入。

然而以上所說的在收支兩方面的沖淡與緩和支出超過收入的作用，都不是由於通貨膨脹的因素產生的。并且，這種種方法和手段，現在有的已經利用到最高限度，像儘量壓低自由支出，對物支出和對人支出之類，不能再向前發展了，有的現在已經不用了，像拋售金鈔和敵偽物資之類，因為金鈔已經賣完，現在剩下來剩餘的敵偽物資也似乎很難賣出去，至於像田賦征實之類，却祇能保持稅收的實值，並不能增加稅收的實值，而且範圍也祇能限於田賦，不能推廣到其他捐稅，抗戰時期曾經試驗過擴大征實的範圍，然而結果都是失敗的。提高稅率和稅額，現在雖然正在進行着，然而也快要達到最高峯了。

從目前的情形看，所有緩和財政支出增加超過財政收入增加的因素，作用大概都是很有限制的。現在唯一的希望是「美援」，如果政府能夠繼續得到大量的美援，那麼一切拋售物資美匯的方法又可繼續，因而取得大量的稅課以外的收入，然而美援必須「大量」，假定是最近美國會通過的六千萬元的數目，那它可能產生的加大財政收入作用，就微弱得可憐了。

因此，當前的財政，大概仍要繼續受到通貨膨脹的壓迫，擴大和加速財政支出超過財政收入的過程。

在這種財政支出增加超過財政收入增加情形之下，所發生的結果是什麼呢？現在所能觀察到的，已經有三點：

第一，財政收支的不平衡和通貨膨脹，到現在已經像「雞生蛋、蛋生雞」一樣的互為因果，互相影響，而且不單如此，還要繼續擴大並加重它們互相影響的程度。因為財政收支的不平衡，產生了通貨膨脹，又因為通貨膨脹的原故，在原来的財政收支不平衡數額之外，還要加上新的，由於通貨膨脹引起的財政收支不平衡數額，這就使財政赤字數額，不但是貨幣數額的增加，而且還是貨幣實值的增加。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又需要加速和加大通貨膨脹的程度，這樣輾轉遞延下去，於是形成了極可怕的惡性循環；在財政上是收入與支出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財政收支不平衡的赤字數額愈來愈鉅大；在經濟上是貨幣發行愈來愈增加，物價天天在作加速率的上漲，因為這樣，便造成了極嚴重的財政經濟崩潰局面。今天財政上所受到通貨膨脹壓迫，已經極其顯著嚴重，然而照現在的傾向看，將來還可能超過今天的程度。

第二，因為政府儘量的縮減「自由支出」和「對物支出」的結果，現在在政府的功能就變得極其簡單：中央是「戡亂」，地方是「保安」，其他都是附屬的，甚至可以說，是為了配合以上的目標維持的。所以今天的中國人民，除了倖存之外，實在享受不到一點政府的保護，更談不到享受施政的利益。

第三，因為政府壓縮「對物支出」和壓低「對人支出」的結果，現在根本談不上行政的效率，人民所感覺到的是「貪污」的流行和普遍。「貪污」的流行，對於政府壓低對人支出上，也許有一點幫助，然而社會和人民的損失却太嚴重了。

這種財政上由於通貨膨脹而起的支出增加超過收入增加的現象，要根本消除，祇有停止通貨膨脹，穩定幣值。當然，成問題的就是停止通貨膨脹，然而這也不難，祇要將產生財政收支不平衡的基本原因，就是將佔着財政支出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軍事費用裁減，問題就完全解決，然而這就須要「停止內戰」，這問題就難以解決了！ 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義的緊張局面

杜明

(一)

目下論時局者，對某一事件或某一問題有關兩造的力量搏鬥至緊要關頭時，輒以「攤牌」作比。假使因此誤認政治上的搏鬥是一種賭博，自然是不應該的。但即使是賭博吧，也不能老是用「白老虎」可以賭得全局的勝利的，最後仍得較量一下實力。在最後的實力較量上，「攤牌」一舉便具有真正搏鬥的意義了。

自從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出了援助希土法案，而「杜魯門主義」成爲流行口號，接着「馬歇爾計劃」也成爲時髦的名詞以後，歐洲的局面便向一個新階段演進。終於九國共產黨合組了情報局，聲言對付「馬歇爾計劃」。於是這樣一個對局便明朗起來了。

這對局的主要場面現在是擺在歐洲。歐洲人民並不是不需要援助，但正如英國拉斯基所指出，所謂援助不應該附帶政治條件。假使因爲接受了援助，不僅失却了經濟上的自主權，並政治上的自主權也斷送掉了，那麼，接受援助無異賣身，那是寧可餓死，不能失節的，而況無援助也不一定會餓死，只是艱苦一點，自力仍可以更生的。自力之道，便是在政治與經濟兩方面都澈底實行民主。可是歐洲有某些政治集團就怕這着，政治與經濟真正民主了，就沒有有了他們的地位，所以不能不出死力反對。他們寧可失節，不惜任何代價要借重外援來維持自己的權力地位。於是一面是寧可不要外援而要求政治經濟的民主，一面是借重外援來反對政治經濟的民主。在出錢援助的老闆看來，出了錢當然要賺利，假使債戶在政治經濟上自己已有辦法，那麼不特無從盤剝，而且將來變成了自己的對頭，後患無窮，所以只有援助那些死力反對政治經濟民主的戶頭。

這對局就是這樣：一方面是歐洲人民反對那令人永世不得翻身的外援，一方面是某些政治集團借重外援不讓人民翻身，以維持自己既得的權力地位。所以在實質上是人民與反人民的對局。

(二)

現在歐洲真到了攤牌的時候了。法義的政局已成了舉世矚目的場面。賴馬迪內閣自從十二日馬賽大罷工開始後，無論如何撐不住了，到十

九日不得不辭職。社會黨的元老勃魯姆出來作嘗試，而失敗，於是組閣之命落到人民共和黨許曼的頭上，於二十三日內閣成立。

勃魯姆的失敗是很有意義的。在法國這樣緊張的對局中間，社會黨還想以「中間」的面貌來緩和這緊張局面。勃魯姆在國民議會中的演說，一面反共，一面又反對戴高樂上台，似乎「中間」得很。可是他雖也是熱烈歡迎美國援助的一個，却没有打聽清楚美國的行情。反共固爲美國所歡迎，但戴高樂今日之所以異常活躍，究竟誰給他喝了一杯白蘭地？而且社會黨的「社會政策」的發霉變色的招牌，還不肯摘下來，出錢的老闆多少還有點不放心。於是勃魯姆也就「中間」不起來。

所以這對局中間已經黑白分明含糊不得了。據倫敦二十八日廣播，（大公報），馬歇爾會向皮杜爾表示，「美國寧願支持戴高樂，而不願目賭法國傾向共產黨」。這「開價」已極明白，毫無還價的餘地了。

人民方面亦不含糊。當賴馬迪辭職之次日，罷工人數已萬達六十，許曼內閣成立之日（二十三日），增至七十五萬。到二十五日加了一倍，達一百五十萬，二十七日又加了一百萬，共達二百五十萬人。而且地區也擴大到北非法屬地阿爾及里亞。全國二十一個工會已組成了全國罷工委員會。據合衆社巴黎二十八日電，「法國經濟仍陷於癱瘓狀態中，每小時均有新罷工發生」。這是對許曼內閣的「新開價」。

許曼的「還手」是什麼呢？他向議會提出了緊急措施法案，內容爲（一）暫時增加警察之權力；（二）將「罷工法」全部修改，工人決定是否罷工之表決必須秘密投票；（三）制止破壞工廠設備及妨礙不願罷工者工作自由之人。並於提出法案後，「立即作軍事上之部署，以應付可能發生之內戰」。合衆社巴黎二十九日電，更爲露骨說，「法政府二十八日深夜開始動員，準備內戰」了。內閣已「同意採取集中權力措施」，「在巴黎區組成龐大兵力，並向國民議會提出供十二月份用之一六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之軍事貸款，此項費用業已通過」。這樣，集中權力，動員武力，再加美元的軍事貸款，就成爲許曼的「新措施」了。而由內閣秘密集權決定的第一步新措施就「包括強迫動員在罷工中之碼頭工人，礦工，鐵路

工人及可能其他受共黨領導實行罷工之二百萬工人」。

這的確已到劍拔弩張的攤牌局面了。

(三)

義大利的局面就報紙電訊所傳，資料雖較法國為少，而其實質只有比法國更沉重。

從十三日的那不勒斯罷工開始，到二十六日，全國罷工人數已經有二百五十萬人了。而且義大利之異於法國者有幾個特點：

第一，義大利不僅在北部的工業區域有廣泛的罷工，並南部農業區域的農場工人也參加了罷工。這就比法國在數量對比及罷工的廣度及深度上，都沉重得多。

第二，義大利不僅罷工非常廣泛，而有若干地方已經不斷演出了武裝衝突。

第三，在武裝衝突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政府已經公開支持了法西斯右派集團，作為政府武力鎮壓的爪牙。

第四，因此義大利罷工的政治意味要比法國濃厚得多。義大利的罷工在一開始便提出了反對法西斯的口號，而米蘭的勞資委員會已要求直接管理工廠和參加財務行政。

第五，像米蘭的情形，左派各黨人士竟直接行動，於二十八日一度佔領縣府大廈，並派代表到羅馬要求撤換縣長。這類型的行動可能為別的城市所仿效。

第六，義大利比法國不同的還有一點是，左翼各黨派的聯絡似乎比法國來得緊密，尤其社會黨，除了右翼以外，始終站在反政府方面的。所以雖然喀斯貝里的天主教民主黨的一黨政府一直喊着擴大政府基礎，但甚多只能拉攏到社會黨右翼及共和黨的少數份子，毫不足挽回危局，因而遲遲不能實現。

這就無怪美國共和黨眾議員羅奇在陳述其在義大利實地觀察之印象時，要大聲疾呼地說，倘若義大利「失守」則希臘亦「不能保」，土耳其也「不能保」，於是地中海與中東「大勢隨之而去」矣。這對於「杜魯門主義」是何等驚心動魄的「危言」。然而事實上的確一點也不誇張，假使法義兩着棋完全輸却，則全局皆非，縱使能照美國的意圖，在德國西部建立一個親美的政府，也無補於「馬歇爾計畫」的大局了。

可見援助法義之所以「緊急」，就「馬歇爾計畫」言，實在有其該急

之道。

(四)

誠然，現在許曼與喀斯貝里除了滿心指望美援之外，實在沒有第二條路，而美國之急於要援助現任的法義政府，也是勢所必至的。這就是所謂攤牌的時候了。

可是，正因為已到圖窮匕見的緊急時候，急行無好步，便不免露出不能不令人致疑的許多破綻來。

當馬歇爾在哈佛大學宣布「援歐」的時候，陳義不為不高，好似一片婆心，慈悲為懷，要拯救歐洲的人民。可是現在所援助的却是動員武力準備內戰的政府，却是利用法西斯黨徒作爪牙的政府，人民反對這政府愈急，美國援助這政府也愈急。馬歇爾計畫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在歐洲人民眼中不是愈弄愈明白了麼？

還有一點使人不能不懷疑的是，縱使美國已經破了臉，不惜任何代價，支持許曼（將來可能是戴高樂）與喀斯貝里到底，究竟相互憑藉的是什麼？

法國一內閣發言人稱，政府對重要警官及全國兵團，實行一種肅清運動，將六十六名左翼警官及二千名有同情共黨嫌疑之兵團兵士解職。（合衆社巴黎二十九日電）而美國羅奇亦會說，「義大利共產黨勢力極盛，可於三數日內解決全國警察。」（聯合社華盛頓十四日電）那麼，武力是否足恃？萬一造成內戰的局面，即使戴高樂重來，羅德里尼復生，是否政府必操勝券，真是絕大疑問。

而且醉心於美援的，因為想望過度了，不免把美援變成抽象化了。從實際上只有一分力量，但在盼援者的神經系裏却變成了十分乃至百分的力量；甚至閉了眼睛不顧事實。

事實是什麼？就是美國現在心有餘，力不足，終至是愛莫能助的地步。這裏有幾個不能忽視的因素：

第一是現在向美國伸手要求援助的不止法義的許曼與喀斯貝里。窮多，難於應付。

第二，援助出得愈少愈慢，則盼援助者的窟窿便愈掏愈大，於是需要便更大更急，使援助者更難於應付。

第三，援助假使能及時趕到並且能充分的話，亦許援助可以在「商業性的立場」上進行，當賺錢生意做，可以出入周轉，應付裕如，愈援助愈

有辦法。可是現在這條道未必能走通，救濟性代替了商業性，有出無入，純粹變成了援助者的負擔。援助者縱有金山銀海，也有時而窮。

第四，而況援助者根本沒有金山銀海。他原來的援助計畫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使歐洲的財力資源由美國組織操縱起來。現在硬要債主拿出現錢來，大批給債戶自己化用，美國老闆那會這麼蠢？

第五，美國誠然是世界上第一個大財主，無奈窮親戚實在太多。加以自己「家務」亦愈來愈不順手。通貨膨脹，物價飛騰，日子也日益艱難了。法義等國情形誠然緊急，可是美國的經濟危機可何曾不急。現在還可以撥一點款項來援助一下，恐怕不久的將來，弄到自顧不暇的地步。美國現在不是已經打算禁止黃金出口了麼？

許曼與喀斯貝里和美國手裏的牌就是如此。法義兩國人民似乎已經看透了對手手裏的牌，所以一出手便來勢不善。這攤牌的局面實在是較量實力的搏鬥呀！

(五)

中國聖哲有言：「能近取譬，則近道矣」。眼前東歐各國與希臘的情形正是歐洲人民最好的一面鏡子，目擊耳聞，難道會無動於中麼？

東歐各國，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有的是二年計畫，有的是三年計畫，都使人民的生活走上了安定繁榮的道路，政治的民主既日鞏固，經濟的民主也日有進境。現在已以南保互助條約為起點與骨幹，進而促成東歐的團結。捷南波三國間已互訂協定，防止德國之再度侵略。匈羅亦訂友好互助條約及文化條約，捷保羅三國之間亦將互訂條約。這是不倚靠美援而自力更生的極好榜樣。

反觀希臘，正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正是外援之所賜。然而外援究竟收到了援助者預期的效果了沒有呢？希臘的游擊隊正愈剿愈多，現在蔓延到全境五分之四的地區裏，於是不得不為了應付這危局而成立了美希臘合參謀本部。這不是反證明了援助之並不可恃麼？

法義兩國的人民在這樣現成的借鏡之下，難道還會迷失自己的道路麼？

在這樣攤牌局面中，不僅法義兩國人民正經歷着嚴重的考驗，即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畫也受着同樣的考驗。全世界也正矚目於這一局，因為其結果關係於全世界人民前途實在太大了。

「收拾人心」

國大召開在即，參政會駐會委員會已在準備辦理結束了。但在結束之前，却發出了「迅速收拾人心，以利戡亂建國」的呼聲，鄭重其事的，把決議案送請政府切實注意。

當然，它將同所有參政會的提案同一命運：由政府歸檔存查，直等到灰塵蓋滿，紙頭發黃，再輾轉到什麼小販手裏，作為包花生瓜子之用。所以其中詳陳的各項辦法，如「懲辦不法大員，地方軍人之勒索吃空，富紳王侯者尤應迅辦」等語，文章雖然佳妙，可以擊節稱賞，却也不必一一具引，以免浪費筆墨。至於有「歷史癖」的讀者，檢查報紙可也。

然而「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瀕留之際的區別贈言，不甘寂寞的臨去秋波，真是忠厚長者之言。如果真能把人心一顆顆檢起，放進政府的荷包裏，則對於戡亂建國，無疑是一大便利。建國之所以不便，亂之所以不利，在參政會諸公看來，原因乃在於人心如牛羊一般放出去，逃散了。所以政府當前急務，該做一番孟子所謂「求放心」的工夫。

但某晚報「今日論語」，却譏之為「有點偏於唯心論」，而且勸政府應該「稍稍唯物一點」。誠然，參政會的呼聲，偏於唯心論，且也只是「有點」而已。因為祖述孟子，並未澈底。「以利戡亂建國」之言，反頗像梁惠王「何以利吾國」的語氣。在孟子這類純正唯

商翼

心論者看來，是要痛詆「何必曰利」的。不過這「今日論語」勸政府「稍稍唯物」的話，却既不中聽，也不中肯。他不知從來統治者，骨子裏，肚腸裏，都是澈澈底底的唯物論者。因為為政之道，一言以蔽之，「何以利吾家」而已。這還用得着你勸嗎？如果你硬要勸，那便是道破他隱衷，觸着他逆鱗，不識相，不知趣，有你有受的。好在這晚報上的作者，只說「稍稍」，發言尚算小心謹慎。但由此一言，也可斷定他一生一世當不上參政員了。

要勸，那就得如參政員諸公，唯心論一點。從來有本領的統治者，莫不內功利而外仁義，陰唯物而陽唯心。此所以漢代諸帝，自己實行黃老申韓之術（唯物論），却尊孔孟為王者之師，叫臣子們都誦讀六經（唯心論）。於是朝廷之上，一個個儒冠儒服；朝廷之下，一個個庸言庸行。而皇帝家庫呢，珍珠寶石就可以車載斗量了。如此人心願願收拾起來，犯上作亂者在絕跡，叛變不戴自平，家國不建自成，此之謂太平盛世。這時候，向外國借錢，馬到成功。叫熊貓小姐和番，也一定不致中途夭折。但推考其原因，當歸功於王者唯物而王者之師唯心的「勸兩翼」。

好戲百看不厭，一幕幕的變換，翻來覆去的演到現在。但只可惜今日參政諸公，已嫌手脚遲鈍，有點搭不上。他們雖也偏於唯心論，却只是「有點」而已。這就無怪乎參政會要取消，而代之以國大。拭目以待，等國大開會，收效更張，應該有一番真正的唯心論來收拾人心吧！

暹羅政變剖析

鄭道傳

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

暹羅雖稱爲中南半島上唯一的獨立國家，然而到今天爲止，它的歷史的行脚仍沒有跨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門限。

十九世紀上半期正當亞洲民族開始受難的時期，法英兩大帝國主義先後併吞了越南和緬甸，暹羅由於處在兩大之間的緩衝地位而得以暫免滅亡的惡運，但是類似「南京條約」的桎梏還是不可避免地落在暹羅人民的肩頭。以一八八五年的英暹條約爲起點，除了承認英人在暹羅有居住通商之權外，尙有關於領事裁判權與關稅協定等；接着法、丹、葡、荷諸國，也都根據英暹條約而取得同等的特權，後來雖然由於它在上次大戰中出過兩千大兵，因而獲得美國於一九二〇年首先取消領事裁判權及廢止三厘關稅，並且在一九三〇年前各列強都先中國而與暹羅進行修約談判，但是帝國主義者的鐵靴投在暹羅經濟政治上的陰影，還是與它的「難兄」中國的遭遇相同的。按暹羅的出產以米、錫、膠、木爲大宗，但在英法相持的時候，英國是它主要的控制者，當時英國在暹的大企業有（一）Bombay Burma 公司在北暹取得麻栗林面積三分之一的採伐權，每年製成二萬塊以上的木板輸出；（二）Borneo 公司，在三元曼谷有大規模的製木場，並經營火柴工業；（三）Luist Leons Wey 鋸木場，擁有廣大的麻栗木林，兼收買中國人的木材，輸出歐美；（四）經營米輸出的 Aiam 公司；（五）製米碾米及輸入機械的 Cooper Johnston 公司；（六）經營米輸出及其他輸出、麻包及其他輸入的 Steel Brothers 公司；（七）經營木場米業及倉庫業之 Anglo-Siam 公司，和輸入機械的 Barrow Brown 公司，此外尙有採錫公司十餘所，都是英人的資本。在暹羅的匯豐、渣打、麥加利等英國銀行操縱暹羅的金融，彷彿它們之在中國南方一樣。其後日本崛起，又從英國人手裏分肥去一部份利潤，日貨在暹的輸入急增，而構成英日角逐的焦點，——克拉運河的開鑿，尤爲英人所反對，因爲它將奪去新加坡的地位，這使得兩造的明爭暗鬥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發生才告一段落。

由於經濟上的被剝削所帶給暹羅人民的苦難是與日俱增的，單從一九二九年說起，當時農民由耕作土地所得的僅有剩餘，平均尙有九二台（約合八·三鎊），而在一九三〇—三一年度，卻不過七台（約合〇·六鎊），一九三一—二年度，甚且還要借債償付租稅。但與此苦難以俱來的新奇的新技術、民主思想、以及與上次大戰有關的「民族自決」和蘇聯革命，卻帶給暹羅人民以新的覺醒。這時首當其衝的便是以勾結帝國主義爲生的封建特權階級，於是發生了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一「不流血革命」，迫由前王拉馬第七頒佈新政，把君主專制改爲君主立憲。但由於專制政體的基礎原封未動，因此反動的貴族集團的反應作用仍然非常倔強，乃繼續演成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月、十月三次政變，最後雖然爲領導「革命」的「人民黨」取得決定的勝利，拉馬第七出走英國，由其侄馬希多以沖齡嗣位（那時尙在瑞士求學，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返國），但接着又造成「人民黨」內部文治派與武力派的分裂，前者以變巴立爲代表，他雖然曾以社會主義者的姿態草擬過「新經濟政策」，然而他是一個十足的機會主義者；後者以變披汶爲代表，他於一九三八年以國務總理而兼理內政、外交、軍事等七要職，盡量擴充兵力，勾結貴族殘餘，助成其軍事獨裁的局面。這位「袁世凱式」的人物，利用着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配以本國落後經濟基礎上所寄生的各種反動人物，一直跋扈到今天。

二、由「泰國」時代到日本投降後的投機人物

正當希特勒在歐洲高唱「大日耳曼主義」的時候，東方也出了一個隱聲虫，這就是一九三九年六月暹羅的易名爲「泰國」(Thailand)，以爲暹羅境內主要民族爲泰族，凡泰族應該統一於一個國家之內，凡有泰族居住的地方，都應該劃歸泰國，爲後來向越南索取領土及侵略緬甸的張本，甚至公然宣稱：「我大泰族分佈於中國西南部的約有三千餘萬之衆」。這個傑作的創始者即爲變披汶，他出身德國軍校，極端崇拜德國國社黨的作風，他所提倡的「獨裁」、「軍國」、「排外」的「唯國主義」，便是泰國立

國的指導原則。他對政敵的手段非常毒辣，曾於一九三五年遇刺未中，隨即有五十個軍官判處死刑，一九三六年又第二次遇刺，事後他監禁了十七名官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發生，他即於十一日在曼谷與日本締結攻守同盟，允許日本假道進攻馬來、緬甸及中國邊境（打洛、佛海、車里），十三日對國人廣播：「現在余欲向泰人等保證，余不是一叛逆之徒，余希望泰人知道日本乃我們生死之交，我們須與日本並肩……」；次年一月廿五日向英美宣戰，七月七日又正式承認南京傀儡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日本爲了報答它的「功績」，特「慷慨地」將揮部北部曼攀（Shan States and Muang Pan）二區與馬來亞的玻璃市、吉打、吉蘭丹、丁加奴四地割予泰國，於是泰國和它的總理披汶遂成爲一個激頭激尾的法西斯幫兇。

然而歷史的發展畢竟是屬於廣大的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西方和東方兩大法西斯先後在一九四五年垮台了，法西斯附庸自然也落到樹倒猢猻散的結局。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墨索里尼倒下的時候，被稱爲「機會主義的法西斯人物」披汶便已經開始感到苦悶，他曾於是年九月中旬發表其告泰國人民書，內容已不如以前之表揚日本的友誼，但警告泰人勿蹈意大利的覆轍，及後又將政府機關移往碧汶，似乎他早已另有打算了。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東條下台，披汶隨即找着一個替身亞拜橫，在他的勸誘之下於是年七月廿九日繼任總理，他一直做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四天才辭職。至於日本投降後的暹羅政局，曾經五易內閣，每一閣換的活動，都有着他的牽線者。我們透過這五位閣換的出身和政績，自不難窺出戰後列強在暹羅的微妙關係。茲先將這五位閣換的芳名和任期列出：

- 亞拜橫 一九四四年七月廿九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 汶耶吉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至九月十七日
- 社尼巴莫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九日
- 亞拜橫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至三月十八日
- 變巴立 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八月
- 變食隆 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九日

關於這些人物：（一）汶耶吉政府完全是屬於過渡時期的臨時政府的性質。（二）社尼巴莫是由美國幫助回國的，他是變巴立的得意門生，戰時在

美國領導「海外自由泰運動」，在他任總理後，由於美國的支持，他開始爲暹羅洗脫罪名，如於十月十五日解散國會，將「泰國」改回「暹羅」，下令拘捕戰爭禍首披汶，並自聯合國取得自理戰犯的權利。（三）亞拜橫出身高棉（柬埔寨）巴塔邦省藩王的家庭，留法的工科學生，一九三二年他就參加了變巴立等所發動的立憲革命，一九三五年以不管部大臣入閣。在日本統治期間，他一面參加親日的法西斯政權，但一面又暗中與英國連絡，因此戰後由於英國證明他是「有線」份子，不但得以脫逃戰犯的罪名，而且接着社尼巴莫做起總理來了。不過他的政府生命只有四十七天。這是因爲他的政策明顯地保護着貴族地主買辦資產者的利益，同時他又簽訂了屈辱的英暹條約的緣故。當他要去職的時候，他乘着自己已經失敗而新政府尚未接收政權的空隙，會唆使大理院宣佈釋放披汶等戰犯，寫下了今天重撐政權的伏筆。而且他下台以後即組織「民主黨」，在人民議會上站在反對的地位，作爲此後活動的「資本」。（四）變巴立是早已聞名的機會主義者，自從一九三二年立憲革命以來，他始終是暹羅政壇上的幕後人，他雖然與披汶的「政見」不同，但自披汶一九三八年登台以後，他仍然是披汶身邊的紅人，那時他不但擢升爲攝政委員會會員之一，最後竟單獨攝政，展開他領導暹羅的序幕。爲了替自己製造政治資本，他在一九三六年以「自由主義的政黨」爲號召而組織「自由泰」。日本統治期間，他一面與日本周旋，一面以「自由泰」的名義暗中與英美各國聯絡；日本投降後，他仍高坐在攝政王的交椅上，待十一月暹王馬希多由瑞士返國，他才辭退攝政的位子。人民議會決議給他以「元老」的頭銜，他繼續在幕後操縱暹羅的政治。一九四六年三月又從幕後出秉國政，並組織「憲法陣線」，聯合「職業黨」及其他小黨以與「民主黨」對抗，接着於五月初頒佈新憲法，在上議院的選舉中，他的黨羽佔了壓倒的勝利，但在六月九日暹皇忽告玩鎗自殺，一般人民及一部份下院議員都疑心變巴立弒君，民主黨更乘機大肆活動，變巴立力持鎮靜，首則宣佈「越邊邊境發生事件」以轉移國人視線，繼則委派他的心腹暹羅秘密警察組織者變亞倫出任陸軍總司令，從事全面高壓，最後於八月下院選舉中用盡種種方法，聯同「職聯黨」獲得一八〇名議席中的三分之二的多數，於是變巴立覺得上下兩院既被控制，政局可趨安定，他才退到幕後去，推他的傀儡變食隆出來繼任總理。（五）變食隆是「憲法陣線」的秘書，暹羅的海軍少將，他是與「元老」同一個鼻孔出氣的。

試改察上述從「泰國」時代到日本投降後活動於暹羅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各人都有着各人的國際背景，亞拜橫以「英國在暹羅的代理人」自居，變巴立則帶着他的秘書變食隆和他的高足社尼巴莫投向美國人的懷抱。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便認為他們的立場鮮明；譬如說變巴立所領導的「自由黨」固然親美，但「憲法陣線」的外交姿態却是親英的；亞拜橫的手裏雖然簽訂過英暹條約，但他所領導的「民主黨」却有親美的傾向；至於變披汶的嘴臉盡人皆知，自不庸再說了。總之，機會主義者的哲學在捕捉機會，進則見風轉舵，退則八面玲瓏，沒有原則，只有利害。這是暹羅政客們的傑作，也是暹羅國運的悲哀。

三、「一·九」政變的內幕與後果

戰後處置「泰國」的寬大政策為暹羅的政客們預留着「機會」，而目前涵湧在國際間的逆流又為他們帶來了「機會」，於是，經過一度「韜光養晦」的「機會主義的法西斯人物」變披汶便乘機再起了。

十一月九日，變披汶發動暹羅陸軍軍官五十餘人，以陸軍中將蔣屏、春和汪、少將變察、上校變角為首，於是日零時在國防部發難，用坦克車控制曼谷。變食隆及變巴立倉皇出走。次日新政府即告成立，以亞拜橫出任總理，變披汶則退居幕後，並由前攝政王察納、前國民議會議長塞維、及亞特爾特契拉斯將軍、亞隆柯與希耶宇德中將等五人組織樞密院，由社尼巴莫起草憲法，樞密院予以頒佈，恢復國王在一九三二年一部分被奪的權力，同時又恢復兩院議會的舊制，但上院議員改由國王任命而非民選。變披汶並令木西里親王於十四日飛赴瑞士，迎接下月五日即告成年之國王符密豐返國。新內閣於十一日接管行政，於是對內一面下令全國各地防軍與抗拒新政府的「暹羅人民反抗軍」進行戰鬥，一面強調「新政府最迫切之任務為解決去年暹王馬希多死亡之謎，肅清官吏的貪污與腐化，改進人民的生活水準」；對外則進行爭取各國對新政府的承認，目前中、英、美尚在一「密切注意」其「發展」，而瑞典、丹麥、瑞士及葡萄牙則已在事實上予以承認。「時間」似乎對暹羅新政府是非常有利的，到本月廿九日為止，新政府已經要調換前政府派駐聯合國的代表和駐華大使了。

我們仔細分析此次政變的內幕，實不外變披汶利用軍人集團與民主黨這兩支「友軍」協同作戰的結果。政變主角春和汪中將告記者稱：「余本人並不懷有出任總理之野心，但余認為變披汶較任何人均為適當」；又據政變者方面發表公報稱：「曾與政府軍總司令亞特爾德加拉成立協議，故

未發生流血事件」，亞特爾於政變後並命令全國軍隊：「蓋此次軍事行動，係為公眾利益而採取」，接着亞特爾即官拜樞密大臣，我們自不難窺出他們事前的妥協跡象。至於亞拜橫出任總理，社尼巴莫起草憲法，因為他們是「民主黨」的正副黨魁，「民主黨」是政府最有力的反對黨，久已在進行倒閣運動，變披汶自然樂於拉攏。而變披汶功成不居，因為他過去的歷史太不「雅觀」了，不得不暫避「嫌疑」，亞拜汶說得很明白：「余深知變披汶一日與現政府發生聯帶關係，多數國家殆難承認現政府，但暹羅現政府現仍須變披汶以維持國內治安」，我們更不難揣知其言外之意。此外，加速促成這次政變的基本原因，在國內固由於變食隆政府的腐敗無能，政府官員肆無忌憚的走私（赫赫大名的第五區行政專員乃烏隆為有名的走私主角），而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理由，則由於戰後列強對變披汶的「寬容」，以及它們在德、意、日同樣的「寬容」所給予的「激勵」，這次政變，是由美國策動的，這固然表明了英美間的矛盾，而意義尤為重大的是：杜魯門主義的觸角已伸展到中南半島來了。故從變披汶再到變披汶，實是一條必然的道路。

然而暹羅法西斯的再起，對今後的世界和平，對東南亞正在苦鬥中的殖民地獨立運動，尤其對三百多萬孤苦無告的暹羅華僑，將是一個莫大的威脅，眼看着第二次大戰中各民主國家不惜任何犧牲所打垮的對象又重新站起，我們實不勝為今後世界和平的前途懼。又據倫敦本月十日廣播：「越南與暹羅之間，勢將因暹羅政變而發生嚴重糾紛，……變披汶或將以真正之軍隊為暹羅對越南作領土要求之後盾」，按暹羅過去在日本協助下所獲得越南東浦寨一部分土地所引起的邊境糾紛，迄今尚未解決，變披汶東山再起，自難忘昔日的好夢。不但如此，變披汶這種不循民意而用暴力所獲得的成功，對於那些行將沒落的殖民地上的封建殘餘，無疑地有着「強心」作用，緬甸益山的碧血未乾，暹羅的「苦迭打」繼之而起，東南亞落後國家的人民真需要加倍警惕呵！至於華僑，幾乎是將「排華」與「變披汶」並稱的，他是殺害僑領曠光炎的劊子手，他親手訂立過保留職業、設禁區、封閉華校華報各種排華奇例，今後是否將如變披汶於本月十五日對中央社記者所稱「中國人民與暹羅人民應以兄弟之情相愛」，這實在不是變披汶的諾言所能保證的問題。而中國在暹的官方人士，不讓履霜堅冰之誠，反而替變披汶幫腔助陣，不知是何居心！

三十六年十一月廿九日于福州。

河南——山東第二？

廷光

困守在平漢離海 兩鐵的十字架上

隨着南綫戰爭的發展，河南很快地大部淪為戰場了。如果說過去河南還得偏安一隅，苟延殘喘，那麼現在已是到處烽火，危急萬分了。打開地圖看看，豫北方面，新鄉以北幾全由共軍控制了，僅剩下新鄉以南平漢路沿綫及新鄉東西原來道清路的一段尚由政府佔領。豫西自陳渡渡河以來，戰場日益擴大，洛陽以西直到潼關都曾被共軍佔領，而此段臨海路上的一些據點剛經收復，豫西南便吃緊了；共軍主力南下，席捲了十多個縣城，直到最近，戰火竟燒到以自衛能力雄厚著稱的鎮（平）內（鄉）浙（川）一帶了。豫東則黃泛區幾全為共軍盤據，黃泛區外圍四方，則又有共軍經常打來打去；北面常常打到開封外圍的朱仙鎮、陳留一帶，南面則屢屢伸延到汝南週邊，與大

別出的烽火會合。豫南則信（陽）潢（川）路以南大部淪入共軍之手，信潢路兩側也常一夕數驚。人們比喻說：政府所能控制的河南，僅是一個十字架了，一根直木是平漢路，另一根橫的則是離海路。現在，連這個象徵苦難的十字架也已岌岌不保，洛陽以西直到潼關間的鐵路綫淪為戰場於前，近來開封以東以迄徐州外圍的鐵路沿綫，也發生了戰事，鐵路遭受空前的破壞，短期內絕難修復。過去，人們常常把山東看作內戰中最殘酷的戰場，看作內戰下典型的犧牲者；現在，河南的人士已常常說河南變成山東第二了。這個比喻，也許並不十分恰當，然而，無疑的，它反映出河南局面的日趨惡化。近月來，在河南省參議員們及黨政軍首腦們間流行着一個口號：「河南自救」；辦法是起用地方領袖，發動地方武力，以自衛自救。這種呼聲是向中央呼

籲派大軍來豫無效後無辦法的辦法，因為中央顯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指望中央一時無甚希望。這種呼聲，是悲劇性的，是失望之餘悲慘的叫喊。不過，在這種悲劇性的氛圍中，也不無小小的喜劇性的插曲；不是很有幾位目不識丁的地方領袖已受客觀局勢之賜而變成了縣太爺了嗎？不是汴鄭等城有很多的投機家已因戰局的惡化而又發過橫財了嗎？不是很多官吏已因戰事波及所轄地區而報銷了無法報銷的虧空了嗎？

北·南·東， 西的四面戰歌

就河南全省說，戰場可分為四個：豫北，豫西，豫東，豫南。豫北指的是黃河以北。這個地區在勝利時就大半在共軍控制之下。北秋是國軍的頂盛時代。那時，大體說來，安陽以南幾全被政府控制住了。隨着今春魯南戰事的展開，豫北國軍大批調出，於是形勢便漸漸轉變。到春之交，劉伯承發動攻勢，湯陰淪陷，老江湖孫殿英被俘，局勢乃躍入一新的階段。國軍控制區日被蠶食，以致只剩新鄉以南平漢沿綫及新鄉東西的百餘里地了。不過，隨着今秋劉伯承的南下，豫北戰場便又處於相持狀態之中。雙方主力均已他去，剩下的是土八路與地方自衛隊間的角逐了。數月來，這裏無大變化，原因也許在此。

豫南則指的是潢，光，固，息，商，羅，經，信等縣。這一地帶，大體在淮河之南，大別山北麓。自劉伯承大軍南下後，這裏就大部淪入共軍之手。由於國軍在這一帶原很空虛，所以，共軍並未遇到大規模的戰鬥。這一地區，就河南說，本是魚米之鄉，地方比較富庶些，今秋稻子又是十足豐收，所以劉伯承佔領了它，在達到其「求食」的目的上說，是不會失望的。共軍

到達後不久，爲了確保其佔領區域，兵力由分散轉而趨於集中，因此，一度擴展及於信潢路以北的共軍現在也已南撤；現在信潢公路已由國軍控制，但時常仍有共軍出沒，公路亦時有破壞。至于公路以南的廣大地區，國軍便大部喪失控制了。不久以前，由於國軍在鄂南黃梅一帶失利，駐守信潢路的八五師便撤向鄂東增援，共軍乃又乘機出擾，陷光山，追潢川，待國軍再派來一旅隊伍，局勢始稍見緩和。然而國軍雖又駐守信潢公路沿綫，出擊力量却仍是談不到的；而共軍於難出幾進之間，物質的收穫倒很可觀，地方的武力也大多被其摧毀。在信潢路南，共軍已在積極推行政治工作，土地改革也在實施。國軍方面，軍政配合工作未見改善，而且過去數月間國軍紀律之糟，更使軍民的合作變成了空想。

豫東戰場，南及于汝南新蔡一帶，東及于皖北毫縣、太和、阜陽一帶，西止於平漢東側，北達臨海沿綫，與山東戰場連成一片。這一地區，去秋時共軍原只剩有幾千土共仍在活動，其根據地在泛東。今春政府曾動員十萬兵力，包括國軍、交警、省保安團及地方武力，會剿他們，然而由於他們軍政配合，長於游擊，光與政府大軍兜圈子，所以不曾被消滅。如今整個泛區已盡入其掌握，其外圍也逐漸擴張起來。由於這一地區在地理上是由山東到大別山區的一條跳板，是共軍補給綫之一，所以共軍對它是很重視的。劉伯承大軍及陳毅部隊都在此與土共會合。尤其陳毅部隊在此對其控制區之鞏固與擴大，曾盡力甚大。省保安團中作戰最強的保二團及保五團，就先後在通許及陳留被殲滅，兩團團長，一被俘，一陣亡，營連排長傷亡與被俘的也都過半。而由豫西南調來的兩團兩個團，也在鄭陵一帶被打垮，損失甚重。現在黃泛區已無國軍及省方武力，共軍更趁勢向外擴張，把汴徐間的臨海路徹底破壞六段，距開封僅廿餘里的興隆車站就曾遭到破壞。

豫西戰場，本來局勢於洛陽開闢的臨海綫一帶，但是隨着共軍的向南深入，戰火也日漸擴大起來。十一月初，共軍主力大批南下，犯臨汝、登封、鄭縣、寶豐、魯山、葉縣等，而南入豫西南一帶，現在戰火已燒過舞陽、方城、南召，而及于南陽、鎮平、內鄉、唐河等地了。共軍原在洛陽外圍會折損國軍整編十五師一個團，此次南下至鄭縣時，又與十五師作戰，結果十五師全部打垮，師長武庭麟、副師長姚某均被俘，殘餘部隊集中開封整訓，補充到現在，還不過二千人而已。伏牛山北，地方武力也已摧毀殆盡。伏牛山以南的鎮平、內鄉、浙川、鄧縣一帶，民團武力是全國有名的，他們已聯防起來，動員了十四個團與共軍火拚。結果鎮平仍不免失陷，南陽告急，內鄉被圍。據聞共軍前鋒則已深入鄧境了。這一帶，也許由於中央信賴地方武力，所以國軍一向很少，當共軍南犯寶豐魯山等縣時，河南省參議會即曾向中央求援，蔣主席並允派

兵一師駐防南陽，然而由於兵力不敷分配，當共軍數日前攻犯南陽西六十里之鎮平時，南陽國軍只有一團人困守城垣，自無法與國軍配合作戰，以解鎮平之圍。至地方團隊抗擊共軍的能力如何，則有兩種相反的看法，一種是樂觀的，以為他們組織嚴密，歷史悠久，在保衛家鄉的抵抗能力；另一種是悲觀的，以為他們本質上是封建意味很濃厚的組織，階級森嚴，團長領袖驕橫兇暴如土皇帝，其士兵如被共軍煽動，戰鬥力可能瓦解。這兩種看法誰較近於真情，讓未來的事實去解答吧。

是第一個山東嗎？

與半年前相較，河南的局面確已大為逆轉了。河南由於無人在中樞說話，從抗戰到現在，一直對中央盡着最大的負擔。抗戰期間，征兵征糧，河南佔全國第一位；勝利後苦難更深重了，以去年為例，全國征兵五十萬，河南就分攤達十萬以上。人民痛苦本已太深了，現在隨着戰

局的擴大，苦難自然更加增長。人們說，河南已成山東第二了。其實，如為政府着想，河南的危機也許比山東還要嚴重。山東畢竟集中有大量國軍，共

長江以南黨的動亂

王士章

正在北方戰事發生着新的變化，而劉伯誠部的共軍推進到長江邊岸的時候，南方的共黨勢力也在加速蔓延之中。近日浙江廣西廣東福建安徽等地的治安問題已愈來愈趨于嚴重，連雲來不以爲意的當局，現在也開始焦急起來，「剿匪指揮所」以及各種清剿機構的設立，便是當局對於內部治安焦慮的明證。

浙江省的「匪患」極爲嚴重，除了滬杭路上七八個城市以外，全省可以說沒有一片乾淨土。浙東不必說，就是浙西也已經風聲鶴唳，惶惶不可終日了。浙江省的「匪患」分佈在下列各地區：

第一是三北區。這一區地處鄞縣慈谿餘姚以北沿杭州灣的產鹽地區，共軍在這裏已經有了好多年的歷史，樹立了根深蒂固的基礎，擁有武裝兵力約五六百人。其軍隊經常出沒於鄞東西及慈餘諸地，組織宣傳隊和抗暴隊，宣傳反對三征（即征兵征糧征糧），因此頗得農民的同情，並且設有「浙東行政公署」，展開政治工作

惡化，政治腐敗的河南一且爲共軍全面控制，對於其「求兵」「求食」將大有裨益，對其戰略形勢也必大大有利。這對政府方面自然是個嚴重的損失。

長江以南各省的農村都已經在積極的轉變之中，武裝的農民所在多有，尤以浙江和廣東爲最嚴重。四川雲南湖南江西諸省，雖然武裝起來的爲數不多，但也已經在醞釀着不安的情緒，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

第二是四明山區。這一區差不多包括了寧屬七縣，因爲地理環境的優越，大家知道皖南黃山是共軍的「老巢」，新四軍被解散後，其殘部即集積在黃山地區，後來這股兵力更滲入天目山區，在這一帶建立了根據地後，經常出沒於昌化、於潛、孝豐、武康、安吉、德清等地。此區地鄰杭州，繞太湖便逼近京滬鐵路，而且就在京杭國道的左近，所以省府當局看得特別緊要，近來已禁止遊覽莫干山，並在此處成立「清剿指揮所」，但也還沒有表現甚麼具體的行動。

浙江

第三是蘇浙皖邊區。這一區介於錢塘江和浙嶺鐵路

第四是會稽山區。此區包括蕭山、紹興、嵊縣、東陽、諸暨等縣，共軍的旗號是「會稽山人民抗暴遊擊隊」，由周芝山率領，約有武裝農民千餘人

第五是諸浦地區。此區介於錢塘江和浙嶺鐵路

之間，包括諸暨、浦江、建德、義烏等縣。共軍的這支部隊雖然是新近編集的，但是配合了當地農民不滿的情緒，其勢力却發展得相當的快。其首領爲丁谷之等，擁部衆不下七八百人。

第六是雁括山區。這區的範圍是雁蕩山和括蒼山脉，以地處僻壤，而且是一片崇高山嶺，故當局力不能及。共軍出沒無常，附近如樂清、黃巖、仙居、永康、縉雲諸縣，迭傳警報，人心惶惶。

第七是沿海地區。共軍活動最烈的部隊要算在定海、象山、南田一帶出沒的徐小玉股。這些共軍隊伍擁有小艇百餘艘，往往捨舟登陸，深入內地，活躍于奉化、溪口、鎮海等地；國軍地方團隊一到此地，少則常被包圍繳槍，多則甚至於相率入海，當局對之亦無可奈何。此外如三門灣等地也有少量部隊活動。

第八是閩浙贛邊區。零星的武裝農民，在常山、江山、龍泉、廣豐（在江西境）等地，所在多有，但還沒有發展到有組織

有計劃的地步，所以暫時還不值得注意。

總之，浙江全省幾乎無處不在烽火之中，當局只能夠保證城郭的無恙，對於鄉區則簡直是聽其自然，束手無策。

福建

福建的情況，比之粵浙自爲小，但這並不是說福建太平無事。連年的兵災、水災、旱災，再加上捐稅的繁雜和封建勢力的榨取，迫使農村一天比一天多事起來。

在閩南地區，由於天災，更由於人禍，使已經掙扎在死亡線上農民不能不「挺而走險」，很迅速地發展爲有組織的武裝鬥爭。目前戰爭蔓延在閩邊境的平和、雲霄、詔安、永定、上杭、龍巖、長汀、武平、漳浦、連城等十餘縣，民變首領黃士誠已經設立了「閩粵邊區軍司令部」，擁有武裝農民千餘人，宣傳着「反三征」、「劃十劣」等。

閩東沿浙閩邊境活躍於浙境慶元平陽泰順等縣的共軍，近更越過省境，

配合寧德、福安、壽寧、福鼎、霞浦、屏南諸縣武裝農民，組織「福建人民謀生隊」，打開官倉，分錢穀與農民，以此聲勢益大，近更建立「浙閩邊區」，指揮二省邊界的武裝鬥爭。

此外如閩西崇安浦城諸城，農民的武力亦已在加速蔓延之中。

廣東

廣東的「治安」情況，在南方諸省中爲最嚴重，省政當局可說已到了不能控制的地步。廣東全省正規軍原僅二旅，但是由於前月劉伯誠的進攻院中，京滬吃緊，連這僅有的二旅也被空運調走，現在粵大的廣東省，已只有些許地方團隊保安隊之類。試想這些無紀律無訓練的實力，怎能負起「維持治安」的重擔呢？我們試把全省情形分東路、南路、北路、與海南島四個部份來敘述。

上述諸路以南路爲最不安靖。自安南粵桂邊境直到陽春江爲止，東西八百里區域內，全部在共

軍的控制之下。南路的共軍，據官方估計，有二個縱隊（每縱隊相當于一軍，包括三個師），一縱隊在合浦、靈山、欽縣、防城諸地，另一縱隊在湛江（廣州灣）、吳川、化縣、廉江、遂溪、海康、茂名、電白、陽春諸地。

「欽防縱隊」的根據地爲十萬大山，這支部隊方在今年五月成立，由廣東省立法商學院學生劉鎮夏領導，至今已擴充至三萬餘人，號稱「人民解放軍」。劉鎮夏是六十四師一五六旅旅長劉鎮湘的胞弟，他於五月間率領武裝農民在防城所屬的光坡、企沙二鎮起事，一舉攻佔東興，打開糧倉，散給貧民，並且宣傳着「反對三征」等，因此他的勢力便擴大起來，以十萬大山爲大本營，四出攻戰，迄今差不多已佔據了合浦、靈山、欽縣、防城諸縣的全部村鎮。這事引起了省府當局的震驚，即於七月初派前一八五師師長陳克強率保安第九總隊（等於一個團）前往「進剿」，並且成立了「欽防清剿指揮部」。但是直到現在爲止，

敵方氣餒不但不殺，反而攻佔了一連串的村鎮，如那良、大直圩等。而且因爲官軍紀律不佳，甚至燒村莊、搶糧食，給了當地人民深刻的印象，因此共軍的聲勢便愈來愈大了。在劉鎮夏的隊伍裏，主要幹部都是大學生和高中畢業生，因此組織比較嚴密。這也是劉部勢力能以迅速擴張的原因。

南路共軍的另一縱隊由張世充及張炎二人率領，主要根據地爲雷州半島。這支部隊雖然地處平原地帶，似乎不易防守，但因爲南和海南島相接，北與勾漏山的共軍取得連絡，西與劉鎮湘的部隊毗鄰，所以沒有左右顧盼之憂。他的主要幹部也大都都是智識青年，目今已差不多控制了其活動區域內的全部村鎮。在吳川和化縣，僅有縣城及六鄉爲政府所控制；廉江與遂溪也只有三鄉安全；至於雷州半島，則只保住了海康縣城，徐聞縣已被佔據。在戰事初起的時候，地方當局認爲「不足爲慮」，因循苟且，戰敗則隱匿不報，小勝則誇大其詞，以致縣府

所能控制的區域日益縮小，本來只放棄鄉村，往後逐漸連鎮區也保持不住，到現在則甚至縣城也遭到圍攻。局勢已經發展到再也隱瞞不住了。省政當局爲「根本肅清匪患」，組織了「剿匪總部」，據稱「部業業已完成，並已獲初步勝利」，但是看近日的戰況，戰線仍舊停滯在茂名信宜一帶，顯見還沒有得到任何進展。當局所感到苦悶的，兵力不足尙在其次，主要是百姓多已「匪」化，往往爲共軍帶路，襲擊國軍後方，以致三月來的清剿無多大成就。

南路共軍聲勢最爲浩大，實力也較雄厚，這一方面是由於儘量吸收智識份子並嚴密組織的結果，一方面也由於彈藥的充足和給養的便利。給養多自港、澳、海南島、越南諸地而來，武器配備則大多來自越南，而兵員的補充和訓練則多在海南島；共軍擁有船隻二百餘艘，經常往返越、瓊、粵諸地之間。海南島在今日差不多已成了南方共軍的根據地

和主要補給站。島的四分之三都在瓊崖縱隊控制之下。在內地的縣城如白沙、樂東、保亭、定安等都被攻佔，甚至如清湖港等亦被佔領。

國軍現在差不多是困守瓊州，能調來應援的只有二個保安總隊，還不滿二千人。試問以如此單薄的武力，防守主要縣城，尙感捉襟見肘，怎能「一鼓肅清」呢？目前共軍已在海南島設行省，派縣長，他們在其佔領區中非但接收了敵偽遺下的豐盛物資（日寇南進時即以海南島爲「南海中的航空母艦」），而且還經營着許多化工廠、軍火製造廠、以及若干飛機場等。

北路的局勢也已發展到了嚴重的地步。此區共軍的主要根據地爲贛、粵、湘邊境的大庾嶺，設有「贛粵湘邊區司令部」。由於地理環境的優越，配合了當地人民的不滿情緒，它的勢力便迅速地膨脹了起來。南雄、始興、仁化、樂昌、翁源、龍南、新豐一帶，大部村鎮都陷入其手。它擁有兵力一個師，號稱「人民解放軍

北江縱隊」。北路的水運目前僅能通到英德，南雄始興二地尤爲吃緊，縣城和外界都已失去聯繫，而新豐縣長則被共軍捉去。始興原是張發奎將軍的家鄉，張曾數度遣兵增援，無奈等到國軍一走，共軍便又進佔，結果只是徒然勞師動衆而已。

廣東東路原是共軍「東江縱隊」的根據地。自從停戰令頒下後，此縱隊即撤至北方。但自去年全面性內戰爆發後，因爲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所以武裝的鬥爭便日多一日。目前在海陸豐、紫金、惠陽、博羅等沿海區域，以及五華、龍川、河源、龍門、增城、從化等地，到處都在爆發着或醞釀着「農民叛變」，危脅廣九鐵路。此外在江西福建廣東三省交界的地方，即共軍所稱的「閩粵贛邊區」，則有以羅觀橋、賴福元爲首的「閩粵贛邊區民衆義勇隊」，擁有武力約二千餘人，經常出入於饒平、大埔、蕉嶺、平遠、梅縣、武平、平和、尋鄖等地。目前該三省已實行聯防，並組成「贛粵閩三省聯防司令部」，企圖加以肅清云。

在號稱「廣東心臟」的粵江三角洲，武裝的「農民叛亂」亦已甚爲激烈；在廣寧有謝漢光部的「西江人民義勇軍」，高要有鄧伍所部，開平恩平有自稱「民主聯軍」的馮超、陳中雁所部等，共約二千餘人。

總之，整個廣東省現在差不多已成了共方所稱的「第二戰線」的副哨，戰火正在南方加速蔓延中。

廣西

廣西情形也差不多和粵浙一般的嚴重，除了北部的山岳地帶以外，其餘如桂東、桂南、桂中、桂西等地，戰火正在爆發着，甚至由鄉村的脫手進而爲縣城的失陷。而省府當局維持治安的力量，總共只有四個保安總隊，試想以不足五千人的非正式軍隊，而要維持像半個法國那麼大的土地的治安，這真是何等艱鉅的工作啊！

桂南的戰事主要是蔓延在勾漏山區的容、藤、岑溪諸縣，有「民主聯軍獨立第十師」的黃世靈部和李達部，今年三月中旬，曾攻入藤、容二縣城，造成著名的「藤容事件」。目前這支部隊已與粵南劉鎮夏部會合。另一股是活動在陸川博白等縣而由鄒某領導的「化北軍區司令部」，一度曾攻入鬱林縣城。

沿鬱江流域的貴縣、橫縣、永淳等地，局勢更見嚴重。全部鄉鎮都已捲入了殺伐的漩渦，這裏的共軍由莫平凡所統轄，最近開攻貴橫二縣城，該二縣縣長且因「應變無方，剿匪不力」而撤職查辦了。

十萬大山的北麓，即所謂桂西之地區，「農民叛亂」正在鬱寧、扶南、上思、綏濠、崇善、恩樂、養利、龍茗等地展開，以陳高和及一部舊軍官總隊隊員爲首，在各地組織及武裝農民。

西區一帶，戰火已在東甯鳳山蔓延，前月萬岡縣城且被攻佔，目前平治百色等地的農村均已告警。

在桂省中部的柳州、

遷江、賓陽一帶，在戰時即有「農民抗日義勇隊」的建立，勝利後這支部隊的擴充頗爲迅速，自去年冬，賓陽遷江一帶貧苦農民千餘在岷南關起事後，聲勢更形浩大。上林都安一帶的農民，由羅某領導着，宣稱「反抗壞政府」，而象縣和猶山區也有「民主聯軍」出現。

桂東北的「股匪」主要係以都龐嶺、萌渚嶺、臨賀嶺爲根據地。他們在山地裏有工會、農會、婦女會等組織，並且發散宣言，組織青年，並已正式命名，稱「桂東解放區」。他們活動的區域，由全縣、興安、恭城以至富川、賀縣，湘粵桂當局爲此特組織了三省聯防司令部，以期「一股殲滅」之。

近來雲南的治安問題也漸漸嚴重了起來，活躍在滇南的有自稱「民主聯軍滇南第一縱隊」的許世好部約五六千人，經常出沒於蒙自、箇舊、石屏、建水等地，以不徵兵不納糧爲號召，目前廣容智識

份子，積極發動宣傳隊，因此勢力擴充得很快。省當局曾遣官軍第九十三旅前往督剿，無奈正如雲南某官報所言「無知愚民，匪化已深」，未見有何成績。在滇西彌勒、瀘西、陸良、開遠諸縣，滇北巧家、魯甸等縣，均有一「民主聯軍」的活動，尤其滇西諸縣鄰昆明，頗使省府當局頭痛。

抗戰時期成爲全國心臟的四川，現在也變得不得了。共黨的軍事活動日見擴大，川北川東諸地，情況更見嚴重。米倉山區的南江、通江、巴中、蒼溪、廣元、寧天嶺南區的江油、劍閣、平武、北川、茂縣等，共軍的力量日見擴充，「反土劣、反捐稅」的宣傳，轟動了多少貧困無告的農民。大巴山區的風聲一陣陣傳來，說是李先念的部隊已經盤據該處，嚇慌了省政當局，成天的開會、商討，結果是通過了增強川北、川西防務，並請中央調兵等案。

至於湖南來說，洞庭湖以北的安鄉澧縣一帶，湘東的幕阜山平江一帶，亦風聞有數千共軍集結，

徐圖大舉。

長江心臟區

現在要說到長江心臟區來了。這裏最堪注意的是皖北、皖南、和江南。皖北近來差不多已打

得一片瓦礫，廣大的西部地區，自壽縣、渦陽以迄潛山、太湖，都在劉伯誠陳毅的部隊控制之下，自不必說；即在蘇皖邊區的洪澤湖周圍諸縣，如天長、盱眙、六合、五河、泗縣、靈璧諸地，也有以「皖東北人民自衛總隊」名義活動的謝楠部四千餘人。

在前月合肥吃緊的時候，此部曾進攻六合縣城，威脅南京。此外在津浦路淮南路之間的鳳陽、定遠、嘉山，也有孫傳文周依賓率領的「淮北游擊大隊」二千餘人。這些共軍現在都在「蘇皖邊區政府」主席李一氓指揮下從事活動。

皖南的局勢已呈極嚴重的狀態。此區本來是新四軍的根據地，皖南事變

後，其殘部仍佔有黃山附近地區，幾年以來，在農村中打下了深固的基礎。

目前在宣城、涇縣、寧國、太平、旌德、績溪、歙縣、石埭、廣德等處，縣府軍隊只能防守縣城，績溪縣且曾遭受到攻陷的慘運。其餘各地也都有朝不保夕之勢。據傳衢州綏靖公署擬「合圍而聚殲之」，至於成效如何，尙未得悉。

近來太湖周圍的共軍又特別活躍起來，以平台山為據點，出沒於無錫、宜興、溧陽一帶，而且有小股潛入蘇州、江陰、武進等地。無錫上月曾發生保衛隊二十八人被共軍俘

虜事件，蘇州近也宣告戒嚴。而在南京東南的茅山區，共軍也日漸活躍。最近省保安司令部據報稱，共方預定在本月二十日開始大舉動，會合江北渡江之隊伍，先攻蘇州武進，將京滬路切為三段云云。此說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但當局正加緊部署，嚴密防範，則似乎是個事實。

總之，現在共軍已在多面活動，而其根本懸特的一點即為民生問題的不能解決。如果當局只顧堅持武力，非但不能使地方安寧，而且只能得到相反

的結果，況且當局也沒有這許多武力。根本辦法，須從自己做起，肅清貪污，嚴懲土劣，停止內戰，實行民主，這才是自救救人的辦法。否則人民不能生存的時候，相率走險，

又怎麼殺得光呢？例如海南島甚至有十殺之戒與連坐法等，這非但是官道民反，而且簡直視國民如牛毛了，那末人民當然要團結如蟻，死命抗爭，而其力量也不可侮了。

皖省國代選舉內情

杜漸

政府在「戡亂」與「行憲」並行的原則下，雖全國戰火瀾漫，動盪不安，對於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仍堅決不再改期而如期舉行了。十一月二十一日這一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報紙上，都以顯著的地位刊登選舉的消息，特號字的大標題差不多都是說：「民主憲政國基永奠」。大小城市裏的熱鬧街市上，都高掛牌樓，懸燈結彩，顯然有一番新氣象。

皖省的選舉，因有若干縣份為共軍佔據而事實上不能如期舉行，結果有三分之一地區准予展期，這使競選的熱中者大為

掃興。以皖省當前的動亂局勢而論，天災之餘，繼以兵禍，人民陷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水深火熱中，對於這樣所謂「奠定國基」的「大事」，委實不感興趣。他們的漠不關心

的態度，不是由於「文化水準低淺」呢？

在事前，曾一度盛傳選舉再展期之說，許多人曾向當道者提出此項請求，似乎已形成了一種運動。各省市參議會都紛紛響應，皖省參議會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們所持的理由是：目前共軍猖獗，全國軍事日趨緊張，而一般人只知傾力於競選，分散了「戡亂」的力量，所以他

們請求趕快停止選舉，以便集中全力「戡亂」。這一種運動雖沒有掀起什麼巨大的波瀾，但也非出於偶然，而是一種含有政治意味的挑釁：他們曾經公開的提出過「反對少數人把持選舉」的口號。這「少數人」究何所指？只要

是稍有常識的人都一目了然，不待明言。

黨內有派，派內有派，正如大圈內有重重的小圈。而各個小圈之間的利害衝突，又是難以避免的。最近兩三年來，重慶南京兩地所發動的接二連三的倒李品仙運動，正說明了這些事實。倒李品仙的運動，斷非出自自人李品仙的來頭大，有

更正
本刊上期第六頁下方
末三行的「湯明先生」
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一
文內：「不過因為英美法
或則牌子很老，或則新發
了財，都是所謂「有」的
國家……」誤為「有」的
為英美法或則牌子很老，
或則都是所謂「有」的國
家……」，應予更正。

因「選舉」而發動「倒李」

可靠的靠山，明知道例是倒不了他的，但是作為一種挾持手段，借此擠一點油水，却屢試屢驗。於是有意在安徽染指的皖人，就不惜犧牲色相，粉墨登場，表面演之了。在幕後的導演人物，也就利用這個，對李品仙施行疲勞轟炸，使他招架不暇，窮於應付。皖人而有意染指皖政者，莫不以此為最有效的捷徑。事實上，今日的李品仙，政權已告旁落，他事事顧慮，處處感受牽掣，較諸當年坐鎮大別山時的大刀闊斧，集中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真有不勝今昔之感！

醞釀已久的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選舉，對於皖省的中上層人士，尤其是熱中此道者，不能不算一件大事，省府當局也必須作必要的準備，而社會方面的結社組會之風也油然而興，這些，都是為了適應競選的要求。在皖省出現的社團小組織，一時如雨後春筍，但值得一提的，只有以一部分省參議

員為主幹的安徽省建設研究會，以省府科秘為主幹的業餘學術研究社，及皖南師管區司令陳瑞和所領導的安徽建設同志會。這是活躍過一時的皖省三大團體，牠們的組成都是為了要在選舉中顯試身手的。

關於這三個團體的內容，我們不願在這裏詳細介紹了。要特別指出的，研究會和業餘社是擁李的，而同志會雖沒有公開的表示反李，但與李是有着距離的。同志會的會員多半接近黨部，這是事實。研究會是一個官紳的大結合，聲勢浩大，陣容整齊，教育廳長汪少倫、社會

處長范任、省府委員萬昌言、省保安副司令張湘澤、一九等區的行政專員如范苑聲朱子帆，都成了這個組織中的健將，他們藉政治上的優勢，招兵買馬，普遍地建立地方組織，發展細包，對於控制未來的選舉，大有舍我其誰之勢。

然而，南京的「再倒李運動」發動了，表面上那批人是為了「救鄉救亂」「革新皖政」，骨子裏也是為了競選，假如他們不採用這種手段，回到安徽來競選是沒有插足之地的，而這樣一來，倒可以要挾着李品仙非支持他們不可。得尺進丈，何樂而不為呢？根據他們的經驗，成功是有些把握的。

從「競選」到競圈

開始的時候，大家只忙於作競選的準備，結社集會，拉攏羣衆，他們真的以為只要得到了羣衆的擁戴，就能當選而無疑問了。於是大家都拚命的在道上面投資。回過頭來，不料中央的圈定辦法規定了下來，無論是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都要絕對的

控制。於是從事競選的人們就得暫時放下下層活動而從事上層活動了，因為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上層，競選者的上層活動忽而轉趨積極了，第一步是省會

省國民黨員的選舉，中央原派陳思遠來指導，陳係廣西人，此次奉派來皖指導選舉，對於李品仙的意見自然要多予方便；陳到了合肥，正是戰事緊張之際，同時選期展緩的決定又公佈了出來，遂又過返南京。事過一月，中央改派賀衷寒來皖，於是活動競選的人們都從四面八方趕來合肥，真是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各通顯神，而大肆活動了。

外傳省府當局對於圈定人選，早就胸有成竹，大抵軒訓出身的佔第一位，與省府有關的佔第二位，黨部方面的最少。在省方的這一圈，雖經圈定，終不能保險，還得到南京去求最後的一圈，於是一幫人馬趕往南京；到了以後，事情却又有變化，有些原來自認絕不成問題的倒成了問題，原來有問題的倒不成問題了。真是「有幸有不幸」了。

在這些人中間，有許多是辭官不做而來參加競選的，像教育廳長汪少倫

、一區專員范苑聲、九區專員朱子帆等，原來都有必成的把握，然而一到南京，却都被畫到圈外去了。他們都是安徽建設研究會的領導人物，而該會會員被圈掉的還有很多，亦多係中堅份子。這樣一來，研究會是全盤失敗了。

研究會的失敗，也就是支持研究會的李品仙的失敗。雖然，研究會的會員也有被圈定的，但考究起來，這些人原來都是與某一方面保持着舊關係的。那就難怪其然了。

競選中的形形色色

這樣的一個大選，正如某些論客所說：「是一個空前的創舉」，我們也不否認。惟其事屬創舉，所以從這上面所表現的形形色色，足夠使人眼花撩亂的。

競選的人都如在變戲法，但戲法人人會變，却各有巧妙不同，而他們最終極的目的，都是要競勝過人的，目的既已確定，

那就不必擇什麼手段了，只要達到目的就成。因為這是個創舉，中國人很少經驗過，所以最初皖省各地的肅正選風運動彼此此起彼落，轟動了一陣子。人們都以社會正義之士的姿態出現，倒似乎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們主張競選應該施以嚴格的監察，他們反對以金錢勢力誘迫選民，反對鋪張的應酬和餽贈，甚至反對以女色誘選。

但事實上，競選開始了，各有巧妙不同的戲法開始獻演了，而那班主持正義之士，雖曾大聲疾呼的喊過一陣子，到了這時却反而無聲無息了。我們所見所聞的，是：以手槍脅迫選民，奢侈淫逸的鋪張應酬，甚至以物資為選舉的條件……一些敗壞選風的形形色色，應有盡有了。上海供職於某報的國

代候選人，在皖省爭取選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票時，即以中央配給報紙為條件，因而獲得最多的選票。

廣州大選趣聞

于人

說是「民主」之基

憲政」之階的國大代表大選開始了。十一月二十一日早上，廣州市內廿四個區域選舉投票所和另外廿三個職業單位以及婦女團體同民等投票所，頓呈一片熱鬧氣象，選舉宣傳車往來於市內通衢大道，更有用卡車載着繁雜的選民到投票所去投「最純潔」的一票的，致被一些窮人誤會為發放賑品。自然這只限於少數沿門托鉢的流浪兒，有戶籍和職業的男女則大都相繼跑到投票所裏嘗試這新玩意，使大選平添了不少景色。

在德宜區投票所裏，廣州市長歐陽駒首先投了劉紀文一票，說是遵從黨的決議，投給黨的候選人。

而在小北區投票所裏，青年黨黃晃（現任粵省委），則投了歐陽駒一票。

之後，來了十多個衣

着舊襪的中年男女，其中三人首先各持一張綠色的身份證去領取「選舉權票」，再換了一張「選票」，跑到票廳旁的桌前。於是「代書處」負責人便問他們：「你選邊（那）一個？」三人不知所措地沒有回答，那負責人便拿

起毛筆說：「選劉紀文啦」，便在「選票」的「被選舉人」下寫下「劉紀文」三個字。然後由那三個

人將「選票」投入字櫃裏；隨後，又有一個像小販的男子，做了同樣的手續後，負責人沒有徵求對方的意見便立即代寫下「劉紀文」三字；之後，有一男二女前來投票，負責人照樣問他們選誰人，那

先生，你寫罷」。那人寫

完後，有人問他為什麼選劉紀文，他猶疑了許久才回答：「渠係好人，我選渠做保長」。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市郊的西山投票所裏。有一個鄉民戰戰兢兢地跑到警察局門口，經過了道白，守門的警察便讓他進去。負責人見是來投票的，便問：「你會寫字嗎？」

在高懸着林苑文女士（鍾天心夫人）的「玉照」，許多人投了她一票。有人問一個男子，為什麼投林苑文的票，他回答：「我好（很）中意渠」。又有

人問一個女子，她說：「渠好（很）漂亮，夠資格做代表」。

婦女們的競選，似更

對顯得明顯化了，吳菊英、胡木蘭、劉靈英、鄧不奴四人各據着投票所附近的「招待所」，展開「拉票」戰。投票人都已受「訓練」，是要牢記着「XXXX」或「XXXX」三個字，免被負責人詢問時說錯了，然後由人率領排隊到投票所投票。

投票開始不久後，有一個老太婆擠得喘不過氣來，氣喘喘地說：「我寧願人工也不要了」，兩萬元的投票「人工」也許是實情了。

新聞記者投票比較「文明」，而且手續也「合法」。每個人一到記者公會投票所，便不假思索的寫下「林伯雅」三個字，也許是「提名」的妙用。林是中山日報社長，該報的採訪主任李某選站在門口，頗向投票人說：「代

表林伯雅先生，多謝，多謝」。有人說既是「國民」的「代表」，又何需來這一套呢？

廣州大選第一天已過，還有今明兩天便告一段落，雖然有人作種種預測，其實是多餘的事，有人說，誰將「榜上有名」，不是早已知道了嗎？十一月廿二日寄自廣州。

時與文訂閱辦法

- 一、本刊採定期訂閱辦法，一次至少三個月，訂閱期間不受零售價格調整影響。郵費漲價，另函通知照補。
- 二、如匯款不便，可購大額（千元以上）郵票掛號寄下，十足通用。
- 三、訂戶儘先寄發，且較另售為廉，外埠讀者尤可不受加成影響。
- 四、訂費務請一次匯足，姓名住址，請勿草書，以免貽誤。
- 五、續訂請註明原訂單號數。

訂閱價目

外國	內國			三個月十二期
	航空掛	掛號	平寄	
平一寄律	九萬五千元	八萬五千元	七萬元	六萬元
半年美金二元半	全年			全年

時與文

刊週

發行人 程博
編輯者 洪
經理部 上海文週刊編輯部
上海姑蘇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新華日報

經濟新形勢

林滄白

論學術獨立

陳旭麓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

的「第二大槓桿」——科舉制

王亞南

雜文——「大選花絮」

商翼

影子

14

上海圖書館

第二卷

通訊

主席北巡前後

辛莘

石家莊失守後的北平政界

凌華

從四川國代選舉中觀察

民意及政府的控制力量

何慧英

合肥城鄉

方瑛

安徽的「善後救濟」

邵資

漫畫

上海雜誌界聯合宣言

華山·人之初



經濟新形勢

林滄白

當前的經濟問題，政府已認爲是「僅次於剿匪軍事」的問題，繼軍事撤亂之後，就有了經濟撤亂的口號，並制定「經濟撤亂急需措施辦法」，在原則上，停止國家行局放款，緊縮信用，控制金融的活動，同時加強物資的掌握，對生產運銷全面管制，並有配給制度積極實行的提議。迄今爲止，在具體步驟上，將有金融管制局及花紗布管理委員會的設立等。於是，當前的經濟形勢，就此形成了一個新的階段，而我在這裏所要討論的，正是這個新階段的來歷，以及它的特徵，並研究它是循着怎樣的規律，往前發展的。

如回顧今年一年來物價的波動，則可以得這種明確的印象：就是最近這次十月漲風，是具體地說明了一種經濟新形勢的到來。如以今年一月份批發物價指數爲基期，可列表如下：

月份	批發物價指數	各月物價對一月的倍數
一月	一〇〇、三六三	一〇〇
二月	一七、七七七	一〇七
三月	一八、三六一	一〇七
四月	二二、一六一	一一三
五月	三二、七〇二	一四一
六月	三七、一六七	一五七
七月	四六、五五七	二一七
八月	四八、九二一	二二七
九月	六〇、五一九	二八〇
十月	九四、八一三	四一三

這就是說，在十月份以前每個月物價的跳動，其幅度不如十月份那樣寬闊。就以往逐月比較，最多上漲一成左右，而十月份則大得多了。所以，從上表可以看出，不僅一年來的物價，是月月在漲，而且，十月份的跳動，在經濟形勢的推演上，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的。

至十一月，照今年上半年物價波動的情形來說，則預期至少有一個短

時期的盤局，然而在事實上，小休半月之後（自十月第四週至十一月第一週內），物價又跳動起來了。就十一月對一月份而言，爲一〇、六三倍，較十月份則漲百分之十六，如以黑市黃金外幣的跳動來說，則更是可觀，較十月份在一倍以上了。

間歇期如此短促，而幅度又如此寬闊，這顯得經濟形勢的嚴重。經濟形勢的演變，是由其各項因素的變動促成的，而物價的變動，正是這些因素最集中的表現。自今年十月後，物價既已如上面所說的跨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那末，它說明了些什麼呢？

十月漲風，正當共軍在東北又一次發動攻勢，而尤爲世人注目的，是共軍的流奔江河之間，以面控制點，以鄉村來封鎖城市，並割裂各城市間的連繫，如此，工業原料與糧食等的供應發生困難，舉個例來說，十月份的棉產估計較之八月份的估計就減少五十二萬八千市担，僅有一千零五十六萬担，這就是棉田被破壞的結果，而集中在產地市場的原棉，又因交通阻隔，無法運出，最後只得仰仗於飛機的輸送了。另一種作爲工業基本動力的煤產，也和原棉一樣，產量減少，輸送困難。糧食的情形也復如此。那時正值收穫季節，而產區價格頻頻報漲。產區變成戰場，交通綫斷斷，鄉村與城市的紐帶逐漸崩裂，這形勢在軍事上自有牠的評價，而在經濟上也有着牠顯著的影響的。

十月過去，人們驚魂未定，而市場又一度波動。繼承十月的軍事形勢，共軍在華中不僅圖謀建立根據地，而且，時時持續而動，在華北，則猛攻北方重鎮石家莊，而竟然攻入，於是，這就造成華北與華中區資金大量的逃避，或由北而來，以上海爲轉運站，繼續南流；華中的情形同樣嚴重，從若干廣州的通訊裏，可以知道資金逃風之盛，甚且以現鈔三四百億大量裝運廣州，再圖逃港。這資金的逃避，不能看作普通的資金流動，而是反映着極深刻的意義的。這種逃風，促使國幣傾跌，另一方面，金鈔大漲，而一般物價也受牽累。

除了因軍事形勢的變化而震撼市場以外，還有一個原因，也是不能忽

觀的。這就是美貨的揭曉。在口頭上儘可鼓吹「自力更生」，而實際上美國對華的各種援助，對中國當前的形勢，是無可否認會發生相當的作用的，但是這不能對中國的當前形勢有着決定性的作用。在經濟上的情形也是如此的。

迄今為止，美國對中國政府，要從明年四月起，才開始每月二千萬美金的援助。目前政府支出，每月以十萬億（每日以三千億）估計，依平衡會最近牌價計算，一天便需美金六百萬美元，一月要一億八千萬美元，所以二千萬美元僅够四天的開支。就算三億美元一次送來，也祇够兩個月的支出。其中六千萬美元是作為本會計年度（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結束前所餘日期之用，那末至一九四八年六月止，政府要開支多少呢？今年全年支出，如以六十萬億計算，二十萬億是上半年用掉，四十萬億為下半年支出。二十萬億以二萬元之美金平均匯率折合，下半年之四十萬億元以八萬元之平價美元匯率折合，共為十五億美元，明年上半年國庫支出假定為今年下半年之三倍，即八十萬億元，則自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之政府全部開支應為一百二十萬億元，即以十萬元合一元美金計，亦為十二億元美金，而美國在這時期的援助，祇六千萬美元，約二十分之一，即美國一年的援助，祇够二十天的支出，加以繳款的遲延，及其數量未能符合當局的期望，這種種自然都會迅速的反映到物價上面來。而這是十一月波動的又一個重要的因素了。

在基本上說，物價波動由於通貨與物資，然而，通貨數量的急速增多，與流通速度的增大，以及物資的短少，在在都離不開軍事形勢的影響。就以通貨增加的數量與速度來說，由於戰事擴大，軍費支出更形浩繁，其數量之多與速率之大自是在意料中的事；更因戰區擴大，法幣流通區域縮小，這也使得城市裏的游資增多，另一方面，就以中央銀行發表的以上海商業行莊存款通貨流通速度來說，一月份為一九·七七，六月份為三八·〇五，由此概可想見貨幣週轉的速率。這何嘗不是由於人們輕幣重物的結果？尤其當軍事形勢發生變化的時候，更來得顯著了。

以物價為標誌，反映着這些因素的轉移，一個經濟新形勢終於逐漸形成了。

四

現階段的經濟新形勢就如此形成了。其歷程是極其清楚的，因此，其所具有的特徵，也極其明顯的表現在下列幾點：

第一，政府對於當前經濟局面是十分重視的，認為「僅次於剿匪軍事」的問題，於是，以對付軍事亂亂的精神來對付當前的經濟局面。現在，都市與鄉村逐漸隔離，都市日漸處於孤立，而都市又因物價高漲，處於動盪不安之中，於是，求得都市的安定是萬分重要的任務了。由於這樣的需要，而有配給制度的擬議。這在經濟政策的演變上是一大事，可以說是

政府權力對公私經濟的干涉之無限擴張，而趨於極頂，也可以說是政治力量的一次最大的考驗了。

第二，為着達到上述目的，政府就不惜任何手段來掌握物資。遠的如自備外匯的強行收購且不去說，最近如傳聞中行將開始的嚴密檢查倉庫，以及不顧民營紡織工業界的反對而實行全面的花紗布管制（從生產到配銷，從原料到製成品），都表示政府企圖全面掌握物資。這在掌握物資的政策上，是發展到了極點。

第三，由於城市生產事業的枯萎，以及鄉村的貧窮及其喪失，稅收的來源也必隨之減縮。為了支持戰費的龐大支出，除了發行通貨以外，就是不斷的加重工商業的負擔，各種稅率不斷調整，一次調整，就一次提高，最近的貨物稅，其調整就是一例，水泥工業的新稅額，較前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其他麥粉及食糖，均較前期增加二成，捲烟稅額，較前期大多增加一倍以上，又如牌照稅，使用牌照稅高出原有稅額三十倍以上，營業牌照稅也高出十倍。新稅不斷增加，稅額時時增大，而人民負擔亦因此加重了。

第四，財政收支，愈加不能平衡。今年究竟支出多少，這不能妄加猜測，據聯合社八日電，總支出已達五十萬億，收入約十七萬億。支出五十萬億，較今年原預算九萬三千億超出四倍以上，但據估計，八月份前支出已達三十萬億（張羣院長報告），而八月份後，物價連續上漲，且公教人員薪津調整，每月支出至少在十萬億左右，故五十萬億的支出，是少估計了。目前發行額，東北與台灣流通券不計在內，至少在三十萬億以上。這可看出當前在軍費支出浩繁下，財政赤字之大，通貨膨脹之速，而萬元以上大鈔，二萬，四萬，甚至十萬，終必發行。這不僅毀棄發行萬元大鈔時對立法院的諾言「不再發行」，而且更反映出通貨膨脹之速，是使人驚心動魄的。而這正是對人民的一種預借，普遍的使人民的購買力再度急遽地減低了。

第五，由於都市與鄉村的隔離，消費市場縮小，這結果，工業生產品的銷路停滯了。又因為城市內的一般人，其購買力也在日益低落，以及各項貸款停止，資金融通困難，於是更促使生產事業的枯萎，這也是城市的枯萎；另一方面，法幣流通區域縮小，使得城市的經濟越加紊亂了。

五

由上述的特徵看來，依城市為基礎的經濟正在日趨惡化，祇要今後軍事形勢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都能在城市裏反映出來；資金大量的逃避，物價的扶搖直上，這都可以預料得到的。現在，政府在華北華中已佈置妥當，準備展開大戰，就安定城市這點着眼，則今天喊出「經濟戡亂」，作各種緊急措施，自有其必要，但值得注意的，萬元以上大鈔是在此項「經濟戡亂」一急要措施實行後發行的。而且，這兩個禮拜的物價控制是否能夠收到預期的效果？而這，又給與一次證明，就是，以內戰經濟體系的強化，來解決經濟問題，是很少可能的。現在，「經濟戡亂」一急要措施，可以說是政府權力對公私經濟的干涉的無限擴張，也是一次最重大的考驗了。

論學術獨立

陳旭麓

胡適之先生在本年九月間發表他的「學術獨立十年計劃」，除撰專論刊於大公報外，且向新聞界反覆聲明，惟恐別人有所誤解。其立意之要點：（一）鑑於留學政策的失敗，免得外匯浪費，主張一意發展國內的大學及研究院；（二）十年內以國家力量扶助十所大學盡量發展，第一個五年的五所大學，胡氏曾舉出北大清華武大浙大中大為發展的對象，後五年的五所大學，將待時間的抉擇。以胡先生在今日國內國外的聲望，作如此主張，是有相當影響，可能為施政者所借鏡的，故教育界人士紛紛表示意見。附和其說者，認為當前的中國環境，有飯大家吃的看法是錯誤的，只有從一重點教育一求取速效，以達到學術獨立的目的。反對的人，一部份站在區域和學校立場上爭長短，不免以私害公；一部份則完全否認這種主張，並責以特殊發展的偏私；也有人對原來的主張作原則上的贊同，提出了修正和加強的意見。雖見仁見智，互有短長，然有一個共同之點，即大家集中於討論學術獨立的成果，很少探本尋源之論，也許各有苦心，要是逐層追問下去，則增加問題的複雜性，不免又要搔到許多痛處，百禍從口出，豈不冤哉！可是學術獨立的本身，原是不能使之孤立的，何況加上中國社會許多的特殊因果關係，在牽連學術的獨立，若徒斷章取義，不顧首尾，問題是不會曉暢明白的，勢將離題愈遠。

所謂學術獨立，是比較的涵義。當海禁未開以前，我們遺世獨立，自尊自大，一切不依賴別人，我們決沒有學術趕不上人的感覺。趕不上人的感覺，是由於海禁大開以後，別人有更好的學術文化出現在我們的眼前，而為我們所不及。由不及而有爭取獨立的思想，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根據胡先生的觀點：學術獨立的標準，除應該自己充分能夠負擔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及解決需要的各項科學問題外，且本國的學人和研究機關要與他國分工合作。換句話說：世界各國已達到的學術標準，中國也要能達到。這些含義，說來確是平易近理，沒有甚麼好高騖遠的地方。要完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毫無疑義的是要具有這些條件。可是儘管平易近理，作為現階段的中國，對這些應該具有的條件，却是天大的奢望。為甚麼別人能之而我們不能呢？為甚麼別人已發明的東西我們連學習的成就

都沒有呢？這就追溯到了一個問題——中國學術所以不能獨立的原因。

說到原因，要是逐條的講義式的依次排述下去，又是許多老生常談，也太費事了。我在這裏只提出一點：西方的許多學者如蘇格蘭底、哥白尼、達爾文等，他們在黑暗的時代裏，不依託當時的社會關係，不管現實給予他多大的壓力，為真理奮鬥，至死不屈，真理於數十年或數百年後而大白，這種為真理奮鬥的啓發精神，帶給了人類以不可遏止的力量；而中國的所謂學人，有的是忠於職責的董狐、方孝孺式人物，思想和行動被當時的社會關係緊緊地鎖住，縱不為社會關係所束縛，而具有衝破羅網的毅力者，又只有李卓吾、金聖嘆等浪漫式的人物。欲求如盧騷、伏爾泰等領導法國啓蒙運動的人，在歷史上除了近世一二人可與彷彿外，已不可多得。以這樣的歷史關係，決定了中國學術的依賴性。但是我並不是說中國學術將長期被歷史的命運控制，社會經濟的力量有時會衝破命運之防的，春秋戰國時代不會隨着社會經濟的變化，產生過光輝燦爛的學術思想嗎？

近世以來，中國社會遭受了空前的變動，學術思想亦同樣的激盪未已。雖然什麼「主義」什麼「學派」移植國內，應有盡有，可是從會國藩、李鴻章建立的留學政策起，儘管花樣翻新，但孫悟空的七十二變，終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留學政策。幾十年來的過程，不能說沒有進步的地方，可是你能擺脫次殖民地的屬性嗎！直至今日，自然科學固然要向別人學習，社會政治的組織也在在要仰人鼻息。學習本來為文化傳播的要素，不足為辱，可是我們的學習太可憐了，不但自己沒有供別人交換的東西，人家的所有，我們也僅能得其皮毛，這是留學政策供人咒罵之處。不過單說留學政策的無成果，也不很公平。因為整個國家就沒有一個自主的政府，那裏有特立獨行的明顯政策，結果留學變了質，學習是次要的，而以鍍金為第一，科學是次要的，而以洋化為第一。這全是次殖民地內屬性加上封建殘餘心理所造成。所以留學者回國後，不是學術上的造詣，而是官階的提高；不是實驗室裏的研究者，而是社會上的新士大夫。就是有些研究較有成就的人，不但國家無適當的設備可以繼續供其研究，一聞其在某項科學上稍有表現，政府就要把他從實驗室拖進辦公室，做起大官來，這是人

才浪費，這是殺學術獨立的殘忍手段，無怪今日學術界依然瀰漫着「應帝王」的驚聞思想和領導羣倫的英雄作風，如此怎能使學術臻於獨立之境。由此可知留學政策的本身沒有錯誤，而是行使留學政策的大環境有問題，致使有百是無一非的政策，反成了有百非無一是的制度。這樣的變質，固屬整個環境和歷史淵源使然，而執行者未能盡其應盡之責，政治心理的矛盾，有意的作弊，均不能予以掩飾。大化革新及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因留學政策卓著成效，使學術文化有長足進步，而底於獨立。現階段中國，無論科學水準，國內需要，萬不能因噎廢食而停止留學；相反地更需要認真的執行留學政策，純以公正的考試及研究成績為去取，剔除那些政治作用的私人關係，爭取留學真正的成果。則留學生所耗的外匯愈多，對於國內學術的建樹也愈大。如果要依胡先生所說，將留學生所耗的外匯來擴充國內的大學，就節省外匯這一點來看，未始無據，然擴充大學並不等於學術獨立，而擴充大學的本身，就需要外來的科學不斷灌輸，如果歷史可以拉回至康乾時代，我們關起門來，依然過着「猗歎盛哉」的聖朝生活，那我們可以無需乎洋鬼子的學問，否則留學依然是需要的。況且留學政策的失敗，除了本身的許多因素，大學教育的失敗是其失敗的前身。中國自創設大學以來，所獲得的結果，與留學政策是一邱之貉，若專責留學的失敗，而忘記了大學教育的拆爛污，何嘗是公平的看法。且留學每年所費的外匯，比其他的許多浪費來，却是一個很小的數字，胡先生也曾指出過。所以用於留學的外匯是不容非議的，應該維持到我們不需要留學為止，只是必須糾正買辦心理和次殖民地勾當的留學政策，建立人才主義純學術研究的留學政策，方能有助於學術的獨立。

當前中國孕育學術的對象，留學之外，自然要推國內的大學了。自科舉轉變為新設的學堂，為時已不能不算久，所獲得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質的方面固跟不上時代的進步，經十年來的戰亂，甚至還趕不上戰前本國已有的水準（然青年對社會認識的進步性却不能抹煞），量的方面，更有許多不可理解的矛盾。我國現有專科以上學校一百九十餘所，以師資的缺乏，設備的簡陋，經費的短絀，乃至許多畢業生的無業可就，一百九十餘所的專科以上學校實在太多了；可是以本年投考大學新生的擁擠來看，則現有的學校尚感不夠。更以美蘇兩國來比，他們的人口不過我們三分之一，美國有專科以上學校一千六百餘所，蘇聯有七百餘所，且範圍較大的學校，學生動輒萬餘人，只是從「量」這一方面來觀察我國的大學，已感

無法與人抗衡。數十年的留學政策，成萬的碩士博士，無補於中國學術的獨立，今欲不假手他人，希望這些沒有建立起學術獨立的留學生所主持的大學獲得學術獨立，他們縱有此雄心，在現實重重的壓力下，亦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裏並不是完全抹煞那些博士碩士們的學問和能力，而是說明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

我們知道要使學術獨立，必須有孕育學術思想的優良場所，即是說要有很好的大學去培植。構成好大學的條件，應有淵博的教授，充分的設備，寬裕的經費，與乎辦學者兼容並包的態度，尤其需要一個自由而安定的環境。今日中國的大學教育，真是得天獨薄，都不能享有這些應該具備的條件。教授在生活的威逼下，轉業兼差，偷工減料，致有大學教授程度低落的現象；設備的七零八落，東全西不全；辦學者之受政治控制，稍稍獨行其是，即不能安於其位，而整個國家的環境又是這樣亂做一團。客觀情形如此，欲求學術的獨立，是有種種困難在。然而我們不能因困難而不辦大學，亦不能因困難而不求大學的改進；為人類的幸福，為國家的前途，尤不能不求學術的獨立，懸的以赴，雖不能亟達，還有我們的希望，促使我們竭其可能的努力，總有吾人的進步。胡先生的「學術獨立十年計劃」原非無意義的建議，不過達到這個計劃的方法，我們需要理智的分析，尤當去其自我的偏私，看清整個教育的癥結，縱限於客觀環境不能迅速完成其願望，亦可告無罪於天下後世，否則一念之差，增加教育界的糾紛和困難，有計劃反不如無計劃的好，有建議反不如無建議的好。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獲得了漢武帝的信任，可是孔老夫子終究要從大成至聖先師的寶座上跌下來的。

胡先生的主張，以為以國家的力量，在五年內發展五所已有基礎的大學，第二個五年再提出五所加意擴充，彷彿這十個大學經此兩個五年計劃，就可使中國的學術獨立。已經有人給胡先生找到了理論的根據，這是所謂「重點教育」。如果「重點教育」僅是國家拿出大量的經費培植幾所專門式的大學，則未免強好了「重點教育」的意義。「重點教育」應該包括獨特發展和專材教育：一個人有其特長，教師應鼓勵其特長的發揮，注意其特長的訓練；學校有特殊的科系，應加強其特殊的價值；國家的教育政策為了配合當時環境的需要，注重某一種人才的造就，作為學校施教的重心；所以「重點教育」決不是錦上添花造成皇冠大學的做法。交大大校長程孝剛先生所說：「各大學包括部門甚廣，各校各有其特長……發展學術，

應就其特長部門，協助發展，使臻於國際第一流學術地位。「他雖未標榜「重點教育」，我想這倒是「重點教育」的本旨。

胡先生挾其「王者師」的卓越地位，想於學術上建不世之功，把中國學術從依賴的深淵裏救出來，遂大聲疾呼的作這「計劃教育」的主張。如果政府真的採納其建議，作今後十年大學教育的重心，可能發生兩種反響：第一、未經抉擇的百分之九十幾的專科以上學校，爲了自身的利害，爲了爭取合理公平的待遇，羣起反對，釀成教育界的大風波。第二、政府在政策上並不作犯衆怒的明顯規定，暗中實施這個計劃，處處給於這幾所優選大學的便利，勢必形成優良師資的集中，學術工具的獨佔，樹立專門大學，開教育界的惡風氣。本來中國現在的大學教育，區域上發展的不平衡，政治關係的特殊待遇，以及對私立大學的歧視，已經爲世詬病，如欲繼續的加重其不平等，無論就教育本身及社會現狀來講，都有些說不過去。胡先生提出的五所大學內，我們不能否認其在國內大學的較厚根基，但是五大學外的好些大學確有她的成就，也一樣的不能否認。至於私立大學，因經費上的牽制，如設備師資種種情形，不能使人滿意，然經費超過無數倍的國立大學，不見得就無懈可擊；而私立大學埋頭苦幹的精神，往往爲國立大學所不及，所以私人辦學的成績，也是不該隨便抹煞的，陳序經先生在一「公論耶？私論耶？」一文內論述此點甚詳（見世紀評論二卷第二十一期），茲不贅述。若政府一意發展「選手」式的大學，「選手」固然可以得天獨厚高視闊步，但使其其他許多大學自生自滅嗎？抑必欲以政治的力量壓抑其居於二三流而至於無一流一嗎？假使胡先生能够保證有了充分的經費，在十年內即可使他所舉的幾所大學變成牛津、劍橋、哈佛、耶魯，而牛頓、愛因斯坦等人物就出現在這些大學裏，而這些大學的成功，就等於中國學術的獨立，如此則我們不敢非議，否則程孝剛先生所舉的三點，值得我們注意，即（一）就各校已有之基礎，易於更大的發展；（二）使各大學有競爭性；（三）經費平均，免有區域之爭（見讀書通訊一四四期）。因爲經費不等於好大學，好大學不等於學術獨立，與其做幾樣標本式的大學給人家參觀，博得別人的喝彩，不如讓其普遍的競爭發展，爭取學術上的成就爲好。

不過程先生僅就胡先生全力發展幾所大學發表意見，而於學術獨立達到的途徑，未予說明，似乎不願涉及到與現實抵觸而與學術發展有關的許多問題，同樣免不了以經費的分贓，公私的短長，區域的爭執，代替了學

術獨立的真理。然而決定學術獨立性的大環境，即整個國家自身的屬性，我們無法具體的去闡釋，也不容許你闡釋，權且按下不談。但與當前學術直接有關的許多事實，是不容忽視的，這些事實已經是人人皆知的常談，常談却已代表了真理，吾人不談學術獨立則已，欲談學術獨立，首先須爭取下列的幾個基本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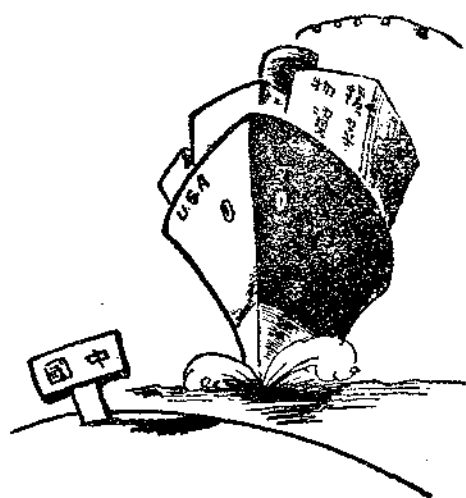
第一、實在我們的教育經費佔國家的整個預算太小了，已爲衆所週知。現在憲法雖已規定了百分之十五，據說從行憲後就可開始依照憲法標準支付，可是民族燬滅的大悲劇沒有截止，社會經濟如此的糜爛不堪，誰能保證條文比槍桿子有力量。作爲教育界領導者的胡先生，不爲整個教育謀出路，却只向蔣主席張院長提出五個大學學術獨立的錦囊妙計，不知胡先生是見到教育經費的不足，只够發展五所大學或十所大學，還是因爲憲法快要實施了，教育經費增加，有餘力發展幾所特殊的大學。胡先生縱無此意，迹其主張，亦不能不叫人心多。縱然在現階段的局勢，空言無補，但一個追求真理者，則應不計得失，從大處遠處着眼，爲整個教育打算，求得全盤經費的解決，作公允合理的分配，庶幾仁者之聲，其利也溥。

第二、如果學術獨立的意義，不是中古閉關式的獨立，則它的發展，是需要高度的思想自由，讓學人縱橫馳騁於精神生活的天地裏。漢武帝把孔老夫子搬出來，統制天下的思想，除了做封建專制政治的保鏢，對中國學術上到底成就了什麼！現在「一尊」的教條雖作了名義上的廢止，可是講學的自由在那裏！我們看到許多通儒碩學之士，過着逃亡放逐的生活，而大學裏却缺乏教授，倖進之徒日多，這是人類文化傳播的損失。北大今日在國內擁有的學術地位，與其說是經費的充分，不如說是蔡子民先生領導思想自由之功。胡先生也會爲思想自由奮鬥過，也會爲中國的啓蒙運動出過力；而對面臨的重重陰影，連唸唸符咒的勇氣都沒有了，變成了別人向他念符咒的身分，這樣的提倡學術獨立，是「一只此一家並無分店」的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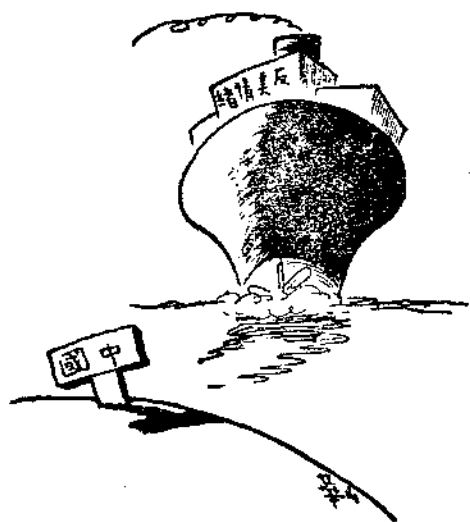
第三、十年戰亂的歲月，教育界人士已苦到盡頭，兒號寒而妻啼飢，在物質和精神雙重的壓力之下，他們的研究工作縱然在若斷若續的進行着，也幾乎已到了凝止的地步。我們固不能奢望政府如美蘇一樣的優待學人，供給汽車洋房和研究的助手，至少也要給予够溫飽的享受，有維持一家

數目的收入，有一間供其私人實驗或研究的房子，俾能一心一意加深其耕耘。否則一個人的生命和時間有限，困於生活，累於室家，把大部份的精力耗於雜務，雖有研究學術的雄心，到頭來只落得窮愁潦倒，資志以歿，狡焉者則入仕經商，飛黃騰達，如此欲望學術發達以至於獨立，終是南轅北轍。因為學術還是需要人去鑽研，中國有些學人雖有打脫牙根和血吞的傻勁，可是和血的牙根已傷盡了他們的心，天天在精神的苦痛中，研究學術又從何談起！所以提高學術水準與提高學人生活水準，是同樣的迫切和必需。

第四、要求學術獨立，自然是由於學術的不獨立，學術的獨立與否，又是由於世界文化的比較得來。中國要求學術獨立的呼聲，當然不自今日始，而始終不能脫離其依傍性者，是受各方面的限制，沒有趕得上人家。在尚未趕上人家的時候，對於別人已獲得的成就，是不能一點放鬆的，基於這個原則，我們的留學政策是要維持到不需要留學為止。不過留學生的出國，不是看他的大學文憑和門第，而要經專門學者的試驗，他確具有接受某項專門學問的知識基礎；回國後，不是徒看博士碩士的頭銜，而要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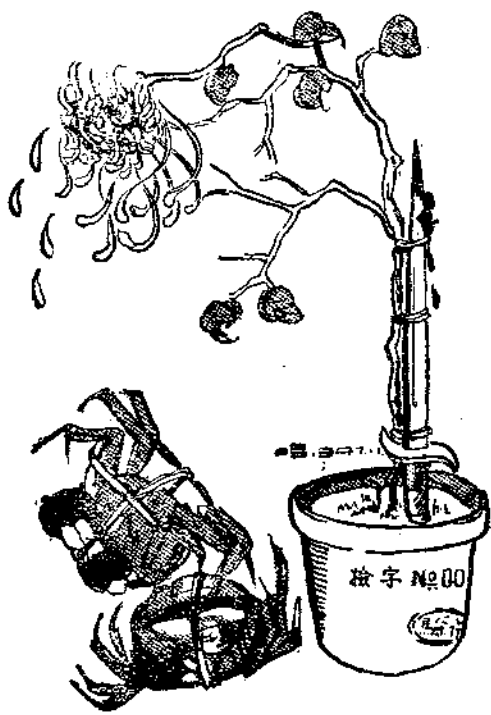


進出口



華山

束縛 人之初



他們到底帶回了什麼。至於有些無需到國外去學習的學問，國內可能給予深造的機會，大可不必以喝海水為榮耀，浪費外匯。所以國內的大學任其自由發展外，中央研究院的擴充或增設是必要的，研究院畢業的學生，須予以留學生同等的待遇，為全國大學真正富有研究心得的畢業生，開闢留學和研究院的兩條路，一方面襲取人家之長，另一方面建立起自己的學術系統。現在雖有中央北平等研究院及各大學的研究所，只是留學和大學的中間物或附庸，絲毫不為人們所重視。胡先生主張建立幾所特殊的大學，使大學的本身構成不平衡的發展，則不如加強研究院的設置，使將來漸漸取代留學的地位。

這些卑之無甚高論的意思，正為阻播學術發展的大敵，早為有識之士所共見。今日談學術獨立容易，為學術獨立出方法亦容易，而欲剷除學術獨立的阻力，則非具有革命的勇氣和精神，惡勢力自不會自己退避，讓出一條光明的大道來。胡先生有建立學術獨立的雄心，而沒有抨擊惡勢力的勇氣，今日之胡先生與五四時代之胡先生顯然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二天橫桿——科舉制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經濟的歷史的研究）之九

中國官僚政治在中世分立局面以後的高度發展，我們已在前面依着有關其經濟條件或經濟基礎的田制稅法去說明它，但在田制稅法關聯着官僚內部經濟利益的配分，而經濟利益的配分，又關聯着仕途控制或拔用人材造就人材的限內，田制方面既不復能維持均田制租庸調法，而採行以資產為課稅對象的兩稅法，由是而有「丁隨糧行」的一條鞭法，乃至「永不加賦」的「丁銀攤入地糧」法；而在用人方面，也就顯然不能再襲用曹魏以來的九品中正法或九品官人法。每種新的經濟體制，是須得有種種能與其作有機適應的社會制度來配合的。由隋唐開創的科舉制，正好是在當時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分別呈現了新事態所形成的結果。這裏暫不忙解述科舉制如何創成，如何有利於官僚政治的高度發展，且先看看所謂九品官人制的如何漸被否定，和如何不適於官僚政治的高度發展。

九品官人制創行於曹魏，乃由秦漢所施行的郡國舉薦方式轉化而來。漢代選用人材途徑，在中央有徵召，在相國等機關有辟舉，在郡國還得定期舉薦。選賢與能，原是各種選舉方式的共同目標。而賢能的鑑別，又是它們的共同困難。然在世家、望族以及與其結託的門生、故吏等特殊社會關係，尚未顯著發展以前，其困難還不過是選舉客觀標準的不易確定，真才不易發現，植黨營私，鑽營奔競的流弊無法避免；而等到長期的官僚統治，把一批官做大了，也做久了的那些人，或他們的後裔，逐漸依種種社會經濟便利，造成特權勢力者了，他們無論在中央乃至在郡國，都隱然成為必須徵召舉薦的對象；曹魏的九品官人制，無疑是效慮到此種既成事實而施行的。九品官人制係於州設大中正，於郡縣設中正，將所管轄區內人士，無論已仕未仕，悉入品狀（品指德行，狀指才能及治績），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為登用黜陟的張本。將全州全郡縣人士加以品狀，絕非大中正或中正一人所能辦到，而上述特殊社會勢力者或大家名門的存在，亦不允許他們作任何客觀的評定，於是品狀云云，就完全以門第高低為準了。所謂「魏氏立九品，置

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氏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矣」（唐書柳沖傳）。「尚姓」無異是貴族社會世祿世官的復活，而與秦漢選賢任能的「尚官」相反。而由是造出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在整個專制官僚統治上，會發生許多不利的影響：

首先，在專制官僚社會，原來是用刑賞為維持統治的兩大利器。專制帝王對臣下的權威和臣下對於他的服從，完全是靠着這兩個把柄。所謂「聖人之治也……必於賞罰」；所謂「賞厚則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韓非子六反），說明離開了或失去了賞罰的運用權力，就等於說是降低或剷除了專制帝王乃至官僚們維持威信的手段。九品官人法由魏晉經宋齊梁陳，推行到隋唐初，愈來愈成為變相世襲制。凡百官族姓為備中正選報稽攷而特意編修的家譜家狀，已經無異是他們子孫世代為公為卿所依據的張本。他們生而有做官的特權，且由家世決定了做官的等第，已顯然是賞不可勸了；再加他們各別在不同程度上，擁有我們在前面第七編中所述的經濟基礎，及與其相應的政治權力，又差不多是罰不易加了。專制君主的賞罰權力被限制，被剝奪，正好與中世分立的封建局面相照應，但那却非中央集權政治形態所能容允。

而且，選賢任能是官僚政治的口號，一能者在位，賢者在職——的理想，的實現程度，確也能測定那種政治場面的休咎與吉凶。但所謂賢者與能者，並不是在政治過程以外「預定生產」出來的，他們必得是在有所勸勉，有所警惕的政治環境下，居定思危，勵圖上進的結果。如高門大族子孫世世為官，他們上進的志向，殫精竭慮以求治績表現的努力，自然就沒有了。所以由魏晉以還，在宋齊梁陳諸朝，「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之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於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宜力勤，便於驅策，不覺倚之為心膂」（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項）。

又况那些幕家世，靠門第的官爺們，不但因為「安流平進」，「不違恩寵」，有的還爲了「風流相尚」，談論或研究一些與治道無關，甚至反乎治道的東西。就在曹魏施行九品官人法前後，老莊、周易，已開始成爲清談資料；其間五經義疏亦被談到，但談論或研究旨趣，非爲有益於治平修省，乃在於清逸與致。由魏之何晏王弼，至晉代有山濤、阮籍、稽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即所謂竹林七賢，均尙「無爲」貴「自然」；南朝更變本加厲，舉朝上下，皆習於三支（老莊周易），兼重佛義，末流所屆，至由「無爲」，「齊物」論旨，引出非名分，非綱常，非禮教的「危險思想」。在當時篡奪相尋的變亂情形下，認真講起綱常名教，特別是君主大義來，在時君聽來，既未必投機，而在這般世代臣事各不同王朝的士大夫們自己，實也有些難於啓齒。但不談也就罷了，由談「自然」支離演變到反綱常名教，那就根本同專制官僚社會「立國精神」相抵觸，所以，一到統一局面稍有頭緒，這流弊就急需予以矯正。

最後，官僚社會的融通性或韌性，就是要在人事升沉上或在仕途的控制上，讓一般所謂「下品」或「寒人」，也有上達的展望；而當社會經濟向前發展，文化傳播接觸較爲頻繁，有較多人民得到受教育機會的場合，更須把封鎖的仕途開放一些，藉以沖淡官民之間的對立情緒。更須把統制思想與統制仕途的方法打成一片，藉以成就教化與治化的統一功能。

所有這些方面的現實考慮，說明了變相世襲的九品官人制，不但不利於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且尤不適於那種統治的高度發展。所以，一到隋唐重新混一宇內，對於如何拔用人材，如何作育人材，再也不能按照老辦法作法；而照應着經濟文化的現實進展情形，甚至也不能再襲用秦漢那樣比較缺乏組織系統的官人法式。

科舉制應時產生了。

隋在長期分立局面之後，完成統一大業，在用人行政方面，自有許多不能不重新來過，自行拿出適應新局勢的辦法。然因當時世族大姓勢力還過於強盛，而隋之創業，又是成於北方族姓關係最稱根深蒂固的關中關東一帶，所以文帝開皇間「雖有秀才之科，而上本無求才之意，下亦無能應詔之人，間有一二，則反訝之，且嫉之矣」（文獻通考，選舉攷一）。煬帝大業中乃大改選舉制，創進士科，以攻試爲選舉標準。更大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徵辟遠近儒生，但爲時不久，社稷淪亡。一切舉士新

規，只有期之於繼起的王朝。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文獻通考選舉攷二）。

開科取士體制，至唐始大臻完備；而我們在此所當注意的，倒不是它分科規定的如何詳密，而是它對於官僚政治有如何的補強作用。

考試大別爲學館生徒試，鄉貢試，和詔試，除後者爲間一舉行者外，其餘兩者，爲取士重要途徑，而整個科舉制對於官僚政治所曲盡的功能，亦存於此兩者之相互補充與相互制約。

唐代開設了許多種類和性質不同的學校。除各州縣分別設有學校外，在中央者有六學二館；二館爲弘文館崇文館，有所收生徒爲皇族及最大顯貴子弟，等第最高；六學爲國子、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前三者分別爲二品以上，五品以上，七品以上子弟入學之所，而後三者則分別爲八品以下，低級官僚子弟及庶人入學之所。學校的等級分得如此嚴格，而所學科別，又分別按照「身分」需要，互爲區別；七品以上，經典爲重，八品以下，技術爲重。學校教育及所習性質不同，顯然會先天限制入學者的出路或前途，但對於這種實質上的不平等，會由幾種形式上的平等規制將它沖淡了，朦朧了。

庶人皇族國戚子弟同樣有入學機會，那不是非常平等麼？此其一；凡屬學館的生徒，要入仕途，都經過過試，此其二；就是不入學館，亦得「懷牒自列於州縣」就鄉貢試，此其三。最後一點，非常重要，如其沒有這種規定，前面兩項形式平等，都沒有什麼意義，而用科舉制打破門閥壟斷仕途的目的，亦將無法實現。所以，到了天寶十二年，雖一度「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但至十四年，又「復鄉貢」。我們由此知道，唐代的科舉學校並行制度，從表面上看來，任何人得「懷牒自列於州縣」就鄉貢試，入學校就似乎成爲不必要了，但除鄉貢試畢竟多一些轉折，沒有生徒試那樣直接外，就應試者講，雖然不入學校也行，學校將因此減低其重要性，但就官僚封建社會講，却又不同了。突然一

下把士族大姓貴胄們把持仕途的局面改過來，叫他們的公子王孫和卑賤的庶人一同攷試，那顯然是不容易辦到的，學校在這場合就無疑在起着「蒸溜」或「濾清」的作用；而且，學校所設科目，因受教者社會地位，有深有淺，有通有專，那不僅可藉以昌明經學，訓練專門人材，而對未入學校人士，亦將因此發生學習上的示範影響和思想統制的功能。所以，把仕途向庶人開放，決不是基於什麼平等或民主的觀念，到了唐代那個歷史階段，要完成集權的專制官僚統治，是不能不採行一種比較稍有融通性的官人方法的。

事實上，唐代亦係起自巨姓大族的環境中，太宗踐祚之初，雖頗思在各方面不過於重視關東舊族傳統，然沿至玄宗之世，欲以真源臨源二公主降士族，婚於當時大姓崔盧，猶以為難，而慨然謂「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唐書杜羔傳——引自前揭方壯猷中國中古時期之門閥）？門閥相互結託，形成莫大社會勢力，要在取士官人方面，完全不受他們牽制，殊不可能。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一百卷，甄別士庶；接着中宗、玄宗、代宗、憲宗、文宗等朝，皆有類似性質的撰述。譜學與依品官人有關，至唐代而反特別興盛，無怪唐代四百餘宰輔中，大姓崔氏占三十二，楊氏杜氏各占十一，盧氏十，鄭氏八，其他屬薛柳武蘇等氏者，復共達數十人。它們把持朝政，自難免不壟斷仕途。所以為庶人下品「網開一面」的科舉，名額極受限制；而攷試及第的人，又不一定可以直接入仕。於是，奔競請託，百弊叢生。「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至二千人，少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文獻通攷選舉攷二）。當時「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已」；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之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呼，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為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同上）。

科舉限制愈嚴，競爭愈烈，而其對思想統制，亦愈易就範；對上級官僚，亦愈易卑躬屈節表示忠誠。士之「可鄙」與否，滿可不問，官僚的統治，却顯然由此注入了一新血液。可是，在那些攷試不第，而又請託不遂的人士，儘管腦子裏充滿了一網常名教，不得「犯上作亂」，但一有

發洩不平的機會，他們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唐末王仙芝黃巢之大亂，即由屢舉進士被擯，憤極而起；此外，如李山甫，李振等皆因屢舉進士不第，圖謀報復，故由黃巢之亂至朱溫柄政，所有舊時世家大姓，非慘遭殺害，即橫被貶黜。千年來門閥高第，幾一掃而空。彼等個人仇怨之伸雪，實體現着「寒人」「下品」長期備受門閥壓迫侮辱之社會的歷史的反抗。

然而，這不是科舉制引起了唐祚的覆亡，而是唐代頑強的門閥勢力，妨阻了科舉制緩和作用的發揮，或者說，唐代施行的不澈底的，狹隘的科舉規制，仍不够適應當時已經活躍而發達起來了的政治的文化的場面。

三

如其說，科舉制是中國後期官僚政治的必要配合物，它自然不會隨着唐祚的覆亡而衰落下去，反之，妨阻着科舉的門閥勢力在唐末所蒙受的致命打擊，却無異為此後科舉制的發展，除去了一個障礙。

在宋元明清諸代，我們已講到那是中國大土地所有制或中國型莊園制經濟特別發達的階段。那些大地主或莊園主，雖然有不少是由豪族，大姓所轉化過來，與所謂中世門閥還保持一些歷史的聯繫，但他們的社會性格，却顯然變得更為流動，就政治上說，就是更接近官僚的場面，而那些以商業高利貸業起家，在當時流動經濟上，日益增加其社會重要性的地主們，當然也更希望仕途能為他們的子弟敞開。所以，唐代創建的科舉制，以及伴隨着科舉制而產生的其他官人舉士方式，就為這些朝代所繼承並從多方面予以擴大和充實，而變得更加系統化了。

比如，就科舉與學校的關係方面講，我們已明瞭唐代把學校與科舉相輔而行，首在使貴胄對庶人保持某種區別，次在對有關思想訓練和學科重點方面，為一般提供示範的途徑。宋代科舉，大體雖沿唐舊，但會一度在王安石秉政時代，把學校看為養士之所，於是整頓太學，立三舍之法，以次遞升。升至上舍生，可免發解及禮部試，特賜之第。可是，安石去職，「寓試於學」辦法即廢。直至明代，又使「學校備材以待科舉」；非國子監生和府州縣學生，不能應科舉。這一來，學校就變成了科舉的必經階段

。就變成了官僚養成所。但進學校需要相當費用，而在學校所習學科，又同時可以在校外習得，結局，學校自然要失掉存在的價值，而把舉士重點移向科舉了。

科舉在唐代本分有進士明經等科別，而對每一科別所要求通解的科目，又依其將來入仕需要，分出必修選修；此外，更設定各種技術性科別如書算等，以待低級吏員和庶人。這至少在形式上是合理的。但唐以後各王朝，對此變來變去，似乎還退步了。宋代對政試科目，前後多所改變，而對於經義、策論、詩賦的抉擇，會在新舊派間捲起極激烈的論爭。最後折衷辦理，將進士分為詩賦經義兩科。元代又把詩賦經義，并作一科，而於通政兩者之外，又加入一項策論。鄉試會試同。明清兩代大體一樣。

爲了使應試者答論不離題太遠，特別於經義政試的文體格式，曲加限制，是謂制義；制義規定文字須逐段相對，又名八股。八股起於明，而更嚴於清。科舉試演變到以經義爲主體，而經義的闡述，又被拘束於八股的文體中，就體制上說，是愈來愈簡單劃一了，就思想統制上說，是愈來愈嚴密，愈走進牛角尖了。但我們這裏且不忙講它的利弊，先且看看伴着科舉制而產生的其他官人方法。

一切都須經過科舉，始得入仕，那無怪我們的歷史家如錢穆先生一流，把科舉作爲中國社會平等的表徵，即無貴無賤無貧無富，都須經過政試，考試不因富貴而保證其不失敗，亦不因貧賤而阻礙其成功。但我們把貧賤先天限制着出身的較深一層的道理丟開不講，史書上會非常明白的告訴我們，官人舉士之法，歷代並不限於科舉。宋代對於科舉異常重視，且於科舉制度之改革，貢獻尤多，但「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尙有定數。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宋官冗費）。官從這些方面雜濫取得的多了，而從科舉入仕的就少了。其他不講，僅恩蔭一項，就多到了異常可怕的程度。依宋任子制：一人入仕，其子孫親族，俱可得官，官愈大，所蔭愈多。甚有蔭及本宗以外之異姓，蔭及門客、醫生的。高宗時，中書舍人趙思誠會力言恩蔭妨礙仕途之弊，謂「孤寒之士，留在選部，皆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調者矣」（文獻通考選舉攷七）。

雜文二題

商翼

「大選花絮」

國代選舉早已結束，開票的結果也多已公佈。對於我們這些小民們，究竟鹿死誰手，那些新貴當選，那些舊貴蟬聯，並不能引起多大興趣。倒是各報上都有點用花邊圍着的「大選花絮」，登着些競選趣聞與開票笑話，在憂愁柴米油鹽之餘翻翻，的確是一種難得的消遣。

如上海有人選「程咬金」、「筱丹桂」、「差類金」；無錫有人選「楊貴妃」、「董小宛」、「貪官污吏」。北方某地競選時，有候選人買了許多炸蠅，一個個都拴上「請選某某爲國大代表」的布條！讓它們飛出去代爲宣傳。南方某地開票時，有選舉票上寫道：「同春堂包治五淋，白濁，梅毒，爛腳。」並附歪詩四行：「道聞有選舉，想吃大肉麵，餓肚換選票，啥也沒吃着。」像這類妙文，只有此時此際的中華

影子

多年來懷着個小願望，想寫篇數百字的短文，談談所謂「中國的」。儘管酒樓、飯館、茶室、戲院……都貼了警察局印製的國防部諭，叫大家莫談國事，你還是隨時可以在耳邊抓到這類話

民國的公民，才創作得出。吃飯時期讀，可以增進食慾。飯後閒談，可以幫助消化。在這難得展眉的年頭，憑空添了這麼多笑資，此大選之所以爲大也。若非耗資過鉅，有違節約法令，我倒很贊成多來幾回這樣的國代選舉的。

但仔細想想，却又覺得可悲。本該是洪流，却只見泡沫。本該是莊嚴的大事，却只見幽默的花絮。當然，這並不能怪當選與落選的被選舉人。還是因爲選民們冥頑不靈，劣根性難除，總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所以弄得堂堂大選，如一席笑談。但願在無定期延會之後，一旦國民代表大會真的舉行了，屆時羣賢畢集，濟濟一堂，能使人耳目一新，氣象萬千，再不是有一種圍在花邊中的花絮，作爲點綴綴點的裝飾品而已，那就是國父在天有靈，遺憾上那句「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不算白寫了。

語：「啊，中國的事就是這樣！」「老兄，中國的玩意兒就是這一套！」……我們的同胞，或者說我們的公民，談起我們的國家來，總愛用一種帶點挪

明清兩代在形式上，雖繼宋之弊，把恩蔭的方式變和緩了，但明初薦舉盛行，此後亦雜流並用；清以科目、貢監、蔭生爲正途，薦舉、捐納、吏員爲異途。特別是捐納一項，明有納粟監之例，清自嘉道以後，內官自邸中，外官自道府而下，皆可報捐。恩蔭既行，不僅爲變相世襲之賡續，且還推恩於貴者之親故；而捐納之設，又無異爲富者大開方便之門。我們歷史家謳歌之「平等的社會」，原來如此！

然而，爲補救科舉制偏頗所施行的恩蔭與捐納，即有弊竇，究不能以此爲科舉病。我們且進一步看看科舉考試施行過程中所表現之「平等」。清代以異族入主中國，特別需要利用聖人之言的經典，利用統制思想與仕途的科舉制，利用熱中科舉或利祿的知識份子，而達成其統治的目的。而爲認真做出一點成效來，會在順治十年的上諭中，對當時神聖的科舉取士內幕，揭示出了這樣的一幅污濁景象：「國家崇儒重道，各地設立學宮。今士子讀書，各治一經，選爲生員，歲試科試，入學肄業，朝廷復其身，有司接以禮；培養教化，貢明禮，舉孝廉，成進士，何其重也，朕臨御以來，各處提學官，每令部院致試而後用之，蓋重視此學員也！比來各府州縣生員，有不通文義；倡優隸卒本身及子弟，廁身學宮，甚者出入衙門，交結官府，霸占地土，武斷鄉曲。國家養賢之地，竟爲此輩藏垢納污之所。又提學官未出都門，在京各官開單屬託；既到地方，提學官又採訪鄉紳子弟親戚，曲意逢迎。甚至賄賂公行，照等定價；督學之門，竟同商賈；正案之外，另有續案；續案之外，又有寄學，並不報部入冊。以致白丁豪富，冒濫衣巾，孤寒飽學，終身淹抑……種種情弊，深可痛恨！」（東華錄順治十年）。

這段話不但告訴了我們：什麼事？還告訴了我們：士如何才能入仕？

四

然而，我們如其從這些方面來評論科舉制的流弊，那就同流俗歷史家昌言科舉制的「平等」優點一樣，太失之支離了。

一個把專制君主頂在頭上，還需要各種封建勢力來支撐場面的官僚社會，它如何能允許真正選賢任能的致試制度！它又如何能允許全國的用人大權，都交給傍人去執行！專制君主及其大臣們施行統治，沒有用人的特

偷的詭氣。好像所談的「中國的」：一則已被看透了，二則反正扶持不起，三則也無關自己的責任。所以只需用這麼一種語氣，搖搖手或搖搖頭，一笑置之。

有次在一個公共場所，我又聽見有位「黃帝子孫」談起「中國的」了。他說：「中國的一切都是影子！沒有靈魂，沒有血肉，甚至沒有軀殼。只有模模糊糊的一片，飄來飄去，在那裏鬼混。」

我恍惚有所悟，的確，中國的一切都是影子。舊的那一套，什麼三墳五典，四維八德，自然都已成了影子。要不然，老先生們不會嘆息「人心不古」了。新的這一套，什麼民主科學，歐風美雨，雖然時髦，却也只有些影子。大至一國大典的選舉，小至上海灘上的野雞口中的洋涇浜，和歐美的真貨色比較起來，皆如猴子擬人，鸚鵡學舌，略有點影子而已。龍門書局影印的西書，恐怕算是最貌似的了。

而這一片新舊中西的影子，又相交織，相糾纏，構成一幅今日「中國的」大畫面。故「命相」則「科學」，「競選」則「禮頭」（見大公報十七日蕪湖通信）。既似國粹，又似西化，然而新的靈魂未具，舊的血肉也早已剝盡，只落得一片影子，恍惚惚惚，若有若無而已。

我因此想起了一篇文章。不是魯迅的「影的告别」，因爲魯迅的預言，影

子「將向黑暗裏彷彿於無地」云云，並未實現。而是安徒生的一篇，雖匿名「影子」，却有血肉，有靈魂，百讀不厭的童話。

那篇童話說一個北方的學者，到一個炎熱的國度去旅行，忽然丟失了自己的影子。當然，他弄得很難堪。一個沒有影子的人，豈非衆人的笑柄？於是逃回北方，躲進自己的書齋裏。他工作得很辛勤，却越來越窮困。到後來，餓得又瘦又黑，大家都說他同影子一般了。忽然，有一天，一位高貴的著黑大衣的不速之客來拜訪他，對他說：「我就是你的影子。從你這裏逃出去之後，我發福了。而你現在却道窮瘦。我們現在交換個位置吧！我要幫助你，使你吃飽。把你的書本拋開，跟我來！從今後，你做我的影子吧。」他們便又出發到那炎熱的國度去旅行。具了人形的「影子」，憑他的狡詐與無孔不入的本領，發了財，做了官，娶了公主。而變爲影子的學者，却被忽視，被踐踏。而最後受不住苦楚，宣稱自己是人的時候，却被衆人目爲瘋狂了。

手頭無書，難免記憶不真，有點「以意爲之」。但無論如何，這一個童話，或者說寓言，正可引用於今日的中國。

對於這「中國的」影子，或「影子的中國」，粗看起來，似乎一則極易看透，二則扶持不起，三則也不必自己負責，只需一笑置之，搖搖手或搖搖頭，

殊權力，沒有任意拔擢人的特殊權力，就根本無法取得臣下的擁戴。任何人走上仕途，如全憑考試，他們就不會對上峯表示特殊恩遇，這與以前經九品官人法「安流平進」的人士，不肯「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一樣。所以，任一施行科舉制的王朝，都必得為專制君主保留親自欽定的制舉方式，必得為其他大官僚保留銓選、選授、銜陞一類的拔用方式，所有這些，再加前述的蔭補，捐納，不但會影響到科舉的名額，並會多方限制已錄取待任用及已錄用待升遷者的做官機會。——一面昌言科舉取士，一面又用種種方式抵消科舉取士的作用，不是非常矛盾麼？

然而更矛盾的却在科舉考試內容，與科舉制宣揚的選拔人材的目的，完全不相符合。如其說科舉及與其伴行的學校，在為了養成或鑑定從政文官，則學校所習，科考所試，應針對其從政所需。擁統的經義，特別是科舉文字格式講經載道的八股，可以說是與實際政治，毫無關係，而抒情言性，吟花弄月的詩賦，更是相去十萬八千里。這種離奇現象的解釋，真如有些人所說，是由於當時君主大臣們，都相信「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都相信經通一切皆通麼？不是的。清康熙頒貼各地學官聖諭十六條中，有兩條答復了這種疑問，即：「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

如其我們不否認科舉制也希望達到選賢任能的目的，但它的更大目的，却在使人的思想拘囚於一定範式中；在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標上；在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籠糊智識水準逐漸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種族或階級意識。如其說，它對於前一個目的達成，過於有限，但對於後一個大目的的成就，就確不算小了：試想，網常教義自中世分立局面以後，不是重復成爲我國的正統思想麼？社會進步了，文化也逐漸開展，一般「居仁由義」，吟詩作賦的有識人士，不是日益薰心於利祿，而不復以國家、民族、人民的安危死活爲念麼？統治者是異族，他們就忠於異族（雖然其間也有少數不仕異族的堅貞人士），統治者是同族，他們就做同族的官。做官第一主義，本來由儒家的政治哲學立下了一堅實基礎，但其充分發揮，却是由於科舉制。

科舉制像從外部爲中國官僚社會作了支撐的大槓桿，雖然它同時又當作一種配合物成爲中國整個官僚體制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

用一種揶揄的語氣說聲：「這就是中國的了！」

但是這一個帶藐視或忽視意味的「中國的」，却把我們的「影子」縱容了，養嬌了。當我們的人民，或者說黃帝子孫，一個個又黑又瘦，餓得同影子一般的時候，也正是它（「影子」）發了福，具有巨大的形體，覆蓋了整個中國的時際。

所以醒醒吧，公民們！不能再有一個「中國的」，把這「影子」一笑置之了。不要以爲它只是模糊糊的一片，在那裏鬼混。不要以爲它「徬徨於明暗之間」，總會「在黑暗裏沉沒」。正相反，鵲巢鳩佔，喧賓奪主，「影子」早成了我們的主人，正在以無血肉，無靈

魂的殘忍，蹂躪着變爲影子的人民。而且，它是有無孔不入的本領的。你看吧，那一個角落沒有它？那一條法令沒有它？那一樁行動沒有它？叫人神經衰弱，寢食不安的，就是這一片中西合璧，古今皆備，化爲主人了的「影子」。

這一顛倒，從何時開始，我不明白。將於何時結束，我也不清楚。但是在今天，如果有已化爲影子的人民，因爲受不住苦，站起來說，「我是人！」那是必定要被指爲瘋狂，須加以嚴平，討伐，至少也得作個緊急措施的。信筆寫來，已過千字。後生淺識，豈敢爲「中國的」一詞作長註？因題目「影子」。

本刊徵求國內外各地通訊稿件

- 一、本刊徵求國內外各地通訊稿件，邊遠省份及海外者，尤所歡迎。
- 二、通訊題材不拘，凡有關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教育文化等類問題者均可。
- 三、注重專題報導，最忌包羅過雜或過廣，如同某某地方印象記一類稿件。
- 四、注重材料之真實性及新聞價值，敘述之系統化。
- 五、通訊格式不拘，但請分段，加小標題。
- 六、每篇字數最好在四千以內。
- 七、來稿一經決定採用，不俟發表，立即從優致酬。

主席北巡前後

辛莘

新的軍事形勢與 新的人事安排

從十月初到十一月末，僅僅兩個月的時間，主席兩次駐節北平。若在承平之世，這確是北方人民的光榮。

兩年內戰，單就表面的軍事一點來看，在今年十月以前，河北戰場，真可說是棋逢對手，停滯在膠着狀態。誰知到了十月下旬，就是這個膠着狀態也保不住了。十月中旬的第一天，共軍開始進攻平保間的徐水。國軍爲了夾擊來攻的共軍，特從保定以南的石家莊調出第三軍的一個師，到了十月廿四日，這支援軍在未到保定的途中望都西南合被圍覆沒。二十天後，河北省五大支點（平、津、唐山、保定、石家莊）之一的石家莊就失守了。

山東是愛莫能助，山西早成呆局，只有西北的察綏還開着一條生路。從北平經張家口、大同、歸綏到包頭的鐵路，還是北方絕無僅有的一條通道；察綏兩省數度經過大員視察，公認是「小康局面」。那麼出兵隣省，以免唇亡齒寒，自是義不容辭。

從今年夏天起，在北方成立「熱察綏」、「陝甘寧」兩個剿匪司令部的傳說，就一直不曾消失。傳說總歸是傳說，始終也沒能實現。這個原因，也許就如傳說中的兩位司令中之一的馬鴻逵將軍夏天在北平招待記者時所發表的：「我不能指揮別人，也不願別人指揮我。」

在這個中央統帥部、行轅、綏署……疊床架屋的指揮系統中再添插幾個機關，原是無傷大體的，只是人事問題彷彿不太容易安排。成立「剿匪司令部」的傳說一度過去了，接着傅氏將出任北平行轅主任的謠言又接着起來，最後則有全國設置三個「剿匪指揮所」的消息傳出。看在此方惟一可供調遣的隊伍份上，這個差使自然落在傅氏的頭上。

據說傅氏還不肯就，大概還是爲了把綏察當作第二第三故鄉，和珍惜那十萬後套子弟兵的緣故吧。趕到南京請辭的電報沒有得到批准，而主席飛臨北平代爲佈置的電報却先傳到傅氏的耳中。二十六日下午，主席親臨北平。文武百官雖都忙碌起來，但最緊張的還是各地將領。一連四天，行轅每天舉行軍事會議，行轅分別召見將領。在指示、訓勉之下，各方總算同意了傅氏義做北方總指揮。二十八日上午，這個總指揮的任命式便在行轅的軍事會議上由主席親自發表。這個會議的空氣很是嚴肅，主席還發表了一段嚴厲的訓話。

關於傅氏新任命的這個消息，第二天便由天津報紙紛紛編爲頭題而揭露出來。北平行轅的機關報「北平日報」特地刻了七行字體的大字，而傅氏本人在平經營的報紙「明日報」，却還故弄玄虛，說：「北方剿匪作戰，將統一指揮……主持人選在遴選中。」

地方政情與經濟

召開軍事會議以及調整人事等項措施，還是不夠解決問題的，在政治經濟上也得照顧一番，偏偏在各地將領後面，又站了不少請願要錢的在等候傳見。各「民意機關」的代表和大學院校長等，就變成第二級召見的人物。

請求團隊的彈藥。軍事上有了新的佈置之後，「民意機關」的代表和爲人師表的大學校長也得到慰勉有嘉的訓示，只是物價似乎不大聽話。

石家莊失守後的北平政界

凌華

孫連仲要向共黨學習 張蔭梧呼籲效法日本

石家莊失守的事，在這次河北省臨時參議會上也是討論的主題，一方面檢討既往，一方面又很痛感於亡羊補牢。在十一月廿四日臨時參議會舉行揭發禮時，李宗仁曾以資資格致詞，他說：「現在中國局面當然是嚴重的局面，要克服還在『人為』。中央應與全國各階層人民團結合作；不是依賴推諉，互相諷罵，就能克服困難。中央現在就有依賴心理，希望美援迅速成功，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戡亂剿匪，這半年來軍事上有很大的成功，膠東半島的收復，在戰略上有很大的收復，共軍的補給線被切斷了；雖然國軍在戰術上吃了虧，共軍到處竄擾，但共軍的力量日漸減小了。……所以大家不要灰心。中央歷來遇到的困難，都可以克服。局面雖不能樂觀，但亦不必煩悶悲觀而互相攻擊。」

孫連仲也派了代表來致詞，認為「我們要向共匪學習」：「冀省軍事失利，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國軍要守據點，分散兵力；第二、共軍可以不按法令，魚肉人民。共匪的黨政軍民配合密切，我們要向共匪學習。」此外，保定校聯會及各縣同鄉代表張蔭梧代表「河北人致詞，說到軍事失利的原因，是：（一）「並非共軍攻破，而是守軍裏面有共軍反間」；（二）「事權不統一，黨政軍不能協調」；此次石家莊之外市燬，係由民衆防守，激戰三四天，飢寒交加，石家莊便是這樣陷落的。」「（三）「政府太看不起人民，如保定此次修城防工事，大拆民房，以掃清射界，使數千人民沒有房子住」。結論是：「政府不能向日本學習：『日本投降前，在冀省日本兵力不足一萬，但能固守點與線及面的大部，就因爲日人是用以華制華的方法，現在政府就不敢以河北制河北，希望參議會將此點發揮出來。」

時選出了一個忠臣，寫了兩篇慷慨激昂的文字。參議員路蔭樞提了兩個保衛河北的議案，其一是「請中央應作戰略上之重新計劃以確保平津保重鎮案」，劈頭就說：「河北依山面海，自古爲軍事重地。唐失范陽，故播遷於巴蜀；宋喪燕雲，故風靡於遼金。獨元明清三朝，定都燕京，卒能統一華夏，享國長久。最近日寇入寇，席捲平津，黃河以南，勢如破竹。昔人謂：河北安則天下安，河北危則天下危。往事具在，信而有徵。慨自日寇投降，冀南淪亡，而永年一城，孤守二載，匪思北竄，終有後顧之憂。近則數月之內，棄永年，棄滄縣，最近石家莊又以棄守聞！日寇百里，昏亡齒寒，平保岌岌危矣！」

「三則曰『軍法從事』，四則曰『應以身殉』。然後又分爲幾期，認爲「三年之後，華北當可底定也，」「否則因循延誤，枝節節節，毫無具體規劃，坐視匪勢猖獗，勢成燎原，則平津保必瀕於危，無平津保即無華北，無華北則全國騷然，雖欲爲江左之偏安而不可得矣，事實昭然，可逆睹也。」

路蔭樞的議案，是「請省政府查明石門滄縣失陷責任以重國法案」，開頭說：「石門淪陷，華北震動，河北人民尤深憤慨，該市爲本省心膂，縮艱齊晉，控制南北，開埠以來四十餘年，商業輻輳，工廠林立。平津而外，首屈一指，日寇投降後，冀南各地來石避難者，逾數十萬。今一旦委而棄之，物資之損失，人民之死亡，當不可以數計，誠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此後說：「概自去歲定縣正定相繼失守，省府當局……泄泄沓沓，日復一日，坐令強寇侵凌，任意蹂躪，在負有守土重責軍事長官，捫心自問，上何以對政府，下何以對人民？……且石莊地勢，西扼井陘，北臨滹沱，設險固守，實具天然形勢。人力物資，亦稱完全無缺，乃不到七日，則土崩瓦解，魚爛肉亡，可知平日負責當局之顛覆。」又舉清末洪楊之役，與今日「朱毛之役」相比，當時「失守城池者，均拿問治罪，故人心漸厲，卒奏中興」。滄縣失守，未及半載，而石莊又相繼淪亡，此兩地內士卒死者若干？百姓死者若干？公教人員被俘擄者若干？槍械彈藥車輛機器資敵者若干？而中央及地方當局，視若無事，此誠大惑不解者矣。將領不聞請罪之辭，中樞亦無查辦之令，以視滿清末季政治，尙遠不逮，則此後遇有匪警，又孰肯捨命不渝，效節死將？綏見望風逃避，懼怯偷生者，比比皆是。雖有金湯，誰復與守，淪胥之禍，即在目前，本會忝居代表，悲憤填胸，如鯁在喉，義難緘默，惟有請求省府主席及軍事當局，將滄石兩地失守責任者，明白宣布，其應予懲處，應按照法令明正典刑，以振軍紀，而慰死亡，迫切陳詞，敬候公決。」

其餘的質詢和報告也莫不直接間接涉及軍事問題，有的問非法攤派不但未禁，反而變本加厲；有的問臨時參議會上次召開子保定的，這次在北平，下次是否能在南京或香港；有的問一剿匪究竟有無通盤計劃。報告之中，尤其常提及石莊戰役以及善後問題。社會處長闡明「救濟」的真象，說：「被救濟的人每人平均是九千元，食糧十市斤，每兩人一套衣服；這一套衣服也許是一隻皮鞋也許是一隻手袋，這種東西，作揖都沒人要。田糧處長謂軍糧最傷腦筋。衛生處長說衛生工作人員往往被共軍「以甚高的待遇」利用去了。保安處長慨嘆待遇不夠。母怪某能代表大多數意見之參議員慨歎曰：「這個局面，雖來也搞不好。」

利，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國軍要守據點，分散兵力；第二、共軍可以不按法令，魚肉人民。共匪的黨政軍民配合密切，我們要向共匪學習。」此外，保定校聯會及各縣同鄉代表張蔭梧代表「河北人致詞，說到軍事失利的原因，是：（一）「並非共軍攻破，而是守軍裏面有共軍反間」；（二）「事權不統一，黨政軍不能協調」；此次石家莊之外市燬，係由民衆防守，激戰三四天，飢寒交加，石家莊便是這樣陷落的。」「（三）「政府太看不起人民，如保定此次修城防工事，大拆民房，以掃清射界，使數千人民沒有房子住」。結論是：「政府不能向日本學習：『日本投降前，在冀省日本兵力不足一萬，但能固守點與線及面的大部，就因爲日人是用以華制華的方法，現在政府就不敢以河北制河北，希望參議會將此點發揮出來。」

參議員紙上談兵
各主管口頭訴苦
這次參議會大會中同

「三則曰『軍法從事』，四則曰『應以身殉』。然後又分爲幾期，認爲「三年之後，華北當可底定也，」「否則因循延誤，枝節節節，毫無具體規劃，坐視匪勢猖獗，勢成燎原，則平津保必瀕於危，無平津保即無華北，無華北則全國騷然，雖欲爲江左之偏安而不可得矣，事實昭然，可逆睹也。」

路蔭樞的議案，是「請省政府查明石門滄縣失陷責任以重國法案」，開頭說：「石門淪陷，華北震動，河北人民尤深憤慨，該市爲本省心膂，縮艱齊晉，控制南北，開埠以來四十餘年，商業輻輳，工廠林立。平津而外，首屈一指，日寇投降後，冀南各地來石避難者，逾數十萬。今一旦委而棄之，物資之損失，人民之死亡，當不可以數計，誠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此後說：「概自去歲定縣正定相繼失守，省府當局……泄泄沓沓，日復一日，坐令強寇侵凌，任意蹂躪，在負有守土重責軍事長官，捫心自問，上何以對政府，下何以對人民？……且石莊地勢，西扼井陘，北臨滹沱，設險固守，實具天然形勢。人力物資，亦稱完全無缺，乃不到七日，則土崩瓦解，魚爛肉亡，可知平日負責當局之顛覆。」又舉清末洪楊之役，與今日「朱毛之役」相比，當時「失守城池者，均拿問治罪，故人心漸厲，卒奏中興」。滄縣失守，未及半載，而石莊又相繼淪亡，此兩地內士卒死者若干？百姓死者若干？公教人員被俘擄者若干？槍械彈藥車輛機器資敵者若干？而中央及地方當局，視若無事，此誠大惑不解者矣。將領不聞請罪之辭，中樞亦無查辦之令，以視滿清末季政治，尙遠不逮，則此後遇有匪警，又孰肯捨命不渝，效節死將？綏見望風逃避，懼怯偷生者，比比皆是。雖有金湯，誰復與守，淪胥之禍，即在目前，本會忝居代表，悲憤填胸，如鯁在喉，義難緘默，惟有請求省府主席及軍事當局，將滄石兩地失守責任者，明白宣布，其應予懲處，應按照法令明正典刑，以振軍紀，而慰死亡，迫切陳詞，敬候公決。」

其餘的質詢和報告也莫不直接間接涉及軍事問題，有的問非法攤派不但未禁，反而變本加厲；有的問臨時參議會上次召開子保定的，這次在北平，下次是否能在南京或香港；有的問一剿匪究竟有無通盤計劃。報告之中，尤其常提及石莊戰役以及善後問題。社會處長闡明「救濟」的真象，說：「被救濟的人每人平均是九千元，食糧十市斤，每兩人一套衣服；這一套衣服也許是一隻皮鞋也許是一隻手袋，這種東西，作揖都沒人要。田糧處長謂軍糧最傷腦筋。衛生處長說衛生工作人員往往被共軍「以甚高的待遇」利用去了。保安處長慨嘆待遇不夠。母怪某能代表大多數意見之參議員慨歎曰：「這個局面，雖來也搞不好。」

其餘的質詢和報告也莫不直接間接涉及軍事問題，有的問非法攤派不但未禁，反而變本加厲；有的問臨時參議會上次召開子保定的，這次在北平，下次是否能在南京或香港；有的問一剿匪究竟有無通盤計劃。報告之中，尤其常提及石莊戰役以及善後問題。社會處長闡明「救濟」的真象，說：「被救濟的人每人平均是九千元，食糧十市斤，每兩人一套衣服；這一套衣服也許是一隻皮鞋也許是一隻手袋，這種東西，作揖都沒人要。田糧處長謂軍糧最傷腦筋。衛生處長說衛生工作人員往往被共軍「以甚高的待遇」利用去了。保安處長慨嘆待遇不夠。母怪某能代表大多數意見之參議員慨歎曰：「這個局面，雖來也搞不好。」

河北善後未辦了 榆林暨鼓動地來

這個時候，榆林才又「大捷」過一次。北平世界日報最近登了一篇「榆林戰役的教訓」通訊，較詳地說到榆林之戰的情形。在那「一隅」，共軍力量是彭德懷王震共九個旅，後來又從晉南調四個旅，「可說已盡其在西北可能動員的最大力量。反觀我們在這一隅的兵力，至

利，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國軍要守據點，分散兵力；第二、共軍可以不按法令，魚肉人民。共匪的黨政軍民配合密切，我們要向共匪學習。」此外，保定校聯會及各縣同鄉代表張蔭梧代表「河北人致詞，說到軍事失利的原因，是：（一）「並非共軍攻破，而是守軍裏面有共軍反間」；（二）「事權不統一，黨政軍不能協調」；此次石家莊之外市燬，係由民衆防守，激戰三四天，飢寒交加，石家莊便是這樣陷落的。」「（三）「政府太看不起人民，如保定此次修城防工事，大拆民房，以掃清射界，使數千人民沒有房子住」。結論是：「政府不能向日本學習：『日本投降前，在冀省日本兵力不足一萬，但能固守點與線及面的大部，就因爲日人是用以華制華的方法，現在政府就不敢以河北制河北，希望參議會將此點發揮出來。」

參議員紙上談兵
各主管口頭訴苦
這次參議會大會中同

「三則曰『軍法從事』，四則曰『應以身殉』。然後又分爲幾期，認爲「三年之後，華北當可底定也，」「否則因循延誤，枝節節節，毫無具體規劃，坐視匪勢猖獗，勢成燎原，則平津保必瀕於危，無平津保即無華北，無華北則全國騷然，雖欲爲江左之偏安而不可得矣，事實昭然，可逆睹也。」

路蔭樞的議案，是「請省政府查明石門滄縣失陷責任以重國法案」，開頭說：「石門淪陷，華北震動，河北人民尤深憤慨，該市爲本省心膂，縮艱齊晉，控制南北，開埠以來四十餘年，商業輻輳，工廠林立。平津而外，首屈一指，日寇投降後，冀南各地來石避難者，逾數十萬。今一旦委而棄之，物資之損失，人民之死亡，當不可以數計，誠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此後說：「概自去歲定縣正定相繼失守，省府當局……泄泄沓沓，日復一日，坐令強寇侵凌，任意蹂躪，在負有守土重責軍事長官，捫心自問，上何以對政府，下何以對人民？……且石莊地勢，西扼井陘，北臨滹沱，設險固守，實具天然形勢。人力物資，亦稱完全無缺，乃不到七日，則土崩瓦解，魚爛肉亡，可知平日負責當局之顛覆。」又舉清末洪楊之役，與今日「朱毛之役」相比，當時「失守城池者，均拿問治罪，故人心漸厲，卒奏中興」。滄縣失守，未及半載，而石莊又相繼淪亡，此兩地內士卒死者若干？百姓死者若干？公教人員被俘擄者若干？槍械彈藥車輛機器資敵者若干？而中央及地方當局，視若無事，此誠大惑不解者矣。將領不聞請罪之辭，中樞亦無查辦之令，以視滿清末季政治，尙遠不逮，則此後遇有匪警，又孰肯捨命不渝，效節死將？綏見望風逃避，懼怯偷生者，比比皆是。雖有金湯，誰復與守，淪胥之禍，即在目前，本會忝居代表，悲憤填胸，如鯁在喉，義難緘默，惟有請求省府主席及軍事當局，將滄石兩地失守責任者，明白宣布，其應予懲處，應按照法令明正典刑，以振軍紀，而慰死亡，迫切陳詞，敬候公決。」

其餘的質詢和報告也莫不直接間接涉及軍事問題，有的問非法攤派不但未禁，反而變本加厲；有的問臨時參議會上次召開子保定的，這次在北平，下次是否能在南京或香港；有的問一剿匪究竟有無通盤計劃。報告之中，尤其常提及石莊戰役以及善後問題。社會處長闡明「救濟」的真象，說：「被救濟的人每人平均是九千元，食糧十市斤，每兩人一套衣服；這一套衣服也許是一隻皮鞋也許是一隻手袋，這種東西，作揖都沒人要。田糧處長謂軍糧最傷腦筋。衛生處長說衛生工作人員往往被共軍「以甚高的待遇」利用去了。保安處長慨嘆待遇不夠。母怪某能代表大多數意見之參議員慨歎曰：「這個局面，雖來也搞不好。」

其餘的質詢和報告也莫不直接間接涉及軍事問題，有的問非法攤派不但未禁，反而變本加厲；有的問臨時參議會上次召開子保定的，這次在北平，下次是否能在南京或香港；有的問一剿匪究竟有無通盤計劃。報告之中，尤其常提及石莊戰役以及善後問題。社會處長闡明「救濟」的真象，說：「被救濟的人每人平均是九千元，食糧十市斤，每兩人一套衣服；這一套衣服也許是一隻皮鞋也許是一隻手袋，這種東西，作揖都沒人要。田糧處長謂軍糧最傷腦筋。衛生處長說衛生工作人員往往被共軍「以甚高的待遇」利用去了。保安處長慨嘆待遇不夠。母怪某能代表大多數意見之參議員慨歎曰：「這個局面，雖來也搞不好。」

老牌日報「新新新聞」的主辦人，也同余一樣，曾在選舉之前，回過家鄉，自然也同樣從事過各種運動的，然而一切與余中英相仿，終於落選了。（據廣漢人說，吳興戴傳賢知難而退，放棄在教育會提名，倒是漂亮舉動）。

「近來從省選所及黨部方面得來的消息，大概除了成都市的孫震、成都縣的黃仲翔、華陽縣的張羣幾位外，其餘都不免或大或小發生了些問題。并且據說類似新津夾江縣縣廣漢等處所發生的事件的，在全川縣份中，至少佔三分之一。有人還這樣說：「政府控制基層自治人員，如鄉鎮保甲長等，無所不用其極，多年以來就分期予以黨的嚴格訓練，化費的錢不知若干。現在這些人員雖佈滿了全川各縣，然在這次選舉中却完全不能達成控制人民的任務。經過這次選舉的考驗，充份證明了控制人民的夢想是成了泡影。時間和金錢，都是白費。」說這話是個什麼人呢？是一位黨部職員，憤憤然的。

會琦勉強上榜 民社黨濶平落第

另有幾件事也值得一提。

青年黨黨魁會琦，被指定在隆昌原籍競選。大概選出現在已不成問題了，然而其間也經過很大的周折。我是隆昌人，我深知縣中的情形。如果讓人民自由選舉，毫無疑義，當選的人必定不出陳能芬和黃肅芳兩人。聽說中央大員如張羣陳立夫諸先生，都會有電報給他們，要他們相讓，以成全中央的政治運用，以成全那位黨魁的民主師子。黃肅芳首先被逼而賣了帳，聲明放棄競選。但陳能芬是軍人出身，在隆昌辦了很多小學，又富有資財，自然很有羣衆基礎，受了人衆的鼓勵，幾乎如上文所述的藍江兩人一樣，想不賣帳。這把黨及政府都急慌了。難得省黨部主委黃季陸先生還親身趕到隆昌，向陳能芬「告饒」（縣中人普遍的還是這樣說的）要求他「顧全大局」。陳表示：「黨及政府的指示，措

辭得體，我接受，但這不是賣會某的帳」。這話，才算玉成了那位黨魁的勝利。

成黨內的離心力

從前在劉湘部下當過財務處長的唐華，他這次競選，據說已化費了五六億元之多，在臨到選舉的前夕，突接國民黨黨部的命令，要他讓給另一人，一句老話：如不服從，當予制裁，這位唐先生真氣壞了，接到這個通知，立刻破口大罵，接着把桌子一掀，掀翻了，桌子上所陳設的骨董花瓶跌得粉碎。可見這一氣真是憤慨萬端。好在有錢的人究竟怕事，氣雖然氣，却終乖乖的聽從了命令，聲明棄權。大概在上文所說全省三分之二的縣份裏，那些被迫放棄競選的人物都不免與這位唐先生有同樣的心情。有人以為這將是國民黨的損失，在官僚政客階層中，因支配選舉而造成了若干離心力。這也不為無見。

制支配的力量顯然是削弱了。其還能勉強達到控制及支配的要求者，也造成了黨的離心，拉攏一個，趕走幾個，畢竟不合算。這似乎值得黨方及政府仔細檢討而妥籌補救之道。聽說某高級負責人，已同別人討論到這些問題了。總之，從上述的事例裏，我們可以明白：畢竟控制人民意志不如想像那樣容易，雖說人民的知識水準很低；二，在這次四川選舉中，竟有三分之一的縣份擺脫黨及政府的控制，而表現了強項的民意，可證明四川人不是如羔羊那樣的馴服。而從這些強項民意的表現中，又可證明：因民智未開而主張不能實現民主的說法，并不可靠。這些強項民意的表現，毋寧說還是一件可喜之事。

市同孫震競選的徐子昌徐大爺，就只得了三萬多票（孫是十一萬多票），而得了個候補第一。蒲江的汪「梁霸子」顯然已經失敗了。至于那些回到原籍競選的顯貴們，誰都拜會過「梁霸子」，「梁霸子」也多表示支持，然而並不因之當選。「再者，那些不聽黨部命令而硬要競選的先生們，也并不全是「梁霸子」，更不是全仗袍哥的力量支撐出來的。這都證明袍哥雖然有力量，究竟并不能隨意操縱人民。而且更證明袍哥一樣是有正義感的，其對政府及黨的不賣帳，倒不是盲目的只爲了要支撐自己的拜兄，而多少是爲了政府及黨所要支持的人不洽輿情，不孚衆望。從這些地方，也可以證明袍哥似乎倒還不一定就是民主的障礙。這是我樂於附帶報告出來的。（十一月廿日，於成都。）

袍哥不起決定作用

談到四川選舉，人們一定會聯想到「袍哥」勢力。其實在這次表現中，袍哥固然不能說無力，但也並不如一般想像，就成了決定力量。比如在成都

本刊二卷十三期通訊「長江以南的動亂」，標題誤爲「長江以南黨的動亂」，多一「黨」字，特此更正。

更正

市同孫震競選的徐子昌徐大爺，就只得了三萬多票（孫是十一萬多票），而得了個候補第一。蒲江的汪「梁霸子」顯然已經失敗了。至于那些回到原籍競選的顯貴們，誰都拜會過「梁霸子」，「梁霸子」也多表示支持，然而並不因之當選。「再者，那些不聽黨部命令而硬要競選的先生們，也并不全是「梁霸子」，更不是全仗袍哥的力量支撐出來的。這都證明袍哥雖然有力量，究竟并不能隨意操縱人民。而且更證明袍哥一樣是有正義感的，其對政府及黨的不賣帳，倒不是盲目的只爲了要支撐自己的拜兄，而多少是爲了政府及黨所要支持的人不洽輿情，不孚衆望。從這些地方，也可以證明袍哥似乎倒還不一定就是民主的障礙。這是我樂於附帶報告出來的。（十一月廿日，於成都。）

合肥城鄉

方瑛

華中戰爭的重心移到大別山了。大別山是一個「亂源」，在消滅亂源的軍事措施下，遠鄰近舍，誰也不能躲開這悲劇場面的傳染。一方面商城市被擄掠，一方面農村生產被摧毀，商業上不能暢其流通，工業上不能盡其利，社會上不能盡其才，生活上不能盡其用。烽火連天，交通受阻，征夫拉夫，槍聲築路，……老百姓不能安詳地在鄉下作最簡單的生產，便脫離土地，擺脫父母妻子，給人家扛槍桿吃飯，國軍的也扛，共軍的也扛，土棍惡霸的一樣要扛。以農立國的農村非但不能促進城市的安定，反而成爲城市不安的大威脅。這於是人人都叫苦，家家有齣戲。

軍人多·公務員多
獨房屋荒乏

合肥是安徽在軍事和政治上的神經中樞，軍人最多，公務員次多。以薪金

爲生活基礎的公務員，生活奇苦，薪金老趕不上物價。軍人還可吃公糧，不管好壞每日兩餐是沒有問題的；公務員們則大都有妻子兒女，這一圈沒有生產能力的家屬拖累住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成天都爲柴米油鹽而心痛。冬天到來，軍人有公家的軍裝，公務員的衣著却得依靠自己。小公務員們在寒流衝來以後，一面唉喲啾啾的發抖，一面擦手擦耳朵的辦公，這情形的悽慘，使得省政府往中央日報發電，求代募寒衣一萬套，分配各級公務員。

兵多，公務員多，僅僅這兩多就使得城裏房屋荒有餘了。以前，中級公務員挑瓦房住，小公務員才住草房；現在呢，誰也不容易新找到一間草屋，房租跟着物價漲，像比賽跳高似的「你高我也高」。有屋子的人，看出了苗頭，把原來的一間，從中間加上了二層薄薄的竹簾，便

當兩間出租。你不要麼？隔一陣就被別人搶租下來，要租也遲了。房子裏住家眷，外面駐軍隊，櫃台上作生意，門口站衛兵，這已經成爲常事。

在一片片房荒聲裏，軍官們許多都有家眷，上行下効，連班長們也有許多帶太太的。弟兄們不帶家眷，却非常嗜賭。我們住著的地方前面是街；而街之處不便聚賭，士兵們便聚在後院裏沒日沒夜的狂賭，有牌九，有骰子，有的猜單雙，有的從老百姓家裏拖出一張破席，抓一把豆子，「四個一撥」地撥下去。他們呼么喝雉的聲浪，使我們半夜不能安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誰敢惹當兵的呢？

方報紙，一家是由省黨部主辦的「皖報」，一家是安徽幹訓團的「公正報」，電訊一色的採用中央社；地方消息最爲編輯者所感興趣的，是桃色案情，既有噱頭，又不易引起「思想」方面的麻煩，是記者們最好發揮筆墨的題目。在書店裏只能見到課本和一些不相干的典籍，那全是擺出來作門面的；京滬出版的新書，有雖有，全是張恨水和馮玉奇的「大世界」。這裏沒有美國的「大腳文明」，也沒有開明的「中學生」和中華書局的「穩當」讀物。小市民、小知識份子因居在還文化的荒島上，不得不付出不每天一千元代價，去讀那些「紅杏出牆」和「一道白光」的低級小說。租書店的生意自然很好，好得使他們運來大量大量的富於肉感的連環畫，纏住了更多更多的讀者。這成千上萬的讀(毒)物，把青年人訓練成奇形怪狀的可憐蟲；你給他談女人，眉開眼笑，給他談劍俠，津津有味，而一遇到國際新聞和民族國家的正經問題時，

新書少·正當娛樂少
惟低級小說充斥

知識份子大多生活在說不出的煩惱裏。讀書吧，沒有一本新書。看電影吧，沒有電影院。兩家地

他們便厭倦得索然寡味了。

土共坐大

說起來，合肥還是安地帶，可是究竟安全到怎樣的程度呢？鄉下人講：合肥城外幾十里路，便是土共的活動地區。東鄉一帶是由和縣巢縣竄過來的一股，要糧，要草，老百姓雖不痛痛快快地給，也不敢說不給。鄉下誰家有存糧，他們調查得一清二楚，一要就得繳出來。許多糧戶把積穀子土共，等到政府派兵催糧時，一顆米也拿不出手，法令難抗，告貸無門，土棍地痞們趁機敲詐勒逼，許多人被迫加入土共。農民們到了流淚要乾的時候，願不得什麼道德和良心，他們也殺人放火，採取了強烈的報復手段。復仇的慾望，淹沒了忍性，向後轉一百八十度，把土共集團當成最後依仗的梁山泊。那怕以後還有更殘酷的惡鬥或屠殺，以後的事以後說，眼前顧不得這許多。

土共集團擴大了，說

起來其中不乏像梁山泊的人物，五花八門，什麼都有：有學用式的書生，有李逵式的貧農，有燕青式的流氓漢，有林冲式的軍官。誰驅趕他們走上這一條路呢？由於共方的存在和號召，固然也是實情，但主要的總是爲生活所迫；鄉長保長敲詐勒索，政治腐化貪污，在求生不能的暗路上，逼得他們一直沒有回頭的機會，於是慘殺反叛的事實展開了。

土劣仗錢勢欺人
冤家藉土共報復

在這裏且講兩個故事。高廟鄉的楊家，是城西北鄉有名的大地東。楊家有三虎，一個是剿匪聯防處主任楊天中，一個是城內警察分局局長楊恕平，一個是高廟鄉長楊介繁。由於他們平日高利盤剝，收租要收草租（在谷租棉租以外），草膏人命，沒人敢惹，老百姓便在暗地裏企圖報復。從今年春天到秋天，揭發罪狀的黑帖子時常出現在牆頭路口，連他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奸佞之徒，或捏名，或未列

民族國家的正經問題時，

安徽的「善後救濟」

邵資

名，郵控於省府、保安司令部、地檢處、合肥縣政府及國防部者，不知凡幾。約是五百多，西北鄉大約有二百多，可是誰能作出精確的統計來？

看起來，土共的實力不僅沒被削弱，反而不甘潛伏，簡直要正式有所作爲了。

鄉里的人民「代表」，許多都集中在城裏找房子，口口聲聲說政府派兵太少，常出怨言。

目前的鄉下，一面是共軍要糧草，集中地方槍枝，秘密進行編組，要人民時時供給情報，防止國特活動；一面是政府「動員救濟」，進兵大別山，搶征糧草，還要派征長備

仗子；以每鄉四十名論，七十幾鄉就有三千多人。鄉下人把征仗子看成和抓兵是一回事。在妻子兒女啼飢號寒的慘狀下，鄉保長拿着「貽誤戎機，緊急治罪」的大旗橫行無阻，人民怎麼能不苦呢？一個老頭子說：「我是鄉代表，本來敢講話，現在事情大了，上頭又給他們作主，教我說什麼？……總而言之一句話，公家不能難老百姓，難開了就是亂子。」

（十一月四日寄自合肥）

漸強起來，像嚴冬的雪花

難民半死不活

由於國共兩軍在安徽境內推磨式的戰爭，由於洪水在皖北（黃汛區十三縣）皖中（舒城、廬江）的汎溢，蚌埠的難民是聚集得更多了。

每當凄風苦雨的寒夜，閩人們正在各種娛樂場所享樂的時候，難民就在火車站，巷弄口，和大商號的屋簷下抖擻着。和他們親近的只有寒冷和饑餓。

市政府是不會管這些閒事的，實在也管不了。這裏雖然也有着什麼難民救濟所、紅十字會、卍字會一類的慈善機構，但氣氛象嚴若衙門而已，真正得到救濟的並不是難民。他們好容易在經過種種限制和審核而被確定爲「難民」之後（凡中國之人，當難民也是要有「資格」的），每人每天僅能領到

三千元，小孩減半，而且以三天爲限。氣運好的，則再領一次一萬元的遣散費了事。

十月中旬後，蚌埠也緊張起來，情形就更加不同了。軍政當局強迫難民離開市區，據說是爲了防範難民中間混有間諜。

和這種情形對照的，是救濟總署皖分署的吉普車街上的「兜風」，是毛毯、奶粉、罐頭……一類救濟物資大批堆在大商店的櫥窗裏兜售，是各地救濟院院長的騎肥馬蹄。

下面是幾個具體的例子，都曾刊載在最近的皖北日報和安徽新報（李品仙兄弟蚌埠市長李品仙和的私人報紙）。

一、鳳陽縣救濟院院長田壽田盜賣救濟物資兩批，一批爲二十噸，另一批約值兩萬元。這些物

資，早由縣總分配給鳳陽縣兒童救濟站。

二、定遠縣「財政整理委員會」主任杜叔平貪污一億七千餘萬元。這筆款子是由募捐得來的水災難民救濟金。

三、定遠縣救濟院院長武君實貪污，計小麥二十噸，其他物資約值三億元。

四、額上縣准提委員會的主任兼該縣參議員劉某，利用准提修運費一億三千餘萬營私。

五、懷遠縣警察局，凡遇難民過境，勒索「手續費」五萬元至十萬元不等。這大概和所謂「買路錢」意義相同。

報館分肥緘默

最後還有一樁值得一提的，就是最近蚌埠新聞界的「皆大歡喜」了。原來行總院分署於上月中旬宣告結束時，有一

筆極大的賬目交不出手，於是就多方「運動」，最緊要的對象自然是新聞界。

新聞從業員大抵每人得到一床美國純羊毛的毯子和三套襪衣布。一個在安徽新報服務的朋友曾經對我讚美過那床毯子：「嘿！這床毯子真好。你看，毛純色純，道地的美國貨。」

對於這件事，「輿論界」自然按下了不提了。蚌埠的四家報館皆大歡喜，心照不宣。一事不提，便百事不提了。

而另一方面，則徵糧火急。前些日子，皖北日報曾載中央飭令省府限期徵辦田糧並補收歷年的欠數的消息，同時，據傳當局又限令各地積谷，蚌埠一地即達一百四十四萬石。

眼看市郊的農民連麥糊糊都吃不起了，有誰救濟他們呢？（十二月四日，蚌埠。）

上海雜誌界聯合宣言

上海各雜誌社鑒於過去缺乏運籌，業務諸多困難，最近物價波動益烈，尤感支持不易，爰於十二月五日集議，為左列二事之陳述：

一、組織公會：十月二十四日行政院修正出版法，規定出版品分類紙、雜誌及圖書三類。新聞界業有報業公會，書業界業有書業公會，獨雜誌界向無公會之組織，同人等身受種種苦痛，認為有即刻組織公會之需要，俾對發行、廣告、印刷、裝訂各項業務有一統之規劃，協力合作，以利文化之傳播。現正進行公會之籌備工作，即行具呈政府請求批准。吾等端誠希望俯察困難同情處境，允許吾等成立公會。

二、要求配紙：年來紙價飛漲，出版界難於負擔，政府為維持文化事業起見，爰有官價紙之配給，但官價紙之分配，尚需求其普遍公平，所有經政府核准登記之出版單位，均應同等享受此種配給之權利。雜誌界之資力素極脆弱，又無鉅額廣告費之收入，平時純賴發行勉力維持，最近紙價一再躍漲，售價則無法比例增加，同人等過去大都未能獲得官價紙之配給，掙扎至今，筋疲力盡，整個雜誌界實已瀕近崩潰之階段，我為特要求政府為維持文化界雜誌業之存在，有迅予官價紙配給之必要。同人等除即推派代表向政府申請外，謹陳實情，惟國人鑒之。

觀稅	經濟	電	現	現	國	茶	時	亞	科	春	兒	世	仇	永	文	中	化	人
聯會	濟周	報	代	代	文	與	與	洲	學	童	童	界	界	文	華	學	世	世
察刊	報	界	計	路	刊	話	文	紀	代	秋	界	村	園	安	秋	雜	界	界
維	經	電	現	現	國	旅	時	科	科	青	名	世	再	市	中	中	工	工
維	濟	紡	現	現	國	行	與	學	學	年	著	界	再	政	國	國	程	程
工	皮	織	代	代	光	潮	湖	畫	畫	畫	選	月	再	政	生	生	界	界
業	書	染	英	英	語	月	月	庭	報	報	界	再	政	生	生	生	生	生
報	論	工	語	語	誌	刊	刊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書	程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報	影	程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報	影	程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報	影	程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本社 為工役陳道 運竊款潛逃 啓事

本社工役陳道運，年二十五歲，浙江郵縣人，經其鄉友張鴻生君介紹，於本年九月來社服務，任事尚屬勤捷稱職，以是取得本社同人之信任。不意十一月十八日，該陳道運竟趁同人一時疏忽，將本社準備購買白報紙之現款一袋，計三千元，偷竊潛逃。據事後偵查，彼於竊得該款後，即乘本社 OCK 牌紅色自行車（執照 14508 號）迅赴老西門同族家中，攜其胞妹陳麗珍（約十六歲）匆促出走，至今音信杳然。本社同人除已具情申報上海市警察局備案，並檢繳此二人像片，請為查緝外，又託各方友人密為注意，務期短期內查知其下落，追回贓物。就彼本人平日所述社會關係以觀，可知其或仍匿居本市，若已潛逃他處，則不外浙江象山或遼寧兩地。按其離社時，身著藏青呢茄克，青布燈籠褲。其面容見所刊像片，身高可列中等，闊肩圓腰，允稱壯實。凡有寬知其居處，據本啓事報告當地治安機關，將其捕獲者，本社願備一千元為謝；如有通風報信因而拿獲者，則以五百萬元相酬。本社現正清理此人前後經辦之事項，誠恐更有欺騙贖贖之情事，猶未為同人發覺者；倘有關方面查出任何可疑之處，即祈攜帶憑據來社商洽，以求圓滿解決為幸。此啓。



則要外浙江象山或遼寧兩地。按其離社時，身著藏青呢茄克，青布燈籠褲。其面容見所刊像片，身高可列中等，闊肩圓腰，允稱壯實。凡有寬知其居處，據本啓事報告當地治安機關，將其捕獲者，本社願備一千元為謝；如有通風報信因而拿獲者，則以五百萬元相酬。本社現正清理此人前後經辦之事項，誠恐更有欺騙贖贖之情事，猶未為同人發覺者；倘有關方面查出任何可疑之處，即祈攜帶憑據來社商洽，以求圓滿解決為幸。此啓。

馬叔庸律師為常年法律顧問

事務所 上海寶波路四〇號二〇一室
電話一九四〇二

時與文

刊週
發行人 程博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沽嶺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京警選字第四一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新時代

歐洲的苦難與新生……………陶大鏞

中國往那裏去？……………徐季明

士官的政治生活……………王亞南

與經濟生活……………王亞南

雜記杭州的「劇詠團」……………潘子農

感歲暮雜感……………鳳子

15

卷二第

北美重遊(一)……………陳達

安徽的「土四軍」……………許柏

湖南民社黨的「家醜」……………陳襟湘

湖南參府衝突事件……………黃非

讀者之聲
廢票所表現的民意
魚與熊掌二者兼失
執法玩法
建議——增闢文藝欄、介紹作者的職務



歐洲的苦難與新生

陶大鏞

一、是誰帶來的苦難？

戰後歐洲的容貌，已整個改觀了。這二年內，它天天顛簸在苦難里。苦難宰割着歐洲政治，苦難更癱瘓了歐洲經濟。但，究竟是誰給歐洲帶來了這樣的苦難？

是希特勒！是納粹主義！是法西斯侵略戰爭！在這次戰爭中，歐洲犧牲了二千萬（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壯丁的生命，歐洲更喪失了二千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財富！（這指直接損失，間接損失還要超過！）這人力與物力的折損，已使歐洲的元氣，腐蝕殆盡了。就工業生產說，戰後的法國，已減少了五分之一，波蘭與捷克減少了二分之一，比利時與德國，竟減少了三分之二！再就農業生產說，匈牙利減少了四分之一，德國減少了三分之一，波蘭與捷克減少了三分之二，南斯拉夫幾乎減少了四分之三！戰爭剛結束時，全歐一片瘡痍。各國雖在破碎的山河上，從事復興，但民窮財盡，困難萬千。如果再走戰前資本主義的老路，不僅緩不濟急，也實在此路不通。所以，戰後歐洲的社會經濟，就到了非「變」不可的階段！

今天，就正值歐洲蛻變的前夜（東歐已「變」了）！它可從各方面反映出來：在政治上，平民力量已經抬頭，勞動階級漸漸取得了領導地位，民主的聯合政權，就是它的具體表現。在經濟上，貧富兩極化，更形尖銳，使中產階級及小市民層，都發出了「經濟革命」的叫喊。在意識上，資本主義已被公認為「時代錯誤」，社會主義也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苦難的現實，改造了每個人的價值觀念，使他們真切地認識到：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一個必然的「變」的過程。

翻開近代史來，我們就會明白：「歐洲是世界舞台的中心」。每一次歐洲的變革，也必然會引起一次世界性的革命。法國大革命與英國工業革命，就是最典型的史例。法國大革命給世界帶來了民主主義，英國工業革命又給世界帶來了資本主義。因而，這次歐洲的變革，在本質上，就指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蛻變，它的結果，必然是民主主義的新生與資本主義

的揚棄。換言之，它將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歷一番根本的改造！

這是戰爭的苦難，給戰後歐洲帶來的新形勢，它甚至使英、法兩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也搖搖欲墜了！爲了挽回「資本主義的厄運」，英國——這最後也是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在歐洲擊起了「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大纛，想阻攔時代的洪流。杜魯門總統的「援助希、土法案」（一九四七年五月），是一個開端，到馬歇爾提出了「援歐計劃」（六月），就發展到頂點。本來，在戰後的歐洲，祇有一股「變」的主流，如果順應「變」的趨向，決不會泛濫成災。現在，從大西洋對岸，又滾來了一股「反變」的逆流，於是，這兩股巨流，就相激相盪，飛濺出滔天的浪花。這情勢是非常明顯的：如果沒有一「希、土法案」，東西兩大集團的對峙，還不會那麼劍拔弩張；如果沒有一「馬歇爾援歐計劃」，也不會有「九國共產黨聯合宣言」，更不會有法、意兩國的政潮與工潮。杜魯門、馬歇爾主義使苦難的歐洲，帶來了更大的苦難！

二、有矛盾，還不會有戰爭！

苦難，是時代苦悶的象徵！有些悲觀主義者與失敗主義者，捉住了這個時代的表象，就憂忡地發出了一「美蘇必戰論」。這種論調，不祇是荒謬的直覺，實可稱爲罪惡的歪曲。我們始終認爲：今天的歐洲，雖則存在着矛盾，但美蘇還不會發生戰爭！

因爲，歐洲的政治糾紛，是與兩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的：一是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的國際矛盾；另一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從俄國十月革命以來，這兩種矛盾雖共同决定着歐洲的歷史發展，但它們却表現了不同的強度與深度。大體說來，在這次大戰前，國際矛盾始終支配了歐洲政治。可是，當希特勒進軍萊茵後（一九三六年），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就日趨尖銳；到英、德宣戰，這個內在矛盾，已超越了國際矛盾。最後，三強更收斂了國際矛盾，並肩作戰，這樣，才保證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戰後的形勢，顯然起了變化。新的國際矛盾，又一天天脹裂開來。然

而，直到今天，還不能用這個國際矛盾，來掩蓋或沖淡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相反地，戰後的國際矛盾固在滋長，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更表現得強烈與尖銳。同時，戰後歐局震盪的基本癥結，主要還是由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

當前法、意的政潮與工潮，就可說是這個內在矛盾的縮影。戰後的法、意人民，雖像其他歐洲人民一樣，已經得到了民族解放與政治解放，但災亂的生活與飢餓的肚子，鞭驅着他們，使他們自發地要求進一步的社會解放與經濟解放。今天法、意政府的所作所為，既有違法、意人民的願望，他們當然要奮臂怒吼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如果法、意人民沒有這樣切膚的革命要求，在今天的巴黎、馬賽、羅馬、米蘭等市，就不會有如火如荼的罷工風潮（法有二百萬工人參加，意有一百五十萬工人）。

因而，法、意的工潮，本質上，就是一次政潮——要求社會解放的政治鬥爭。倫敦太晤士報社論說得非常深刻：「如果得不到他們（指法、意工會）的合作，任何國家復興的嘗試，都不會有什麼成就」。（一九四七·十一·十九該報）

有些人，把法、意的政潮與工潮，看作變相的美蘇之爭，這種觀點，也是偏激的。美蘇的雄峙，固足「影響」法、意政治，却不能「操縱」法、意政治。法國政府如果死心地跟着美國，就不會向美國抗議「魯爾復興計劃」；法國政府如果一味地仇視蘇聯，也犯不着再向蘇聯請購二萬五千噸小麥。何況，「政府是人民意志的表現」，法、意政府的內政與外交，如果走上了違背人民利益的道路，即使沒有美蘇的外鑠影響，法、意國內也同樣會發生社會矛盾，換言之，也同樣會發生政潮與工潮的！

其次，從英美的微妙關係來看，我們也還找不到三次戰爭的根據。英國今天雖由信奉社會主義的工黨執政，但它還沒有改變英國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它必然是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的決鬥。如果今天會有這樣的大戰，英美勢必站在一條戰線上。可是，今天英美間的經濟矛盾，實有甚於英蘇間的政治矛盾。英鎊停止自由兌換（八·廿）無非意味着英鎊與美元的鬥爭；日內瓦關稅談判的幾次擱淺（從五月至十月），更充分暴露了英美的貿易戰爭。英美間的矛盾存在一天，美蘇間即使也有矛盾，還不致擴大為戰爭。我們認為：至少在眼前，英美間的經濟矛盾，還絕對消除不掉。英美雖則還「同床」，但早已「異夢」了。（最近，更可從巴勒斯坦問題上看出！）

當然，我們也並不否認：由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經濟體制的對立，「可能」從矛盾擴大為戰爭。但，「可能」不是「現實」，更不是「必然」。祇有當兩個經濟體制的國際矛盾高過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的時候，這戰爭的「可能」，才會從「現實」變為「必然」。可是，今天歐洲的現實條件，還沒有發展到那種程度，因而，三次大戰，目前還絕對不會從「可能」變為「必然」。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看到兩個世界的國際矛盾，可以警惕，却萬萬不能強調或舖張，尤其不能把矛盾看成戰爭。無論如何：今天在苦難中掙扎着的歐洲，即使有美蘇的矛盾，還不會有東西集團的戰爭！

三、新時代·新民主·新世界

戰後的歐洲，雖掙扎在苦難里，但這苦難，是產前的陣痛，是新生的考驗！戰爭給歐洲帶來了苦難，也給歐洲帶來了一個新生的時代。

這個新時代的歷史內容，就是捷克總統所說的新民主主義（New Democracy）。他說過這樣幾句警語：「每一次現代戰爭，不可避免地將給歐洲帶來革命。……這一次，從歐洲大陸來看，它正從自由主義蛻變為一種以社會主義成份為主的新制度」（見「捷克國有運動」，頁五）。他認為，這「新民主主義，就是繼續為一個理想的社會而鬥爭」（見「民主主義的今天與明天」，頁二〇）。

所以，戰後歐洲的新生，事實上，即為民主主義的新生。這個新民主主義，在東歐已經枝粗葉茂，在西歐，也已吐苗露芽。東歐土地改革與國有運動的順利推行，已為新民主主義奠下了不拔的基石。東歐工會組織與合作制度的發育壯大，更照耀了新民主主義的光輝的前途。「戰後波蘭的革命，表現了最優良的進化傳統」（倫敦「經濟學者」週刊，一九四六·五·廿五）。戰後捷克的經濟改造，也創造了一個「人民的春天」（全上，一九四五·六·卅）。戰後的南斯拉夫，「無論在政治上及經濟上，都已有了可佩的進步」（全上，一九四六·一·十九）。「在匈牙利、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法西斯組織已徹底解體」（全上，一九四六·五·十一）。「在長期紛擾的歐洲的一角（按指東歐），能夠有這樣的國際和平與經濟合作，是值得我們大大歡迎的」（全上，一九四七·八·九）。由於東歐新民主主義的美麗與生動，使英國最正統的「經濟學者」週刊，也寫下了這許多頌辭。最近，英國國家大主教訪遊東歐歸來，更讚不絕口，他稱

東歐民主國家爲「燦爛的新世界」。

東歐新民主主義的發榮，給西歐一個新的刺激與活的榜樣。儘管今天英、法、意等國的政權，仍爲保守集團與金融寡頭所左右，但牠們的社會地位，顯已動搖，牠們不能再一意孤行，西歐社會內部的糾纏，就反映新民主主義的力量正在那兒醞釀。西歐國家所施行的社會改良主義，即使非驢非馬，也不能不看作一種「變」的朕兆。最近，從西歐諸國的市選，表面似趨右傾，實則並不盡然。在英國，工黨市選慘敗，祇能表示英國人民對工黨的一種怨憤的抗議，所以，在過去三十三次國會議員的補缺競選 (By-election) 中 (按指工黨執政以來)，工黨還沒有失敗一次，這說明英國人民還能以大義督責工黨 (英國不像法國，市選不能影響中央政策)。在法國，戴高樂集團雖在市選中佔了上風，但還沒有力量，來推翻第四共和。最近法國的政潮與工潮，也正表示法國民主力量的湧。如果戴高樂還想上台獨裁，那法國將會演出內戰的悲劇。就說意大利吧，由於左翼勢力浩大，蓋斯貝里政府也還不敢明目張胆地媚美反共，否則，也可能導致內戰。英、法、意是西歐的三大台柱，在它們國內，新的民主陣營，都已有了不可壓服的力量，這遲早會轉移西歐的政治方向，使它也一天天從舊民主主義走向新民主主義去！

四、光明在召喚

本來，歐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經濟單位，西歐工業進步，東歐農業發達，彼此可分工合作，共存共榮。今天，儘管在政治上，東歐與西歐儼似二個對立的集團；然而在經濟上，它們畢竟還分不開來。每一個西歐國家與每一個東歐國家，幾乎都已重建了互惠的貿易關係。英蘇間的商務談判，雖兩度頓挫，但展望英國經濟前途，我們認爲英蘇貿易協定，遲早仍有訂立的可能。我始終認定：歐洲問題的本質，是經濟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因而，這一根經濟紐帶——東歐與西歐的生命紐帶，才是歐洲的光明與幸福的泉源，馬歇爾計劃非但不能把歐洲從苦難中拯救出來，反而僵化與麻痺了歐洲經濟。東歐比西歐窮，東歐戰時損失比西歐慘，東歐經濟遠比西歐落後，爲什麼今天東歐的社會經濟已欣欣向榮，而西歐人民還在那兒啼飢號寒呢？東歐的經濟復興，既不靠美元，也不靠盧布，祇靠「新時代的新民主主義」！靠了它，廣大農民從封建剝削中解放了出來；靠了它，全

體工人掙斷了「人吃人」的生產關係；靠了它，一切勞動人民得到了人的地位與工作的自由，他們會自覺地自動地提高生產熱忱，他們願意用汗的代價來感謝新的再生！他們不乞求剩飯殘羹，他們要用自己的辛苦，來培育新時代的甜果。雖則，果實還沒有從樹上掉下來，但已纍纍地掛在那兒了。

再看西歐，十六個國家正眼巴巴地渴待着金元。是的，金元是有用的，但金元同樣可以害人！充其量，金元祇能救救「急」，却絕對救不了「窮」，說不定還緩不濟「急」。戰後的英國，就是一個大教訓！英國出讓了一部分帝國經濟權益，向美國獲得了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借款，但祇用一年，就耗剩四億美元了。這筆款，既救不了英國的「急」，却使它變得更加「窮」。結果，就釀成了英國空前的經濟危機。現在，工黨政府似已大夢初醒，想來自力更生了。根據這次「馬歇爾計劃」，在四年內，西歐十六國所能得到的貸款總額，不會超過二百億美元，每年平均祇有五十億美元，還要由十六個國家來分攤，每個國家又能得到多少呢？

所以，馬歇爾計劃是絕對救不了西歐的。西歐今天最急要的，不必是金元，而是更高度的民主。如果西歐不求社會經濟的改造，即使借到了金元，也一定會蹈英國的覆轍。如果西歐國家能接受時代的洗禮，發揚新民主主義，決心自力更生，就一定像東歐那樣，一天天走上經濟繁榮之路的。同時，根據這個新時代的民主原則，又可重建一個民主的德國，使它不再爲獨佔資本主義所毒化而重禍世界！如果民主德國能够建立起來，它不僅將爲中歐的安定力量，且可加速歐洲的經濟復興。否則，對德和約問題，將「治絲益亂」，就永遠得不到合理的解決。

這一個光明的現實——民主主義的新生，正在召喚着歐洲。因爲存在着這樣一個光明的現實，在今天的歐洲，就更不會發生三次大戰！相反地，在現實的苦痛的教訓下，它還能縮短東西歐的距離，化除東西歐的猜忌與偏見，使社會主義在國際經濟的比重上，漸漸壓倒資本主義，到那天，獨佔資本主義已失去優勢，當然不敢發動侵略戰爭了。這也許是一個遙遠的夢，但相信人類的智慧，可以將人類自己導上一條永久和平的大路上去！但願度過了這一個苦難的霧冬，新生的陽春就在歐洲誕生了！

一九四七，十一月，廿五，四外長會議開幕日，於倫敦。

中國往那裏去

！

徐季明

隨着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作為「經濟及政治的反映」的社會思想，也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這些分歧的意見，數月來陸續發表於各大報章雜誌，而且到最近，已逐漸觸及問題的檢心，并有引起一次規模相當浩大的論戰之趨勢。

我們不妨把這一行將開展的論戰，暫先定下一個題目——中國往那裏去？

抗戰結束以來，世界與中國局勢的變化，是迅速的，也是巨大的。在起初，從一九四五年秋到一九四六年夏季，無疑間地，是一個比較溫和的年份。因此，在我國學術思想界，除了極端派以外，大家意見的分歧也就不甚厲害，在和平民主的口號之下，對於中國的前途，一般地都在追求一個和平法治進步的局面。但是，去年秋季以來，特別是今年春季以來，國內外局勢都有了深入一步的發展。舊的（那條被一般所追求的合法進步的）道路，逐漸被現實所否定，於是，究竟「中國往那裏去」的問題，又漸漸被提出討論了。

在這一討論之中，樊弘教授「兩條路」一文的發表，是有澄清的作用的，他把當前中國的兩條道路，用對比的方法列舉起來。他要人選擇：

「當前中國的分配制度只有兩種，一種是對富人之產以資貧民，一種是窮貧民之產以資富人。……中國的工業建設有兩條路，一條是以全體勞動者的覺醒為基礎的工業建設，一條是以少數的官吏的覺醒為基礎的工業建設。……我們都必須加以選擇。」（時與文，二卷三期）

就在樊先生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國內外的局勢又有進一步的發展了，這在國際上，就是兩大陣營的形成；而在國內，則是兩極化的明確發展。局勢不僅要人們選擇這一兩條路，而且逼得人們不能不作迅速的選擇。在這種情形之下，於是承繼了半年來有關「中間路線」的論爭，就表現為這樣兩種意見的對立：一種意見是，繼續追求那始終未曾追求到的中間道路。這在當時出版的一「展望」雜誌，是明確地標榜着以此為任務的。另一種意見，則是認為「時局實在太緊張了，兩個陣營對壘已明朗化，非此即彼，和平的中間派，此巷無路。……談論在兩大之間中立，已是夢囈，是廢話了。」（創世，第四期）

這兩種意見的對立，是今天思想論戰的核心所在。

作為反映社會意見最為迅速的知識份子，在這兩條道路的選擇之中，一般的表現，究竟是怎樣的呢？費孝通教授在「論知識階級」一文中，傳達了一部份「讀書人」的苦悶，他說：

「……以整個中國歷史說，從沒有一個時期，在社會上處於領導地位的知識階級會像現在一般這樣無能，在決定中國運命上這樣無足輕重的。……中國知識階級是否還有前途，要看他們是否能改變傳統的社會結構，使自然知識，技術知識，規範知識能總成一體，而把他們所有的知識和技術來服務人民。我並不敢預言中國知識階級能做到這自新條件，在我們眼前似乎一切都向着相反的道路上進行。」（觀察，三卷八期）

這意思就是說：他們是需要「變」的，但是，這「變」的槓桿却是在「領導社會的知識份子」身上，費先生文章裏雖然提到了「服務人民」，但這些人民是「被領導者」，而不是變革的槓桿。費先生的這一意見，誠然反映了當前「讀書人」的苦悶，但也更加反映了當前「讀書人」的優越感。因此，他的這一代表性的意見，是與另一種意見有着根本區別的。那種意見就是：

「今天中國的士，茫茫無所歸趨，它不能負起改造社會的任務，這可以說是時代的悲哀。士是社會中的知識份子，如果它不能自己覺悟，難道還要別的份子來解救不成？它必須從下述各方面自救救人：首先，必須自視為民衆中的一員，不能以知識作為身份優越的特權。其次，士必須摒棄主奴觀念，……其次士必須爭取思想自由，……再次，必須拓展就業的範圍。」（何若鈞：「士的束縛與解放」，時與文，一卷二十四期）

我們可以說，這一意見的討論，是有其「發凡」的意義的。

正是由於一部份知識份子的上述苦悶，於是探求「中國往那裏去」的答案，出現了一種「哲人政治」或「知識份子政治」的理論。這種理論的主要代表人，有梁漱溟、張東蓀、費孝通諸先生。梁張兩先生均否認憲政適合於中國文化的需要，這可說就是對於張君勱先生的一「憲政救國論」的一種反動，但這「反動」的理由，却是相當新穎的。有的認為從中國的憲政史來看，民國以來的屢次大選，都為特殊階級所利用；即以最近純粹的民元大選來說，結果仍為曹錕的賄賂所玷污，所以英美民主是不能實行於中國的。有的更從理論上說，英美民主與中國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試看，歷史長久文化昌盛如中國，農民暴動類似革命之事雖屢見不鮮，而從不開民間起而作參預政治的要求，與夫自由人權之要求者，這就根本不同於西洋

。中國不嫌自由太少，而嫌自由太多，實行憲政，有弊無利（見梁著「預告選災·追論憲政」，觀察，三卷四期及五期）。據云凡是西洋文化一進中國，都幫助了皇帝及官僚的政權，除使其對於人民專事高壓剝削以外，即不會有別的了（見張著「我亦追論憲政及文化的診斷」，同刊三卷七期）。根據上述幾種相似的看法，梁張費三先生替「中國往那裏去」所判開的藥方，遂認為必須有高明深審的哲學家來領導，而且此種領導的責任一尚非一般政治家，經濟家或科學家所能解釋，據云「許多問題，許多矛盾，到哲學家這裏才能疏解溝通，無所滯礙，而後在各方面照顧之下，妙取一着。祇可由極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總而言之，我們今日建國決大疑決大計，天然是多數人接受少數人的領導，普賢尚智而不必衆。一般所謂民主，於此皆不相應。」（梁文）張先生的意見與此大體相同，但他較梁先生似乎略有尺度上的不同，他以為「必須有深知中國國性與中國文化的學者，同時又深知西方文化與政治，這樣的學者多多益善，大家會同研究一個專為中國而設的制度。」費先生則更具體地在公報的專論欄中連續展開了「基層行政僵化」的討論，他的着眼點放在下層，但是他的基本看法是與梁張兩先生的意見一致的。他在「損蝕沖洗下的鄉土」一文中說：

「由這種人物（按指鄉閭閥閥）所激起的農民仇恨，正逐漸形成一片火海。……地方上現在已沒有任何擔得住那種藉藉稱勢和暴力來敲詐劫掠的力量了。買辦老爺已經不存在，洋秀才都擠在城裏，農民除了束手待斃，祇有自己出來抵抗，而整個生產機構也就難免於癱瘓了。……這悲劇日積月累，災難終於降臨，大有橫決難收之勢了。」（大公報，十一月卅日。）

於是他開出的藥方是「必須從速恢復鄉城之間的循環關係」，迅速恢復由善良的知識份子管治的鄉村秩序。

這一意見討論到這樣的程度時，已經很明顯地觸及了根本問題，即是「中國往那裏去」的道路，究竟是決定於「農民仇恨形成一片火海」而變成一種「橫決難收」的局面呢？還是用「哲人政治」或「知識份子政治」來保存原有的秩序（雖然這種秩序已與官僚團體大異其趣，但它究竟還是原有秩序的範疇）？

我們已經在大公報及北方若干報紙上看到對於這一意見的爭論。樊弘教授這次又充當了論爭的一角，他在「觀察」（三卷十四期）及「知識與生活」（十六期）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都是有其重要意義的。他認為這種通儒理倫近乎拍拉圖的「哲學家候補帝王記」，在現實政治中是行不通的。他更進一步指出：

「保護農業自由權利的儒家政治哲學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很好，可是在資本萬能的時代就不好了。保護營業自由權利的民主政治在資本萬能的時代很好，可是在集體勞動萬能的時代便不好了。世上還有什麼偉大的生產的能力比得上計劃的集體勞

動呢？中國的民主政治，經過這幾年失敗以後，我們似乎應該有一個澈底的覺悟，即除了有計劃的集體勞動外，民主政治在中國無論由什麼哲學家來領導，都好像一座倒立的金字塔，它永遠是站不住的。」

這一組意見的對立乃是今天思想論爭的主要內容。「中國往那裏去」？必須「變」，已經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了。但是，是澈底的變呢？還是稍稍的「變」，而仍保存一部份舊的秩序？——這是需要繼續展開論爭，求得正確結論的。

但是，顯然還有另兩組分歧的意見，如果不能在論爭中獲得正確的結論，則這次論戰的主要內容，是仍然難說充份的。

另兩組分歧的意見，其中一組是在國際問題的看法上。許多人認為中國應該有「變」，例如陳旭麓先生說：「中國還需要革命。——但是他認為：『我們的國家有國際的兩大勢力在激盪，自發的革命受了限制。』（時與文，二卷四期）」

一涉及國際問題，意見的複雜就更加可觀了。當前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的形勢呢？關於「世界主要矛盾」的論爭，是進行過了，但是這問題依然有進一步澄清的必要。而在目前，則「究竟什麼是決定世界前進的動力」？——這個問題，尤其有首先弄明白的必要。以大公報社評為首的國際局勢觀察家，至今還是以美蘇關係的一緊一鬆，為悲為喜。而另外的許多觀察家，則已逐漸把視線從上層合作轉到下層合作方面來；當法國政府為了阻止法國工人提高工資百分之二十而不惜造成流血事件以後，他們就更能把握合法中間道路的意義了。

弄明白了這個問題，對於美蘇兩國在世界上的位置，也就會弄明白了。這樣對於美國援華問題，也就有了正確的估價。

在展開中的這場大論戰中，歡迎美國干涉中國的意見是不存在的。論爭中對於美援的意見，可說大多數認為美國內部存在着矛盾，而美國與中國政府之間也存在着矛盾，從而得出結論，美援不能阻止中國的「變」，但美援却可使中國變「得不太多」。

這種思想，就已表現出來的來說，計有：一，強調共和黨與民主黨競選的矛盾，認為黨爭會阻止美國大量援華（如貝遜的「論滄海一粟」等）；二，強調美國扶助日本以後，可能一完全放棄中國（如費孝通對魏特邁來華結果的揣測）；三，強調中國戰亂不值得美國投資（全上）。從這些說法伸引，美國援華與中國政府的矛盾就很大了。同時，由於重視美援的大小多少，也就間接造成「美援還是有效」的結論。

與這種觀察相對立的，為另一種看法，即并不重視上述結論，而將美國對華政策視為決定了的，不過由於歐洲形勢的緊張、美國本身的困難、

以及中國政府的效率太差，却延阻并影響了它既定政策的進行。因此得出結論：美援仍將給予反對「變革」的那些中國勢力，不過歷史已證明美元不能阻止中國的行進而已。

這樣的一組對立爭論，從今夏「民主國際」的論爭開始以來，已經愈益深入了。這種深入，對於「中國往那裏去」的大論戰，是有重大意義的。

又一組意見的紛歧表現在對經濟前途的看法上。

採取「小變大保持」想法的人，老早就希望「中國的經濟不是崩潰而是癱瘓」，因此「要變而不要亂」。這種意見，後來被別人看出了是不對的，「拖是拖不出結果來的，最後還是要被迫走上大改革的途徑」，因此希望那個維持舊經濟結構的勢力「趕快覺醒過來，自動地去實行各種政治經濟的澈底改革」（見經濟週報，五卷十四期，姜慶湘的「轉型期中中國經濟」）。同時接近官方的經濟學者，也有採取同一意見的，遂提出了凱恩斯學說中國化的問題（如七月廿七及八月廿日大公報，徐建平吳大業兩先生的專論）。

「大學」與「經濟週報」發表過許多反對這些意見的意見，除認為「凱恩斯學說休矣」以外，更指出「農村經濟已發生巨大變化，將因此決定中國大都市的經濟，以致整個經濟的命運」。可是中國城市與鄉村的關係究竟怎樣？農村的土地改革，對於城市民族工商業的作用，是正的呢還是負的？——這些問題，還缺乏深入的討論，與此相反的，也有人認為今天的戰爭是「城鄉火併」，是「農村對都市的激烈反抗，而都市的困難，則是因這種反抗所導致」（中國建設，五卷三期，姜慶湘：「論當前城鄉對立關係」）。如果這組對立的意見缺乏深入的討論，那麼，「小變大保持」的理論，如像費孝通先生的「知識份子治理鄉村秩序」論，是會得不到良好的論爭結果的。「中國往那裏去」的大論爭，也就會得不到良好的結論。

上面分就這一正在開展中的大論戰的核心問題，主要內容，以及對國際形勢與經濟的看法的不同，作了簡單的介紹。既然社會思想是社會經濟與政治局勢的反映，那麼這次大論戰也正是最近以來國內外形勢發展的反映了。從以上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場論戰的範圍是相當的，需要許多學術思想工作者聚精會神來從事這一重大而有意義的工作。

在今天，加速展開這一個大論戰，尤其有它偉大的意義。因為思想論

爭雖然是社會動盪的反映，但是，如果能夠迅速地得出正確的結論，却又是可以反過來加速社會的發展的。苦難的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已經飽經憂患，當局勢緊張到現在的情形之時，迫切的需要明白「中國究竟往何處去」。需要變革，已經是不用懷疑的了；尤應注意者，某些意見已經進入具體試探的階段了。十一月十日英文「大美晚報」提出了「中國聯邦」的主張。十一月十五日，馮玉祥在美主張美國改變援助對象，「拯救中國，而免把中國推進共產黨懷抱中去」，他并指出美國的幫助，在現在是會有效的，以後就要不行了（The Nation）。十一月廿九日，大公報社論亦有重大主張。但是「真理在辯論以前是不能預先判斷的」。中國究竟往何處去？我們應當在這次論戰中探出一條正確的道路來。

民國卅六年十二月一日，於復旦。

記杭州的「劇詠團」

潘子農

上月去杭州，曾為浙江省教育廳巡迴戲劇詠團導演了沈浮兄的「金玉滿堂」。此行觀感，頗有幾點可以談談。

這個「劇詠團」直屬於教育廳，全團一共祇有十六人，主其事者，是出身於當年政治部在重慶開辦的軍中文化訓練班戲劇組的學員。所以團體的編制上雖不免沾染了一點「衙門氣」，却也相當地保存着抗戰期間戰地演劇隊的優良傳統。再說團員的待遇也還不壞，每人的底薪平均總在百元左右，按照現時公教人員薪給倍數發給，大約沒有太重的家室之累。團員，在杭州是可以對付過去的。倘以上海「新中國劇社」同人每月祇拿十萬塊錢的情形相較，則「劇

詠團」的待遇，簡直是應該被譏笑的。

然而作為一個巡迴全省的演劇隊而論，這十六名的員額限制，是怎樣也難於展開牠本身應有的任務的。就拿這次排演「金玉滿堂」的情形來說吧，全劇共有十七個角色，他們「盡其所有」，單在演員的配置上，就得另找一個團外朋友來「客串」。於是從演出的事務以迄舞台上的技術工作——服裝、道具、燈光、佈景等，都要由這十六位作了演員的人來兼任。若干在我們看來是近乎「奇蹟」的事件，也就層出不窮；全劇兩堂佈景的設計與製作，均出於一個演員之手，而另一位主要演員則在上演的前夜，奔走全市去懸掛了四十多塊廣告

士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經濟的歷史的解釋）之十

中國人傳統的把做官看得重要，我們有理由說是由於儒家的倫理政治學說，教了我們一套修齊治平的大道理；我們還有理由說是由於實行科舉制，鼓勵我們「以學干祿」，熱衷於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長期的官僚政治，給予了做官的人，準備做官的人，乃至從官場退出的人，以種種社會經濟的實利，或種種雖無明文確定，但却十分實在的特權。那些實利或特權，從消極意義上說，是保護財產，而從積極意義上說，則是增大財產。

「做官發財」始終是連在一起講的。

中國士宦的政治生活與他們的經濟生活的特殊聯繫，對於中國官僚政治的長期延續，有着極大的促進作用。

從現代比較上軌道的市民社會來說，做士人，做一個普通的知識份子，固不必說，就是實實在在做了官，乃至做了像樣的官，也不過是一個職務，並沒有何等特殊利益可言，而站在圖利的觀點，也許還不如經商或從事某種企業經營。

反過來說，在中世的貴族政治狀況下，我們又發現，大大小小的貴族，他們除了靠土地吃地租以外，許多可能圖利的經濟活動是不被許可的。比如商業、高利貸業，不獨貴族，就是虔誠的基督教的農民，也視為非正當的業務，而一般都是由異教徒或猶太人去做的。比如，德國普魯士政府曾於一八〇七年發佈「解放勅令」(Emanzipationsedikt)，其中規定「從一八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廢止全國的隸農，一八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後，祇存有自由民」。可是，「隸農」變了「自由民」，貴族也得變為「自由民」，所以，又由一八一四年十月二日之法律規定營業的自由(Gewerbefreiheit)。依此規定，貴族也可經營如商人百姓一樣的事業。由此可見封建時代的貴族，並不能任意從事營利性的經營。雖然這種禁例，究在當時實行到了如何普遍程度，還難確定，但貴族不但不願作這類事，他們也是不屑作這類事的。又如，經濟狀況遠比德國為進步的英國，在十八世紀

中葉以前，「尚以執掌田地為在社會上取得重要地位之唯一可靠方法。商人和製造家，無論多聰明，多富足，總以為不及大地主那樣高貴。被人知道是一個工匠或商人，或者這種人的嫡派子孫，都是在社會上的玷辱」(李譯奧格近世歐洲經濟史第一二七頁)。

然而，中國的士宦或士大夫，却似乎很早就打破了這種在歐洲是到前述近代專制官僚社會階段才逐漸打破了的職業上的「成見」。雖管子書中有一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一世的世業世守的說法，可是我們在戰國之世，就已出現了一位標準的官僚貴族兼為大土地、高利貸者及商人的有名人物，那就是齊國的孟嘗君。史記記載他以貴族「相齊」；「封萬戶於薛」，是大土地所有者；「出錢於薛」，是高利貸業者；對收租收利客馮諼答問「以何市而返」，是商業家。——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最早最顯赫的官、商、高利貸者及地主「四位一體」的典型。

秦在剛要統一的時候，一個大商人呂不韋做了相國，他同另一個大商人嫪毐，都取得侯爵，變為食邑封君。漢高祖既定天下，曾「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到了惠帝高后時，「復弛商賈之律」，但對於「市井之子孫，仍不許其士宦為吏」。可是專制官僚的統治形態，頗適於商業之發展，商人階級有了錢，都豪闊起來，法律雖禁止他們的子弟仕宦為吏，但金錢萬能，他們不但因其富厚，交道王侯，力過吏執（前漢書食貨志），且不但「封皆低首仰給」（史記），並且「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漢景帝看見來勢不佳，乃改變一個作法，詔謂：「今皆算十以上酒得官（應劭曰：十算，十萬也）。廉士算不必乘，有市籍不得官，無算不得官，朕甚怒之！營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前漢書景帝紀）。做官的營算標準，由十萬降低到四萬，仍不免令「廉士失職」；而「有市籍不得官」，用錢去買土地，不要市籍，就此路仍通了。所以到了「雄才大略」的武帝，他就不像乃祖乃父那樣拘謹和轉變抹角，乾脆的讓商人做官，起用孔僅、東郭咸陽一千人經營鹽鐵事業，

他們這兩位以做鹽鐵生意起家的新官人，又盡量緣引同類，「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致令太史公喟然太息於「吏道益難不選，而多賈人」；可是，武帝雖在一方面大量用賈人爲官，同時却創立了許多名邑的商賈稅，並還很特別的諭令取得有市籍的賈人，其自身及其家族，皆不許占有田地。此後，關於商人爲官爲地主，地主爲商，在中世分立局面下，等官僚逐漸貴族化了，那些「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的士宦們，多半不願去經商牟利，同時，商人要跨進政界，也不免遭受當時講究身分的障礙。到了隋代統一，開科取士，還明令工商不得入仕，而到了唐初，又禁止地主經商。

我們其所以上面指出商人爲官的一面，因爲商人可爲官，爲官爲士宦的人，也就可爲商，可爲高利貸業者了；我們其所以要引述禁商爲官或入仕，或者禁官禁地主從事商業的一面，因爲要一再去禁，要作規定去限制，就說明事實上官商地主高利貸者已是一「通家」了。但問題不在政府應否用法令去干涉士宦的經濟生活，而在我們傳統的士宦的特殊經濟生活，該是如何形成，那會如何由政治生活所促成，又反過來影響其政治生活。

在歐洲，貴族可以自由從事經濟活動，是在貴族身分開始解消的時候，是在領主經濟開始向地主經濟移轉的過程中。中國貴族領主從事商業高利貸業，也恰好是在我們初期貴族政治開始解體，地主經濟開始形成的階段。在這種限度內，我們的「治化」或「開通」，確已走在歐洲前面了。可是，歐洲許多國家在那種過渡階段後，很快就走上了現代化旅程，一個特殊的士宦階層，根本就不會立足；反之，中國貴族支配的封建社會瓦解後，代起的却是一個官僚支配的封建社會，惟其還是封建的，它對於商業高利貸業就不能不時常持着一種戒心；惟其那種封建制不是立在領主經濟基礎上，而是立在地主經濟基礎上，它又實在無法阻止商人不作地主，士宦不特殊的過着一種「自由」經濟生活。

爲什麼呢？這是比較說來話長的。首先，地主經濟的成立，是以土地得自由買賣爲前提。沒有錢可以賣去土地，有了錢可以購買土地。其間自然爲商人高利貸業者開了一個變成地主的門徑。雖然像漢武帝那樣嚴厲禁止取得市籍的人，其自身及其家族都不得占有土地，但以後依所謂「緡錢令」，「使

商賈中產以上大率破滅」的時候，不是統計「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史記平準書）麼？商人不但擁有大量土地，還擁有大量奴婢。商人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兜一個圈子，以地主資格做官，當然就無法不叫官不佔有土地，不經營商業高利貸業或其他企業了。

而且，實行地主經濟的結果，國家要把以賦稅方式獲有的大量農產物，變爲商品，變爲貨幣，變爲俸給及其他開支，那不但使私人商品貨幣經濟得到發展，而由是刺激一般商業，刺激一般高利貸業，同時還造出一種特殊的商工企業和高利貸業。試看下面這段話：「封建官吏對食糧的壟斷——一部分是他們從服務上收來的，一部分是他們以地主的資格，從農奴那裏收來的——便推動他們走向自己買賣行爲更遠的發展上去，而帶着一種毫無遺留的獨占整個羣衆的「剩餘」的目的。他們與商人起了接觸，而且利用商人作他們商業經紀或店員，從流通中分給商人一點微利。後來，這種獨占農民剩餘的封建私有之與商人的合作，已經過渡到較高的階段，即是進到在政府和機關作用過程中所累積起來的高利貸資本與較軟弱的商人資本之間的合作。那時商人資本所以比較軟弱，是因為它不能直接參與政府掠奪的緣故」（李譚沙哈諾夫中國社會發展史第一七四頁）。「封建官僚機關的利益關係，是在於把全部農民勞動剩餘實現於市場之上，並且因此而轉入「國家」的荷包」（同上第一七五頁）。而在「國家」由那些封建官僚所把握利用的限度內，自然會由此轉入他們個人的荷包，經商就成了國務或國家公務的一件重大的事，中國士宦不能像歐洲貴族僧侶那樣，把商業看爲「不潔」，「不自然」的業作，且從而「追逐之」，就頗爲自然了。

商業如此，伴隨商業而產生的高利貸業亦係如此；以穀米爲重心的商業如此，一切日常用品如鹽，如鐵，如酒，如布，也就很自然變成官業對象，由管制流通過程，進而管制生產過程了。商業不但與高利貸結合起來，且進一步連同高利貸業與各種形態的手工業製造業取得了密切聯繫。兩漢之際的王莽時代，就有所謂六筭五均的「國家經濟」形態出現；官賣，官營，官貸的經濟活動，雖然間或也引起一二不識「時務」的好心腸的士大夫的「與民爭利」的嘆聲，但一般的士宦，却可用「爲民興利」的大口實，來使他們的經濟活動「合理化」。他們在朝，儘可能設法去接近各種形態的官業，在野，又像「先天的」註定是族產，學田，積穀……一類公共

產業的經營者，他們多半原已是地主兼高利貸者，或者某種場合兼為商人或各式小產業經營者，一經在朝在野同一「公家經濟事業」接觸，就很快要「發跡」了。

他們無論是一「達則兼善天下」的把持朝政，抑是一「窮則獨善其身」的武斷鄉曲，始終在把政治作為達成經濟目的的手段。而這種傾向，就是直通「貪污之路」的便橋。

三

歷史家昌言中國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斲史，但從另一個視野去看，則又實是一部貪污史。廉吏循吏在歷史上之被重視與被崇敬，乃說明這類人物該是如何的稀罕。歷代對於貪污所定法律的嚴酷，更說明這類人物該是如何的多。

貪官污吏之多，一般人總喜歡用「風氣」或「民族性」一類玄學性質的事實去解釋，以後者而論，彷彿中國人是天生成貪污似的；以前者而論，又彷彿有一二出類拔萃的人物出來表率一下，風氣就會改變過來似的。兩者通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了。

中國有關貪污誤國的最早古典，是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這「古典」不知被千百年後的文人學士官吏們誦讀了幾千萬遍，然而事實一直在反覆給它以確證。在漢元帝時，賈禹會上書解說貪污的由來：謂「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海內大化……武帝臨天下……用度不足……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者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其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為在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勤謹為，勇猛而臨官。」……故居官而置富者為豪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此！」（轉引自張純明著中國政治二千年第六五——六頁）

這段話對於貪污的說明，比之一般所謂民族性論，風氣論，要接近事實多了，特別如「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確係入骨三分。一個「無義而有財者」在位，一面需要有一「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者，造假賬，「欺上府」；同時又需要一「勇猛能操切百姓者

一為爪牙，供驅使，於是一個貪官，便必然會配合有大批文武官吏，其結果自然是相率不講孝悌禮義，而羣以「多財為光榮」了。然而這說法也只是就事論事，少了一點文學迂腐氣，仍不能給我們以明確的認識。

一個為官僚把持操縱的社會，本來沒有什麼法度可言，要說有，不外是有關人民對於他們的義務的規定，或有關他們自己相互之間的權利的規定罷了。如在一個交換經濟不發達，而又小國寡民的場合，他們不但消費慾望有了限制，就是剝削行為也不能不稍為收斂。但在統一的集權的大場面下，以土地及土地生產物為重心的交換關係，貨幣流通關係既然建立起來，天下的貨物，乃分別輻輳於官僚所在的都市，「不見可欲則心不亂」，見可欲，就難免有些「心亂」了；而且，官對人民的特殊差別表現，特別在官職不會職業化而是被看作一種特權的行使的情形下，首先是從物質的享受上具體顯示出來。如其像史載漢初那樣，「天子不能鈞駟，將相或乘牛車」，他們在老百姓面前，就顯然沒有了不起的「威嚴」或「威儀」了。況加中國歷代官吏俸祿的規定，雖然從人民眼光看來，頗為不薄，而且官位愈高，報酬亦愈大，但要單單藉此維持官的特殊場面，特別是滿足他們在相當發達的商品貨幣經濟下的無限慾望，恐怕無論如何也嫌不夠。他們巧取豪奪的貪慾既由此形成，而嚴格禁阻他們滿足貪慾的法軌又不可能在專制官僚政權下確立，於是，利用職權以圖私利的勾當，就令沒有我們前面述及的官家「與民爭利」的各種侵漁機會，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不是什麼「事未易明，理未易察」了。結局，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的體現為貪污生活。其中少數循吏廉吏出現，便似非常值得稱揚，而大勢所趨，也便容易在一般人心目中幻化為「民族性」問題，或曲解為單純「風氣」問題了。歷來確也不乏一些持正不苟的立廉誓污的人物出來為「民族」爭一口氣，挽救頹風，改造「風氣」，但惜其「挽救」「改造」之道，只是消極的一己的「清風亮節」，或嚴厲的懲治若干貪官污吏而根本沒有觸到問題的病根或痛處。

試展開一下歷代對付貪污的嚴厲情形，就可瞭然今日想從貪污本身去根治貪污的人的設想，是如何的素樸！

「漢時職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職吏，多於廟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賄貨厲民，故尤嚴食墨之罪，……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剌沒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為厚幸……元史至元十九年赦中外官吏，職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顧炎武日知錄）。

「洪武十八年詔盡遣天下官吏之爲民者赴京師築城……又按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職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革。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傍，各懸一剝皮實革之袋，使觸目驚心。」（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重懲貪吏）。

「乾隆四年，宗人府議奏：莊親王等結黨營私，往來詭密，因治胤祿，弘督，弘昇，弘昌，弘皎等革職有差；督黨安泰並坐絞。五年，御史仲永禮奏參提督鄭善，受命賄銀一萬兩，凱實賜死。又山西學政喀爾欽以賄賣生童，縱僕營私，違禁漁色，爲御史所劾，得旨正法。並諭諸大臣，嗣後當各自儆省……」（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十二頁）。

綜觀歷朝貪污史錄，愈接近近代，貪污現象亦愈普遍，貪污技巧亦愈週密，而與懲治貪污刑典的寬嚴，似無何等重大關係。明代立法最嚴，但明代貪污實較任何前朝爲烈；清初爲籠絡懷柔漢人，政尚寬大，降及中葉，任一社會政治角落，均留有貪污痕跡，然此亦不能謂爲施行寬政的結果。中國社會經濟發生至明清兩代，流通經濟現象，愈亦活躍；高利貸業商業的擴展，對官吏貪慾的助長，已非常明白，而凝固的政制措施，不能適應變動發展實況所造出的大小漏洞，復給予各種貪慾以發洩的機會。

比如，中國官制上關於官吏名額的規定，往往注重形式，不顧事實需要。地方政務即使年有增加，吏員額數終未按比加多，以清代而論，據大清會典所載，總計州縣數目一四四八，佐貳數目連學官加算起來，亦不過五五二六，卽一位知縣或知州的佐貳還分不到四位。每州縣當時人口平均以二十萬人計，要一個縣或州的負責人帶着三四佐貳，把「刑名」，「錢穀」，「書記」，「掛號」，「徵比」各項事務做好，任憑天大本領，也不能夠，於是縣府衙門不得不在定額人員之外，聘定幕友，依託地方士紳。幕友是要致送報酬的，政府對幕友不給俸祿，「而幕之修」，就要「出於官祿」了，聘請十個八個幕友，把全部「官祿」拿出，還嫌不夠。至於縣太爺與百姓之間，往往靠一批鄉紳做着承上啓下的聯繫；他們這些人雖不從州縣直接索取報酬，却顯然會因此開一請託包庇之門，而間接成爲小百姓的無形的無限的負擔。在州縣如此，在總督衙門亦係如此。田文鏡爲河東總督時，曾自述其衙門中書役人數說：「臣衙門經制（政府定額）書史，上下兩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現今辦事書吏，頭班二班，俱有百餘名，是較經制十倍有餘，事務殷繁，尙苦趕辦不及」（以上參見文史雜誌第三卷第二期王斌著韓俸與陋規）。這些額外人員的報酬，該如何打發呢？那在事實上，不但不會增加主管人員的負擔，且還可能變爲他們的一個「財源」。道光時曾有這樣一道上諭：

「直省大小官員，自雍正年間，蠶食養廉，由督撫以至州縣藉以爲辦公之

資。迄今將屆百年，督撫司道廉俸厚者尙敷公用，至府廳州縣養廉止此定額，而差務之費，捐攤之款，日益增加，往往有全行坐扣，祿入毫無者。雖在清潔自愛之吏，一經履任，公事叢集，難爲無米之炊，勢不得取給陋規以資挹注。而不肖者則以少取與多與均干吏議，轉恣意徵求，除辦公之外悉以肥其私囊。上司心知通省官吏莫不皆然，豈能擬行糾劾，遂陽禁而陰縱之。於是集斂盜取之風日甚一日，而閭閻之盡藏，概耗於有司之朘削，民生困敝，職此之由」（轉引自前揭論文）。

在地方官吏如此，京官則另有「陋規」，供其中飽。一般的講來，京官發財機會，本沒有直接臨馭老百姓的地方官吏那樣多，但因為六部是各省的頂頭上司，各省州縣對六部有何請求，均得孝敬孝敬。比如爲了奏銷地丁，就有一「奏銷部費」；報銷錢糧，就有一「報銷部費」，調一缺，提一官，請一議敘，及辦理刑名案件，皆非拿出一「打點」，「照應」，「招呼」，「斡旋」的手續費不可。若京官出差到地方或外放，在一般人心目中，就公認他是找到了抓錢的好機會。地方官吏，除了以「公幫銀」，或「盤費」，或「程儀」等名色，提供其路上開支外，又有「支應」一類名色，提供其到後開支；更於供應以外，多送「規禮」，復致贈「贖儀」。然此係就案差而言，若職司文教權衡的學差，雖然其使命非常神聖清高，對於錄取士子的需索，却頗不客氣。從所謂「紅案銀」，所謂「做了一任鄉試主考，可過十年舒服生活」的傳說，就可想見利用職權發財的事，即使身臨「聖域賢關」，日以綱常大義或名教自矢的人，也並無例外。

地方官要在地方發財，不得不賄通京官；京官要通過地方官發財，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們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個貪污大局面，對於這局面，用少數認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會成功，就是用再嚴酷的法律去制裁，也並不濟事。

四

要之，中國士宦的做官發財思想，是中國特殊的官僚封建社會的產物。我們沒有意思責難做官，也並不反對發財，但做官被看成發財的手段，做大官發大財，做小官發小財，甚至沒有正式取得官階官銜，而在鄉村以似官非官的身分，利用任一機會發混財，那就會在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響。

以地主經濟爲基礎的專制官僚統治，既然如前面所說，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貸者與地主的「四位一體」場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權的或官營的經濟形態，更一定要造出貪贓枉法的風氣，而這三者又最可能是息息相通，相互影響的，它們連同作用起來，很快就使社會經濟導向孟軻所預言到的一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一的大破局。

中國歷史上是不只一次經歷了這種大破局的。其中因果關鍵，我們將

北美重遊(一)

陳達

本文承陳達先生交本刊及北平益世報副刊「社會研究」同時發表，特此聲明。——編者

本年六月初旬，我在芝加哥大學末次公開演講以後，社會學系舉行一個茶會，參加者有該大學的教授及其夫人，並有研究院學生，共約一百人，主席的介紹詞中有一段云：「今日的來賓，三十一年前已經是認識的，那時他在奧拉根省波德倫市的麗得大學 (Reed College, Portland, Oregon) 肄業。」據主席的記憶，麗得大學的學生有一次要我述說對於美國最初的印象，我照例說些恭維美國人的話，他們說，這是很得體的；不過還要我提出些內心感覺到但不輕易向人發表的意見，我就說明了下列兩點：第一：據我的觀察，美國人的迷信不亞於中國人，因為我到舊金山不久，即遇到一個星期日，看見男女老少成羣結隊向教堂裏去拜偶像。第二：美國人似乎不甚講究性道德，因巴拿馬博覽會剛於一九一五年舉行。我於一九一六年九月底到舊金山時，乘間參觀博覽會，大部份房屋已經拆去，存留的房屋不多，所留下的房子裏，最惹起我注意的是和人一様高大的男女塑像，有些女像露胸或露下體，這些石膏人像我在中國未曾見過，依照我國舊文化的標準，裸體人像似乎是不道德的。實際那一日所見的，是天主教的一個禮拜堂，根據教會舊習，教堂所供的神，並非偶像。至於博覽會場的塑像，或是模倣希臘與羅馬的藝術，或刻塑現代的人物，在西方藝術裏往往佔普通而相當重要的部份。我對於這兩件事的印象，十足指示我對於西方文化缺乏認識。主席問我：「這次重遊北美，對於上述的印象，是否要有所修正？」不容說，隔了二十四年以後，再到美國來遊歷，我自然要修正前述的印象，並要聲述些新印象。所謂新印象是對於我個人而言，對於他人未必是新的。各人的觀察不同，注意點亦有別，我所注意的事物，自然是風土人情，社會問題，社會制度，及一般社會的趨勢，別人認為瑣碎的事情，如果我認為有趣或有意義的，我就記錄下來，約略加以分析或批評。我這次旅行夠得上德國人所謂研究旅行嗎 (Studienreise)？我還沒有肯定的答案。不過我在下面所述的，大致是

隨心所欲，與到即錄，和我「混跡十年」一書的內容，性質頗有相似的。

普林斯登二百週年紀念會 (三六、四、一一—三)

普林斯登大學於一七四六年成立，至一九四六年為二百年。近來舉行別開生面的紀念會。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共舉行學術會議十六次，代表十六個不同的部門。這是紀念會的主要節目。今年四月一日至三日，舉行遠東文化與社會的學術會議。除美國專家外，尚邀請他國專家若干人。到會者有英國法國荷蘭瑞典的著名學者。我國被約者雖多，實際參加者僅五人。總數共四十餘人。關於中國藝術與考古古組，共舉行會議六次，中國社會組亦舉行會議六次，此外兩組有聯合會議兩次。關於藝術部份，瑞典博物館長西倫 (Oswald Siren) 所述中國花圖，普林斯登羅維 (George Rowley) 教授所講中國繪畫，俱有深刻的了解與欣賞。加以馮友蘭氏對於哲學背景及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 氏所述地理對於文化的影響，使我們對於中國文化，可以有深一層的了解。大學博物院中陳列中國字畫百餘幅，那是一八九三級畢業生 Dubois S. Morris 所贈的。此人在我國安徽懷遠縣傳教三十年，深愛我國的字畫，就其所藏字畫五〇〇件中，選出一部份贈與大學，這是第一次的公開展覽。梁思成君關於我國古墓，陵園等亦陳列影片一百餘幅，就中並繪有建築圖案者。我對於下列各件特感興趣：(一) 四川灌縣竹素橋，宋建，清嘉慶修 (一八〇三)，(二) 河南登封縣告成鎮測景台，元郭守建 (一三〇〇)，(三) 四川彭山縣江口鎮漢墓 (選自中央博物院陳明達氏彭山崖墓報告「未刊印」)，(四) 雲南昆明妙塔寺金剛寶座塔，(五) 山東曲阜孔廟碑亭，金明昌六年 (一一九六)，(六) 山西榆次永壽寺雨花宮宋大中祥符元年 (一〇〇八)。

中國社會組所討論的涉及政治經濟與社會若干部份。內中未德府各爾 (Karl A. Wittvogel) 氏關於社會史的研究，業已完成至近代，是規模極大的工作。奧吉德 (John Orchard) 氏討論工業化的趨勢，關於人口

部份，我認為今後的研究應注重全國性的。因受治安經濟與人材的限制，全國人口普查，一時不易下手。我擬出全國性的選樣普查，作為入門之路名曰：Proposal for the First National Census of China by Sampling: A Discussion of Method and Significance。我提議就全國選出三十縣七市及四邊區(少數民族)舉行選樣普查，以期對於材料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可以逐漸進步，頗引起專家的注意，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並選載論文的一部，美國人口學者湯姆孫 (Warren S. Thompson) 氏繼起發言，認為我國如政治清平，經濟發展之後，人口的增加或較速於既往，因此可以引起國內及國際間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大會完畢時，普林斯登大學舉行臨別的盛宴，我國駐美顧少川大使蒞會演講。華盛頓大學東方學院主任戴樂爾 (George Taylor) 氏就「中國研究的將來」一題，認為美國的將來趨勢，要漸漸注意到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此種趨勢，顯與以往不同，因在以往的時候，其重心在研究中國歷史，哲學及藝術等。

成功湖 (三六、四、十)

成功湖是聯合國各機構暫時辦公之所。由紐約坐火車約一小時餘可至。我去參觀人口委員會 (Population Commission)，其顧問 Notestein 教授，已在普林斯登大學見過，尚有 John Durand 及前學生潘嘉麟，亦在彼工作。該委員會業已舉行會議數次，第一次在二月六日至十九日，其主要議決案有二：(一) 建議於經濟及社會委員會於一九五〇年舉行世界農業普查，同年舉行全美洲二十二國的人口普查。(二) 建議於經社會於一九四八年刊行人口年鑑，包括聯合國各會員國，並包括人口問題各主要項目。

那一日談話的主題，是聯合國業已決定於明年印行人口年鑑，關於中國部份，僅能擇其已有的材料，作比較普通的敘述，有時候並須作估計。

Notestein 介紹 General Frederick Osborn 我與 Osborn 曾經通信數次，只知道他是美國人口學

會的職員，不知道擁有軍事頭銜。原來在木次世界大戰，有一時美軍士氣異常頹喪，一般軍官對此，知其問題之嚴重而束手無策。Osborn 爲之策劃，選請大學校中著名心理學家若干人，研究分析，並提出辦法，結果軍中士氣復振。

Osborn 去年春來函，約余於去年十月間出席紐約市的美國人口學會年會，惜余當時正從事於戰時勞工生活的研究，未能如約爲憾。我在昆明聯大圖書館曾讀其所著的 *Preface to Eugenics* 一書，當時所得的印象，以爲此人似非對於著述富有經驗者。此次經 Note stein 的解釋，知 Osborn 素爲一商人，頗有贏餘，但於近年來損失其一部份，深覺銳意於商業，除華華爲利外，別無深厚意義，於四十五歲時退休，對於人口問題頗感興趣，時與人口學專家 Prof. Frank Lotimer 往還，經其指點及鼓勵，用力益勤，曾於 1934 年，二人合著 *Dynamics of Population* 一書。

Osborn 有叔曰 Henry Fairchild Osborn，曾著 *Man of the Old Stone Age*，余在哥倫比亞肄業時，即被列爲社會學主要參考書之一。

經馬歇爾將軍的介紹，Osborn 代表美國，爲原于能委員會委員之一。趁開會休息時間與之談話，我們三人站在一起，Osborn 身高六呎七吋，Nolestein 六呎一吋，余僅五呎二吋。會場攝影者見之，爲余等攝影以留紀念。余對自已曰：這是最可玩味的長子與矮子比較圖，美國對於這類的故事，往往歡迎，譬如三十年前，轟動一時的 *Mutt and Jeff* 滑稽片。

同化 (三六、四、十一)

紐約市公衆圖書館，有幾間屋子，比以前的布置格外講究。今日參觀外國文新聞紙展覽會，這些俱是美國境內所印行的。共列九十三種，內有中國文新聞紙數種。美國人口裏有大量的移民，由世界各處徙入。他們各有語言、文字、民風。到了美國以後，漸漸習英文，並與美國人同化。美國人對於同化工作，往往亦引此以自豪。前述外國新聞紙，雖尚在美國境內流通，但英文是他們的國文，學校裏，職業園中，與社會上俱用英文。只有家庭與朋友當中，有時還採用本國文字。我所參觀的是同化工作中最渺小的部份，但性質和同化工作一致，且亦頗感興趣。我所最注意的是標語的一種，文曰：許多種文字，一個民族 (*Many Languages, One Peo*

ple)。一九三四——三五年我爲研究我國海外僑民一事，曾遊歷南洋羣島。據估計，馬來亞、荷屬東印度，中南半島及暹羅共有華僑學校三千餘所，大多數的學校以國語授課。在校內，凡教員與學生，或學生與學生俱以國語談話，因此國語是交換意見，減少誤會，溝通思想的最大力量。凡國語盛行的華僑社區，衝突較少，感情比較融洽，團體械鬥之事罕有所聞。在南洋華僑社區裏，國語的普遍，與美國的同化工作，性質有相似處，一樣是社會化的原動力。

華盛頓紀念塔 (三六、四、十九)

華盛頓塔是美國首都名勝之一，高五五五呎，以大理石及西門士爲基礎，深三六呎，共一二六方呎，牆厚一五呎。一八四八年開工，一八八五年完成，值一，三〇〇，〇〇〇美元。各種紀念碑，俱可在石級上看見。內有由四十四省及十六市公立的，與由兄弟會，政治團體，學校，紅印人會，軍隊等所贈的。外國贈以紀念碑者有巴西日本與中國等。塔中空處底邊五五方呎，頂尖三四方呎，高五〇〇呎。余以前來遊時乘升降機，今日與致特佳，步行而上，升降機邊，共有石級九〇〇級，至二二〇呎處見有中文石刻，其文曰：欽命福建巡撫部院大中丞徐繼畲所著瀛寰志略 (道光庚申年出版，即一八四八年) 曰：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替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爲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爲公，駁駁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高善俗，不爲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衆國以爲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備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之人物，能以華盛頓爲稱首哉？大清國浙江甯波府鎮，耶穌教信董立石，咸豐三年六月初七日，合衆國傳教士識。

我因由石級步行而上，得抄錄前述石刻，如獲至寶，至於此件究爲何人所贈，似難驟下斷語，我以爲「耶穌教信董」所贈，鑄於甯波府。文中所說甯波府並非指甯波府知府，實係刻石的處所。但末後又有「合衆國傳教士識」，不知何意。細玩其文氣，應是中國籍耶穌教信徒的贈品，在甯波的美國籍傳教士，似不應該包括在內。

國會圖書館 (三六、四、二十)

一九一九年暑假，我曾在國會圖書館服務，那時的中文藏書在第二十八區。我的任務爲關於中文圖書的記錄與分類。有些書籍用布匣裝好之後，在匣背寫明書名及分類號碼，我所寫的亦不在少數，此次我到圖書館參觀時，知道東書庫 (*Orientalia*) 已移入新建築中。我看到二十八年前自己所寫的書目甚多，例如適園叢書 (*U341.C368*)，輿地紀勝 (*Bess, W 20*)，曹學士廟志 (*B 151. 1261. T. 78 C*)，當時的同事只有黑人 *Clair* 一人尚繼續在彼服務，我見其兩鬢斑白，問曰：尊姓的第一字母係 C 字抑係 K 字？余所能記憶者僅此而已。新樓在圖書館東邊，共五層樓，成長方形，外部用喬其亞省的大理石。書庫在樓房中間部份，在第五層的下面，其容量爲一千萬本，比舊圖書館大一倍。由新樓至舊館，有地下鐵道，以電力火車運圖書，舊館中著作權辦事處及譜系室已移至新樓。舊館無冷氣設備，新樓則有之。新館第五層樓有研究室一七二，供研究員借用。自一九二一年起，我開始博士論文的著述，在舊館的北幕 (*North Curtain*)，長期借用書桌一張，搜集材料，閱書並撰稿。其設備遠不如今日所有的研究室。本年在美國七個半月，我到過華盛頓兩次。第一次在四月，約留兩星期。第二次在八月與九月，約留六個星期，有許多時間是花費在人口局與國會圖書館的。我在普林斯登大學所擬關於我國選權人口的計劃，人口局若干專家深感興趣。他們和我有若干次的討論，參加討論者計有列各位：Morris H. Hansen, William Hurwitz, Benjamin Tepping, 有時候 Irene Taneher, A. B. Jaffe, Calvert Dedrick 亦加入。人口局專家在原則上贊同我的主張，在技術上有許多的修正，並協助我利用中國材料擬出一個他們認爲可以實施的人口選權普查。我很幸運的得到國會圖書館遠東書庫主任 Arthur Hummel 的幫助，在新樓借用一間研究室，在裏面可以利用中國人口報告，資料及地圖等，依照各專家及我擬定的選權計劃，由河北山西河南三省開始。這三省共有三百餘縣。在這許多縣裏我們要選出若干縣份，盼望可以代表三省的實際人口情形。此外尚須加若干市，作爲三省內市鎮人口的代表，然後按主要的人口特點，擬定選權普查。我說以三省開始，這是嘗試的性質，目的當然是在全國。不過國會圖書館關於我國的人口材料不多，所以我們因爲受材料及時間的限制，暫時僅取用三省，我自己每日在研究室內工作，人口局選權專家，亦幾乎每日來參加討論。最後三星期，每日至少有一人或二人來幫助。

安徽的「土四軍」

許柏

由於劉伯誠部的大舉南下（據說劉本人其實並未渡河，始終在鄂鄂南下隊伍係由鄧小平指揮），安徽弄成了目前這樣遍地烽火的面面。這中間，劉部自然是主要的力量，但「土共」也曾起過「火種」的作用，使這個「火把」在短時期內，燃遍了全省。

分佈及來歷

我且根據政府的調查，把長江以北的安徽境內的「土共」速寫一個輪廓。

(甲)「晉冀魯豫野戰軍」獨立旅李仁林部三千人（人數概依政府方面的估計），流竄地區為皖豫邊區沈邱、太和、臨泉一帶。

(乙)「新四軍」一、「鄂皖邊區游擊兵團」，又稱「皖西人民自衛軍」，由張體學任指揮長，陳大超任邊區黨委書記，羅厚福任司令員，下轄四個支隊及一個獨立營。每一支隊轄三個大隊，由鍾太湖等任司令，共約四千人，經常活動於舒（城）霍（山）岳（西）

邊區一帶。

二、「豫皖蘇邊區軍區」，張國華、魏鳳樓分任正副司令，下轄三個軍分區：

(一)第一軍分區（獨立旅），司令員金紹山，政委張大生，下設三團三營，共約四千人，出沒於永城宿縣間之苗橋濉溪鎮韓道口一帶。

(二)第二軍分區，魏鳳樓兼任司令員，四千人，出沒於臨泉、界首、沈邱間。

(三)第三軍分區，司令員李標，常在永（城）宿（縣）蒙（城）渦（陽）一帶流動。

三、「蘇中軍區第七軍分區」，指揮長饒子健，副指揮長趙匯川，下轄兩個縱隊，由萬立學等任司令。共約四千人，經常在洪澤湖東岸五河、潘村、泗縣、靈璧、蔣溝、劉圩集、仁和集、雙溝、青陽、鮑集、新集一帶活動。

四、「皖東北人民自衛軍兼津浦路西游擊總隊」，孫傳嘉部兩千人，活動地區為定遠鳳陽間。

五、各縣縣隊：

舒（城）六（安）
舒（城）柯（城）

霍山
六安

巢湖（陽）

雪楓

宿懷

宿蒙

蕭縣永（城）宿（縣）

五河

泗洪

泗縣

盱鳳嘉

定（遠）滁（縣）

各縣均設有縣隊，由縣長兼任隊長。

以上都是早經政府調查好了的，依照估計總共是兩萬三四千人。

「土共」有它的歷史。民國二十三年衛立煌攻佔金家寨，共軍主力西走，當時其一部分幹部即潛入皖中皖北。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潛伏各地的份子漸漸多了，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吧，各個「抗日根據地」就被建立了起來。他們多是舊時新四軍的幹部，聽說現在也仍屬新四軍統轄，所以，稱他們為「土四軍」或者比

起「土八路」還要貼切一些。

他們確是在日本人和國軍的鏖戰縫裏成長起來的。聽說當時日本人稱他們為「赤匪」，稱國軍為「蔣軍」，可見他們之恨共軍，比恨國軍更為厲害。

勝利之初，國共爭搶受降，國軍藉了美國大飛機的幫助，先幾天到了蚌埠；以後共軍曾攻到市郊的老虎山下，情勢相當危急；最後還是日本人出動了一大隊的鐵甲車沿淮南鐵路而下，才把他們趕走。

縣長 林傑
趙甫儉
霍依茹
陳爾達
蔣天然
李晨
魯雨道
汪冰石
邵光
李品立
張白鄂
謝楠
楊道南
方忠國
吳萬銀

居然美式配備

「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

用這首歌詞來形容「土共」，是再恰當也沒有。無論在抗戰時期或者勝利以後，安徽境內的共軍大約從來不曾有過一個兵工廠。靠他們的「陝甘寧邊區」運來吧，似乎不可能。於是只有搶奪敵人的武器之一法。誰是「敵人」呢？勝利以前自然是日本人，勝利以後就變成國軍了。

在政府武裝隊伍當中，為土共供應鎗炮最多的，要算地方團隊。此外是「大吃小」，找到了一個國軍單薄的小據點，就集中全力進攻，全部解決了才罷手。國軍曾因此吃過很多虧，現在似乎已經看清楚了這一着，甯願放棄一些地方讓共軍去佔領，不再敢把兵力過於分散。但現在方始發覺，似乎有點過遲了。目前，國軍所擁有的新式配備，「土共」也都有了！舉凡擲彈筒、火箭炮，無不如此。

糧源與兵源

「土共」的糧食，一部分也是從政府方面搶奪得來的，但大部分還是由於他們自己「搞生產」。事實很顯然，他們的兵，本來就大都是農民，而且「搞生產」自然也不困難。並且這還是他們糧食的主要來源。

此外，在他們的佔領區內，也有徵收得來的田賦。在國軍來圍攻的時候，他們就發行所謂「飯票」，聽說憑着這種「飯票」，便可到當地的老百姓家裏，吃到現成的飯，而將來，這種「飯票」就當田賦繳納。

國軍除供給他們一份美式鎗炮和糧食外，還供給兵源。

今年春天，蒙城縣參議會裏的一個參議員曾慨感系之的對記者說：「光是幾個土八路，倒是有甚麼可怕的呢！可怕的是他們利用這春荒嚴重，民不聊生的時候，到處誘惑民眾。好多人無路可走，就只好走上梁山。……據我所知道的，十幾天之內，走到那邊去的，就有一兩千人。……」

問題就在：為甚麼「春荒嚴重，民不聊生」呢？

飢民們為甚麼會被「土共」所誘惑而走上梁山？

當然，在「土共」的主觀方面，也有它之所以能夠誘惑民眾之處，譬如他們的理論。但中國老百姓政治意識的水準還實在很低，能區別「辯證法唯物論」和「唯心論」的，更可說是絕無僅有。所以主要的理由還在「民不聊生」。政府在替土共「徵兵」，而且都是「志願兵」，而且是源源不斷地在那裏替他們「徵」着。

作戰方針

大體上講，共軍目前

採取的都是游擊戰或所謂運動戰，在戰略上講，就是持久戰。

不硬攻，不死守；集零為整，化整為零；以大吃小，以小帶大；此剿彼竄，東起西伏。這些可以說是他們的作戰原則，也是他們「圍爭」的基本方針。

他們更注重「政治戰」。『爭取羣衆，學習羣衆，服務羣衆』是他們的口號。目前他們圍爭的主要方針是在於擴大農村面和建立政治信仰上。

他們能優待俘虜，絕少殺害。有好些縣長甚至於國軍的中下級幹部，於城陷被俘後，心想：這一下子可完了；但還好，他們僅被「勸告」了幾天，如不能接受，往往就被釋放出來。關於這些事實，國軍方面倒也承認的，稱之為「虛偽的優柔政策」。

其實，共軍也樂得這樣幹的，因為，有好些經過他們「優待」過的俘虜，回到這邊來時，往往都變成了他們的義務宣傳員。「土共」又有一種釋放囚犯的「習慣」。譬如他們上次攻下蒙城後，除大開倉庫的積谷讓窮人來搬運外，第一件大事就是釋放囚犯，不管是賊、小偷，土匪或者政治犯，他們

都「一視同仁」，一齊帶走了。

提到戰術，我便想起

一個小故事。時間是今年七月，地點是洪澤湖西南岸蔣壩鎮。「土共」攻佔了蔣壩，守蔣壩的一個保安大隊全部被俘虜了。但土共還是貪得無厭，又派人冒充保安大隊的人員，用電話向駐五河縣城的國軍告警，要他們趕快派一連人來「援救」。

「一營人夠了嘛？」五河的國軍問。「噫，那裏要這麼多，一連人就夠了。」於是國軍就即刻派出了工兵營的一連人，不過派出了之後，就一直沒有再回來，在五河到蔣壩的途中遭預伏的「土共」全部解決了。

試看它的作用

「土共」在內戰中起着一些甚麼樣的作用呢？一、牽制國軍。凡土共活躍的地區，國軍是無法把兵力都抽調乾淨的，總要留下一些部隊來守衛據點；在有鐵路的場合，更不能隨便移動。同時還要預置一些「清剿」的部隊。以過去的安徽而論，國軍受牽掣而不能調動的兵力，除地方團隊外，便有兩

個整編師以上的正規軍。

二、破壞鐵路，殺政和糧政。單就安徽來說，破壞鐵路之事倒比較少，而破壞糧政殺政則的確弄得政府有點頭昏腦脹。征兵征糧的官吏常被「土共」一個個活捉而去。

連縣長鄉長都似乎有所顧忌了。甚至於有好些低層幹部，像保長、甲長一流的人物，竟只好「兩面通」起來，因為有地些方可能在一天之內竟「三易其主」。

三、策應主力作戰。這是「土共」頂重要的任務。這次劉伯誠之所以能夠很順利的進入大別山區，「土共」的策應實在不可忽視，他們在許多方面幫助了劉部的行動，如糧食、運輸、嚮導、策應，以及情報的蒐集和傳遞等等。

在劉部剛渡淮河的時侯，洪澤湖的趙匯川部和定鳳邊境的孫傳嘉部，都鬧了起來。由於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有八九年的「圍爭」經驗，因而熟習了各地的民情和地形。他們善於組織羣衆，誘導羣衆。聽說這次劉伯誠的十幾萬大軍，

在缺糧的時候，竟也可以拿着「飯票」到老百姓的家裏去吃現成的飯。

大概也就是由於上述的原因吧，聽說十月間從廣濟以南和新洲赤湖（瑞昌北）渡過長江的，就是「土共」張體學蔡瑣所部七八百人。

此外，「土共」還有「婦女隊」，「兒童團」之類的組織。利用這些組織，就構成「情報網」和「情報站」。如得到了重要的情報，他們就星夜分站傳送。在這方面，國軍和政府的特務實在望塵莫及的。

這次風潮的掀起，導火線當然是選舉問題，可是湖南民社黨原來就新舊門戶對立，意見紛歧，一直對分贖不均，才露出原形來的。說也奇怪，該黨在整個湖南不上六千黨員，可是他們骨子裏竟分為新舊兩派。舊派大多數與昔時進步黨有點關係，主要分子是向懋父舒禮鑑危道豐幾個人，在情感和意志上多與張君勤密切，所以這些老頭子也就因為張的關係而擴大組織。新派是蔣

湖南民社黨的「家醜」

陳襟湘

越綏越不靖

到目前為止，國軍的綏靖工作已辦理一年多了，但是越綏越不靖，越殺越不盡。政府當局爲對付這「一股殘匪」，還特地劃出一個第八綏靖區，委夏威任司令官，統帥三軍（的確確是三個軍，現在則稱整編師），爲期已達一年，除了供給「土共」一些美式裝備、糧食、「志願兵」，並弄得勞師傷財之外，似乎並無所得。（十二月十一日寄自蚌埠。）

這黨章卅八條七款之罪，謹依七條一項之規定，特電質詢，懇急示改提人名交湘黨籌會通過再提，免多數黨員及全湘人士發生異議，致引起重大糾紛，不可收拾。盼急覆。湘籌委會代主任舒禮鑑，黨員羅正緯危道豐何永發陳毓英等二三人企叩亥支。

這是中央公佈遴選青年民兩黨省參議員後的第二天，人們正在盼望那些新貴到省參會去湊湊熱鬧，却想不到民社黨竟然包庇裏起火。

舊派與新派

十二月六日，長沙湖南日報刊載了一段加註的新聞，其中錄登了這樣一個電報：「上海海格路範圍六十五號張××先生轉張主席交中常會執監諸公均鑒：此次各級選舉提名，經湘籌委會決定，由向主任攜呈中央，聞蔣中常委向田，推翻原案，濫列私人，參雜汚劣，人言嘖嘖，玷辱黨譽。如果屬實，顯

管什麼黨規，儘量的吸收黨員，出售「選舉」……

「爲目的不擇手段」，這是新派的作風。他們

「爲目的不擇手段」，這是新派的作風。他們

還有一樁故事也值得一提。向樸父未返湖南之前，曾托舒禮繼代辦事情

舒禮繼代辦事情，舒不知從何處得來一點流言，說「六二」的「三

選舉角逐前後

「擁護」到「擁護」到底底是爲了發揮各人的主張嗎？天曉得！歸根落葉，還是爭官做，爭選舉，爭名爭利爭勢。老實說，蔣勻田的抓幹部，張君勱的拉老友，都是爲了今年的大選。所以在大選之前，雙方明爭暗鬥，無所不用其極。

把兩派的勢力比較一下，當然舊派不過新派。在每次會議上，新派說「這是黑的」，舊派就不敢反過來說是白的。所以凡是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省參議員的人選，往往新派佔優勢。舒禮繼說：「我們爲了面子，許多違犯黨規的事，我們不提出彈劾。對候選人的提名，也就不大爭執，因爲那實在沒有什麼意思。每次黨委會決定呈送中央的名單，只要大致過得去，我們也就不爭了，因爲中央的強

主席就爭不過蔣勻田。」國大代表和立監委員，大致上還圍了老派四個，其餘均由蔣勻田派包辦。由這一點，我們可知舊派的確是受足了氣的，以前還忍耐着，而這次公佈的民社黨七個湖省參議員中，舊委會原來提名的却一個也沒有上榜，都被蔣勻田刷得乾乾淨淨，於是舊派把以前蘊藏在內心的怨氣統統暴露出來，所謂「家醜外揚」了。

連我這個所謂負責者都不完全認識這些先生，所認識的幾個又都是漢奸，流氓，無名卒。這真是太豈有此理了。

中途入黨買了一員。至於×××呢，是一個會充專員公署小官吏的人物，在薛岳主湘時，曾因私藏軍火被拘押兩年，平日一向是惹人討厭的流氓。至於湖省新派的領導人物，據說是個初中未畢業的壞蛋，居然大遊大擺，盡力活動，而得到蔣勻田的垂青。其實這些人簡直是毫無資望，毫無常識的土豪或劣紳，這不能不引起一般人的反感。

湖南參府衝突事件

黃非

漢奸·流氓·無名卒

據說原來由籌委會通過的名單，包括王秀蘭、戴雲學、王果等，可是所公佈的參議員却是另外的七個人。據舒禮繼說：「

次大會中，喻煥生以第一紡紗廠的監察委員的資格

（記者按：第一紡紗廠會發生一動用三十億公款的

貪污案，鬧了一番之後，結果由省委會派三人爲該廠監察委員了）

向王主席東原提出質詢。他說：「

對於建設廳，希望王主席多加注意，因爲李慶長

天在共全省三千萬人民的座。這話怎麼說呢？我

僅就紡紗廠的二三件事來說。

「第一件，我聽說紡紗廠的監察隊長發牢騷，說廳裏派了許多掛名

警察，坐領乾薪，一點事也不做；又聽說工務課裏

也派了幾名掛名的技術人員，請課長也憤憤不平。

這次我到省垣向廳裏多方調查，結果並無廠方掛名

員的姓名。只有兩個姓

李的，據說是廳長的族叔

和堂兄，尙在當遠家中，並未來省。又建廳於九月

間令廠送布三十二件（記者按：共六百四十疋），並未付款，據說準備分發

員工應用。但我這次到省，並未看見任何員工穿一

寸廠布。這些布究竟到那裏去了？並且縱然是發給

員工穿了，但建廳員工爲數不多，三十二件布可做

五千多套衣服，恐怕也用不着這許多吧？建廳所管部門很多。如果設了三個監察的紗廠都可以隨便提布，那麼只設一個監察的採金廠，一個也沒有設的。水泥廠、煤礦公司、公路局等，又何嘗不可以提黃金提水泥提煤炭甚至要汽車票？像李廳長這樣作風究竟是哪乎？正乎？人乎？禽乎？我想知道是天地知你知我知，並且是如主席所出的佈告一樣，是全省軍民一體週知的。所以我主張張殿勳請先從建廳職起，剿匪請先從李廳長剿起！

官吏貪污·議員敲詐

這一番「跡近公然侮辱」的質詢，使滿座皆驚了。王主席只答覆七個字：「我一定要徹查的。」但就在旁聽席上的李毓九怎麼下得去呢？雖經王主席一再示意「會外解決」，他還是氣憤憤的起來答辯了。

「第一，關於紡紗廠警察問題：因為原來由警察處派到建廳守衛的警察因故被調回去了，所以建

廳才設法把紡紗廠的警衛調了五名到廳守衛。現在這五名警察仍然留在建廳，有人可查（記者按：第三日建廳登報更正五名為六名）。第二，吃缺的問題：這因為有幾位轉業軍官被派到紗廠工作，但迄未正式到差，薪金却已照給。這都有事實可查，雖是不合理的事，但我無法處理。（記者按：第三日建廳登報更正為「本廳奉省府命令派轉業軍官到紡紗廠，但均留長工作，薪金在辦事處支給，按時到公，並無領取乾薪情事。」原來轉業軍官曾開會對李毓九的話表示抗議）。

第三，建廳提了三十二件布，這都是員工備款照價購買，有案可查，手續完備，並無不合法情事。第四，喻參議員指我是共產黨，現在我當着主席，請求徹查，決不能接受這樣的侮辱。」

除了答辯之外，李毓九還展開了積極的反攻。他說：（一）喻煥生曾託王鳳山向我要求照原價購紗四十件（廠價比市價低），我因限於規章，未予

應允。（二）喻煥生介紹一名押運員到廠工作，亦因額滿未予錄用；因此之故，喻煥生懷恨在心，借故攻訐。並且（一）喻煥生任紗廠監察委員，久未到職，却仍支公款；（二）喻有子在紗廠掛名拿薪，並未工作。

又有建廳一高級職員對記者說：「喻煥生本人曾於上週向紗廠索詐一億元，該廠傳廠長未答應他，廠長也因為沒有甚麼正當理由給錢，未曾答應。其次，喻煥生託王鳳山向廳長買紗的事，有王鳳山蓋有私章的名片為憑，上面寫着：『福明工廠係喻煥生兄主辦，所請紗請予照發。』」第三，喻煥生託王鳳山介紹親戚到廠工作的事，有王鳳山的信為憑：「喻煥生兄之至戚吳某現在安江，轉囑請兄派往紡紗廠任用。」要查證據麼？有，很多，信件在，人證在。不過我要請示主席之後才能公開。」

對於這，王鳳山表示喻煥生代表縣參議會向廳方要求配紗或者者之，向

廠方介紹人或者者之，但他自己卻絕沒有轉達此意。而喻煥生則聲言：「如果有這種事，我可以自殺。」可是李廳長卻說：「我有證據，絕不冤枉人。」

這樣你一來我一往，互相攻訐，你說我貪污，我說你敲詐，什麼風度、尊嚴、威儀……都一古腦兒剝除，各各露出狐狸尾巴。然而，還不只此，好戲還在後頭哩。

建廳職員訓 參議會示威

第二天（九日）上午八時，建廳職員開了一個會，一致認為喻煥生不但侮辱了「我們的廳長」，而且簡直是把建廳開刀。於是大家一致決定：大家一起去參議會示威去！

上午十一時正當社會處作施政報告的時候，會場外面忽然人聲嘈雜，只見建廳百多職員，由科長率領，一擁而進，聲勢洶湧，衝過衙門，浩浩蕩蕩，直抵辦公廳門首，羣呼

口號：「衝進參議會去！」「抓喻煥生出來！」「打倒喻煥生！」「喻煥生是流氓地痞！」「打……！」「喊一聲，舉一下手，像宣誓一樣，情況非常混亂。秘書長出來解釋，沒有用，李毓九本人出來制止，也沒有用。他們所堅持的，是：（一）喻煥生公開宣稱亂要從建廳職起，要他拿出建廳為匪窟的證據來。（二）要參議會把喻煥生交出來，叫他親自答覆。（三）要招待新聞界報告喻煥生敲詐劣跡，發快郵代電。直到後來省府秘書長劉公武出來代表主席解釋，要他們「保持政府威信，尊重參議會尊嚴」，羣衆才一路呼喊着口號，退了回去。

這一鬧，問題就鬧大了。參議諸公認為「他們擅自集衆包圍會場，置參議員於何地！這簡直是土匪行徑。」「今天來的是王主席任命的官吏，不是無組織的羣衆，王主席要

對省參議會負責，照這樣看起來，以後參議會可以不要開會，人民代表也可以不必說話。」「建廳的暴動李廳長是首犯，省府如不撤查李毓九，我們大會立即解散。」「在民主政治下，這樣以武力向參議會示威，不是湖南單獨的問題，而是全國民意代表的恥辱，這種行動確與共產黨一樣，這樣不講理就等於共產黨。」雖然也有幾個老成持重的起來說什麼喻煥生措詞太濤火云云的，但都被一陣噁聲止住了。最後議決三點：（一）派九位代表向王主席交涉；（二）明日召開緊急會議，聽取九人報告，再作決定。（三）明日大會請王主席公開答覆。

代表們向王主席提出三個條件：（一）撤李毓九的職；（二）懲辦此次「暴動」首要職員；（三）保證以後無類似事件發生。王主席認為二三兩條件可以考慮，第一條非在他職權範圍內，不能答應。當晚王主席召集廳處局

對省參議會負責，照這樣看起來，以後參議會可以不要開會，人民代表也可以不必說話。」「建廳的暴動李廳長是首犯，省府如不撤查李毓九，我們大會立即解散。」「在民主政治下，這樣以武力向參議會示威，不是湖南單獨的問題，而是全國民意代表的恥辱，這種行動確與共產黨一樣，這樣不講理就等於共產黨。」雖然也有幾個老成持重的起來說什麼喻煥生措詞太濤火云云的，但都被一陣噁聲止住了。最後議決三點：（一）派九位代表向王主席交涉；（二）明日召開緊急會議，聽取九人報告，再作決定。（三）明日大會請王主席公開答覆。

代表們向王主席提出三個條件：（一）撤李毓九的職；（二）懲辦此次「暴動」首要職員；（三）保證以後無類似事件發生。王主席認為二三兩條件可以考慮，第一條非在他職權範圍內，不能答應。當晚王主席召集廳處局

對省參議會負責，照這樣看起來，以後參議會可以不要開會，人民代表也可以不必說話。」「建廳的暴動李廳長是首犯，省府如不撤查李毓九，我們大會立即解散。」「在民主政治下，這樣以武力向參議會示威，不是湖南單獨的問題，而是全國民意代表的恥辱，這種行動確與共產黨一樣，這樣不講理就等於共產黨。」雖然也有幾個老成持重的起來說什麼喻煥生措詞太濤火云云的，但都被一陣噁聲止住了。最後議決三點：（一）派九位代表向王主席交涉；（二）明日召開緊急會議，聽取九人報告，再作決定。（三）明日大會請王主席公開答覆。

完結中
張亮

各首長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拉住趙議長和唐副議長伯球商談了一整夜。

第二天參議會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議了兩三小時，謝絕記者旁聽。下午三時，由王主席率領省府的道謝團至參議會道歉。並解釋此次「暴動」，事先李毓九並不知情，該團主任秘書則已撤職。一場風波便這樣轉入低潮了，其間的奧妙文章，心機轉折，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十一日）又成立了什麼特別調查委員會，分別調查李毓九噓煥生貪污證據的事跡，然而我們可以預料，調查的結果將是：貪污者與被詐者，在「威信」和「尊嚴」的大題目下，互相諒解，誤會冰釋。不信，等著瞧吧！

對於這一次「參」政「衝突」的事件，老百姓是抱著觀望的態度，來看熱鬧的。因為他們知道，政府方面的貪污無能，家喻戶曉，自不必說，而口口聲聲自己是人民代表的也不見得怎樣清白。安江第一紡紗廠動用三十億公款的貪污案，就是由省參會派三個監察院院員的，大家分點好處，便不作聲了。此外，政府發還給人民的糧食庫券債款，由省政府提議，省參會贊助，決定截留一半充作「農建」公司股本，參議諸公大多兼任農建的董事，引起人民不滿，各縣參會紛紛抗議，釀成「縣民意」與「省民意」之事。嗚呼，

「全國民意代表」的恥辱

建康主任秘書撤職後，各科科長也相繼辭職，簽名蓋章；輪到最後某科長，他慨然嘆道：「我幹科長二十多年了，丟也丟不脫，今天因此辭職也很好。」大官圖法，小職員作犧牲，這現象在中國是比比皆是的。

揭開了一池糞便，臭氣冲天，自己還意不去，終於拉拉扯扯又想把牠蓋起來。但蓋起來卻不如揭開那麼容易，所以在昨天

民主花樣是發新了！還有，參議員除一名彭紹香外，都在省政府兼參事之職，拿四百塊月薪的乾薪。稍議長雖聲明還是參議員私人問題，但據說各參事之能全體「備位參事」，還是參議會以正式公文向省府要求，經過王主席親批「照辦」的。其餘如硬逼人民拆掉棚屋讓出地盤，好建造今日用來開會的「民主講堂」……諸如此類，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用不着建議職員來揭發。這樣的民意機關，民意代表，藉一句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這不是湖南參議會的問題，而是全國民意代表的恥辱。」（十二月十二日寄自長沙）

（十一日）又成立了什麼特別調查委員會，分別調查李毓九噓煥生貪污證據的事跡，然而我們可以預料，調查的結果將是：貪污者與被詐者，在「威信」和「尊嚴」的大題目下，互相諒解，誤會冰釋。不信，等著瞧吧！

對於這一次「參」政「衝突」的事件，老百姓是抱著觀望的態度，來看熱鬧的。因為他們知道，政府方面的貪污無能，家喻戶曉，自不必說，而口口聲聲自己是人民代表的也不見得怎樣清白。安江第一紡紗廠動用三十億公款的貪污案，就是由省參會派三個監察院院員的，大家分點好處，便不作聲了。此外，政府發還給人民的糧食庫券債款，由省政府提議，省參會贊助，決定截留一半充作「農建」公司股本，參議諸公大多兼任農建的董事，引起人民不滿，各縣參會紛紛抗議，釀成「縣民意」與「省民意」之事。嗚呼，

生死戀

林淑華著

預約每冊四萬元，卅七年一月十日截止。預約處上海郵政信箱四〇五六號

內政部備案登記證警字第四一八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三八號

本刊停刊一月啓事

本刊奉上海市社會局通知，以轉奉內政部代電，予本刊停刊一月（四月）之處分，並令具報停刊日期，自須遵照辦理。茲於本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第二卷第十五期後，自同月二十日起至三十七年一月十九日止停刊一月，第二卷第十六期延至明年一月廿三日出版，除已分呈上海市社會局及警察局備案外，特行啓事週知。停刊期內，經理部照常於每日下午二時半至五時辦公，敬希公管。此啓。

掛號訂戶注意

茲以郵資加價，掛號及航掛訂戶每期增加郵費二千五百元，應請補寄郵費。

本刊合訂本第三冊出版預告

本刊合訂本第三冊（第二卷第一—十二期）即將出版，每冊定價七萬元。合訂本第一冊再訂本（第一卷第一—十二期）準於十二月底出版，定價四萬元。合訂本第二冊（第一卷第十三—廿四期），定價四萬元，餘書無多，欲購從速。

時與文訂閱辦法

- 一、本刊定期訂閱辦法，一次至少三個月，訂閱期間不受零售價格調整影響。郵費漲價，另函通知照補。
- 二、如匯款不便，可購大額（千元以上）郵票掛號寄下，十足通用。
- 三、訂戶儘先寄發，且較另售爲廉，外埠讀者尤可不受加成影響。
- 四、訂費務請一次匯足，姓名住址，請勿草書，以免貽誤。
- 五、續訂請註明原訂單號數。

訂閱		價目	
三個月十二期	國內	平寄	六萬元
	航空	掛號	十萬元
半年	國內	平寄	八萬五千元
	航空	掛號	十二萬元
全年	國內	平寄	十六萬元
	航空	掛號	二十萬元
外國	平寄	加	二元半美金

時與文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ung Road, Shanghai, China

發行人 程博
編輯部 上海崑崙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